

# 晚年林彪

原创作者：温相

## 《晚年林彪》总目录

### 第一章：林彪与毛泽东的历史渊源

- 第一节：林彪首次支持毛泽东
- 第二节：从“短促突击”到会理会议
- 第三节：“战锦方是大问题”
- 第四节：在“高饶事件”中

### 第二章：在庐山崛起

- 第一节：林彪与“反教条主义”
- 第二节：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历史宿怨
- 第三节：林彪上山
- 第四节：主持军委扩大会议

### 第三章：神化毛泽东的背后

- 第一节：突出政治
- 第二节：谭政遇难
- 第三节：林、罗交恶
- 第四节：插手海军
- 第五节：异调独弹
- 第六节：“腹诽”种种

### 第四章：“文革”序幕

- 第一节：整垮罗瑞卿
- 第二节：江青请“神”
- 第三节：匿名信风波

## 第五章：跃居“副统帅”

- 第一节：摊牌前后
- 第二节：贺龙蒙难
- 第三节：肖华“落马”
- 第四节：傅连璋沉冤
- 第五节：“杨余傅事件”始末

## 第六章：林彪集团、家族概况

- 第一节：叶群其人
- 第二节：“超天才”林立果
- 第三节：“四大金刚”
- 第四节：陈伯达入伙
- 第五节：林小琳与林立衡

## 第七章：分道扬镳

- 第一节：林彪·江青·康生
- 第二节：设立国家主席之争
- 第三节：炮打张春桥
- 第四节：批陈整风

## 第八章：林彪之死

- 第一节：毛泽东南巡
- 第二节：“571工程”
- 第三节：折戟沉沙
- 第四节：身后余波

## 第一章：林彪与毛泽东的历史渊源

### 第一节：林彪首次支持毛泽东

毛泽东、林彪之间的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井冈山时期，特别是红四军“七大”前林彪对毛泽东的首次明确表态支持，这给毛、林关系的发展的投下重要的一笔，因此我们首先就要对这件事给予重点的介绍。

说到红四军的“七大”，就要先说一说中共中央在1929年的“二月来信”。1929年4月3日，红四军前敌委员会（简称“前委”）接到中共中央写于同年2月7日的一封信，这封信史称“二月来信”。该信的主要内容主要是根据共产国际（第三国际）领导人布哈林的讲话精神写成，要求红四军化整为零，分散到农村中去，甚至提出要求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此信写于革命处于严重低潮阶段，其对革命前景的估计显然印有当时的烙印。而实际上在4月4日，中共中央就已经对此信中的部分观点做了修正，提出如果朱德、毛泽东一时不能来的话，中央希望红四军前委派来一名得力的同志和中央商讨有关问题。然而，“二月来信”还是留下了一定的“后遗症”，例如对游击战的观点。红四军内部开始出现分歧。恰巧在这时，中央派来的刘安恭给本来已经不够平静的红四军的政治水面上扔进了关键的一枚石子，从而激起了“七大”的轩然大波。

刘安恭(1899-1929)，字季良，四川永川人。其父曾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率领群众推翻永川县满清政府，被推选任第一届民选县长。幼时随父迁居成都，受过中等教育。1918年前后考取官费赴德国留学，入柏林大学电机工程系学习。1922年后与旅德的章伯钧等结识。曾在比利时加入第三国际，成为共产党员，参加旅欧革命活动。1924年前后回国到成都，应川军将领杨森之聘任其军部参谋，同时任成都电话局局长。后随杨部到四川万县。1926年秋起协助朱德在杨森部队从事兵运工作，先是发动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万县事变”，又策动杨部一个团参加国民革命军。1927年初转至武汉，同年夏在汉阳国民革命军某师负责筹组政治部。大革命失败后，8月参加南昌起义，在起义军中做政治工作。随军南下失败后转至上海。1928年初与刘伯承等赴苏联，被分配入红军高级射击学校学习。1929年初结业回国到上海，被党中央指派为中央特派员，携带中共六大文件和中央2月7日给红四军前委的信(即“中央二月来信”)前往红四军指导工作。

红四军原工农运动委员会在改组为政治部后，毛泽东亲自兼任主任，刘安恭进入四军，则很快取代毛泽东成为政治部主任，同时兼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刘本

人下车伊始就公开指责毛泽东“太霸道了。”【注1】（《陈士榘回忆毛泽东》112页）刘安恭的这个指责和此前湖南省委巡视员杜修经、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杨开明的提法如出一辙。由于刘安恭头顶上戴着中央派来的帽子，所以，一经他开口，四军内部就党对军队的领导问题很快进入激烈争论阶段。刘安恭主持临时军委会议要求划定前委的范围、削减前委的权力。至1929年5月底，福建永定县湖雷红四军前委会议上关于前委、军委权力之争已经演进到白热化。争论的焦点是红四军要不要仍旧设立军委，一方认为应该有，而且还要扩大，指责前委包办、专政，搞“家长制”，实际矛头是对着毛泽东；另一方则认为设立军委未免叠床架屋、分权主义。两方意见莫衷一是、各争雄长。这起争论表面上看来是对前委、军委的职权范围界定的讨论，实则根本上还是围绕着如何发展红军、壮大根据地的核心问题展开，其主要表现形式则是组织路线上是不是继续按照毛泽东原定的思路。自然也就牵扯到毛泽东所担任的书记的前委上来，在争论中关于一些陈年老帐也被提了出来，有些人并没有完全从工作的角度出发进而演化成为人身攻击，尤其是不点名的对毛泽东的指责成为这次会议的潜在主题。

这里需要回顾一下毛泽东在红四军及其根据地中的地位沿革。1928年4月，朱、毛井冈山会师，毛泽东任红四军党代表兼军委书记，同年5月，毛泽东任湘赣边界特委书记，红四军军委书记则由陈毅担任。6月，根据中央指示，毛泽东任前委书记，统一管辖特委和军委。在1928年4月到1929年5月之间一年多的时间里，毛泽东几乎始终是红四军的当家人，虽然红四军“六大”上朱德成为红四军军委书记，但是，红四军的行止在相当多的程度上要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理。毛泽东力主以宁冈为大本营开展土地革命进行波浪式推进，这从后来的事实证明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可是，毛的这个观点却受到湖南省委乃至中央的干扰，而这种干扰却迎合了红四军内部一些人，由此引发的争议后来导致了井冈山革命斗争史上著名的“八月失败”。原本“八月失败”的老帐还没有来得及清算，这次又增添了二月来信和刘安恭的“钦差”言行，以致于一个区区的湖雷前委会议也不能解决上述争端，非要付诸全军的代表大会了。

在湖雷会议中，此时身任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的林彪可谓旗帜鲜明，从一开始就积极的站在了毛泽东的一边。而投身到争论中的林彪所带有的特色颇能折射出其人后来的某些做法的痕迹。林彪先就给主张设立军委的人扣上一顶大帽子，说他们这是“无耻的阴谋”。【注2】（《萧克回忆录》123页）林彪对毛泽东的支持在当时看来还是不容忽视的，一则林彪的职务比较显眼，二则林彪并不能算是毛泽东历来主张的无条件服从者。陈毅晚年曾经回忆，在1929年4月，也就是湖雷会议召开前一个月，就中国革命高潮是否到来，毛泽东与林彪之间发生了冲突。毛泽东提出“江西的革命条件成熟了，我们准备一年之内实行争取江西的计划。”林彪当时就反对，林彪说：“你这个估计不正确，我根本不同意一年争取江西的计划。湖南你再说不行，湖南人他愿意当兵，我们这个队伍到湖南就扩大了队伍；我们队伍一到江西，没有老百姓愿意当兵；我们到福建，福建当然有苏区，但是也没有人愿意当红军。红军根本就不能扩大，怎么还说要夺取江西一省？不能作这个估计，我们有什么办法去打南昌？敌人

有一个旅、两个旅尾追，我们就要避免作战，搞得我们马不停蹄，我们还要夺取南昌，夺取江西？这是高调，我不同意。我的主张还是要把队伍分散了去打游击，看一个时候，看一个很长的时候，看有没有希望。可以到全国各地去打游击，争取群众，扩大声势，以后再说。”【注3】（《陈毅谈井冈山时期的林彪》《党史博览》2003年第10期）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并没有说服林彪，可也没有听从林彪的意见。由此可见，林彪在湖雷会议上支持毛泽东，其本身还不能说是一种“投机”，更多的是他与毛泽东在前委、军委乃至红军建设上某些观点的一致，而且林彪在4月间反驳毛泽东的意见不等于他认为红四军可以离开毛泽东。

就在湖雷会议和红四军“七大”之间还有一个扩大会议，地点在白砂。这次会议尽管投票取消了临时军委，可对于毛泽东的主张还是大有抵触，毛泽东这时求去心切。他在白沙会议上提出一份意见书，一共包括四点，而主要涵义则是阐明他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这里所谓的不生不死的责任指的是毛泽东不能担当一个徒有虚名的前委书记，因此他提出离开。当毛泽东求去态度一明朗，林彪很快就来了反应。江华回忆说：“当天夜里，林彪给毛泽东同志送来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赞成毛泽东同志离开前委，希望他有决心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注4】（《江华回忆录》89页）毛泽东辗转反侧、一夜未眠，就在接到林彪的信的几天之后也就是6月14日，毛泽东作出回复，即《给林彪的信》，毛泽东开宗明义的第一段话就说：“你的信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注5】（《毛泽东文集》第一卷64页），毛泽东说的很为清楚，那就是对林彪之于自己的支持相当满意。毛泽东在信中还批驳了一些人加诸给他的种种指责，包括家长制的说法。平心而论，这场争论中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红四军内部对朱德、毛泽东两个人的工作手法和个人性格上的定位评价。朱德为人宽厚、包容，而毛泽东就偏于严厉，缺乏民主。江华说：“毛泽东同志对干部要求高、要求严，批评人也是很严厉的，……常常令人难以接受、下不来台，因而有些同志对他是有意见的。”【注6】（《江华回忆录》94页）而黄克诚转引何笃才的话指出毛泽东的缺陷在于“过于信用顺从自己的人，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不能一视同仁，不及朱老总宽厚坦诚。”【注7】（《黄克诚自述》113页）

林彪的信发出，毛泽东还是要走，朱德在6月15日回复林彪关于前委问题的争论，朱德的这封信还能体现朱德一贯的“长者”的作风。此前，林彪在给毛泽东信中讥讽朱德“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结合，专门吹牛皮的攻击别的同志。”【注8】（《朱德传》178页）林彪还进一步提出朱德在“拉拢下层”。而对于这些，朱德并没有过于在意，他的信中只是就事论事，客观的提出红四军中出现的书记专权的沉闷现象容易打击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整个争论过程中，朱德较少涉及个人的人身攻击，也较少进行挖苦讽刺乃至漫骂，这是十分难得的。毛泽东给林彪的复信以及朱德的再复都给公布出来进行公开讨论，这样一来，七大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七大在福建龙岩召开，七大的组织决议有些各大五十大板的味道，一方面对毛泽东、朱德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和书面警告处分，一方面还教训了刘安恭和林彪，指出林彪的信“未免过分估量，失之推测。”决议在批评刘安恭的同时肯定了毛泽东并没有在红四军中拉帮结派。应该说，七大对于平息一段时间以来的无休止的争论起了一个遏制的的作用。而且，七大的民主方式和要义精神还是比较可观的，萧克多年之后还这样评价七大说：“如果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我们党还保持像四军七大那样一种批评精神，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也许就搞不起来。”【注9】（《朱毛红军侧记》98页）七大的一个最为主要的特征就是毛泽东暂时离开了红四军，前委书记改为陈毅担任。毛泽东走前说：“至于会议对我个人有很多批评，我现在不辨，如果对我有好处，我会考虑，不正确的，将来自然会证明他这个不正确。”【注10】（《毛传》211页）而其内心对这样的决议自然不满。会后，毛泽东和贺子珍、江华等人去蛟洋，离开龙岩时马匹还给扣住不放，难怪江华事后感慨：“那时我们一行人真有些灰溜溜的样子。”【注11】（《江华回忆录》97页）

红四军七大留给毛泽东的隐痛是不言而喻的，这次会议导致的毛泽东在政治上的第一次大的挫折和此后的被临时中央剥夺权力还有所不同，因为后者毕竟头顶上戴着上级领导的帽子，而此次则是一个自下而上的民主决议方式将毛泽东选举下台的，更何况他们对毛泽东的指责令毛泽东大为光火。9月召开的红四军八大前夕，邀请毛泽东出席大会，毛泽东非但不予理会，还写信痛斥说：“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这是陈毅主义的眼中之钉，陈毅要我做八方美人四面讨好，我办不到。红四军党内是非不解决，我不能随便回来。”【注12】（《毛传》212页）在信中毛泽东把陈毅的主张竟然一下子上升到政治路线和主义思想这样的高度，而此前在陈毅于7月转回中央之前前来蛟洋和毛泽东交换意见时，两人之间再度爆发争论。【注13】（《江华回忆录》94页）毛泽东的回信换来了前委给毛泽东的又一次的警告处分，并且责令毛泽东必须到会，病势很重的毛泽东不得不坐着担架回到军中，毛泽东事后把这次患病称之为“鬼门关”，也因为毛泽东的这场大病久不露面，连共产国际都误将国民党方面的道听途说当作真相，居然在1930年年初的《国际新闻通讯》上给毛泽东发了“讣告”。尽管此后，朱德、陈毅都认识到红四军七大中把毛泽东“请出”领导岗位是犯了一种错误，可是，这段误解在其后的日子里随着毛泽东的政治地位的不断上升进而被演化成为所谓的路线斗争，举凡涉及井冈山或者早期红军时，朱德、陈毅的这段个人历史都要给别有用心的人抬出来臭批一顿借以显示某种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而这些也就成为朱德、陈毅在今后几次重要的政治斗争中的沉重的历史包袱。

但是，对于林彪来说，虽然他没有达到挽留毛泽东的目的，却意外的赢得了支持毛泽东的影响，就这个影响来说在林彪自我爆炸之前那是相当深远的，它

给毛泽东同林彪日后的交往铺垫了一层深厚的基石，也给林彪本人的拥护毛泽东的历史罩上了第一个耀眼的光环。

## 第二节：从“短促突击”到会理会议

在陈毅主动认识到毛泽东离开红四军领导岗位的错误和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九月来信”让毛泽东从第一次大挫折中站了起来，继续领导红四军。

然而，就在毛泽东归队不久，林彪又一次向毛泽东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而林彪提出的问题因为事涉中国革命前途的大节，所以，毛泽东提笔写了一篇文章作为给林彪的答复，前后不到半年，毛泽东已经两次给林彪写去长信，这次回复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在回复中尽管指出林彪等人的这种思想上的种种不足和缺陷，却没有厉声指斥，更没有扣什么帽子，彼此之间更像是一种平和的讨论，在回复的结尾处，毛泽东还少有的用文学的笔调深情的写道：“但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遍览毛泽东的各种著述，类似这种笔调还不多见，何况这是在谈一个十分严肃的话题，从这个结尾来看，毛泽东的回复更多的应该是激励而非批判。但是，林彪的提问却成为一桩历史公案，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就有着不同的解读。1948年，林彪曾经向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如果公开刊行此信的话，请不要再提他的名字，适时，林彪已经成为方面军统帅，这样的请求又不过分，自然得到批准。若干年后，林彪在党内声名日渐显赫之际，借着重上井冈山的机会，填了一首《西江月》（一说是他人捉刀），内中有句“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这句词不论是否为林彪所作，但都代表了林彪的意思，只不过说什么“岂疑星火燎原”未免有些做作。且不论林彪确曾怀疑过“红旗能打多久”，而且林对革命前途不那么看好其实早已有之。粟裕回忆说：“当时黄埔军官学校出身的一些军官，其中包括七十三团的七连连长林彪，来找陈毅同志，表示要离开队伍，另寻出路。而且还“劝”陈毅同志也他们一起离队。他们说：“你是个知识分子，你没有打过仗，没有搞过队伍，我们是搞过队伍的，现在队伍不行了，碰不得，一碰就垮了。与其当俘虏，不如穿便衣走。”陈毅同志坚定地回答说：“我不走，现在我拿着枪，我可以杀土豪劣绅，我一离开队伍，土豪劣绅就要杀我。”陈毅同志更严肃地告诫他们：“你们要走你们走，把枪留下，我们继续干革命。队伍存在，我们也能存在，要有革命的气概，在困难中顶得住，个人牺牲了，中国革命是有希望的。拖枪逃跑最可耻！”陈毅同志的这一席话，不仅痛斥了动摇逃跑分子的可耻行为，而

且充分表达了他在险恶的环境里坚持革命到底的顽强决心。”（【注 14】《粟裕战争回忆录》41 页）粟裕回顾的这段历史发生在南昌起义失败后，可见，从那时候开始，林彪对革命的前途就有着一定的悲观意识。1955 年授予元帅军衔的十位高级将领中，朱德、贺龙、刘伯承、叶剑英、彭德怀在参加革命前都已经在国民党军中有了一定的地位和影响，其中朱德、贺龙、叶剑英的职务还一度比较显赫，然而即便是这样，仍旧没有影响他们走到中共阵营中的决心，如果说到摇摆不定，他们似乎比林彪更具有“先天条件”，而遍观十大元帅，像林彪这样公开怀疑革命的前景的确罕见。

文革中为了美化林彪，以致于完全回避林彪的提问。而林彪死后，对于林彪的评价又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把林彪的正常提出疑问说成丧失立场、投机革命的代名词，也是不可取的。关于林彪提问的本身，黄克诚有过一个客观的评论，黄说：“林彪写信给毛主席，提出‘红旗能打多久’的问题。在党内来说，一个下面的干部，向党的领导反映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现在看来这是个好的事情；如果把自己的观点隐瞒起来，上面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这是不正确的态度。林彪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尽管观点错误，但敢于向上面反映，就这一点说，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态度。在党内有什么意见就应该提出来，现在应该提倡这种精神。有些同志不敢提意见，生怕自己吃亏，这不好。提的意见不一定都正确，还可能是错误，这不要紧，错了可以批评。由于林彪提了这个问题，毛主席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林彪不提那这个问题，毛主席那篇文章也写不出来。”（【注 15】《黄克诚自述》380、381 页）黄克诚持论公允，不因人罪事。然而，我们从黄克诚的评论中也能发现，黄克诚肯定的也仅仅是林彪提问的方式、方法而非林彪所提问题的观点。纵观林彪一生，他诚不失为一名优秀的战将乃至军事家，但是，却缺少在战略上的远见卓识和高瞻远瞩，这个致命的弱点后来直接导致他在政治上摔倒、垮台。

随着毛泽东率领红军开始打退国民党军的三次反围剿并且登上红一方面军乃至中央苏区的领导岗位，林彪的位置也随之有了新的变化，他从红四军的第一纵队司令员而红四军军长而红一军团军团长，成为朱毛红军中屈指可数的大将之一。林彪以其在运动战中的出色的军事指挥才能赢得了全军上下的尊重，特别是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林彪大败蒋军王牌主力，令陈诚的土木系为之失色，成为红军战史上特为可书的一笔。而就在林彪风头正健时，毛泽东再度迎来了他政治生涯上的又一次重挫。如果说井冈山是毛泽东的“土伦”，那么宁都无疑则是他的“麦城”。中共党史上有两次宁都会议都是以打击毛泽东为主要内容的，尤其是 1932 年的宁都会议，惟其如此，所以，这次宁都会议已经成了特指。意即 1932 年 10 月 3 日到 8 日在江西宁都小源召开的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以王明、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挟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的余威施压于中央苏区并且迫其就范的重要表现。而要达到这种目的首先就必须剥夺毛泽东在军事领域的发言权。就在这次会议上，与会者多次向毛泽东发难，给毛泽东扣上一顶又一顶的帽子，例如“上山主义”、“东北路线”、“守株待兔”、“不尊重党领导机关和组织观念的错误”等等。在讨论毛泽东工作去

向时，周恩来、朱德、王稼祥都不同意把毛泽东调离军事指挥岗位，但是，却没有说服多数派。接着在10月6日的会议上，博古还就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温和”态度做了点名批评，博古要求同毛泽东的所谓倾向做坚决的斗争。10月26日，中央正式任命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1933年6月，再次召开的宁都会议不但否决了毛泽东对前一次宁都会议的批评，还由此认定上一次宁都会议的正确是保证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被毛泽东称之为“高慢的宗派主义”的宁都会议导致对毛泽东在此后一段时间里的不断升级的打击纷至沓来。

毛泽东因为养病的关系和中共福建省委书记罗明长谈了一次，罗明对毛泽东的主张深以为然，回去后还向大家做了传达。罗明或许还没有从他和博古的接触中领会到博古等人之于毛泽东的真实态度，博古去长汀期间，有人提议要博古顺路看看毛泽东去，而博古说：“毛泽东有什么可看的？”【注16】（《毛传》311页）果然，当罗明开始布置下面按照毛泽东的意见办理巩固、扩大闽西根据地时，临时中央发出《关于闽粤赣省委的决定》，第一次以文件的方式提出“罗明路线”，并且因此撤销了罗明、谭震林、张鼎丞等人的职务。与此同时，临时中央还布置开展在江西和红军内部肃清罗明路线残余势力的斗争，邓小平、毛泽覃、谢维俊、古柏作为“四大毛派头子”，肖劲光、陈正人、李井泉、余泽鸿作为“四小毛派头子”先后遭到无情打击。而其矛头则是对准毛泽东，毛泽东自己也深有体会，他说：“反邓毛谢古，是指鸡骂狗。”【注17】（《百年小平》69页）

为了进一步削弱毛泽东的权力和影响，博古还请出一把“尚方宝剑”，这就是李德。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出生，1919年参加德国共产党，曾经被送往莫斯科进行军事深造，1933年9月到达江西瑞金，出任所谓的“顾问”，博古明确李德可以全权处理军事，把李德抬到一个吓人的地步，其内容并不完全因为李德来自苏联，而主要是博古准备利用李德的名头和身份对已有的权力结构进行全面的分化、改组。王明离开上海赶赴苏联前夕指定博古、张闻天、陈云、卢福坦、李竹生、康生6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其中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常委，博古总负责。这个总负责其实就是总书记，博古、王明、周恩来、卢福坦等人在小酒店里开会，会上便说明博古的实权就是总书记。【注18】（《博古传》96页）到了江西以后，三位常委只剩下了博古和张闻天（卢福坦变节）。张闻天并不好驾驭，博古乃以李德充当钦差的幌子，一则应付远在苏联的王明，一则震慑近在咫尺的战友。由于李德自命受训于苏联，所以，一上台就基本摒弃了毛泽东的原有主张。这时，毛泽东业已自顾不暇，邓小平降职、肖劲光判刑、贺敏学（贺子珍的兄长）罢官，当贺怡跑来向姐姐、姐夫哭泣时，毛泽东无奈的说：“你们是受了我的连累呀。”【注19】（《毛泽东传1893—1949》333页）当时毛泽东的处境用他自己的话形容就是：“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现在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坑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注20】（《毛泽东传1893—1949》334页）毛泽东之所以很快在苏区丧失权力，主要原因是博古等人打着中央的旗号，但是，另外一层原因也不容忽视，这就是后来黄克诚所感悟的：“本来，毛泽东同志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中，已经有了很高的威望，大家都公认他的政治、

军事路线正确。然而，临时中央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后，轻而易举地夺了毛泽东的权，以错误的政治、军事路线，代替了正确的政治、军事路线。之所以会如此，苏区同志相信党中央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如果不是毛泽东同志在组织路线上失掉了一部分人心，要想在中央苏区排斥毛泽东，当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注 21】（《黄克诚自述》113 页）

李德一旦手握大权，很快就在红军中积极推行他的那套主张。李德力主堡垒政策和短促突击。这种消极的防御手段首先在武器问题上就行不通，堡垒政策也好、短促突击也罢，锐利的武器是必不可少的后备力量，而当时红军一无飞机大炮、二无外线补给，所使用的子弹既不是来自外国的“洋货”，也非国内正规兵工厂的产物，而是自制的再生弹，这种再生弹里装的是土造的硝盐，燃烧速度慢不说，动力也不足，弹丸不能很好的咬和膛线，初速很低，打出去在空中翻跟头，而对方使用的是尖头弹，不但有曳光，杀伤力还大。【注 22】

（《耿飏回忆录》上册 146 页）以这样的装备和对手进行阵地之间的较量其结果不问也知。而李德的教条还反映在一些细枝末节上面，例如每支部队的掌旗兵不论是冲锋还是护旗都不准弯腰，更不准蹲下，结果掌旗兵成为每支部队阵亡数量最多的一个。再有就是指挥员在观察敌情时也不准弯腰，因为假如这样做了，就是怕死、不革命，就要受到党内、军内纪律的惩处。红四团团团长肖桃明就是给这种极左政策葬送了性命。【注 23】（《耿飏回忆录》上册，158 页、160 页）伍修权回忆说李德一度是从苏军俘虏中转化来的，目前关于李德的身份背景，党史研究上还没有统一的定论，如果伍修权的这个回忆属实的话，那么李德所作出的另外一个决定就更能说明其人的左倾思想。长征开始时，孙毅是教导师的参谋长，两腿受伤，按照级别还是按照病况都应该享受到骑马的待遇，哪知道李德因为孙毅是国民党军出身，就一笔否决了孙毅的马匹待遇。而这时李德自己似乎忘了他也曾经做过红军的对立面。【注 24】（《孙毅将军自述》113 页）

面对李德的如此胡乱指挥，彭德怀斥之为“崽卖爷田心不疼”，其他一些高级将领也是敢怒不敢言，连向来不怎么过问军事的张闻天在广昌失守后也对这种做法提出了质疑。然而，这时候有一个人却对李德的“短促突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致于还专门发表文章进行唱和，他就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

林彪此时在红军中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大将，他麾下的红一军团是红军主力中的主力，身经百战不说而且战功显著。连身为李德的翻译的伍修权都认为林彪“善于打运动战”【注 25】（《回忆与怀念》111 页）可就是这么一位善于打运动战的林彪竟然做起了短促突击的文章。林彪的这篇《论短促突击》成为当时议论的焦点，李德本人对林彪的做法很表高兴，林彪给李德留下的好印象直到遵义会议后李德失去权力时还念念不忘。【注 26】（同【注 25】）而作为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大感困惑，聂始终认为这是林彪在政治上的一个表态。【注 27】（《聂荣臻回忆录》202 页）林彪一生，善于取巧，无论是作战还是从政，尤其在他的后半生表现的更为明显。而《论短促突击》一文的横空出世自

然不是林彪的心血来潮，而且，就林彪的军事经验不可能不觉察李德的所谓的短促突击的要害，既然了解的话，还能如此行事那就应该是林彪取巧手段的一次重要表现。

由于博古、李德等人的一误再误导致红军不得不撤离中央苏区，开始长征。在长征之前，聂荣臻提议去见一见久未谋面的毛泽东，林彪同意了，林聂一行见到毛泽东，毛格外高兴，毛泽东说过：“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如今能主动来看毛泽东的居然还是他亲手培养出来的红一军团的两任军事主官，这不能不令毛泽东兴奋，可碍于当时的情况，毛泽东没有和林彪、聂荣臻多说什么，仅仅寒暄两句就去了图书馆。【注 28】（《聂荣臻回忆录》213、214 页）对于林彪发表的《论短促突击》，毛泽东应该有所耳闻，然而，毛并没有对这篇文章作出什么具体的评价，哪怕是后来毛泽东重掌大权。（林彪死后，该文受到批判那又另当别论）在毛泽东踏上长征之路时，林彪还从一军团挑选了 12 名战士护卫毛泽东，刘亚楼还说过：“毛主席受王明路线排挤时，是林彪派人保护他。”【注 29】（《风云 9.13》53 页）公开发表文章在前，暗中保护于后，到底哪一个才是林彪对毛泽东的真实态度呢？恐怕只有当事人毛泽东、林彪才心知肚明。

长征途中遭遇湘江惨败，红军上下怨声载道，对博古、李德的瞎指挥的不满达到顶点，毛泽东利用长征期间和张闻天、王稼祥的交流，使得他们二人很快和自己结成了“统一战线”，在这个统一战线的不断努力下，中央于 1935 年 1 月 15 日到 17 日召开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就是史称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部分清算了博古、李德的错误，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拿了下来。因为会议批判了李德的军事错误，当然包括那个短促突击，林彪作为短促突击的一度爱好者没有与会发言。遵义会议的组织决策把毛泽东选入中央常委行列，稍后毛泽东成为周恩来在军事上的主要助手，张闻天取代博古，这样一来，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成为新的三驾马车主导党和红军。失意的李德准备从红一军团林彪那里取得一点安慰，但是，他没有想到这时的林彪已经不再是鼓吹短促突击时的林彪了。伍修权回忆说：“林彪已不大接近他了。”【注 30】（同【注 25】）

遵义会议不仅是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历史转折点，也是毛泽东个人政治生涯的一次最为重要的转折点。会后，毛泽东一度想给贺子珍卖个关子，哪知道因为过于兴奋自己倒先说出来了：“这个会议，大家都觉得我这个菩萨又有用了，把我抬出来，承蒙大家捧场，选我进中央政治局常委。大家看得起我老毛，认为还是有一点本事。惭愧、惭愧！进入中央领导层，滥竽充数而已。不过我也没有谦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从毛、贺的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是无比珍惜这次来之不易的机会的。【注 31】（李敏著《我的父亲毛泽东》170 页，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第 1 版）然而，就在毛泽东还没有完

全坐热常委的位置的 1935 年 5 月，由于林彪的一封突如其来的来信，再次把各色政治人物卷入一场意想不到的政治风波中，这就是会理会议。

会理会议的起因是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因为抱怨毛泽东的军事指挥都是走的“弓背路”费力不讨好，按照林彪的看法是应该走“弓弦路”。而且林彪还认为如果继续听任毛泽东的指挥，部队就有垮掉的危险，所以，他要求彭德怀出来指挥红军。林彪的这封信的内容主要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指挥，迅速北进与四方面军会和。【注 32】（《彭德怀自述》198 页）林彪写好这封信以后，给彭德怀看过，而且还对彭德怀说：“现在的领导不成了，你出来指挥吧，再这样下去就要失败，我们服从你领导，你下命令，我们跟你走。”【注 33】（《聂荣臻回忆录》259 页）彭德怀当时还认为林彪的信“出于好意，是想把事情办好。”【注 34】（《彭德怀自述》199 页）聂荣臻则激烈的反对林彪的如此行为，聂表态说：“你是什么地位？怎么可以指定总司令、撤换统帅？”【注 35】（同【注 33】）聂还拒绝在信上签字。

林彪的信甫一送达毛泽东等人处，立即引发轩然大波。中央决定在 1935 年 5 月 12 日于会理城郊的铁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红一、三军团的主要负责人都到会（刘少奇未到），杨尚昆腿伤未愈是用担架给抬去的，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早在 3 月 12 日，中央决定成立新的三人团，集中处理军务，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其中周恩来是负责人，而在新的三人团中起主要作用的无疑是毛泽东。林彪要求替换军队的领导虽然名义上是对着新三人团的，实则针对毛泽东。因此，毛泽东大为生气。不过，毛泽东真正生气的原因还不单纯是因为林彪的来信，而是林彪来信的背后。

1935 年 1 月下旬开始的土城战役失利，博古因而讥讽毛泽东“看来狭隘经验论者指挥也不成。”【注 36】（《杨尚昆回忆录》134 页）博古的看法是从政治角度出发，而三军团的一些主要指挥员则从军事角度出发，对土城战役失利表达了自己的真实看法，比如黄克诚就直率的对刘少奇说：“这一仗打得不合算，既没有达到目的，又造成很大伤亡。”【注 37】（同【注 36】）黄克诚还因此向中央写信反映。刘少奇对黄克诚的意见也有同感，刘少奇表示，革命正处于低潮，应该改变方针，不能在贵州一带打圈子。【注 38】（《黄克诚自述》151、152 页）刘少奇是 2 月到三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的，他到了三军团以后了解到干部战士对走路还是打仗有过一些争议，其中有些人认为如果就这么走路走下去，部队不打也给拖垮了，刘少奇还把这些意见连同三军团政委杨尚昆的签字一起发了电报给中央。三军团的这封信以及土城战役的失败几个行动联系起来所产生的威力自然不同。土城战役是毛泽东重掌军权后的开山第一仗，而走路胜过打仗又是毛泽东不同于原最高三人团的军事方针，三军团的来信在前，林彪的来信于后，但是，提出的问题几乎都是质疑既定的军事指挥路线。更为主要的是黄克诚也好、杨尚昆、刘少奇也罢，他们写就的来信在毛泽东看来还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于黄克诚的喜欢“顶牛”，毛泽东早有领

教，他说过：“上自中央、下到支部，有意见他都要讲。”【注 39】（同【注 36】）所以，此间黄克诚给刘少奇乃至中央反映意见也在毛泽东的意料之中。毛泽东倍感疑惑的是另外一件事。

作为毛泽东亲手培养的军事指挥员的林彪曾经在毛泽东面临下台的红四军争端中无条件的站在了毛泽东的一边，而且也曾经在毛泽东失势的关头看望过毛泽东和派遣战士护卫毛泽东，在毛泽东看来，林彪和他的如此历史渊源何以突然写信质疑刚刚走上前台的他呢？这里面恐怕要有人进行策动或者挑唆。而策动以及挑唆的人的位置应该在林彪之上。这样，毛泽东就把疑点的落脚处锁定到了张闻天、彭德怀的身上。张闻天当时随三军团行动，而且又是中共中央临时总负责，同时张闻天也和王明、博古他们有着一定的历史关系虽则这种关系在遵义会议前后已经南辕北辙。加之毛泽东听信了个别人的猜测和判断。【注 40】（《张闻天传》223 页）而彭德怀是三军团的军团长还曾经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在红军中的威望仅次于毛泽东、朱德，此前在打鼓新场的问题争执中又牵扯到彭德怀，可以说对彭德怀算得上余憾未消。【注 41】

（同【注 36】）因而毛泽东在会理会议上对待写信的林彪批了一句：“你是个娃娃，懂得个啥。在当时这种情况下，不走弓背走弓弦行吗？”一句“你是个娃娃，懂得个啥”等于把林彪写信的性质给确定了，而对于张闻天、彭德怀的批评则有所不同。毛泽东虽然没有明说张闻天，但是言语中已经表达了一层重要的意思意即毛泽东认为张闻天是到三军团和彭德怀联合一起反对他的，并且对张闻天说了“你是个书生，根本不懂得革命战争。”的话。【注 42】（《杨尚昆回忆录》136 页）而后毛泽东又在 1941 年、1943 年两次会议上再度指责张闻天，毛泽东在 1941 年的会上说张闻天在会理会议之前严重的政治动摇，挑拨军队领导同志林彪、彭德怀反对三人团。张闻天当场表示要保留意见，当晚写信但未发出。1943 年会上毛泽东又一次的批评张闻天，张闻天这才确实重视起来，做了一番调查，查明×××在里面起了不好的作用。【注 43】（同【注 40】）对于彭德怀，毛泽东也是批评的相当严厉，杨尚昆回忆说：“认为林彪的信是彭德怀煽动起来的，因而迁怒于彭总。”【注 44】（同【注 42】）彭德怀在会上也做了一点发言，那就是也反对林彪的意见，彭说：“遵义会议才改变领导，这时又提出改变前敌指挥是不妥当的，特别提出我则更不妥当。”

【注 45】（同【注 34】）彭德怀是抱着“事久自然明”的态度的，所以，没有过多的反复说明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可是，他没有料到的是毛泽东本人并不认同他的这番解释，特别是会理会议成为一桩历史公案在毛泽东、张闻天、彭德怀三人的关系上投下巨大阴影，多年以后的 1959 年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旧事重提，重又成为张闻天、彭德怀在历史上就反对毛泽东的“罪证”之一。这时候彭德怀才颇为失悔当初实在应该说清楚才对，他说：“还是应该谈清楚的好，以免积累总帐，同时也可避免挑拨利用。”【注 46】（《彭德怀自述》200 页）

会理会议上把思想上的认识的不同上纲到右倾机会主义，让事情变得更为复杂起来。而就在这场复杂的会议上，作为始作俑者的林彪却有些超然。目前党史研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林彪在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曾经就历史上的会理会议给

彭德怀作出旁证属于难能可贵的行为。我们认为这是不恰当的，也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

彭德怀作为会理会议的主要当事人，回忆道：“林彪当时也没有说他的信与我无关。”【注 47】（《彭德怀自述》199 页）本来，这件事不是很难说清楚的，而且事实上也正是林彪在没有征求彭德怀意见的情况下贸然给彭打电话并且独自主张把信发出去的。这件事就其本身来说和彭德怀可以讲毫无关系，如果一定有关联的话，那就是林彪推举了彭德怀。按照常理，林彪面对毛泽东对彭的指责实在应该站出来给彭做一个技术上的澄清，但是，林彪没有说。林彪不但在会理会议上没有说明，而且在延安整风期间也没有说明，为什么反在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说明呢？对于林彪的这点行为，李锐认为“因当事人面对面，林彪不能不说实话。”【注 48】（《庐山会议实录》189 页）而《庐山会议简史》作者谢春涛则进一步认定林彪的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就会理会议往事的澄清实则属于“为了洗清和彭的关系，表明他在历史上同彭没有瓜葛。”

【注 49】（《庐山会议简史》189 页）我们认为，谢春涛的这个看法还是很有些道理的。我们这里不妨提前看一下庐山会议中的某些片断，1959 年 8 月 4 日晚上 7 点到 11 点多，这四个多小时中，中央几位常委数林彪讲话最多，占了一半以上的时间，而且有个细节值得注意，那就是林彪在通篇讲话中没有像其他常委那样继续称呼彭为“彭德怀同志”，而是代之以“他”。由此可见，林彪对彭的界线画的是何等的分明。【注 50】（《庐山会议实录》213 页）就这样一个连对彭德怀的称呼都格外比较其他常委还留心（其时，彭还是政治局委员，毛泽东也还称呼彭为同志，唯独林在这次会议上不叫）的人，他出面给会理会议作出的澄清难道是给彭德怀辩诬的吗？可能吗？而就在 59 年 8 月 1 日的常委会上，彭真就整风期间平江起义士兵委员会审查问题向彭德怀正式作出道歉，如果真的要澄清一件历史公案的话，显然彭真的态度才是正道。我们都知道，在林彪提出意见后，作为政治委员的聂荣臻是积极反对的，但是，林并没有听从聂的劝阻，试想林彪既然可以不听聂荣臻的招呼，何以连事后承担责任的胆量都没有呢？另一个疑点就是整风期间，张闻天的《整风笔记》中说出了真相（时间是 1943 年），并且附属上林彪、彭德怀的严正声明，然而这个出自林、彭的声明也仅仅证明张闻天与此事无关，并没有证明同彭德怀也无关。林彪既然能够给出证明证实和张闻天无关，那么为什么不能同时证明同彭德怀无关呢？更为主要的是我们联系到林彪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落井下石最为严重，他给彭扣上的三顶帽子（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以后成为批彭的主基调之一，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果奢谈林彪说明会理会议是为了给彭德怀辩诬简直就是可笑。

会理会议风波过后，中央红军继续执行毛泽东的军事政策。林彪在 1935 年 9 月 12 日担任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林彪组成的五人团成员，集中指挥军事，年仅 28 岁的林彪已经跻身红军高级领导人行列中。此后中国工农红军北上部分一度改组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林彪任副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到了陕北后，在下寺湾组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林彪

成为该委员会 9 名委员之一，恢复红一方面军建制的时候仅仅保留了红一军团（另外一个红十五军团），彭德怀主动提出取消红三军团。但是，在这次改编过程中对于原红三军团的干部安排上出现了一些不恰当的举动，把一些能力较强的干部诸如张爱萍分派到军团政治部做干事，而把红一军团原来撤职的干部派到下面的师里做副师长。【注 51】（《王平将军自述》86 页）

就在红军全力组织东征时，林彪又犯了一回“自由主义”，他跟彭德怀说：“我不赞成东征，他（指毛泽东）要走就让他走吧。”【注 52】（《杨尚昆回忆录》163 页），彭德怀这次也没有听林彪的，好在林彪也不过是说说而已，事后毛泽东派他去做调查了解工作，他也没有反弹。倒是在东征结束后 1936 年 5 月 13 日在大相寺村召开的红一方面军军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冲林彪真的发了火气。主要是因为林彪在东征过程中所犯的本位主义错误，毛泽东说：“红军是共产党的军队，不是你林彪个人的队伍。”【注 53】（《叶子龙回忆录》27 页）林彪闹本位主义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彭德怀率部准备恢复井冈山根据地的前后，林彪就曾经拨了一批坏枪给彭德怀，还因此遭到毛泽东的批评。这次也算是旧病复发。

受到批评的林彪没有因此动摇他的地位，他后来又出任红军大学校长，1937 年 1 月，红军大学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校长仍旧是林彪。在“抗大”期间发生了一件重要的“逃亡”事件，涉及到林彪，不能不说。从 1937 年 3 月 31 日开始的清算张国焘错误路线斗争开始后，一些扩大化的现象逐渐产生，特别是对原红四方面军的某些高级将领评价不客观、不公正，引起了他们的背后议论。抗大政治部给各队领导布置的任务主要是三条，第一条：四方面军是土匪；第二条：四方面军是军阀；第三条：四方面军干部是被张国焘收买的。【注 54】（《李先念传》311 页）这一来终于引发四方面军干部的抗议，红四军副军长刘世模愤而开枪自杀，幸好未死，许世友的吐血住院。而包括许世友、刘世模在内的一些四方面军干部诸如洪学智、王建安、朱崇德等人又被扣上“武装暴乱”“叛变革命”的帽子遭到扣押，李先念等人则在分配工作时遭到降级使用。这些内在的矛盾引起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亲赴抗大做了解释工作，宣布以往三条并不代表中央的意见，还做了其他的相关安抚工作，这才平息了一场可能出现的激化。【注 55】（同【注 54】）而引发这些矛盾的源头固然有总体思路上的偏差，但也有林彪在具体把握上的过左。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 1961 年 6 月 12 日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给予提及，毛泽东说：“林彪把持抗大，搞宗派主义，整四方面军的同志整的过分，造成歧视四方面军干部的后果。”【注 56】（《李先念传》318 页）毛泽东讲这番话的时候，林彪正逐渐走向他个人政治生涯的顶峰，毛泽东的议论显然和 9.13 事件后某些谈论还有着明显的不同，应该说毛泽东指出林彪具有宗派主义倾向还是一针见血的扎到了林彪的痛处。

平型关战后，林彪意外受伤被送去苏联养病。归来后的林彪受到毛泽东的热忱的欢迎，这一场面作为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师哲有过详细的回忆，毛泽东

向山下走，同不期而遇的师哲说：“林彪回来了，我去接他。”这让师哲很为吃惊，在师哲的记忆中，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人从外面回来，毛泽东都没有亲自迎接过，而等到林彪一下车，毛泽东迎上去和他握手，而且还是握着林彪的手回到窑洞，亲自吩咐伙房给林彪做饭，还让林彪住的靠近他的住处。

【注 57】（《在历史巨人身边》231、232 页）1942 年 2 月 17 日，延安还专门给林彪的归来开了一个规模不小的欢迎大会，林彪在会上的即席发言随即被刊登在 2 月 18 日的《解放日报》上面，也就在报纸登出林彪发言后的第十天（2 月 28 日），中央任命林彪担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并由邓发、彭真、林彪组成管理委员会支持中央党校日常工作。而在外人斯诺的眼中，林彪和毛泽东的关系既有统帅和战将的一面，也有老师和学生的另一面。斯诺等人在抗日剧社看戏休息时，群众一致要求毛泽东和林彪一起合唱一首歌，而就在斯诺采访林彪时，毛泽东当着主客人的面脱下自己的长裤，往床上一躺。【注 58】（《西行漫记》66 页、69 页）凡此种种也间接的说明了林彪那时候在军队以及党内的真实地位。

### 第三节：“战锦方为大问题”

前面我们谈及林彪在战略眼光上的缺陷，众所周知，在打与不打锦州问题上，林彪颇为踌躇，毛泽东在给罗荣桓写的挽诗中即有“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一句。那么，在夺取锦州的问题上，林彪的态度何以如此呢？是不是另有来由和曲折呢？我们不妨来回顾一下历史。

抗战结束，中共中央很快就把目光投向东北，东北的重要战略位置让毛泽东等人决定派遣大量的干部队伍趁国民党立足未稳进行迅速占领。党内一些远见卓识的高级干部也同时看出东北之于今后角逐天下的重要性。黄克诚于 1945 年以个人名义于向中央和军委发电提出他对当前局势的看法及军事方针的建议，其主要内容有：①蒋介石对和谈毫无诚意，只是以此作为欺骗人民、麻痹我军和拖延时间之手段，因此我们不能对和谈抱有幻想，应当立足于打，在与蒋谈判的同时，应集中主力准备决战。②取得联成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有利于进行长期斗争。为此在军事部署上建议应尽量多派部队去东北，至少应有 5 万人，能去 10 万人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建东北总根据地，支援关内作战。③关内以晋、绥、察三地区为第一线战略根据地，以山东地区为第二战略根据地，集中主力，消灭敌人。④为执行上述方针，建议从山东调 3 至 5 万人去东北，华中应调 3 至 6 万人去东北。9 月 19 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取得当时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的毛泽东的赞同后，为中央起草了《关于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明确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并有计划地陆续向东北派遣部队，在很短时间内，使东北军队的数量就达到 10 万人之多，成为日后创建东北根据地的基本力量。

而从组织系统上观察，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的13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先后有4名给派往东北主持工作。（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可见，中共中央对东北的看重。要进占东北仅靠政治上的攻势还远远不够，当务之急要把著名的战将派上用场。毛泽东由此想到了林彪。在当年保留的电文中，我们依然可以看见毛泽东急切的字眼：“林彪等现在何处？”1945年10月22日，中央任命林彪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吕正操、李运昌、肖劲光分任第一、第二、第三副司令员，彭真、罗荣桓为第一、第二政委。

林彪走马上任迎接他的可不是鲜花、掌声，而是层出不穷的各种问题、分歧。当时中共中央还在和平问题上同国民党、美国人周旋不止，中央一时还不准备放弃在和平方面的努力。林彪也做了两手的准备，他在1946年1月5日发电给中央称：“国内和平是否完全可靠？如完全可靠则我在东北部队目前应集中力量做最后一战，如不可靠则应分散建立根据地，准备应付敌明年之进攻。”中央给林彪的回电中说：“国内和平有望。”【注59】（《东北解放战争纪实》111页）但是，林彪对蒋介石提出的所谓和平预案却并不在意，他在1946年1月15日再电中央时说：“此次和平协定的实质实为蒋之一重大阴谋。”【注60】（《东北解放战争纪实》114页）他还提醒中央说：“我们对现在所谓和平的实际收获，须清醒的考虑之。”【注61】（《东北解放战争纪实》115页）就在给中央发电的同一天，林彪下达给属下各作战部队的命令则是十分明确的提出以战争为第一手准备，他在电文中说：“各部须严整战备，只有战争才能争取和平。”，一句“只有战争才能争取和平”说明林彪在东北战争的开局阶段已经有了不同一般的认识，这也是后来毛泽东、中共中央决定委林彪处理东北全权的决定的主要因素。

值得一提的是在发挥林彪等前线一级指挥员的潜能上，毛泽东和中央做的颇为放手，统帅部和前敌指挥部之间的配合较好。黄克诚在1945年11月就给中央和毛泽东发去电文提出自己的观点，毛泽东回复要黄克诚与林彪坦率的谈谈各自的看法，随即黄克诚就给东北局去电提出建议，黄认为应该“暂时避免与敌人争夺大城市，而把工作重点放在创建广大根据地上。”黄克诚与林彪见面后，再次重申了“策疲乏之兵，当新羁之马”是不可取的，认定当前最重要的是建立后方，站稳脚跟，逐渐发展壮大自己，以期在未来的时间内同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这个意见得到了林彪的赞同。适逢毛泽东来电询问对东北局势的判断，黄克诚便把自己的意见再次复述一次，得到毛泽东的首肯，这一点在1945年12月28日毛泽东起草的著名的《建立巩固东北的根据地》指示电中得到充分体现，该文中的“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成为以后东北战局的重要指示方针。

鉴于东北战场严峻的形势，中央决定统一事权，于1946年6月16日任命林彪为东北局第一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政委，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副书记兼副政委，并以林、彭、罗、高、陈五人组成东北局常委。林彪一马

三跨，成为东北战区最高指挥，其麾下甚至囊括了三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高岗、陈云）、两名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彭真、陈云）。（当时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即为常委会）足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对他的倚重。而就在林彪就任东北局一把手的前后所发生的“四平战役”又一次引发的争论对后来林彪决定是否攻占锦州施加的影响不容低估。

1946年4月18日，国民党军新1军推进四平西郊，林彪预料国民党军可能会攻取四平，急电长春部队南下增援。四平就其地理位置来说，毫无险阻可守。但是，毛泽东在4月13日给林彪的电报中说过：“守住四平、本溪以利谈判。”【注62】（《毛泽东年谱》下卷68页）为了贯彻毛泽东的指示电，林彪把总部迁到离四平很近的梨树县，他自己带着一部小电台和参谋、警卫员多次前往前线进行实地调查。适时，敌强我弱，如果采取硬拼的方式必然导致很大的消耗。黄克诚就不同意如此办理四平战役，他从白城子给林彪发去电报，几次建议不能硬拼，后来干脆建议林彪撤离四平。但是，林彪没有向以往那样迅即给黄回复，而是默不做声。而林彪之所以对黄克诚表示沉默并非林彪充耳不闻，则是此时此刻毛泽东的电报所传达的意见同黄克诚截然相反。4月20日毛泽东致电林彪：“准备于必要时把长春化为马德里，”【注63】（《毛泽东年谱》下卷70页）4月26日，毛泽东致电林彪：“鼓励坚守。”【注64】（《毛泽东年谱》下卷73页）次日，毛泽东再度提及“化四平为马德里”直到5月1日，毛泽东还要求林彪“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注65】（《毛泽东年谱》下卷76页）林彪是师承毛泽东，是运动战出身，而军队也是按照毛泽东军事思想训练出来的，像四平街这种战役对于民主联军来说并非长项，所以，打的相当艰苦，损耗也很大。黄克诚眼见林彪没有回复，心急如焚，乃于5月12日直接电告中央表达自己的看法：（一）由关内进入东北之部队，经几次大战斗，战斗部队人员消耗已达一多半，连、排、班干部消耗则达一半以上。目前虽尚能补充一部新兵，但战斗力已削弱。（二）顽93军到达，如搬上大量炮兵及部分坦克用上来，四平坚持有极大困难。四平不守，长春亦难确保。（三）如停战短期内可以实现，则消耗主力保持四平、长春并绝对必要。如长期打下去，则四平、长春固会丧失，主力亦将消耗到精疲力竭，不能继续战斗。故如停战不能在现状下取得，让出长春可以达到停战时，我意即可让出长春，以求得一时期之停战也是好的。以求争取时间，休整主力，肃清土匪，巩固北满根据地，来应付将来决战。（四）东北已不可能停战，应在全国打起来，以牵制国民党向东北调动，东北则需逐步消灭国民党兵力，来达到控制全东北的目的。（五）我对整个情况不了解。但目前关内不打，关外单独坚持消耗的局势感觉绝对不利，故提上述意见，请考虑。【注66】（《黄克诚自述》236、237页）。中央和毛泽东并没有回答黄克诚的这封电报，但是，在5月19日，毛泽东再电林彪说：“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地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注67】（《毛泽东年谱》下卷83页）而就在毛泽东这封电报来临之前的18日，林彪已经电令民主联军进行撤退。同时，林彪告诉毛泽东，民主联军正在组织撤出战斗。这场为期一个月的四平街战役打下来，民主联军方面一共损失高达8000多人，部队的元气受到波及，其中像黄克诚的第三师第七旅是井冈山的种子部队，撤退时只剩下3000多人，万毅的第三

师原有 13000 多人，战后只剩下 4、5000 人，还有邓华的保 1 旅损失也相当严重。韩先楚曾经就四平街一战做过具体的评述，他说：“四平保卫战· · · · · 过多的看重了一城一地的得失，在战略上是失策的。”【注 68】（《东北解放战争纪实》189 页）而一直没有收到林彪、毛泽东回电的黄克诚直到 1959 年的第一次庐山会议期间才从毛泽东口中得知坚守四平原来是毛泽东的决定，黄克诚其时处境已经很难，仍旧不脱率直的性格，脱口便说：“是你（毛泽东）决定的也是错误的。”【注 69】（《黄克诚自述》237 页）林彪自己在四平战役结束后也发了一顿感慨，他说：“和平空气，在我们今天的东北是最害人的。”【注 70】（《东北解放战争纪实》187 页）

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打锦州期间林彪的具体表现。如果说四平保卫战林彪是被动的执行毛泽东指示，那么打锦州则反映出林彪在军事战略上逊于毛泽东。1948 年 9 月 12 日辽沈战役打响，29 日东北解放军切断了辽西走廊，将锦州、义县之敌分割包围。10 月 1 日，攻克义县，锦州就在眼前。10 月 2 日，东野总部抵达郑家屯以西，作战科向参谋长刘亚楼报告说，在葫芦岛方向敌军新增四个师。林彪在考虑南下的过程中一直忧心忡忡，他的顾虑无外乎三点，一、缺粮缺油，汽车只带了从后方南下单程的汽油；二、后方运输线太长；三、怕傅作义由关内北上，锦州攻不下，大量汽车、坦克、重炮会因无汽油而撤不出来。【注 71】（《罗荣桓传》456 页）当后勤得到保证的承诺出来后，林彪这才放心决意南下，如今听说葫芦岛又来了 4 个师，“担心被沈阳、锦西、葫芦岛之敌所夹击”，就在当晚的 22 点，以林罗刘的名义电告中央，电文如下：“得到新五军及九十五师海运葫芦岛的 message 后，本晚我们在研究情况和考虑行动问题。估计攻锦州时，守敌八个师虽战力不强，但亦须相当时间才能完全解决战斗。在战斗未解决以前，敌必在锦西葫芦岛地区留下一两个师守备。抽出五十四军、九十五师等五六个师的兵力，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该敌，则该敌可能与守敌会合。在两锦间敌阵地间隙不过五六十里，无隙可图。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长春之敌数月来经我围困，我已收容逃兵 1.8 万人左右，外围战斗歼敌 5000 余。估计长春守敌现约 8 万人，士气必甚低。我军经数月整补，数量质量均大大加强，故目前如攻长春，则较六月间准备攻长春时的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迟延半月到 20 天时间。以上两个行动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这是一封特级电报，送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大发政治脾气，他亲自起草军委电报，分别于 10 月 3 日的 17 时、19 时连发两封电报，17 时电报称：“（一）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独援锦的目前紧要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你们可以于攻锦州之同时，部署必要兵力于两锦交通线上，首先歼灭由锦西增援锦州之四个师，然后打下锦州。在五个月前（即四、五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在两个月前（即七月间），长春之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锦西、滦县线之第八第九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又因新五军从山海关、九十五师从天津调至葫芦岛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二）你们指挥所现到何处？你们指挥所本应在部队运动之先（即八月初旬），即到锦州地区，早日部署攻锦。现在部队到达为时甚久，你们尚未到达。望你们迅速移至

锦州前线，部署攻锦，以期迅速攻克锦州。迁延过久，你们有处于被动地位之危险。”【注72】（《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战士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476—477页）19时电报称：“本日十七时电发出后，我们再考虑你们的攻击方向问题，我们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除了前电所述之理由外，假定你们改变方针，打下了长春，你们下一步还是要打两锦。那时，第一，两锦敌军不但决不会减少，还可能增加一部，这样将增加你们打两锦的困难。第二，目前沈阳之敌因为有长春存在，不敢将长春置之不顾而专力援锦，你们可利用长春敌人的存在，在目前十天至二十天时间（这个时间很重要），牵制全部、至少一部分沈阳之敌。如你们先打下长春，下一步打两锦时，不但两锦情况变得较现在更难打些，而且沈敌可能倾巢援锦，对于你们攻锦及打援的威胁将较现时为大。因此，我们不赞成你们再改计划，而认为你们应集中精力，力争于十天内外攻取锦州，并集中必要力量与攻锦州同时歼灭由锦西来援之敌四至五个师。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望你们深刻计算到这一点，并望见复。”【注73】（《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战士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第477-478页。）也不怪毛泽东发起脾气，此前林彪在攻打锦州问题上就一再和中央讨价还价，最初林彪决定南下作战也还是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有些差距，林彪意在打北宁线上几个小城市，而毛泽东则力主关门打狗，把蒋军一律消灭在关外。就在8月11日，林彪还在和毛泽东讲价钱，这次毛泽东有些勃然，他给林彪发去长电，口气颇为严厉，林彪吃不住了，这才在两天后再电毛泽东，表示尽快行动。毛泽东敢于封闭关口在锦州同蒋介石摆开决战的态势，不能不说这是毛泽东棋高一着的表现，在历史上，清军入关之前的松锦大战一举歼灭明军13万之众，俘洪承畴诸人，就此确立清朝在关外一统天下的局面并为后来大举入关奠定基础。毛泽东熟读古今战例，对于这段历史，他不能不做重点的了解，而且，从当时的情况看，毛泽东的此一决策确实罕有其匹。毛泽东这一手笔同长征期间的“四渡赤水”一样都是毛泽东军事生涯中的亮点。而作为一线最高军事指挥员的林彪计不出此，而且还在兵临城下的时候提出大军回撤，以所谓的“准备了一桌席而来了两桌客”作为牵强的理由，实在说不过去，这也折射出林彪其在战略上的短视，尽管后来他很快修正自己的这个错误。

在罗荣桓等人的劝说下，林彪考虑再三决定按照军委意图办理锦州事宜，乃回电称“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军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的可能，至少能歼灭敌之一部或大部。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此次战斗目的，拟主要放在歼灭敌人上。锦州有可能在夺取之后，象开封一样两面援敌重占锦州，因我打援力量仅能迟滞敌人，而无歼灭敌人的可能。敌宁可放弃沈阳，而必保持和恢复锦州。”【注74】（《罗荣桓传》457页）这封电报发出时间是10月3日9时，抄送到军委已经4日凌晨1时，毛泽东松了一口气，回电林罗刘说：“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与此同时，毛泽东还淳淳告诫说：“你们决定以四纵和十一纵全部及热河两个独立师对付锦西、葫芦岛方面之敌，以一、二、三、七、八、九共六个纵队攻锦州，以五、六、十、十二共四个纵队对付沈阳援锦之敌，以九个独立师对付长春之敌，这是完全正确

的。你们这样做，方才算是把作战重点放在锦州、锦西方面，纠正了过去长时间内南北平分兵力没有重点的错误（回头打长春那更是绝大的错误想法，因为你们很快就放弃了此项想法，故在事实上未生影响）……从这件事，你们应取得两个教训：第一个教训，是你们的指挥所应先于部队移动到达所欲攻击的方向去（这一点，我们在很早就向你们指出了），由于你们没有这样做，致使你们的眼光长期受到限制。第二个教训，是在通常的情况下，必须集中主力攻击一点，而不要平分兵力。关于不应当回头攻长春的理由，不是如你们所说的‘太费时间’以及‘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而是如我们昨日十七时及十九时两电所说的那些理由，即你们如果真的回头攻长春，你们将要犯一个大错误。就拿突围一点来说，目前该敌突围愈迟愈有利，不突围更有利。”【注 75】（《毛泽东年谱》下卷 352、353 页）

我们从毛泽东和林罗刘之间往返的电报的语气中可以看到，即便是在毛泽东盛怒之中仍旧没有把这种火气带进工作里，始终用一种摆事实、讲道理的口吻进行同志式的争论，而林彪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后也很快表态执行军委的命令，将帅间的理解、合作和精诚正是中国共产党能够在三年这么短的时间内打败国民党的主因之所在。

在辽沈战役结束后，罗荣桓等人起草的给中央和毛泽东的《九、十两月份作战情况综合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话“后由蒋介石飞沈亲自指挥，从华北抽调独九十五师、六十二军全部、九十二军之二十一师陆续经海运葫芦岛登陆，加上锦葫原有之四个师共计九个师，企图由锦西向北驰援锦州，这曾使我们攻击锦州之决心一度发生顾虑。但这一过程共两小时即确定仍坚持原来之决心不变。”【注 76】（《罗荣桓传》474 页）本来这是实事求是的陈述，可在林彪眼中无疑是自揭短处，林彪看后闷闷不乐，“一声不吭，把稿子往桌上一放，转身走了。”林罗后来分手大抵和这件事也不无关系。

在林彪得势时，关于打锦州这件事始终秘而不宣，特别是林彪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统帅”后，更无人敢提这段往事。到了林彪倒台，各种批判林彪的文章、书籍铺天盖地而来，内中自然少不了林彪的这个“短处”，像《毛主席军事路线伟大胜利——批判林彪在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中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一书的第 31 页，我们还能看到这样带有当年历史痕迹的话：“可见林彪绝不是什么天才的军事家，而是一个鼠目寸光、毫无战略头脑的蠢猪。”【注 77】（该书 31 页）如果按照这本书中所说的林彪真的是一头蠢猪的话，那么无法解释中央为什么要赋予他指挥东北战争的全权，但如果按照时下一些流行的翻案说法又怎么解释林彪在这个问题上所暴露出来的短视呢？诚然，林彪在战争年代不失为一名优秀的革命将领，而且他也是一名军事家，不过这不等于说林彪在军事上毫无缺陷可言，也不等于说林彪的战术效果完全等同于他的战略眼光，以往一些极左的观点把林彪的军事指挥才能由于政治上的失败进而说的一钱不值显然不是客观的，而目下有些人为了标新立异、哗众取宠盲目给林彪

的军事素养增添人为的光环也一样不可取。事实上，林彪尽管在战术颇有一套，包括他的六个战术原则都是实战的典范，但是，林本人在战略上的缺陷不论是在战锦还是稍后的南线追歼都暴露无遗，如果对此忽略不计，自然不可能描述出一个完整的林彪。

#### 第四节：在“高饶事件”中

建国后的林彪在多数时间里给人们的印象是一个“病人”，然而，复杂多变、诡谲莫测的政治风云让他不断的脱掉病号服从床上爬起来走到政治的前台。五十年代初期发生的震惊党内外“高饶事件”就是林彪的第一个亮相。

要了解高饶事件中的林彪，必先要了解一下高饶事件的两位主角——高岗、饶漱石。高岗，原名高崇德，陕西横山人，曾在国民党军队中做过兵运工作，1932年1月任陕甘工农红军游击队队委书记。1933年8月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政治委员，11月后，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政治委员，红二十六军政治委员，是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人之一。1935年2月，为了统一陕甘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党和红军的领导，陕甘特委和陕北特委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高岗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政治委员。而这次组织上的统一标志西北革命根据地的正式建立，也就是说高岗属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1935年9月，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孔原（陈铁铮）授权的朱理治、聂鸿钧、程子华为成员的代表团开始主持西北的大局，代表团决定撤销西北工委，另外成立陕甘晋省委，朱理治、刘志丹、郭洪涛、高岗、程子华、郭述申、马明方、聂鸿钧9人为成员，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同时，红十五军团成立，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程子华任政委、高岗任政治部主任，而十五军团真正的当家人则是三人代表团之一的聂鸿钧。陕北这片红色根据地是刘志丹、谢子长一手打下来的，如今外来的聂鸿钧做了军事上的负责人，高岗当然不满，而且高岗自认军团的政治部主任不过是个挂名的空头衔，由此和朱理治吵了起来，朱理治认为政治部主任对于高岗并非大材小用，因为政治部副主任由郭述申担任，郭和高同为省委委员。而且聂鸿钧来前中央已经安排聂主管军事工作。【注78】

（《纪念朱理治文集》557页）朱理治到陕北来还有一个任务那就是秉承临时中央的意见在西北开展肃反，朱理治看好原红25军参谋长戴季英，准备让他出任保卫部部长，可是，当朱理治征求徐海东意见时，徐海东否定了戴季英，徐海东说戴季英“意识不好”【注79】（《纪念朱理治文集》559页）徐海东这么说也是有些道理的，因为戴季英在肃反中多次犯有严重错误，其人过左，甚至力主杀俘，还曾经挑拨徐海东同程子华之间的关系，吴焕先死后，戴季英还伸手要官准备和徐海东平分25军（由戴季英出任军政委，拱倒程子华）【注80】（《徐海东将军传》155、170、171页）不过，徐海东反对归反对，戴季

英还是担任了保卫部副部长代理部长，聂鸿钧主持肃反工作。戴季英一上任就开了“杀戒”，逮捕黄子文，由黄进而抓捕了刘志丹、高岗。在逮捕刘志丹、高岗问题上，郭洪涛持有反对意见，他认为刘、高肯定不是右派，但是，戴季英提供的口供也无法让朱理治等人证明刘志丹、高岗是无辜的。而且，在对待刘志丹、高岗的去留问题上，戴季英坚持主张杀掉。幸而朱理治没有完全听信戴季英的意见，而后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差点给活埋的高岗被毛泽东派来的代表救出，戴季英受到撤职处分，同时被救出来的还有习仲勋、张秀山等，据习仲勋后来说，当时准备活埋他们的坑已经挖好了。高岗获救以后，在1938年5月开始担任陕甘宁边区区委书记，1939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一次会议上被选为参议长。1941年初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同年5月，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与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合并组成中共中央西北局后，任西北局书记，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跻身核心层。崭露头角的高岗并没有忘记当年的“仇辱”，他在1942年就公开打击朱理治，于西北高干会议上指责朱理治利用肃反残害同志、反对迎接中央红军等，搞的朱理治灰头土脸直到1959年才由中央通过正式的审查意见予以否定。

高岗在历史上有过一段不甚光彩的经历，就是在临镇战斗中有过临阵脱逃的一幕，关于这点高岗讳莫如深，曾经找到陕北的老同事阎红彦，请他予以保密，但是，却遭到阎红彦的拒绝。阎红彦非但没有给高岗隐瞒，反而据此向中央报告事件的内情，惹得高岗大怒。1942年西北高干会议上，高岗就阎红彦一度通过肖劲光向中央反映要求成立陕北师的问题对阎红彦进行打击。1945年6月，阎红彦得知高岗已经是中共中央委员的候选人，又向刘少奇、任弼时反映高岗的历史旧账，不过却受到刘少奇等人的批评。【注81】（《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20、21页）高岗当选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后，阎红彦再次上书中央，他认为高岗“伪造历史、临阵脱逃、品质不好、诡计多端，迟早要出问题，请中央注意。”刘少奇要阎红彦对自己的讲话负责，阎红彦随即表示中央可以记档存录。【注82】（《只唯实》21页）1945年7月，中央召开“西北历史问题座谈会”，康生到会指出：“高岗是西北的革命领袖，今后不准任何人反对，阎红彦反对高岗是错误的。”【注83】（同【注81】）就在这次座谈会上对于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人做了正式的排名，即刘志丹、谢子长、高岗。时刘志丹、谢子长已经牺牲，而高岗则成了西北革命根据地创建人和领导人中的硕果仅存者。高岗在同王明等人的斗争中的表现，深得毛泽东的满意，高岗很早就对毛泽东说过：“原来我们以为苏联飞机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好东西，却不知道是祸从天降。”【注84】（《在历史巨人身边》166页）这里高岗指的是王明从苏联的归来，在高岗主持西北局工作期间，得到过任弼时等领导人的支持，1943年4月28日，中央决定成立反内奸斗争委员会，刘少奇任主任，高岗、彭真、康生任委员，这说明高岗的地位已经逐渐在拔高。

解放战争期间，高岗出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副政委，1949年后开始担任东北地区的党政一把手，建国时还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高岗作风泼辣、行事大胆，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高麻子这人能干事”（《叶子龙回忆录》201

页)高岗在东北主政期间颇有成绩,特别是在保障抗美援朝志愿军后勤工作方面很有成绩,彭德怀曾经赞扬高岗说:“志愿军的胜利主要是得到高岗和东北的大力支持。”【注85】(《我的回忆—张明远回忆录》372页)1952年11月,高岗奉调来京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从1952年8月到1953年年初,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东北局第一书记高岗、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先后调京工作,而以高岗的位置最崇,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1953年3月24日,政府的党组干事会撤销,周恩来原来负责的政府系统工作除了外事方面还由周恩来作主外,其他的都划归给他人,其中高岗担过来的部委就有八个之多,包括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燃料工业部、建筑工业部、地质部、轻工业部、纺织部。高岗所领导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故有“经济内阁”的外号。

和高岗后来声气相投的饶漱石则是另外一番经历,他不具备高岗那样的战争资历,其人是党团干部出身,还搞过工运,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共青团北满省委书记,上海工会联合会党团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1935年赴苏联,任中国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饶漱石的发迹在于新四军阶段,项英主管新四军时,饶漱石不过坐着东南局副书记的冷板凳,等到刘少奇接手新四军后,饶漱石也迎来了他的政治春天,先后出任华中局副书记、代理书记兼新四军政委。1943年10月,饶漱石利用整风之际对陈毅突然发难,陈饶之间因为工作上、思想上、性格上的种种矛盾于此一并发作,饶漱石抓住陈毅在历史上反对过毛泽东的旧账大做文章以至于新四军内部不少干部对陈毅敬而远之。饶漱石还在会上列举出陈毅的十大错误进行人身攻击,陈毅有口难言,他对饶漱石说:“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力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发。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之日。”饶漱石在会后先行向毛泽东、刘少奇告状,电文长达1500字。此为新四军史上著名的“黄花塘事件”。毛泽东随后复电称:“我们希望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前次你们来电要求以一人来延,那时我们不知你们间不和情形,现既有此种情形,而其基本原因,因为许多党内问题没有讲通。如陈来延安参加“七大”,并在此留住半年左右,明了党的新作风及应作重新估计的许多党内历史上重大问题……则一切不和均将冰释,并对党有极大利益……陈来延期间内职务由云逸暂行代理,“七大”后仍回华中,并传达“七大”方针。”【注86】(《陈毅年谱》419页)就在陈毅见到毛泽东准备谈及饶漱石整人时,毛泽东却打断陈毅的话头,毛泽东告诉陈毅说:“至于与小姚(即饶漱石)的问题,我看还是不要提,一句话也不要提。”【注87】(《陈毅传》295页)几天后,毛泽东动员陈毅给华中局发电报做一个自我批评,陈毅于是给华中局去电称“我的某些认识上和处理方式常有不正确的地方”云云。【注88】(《陈毅传》296页)毛泽东也去电解释,声称“陈毅同志都是有功劳的,未犯路线错误的”而饶漱石颇有“得理不让人”的架势,给毛泽东答复中继续批判陈毅说“陈同志在思想意识、组织观念仍有个别毛病”,还提出要毛泽东就近帮助陈毅,其口吻相当不客气。说起来也是饶漱石恃宠而骄的表现。【注89】(《陈毅传》297页)陈毅见到饶漱石这副态度,自然怒不可遏,倒是毛泽东劝了陈毅:“主要是人家对你有误会,有什么办法?越解释误会越大。”整个黄花塘事件最后以陈毅的委曲求全而告终。“黄花塘事件”可以称得上扑朔迷离,因为事件涉及很多的

敏感的人和事，所以多年以来一直都是很有难言之隐，身为当事人之一的原新四军副军长张云逸曾经说过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如果一个人看上去在各方面都表现得一点缺点、错误都没有的话，那是假的。一个人无法样样都当第一，不管他有多大的本领他都无法做到样样都精通，不可能成为无所不能的主宰。”【注 90】（《革命回忆录》之九 167 页）通过张云逸的这句话也许能够看出点内中的潜在的端倪。

饶漱石在党内素以手段狠忍著称，他自己曾经公开说过：“和我一起工作，开始你可以欺负我，但是到以后我准得治得你怕我，对不听话的就要像驯蒙古马一样，用套子套住。”【注 91】（《黎玉回忆录》250、251 页）但是，此人官运亨通，七大时，华中地区党组织有人给饶漱石提出意见，说饶此人“欺人、弄权、虚伪”，居然惊动刘少奇亲自到华中代表团参加会议，点名批评给饶漱石提意见的人，认为对饶的攻击是破坏领导威信、影响党的团结。【注 92】（《刘少奇之路》之三 795 页）解放战争中，饶漱石担任第三野战军政委，以后还出掌华东大权，成为赫赫有名的大区负责人。1952 年年初，饶漱石身体不适，粟裕向中央建议饶漱石离职休养一段，饶漱石大为不满，来北京后当面问毛泽东三点：第一，我对敌斗争是否勇敢？第二，我在华东局是否犯了路线错误？第三，为何要用粟裕陪我进京的方式调京？面对咄咄逼人的饶漱石，毛泽东表示：“如你认为健康能够支持，可以立即回华东工作。”【注 93】（《刘少奇之路》之三 796 页）党内领导人能够如此和毛泽东讲话、如此态度行事的恐怕非常少见。1953 年 4 月，饶漱石正式来京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而此前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是彭真。

高饶事件的缘起是高岗的“批薄射刘”，也就是利用批判薄一波的机会影射刘少奇。而薄一波之所以挨批则由于“新税制”一事。1952 年 12 月 26 日，政务院第 164 次会议批准了由财政部拟定的修正税制方案。12 月 31 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这一次新税制的原则是体现了“公私纳税一律平等”，修正税制有两个特点，一是保税，一是简化税制。但正如薄一波自己回忆的那样“在修正税制的过程中，确有操之过急、工作过粗的毛病。新税制从 9 月财经会议酝酿到年底出台，仅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为了赶在元旦前一天公布实施，为了抢在春节前一个半月的旺季多收点税，许多该做工作没有去做，或者虽然做了但做得很粗。比如，方案提出来以后，没有发到地方财政、税务部门去征求意见，更没有同地方党政领导打招呼；在有的中央部门负责同志对某些具体条文明确提出反对意见之后，我们主管的同志特别是我自己也未予认真考虑。……”【注 94】（《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的回顾》上卷 235、236 页）新税制颁布后，商业部调整了部分商品的价格。但在新税制公布的同时，商品流通税的各项施行细则并未及时公布，商人们对各种税率如何调整及纳税手续不甚了解，商业部调整牌价的通知又未及时下达，致使一些私商纷纷提款购物存货，导致市场发生混乱，尤其是华东和中南地区，出现了涨价、抢购、停业的混乱局面。中共山东分局书记向明联名写信给中央反映情况，毛泽东在接到向明和北京市委的报告后很快作出反应，他

给周恩来、邓小平、薄一波、陈云写信严厉指出：“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注 95】（《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的回顾》上卷 234 页）1953 年 2 月 10 日，财政部吴波、商业部姚依林、粮食部陈希云联名给毛泽东写信就新税制问题做了汇报，毛泽东则进一步对新税制提出批评，口气比较上次更加严厉，而且直接就把这种工作上的失误上升到路线错误上来，毛泽东说新税制是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还由此指责政务院犯了分散主义的错误，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对政府机关的领导。根据毛泽东这一指示，周恩来亲笔签发了 1953 年 3 月 24 日撤销以他为书记的政府党组干事会的通知。

1953 年 6 月，中央召开全国财经工作会议，这次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是解决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可是居然给开成了一个批判会，其斗争矛头直指薄一波。在财经会议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找到陶铸请他吃饭，给陶铸透底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重重的整一整薄一波，还要陶铸放头炮。高岗还利用出差的机会找过陈赓，内容也是如此，因为他知道陈赓和薄一波之间曾经有过一段不甚愉快的插曲：七大时提名中央委员候选人，薄一波是候补中央委员候选人，陈赓认为不妥，找了刘少奇、周恩来反映，毛泽东知道此事后说，为什么不可以当正式中委？提候补中委就不妥。毛泽东此话一出，薄一波一跃而为正式的中央委员。【注 96】（《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上卷 375 页）高岗认为陈赓既然当初对薄一波的当选有些意见，那么此间批薄，陈理应挺身而出，哪知道陈赓不但没有答应，反而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后来周恩来说过，第一个向他报告高岗阴谋的就是陈赓。高岗连续拉陶铸、陈赓未果就自己直接上马出阵，在会上一边大批薄一波，一边开始影射刘少奇，他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而看不起东北的经验。”【注 97】（《刘少奇之路》之三 787 页）高岗之所以从批薄一下子转移到射刘是有着其深刻背景的。

首先，毛泽东对刘少奇在 1949 年 4 月的“天津讲话”不满，其次 1950 年 2 月，高岗来京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将他收到的刘少奇谈话记录送交毛泽东。试探毛的反映。毛泽东将此件批给陈伯达看，明显对刘少奇谈话的不满，形于颜色。【注 98】（《刘少奇之路》之三 775 页）再有就是毛泽东曾经考虑要把中央分为一、二线。高岗拉陶铸、陈赓都还只是让他们充当炮手，而高岗真正要拉的人则是林彪。

林彪在建国后身体不好一直处于休养状态，但是，他和高岗因为有东北共事的关系，一向谈得来，而且那时候的林彪因为军事上的成就在党内威望不小，尽管养病，但经常也有很多领导干部去看望他。在杭州高岗对陈正人说：毛主席说过“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高”，现在应该是“高林”了。高岗还说：他去毛主席那里，毛问他谁当部长会议主席合适，他写了一个“林”字（意即林彪），但毛给他写了一个“高”字（意即高岗）。【注 99】（《刘少奇之

路》之三 793 页)高岗当时集中散布的对刘少奇的不满主要有过这样一句话：“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这个圈圈的论调是饶漱石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提出来的。【注 100】（《毛泽东传 1949—1976》上卷 278 页）高岗当时推说上面这句话是某位领导同志对他说的，然而，我们在考诸史料时发现林彪的意见和高岗指责刘少奇的这番话有着惊人的相似。林彪在西山养病，大区领导人去看望林，张明远听到一位领导这样议论林彪的看法，这位领导说：“林总看问题尖锐深刻，现在白区党控制着中央的权力，很危险，中央的领袖，毛主席年纪大了，少奇是不行了，只有高主席是久经考验的。”【注 101】（《我的回忆—张明远回忆录》381 页）从以上的这位领导的谈话中可以知道林彪所谓的看问题深刻尖锐，实际上也是对刘少奇的地位提出质疑，否则这位领导不会有下面那番引申。当 1967 年 2 月，张明远的女儿问及张明远所谓高饶事件到底是怎么回事时，张明远只说了一句：“高岗当时是拥林反刘。”【注 102】（《我的回忆—张明远回忆录》557 页）试想一下，高岗当时的地位远在林彪之上，为什么要拥林反刘呢？而作为深得毛泽东信任号称“党内圣人”连高岗都素来礼让的罗荣桓在 1955 年 3 月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期间发言说，毛泽东提出二线以后，他就曾向毛泽东提议要高岗出来，毛泽东告诉罗，高岗听不得反对意见。【注 103】（《罗荣桓年谱》760 页）

高岗发难，饶漱石也没有沉寂，他利用安子文拟就的一份政治局委员名单中“有薄（一波）无林（彪）”大加指责，矛头也是对着刘少奇去的。而所谓的“有薄无林”又是如何一回事呢？林蕴晖在他的《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刘少奇之路》一书中曾经就此事做过详细的论述，我们不妨来看看：“1953 年 3 月初的一天，高岗找安子文说，昨天主席找他谈话，讲了两个问题：一是政治局成员要改组；二是加强中央各部的机构，征求他对这两个问题有什么意见。高说，他因事先未曾考虑过这些问题，毫无准备，故未表示意见，等主席下次找他谈话时，再表示他的意见。高又问安：某、某二人怎么样？安表示，这两个同志都很好，年青、正派，有经验，有能力，有前途，将来就要靠这些人做事。由于当时中央正在研究加强中央的办事机构，准备增设新的部门，既然毛主席找高岗商量这个问题，安子文作为中央组织部具体工作的负责人，有责任早作准备，以备中央谘询。出于这种考虑，安子文便拟了一个中央政治局的名单和中央各部主要负责人的名单。其中，中央政治局名单分成两组写出，一组写有现任中央书记处的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六个中央局的书记：东北的高岗、西北的彭德怀、中南的林彪、西南的邓小平、华东的饶漱石、华北的薄一波，外加实际主持中南局工作的邓子恢。另一组写有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张闻天、康生五个名字，以及李富春、习仲勋、刘澜涛。”【注 104】（该书 797、798 页）由此可见，所谓“有薄无林”是饶漱石强加给安子文的罪名。但值得注意的是饶漱石和高岗都提出了一个现象，那就是对林彪的格外关照。两个人发难过程中几乎完全一致的一个重要表现都是拥护林彪出来。

高饶事件稍显苗头时，毛泽东特别嘱咐陈云，到杭州转达给林彪知道：“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

【注 105】（《毛泽东传 1949—1976》上卷 280 页）毛泽东这里所指的“上当”一说应该表明林彪在高饶事件中的实际地位和作用了。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对高饶事件进行了严肃的批判和斗争，高岗、饶漱石随即从政治舞台消失，其中高岗还走上了自杀的绝路。本来，毛泽东还是准备给高岗一条出路的，毛泽东让人找高岗谈话，要高回陕北负责一个地区的工作，高岗第一次自杀后，毛泽东就放弃了这个想法，他说：“高到西北的事不要再提了，随他去。”

【注 106】（《叶子龙回忆录》201 页）高饶虽然得到清算，但是，高岗在攻击刘少奇有关资产阶级、富农政策方面的事情没有给予明确的说法。文化大革命中，东北的红卫兵搞过一个“揪高饶漏网分子联络站”，周恩来得知亲自把联络站的头头找来呵斥道：“你们这样搞，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高饶事件是主席亲自处理的，不要搞了。”【注 107】（《我的回忆—张明远回忆录》423 页）

一度身陷高饶事件的林彪并没有因为高岗、饶漱石的垮台而受到责难，反而在 1955 年 4 月 4 日的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这次和他一道当选的还有邓小平。邓小平的当选完全可以理解，而林彪的当选则费人思量。

## 第二章：在庐山崛起

### 第一节：林彪与“反教条主义”

1958 年的全军“反教条主义”波及范围之广乃建军以来所仅见，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从这起事件开始，极左政策开始在党内乃至党外蔓延开来长达 20 年之久，直到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而且，也正是从这起事件开始，我们这本书的主人公林彪也基本结束了他的所谓的养病抑或韬晦的生活，逐渐显露在政治的前台。

建国初期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全国上下处处向苏联学习、处处标榜苏联的先进经验，军队也不例外。这种“一边倒”的倾向在军事教学上表现的尤为明显。其中最为突出的也是大家反响最为强烈的就是“6 小时一贯制”和“三堂会

审”。什么是“6小时一贯制”呢？就是南京军事学院在教学时间安排上按照苏联军事院校模式从上午9点到下午3点，50分钟一堂课，仅在课间休息10分钟，6个小时的正课一贯到底，中午还不能吃饭、休息，搞的人困马乏，特别不适合中国学员的实际起居习惯，学员纷纷质问：“为什么连这个也要学苏联的？”【注1】（《廖汉生回忆录一续》110页）而“三堂会审”则是考试制度，每次考试，既不划重点，也不出复习题，更不指定考试范围，等到考试来临，卫兵把门于外、三位考官面试于内，学员面对三位考官从各种考题的卡片中随机抽出一张，必须当场回答，其情景之紧张如临大敌。【注2】（同【注1】）此外，学员对于一些苏军顾问大讲其卫国战争、国内战争的经典范例不以为然，因为军事学院的学员并非普通的学生，而是身经百战、战功赫赫的高级将领，他们曾经遭遇的战争情况并不比苏联自身所遭遇的单纯，所以，每当苏联顾问眉飞色舞的大谈其经验时，总有些学员不禁要说：“你们在卫国战争中的那些仗，打得跟我们也差不多嘛。”【注3】（《廖汉生回忆录一续》85页）学员们反映的这些个问题虽有对教条主义倾向的不满，还只是针对具体的技术环节，也就是一个学习方法的不同意见，远没有上升到什么路线、主义，而且，作为军事学院的负责人刘伯承自己非常注意对教条主义的控制，早在办“陆大”（陆军大学）时毛泽东曾经要给“陆大”派遣一批苏联顾问，刘伯承有憾于红军苏区时期李德以顾问之名行“太上皇”之实的历史教训专门和周恩来提出最好不要叫顾问这个名字，而改为专家，刘的良苦用心得到周恩来的同意。【注4】（《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四142页）刘伯承对于教条主义的倾向也时有纠正，1956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五个文件的通知，要求全党认真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等5篇文章，“克服实际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特别是克服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外国经验中的教条主义倾向，克服学术研究、报刊宣传、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也发出了贯彻中共中央指示的补充通知。而就在5月，刘伯承在中共军事学院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在全面总结学院工作的同时，就提出了防止与反对教条主义的问题。8月，刘伯承赴京出席党的七届七中全会和“八大”预备会议，从北京三次写信给院党委，明确地表示：“我们学了5年多的东西，总算有了几条，教条主义的思想有些发展（即将苏联经验搬用过来），这是合乎情理与事实的。在学习五个文件中，反主观主义（即教条主义与经验主义），着重反教条主义是对的。”9月4日，刘伯承又一次写信给院党委，提出反对教条主义的方法。他说：“在检讨时必须发扬民主，进行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肯定那些是对的，就继续发扬；否定那些有错误和缺点的，就改正。不要过分追究个人责任，作过火的斗争……如说有错误，那是院长、政委主要领导者的责任。”【注5】（《刘伯承传》651、652页）

但是，刘伯承的努力并没有阻止这场风波的到来。训练总监部主管院校工作的副部长张宗逊到南京军事学院进行调查，张宗逊曾经提出对于苏联要“不走样的学”，【注6】（《张宗逊回忆录》448页）他在南京军事学院调查期间，却认定这里的教条主义严重，和他同去的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还说：“军事学院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这时还有人说“训练总监部是教条主义的司令

部。”【注7】（《萧克回忆录》442页）而关于南京军事学院的问题，张宗逊他们来之前，已经有人向军委、国防部主要领导反映过，1957年1月5日，当时在南京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学习的韩先楚上将就曾经向彭德怀反映过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面的一些看法。【注8】（《彭德怀年谱》637页）1957年2月彭德怀、谭政等领导来到南京军事学院检查工作，此后形成了一个报告，也就是《军事学院反教条主义问题》，这份报告在肯定学员的成绩后称：“但是在过去几年的教学中，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教学工作中的教条主义相当严重。最主要的表现是教学内容和我国我军当前的实际情况不大相适应。在教材和作业想定中，对于我军党委集体领导和首长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制度，对于我军的政治工作制度照顾少，多半是采用了‘一长制’的精神。编写教材和作业想定的根据，没有注意我军现有的装备技术条件以及我军最近的将来可能达到的装备技术水平，而是把苏军已经高度机械化的装备技术条件作为依据。在战术演习中，除了注意到一般地形条件下的攻防战术之外，很少针对我国大部分沿海地区山地多、河流多、水田多的特点，忽视了我军长期在复杂地形条件下所采用的渗透、穿插、迂回、包围等战术活动，把大部分演习都设想在一般起伏地带，都设想为大规模的正面攻防战。这样教学的结果，固然一方面可以使干部取得一些现代技术条件下的战争规律知识，但是，另一方面就包含着一个危险，这便是一旦发生了战争，我们的军队就可能不会以劣势的装备去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也可能不会在山地、水网、河川地带进行作战，将使我军在战争初期遭受不必要的损失。”报告在分析产生错误的主、客观原因时说：“在军事学院产生这些缺点，是有客观原因的。在学院开办的最初几年，没有适合我军情况的现成教材，因此许多教材不得不请苏联专家替我们编写；学院人力不足，忙于应付施教，不能兼顾研究我军自己的经验；我军的各种条令迟至今日没有编写出来，使教学无所依据。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从学院方面来说，在成立了6年多之后，对于结合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仍然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特别是经过1956年9月全院学过五个整风文件，学院中的许多同志已经感到有反对教条主义必要之后，而院党委仍然徘徊、犹豫、拖延，未能下定决心，就使党委领导在教学工作上落后于客观实际了。”【注9】（《刘伯承传》656、657页）这份报告缺乏一定的客观和全面，夸大了所谓的教条主义的严重性，特别是把这个所谓的错误归结为军事学院主要负责人身上，说这是由于他们的拖延、犹豫、徘徊造成的更是错上加错。国防部工作组的这份报告开启了全军反教条主义的大门。

3月2日，彭德怀在听取南京军事学院汇报后发言表态，他说：“在学院教育中，不是有无教条主义的问题，而是教条主义相当严重。”但是，彭德怀也同时指出：“不能把责任归咎于哪一个人，要论责任，我也是有责任的。”【注10】（《彭德怀年谱》642页）彭德怀的讲话和此前的报告不尽相同，从彭的讲话来看，彭不同意单纯的就把责任划给某个人，这时，彭德怀还是倾向于对事不对人的。这份讲话报经毛泽东，毛泽东于4月25日批示“此件已阅，同意。”而就在毛泽东批示之前的3月14日，彭已经先把这份报告交给在上海疗养的刘伯承过目，刘伯承看后表示“没有意见”。【注11】（《彭德怀年谱》643页）3月4日，彭德怀在同总高级步校头头座谈时还是强调要“应该把技术加到军事体系中，不是把军事体系塞到技术中去。”【注12】（同【注11】）

在接到彭德怀等领导对学院的批评后，在3月8日，刘伯承在给钟期光、陈伯钧等人的信中指出“这次又获德怀同志谭政同志检查指示，方针办法更为明确，学院应切实遵循。”【注13】（《曲折发展的岁月》282页）此后刘伯承还分别在5月30日和8月24日两次给学院当时主持工作的负责人写信，就如何保证反教条主义的实现以及干部开展的批评自我批评做了指示。尽管刘伯承从组织的角度同意接纳彭德怀检查工作后形成的报告和3月初的讲话要点，但是刘伯承还是坚持认为“军事学院的训练方针、训练内容和对解放军经验的估计，对苏联先进经验的学习，基本方向和原则都是正确的，应该充分肯定。工作中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是属于贯彻执行中具体措施方面的问题。”【注14】（《刘伯承传》658、659页）也就是说南京军事学院出现的所谓的教条主义说到底还是技术问题、方法问题，而不是路线问题。应该说刘伯承的这个看法还是符合客观事实的。

然而，事与愿违，刘伯承的客观看法没有得到高层的认可，而且斗争的方向正朝着刘伯承希望的相反路线越滑越远。反教条主义的问题在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主持召开的相关会议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秘书长黄克诚同意报告对军事学院的评价，而训练总监部部长萧克则持反对意见，萧克尤其不同意称军事学院为教条主义大本营的说法。萧克不但不同意黄克诚的结论，也和彭德怀有严重的分歧，萧克认为彭德怀在1957年2月对军事学院教条主义的严重估计，同时也不同意彭德怀批判正规化、现代化的口号。1958年2月21日，就此前彭德怀写就的纪念苏联红军建军30周年大会上的文章《把我军建设成优良的现代化的革命军队》提出自己的看法，萧克认为，不应该把中央军委、毛泽东提出的军队正规化、现代化的口号和后来毛泽东提出的现代化、革命化的口号对立起来，后者不过是对前者进一步的高度总结，而不是对前者的否定。萧克给彭德怀的这封上书后来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就在萧克给彭德怀上书的同时，训总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把本来已经严重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这次会议的一个内容就是讨论反教条主义的，开会期间，有些人针对张宗逊对学习苏联的前后颠倒的态度提出了批评，认为以前张宗逊要求“不走样的学”、“先学后用”、“死学活用”、“不愿学苏联的滚开”，忽而一下子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学的越多、中毒越深”。【注15】（《萧克回忆录》447页）结果，与会人员还要求把已经调任副总参谋长的张宗逊找回来听听意见，在请示黄克诚同意后，张宗逊又回到训总听训，就在四级干部会议将要结束时，总政治部工作组下来了，工作组组长、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刘其人指责训总的四级干部会是向党进攻的会，而反对张宗逊就是反对彭德怀，就是反对党中央。刘其人说：“彭总说了，你们反张宗逊就是反我。”张宗逊自己也说：“我的思想就是彭总的思想，反对我就是反对彭总，就是反对军委，就是反党反中央。”【注16】（《萧克回忆录》448页）原本四级干部会上对强加给训总的“教条主义司令部”就相当不满，这样一来事态更加严重了，就连先前主张“对事不对人”的彭德怀说话中也带了意气，彭说：“训总撤了我国防部长的职，我进不了训总的大门，南京军事学院又有土专家，又有军事权威，我不敢去。”【注17】（《萧克回忆录》449页）

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全党全军都在看最高当局的眼色，也就是毛泽东的态度。本来，毛泽东对军事上出现的教条主义并没有存在很大的顾虑，他在成都会议上还说：“军事工作中搬了一部分教条，但建军基本原则坚持了，还不能说是教条主义。”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政治形势的转变，毛泽东的思维也随之转变，当时，中苏关系已经从蜜月期走了出来，开始在一些问题上出现分歧，苏联领导人对斯大林的评价和稍后在处理国际问题上的手法同毛泽东的认识已经渐行渐远，学习苏联不但不合政治时宜，仅从技术层面上也有负面影响，而且教条主义触动了毛泽东最为敏感的一根历史神经，让他把目光投向那些曾经导致他“走麦城”的往事中去。在中央苏区时，就是因为教条主义的原因使得毛泽东吃足了苦头，也给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毛泽东对教条主义可谓恨之入骨，直到他的晚年还对教条主义深有感触的指斥道：“你们只恨经验主义，不恨教条主义，28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注18】（《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1975》188页）而对于那些曾带有教条主义痕迹的人也极尽挖苦之能事，当年有人称赞张闻天是理论家时，毛泽东不满的说：“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注19】（《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127页）由于上述历史原因和现实情况，毛泽东在接到几方面意见后，决定对教条主义进行批判。

毛泽东所接到的几方面意见中除了彭德怀的国防部报告外，还有一个十分关键的意见是来自于林彪之手。林彪自从脱身于高饶事件后，在1954年9月成立的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共中央书记处之下的中央军事委员会，林彪和毛泽东、朱德、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叶剑英、聂荣臻、徐向前都是成员，同年10月，在军委分工上，林彪和朱德、陈毅暂时不作具体安排。【注20】（《罗荣桓年谱》755页）这一时期的林彪还是以休养为主，1956年的八届一中全会上林彪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也就在1958年的5月，林彪在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上跃而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成员。林彪是5月25日当选中共中央副主席的，但是，他关注全军反教条主义则是由来已久的。据林彪自己在1959年8月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去年军委扩大会议反教条主义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训总四级干部会议开了个把月，这时候彭德怀同志站在什么立场上是很含糊的。在军委扩大会议之前，彭德怀同志的态度也是不明确的。”这个开篇的帽子因为彭已经在此前的庐山会议上遭到彻底的批判，所以，即便林彪颠倒黑白的胡说一通，在当时的政治背景看来也是情理之中。跟着林彪话锋一转：“我刚回京时，刘其人找到我那里去，无意中谈到萧克· · · · · ·萧克有教条主义倾向，我才开始接触这个问题，当时军委扩大会议马上要开，但并没有确定以反教条主义为主题，我得到这个材料后，认为应该以这个为主题，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有这个思想内容。（我）把情况报告给毛主席，毛主席认为应该开展这个斗争，会议是毛主席决定的，材料是×××提供的，这才有去年以反教条为中心的军委扩大会议。”【注21】（《萧克回忆录》450页）从林彪的讲话中，我们注意到一点，那就是正是林彪本人把材料送交给毛泽东之后，毛泽东才决定开展反教条主义，而原来议定的扩大会议议程中反教条主义并非主

要议题，也正是林彪自己“认为应该以这个为主题，军委扩大会议应该有这个思想内容。”才使得反教条主义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成为一切问题的中心。

事实上，林彪不仅在送交材料上先声夺人，而且在开会期间也给反教条主义摇旗呐喊、拔高升温，他说：“有人一提起学习就想到外国，专学外国的东西，以为只有外国的东西才是好的。这就是迷信，一定要打破迷信观点”、“不要一谈到外国的东西就津津有味，把本国的东西看作是‘土包子’。”、“我们的经验很丰富，不能把黄金当黄土甩掉了”。他还说：“有的单位不把毛主席军事著作作为军事基本教材，只作为参考材料，是不对的。有的单位连参考也没有列上，就更不应该。”【注 22】（《刘伯承传》663 页、664 页）林彪是军委扩大会议的主持人，他这么讲让这次会议陡然气氛紧张起来，6 月 9 日，黄克诚传达毛泽东的意见，说毛泽东讲开不好，大家就不要走。并且把会议范围扩大到师一级。【注 23】（《萧克回忆录》450、451 页）

彭德怀在宣布本次军委扩大会议内容时点了萧克的名，跟着林彪就在开幕式的讲话中对彭进行了不露声色的支持。林彪说：“军委的经常工作是在彭老总的主持下进行的，今后我们要继续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军队同志继续在彭老总的领导下更好的团结起来。”【注 24】（《曲折发展的岁月》289 页）五十年代一度流行在军内的一句口号“要团结在彭总的身边”实际也是出自林彪之口。因为毛泽东决心很大，彭德怀、林彪作为军委负责人和大会主持人又都发了话，所以，批判的调子开场就很高，而且直接指向训总的负责人萧克。彭德怀说萧克：“朱可夫事件，匈牙利军队未经战斗就瓦解的教训，你都不吸收，我军的历史教训你也不吸收，就是看到了正规化。你不同意我批判正规化口号的提法，写信给我，说只是执行中的问题，我不能同意。就是执行中的问题，也得要批判。”【注 25】（同【注 24】）彭德怀还提出“反教条主义”斗争是“在建军新阶段中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给萧克等人扣上“军事教条主义”和“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思想和战略方针”的帽子。【注 26】（《萧克回忆录》451 页）

彭德怀在 6 月 20 日讲话中提到三点意见，第一，从建军那天起，就存在着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第二，犯单纯军事观点和教条主义错误有多种，主要是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第三，在教条主义问题上，我（彭德怀）也是有责任的。

【注 27】（《彭德怀年谱》688 页）毛泽东对彭德怀的这份意见很感满意，专门做了批示：“此件值得一阅。”【注 28】（同【注 27】），毛泽东还表示：“我多年来没有管军事。不管军事，四年于斯矣……你们凡是批评彭德怀同志的，也就是批评我。”【注 29】（同【注 27】）毛泽东这里虽然是自我批评，可鞭子却打在与会者的身上，他们都自感责任重大。接着，毛泽东于 6 月 23 日、29 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公开提到：“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自己的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应该主要讲自己的，另外参考人家的。”他还说：“不知道军事学院、训总到底有

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列主义本来是行动的指南，而他们当作死条条来啃，马克思、列宁在的话，一定批评他们是教条主义。”【注 30】（《刘伯承传》664 页）有人向毛泽东汇报说萧克抵抗反教条主义运动，不作检讨。毛泽东说：“萧克是坏人，是资产阶级队伍的人。”【注 31】（《萧克回忆录》451 页）对于刘伯承，毛泽东说了一些“错误评论刘伯承功过的话。”【注 32】（《刘伯承传》664 页）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采取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批判军队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路线、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党宗派活动等等，开展所谓的两条军事路线的斗争。批判对象从萧克扩大到李达、陈伯钧、宋时轮、叶剑英、粟裕、刘伯承。特别是对刘伯承，扩大会议显得不够公正、客观，会议给刘伯承划定了五个历史时期，即北伐、土地革命、抗战、解放战争、建国后。而指责刘伯承五个历史时期有三个历史时期是犯了路线错误，也就是土地革命、抗战前期和建国后，按照这个比例划分，刘伯承已经属于“功不抵过”了，难怪当时就有人私下提醒陈伯钧要他尽快和刘伯承划清界限。【注 33】（《曲折发展的岁月》290 页）而刘伯承的夫人汪荣华在《送伯承远行》一文中指出，当时已经有人准备把“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总代表“送”给刘伯承，可是未果。【注 34】（《记刘帅》541 页）

在这样的高压气氛下，刘伯承被迫北上进京检讨。到了北京，他得了青光眼，眼压高达 73 度，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一面治疗，一面准备检查材料。7 月 10 日，刘伯承几乎是冒着失明的危险走上讲台进行公开检讨。当刘伯承出现在会场时，掌声大作，持续大约有半分钟。廖汉生中将曾经感叹的自言自语道：“老首长，没少受罪啊。”【注 35】（《廖汉生回忆录一续》134 页）原 66 军军长刘政（时任高等军事学院战略教研室教员、大校军衔）听后刘伯承的检讨，深受感动，还给大会主席团写了信谈自己的感触。【注 36】（《曲折发展的岁月》291 页）

在这场反教条主义运动中，有三个人的态度值得关注，这三个人就是邓小平、陈毅和叶剑英。

邓小平和刘伯承久为搭档，人称“刘邓”，在会场内外风刀霜剑的情况下，邓小平说了这样几段话，邓说：“刘伯承同志工作积极认真，对组织是尊重的。他今年已 66 岁了，又有病，不要搞得太紧张。”【注 37】（《刘伯承传》665 页）在谈及刘伯承的功过是非时，邓坦率的说：“伯承同志，我是非常尊重他的，我们是老搭档了，你说他犯了错误，我心里那么舒服？我是很不舒服的，伯承同志这几年工作不是都做的不好，也不是过去不好，不能说他多年来做的不是好事，如果这样说，不公道。”【注 38】（《曲折发展的岁月》291 页）邓小平能在那种背景之下说到对待刘伯承的所谓的历史时期功过划分实为不公道诚属难能可贵。在斗争最为严重时，毛泽东曾经考虑要撤销刘伯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征求邓小平的意见，邓不赞成，毛泽东这才作罢。【注

39】（《曲折发展的岁月》294页）也是这位刘邓大军的“邓”，后来专门给反教条主义重新定性，给那些蒙受冤屈的战友包括刘伯承在内公平反昭雪。

陈毅和刘伯承交往并非很多，和萧克是老战友，当刘伯承准备检讨时，陈毅跑到北京医院看望刘伯承，他对刘伯承说：“你写啥子检讨嘛！要写，我替你写，写一百个字就行了。”【注40】（同【注37】）而就当有人把萧克往“反党”上面挂靠时，陈毅还谈起萧克素来和士兵的关系不错，离开五师时，官兵都哭哭啼啼、依依不舍。【注41】（同【注38】）叶剑英从一开始就不同意给训总和军事学院扣上教条主义司令部和大本营的提法，他在去南京军事学院考察时顶风夸奖刘伯承道：“我们刘伯承同志40多年的战场生活、军队生活，俄文、中文、战斗经验，象他这样是很少的，很红、很专，但就是不健。他曾八九次受伤，为革命、为人民流了很多血，是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宝贝，应该很好地维护他的健康，负责国家大事。”【注42】（《刘伯承传》660页）

“岁寒知松柏”，全军反教条主义运动中，有人落井下石，有人幸灾乐祸，也有人风吹草动，更有人实事求是，上面我们提到的邓小平、陈毅、叶剑英所作所为、所言所思就是这场极左运动里难得一见的最大的亮点。有位日本记者曾经说过这么一件事，他讲刘伯承晚年对身边人说，如果将来他死了，追悼会要请邓小平给主持。此事未经证实，不过，邓小平在刘伯承病逝后确实亲自主持了刘伯承追悼会，并且最先率领全家来到刘伯承的灵堂向刘伯承遗体肃穆的三鞠躬。

全军反教条主义大会在1958年7月22日终于落下帷幕，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决议指出：“教条主义倾向直到最近仍然占着统治地位。”决议要求：“目前的斗争必须在全军认真的展开。”【注43】（《曲折发展的岁月》292页）大会还通过了《关于处理萧克同志所犯错误的决议》，这份决议表示暂不对萧克作出结论，待大会闭幕后，在军委和总政治部的领导下，做进一步的彻底揭发检查再作定论。

萧克、李达被诬为“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代表人物”继续在扩大会议后遭受批判，并且撤销了他们的职务。刘其人、甘泗淇、张宗逊还把萧克主持编写的、经毛泽东批阅、彭德怀修改的《共同条令》称之为“反党反中央、反对军委领导，反对军委正确路线、企图改变我军面貌的纲领”。【注44】（《萧克回忆录》452页）萧克因急火攻心、疲惫不堪以致于大口吐血。萧克的检讨送了上去，彭德怀说：“萧克，你这个人经得斗。”萧克回答：“我的检讨还可以根据事实核查。”在讨论关于军委对萧克错误的决议时，萧克有些不服气，随口说了一句：“基本上同意。”结果马上招来质问：“你说的基本是多少？百分之五十还是百分之六十？”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很严厉的说：“他不服，再开个

会研究一下。”萧克这才默不做声。【注 45】（《萧克回忆录》455 页）军委扩大会议定了调子，所以，此后的批判逐步升温，例如指定训练总监部临时党委书记郭天民上将领导揭发萧克和李达，等到郭天民“积极表现”后，又把郭天民当作了批斗对象，还给郭天民硬安了一个“萧克、李达反党宗派集团”

“第二副帅”的头衔。【注 46】（同【注 45】）而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蔡铁根大校的遭遇更为惨烈，蔡铁根不过说了一句“共同条令”是经彭总修改、军委例会通过、毛主席批准的实话，就被打断发言揪出会场，同时撕下领章帽徽，作为右派关押起来，文革中蔡铁根不满诬陷，上书抗辩居然遭到处决！

【注 47】（《萧克回忆录》452、453 页）由军委扩大会议引发的批判余波直到 1959 年 5 月 14 日中央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以萧克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和反党宗派活动》才告结束。这场运动波及到了萧克、李达、郭天民、李钟奇、吴伟、叶楚屏、杨力勇、李文芳、王波、刘光第、王时彦、陈绪英等多名将领，其中陈绪英拒绝工作组要求他“揭发”的指示，结果给赶出军队送到边疆劳动。【注 48】（《萧克回忆录》456 页）

全军反教条主义持续长达一年有余，其影响之坏却远不及此。徐向前对这起运动的评价是：“这场反教条主义斗争是错误的，不仅伤害了刘伯承等同志，而且严重干扰了起步不久的我军现代化建设。”聂荣臻也说：“反教条主义，把这问题推到刘帅身上，这是不合适的。”【注 49】（《钟期光回忆录》524 页），中央军委纪委于 1987 年的第 15 号通报中给那些在反教条主义中受害的干部予以昭雪。而邓小平早在 1980 年秋就指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

【注 50】（《刘伯承传》668 页）他在亲笔撰写的《悼伯承》一文中郑重的提出：“1958 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完全可以说，伯承是我军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他在这方面的重大贡献，永远值得我们珍视。”【注 5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188 页）身为当年反教条主义的当事人钟期光将军晚年的回忆中把这场运动的弊端总结为这样几点：第一，把上面的问题搞成了下面的问题；第二，把学术学风问题搞成了政治问题；第三，把实际工作中的具体问题搞成了建军路线问题；第四，把工作问题搞成了党内斗争问题；第五，把国际、党际关系调整问题，搞成了国内、党内的人事问题；第六，以保守反进步，以愚昧反科学；第七，以土教条反洋教条；第八，以主观主义反对所谓主观主义；第九，自相矛盾的必然的逻辑错误；第十，对刘伯承元帅创办军事学院的功过评价是不符合实际的。【注 52】（《钟期光回忆录》525 页—532 页）其中，第七点的“以土教条反洋教条”和第六点的“以保守反进步，以愚昧反科学”最能一语道破反教条的错误核心所在。比之在军事正规化、制度化、现代化上面的损失而言，反教条主义的最严重的在于“开了遵义会议后党内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坏头。”【注 53】（《萧克回忆录》456 页）

在这场运动中，有两个人的作用不容忽视，一个是普遍受到敬重的彭德怀，一个则是本书的主人公林彪。彭德怀在反教条主义运动里的表现用钟期光的话说那就是“他（彭德怀）的整个一生是光辉而悲壮的，但在反教条主义问题上，

是令人遗憾的。”【注 54】（《钟期光回忆录》528 页）不过，彭德怀很快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文革结束后，彭德怀的侄子彭启超通过总政治部找到萧克，对萧克转达了彭德怀的遗言：“1958 年的事，让你们受苦了，对不起同志们啊。”【注 55】（《萧克回忆录》457 页）而萧克也早已原谅了这位心直口快、耿介一生的老首长。

我们反过来再审视一下林彪的表现，按照林彪在 1959 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来看，1958 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本来并没有准备把反教条主义作为主题考虑，正是由于林彪看中了反教条主义这个特殊的题材，并把他的动议转达给毛泽东，这才引发了后来的系列运动，可以说这场运动也正是在林彪的推波助澜的情况下完成的，对于造成的种种冤假错案，就林彪来说他是推卸不了主要责任的，而 1958 年林彪的这一笔也标志着他开始走上了助左为虐的晚年不归之路。

## 第二节：毛泽东与彭德怀的历史宿怨

林彪虽然在全军反教条主义的运动中露了一次面，但是，还没有完全走到前台来，时隔不到一年的 1959 年的第一次庐山会议上，作为“批彭”搬来的所谓的救兵的林彪的表现较之上年的幕后活动不仅身先士卒，而且风头十足。而我们要了解庐山会议这段历史则须首先回顾一下毛泽东同彭德怀之间的历史上的恩怨是非的纠缠经过。

### 1. 王佐、袁文才被误杀

众所周知，毛泽东能够以井冈山作为红色革命的第一块武装割据的屏障，和王佐、袁文才的衷心拥护分不开的。

袁文才，1898 年出生，祖籍广东，江西宁冈县（今井冈山市）人，属客籍。王佐，1898 年出生，江西遂川县人。袁文才、王佐都生长在井冈山地区，早年因反抗土豪劣绅的压迫，相继投身绿林，组织队伍，“杀富济贫、除暴安良”，在茅坪和茨坪遥相呼应，逐渐控制了整个井冈山。1926 年 9 月，在中共宁冈

县支部领导下，袁文才率部参加宁冈暴动，任县人民委员会军事部长、赣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并于同年 11 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 年 1 月，王佐也把自己的队伍改编成党领导的遂川县农民自卫军，任赣西农民自卫军副总指挥。1927 年 10 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后，积极团结改造袁文才、王佐，他们也愿意向共产党靠拢，把毛泽东和起义部队接上井冈山，并率部接受改编，参加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建立红军队伍的斗争，1928 年初，经过改编后的袁文才和王佐所部正式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任团长兼一营营长，王佐任副团长兼二营营长，不久，王佐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28 年 4 月，红四军成立，袁文才和王佐分别任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团团长和副团长。同时，他们还兼任遂川县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执行常委、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委员、湘赣边界防务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袁文才还担任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主席。期间，他们率领部队先后参加了宁冈新城战斗、龙源口战斗和著名的黄洋界保卫战等战斗，屡立战功。【注 56】（新华网新闻资料库）

袁文才、王佐素来服膺毛泽东，杨克敏说袁文才、王佐“只信仰个人，不相信群众”袁文才说过：“我就听一个毛委员的。”【注 57】（《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之二，232 页）袁文才还是毛泽东、贺子珍的媒人。总之，袁、王同毛泽东的关系是相当融洽的。但是，中共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对土匪的规定显示了新一轮的极左错误，这就给袁、王被杀提供了主要依据。袁、王被杀还有一个重要背景，那就是中央巡视员彭清泉（潘心源）的负面作用。由于主客籍的矛盾，中共湘赣边界特委曾经向中央反映过袁文才、王佐的问题，中央决定派彭清泉前来解决问题，彭清泉是中央巡视员，手里拿着“尚方宝剑”，一到根据地就把屁股做到了反对袁王的一边，召开红五军和边界的联系会议，在联系会议上，彭清泉力

主坚决解决袁文才、王佐，这点得到了红五军负责人彭德怀的认同。而这次在1930年1月18日到21日召开的联系会议等于说推翻了此前毛泽东所作出的灵活、机动的决定。1929年1月4日在宁冈柏路村的前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传达六大文件，待念到“处理与土匪关系”时，毛泽东叫停，故意支开王佐、袁文才，然后在小范围内讲了文件的真实要求，对于袁王的去留，毛泽东态度很明确，还是主张留下来，而彭德怀态度也很明确，那就是力主杀掉。这次彭清泉代表中央表态，直接的支持了彭德怀的意见。更巧的是这时宁冈县委谢希安等人向边界特委反映袁文才勾结罗克绍准备颠覆永新政权的情况送到了彭清泉、彭德怀等人的桌面上，彭清泉和特委对这个反映没有做详细的分析和调查，匆忙作出决定，彻底除掉袁文才、王佐，彭德怀则派出红五军前往执行解决袁王的命令。

实际上，袁文才不是勾结什么罗克绍颠覆永新政权，而是利用罗克绍给红色政权增添武器装备。罗克绍是茶陵五县的联防总指挥，手中有一个30多人的兵工厂，袁文才把罗克绍抓在手里目的就是要把武器搞到手，所以，抓获罗克绍以后，袁文才对罗非常礼遇，不但松绑还邀请罗打了麻将，这就让谢希安他们极为不满，认为袁文才准备勾结罗克绍不利于苏区，于是，谢希安就报告了他们的猜测，悲剧因此酿就。

中共六大的《苏维埃组织问题决议》中既有“与土匪或类似的团体联盟仅在武装起义前可以适用，武装起义之后宜解除其武装，并严厉地镇压他们”的条款，又有联席会议的决定，收拾袁王自然是“有理、有力”。1930年2月22日，袁文才、王佐留少数部队在宁冈，大部于当天抵达永新县城，特委安排好了袁王的住处。接着，湘赣边界特委就在永新召开各县负责人联席会议，会上彭清泉向袁文才、王佐发难，列举所谓的反党事实，袁文才据理力争，而且还拍了桌子，王佐比之袁文才还要激烈，干脆掏出了手枪放在桌上。23日晚，就

在特委准备的大量酒菜款待各县来人时，彭德怀的红五军从马家洲一带秘密转移到永新附近，其中第四纵队在拂晓前赶到永新县城，包围了袁王的部属，第四纵队战士手臂上都绑了白带子，凡是遇到没有缠白带子和口令对不上就可以直接开枪。而红五军之所以这么快的就把清洗的矛头直接对准了袁王，则是根据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特委秘书长陈正人的报告，朱昌偕、陈正人向彭德怀等人报告说袁王要叛变，务请红五军挽救这一危局。【注 58】（《彭德怀年谱》43 页）就这样，彭德怀迅速决定调动部队开驻永新。袁王事件起来后，又是边界特委书记朱昌偕第一个闯入袁文才的房间，开枪就打，袁文才当即死在床上，而王佐听到枪声慌忙逃跑，涉水时淹死河中。这次变乱，袁王身死不说，其部下被打死、淹死的也有 40 多人，其余编入红五军和宁冈县游击队。杀害袁王以后公布袁王的所谓罪状有两条，一为袁王反对分田反对苏维埃；一为勾结茶陵靖卫团危害永新赤色政府。事后查明，这些罪名都是站不住脚的，而袁王既死，袁王余部急于报仇，一面私放罗克绍，一面向国民党投靠，井冈山随即丢失，此后红军多次反攻力图夺回都未能奏效，直到 1949 年才重又归于解放。

袁王被误杀是一起红军时期的悲剧，如果讨论起这件事的责任，我们认为中共宁冈县委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办公室给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书面汇报《关于错杀袁文才、王佐的调查报告》还是比较符合客观历史实际的，这份报告确认事件责任首先要归罪于中共六大的极左决议，其次是边界特委的一些负责人捕风捉影、不加分析的报告，当然，彭德怀作为红五军军长、前委候补常委也需要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彭德怀那时候所处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萧克曾经回忆说：“当时在地方，在军队，真正决定问题的是彭德怀。”【注 59】（《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之二 233 页）可见，如果彭德怀能够冷静一点思考这件事，也许后果不至于此。

事实上，在袁文才、王佐问题上，毛泽东曾经对彭德怀讲过：“袁这人很狡猾，名堂很多，他已同意随四军政治部工作，这就可减少井冈山以后工作的困难。”【注 60】（《彭德怀自述》143 页）这是毛泽东离开井冈山之前和彭德怀的谈话，从这次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并不放心袁文才，认为他“狡猾、名堂多”，但是，也指出解决的办法，那就是“离开旧基础、改换新环境”【注 61】（同【注 60】）这同此前的 1929 年 1 月 4 日柏路村前委扩大会议上的毛泽东对袁王的态度基本是一致的，那就是最低限度不要杀，而就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则主张杀掉。后来，彭德怀在同薄一波的谈话里也承认自己在袁王事件上负有责任，错在轻听轻信上。而毛泽东则对彭的这一错误提出过严厉批评，认为无论如何没有理由将他们杀掉。【注 62】（《领袖元帅与战友》182 页）庐山会议期间，有人诬称彭德怀误杀王佐、袁文才是为了吞并他们的武装，这是无稽之谈。但是，袁王事件留给毛、彭关系上的阴影则是无疑的。

## 2. 打赣州

1931 年 3 月 18 日，彭德怀在苏区中央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增选为苏区中央局委员，同年 11 月 25 日，彭德怀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为朱德、另一位副主席为王稼祥）这时候的彭德怀已经跻身苏区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的军事意见举足轻重。1932 年 1 月已经走上左倾道路的中共中央发布《中央关于争取革命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根据这个指示，1 月 10 日中革军委下达向赣州进攻的命令，此为打赣州的背景。这次攻打赣州主力部队为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第四军），彭德怀任主作战军前敌总指挥。赣州位于赣江上游章江、贡江交汇处，易守难攻，素有“铁打赣州”一说，因此毛泽东不同意硬攻，他阐述自己的意见：赣州是赣南的政治经济中心，是闽粤两省的咽喉，是敌军必守的坚城；它三面环水、城墙高筑、易守难攻，前年三月红四军曾围攻赣州三天，没有结果，只得撤围；现在赣州南北都屯集着国民党重兵，以红军现有力量和技术装备很可能久攻不克，还是不打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但是，中央局多数成员不同意毛泽东的看法，赞成按照临时中央的决议，毛泽东建议是否应该听一听前线指挥员的意见，项英表示，在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时，他问过彭德怀可不

可以打下赣州？彭德怀回答：“赣州守军马（壘）旅估计有六千人，地方靖卫团两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时间，蒋介石又不来增援，是可以打下的。”【注 63】（《彭德怀自述》173 页）于是，毛泽东的建议落空。在打赣州的途中，有人还扬言说打下赣州后回来找毛泽东算帐。

中央红军这次攻打赣州历时三十三天，连续使用多种攻城方法，但赣州城未能攻下，红军伤亡达三千多人，红一师师长侯中英被俘遇害。项英冒雨骑马找到毛泽东，请毛泽东务必下山前往参加攻打赣州决策，毛泽东复电前线指挥部，提议大胆起用起义才两个月、原来被作为预备队的红五军团，以解红三军团之围。他又从瑞金出发，日夜兼程，赶到赣县江口前线指挥部。朱德告诉毛泽东：按照你的意见，已把预备队红五军团拉上来，在红四军支援下，使红三军团脱出险境。【注 64】（《毛传 1893—1949》292 页）提议苏区中央局在前线召开会议，讨论打赣州的经验教训和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三月中旬，苏区中央局扩大会议在赣县江口举行（即江口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攻打赣州是错误的，主张红军主力向敌人力量比较薄弱、党和群众基础较好、地势有利的赣东北发展。他这种主张，是要转入外线的进攻作战，以“出击求巩固”。但另一些人仍认为，红军攻打赣州是依据中央和中央局的决议，在政治上是正确的；胜败乃兵家常事，现在虽从赣州撤围，并不是不再打赣州了；红军还是要执行中央的“进攻路线”，要夺取中心城市的，主张红军开到湖南去。【注 65】（同【注 64】）就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支持了中央局多数意见，再一次和毛泽东唱了“反调”。【注 66】（《彭德怀传》103 页）这样，在多数人反对毛泽东的意见的情况下，红军主力“夹赣江而下”，向北发展，相机夺取赣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较大城市；以红一、红五军团组成中路军，以红三军团、红十六军等组成西路军，分别作战；两路军苦战数月，虽小有斩获，但对于完成一省或者数省的胜利、打破敌军围剿态势并没有给予根本性的支撑，反而削弱和疲惫了自己的力量。对于这一点，朱德、彭德怀都深有感触，朱德一九六一年二月九日曾赋诗《经闽西感怀》，对毛泽东这次意见遭受否决表示惋惜：“不听仙人指，寻求武夷巅。越过仙霞岭，早登天台山。赣闽成一片，直到杭州湾。出击求巩固，灭敌在此间。”朱德在注释中说明：“这首诗第一句以下各句，都是毛主席当时的指示精神”，“但这一正确主张，未被采纳”。【注 67】（同【注 64】）而彭德怀也坦率的承认了自己当时的错误认识，他说：“我在当时没有这种认识，执行方面军司令部打赣州的错误命令时，不仅未加任何抵制，而且是自觉的坚决的执行。只想打开赣州、解放赣南、联系湘赣边区，巩固后方、保护瑞金安全，然后再行北进，这样片面的想法，显然是脱离了当时的客观政治形势的。”【注 68】（《彭德怀自述》174、175 页）对于打赣州之后的江口会议上的表现，彭德怀自我检查说：“我当时没有认识四中全会是立三路线的继续，· · · · · ·当时自己仅仅是服从中央决定，带有极大的盲目性。”【注 69】（《彭德怀自述》176 页）

其实，从党内的组织原则看，彭德怀同意大多数中央局成员的意见和执行临时中央的决议这点上并不为过，尽管当时多数派意见和临时中央的决定都具有很大的片面性，但是，因此就像第一次庐山会议上指责彭德怀从这时候便开始心存反毛的倾向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无限上纲的一种表现。不过，彭德怀其时身处的地位十分关键，他的一票看似一票实际代表着相当大的权威，如果

他在江口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那么会议决定将会朝着有利于毛泽东主张的方向发展，对于这一点彭自己也不讳言。他说：“当时我如支持毛主席的意见，中央局可能会重新考虑。”【注 70】（同【注 69】）攻打赣州前后，正是毛泽东在中央苏区走向失势的开始，这时节的毛泽东急需支持和理解，所以，彭德怀在赣州问题上的前后两次“唱反调”的态度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伤害了毛泽东的政治感情，而这件事也始终成为毛、彭关系上一个明显的难以克服的阻碍，直到庐山会议期间还被提出并且加以延伸。

### 3. 会理会议

关于会理会议上，毛、彭之间形成的历史误会我们在本书的第一章第二节《从短促突击到会理会议》中曾经给予介绍，这里不再做更多的重复，只是对内中的个别细节做一点必要的补充。

根据彭德怀的《庐山笔记》中记载，毛泽东在会理会议期间曾经打断毛泽东的发言，直指彭德怀说：“彭德怀同志你对失去中央苏区不满，在困难中动摇，这是右倾，林彪写的信是你鼓动起来的。”“你向中央隐瞒三军团指战员对作战方针的不满情绪，少奇向中央反映，你不签字。”在指责彭德怀的同时顺便把担任三军团政委的杨尚昆也说成“彭德怀的尾巴”，算什么政治委员等。林彪面对如此肃杀的场面说：“我给中央写信，没有什么想法，主要因为老跑路，心里烦闷。”彭德怀在会议的最后作出声明，林彪给中央写信，事先他不知道，也不是他鼓动林彪做的。【注 71】（《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50 页转引彭德怀《庐山笔记》）即便是这样，林彪仍未当场作出旁证解释写信的前因后果，毛泽东也不相信彭德怀的解释，否则庐山会议时就不会旧事重提了。

### 4. 百团大战前后

王明自 1937 年 11 月回国后，在抗战的总体方针以及中共和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如何应对统一战线等一系列相关问题上和毛泽东发生了冲突，王明的这些观点后来被称之为“第二次王明右倾路线”。在对待这次路线错误的斗争中，彭德怀的一些表现令毛泽东不满，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的闭幕式上如此评价道：“二次王明右倾路线团结了不少人，团结在长江局周围去了，除陕北外都有影响。因为路线错误，1938 年对革命有损失，有些地方 1939 年、1940 年才转过来，危害了两年多。那时候，新四军在项英手上；八路军在彭德怀手上，那时一个北方局，一个东南局，还有一个山东分局，甚至连陕西省委都不听我们的话。所有那些错误，都该清算一下。”【注 72】（《庐山会议实录》307 页）

1937 年 10 月 8 日，华北军分会（前身为中央军委前方分会，于 1937 年 8 月成立，朱德任书记、彭德怀任副书记，后改称华北军分会）发出《目前华北战争

形势与我军任务》的指示，这份指示认为山西可以看作是抗战中华北的堡垒，提出巩固山西、反击敌人、改变华北战局的主张。事实上，这个指示和毛泽东在洛川会议上的提法颇有抵触。毛泽东在1937年8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称“洛川会议”）上明确指出红军在抗战中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其原则是“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毛泽东认为：“在这些特殊的情况下，必须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成为游击军（说的是分散使用，不是说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和游击战，才能同敌情和任务相符合。但是这样的一个转变，便在现象上表现为一个倒退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应该是非常困难的。”【注73】（《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91年6月版，551页）毛泽东的这一提法在会上遭致一些不同意见，聂荣臻回忆道：“在洛川会议上讨论作战方针时，曾出现过不赞同游击战而主张打运动战的分歧意见，他（引者注：指毛泽东）担心部队挺进前线后，一些同志蛮干。”【注74】（《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8月版，第359页）聂荣臻这里所说的分歧意见的人群中也包括彭德怀，因而，毛泽东在1937年9月21日电告彭德怀：“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要实行这样的方针，就要战略上有有力部队处于敌之翼侧，就要以创造根据地发动群众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为主。集中打仗则不能做群众工作，做群众工作则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则不能并举。然而只有分散做群众工作，才是决定地制胜敌人援助友军的唯一无二的办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无结果之可言的。”他强调：“目前情况与过去国内战争根本不同，不能回想过去的味道”。他要彭德怀“对于个别同志不妥当的观点，给予深刻的解释，使战略方针归于一致”。【注75】（《毛传1893—1949》487、488页）毛泽东还在这封电报中特别提醒道：“整个华北都是危如累卵。个别同志对于这种客观的必然的趋势似乎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被暂时情况所诱惑，如果这种观点不变，势必红军也同阎锡山相似，陷入于被动的、应付的、挨打的、被敌各个击破的境遇中。”【注76】（《毛传1893—1949》487页）但是，毛泽东的提醒没有引起华北军分会的足够重视，“十月指示”虽然也说要按照独立自主的运动游击战的原则，但是，这个指示其实质还是具有“轻敌速胜观点”（彭德怀语）【注77】（《彭德怀自述》223页）后来，这个指示受到批判，彭德怀因为是华北军分会的常委、负责人之一，所以，也蒙受了指责，其实，彭本人在“指示”起草和下发阶段根本不在八路军总部，他还是在卫立煌处看到的，不过，彭自己也承认，他身上的“轻敌速胜的思想，对别人可能有影响”【注78】（《彭德怀自述》224页）

接着，在1937年12月9日到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有关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十二月会议尽管没有此前的“洛川会议”和稍后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那样著名，但其历史地位和影响实在不容低估，有关党史资料上披露此次会议中央政治局成员出席景象颇为壮观、整齐，计有：毛泽东、王明、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张国焘、王稼祥、任弼时、彭德怀、项英、刘少奇、康生、陈云、邓发、凯丰。【注79】（王建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296页）在这次会

议上，不但于此抗战中的各自政治观点有一集中的表露，也对党的核心层的成员有所改组。王明就于此间抛出他的“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基本观点，周恩来则在12月11日的会上提出“从山西的情况来看由于没有实行抗日高于一切的原则，而把独立自主提得太高，所以党内、军内和各地都有不利于抗战、不利于统一战线言论、思想及行动。”【注80】（《周恩来年谱《1898—1949》393页），从中央领导层的一些成员发言表态看，当时围绕着抗战中中共到底应该采取哪一种手段维护抗战大局的同时又能保证自身的独立性上存在着一些微妙的言行。彭德怀没有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反而受了王明的影响，他在会议上除了汇报华北抗战情况以外，没有明确提出支持毛泽东的主张，当然也没有明确提出拥护或者反对王明的主张，而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注81】（《彭德怀自述》225页）而当王明对毛泽东所提出的以山地游击战为唯一抗战方针提出批评时，彭德怀赞同王明的看法，他说：“在战略上应当是战略游击战，在应用上要利用山地打游击。”【注82】（《彭德怀传》177页）彭德怀对于毛泽东的战略意识是逐步认识到位的，所以，当时彭的这种表态很难说就是和王明打成一片，更不能因此说彭就是反对毛泽东的。不过，彭的表态让毛泽东不快倒也是事实。十二月会议还决定成立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书记：王明。秘书处由毛泽东、王明、张闻天、陈云、康生组成。

1940年，日本在中国战场加紧对国民党政权进行政治诱降活动，同时以主要力量继续进攻抗日根据地。日军在占领区周围建起了大量的碉堡，布下铁丝网等障碍物，试图分割、瓦解各个根据地，此为“囚笼政策”。与“囚笼政策”相对应的则是“三光政策”，而当时盛行的所谓的“共产党游而不击、专打友军”的政治谣言令一部分人对八路军的抗击日本产生些许怀疑，这样，对内对外都需要通过一场战役来说明问题的本身。1940年8月20日至12月15日，八路军集中了105个团约20多万人的兵力，在华北地区对日军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全面出击，8月20日至9月10日是战役的第一阶段，主要任务是交通大破袭，破坏敌人的交通线，重点是正太铁路线，以及深入华北各抗日根据地的主要公路。9月20日至10月初是战役的第二阶段，主要任务是攻坚战，继续破击日军交通线，重点攻占交通线两侧和深入根据地内的日军据点。10月6日至12月5日是战役的第三阶段，中心任务是反“扫荡”。历时3个半月的百团大战，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400余人，拔除据点2993个，破坏铁路948里、公路3000余里，缴获各种枪械5600余支（挺）、破坏煤矿5所、桥梁、车站、隧道260余处。目前，党史对于八路军的伤亡数字有异议，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公布的数字显示八路军伤亡为17000余人，而1997年12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一书中则显示八路军伤亡数字为22000余人，（该书102页）两者究竟孰是孰非，还有待于进一步的验证。

百团大战沉重的打击了日本侵略者，以不可辩驳的事实粉碎了所谓的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谎言，赢得了全国各界的认可，特别是振奋了民族抗战的精神、激励了抗战到底的决心。包括国民党政权的第一号人物蒋介石尽管事后曾命令不准百团大战的字眼及其有关报道不准出现报纸上，【注83】（《彭德怀

传》224页)但是,他仍旧不得不给中共和八路军发去贺电。而毛泽东亲口问彭德怀:“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组织一两次?”

【注84】(《彭德怀自述》238页)1940年9月20日,延安各界举行万人集会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大会慰问八路军前方将士,毛泽东、朱德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大会。随着彭德怀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的逐步升级,百团大战的评价也从颠峰滑入谷底,有人甚至说彭德怀是背着毛泽东发动的百团大战,在文革结束后,发现1940年7月22日彭德怀发给延安总部的电文收文原件,这桩随意扣在彭德怀头上的帽子才算摘掉。【注85】(《彭德怀传》214页)林彪在庐山会议上公开指斥彭德怀的百团大战是“大战观点”,以后林彪垮台,但是,林彪给百团大战扣上的政治帽子却没有因为林彪的覆灭而覆灭。百团大战在进行过程中曾有一些技术上的错误,对此彭德怀毫无保留的进行了检讨和检查,当我们今天翻开《彭德怀自述》第238、239页时,就会自然而然的对这位功勋卓越的元帅的坦白的胸襟感到由衷的敬佩。然而,彭德怀一旦落马,有人立刻据此把百团大战枝节上的缺点上升到政治上的认知层面来,不遗余力的进行诽谤和诬陷,直到扣定“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维护蒋介石统治”等莫须有的罪名。而这些罪名直到文革终结才得以最后被揭穿,这些事实的背后是值得发人深省的。

## 5. 华北会议

1945年2、3月间的华北工作座谈会原本是薄一波基于一些党内同事对彭德怀颇有意见的情况下向彭德怀建议召开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座谈会,其目的在于说清楚往昔的某些是非曲折。【注86】(《七十年奋斗与思考》367页)不料,这次座谈会却成为批彭的战场。

会议一开始,彭德怀就以往的工作中的不足特别是在《新华日报》上发表的“自由、平等、博爱”的观点进行自我检讨,对照找差距,会议还是在正常的气氛中进行。哪知道十几天后,会议内容突然发生根本性转折,先是李富春、陈毅等并不在华北工作的领导干部到会,跟着就是在延安整风阶段大权在握的康生也到会发言,康生先把彭德怀的“历史问题”给捅了出来,从历史上清算彭德怀,把彭说成一贯反毛的典型。康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他既然开口说话,那么他的话很快就给华北座谈会定了调子,随后而来的是铺天盖地的对彭德怀的上纲上线的批判,其词调之尖刻、其用意之阴暗,在党史上也是罕见的。有人指责彭德怀说:“你在大革命时期没有入党,直到1928年才带领几个营上井冈山,但这能说你思想觉悟高?对党有感情?”有人则指责彭德怀说:“你是有大志的,原名彭德华,就是志在得中华。”有人还说彭是惯于“闹独立性”,有人甚至把彭的生活简朴说成虚伪。【注87】(《七十年奋斗与思考》369、370页)而批判最为集中的就是百团大战,“这次会议,从根本上否定了百团大战”【注88】

(《杨尚昆回忆录》203页)面对这种调门一浪高过一浪的批斗,连曾经赞同百团大战的薄一波、杨尚昆、安子文都不敢发言。【注89】(《七十年奋斗与

思考》371 页) 而彭德怀本是针对反逆流斗争中有些地方不讲政策、随便杀人、不尊重人权时，引用了法国大革命时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结果却它成为华北工作会议上批判彭的资产阶级世界观的一个内容，其原因根据杨尚昆的回忆是这样的：“因为毛主席看到这篇文章时不高兴，认为没有阶级分析。文章发表时，我已经回到延安，后来听说文章是别人起草的，署名的也不只是彭德怀一个人。”【注 90】（同【注 88】）针对百团大战，这时毛泽东的态度也有改变，虽然“毛主席这时没有说百团大战不对。”但是，毛泽东主张“抗日战争期间的问题要等抗日战争结束了以后才能作结论、才能说清楚，所以，现在这个事情不作结论。”，其结果必然是“表面上是不了了之，实际上是把问题挂起来了，”这也就是“彭德怀同志很不高兴。”的由来。【注 91】（同【注 88】）

华北座谈会原先是从批评、团结、再批评、再团结的角度出发进行的工作总结，但是，会议后来竟然发展到对彭德怀的历史清算，手段采用“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杨尚昆语），历史上的陈芝麻烂谷子都给挖掘出来，成为批彭的佐证，极大的伤害了彭德怀，给彭造成的精神的压力和心理上的反感显而易见，同时也是有失公正、客观。由这件事后来还导致第一次庐山会议上所谓的“华北座谈会操了 40 天娘”典故的出现。事隔多年，杨尚昆曾经如此评价华北座谈会的批彭问题，他说：“会议本来是总结工作，后来发展到集中批彭德怀，不但事先没有给彭打招呼，连我这个北方局书记对会上批彭不断“升温”也缺乏思想准备，没有人同我来商量过。所以，华北工作座谈会上这样批彭是不应该的，会议的结果不好，批评者上纲上线，被批评者有口难辩，会议不了了之，以致长期间是非不清，以讹传讹，使上下之间、同志之间心存块垒。这是深刻的历史教训。”【注 92】（同【注 88】）

※※※※※※※※※※※※※※※※  
※※※※※※※※

※※※※※※※※※※※※※※

纵观毛泽东、彭德怀之间的历史宿怨，其中多半是由于误会、误解造成的，本来是工作上的正常分歧，结果因为历史的原因造成了彼此之间的嫌隙、怨气。而具体看，像误杀袁王、打赣州、华北抗战方针等方面，彭德怀存在着一定的缺点和错误，但是，这些缺点、错误有的是属于认识上，有的是属于执行过程中的，很难就把这些错误归结为政治路线的斗争。不过，以上的情况特别是会理会议其发生的历史背景是毛泽东是少数派，他的正确的东西需要得到支持的关键时刻，而彭德怀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认同毛泽东的观点，这就给后来一些人播散彭德怀一贯反对毛泽东提供了口实，也给毛泽东、彭德怀的关系出现裂痕带来了先决条件。

彭德怀为人刚直不阿、清正廉洁、无私无畏、一秉至公。但是，他在工作中并不是十分注意工作方法，有时则流于生硬，给人不好的印象，例如关家垸战役

中，刘伯承建议暂时撤围、另觅战机，彭德怀冲口而出：“拿不下关家垭，就撤掉你 129 师的番号！”素来宽和大度的刘伯承听来也不免气恼。【注 93】（《彭德怀传》227 页）而由于某些事骨鲠在喉不得不吐又留下了“抗上”的名声，中共七大期间，毛泽东对身边的师哲谈起彭德怀，毛说：“此人目空一切、刚愎自用！”【注 94】（《在历史巨人身边》270 页）而这还只是建国前彭留给毛泽东的印象，建国后尤其是第一次庐山会议前后，毛泽东对彭德怀显然又有了新的“看法”，而这些看法除了我们追述的这些历史原因外，那就是彭对待“三面红旗”、对待“个人崇拜”等一系列新问题上的异议所致，在第一次庐山会议前的上海会议时毛泽东曾说：“我这个人是被许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了我的，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注 95】（《庐山会议实录》73 页）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彭在庐山的悲剧有一个必然性，似所难免。

### 第三节：林彪上山

1959 年夏季在江西庐山召开的庐山会议（7 月 2 日到 8 月 16 日）从纠左最后演变为反右并且导致极左政策在党内外的泛滥。中央文献版《毛泽东传 1949—1976》作者认为这次庐山会议是“毛泽东又一失足的地方”，【注 96】（《毛传 1949—1976》下卷 1010 页）而就在毛泽东出现政治失足的庐山，有人则步入他的崛起阶段，这就是林彪。

为了解决“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所带来的一些实际问题，中共中央决定在 1959 年 7 月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后来历史所指的“第一次庐山会议”。这次会议原定的会议议程有两个，第一，总结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纠左工作；第二，调整修改 1959 年的经济计划指标。从 1956 年开始的在经济工作中出现的急躁冒进的势头本来已经给工作在第一线的周恩来、李先念、薄一波等人所察觉，并且做了必要的调整，名曰“反冒进”，但是，这些工作很快受到毛泽东的否定，毛泽东认为他们的措施给正在蓬勃兴起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潮泼了冷水，斥之为“右倾保守主义错误”，因为对毛泽东追加基本建设投资 20 亿提出异议：“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的周恩来很快在 1958 年的南宁会议上成了重点批判的靶子。毛泽东甚至一度动了以柯庆施取代周恩来的念头。【注 97】（《开国总理周恩来》356、362、363 页）稳健持重的李先念也被毛泽东起了一个“杞国人”的外号，毛泽东一见李先念就说：“杞国人来了。”还问李先念知道不知道杞人忧天的典故。【注 98】（《领袖元帅与战友》292 页）至于薄一波、陈云等也纷纷在“反右倾保守主义”这面大旗下被迫检讨。倒是上海的柯庆施因为“乘风破浪”受到了毛泽东的表扬，毛泽东拿着柯庆施炮制的文章问周恩来：“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周恩来说：“我写不出来。”毛泽东又说：“你不是反冒进吗？”

我是反反冒进的。”毛的这些话连《毛泽东传 1949—1976》的作者都不得不承认“也太过分了”【注 99】（《毛传 1949—1976》上卷 771 页）

由于毛泽东的大力支持，大跃进运动在全国各地可谓风起云涌，“三面红旗”“迎风飘扬。然而，它所带来的实际后果却是不敢恭维，最为显著的就是浮夸风的出现以及泛滥，像河北省徐水县连续制造“卫星”，说什么一棵白菜 500 斤、山药亩产 120 万斤、小麦亩产 12 万斤，广西环江县的“卫星”则为亩产中稻 130434 斤，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而农业部根据这些胡乱拼凑的东西搞出来的 1958 年全年粮食估计总产量高达 10000 亿斤，最后连毛泽东都看不过眼，要求砍掉三分之一。而在浮夸风的背后隐藏的问题越来越多、经济困难越来越重。1959 年 4、5 月间湖北省、河北省、广东省先后就粮食问题向中央告急，号称“九省通衢”的武汉市当时竟然出现粮食供应不上的局面。而相比城市，农村的状况更加令人堪忧，广东省的部分县如南雄等地饿死了 134 人、浮肿现象也大量出现。【注 100】（《庐山会议简史》32 页）对于大跃进造成的人为的灾难，党外民主人士有些不同的声音，海外一些敌对势力也开始就此问题揪住不放，昔日的盟友苏联共产党也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不同的意见，至于党内认识到这种情况的危害性的更是大有人在，其中以彭德怀、张闻天等人为最。

彭德怀一度还是大跃进运动的鼓吹者，他真心的为人民群众的力争上游喝彩，可是，当他走到田间地头、走到基层点面时，他所看到的情况和他每日阅读到的“好消息”居然截然不同。1958 年 12 月的八届六中全会期间，彭在西北组就公开质疑粮食产量，搞的主管农业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抱怨道：“老总呀，你这也怀疑、那也怀疑，怎么办？”【注 101】（《庐山会议简史》44 页）六中全会后，彭德怀回到家乡湖南省进行考察，这一考察不要紧，发现的问题更多更严重，让彭德怀这位大跃进的“促进派”很快转化为“促退派”。他在平江发现造假者竟然把 1957 年高产数字公布为 1958 年的生产数字，而将 1958 年的较低数字公布为 1957 年的生产数字。【注 102】（《彭德怀自述》266 页）也是在平江，一个红军伤残老战士递给彭德怀一个条子，条子上的字让彭德怀心惊的同时深感悲痛：“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钢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请为人民鼓咙胡。”此后，彭德怀还找了和自己观点相同、相近的薄一波、周小舟、陆定一、贾拓夫等人交换过意见，越来越觉得大跃进中的极左不能不纠正了，浮夸必须得到很快的制止。就在彭德怀质疑大跃进的时候，毛泽东于 1959 年 4 月的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八届七中全会上大谈海瑞精神，毛泽东还要彭德怀去看看明史的海瑞传，彭德怀便把毛泽东推荐送来的明史《海瑞传》置于案头，时常阅读理解。不过，按照毛泽东秘书胡乔木对毛泽东提出的学习效法海瑞的理解倒是别有一番趣味，胡乔木说：“主席引起海瑞说法的意图有多项，但是目的是在不出海瑞，因为让海瑞出现，这实际上是做不到的。”【注 103】（《庐山会议实录》36 页）这也就是后来胡乔木主持修改吴晗的文章中特意加上了左派海瑞右派海瑞的由来，事实上毛泽东自己后来也说他不喜欢右派海瑞。但是，彭这时尚没有去做海瑞的念头，因为他连庐山会议去与不去都在未定之间。

彭德怀不愿意去参加庐山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有一个因素，那就是毛泽东对彭的批评。1959年4月2日到5日，毛泽东在批评国家计委工作时突然口风一转，批评彭德怀说：“彭德怀你恨死我了，因为我批评过你。”【注104】（《彭德怀年谱》724页）彭德怀沉默不言，内心自然不快。从4月24日到6月13日，彭奉命率领军事代表团到东欧等八个国家进行友好访问，这次访问归来彭和黄克诚谈了一个上午，两个人对国内很多地方出现的缺粮现象大感意外，几天后，彭便接到中央办公厅的通知让他去庐山开会。彭本不想去，让黄克诚替他去，黄克诚劝他说：“中央通知你去，没通知我，我怎能替你去呢？你是不是受了批评，心里不舒服？”彭德怀说：“也不是不服气，就是感情上觉得别扭。”【注105】（《黄克诚自述》301页）彭德怀又去征求张闻天的意见，张也说：“中央开会，还是去好，能多少听一听也好。”【注106】（《张闻天传》645页）就这样，在黄克诚、张闻天的劝说、建议下，彭德怀上了庐山，这一去竟然成了反党集团的头子，还牵连到黄克诚、张闻天，这都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

彭德怀在去庐山之前已经在公开场合下说了一些“犯忌”的话，比如他说：“匈牙利每人每年平均吃到40斤肉，还出了匈牙利反革命事件，还要请苏联红军镇压，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的工人好、农民好，党的威信高，不然出了匈牙利事件，红军可没有那样多。”【注107】（《庐山会议简史》48页）而他在驰往庐山的途中看到的衣衫褴褛、面有菜色的饥民难过的吃不下饭的情景似乎也在提前验证他似乎一定要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充当20世纪的海瑞了。

庐山会议在初期阶段被称之为“神仙会”是有一定道理的，白天开会、晚上看戏或者跳舞，星期天休息，业余时间还可以游览一下庐山的风景，有的领导干部因此诗兴大发，包括毛泽东在内心情都不错，毛自己还写诗、题字，表现出难得的愉快。虽说他给中央诸人命题十九个，不过，这也还只是泛泛的讨论，而且大家都是抱着“纠左”的态度来的，想来应该分歧不大。7月11日晚，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夜谈，说了不少比较白天会上还要透彻的话，内中反映出毛泽东“纠左”的愿望，而且周小舟说了“上有好者、下必甚焉”的话，毛泽东也不以为杵，李锐还建议由陈云来管经济，毛泽东表态说：“提倡敢想敢干，确引起唯心主义，我这个人也有胡思乱想。”还因之谈及自己的个性：“我这个人四十之前肝火大，总觉得正义、真理都在自己手里，现在还有肝火。”【注108】（《庐山会议实录》63、64页）从李锐记录的这些毛泽东的谈话的只言片语来看，毛不但对纠左问题抱有信心，还做了点自我批评，尽管这种自我批评很少。

也许正是在这个前提的感召下，庐山会议前期有些领导干部的发言是很能切中时弊的。彭德怀找张闻天、周小舟各谈了一次话，其中他和张闻天谈话中多次议论到毛泽东其人，彭德怀住在河东路176号，张闻天住在河东路177号，两个人是邻居，而且共同语言较多，张闻天说：“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样。”彭德怀说：“斯大林晚年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

内部矛盾。”张闻天说：“毛从中国历史上学了不少的好东西，也学了中国统治阶级中不少的权术。”彭德怀说：“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比党内任何同志都熟悉，历代王朝第一个皇帝都是厉害的、英明的。无产阶级领袖也要厉害才行。列宁也是很厉害、英明的。”【注 109】（《彭德怀年谱》740 页）彭、张之间的这些议论如果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可以说得上是十足的“黑话”，不过，彭、张“黑话”不黑，而且还很实事求是，况且彭德怀把毛泽东同列宁相提并论，也算不得对毛泽东的不敬。但是，他们的这些议论后来倒成为他们的“反状”之一。背后的探讨未了，彭德怀在小组讨论会上也是大发议论，彭的发言中有几段很引人注目，一个是毛泽东也有责任，一个是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不正常的，还有一个就是彭德怀讲的，在华北工作座谈会上操娘 40 天，现在三天行不行？【注 110】（《彭德怀年谱》738、739、740 页）彭德怀的这三点都是围绕主题之后的延伸，特别是重提华北会议的旧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翻旧账，特别是用了“操娘”这个词所引发的埋怨更大。

有些人对于彭的这些发言不很满意，而彭德怀也认为目前的讨论左的问题及其后果也是言不及义、文过饰非，总之没有说到要害处或者说的不透，这就是彭要写信上书的思想由来。彭德怀在上书前还数了一数中央的几位主要领导同志的难处，他说：“刘少奇当了国家主席后不好说话了，周恩来、陈云犯了错误不好说话，朱德看问题不够清楚不便讲话，林彪长期不管事，情况不熟，邓小平也不便讲话。”他自认为在政治局中他还可以和毛泽东讲上一些话，而且即便是说错了，不当国防部长，还有黄克诚在。【注 111】（《庐山会议简史》90 页）促使彭德怀上书言事的还有两个偶然因素，一个就是 7 月 12 日上午（此处按《彭德怀传》说法，《彭德怀自述》说是本定 7 月 13 日晨）彭德怀准备当面和毛泽东谈谈纠左的问题时，毛处警卫人员告诉彭，说毛泽东已经休息了，彭不便打扰于是告辞。所以，至今都有党史研究者认为假如当初毛、彭能够见面晤谈，庐山会议批彭也许就不会出现，当然，历史是不容假设的。另一个是周小舟的赞同，周小舟说：“那你就写信也好，· · · · · · 写给主席看看，也就很好了。”【注 112】（《彭德怀传》594 页）对于彭德怀要上书给毛泽东，当时在彭身边工作的机要参谋都表示过顾虑，王承光就劝阻过彭，他说：“写信在文字上很难说清楚。”见彭不采纳，王承光就托故说：“是否要王焰、郑文翰来一个人，坐中央办公厅送文件的飞机，明天就可以到，我们一起研究着写。”彭德怀还是不答应，并且很快口述了上书的内容要王承光写下来。【注 113】（《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241—243 页）彭德怀的上书大约 3000 多字，全信首先肯定大跃进的成绩是“伟大的”，其次谈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提请毛泽东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浮夸风的普遍滋长，一个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信的结尾沿用毛泽东的提法，总结大跃进还是前途光明。彭德怀的信通篇下来除了实事求是的反映问题并无特殊的指责，更谈不上攻击二字。彭在信递交上去后还同王承光预料了可能出现的后果，彭说：“主席可能找我去谈一谈，也许会找常委同志研究一下，主席也可能要印发大会，如果印发会伤一些人，不过印发也好，可以刺激各地作点检讨。”【注 114】（《彭德怀年谱》741、742 页）可见，彭对毛泽东可能把信印发大会还是有点预见的，只不过，他没想到由此做检讨的不是各地领导，而是他自己，更没有料到这件事成为他晚年厄运的发端。

彭德怀去信时间是 1959 年 7 月 14 日，7 月 16 日，毛泽东就下达指示“印发各同志参考”，并冠以题目《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同一天，毛泽东找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开会，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常委会决定会议延长一周，此外通知林彪、黄克诚、彭真、薄一波、安子文等人上山。【注 115】（《庐山会议简史》105 页），林彪的上山成为庐山会议批彭运动升级的序幕的拉开。

林彪是被看作“救兵”给搬上山的，其实黄克诚的上山也是作为“救兵”出现的，谭震林曾对黄克诚说：“你要知道，我们找你上山来，是搬救兵，想你支持我们的。”黄克诚反驳道：“那你就想错了，我不是你的救兵，是反兵。”【注 116】（《黄克诚自述》302 页）到底是“救兵”还是“反兵”，后来，黄克诚自己有过一个清醒的认识：“毛主席临时通知我上庐山参加会议，是为‘彭德怀反党集团’凑班子的。既叫反党集团，总不能是一个人，你们想想，彭德怀搞反党集团，要是没有黄克诚参加，谁会相信？”【注 117】（《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255 页）毛泽东是否如黄克诚推测所说呢？不得而知，不过，黄克诚一上山就坐到了彭德怀的一边也是事实。但黄克诚并不同意彭德怀的写信方式，而且对信的内容也有异议。黄克诚看罢彭的上书内容后说：“这封信提的意见我赞成，但信的写法不对，语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样干什么？”彭说：“我就是提得引起重视。”黄克诚说：“你总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应该互相了解较深，这些话何不与主席当面交谈，何必写信？”【注 118】（同【注 116】）黄克诚还告诉彭德怀说，彭的这封信，漏洞很多，而且还伤了人。【注 119】（《彭德怀年谱》742 页）黄克诚说的都是实话，彭德怀信中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个说法很让毛泽东等一些领导人恼火，这点彭也承认：“如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就可以不写，不过讲的重一点，刺一下主席也好。”【注 120】（《毛传 1949—1976》979 页）不过，彭德怀还是接受劝告进而要求中央办公厅收回那封信，不要下发，7 月 21 日，彭德怀再次建议把信收回，但是，已经晚了。

针对彭德怀的来信，党内展开激烈讨论，讨论中张闻天、周小舟、黄克诚、李锐等人发言支持彭的意见，党内其他领导干部中支持彭的意见的也不少，像一机部部长赵尔陆、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茄、国家计委副主任贾拓夫等人都认为彭的信主体精神还是好的。特别是张闻天的长篇发言给予彭德怀的意见书很大的支持，引起一些人的不满和不快。7 月 22 日，大跃进运动的著名“促进派”柯庆施、李井泉表示对“纠左”不满，柯庆施对毛泽东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柯庆施还单方面的认定彭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泽东的。【注 121】（《毛传 1949—1976》下卷 983 页）柯庆施等人的汇报给本来已经有些“过敏”形势再添一把柴火，毛泽东其实在 7 月 17 日晚曾经找周小舟、胡乔木、李锐等人谈话时指出，当年华北军分会发小册子不同意中央在洛川会议上战略方针，这个小册子被王明利用。毛泽东提及的这番旧事别有一番深意，在李锐看来：“让我们知道，彭这个人同他（毛泽东）在历史上不一路，启发我们这些不知世事的人不要倒在彭德怀

一边去。”【注 122】（《庐山会议实录》72、73 页）与此同时，还有一个现象令毛泽东有似曾相似的感觉，那就是 7 月 21 日张闻天的支持彭德怀的讲话，因为 7 月 20 日庐山上已经有了“小广播”说毛泽东对彭的意见书不满，而就在这种情况下，张闻天还是大谈特谈，特别是张闻天的如下讲话至今读来还是振聋发聩，张闻天说：“主席常说，要敢于提不同意见，要舍得一身剐，不怕杀头等等。这是对的，但是，光要求不怕杀头还不行，· · · · · · 另一面是要领导上造成一种空气、环境，使得下面敢于发表不同意见，形成生动活泼、能够自由交换意见的局面。”【注 123】（《张闻天传》671 页）历史上，张闻天和彭德怀的关系就曾引起毛泽东的误解，这一次显然又一次理所当然再次给误解了。所以，在接到柯庆施的汇报的第二天，毛泽东终于出来表态了。

7 月 23 日，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摘录如下：

毛泽东说：“你们讲了那么多，允许我讲个把钟头，可不可以？吃了三次安眠药，睡不着。我看了同志们的发言记录及许多文件，还跟一部份同志谈了话，感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跳之势。吴稚晖形容孙科是一触即跳，现在有些同志不让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因之，有一部分同志感到有压力，两种话都要听。我跟这些同志谈过，劝过他们，不管坏话，好话，两种话都要听嘛。嘴巴的任务，一是吃饭，二是讲话。既有讲话之第二种任务，他就要讲。还有人长了耳朵，是为了听声音的，就得听人家讲话。话有三种：一种是正确的；二是基本正确或不甚正确的；三是基本不正确或不正确的。两头是对立的，正确与不正确是对立的。好坏都要听。

现在党内党外都在刮风。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搞得一塌糊涂，要垮台了。党内这一部分意见我还没有看完，集中表现在江西党校的反应，各地都有。邵大个（江西省长邵式平）你不必着急，你们搞出的这个材料，实在好，今天就印出来。所有右派言论都印出来了，龙云、陈铭枢、罗隆基、章伯钧为代表。江西党校是党内的代表，这些人不是右派，可以变就是了，是动摇分子。他们看得不完全、有火气，做点工作可以转变过来。有些人历史上有问题，挨过批评，例如广东军区的材料，有那么一批人，对形势也认为一塌糊涂。这些话都是会外讲的，我们这一回是会内会外结合，可惜庐山地方太小，不能把他们都请来。像江西党校的人、罗隆基、陈铭枢，都请来，房子太小嘛！

不论什么话都让讲，无非是讲得一塌糊涂，这很好，越讲得一塌糊涂越好、越要听。硬着头皮顶住，反右时发明了这个名词，我同某些同志讲过，要顶住，顶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有的同志说“持久战”，我很赞成，这种同志占多数。在座诸公，你们都有耳朵，听嘛！难听是难听，要欢迎，你这么一想就不难听了。为什么要让人家讲呢？其

原因在神州不会陆沉，天不会塌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些好事，腰杆子硬。那些听不得坏话的人，他那个腰杆子有些不硬。你如果腰杆子真正硬，坏话你为什么听不得？我们多数派同志们腰杆子要硬起来。为什么不硬？无非是一个时期猪肉少了、头发卡子少了、又没有肥皂，叫做比例有所失调，工业、农业、商业交通都紧张，搞得人心也紧张。我看没有什么可紧张的。我也紧张，说不紧张是假的，上半夜你紧张紧张，下半夜安眠药一吃，就不紧张了。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我看是暂时的，就是两三个月、春节前后，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现在群众和我们结合得很好。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一点，但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主要是公社运动，我到遂平详细地谈了两个钟头。碴峪山公社党委书记告诉我：七、八、九三个月，平均每天有三千人参观，十天三万人，三个月有三十万人。听说徐水、七里营也有这么多人去参观。除了西藏，都有人来看了，到那里去取经，其中多是县、社、队干部；也有省、地干部。他们的想法是：河南人、河北人创造了真理，有了罗斯福说的“免于贫困的自由”；就是太穷了，想早点搞共产主义。现在听说这些地方搞了共产主义，那还不去看看。对这种热情如何看法？总不能说全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吧，我看不能那样说。有一点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确是狂热，无非是想多一点、快一点，好省那时谈不到。总而言之是多快。这种分析是否恰当？三个地方三个月当中，有三个三十万人朝山进香，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但事实上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吃肉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一口吃成一个胖子，你吃三年肉也不一定胖；比如林彪同志，我看他十年还不会胖，总司令和我的胖，也非一朝一夕之功。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至少百分之三十是积极分子，百分之三十是消极分子（即地、富、反、坏、官僚、中农和部分贫农），百分之四十随大流。百分之三十是多少人？是一亿几千万人，他们要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大规模耕作、非常积极。他们要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随大流的，这也可以、那也可以，不愿意的只百分之三十。总之，百分之三十加百分之四十为百分之七十，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内有狂热性，他们要搞。

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地瓜、稀饭，面无表情，因为刮了“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提款”。对刮“共产风”也要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些什么人？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干部，刮向大队和小队，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我们说服了这些干部，坚决纠正，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今年三、四月间，就把风压了下去，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算清楚了；队跟群众的账有些地方也算清楚了，未算清的再继续算。这一个月的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们懂得了平均主义不行。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少

数人还留恋“共产”，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了。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也没有这个规矩，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剥夺人家的劳动。这类事，自古以来是“一个指头”。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按，此处记忆有误。劫生辰纲是晁盖等人干的，此时宋江还没有上梁山。）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取之无碍，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是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挤垮，赎买。怎么能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只有一个多月就息下这股风，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今年三、四月或加上五月，有几亿农民、几百万干部受了教育，讲清了、想通了。主要是讲干部，不懂得这个财并非不义之财，而是义财，分不清这个界限。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没有搞通几个月就说通了，不办了。十分搞通的未必有，九分通、七八分通。教科书还没有读，要叫他们读，公社一级干部不懂一点政治经济学是不行的。不识字的可以给他们讲课。梁武帝有个宰相陈庆之，一字不识，皇帝强迫他作诗，他口念，叫别人写；“微令值多幸，得逢时运昌。朽老精力尽，徒步还南岗。辞荣比盛世，何愧张子房。”他说你们这些读书人，还不如老夫的用耳学。当然，不要误会，我不是反对扫除文盲，柯老（柯庆施）说，全民大学，我也赞成，不过十五年不行，恐怕得延长一点，几亿人口嘛。南北朝时有个姓曹的将军（指梁朝的曹景宗），打了仗回来作诗：“出师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过路人，何如霍去病？”还有北朝的将军斛律金，这也是个一字不识的人，他有《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字不识的人可以作宰相。为什么我们公社的干部、农民不可以听政治经济学？我看大家可以学。不识字讲讲就懂了，现在不是农民学哲学么，工人学哲学么；他们比我们，比知识分子容易懂。我们这次议事日程就有读书这一项。我也是个没学问的人，这个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我就没有看；略微看一点，才有发言权，也是怕大家来考我，我答不出怎么办？要挤出时间读书，全党来个学习运动。

他们（指省以下各级地方干部）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讨。北京来的人哇啦哇啦，他们当然听不进去：我们作过多次检讨，难道就没有听到？我就劝这些同志，人家有嘴巴嘛，要人家讲嘛。要听听人家的意见。我看这次会议有些问题不能解决，有些人不会放弃自己的观点，无非拖着嘛，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无非两个可能，一个可能放弃，一个可能不放弃，两者都可以，何必怕呢？我找大区长开了一个会，我就是这么讲的，对不对？没有扯谎吧。听不得坏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无非是讲的一

踢糊涂，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时代、青年时代，也是听到坏话就一股火气。我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现在学会了听，硬着头皮顶住。听他一两个星期，劝同志们要听，你们赞成不赞成，是你们的事，不赞成，无非我有错误。有错误嘛，还是真有错误、假有错误。真有错误，我作自我批评，再来一次；假有错误，那是你们的事。你们弄假成真，本来不错，你们说嘛。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同志是我讲的四种人里面的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所谓四种人是：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是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对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那种摇动，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也不讲小资产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于是，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来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但是也相当深，就是不讲冒进了。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是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一个高级社（现在叫生产队）一条错误，七十几万个生产队，七十几万条错误；要登报，一年登到头也登不完。这样结果如何？国家必垮台。就是帝国主义不来，人民也要起来革命，把我们这些人统统打倒。办一张专讲坏话的报纸，不要说一年，一个星期也会灭亡的，大家无心工作了。马克思讲，莫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停止工作，人类也要灭亡的。只要你登七十万条，专登坏

事，那还不灭亡呵！不要等美国、蒋介石来，我们国家就灭亡了，这个国家应该灭亡，因为那就不是无产阶级党了，而是资产阶级党了，章伯钧的设计院了。当然在座的没有人这样主张，我这是夸大其词。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就另外组织解放军，我看解放军是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问题要注意，讲话的内容，我看基本是正确的，部分不妥。列宁讲，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要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要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现在据我看，他们还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也不是左派。我所讲的左派，是不加引号的左派，是真正的左派，马克思主义者。我所讲的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就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我现在还没有想清楚。他们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但他们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我那时讲，你们自己把自己抛到离右派三十公里，接近三十公里了，因为右派很欢迎这种论调，右派一定欢迎，不欢迎才怪，距离右派不过还有三十公里。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我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但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钢铁你要搞六百万吨，我要搞一千零七十万吨。北戴河会议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绝孙。补贴四十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讲了好久？不到两个钟头嘛。散会！【注 124】（《庐山会议简史》140—151 页，有删节）

毛泽东长篇累牍的发言不啻给会议投下一磅重量炸弹，不论是所谓的左派还是所谓的右派，不论是赞成彭德怀意见书的还是不赞成彭德怀意见书的都异常震惊，毛泽东对彭德怀的意见书的愤慨态度大大出乎与会者的意料之外。黄克诚说：“主席的讲话对我们是当头一棒，大家都十分震惊。”【注 125】（《黄克诚自述》305 页）而除了黄克诚的“震惊”，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李锐等人更多的表现为“愤愤不平”，张闻天曾经激愤的对秘书说：“这样以后谁还敢说话？”【注 126】（《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316 页）彭德怀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我好心好意写了个信，就引起这样大的问题，这样一来，以后谁还敢讲话！发展下去还不就形成了斯大林后期的局面。”【注 127】（《彭德怀年谱》745 页）周小舟、李锐则情绪激动，说了很多“出格”的话，特别是在 7 月 23 日夜晚的谈话涉及了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即“斯大林晚年”，以致于后来因为这件事搞的斗争进一步升级。从毛泽东的这封信里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给彭德怀的定性是很重的，围绕着毛泽东的这一定性，稍后几天的会议成了围剿彭德怀以及与彭德怀有类似观点的领导干部的战场，李井泉、柯庆施、贺龙、肖华、苏振华等人纷纷指责彭德怀，批彭成为会议的主流。

林彪这时又是什么态度呢？林彪上山以后，动作不大，他大概一直在观察。原空军文艺处副处长官伟勋在他的回忆录中披露过这么一个情节：“林彪曾私下里说彭德怀的万言书是正确的，就是急了点。”【注 128】（《我所知到的叶群》215 页）关于这一点，作者没有交待林彪说话的具体时间、地点，所以，也就很难说林彪所讲的是不是一定在庐山的私下议论，如果按照一些当事人的回忆看，庐山会议在毛泽东发言后的急转直下的形势很为紧张，林彪而且又是作为“救兵”上山，他素来奉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信条，怎么会有理由在私下里大发如此议论呢？毛泽东对彭德怀顾忌之深，（黄克诚语，见《黄克诚自述》316 页）党内一些高级领导也是心知肚明的，更何况林彪一向以善于揣摩毛泽东著称，毛泽东和彭德怀以开玩笑的口吻说过：“咱们定个协议，我死以后，你别造反，行不行？”【注 129】（《黄克诚自述》316 页）对于这些事情，林彪应该有所耳闻，他时下要面对的是如何在实际行动中完成好批彭的任务，又何来这种“感人”的背后议论呢？

下面我们还是来一起看看林彪的公开表态吧。在林彪发表公开发言之前，也就是 7 月 26 日，又有两个指示落地，一个是毛泽东批发的《李云仲同志的意见书》，并加写冠以标题为《对于一封信的评论》的 2000 多字的批语，李云仲时任东北协作区办公厅综合组组长，李不过是以普通党员的身份向领导层反映一

些在他看来是比较严重的情况，却不意成为遭受打击的陪绑。毛泽东在批语中强调了两点，一点是明确表态要反右，一点是要求中间派站稳立场。比较7月23日的讲话，毛泽东提高了斗争的调门。与此同时会议传达毛泽东的又一个指示，那就是：“事是人做的，不仅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线，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政治斗争的烈火已经开始熊熊燃烧了。

大抵彭德怀对于以后的态势可能有所预感，他同安子文谈话中说：“我这次闯了滔天大祸，杀头我也准备了。”【注130】（《彭德怀年谱》743页）可是，彭可能没有想到世间还有比杀头更为残忍、酷烈的就是昔日战友、同事对他的批斗和猜疑。在毛泽东26日批示对事也对人之前，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已经开始质问彭德怀了，他连续提出以下几个问题：“为什么写这封信，是否不服气？”、“是否出国访问受了影响？”、“你对林彪当中央副主席是否有不满呢？”，当彭德怀说：“从未想过这种事”，曾希圣立刻拂袖而去：“这样我们就没有法子谈了。”【注131】（《彭德怀年谱》744页）曾希圣在大跃进运动中也一度是“红人”，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李世农因为如实地对曾希圣搞的浮夸风提了意见就给打成“右派”，牵连到妻子也一并下放劳动。南京市的一个人给中央写信反映安徽省饿死人的事，安徽省委还要南京市委查出这位写信人的成分、写信动机和出身。难怪刘顺元愤懑的对战友——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负责人之一的钱瑛说：“带头刮浮夸风、弄的安徽饿死许多人的曾希圣却一直官运亨通，身兼安徽、山东两个省委的第一书记，一个人当两个省的第一书记，是史无前例的。”【注132】（《刘顺元传》340、341、342页）曾希圣的问话涉及了林彪，而在彭德怀看来，曾的问话令他想起当年苏区时代李德这个洋顾问也曾经狭隘追问彭是不是因为丢了中革军委副主席所以才对他李德不满的。【注133】（《彭德怀年谱》744、745页）实际上，彭德怀早就有辞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意思，他在来庐山之前就和毛泽东谈过，不料却因此碰了一鼻子灰，毛泽东说：“给你个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还不够吗？”【注134】（《彭德怀传》664页）所以，曾希圣对彭德怀的质问毫无根据，如此裁度彭的心胸也很为无聊。

但是，曾希圣的猜测同林彪的定性发言相比简直不值一提。7月30日早晨，毛泽东找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等四人去他住处谈话，毛泽东给黄克诚戴了几顶帽子，一个是说他是彭德怀的政治参谋长，一个是说他属于湖南集团的首要人物，一个是说他乃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还说黄克诚同彭德怀是“父子关系”，黄克诚对此进行一一反驳，黄克诚指出无论是当总参谋长还是从湖南进京都是毛泽东的意思，和彭德怀无涉，何况同湖南的负责同志多见几次

面、多谈几次话、多关心一点湖南的工作，何谈湖南集团和军事俱乐部呢？黄克诚的抗辩没有让毛泽东发火，期间的气氛还是不错的，毛泽东要黄克诚、周小舟他们“觉今是而昨非”还要周小舟“不远而复”，实质上都是要他们几个和彭德怀划清界线，但是，黄等人的表现并不令毛泽东满意。【注 135】

（《黄克诚自述》308 页）在毛泽东和黄克诚等人谈话时，叶剑英、聂荣臻也找了彭德怀谈话，还提了三个问题，一是为什么写信？二是这封信是什么性质？三是为什么总是要在紧急关头搞一下？这次谈的大约都很激动，聂荣臻后来回忆说叶剑英在问及彭德怀“毛泽东同志健在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时还落了眼泪。【注 136】（《庐山会议实录》170 页）彭德怀自己也说“大约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热泪盈眶而别。”可见，落泪的不止是叶剑英。【注 137】（《彭德怀传》622 页）这些枝节问题一过，7 月 31 日的常委会就开始正式摊牌了，而林彪也开始正式的披挂上阵了。

在 1959 年 7 月 31 日和 8 月 1 日，于毛泽东的住处连续召开两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批判彭德怀。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贺龙、彭德怀，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列席旁听，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毛泽东首先开讲，主要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待彭德怀目前的问题，也就是说彭之所以走到今天，从历史上就能看出痕迹，主要谈了抗战时期、红军时期和彭德怀的几次重大分歧，算了历史旧账。彭德怀偶尔回答几句，林彪则有意识的插话，其配合之紧、跟随之快、反映之敏在会议上是罕见的。而且，林彪的讲话为了达到拱倒彭德怀的目的甚至不惜转嫁责任给他人。众所周知，林彪在战争年代喜欢把战功、战绩时时记载下来，这对军人来说无可厚非，可是就在这次庐山会议、就在这次常委会上，林彪把自己最为荣耀的战绩之一的平型关大捷说成“平型关吃了亏，头脑发热，是弼时作的决定。”

【注 138】（《庐山会议实录》182 页）林彪还把百团大战说成“大战观念”。7 月 31 日这天的常委会毛泽东把他和彭德怀的历史关系定位为“三七开”，林彪发言不多，而且都是插话，到了 8 月 1 日，事态进一步明朗，林彪的“火力”也就彻底升级。8 月 1 日常委会第一个发言的是朱德，朱德在小组会上对彭德怀多有回护，还说：“彭总发言的态度是好的”，自然引起有的人的不满，这次常委会上，朱德仍旧照本宣科，毛泽东将腿抬起，用手搔了几下鞋面说：“隔靴搔痒”，朱德无法再讲。【注 139】（《庐山会议实录》185 页）林彪接着朱德发言，一上来就给彭德怀扣了几顶厉害的帽子，说彭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历史就是喜欢捉弄人，林彪诬陷彭德怀的这几项罪名十几年后恰恰是林彪自己的真实写照。林彪的讲话可谓“击中要害”，以后会议中给彭德怀上纲的罪名除了毛泽东点名指出的以外，其他的内容大都由此而来。林彪说：“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大英雄。”林讲这些时声色俱厉，气势汹汹。

林彪接着说：“不少人说你讲假话、有野心。长征时讲过，入党前，救中国舍我其谁，入党后情形不同，应该讲出来。在党内也有藐视一切的思想，好犯上。有个东西扛起，有思想、愿望、目的，总觉得自己行，有个路线、纲领、世界观，自视很高。你看风使舵，没有张国焘蠢，看到不行采取主动转弯，六中全会时，你赶快撇开了王明，王明船快沉了，赶快上岸，拿石头打船。· · · · · ·你混同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个人野心、政治方向、灵魂深处，没有脱胎换骨、危险在此。是个不驯服的党员，入党后自立为王，对同级、上级不尊重，对下看不起。· · · · · ·好名、揽权、要指挥全局，大场面掌握在手，换个名词，就是野心，派头气势有的。形式上有很多迷人的东西，说你张飞，实际上并不是张飞，· · · · · ·利用坦率形式迷惑人，实际是老奸巨猾的本质。说信不准备发表，而是准备发表的，国内外都在刮风，以为好时机到了，控告书、告党状，发表以争取群众，事实证明是右倾，动机是从个人野心出发，捞一笔。”【注 140】（《庐山会议实录》200、201、202 页）

林彪的这篇讲话篇幅不是很长，但是，却提了一个别人没有提到的东西，那就是指控彭具有所谓的野心，要搞什么自立为王，这里林彪所说的彭德怀的“对同级、上级不尊重、对下看不起”和历史事实有着很大的出入，上将周桓曾经回忆说在发动百团大战前，彭德怀对周桓亲口交待要认真照顾好朱德的安全和起居，并说：“总司令年纪大了，有紧急情况要把他轻轻叫醒，如有急电，先把蜡烛点好。”周桓每忆及此总是感动莫名。【注 141】（《彭德怀传》210 页）彭对下级时有发火，却没有哪一次因为私利和涉及到下级对自己的态度，从历史上看，彭德怀的所谓的发脾气几乎都是和工作、和集体利益有关，而没有任何一次关系到他个人的成败利钝。毛泽东曾经写诗称赞彭“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而彭则表示可以改作“唯我英勇红军”，彭在党内、军内很少宣传自己，在西安看到有自己的挂像就发火，对属于封建的那套吹吹拍拍、个人崇拜向来非常抵触，1953 年 7 月 9 日，总政和中央办公厅联名给选送文工团员到中央警卫团的文工团，提出条件中有“容貌端正”一项，彭德怀立予以抵制，并说这不是中央写的，还要查明。事后，搞清楚这件事是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办理的，彭德怀毫不留情的提出批评，彭说：“不应以中央的名义向下调文工团员，特别是第三个条件，使人觉得像是选妃似的。”【注 142】（《彭德怀年谱》561、562 页）至于林彪所说彭德怀在党内藐视一切、有个纲领、路线云云更是无中生有、信口胡说。彭自己说过，他对毛泽东的认识有一个大哥—先生—领袖的过程，而一旦认定毛泽东是为领袖，就决心一跟到底。事实上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没有哪一次不是彭德怀主动勇挑重担，从富田事件到西北转战再到抗美援朝，林彪的发言的核心是诋毁彭的名誉，在批臭彭德怀的井里扔下一块属于他自己的石头，林彪的惯于取巧也在于此。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人民剧院开幕，会前彭德怀说：“我已经很臭了，这次还要把我搞臭，这样也好，这样才能在全军消除坏的影响。”

【注 143】（《彭德怀年谱》746 页）8月4日晚，由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一个通气会，向后面上山的人讲解一下在庐山发生的这起事件的原委，林彪在这天晚上讲话最多，4个多小时的会议，林彪讲话占了一大半，人们几乎很难看出这位中共中央副主席身上有着什么疑难杂症。林彪在讲话中凡遇彭德怀处均不提同志或者姓名，而是代之以他，其人在政治立场上的领会能力之高确属少见。

（其时，其他中央常委还呼之彭德怀同志，唯独林彪不名）林彪在这次通气会上的讲话比之常委会上的讲话更进一步，也更为“准确”、“生动”、“高度”的给彭德怀及其意见书定性上纲，他的讲话中出现的“大马鞍形”的生动比喻还被毛泽东在稍后的讲话中引用作为结尾。林彪指斥彭德怀的重点有三，第一，林彪把彭的意见书流露的思想看作将会产生大马鞍形的先兆；第二，林彪首次提出要揭发彭德怀的思想意识方面的东西，质疑彭德怀的个人品质，从工作上的分歧进发到对人身的攻击；第三，林彪把彭德怀和赫鲁晓夫联系到了一起，说彭是要提倡赫鲁晓夫精神的。林彪所提的三点中第二条至为突出，一般说来，政治上的批判中扣一些大帽子、打一些大棍子都在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而因为政治上的分歧进而攻击对手的私德、品行并对这些进行不合理的歪曲，即便是在古代的中国，也被视作“下三路”。林彪在讲话中声称彭德怀利用生活朴素来迷惑人，历史上，陈琳撰文讥讽曹操、骆宾王草檄文谩骂武曩，也都是涉及个人品行，不过，曹操、武曩在人格上也确有亏欠，虽说文字经过政治的拔高，可也不算过分，而林彪对彭德怀的指责纯属颠倒黑白、指鹿为马，古今中外、莫此为甚。彭德怀的生活朴素、艰苦自律在党内有口皆碑，就在朱德小组会上点出彭的这些优点时，连那些大力批彭的人也不得不噤声，而林彪则从这里打开缺口，直指彭的优点实则为“缺点”、“阴谋”，林的这个表现已经和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奸佞无异。关于这点我们需要回顾一下历史。薄一波曾经半开玩笑的对彭德怀说：“听说彭总生活一贯简朴，生活上对大家要求很严，谁要是请你吃点好的，你都要骂娘的。”彭德怀说：“谁讲我不爱吃好东西，讲这种话的人，大概是想把好吃的东西留给他自己吧。”然后，彭正色说道：“我们的生活比内战时期好多了，但是，一些不好的苗头也出现了，有些同志不愿再过艰苦日子，开始贪图享受了，这个很危险，如果不注意就会腐化堕落。”【注 144】（《领袖元帅与战友》174、175 页）彭德怀、薄一波的对话发生在抗战中，可见彭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忧虑中共干部队伍保持朴素、纯洁的工作作风，这种心忧天下的难得品德在林彪的这次发言中居然给篡改成“伪君子”的重要表现，如此异想天开的“发明”的确令在场的与会者大吃一惊。不过，彭德怀对林彪为他澄清了会理会议的往事还是深表高兴，他对身边

工作人员说：“今天会议上林彪算是澄清了 20 多年的历史误会。”【注 145】（《彭德怀年谱》746 页）

林彪给彭德怀的品性上的定性在 8 月 4 日通气会之后的揭批会上获得了一定的市场，一些将领朝着林彪的定性进一步质问彭德怀，例如苏振华说：“彭德怀同志长期把自己装成一个君子，在军队和部分群众中是有一定影响的。如果不把他的伪君子的画皮剥掉，是能迷惑一部分人的。”罗瑞卿说：“（彭德怀）所谓艰苦朴素，实际上很多都是装的，他是党性有亏，私心很重，不是正直无私。”李井泉说：“我感觉有许多地方不老实，不像是张飞。”陶铸说：“从他外表看，似乎艰苦朴素，道貌岸然，但是，把他的外表揭开来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注 146】（《庐山会议实录》234、235、236、239 页）8 月 7 日开始追逼彭黄“军事俱乐部”一事，斗争更加白热化、罗织的罪名也就更加离奇。彭德怀被认定是“军事俱乐部”的主帅，黄克诚为“副帅”，依据之一就是彭德怀率团出访的过程，总政副主任肖华提出了一个疑问，他说：“我还怀疑他（彭德怀）第二次与赫鲁晓夫的谈话，他们在一个桌子上，我们在另一个桌子上，没有大使馆的翻译在场。”此前肖华当众提出彭德怀在阿尔巴尼亚的一段讲话，肖华说：“彭德怀同志在阿讲了一段话，说我们的党，在革命时期最大的危险是右倾，当夺取了政权以后，最大的危险是官僚主义，是左倾。”【注 147】（《庐山会议实录》246 页）于是，一些人又把斗争的风向指到“里通外国”的问题上来，有人因此追问彭德怀到底和赫鲁晓夫谈了一些什么，事实上只要稍稍动一动脑筋就会清楚，彭德怀不会外语，而且和赫鲁晓夫一共见面时间不过几分钟，他们之间还能发生什么呢？但是，在当时的背景下，彭的自辩根本没人理会，“里通外国”成为彭的一项“莫须有”的罪名，后来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还对此发了一番议论，刘说：“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刘说到这里，毛泽东插话说：“只要不是里通外国。”【注 148】（《彭德怀年谱》771 页）显然，刘少奇、毛泽东都把里通外国看作是彭德怀既有的“行径”。这时，为了彻底批臭彭德怀，还把彭德怀和高岗又扯到了一处，说什么“高饶联盟其实是彭高联盟”，彭德怀早在高饶事件后就对此问题做过检查，彭和高岗谈不上什么过从甚密，高岗邀请彭德怀去参加舞会，彭都予以谢绝。当高岗提出搞“轮流坐庄”时，彭德怀明确表示反对，彭德怀提出中央日常工作还是要刘少奇出来主持，刘少奇当时还推辞一番，彭德怀说：“这又不是写文章有稿费，还有什么推辞的呢？”高岗后来问彭德怀为什么不同意轮流坐庄，彭说这就是我的认识，气的高岗甩袖而去。

【注 149】（《彭德怀年谱》556 页、565 页）从这组情况看，所谓的彭高联盟乃属子虚乌有。

在多人的围攻下特别是在康生、李井泉的反复追逼下，彭德怀有些受不住了，这些乱泼的污水让彭德怀大声说道：“我说我是野心家，想把毛泽东赶下台，你们愿意听，我可不能那么说。”【注 150】（《彭德怀年谱》747 页）这时有人动员黄克诚“反戈一击”，黄克诚说：“落井下石得有石头，可是我一块石头也没有，我决不做诬陷别人、解脱自己的事。”【注 151】（《黄克诚自述》312 页）陶铸给黄克诚写信奉劝黄克诚要帮助彭德怀挖掘思想、切实认识错误，陶铸认为这算不得“落井下石”，陶铸还用贞节烈女的例子教育黄克诚，要黄“从一而终”，决不可“移情别恋”。【注 152】（《陶铸传》275、276 页）黄克诚后来不无感慨的说：“我平生受过无数次斗争，感到最严重、使我难以支持的，还是庐山会议这一次，我一向有失眠症，经常吃安眠药，但最多不过两粒，这时每晚吃到六粒，还是不能入睡。”【注 153】（同【注 151】）可是，等到“斯大林晚年”的话题给揭发出来后，黄克诚就是多吃几粒安眠药也无法安眠了。

7 月 23 日晚因为对毛泽东白天的讲话不满，周小舟、李锐等人说了一些激愤的话，例如斯大林晚年等，后来他们又去找黄克诚谈谈，在黄克诚的住处大家又都说了一些“出格”的话，彭德怀刚巧也去了黄克诚处，等谈完出来，周小舟遇见罗瑞卿。8 月 10 日，小组会上就有人追问 7 月 23 日晚，周小舟、李锐、周惠到底到黄克诚住处谈了些什么，这时罗瑞卿带李锐进入会场，黄克诚误以为李锐已经说了 7 月 23 日晚关于斯大林晚年的议论，此前黄克诚曾经因为周小舟碰见罗瑞卿就动员周去向毛泽东说清楚那晚上的事，周小舟认为现在去说反而不好，于是没说。此时，黄克诚自己把这件事说了出来，随即引起轩然大波，会场一阵骚动，后来周小舟主动承担了责任，说是他说的。【注 154】（《黄克诚自述》313、314 页）由于这么一个敏感的话题最终让彭黄等人有口莫辩，坐实了所谓的“军事俱乐部”的罪名。

8 月 11 日，八中全会举行大会，毛泽东再度发言，在这次发言中，彭的性质更加严重，不但和杜勒斯有了“共鸣”，还同高饶穿了“连裆裤”，毛泽东除开批判彭德怀，把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也一并囊括在内，一时嘻笑怒骂、旁征博引。毛泽东讲话结束，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在“帮助教育”下被迫出面检讨，不但检讨还要认帐，不但认帐还要签字，黄克诚说：“这字好难签，但我们已经是不得不签了。”【注 155】（《黄克诚自述》316 页）8 月 16 日，延宕了数日的中央全会落幕，并且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决议》中引用林彪给彭德怀的定性指称彭德怀是“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在闭幕会上，毛泽东

又一次发表讲话，在毛的讲话的结尾引用了林彪的那句“名言”意即避免了大马鞍形。

而山下因为腿伤没能参加庐山会议的邓小平和山上诸公之于彭德怀的看法却迥乎不同。会议之后，宋任穷等人去医院看望邓小平，他们向邓转述了庐山会议上的点滴情况，邓小平非但没有迎合批彭的论调，反而大谈彭德怀的历史功劳，还讲不论他有什么错误，这些功劳都应该肯定。邓的如此态度在当时一边倒的格局中可谓凤毛麟角。【注 156】（《宋任穷回忆录（续）》351、352 页）

1959 年的第一次庐山会议不但是党内一场少有的悲剧，也是一场少有的闹剧。说它是悲剧因为它把本来正确的意见当作反党的思想加以错误的批判，全党的战略航程逐渐向极左靠拢；说它是闹剧因为像彭德怀、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这些刚直强项、尽忠职守、公而忘私的领导干部反而被那些动机不纯、私心大动的人指责为“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林彪可以说是这次会议的主要受益者之一，他不仅取代了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而且由此一发不可收拾的扶摇直上，直到坐上炙手可热的第二把“交椅”。彭德怀走下庐山之后，连同桌吃饭的人都找不到一个，而林彪则成为“护驾”的“英雄”，志得意满。不知道林彪对这样的天壤之别有无其他感想，他或许没有料到 12 年之后，也是因为又一次庐山会议，他落得的下场连 1959 年的彭黄张周还不如。

#### 第四节：主持军委扩大会议

1959 年 9 月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共中央军委由毛泽东任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为副主席，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等 14 人为常委，粟裕等 17 人为委员，军委秘书长由总参谋长罗瑞卿兼任，苏振华和萧向荣为军委副秘书长；10 月 20 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通知，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直属于军委常委），由罗瑞卿、谭政、杨成武、萧华、邱会作、萧向荣六人组成（1960 年增补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为办公会议成员）；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兼任军委副秘书长。这样，林彪、罗瑞卿分别取代彭德怀、黄克诚主管全军和总参的工作。此前也就是 8 月 26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彭

真传达林彪任国防部部长，并就此征求罗荣桓的意见，罗荣桓唱了反调：“林彪身体不好，国防部长常有外事活动，建议由贺龙任此职。”【注 157】

（《罗荣桓年谱》793 页）这就给本来已经有些龃龉的林、罗关系又投下了不快的一幕，为以后林彪和罗荣桓的分手提供了又一个准备条件。

庐山批彭还没有完全结束，8 月 11 日，召开军委扩大会议的通知就已下发。这次会议的规模相当之大，大军区领导除一人留下值班，其他全部要求参加，省军区、野战军的司令员、军长、政委等军事主官、政工主官一律参加，因为扩大会议是扩大到师，所以，师以上单位各派两名正职参加。会议参加人数高达 1061 人，508 人列席，会议光是秘书长就设了三人。林彪受命主持这次规模空前的军委扩大会议。如果说一年前的全军反教条主义的扩大会议上林彪还只是旁敲侧击，那么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林彪则是完全的主角身份。

这次军委扩大会议旨在批臭彭德怀在军内的 30 年的影响，所以，内容凌厉而直接。第一，给彭德怀确定了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罪名，甚至把彭在前一年的反教条主义中的表现也称之为“捞了一把”；第二，清算了彭德怀、黄克诚的历史帐，这几乎成了历次运动的必修课。毛泽东给彭德怀同他自己的关系既定为三七开，所以，七分不合作就是彭德怀的“万恶之源”，扩大会议认为彭德怀早年名叫彭得华就是有野心，领导平江起义是投机入股，参加革命 31 年也是三七分帐，七分错误、三分成绩。同时指称彭黄都是高饶联盟的漏网分子。第三，追查所谓的“军事俱乐部”的问题。第四，追查所谓的“里通外国”的问题。

在追查军事俱乐部的事情上，彭德怀受伤最重。会议当中一些不明真相的年轻干部纷纷指责彭德怀：“你快交待啊，不要再欺骗我们了。”彭德怀说：“开除我的党籍，拉我出去枪毙了吧，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就自己来报名嘛。”即便如此，还是不能过关，会议追逼彭德怀俱乐部成员有多少，彭不得不违心的说有 4 个，这当然过不了关，于是再逼，到底有多少？彭只好说，就是以彭为首的 4 个，其他的因为他们不愿报名嘛。彭的回答被说成“不老实”，有人就问彭德怀“贾拓夫算不算一个”，国家计委副主任贾拓夫和彭德怀等人对大跃进的看法有相近的一面，李锐发言结束，贾拓夫还给李锐做了个揖，说感谢李锐帮计委说了话。彭德怀的意见书批发下来，贾拓夫对宋平等人说彭的意见书写的好，不过，贾拓夫也认为意见书里面有点刺，他和彭德怀说：“写的好，不过有点刺。”彭说：“怎么？刺了毛？”彭的直言无忌或许已经令贾拓夫感到大事不妙，他向彭德怀道了一句“珍重啊，彭总。”彭德怀在会上曾经表扬过贾拓夫，说党内懂经济的就两个人，一个陈云，一个贾拓夫。这样贾拓夫在彭德怀出事后自然而然的成了人们轰击的对象。毛泽东说：

“1937年，（陕西省委）西安离延安那么近，也不听延安的，而听武汉的，王明在武汉。”实际指的就是贾拓夫。【注158】（《贾拓夫传》179、180、181页）不管贾拓夫怎么解释，按照“彭德怀那样欣赏你，彭德怀有问题，你（贾拓夫）当然也有问题”的逻辑，贾拓夫成了上“贼船”的又一人，而贾拓夫和彭德怀的组织联系居然是彭德怀送给贾拓夫的女儿的一架相机。【注159】

（《贾拓夫传》186页）彭德怀尽管没有承认贾拓夫是俱乐部成员，但是这对贾拓夫的命运丝毫没有有什么帮助，工交口党组扩大会议甫一结束，贾拓夫就给戴上了“右倾机会主义反党分子”的帽子，撤销国家计委副主任和党组副书记的职务。

追逼军事俱乐部虽然成果不大，最后彭德怀声明可以国法审判，这样也就确定了4个人，但是，扩大会议既名扩大，那么斗争中的扩大化也就难以避免。上将邓华、洪学智、中将万毅、少将钟伟先后给牵连进来，成为“小彭黄张周”。

先来说邓华，上将邓华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他和彭德怀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合作愉快，诚如他自己所说：“在彭总手下工作，心情是愉快的。”既然“如此愉快”，那么关系一定不浅，大会秘书长对邓华劈头一句：“邓华，我明白同你讲，你是一位有经验、难得的指挥员，但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比你强的还有，你不要太骄傲了，你，十个元帅反了九个！”【注160】（《邓华将军传》286页）1958年在从化和邓华相聚甚欢的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也一反旧态的质问邓华：“彭德怀爱骂人，许多人都骂到，就是没骂过你，这是为什么？”、“你长期和林总格格不入，为何一到朝鲜就和彭一拍即合？”会后，两位邓华昔日的战友找到邓华劝说邓华承认他和彭德怀的“黑关系”、承认“反党反毛主席”，这样便可以顺利过关。邓华气愤的说：“这不是诱供吗？”

毛泽东稍后对邓华的问题表了态，毛泽东说：“邓华是彭的人，但是，邓和彭是有区别的。”【注161】（《邓华将军传》288页）继毛泽东表态后，林彪也出来表态，林彪说：“我考虑很久，晚上睡不着觉，总觉得邓华留在部队是一个危险人物。”【注162】（《邓华将军传》288页）邓华就此厄运临头。由黄永胜参加的三人批邓小组主持编写了《关于邓华同志问题的小结》，邓华难以接受，他说：“我的错误是严重的，但要说我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说不过去嘛。”黄永胜说：“彭黄反党集团你是个重要成员，你的错误性质是反党反中央的。”最后，邓华痛哭流涕的表示其他问题可以接受，就是“反党、反毛主席”接受不了，黄永胜说：“我们大家让他考虑考虑再作检讨，我们小组通过《关于邓华同志问题的小结》。”邓华再次表示不能接受“反党反毛主席”，

黄永胜说：“在逻辑上说不过去，我们这个小组就这样了，小组通过！”【注 163】（《曲折发展的岁月》304、305 页）值得注意的是，黄永胜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第一次批斗邓华时还说：“你现在还不是反党，把问题讲清楚就行了。”谁知林彪在看了简报以后狠狠的批评了黄永胜，黄永胜随后再批邓华时便开始上纲上线。【注 164】（《邓华将军传》297 页）

邓华从此告别 31 年的部队生涯，下放四川，任四川省副省长，主管农机工作，在政治待遇上还是保持行政五级。邓华到四川工作后，和彭德怀还有过一段难得的遭遇，颇为感人。彭德怀下放西南三线任副总指挥以后，一直想去看看因为受他的连累被贬官四川省副省长的老战友邓华，他和警卫参谋景希珍说：要是能见到邓华同志就好了。景希珍于是就帮助他找到邓华所在的地址：成都童子街 29 号的详细方向。彭德怀于是趁着夜深人静，来到邓华的住处，他在邓华的楼下站住了，望着楼上的灯光，据景希珍回忆，他看到这位铁打的豪杰居然泪光盈盈，然后，彭德怀挥挥手说，回去吧。景希珍大为不解，为什么不上去呢？彭德怀说我的名声不好，我怕牵连他呀，回去回去。就这样，二人近在咫尺竟然没有见上一面。无独有偶的是，邓华早就知道彭德怀来到成都，他多次下决心去看看，有一天早上，他看到彭德怀和景希珍散步，他满意的对秘书笑了：看到彭总身体还好，我就高兴了。秘书问他为什么不去打招呼，邓华说：算了，我是被下放的干部，老总刚刚出来工作，我们碰到一起又要被人说闲话，对老总不利啊。回去回去。就这样，两位生死与共、患难与共的战友没有见上宝贵的一面。等到邓华再见到彭德怀的时候，是 1978 年 12. 24 日彭德怀的追悼大会上，邓华站在彭德怀的骨灰盒之前，望着昔日老首长的音容笑貌，双泪长流。

中将万毅，时为八届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他出身东北讲武堂，为人骁勇善战，军中有“不怕一万，就怕万一（万毅）”一说。在西柏坡，毛泽东还和万毅开过玩笑，毛泽东问万毅：“你说百家姓里除了姓伍、姓陆的、姓千的、姓万的之外，还有什么姓与数字有联系啊？你姓万，是不是对这方面有所研究？”吃饭时毛泽东还对万毅说：“你可算是张作霖的‘余孽’啊？”万毅回答：“我不能算是张作霖的‘余孽’，张作霖的‘余孽’应该是张学思。”【注 165】（《万毅将军回忆录》238、239 页）万毅曾任第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总参谋部装备计划部部长。庐山会议，万毅本来没有份，是二机部部长宋任穷要万毅上庐山向彭德怀、聂荣臻汇报工作，万毅当时还是国防科委副主任，万毅不想去，宋任穷坚持要万毅上山汇报，万毅就这么上了庐山，这是一个非常偶然的原因。【注 166】（《万毅将军回忆录》253 页）上了庐山的万毅在 7 月 22 日小组会上发了言，他还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要把彭德怀的上书批发下来讨论的本意，所以，他还处在“畅所欲言”的状态中，他说：“彭德怀同志把自己考

虑的问题提出来，精神是好的，是赤胆忠心的，基本精神都是对的，但有的问题说的简单一些，如果再多说几句、多加分析就清楚了。”【注167】（《万毅将军回忆录》255页）次日，毛泽东讲话，风向大变，特别是万毅亲眼目睹彭德怀在门口同毛泽东说“主席，我是你的学生，我说的不对，你可以当面批评教育嘛。”毛泽东没有作答，脸色一沉，甩手就走开了。【注168】（《万毅将军回忆录》257页）他感到事态已经逆转。8月7日起，万毅开始做检讨，他交代了他和彭德怀的所谓的“私人关系”，其实不过是和赵尔陆一起在彭家里吃了一顿工作餐，朱可夫送给彭一台收音机，彭不要，万毅从彭的手里要来了，仅此而已。万毅的这种交代哪能让与会者满意，李井泉就打断万毅的讲话说：“不能叫万毅发言，他不老实，也不交代他的问题。”还是薄一波看不过眼去打了圆场。【注169】（《万毅将军回忆录》258、259页）既然在庐山对万毅没有批透，那么军委扩大会议上则要补足，扩大会议给万毅作出的结论和彭黄的类似，还把彭德怀的几顶帽子分给了万毅一两个，说万毅是“伪君子、阴谋家、两面派”，还是“教条主义者”。还诬称万毅把东北军的共产党员名单交给了东北军师长，会后，万毅调离原岗位，下放陕西任建委副主任。

少将钟伟，原名钟步云，又名钟德泰。湖南平江人。1929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7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员、第三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师特务连政治委员、第四师十一团俱乐部主任。1932年12月任红三军团第三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1933年4月任第四师十二团总支书记，8月任第十二团政治委员。参加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先后任红三军团第四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第十团政治处主任。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八师政治部主任。1936年10月任第七十三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东征、西征战役。抗日战争时期历任抗日军政大学高干队支部书记、第五大队协理员、第三大队政治处主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第二团、第三团政治委员，苏北抗大五分校代理校长，淮海军区第四支队司令员，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二十八团团团长、第十旅副旅长等职，率部参加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三师第十旅旅长，第二纵队第五师师长。1948年4月成立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任司令员。11月任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九军军长。率部参加解放东北和进军中南的多次重要战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广西军区参谋长，中南军区编练司令部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军司令部参谋长，北京军区参谋长。

钟伟是一名具有传奇色彩的高级将领，他作风泼辣、勇猛善战，在战场上屡次抗命，却深得统帅的器重。本来批判的既定对象中并没有钟伟的名字，这位北京军区参谋长是自己找上门去的。在批判黄克诚时，空军吴法宪提出了“黄金案”。所谓的黄金案的来由是新四军第三师开拔前，为了携带方便就把原来积累的边币兑换成黄金，后来这笔金子中还剩下一部分由黄克诚征得组织的同意，将其带往西满军区，而后黄克诚去湖南工作，考虑到湖南烈士后裔居多，在请示李富春同意后就把这笔金子转移到湖南用作抚恤烈士后代，这笔费用是翁徐文负责，黄克诚虽有批准权，但是始终没有直接经手过。吴法宪旧事重提的目的主要是给黄克诚泼污水，谁都知道黄克诚一生直道、朴素，在私德方面深得大家的敬重，而今居然“贪污黄金”，这等于从另外一个角度把这所谓的“军事俱乐部”从里到外搞臭。黄克诚曾经因为问心无愧，便告诉翁徐文说：“如果你嫌它累赘，销毁了它也可以。”【注 170】（《黄克诚自述》319 页）

此时挨批的黄克诚委实拿不准这笔帐到底还在不在人世，况且这时候即便是黄克诚自己俯仰无愧，但是，在这么一个任意诬陷的大环境下，他也是有口难辩、百身莫赎。而且，当有人问李富春是否还记得此事时，李富春也说记不得了。然而，就在这时，钟伟站了出来第一个替黄克诚辩解，大约他的“火力”让主持会议的人倍感不快，所以，原可以避开风口浪尖的钟伟立刻成为“彭黄反党集团”的漏网分子遭到批斗。钟伟虽然被冤枉，但黄克诚的“黄金案”因为经手人翁徐文的细心保留的帐目最终令黄克诚洗脱出来。【注 171】（《黄克诚自述》320 页）

与 1958 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有所不同的是，这次军委扩大会议的批判对象从彭黄一直扩大到朱德。林彪点名批评朱德，还宣称朱德“没有当过一天总司令”，又把当年在江西的旧账重新翻了出来，并以此作为朱德反对毛泽东的历史证据。朱德对康克清说：“总司令不是我要当的，我当没当过总司令，毛主席最清楚。”【注 172】（《朱德传》696 页）不过，朱德还是被迫做了长篇检讨，朱德在检讨中说：“自己在历史上曾经犯过路线错误，并且几次支持过错误路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又犯了两个大错误，· · · · · · 既然如此，那么，同志们对我的批评不能说是没有理由的。”【注 173】（《曲折发展的岁月》306、307 页）10 月，中共中央将朱德的这份检讨印发党内。【注 174】（《朱德传》696 页）

在军委扩大会议的重大压力下，彭德怀、黄克诚等先后被迫检讨，彭德怀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认错的书信，得到了毛泽东意外的称许，毛泽东说他热烈的欢迎彭德怀的这封信。9 月 11 日，毛泽东发言作总结性讲话，说彭德怀居心不良，

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的党内来。【注 175】（《彭德怀年谱》750 页）9 月 12 日，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扩大会议决议》，《决议》按照林彪给彭德怀定的几顶帽子最后给彭做了组织结论，说彭是“野心家、伪君子、阴谋家”，要求全军彻底肃清彭黄所散布的毒素和恶劣影响，会后不久，彭黄的职务遭到撤销。耐人寻味的是作为第二号人物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在会议的尾声中即 9 月 9 日的一次讲话，此次题为“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问题”和“关于所谓个人崇拜问题”的发言是继庐山会议 8 月 17 日同样题目的第二次讲话。刘少奇说：“我这个人历来是提倡‘个人崇拜’的，现在我还要搞，还要搞林彪同志的、小平同志的个人崇拜，你们不赞成我搞，我也要搞的，我也不一定要人家同意的，我就是这么搞。”【注 176】（《曲折发展的岁月》305 页、306 页），刘少奇的讲话实际是针对彭德怀反对“个人崇拜”有感而发的，但是，刘少奇在 8 月 17 日的讲话中只是提出要对毛泽东进行崇拜，而这次则增加了邓小平和林彪。刘少奇说要搞一点邓小平的“个人崇拜”这不足奇，因为毛泽东在八大之前的中共七届中全会上关于“总书记”的话题中就盛赞过邓小平，此后毛泽东还多次说过“我这个人名字叫毛泽东，我挂正帅，也就是大元帅，小平挂副总司令，也就是副元帅，我们一正一副。”、“小平同志呀，你挂帅了，你是总书记了，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你敢不敢呀，你是书记处的总书记，也是政治局的总书记，也是我的总书记，也是中央委员会的总书记嘛。”之类的话。【注 177】（《毛泽东传 1949—1976》下卷 939 页和《邓小平与毛泽东—说不尽的世纪两伟人》50 页）毛泽东还多次提出：“我的接班人第一是刘少奇，第二是邓小平。”1957 年赫鲁晓夫访华时，毛泽东对苏联人说：“我们党的接班人，也是我的接班人，邓小平是一个，你可能不知道，我现在向你介绍他，他以后到了你们那里，你们对待他就像对待我一样。”由此可见，邓小平自从 50 年代初期调入中央工作，其接班人的地位已经呼之欲出，刘少奇上述的说法加之于邓也是据此而来。但是，林彪则不同，林彪一直处于养病状态，很少过问中央具体的事务，他在中央领导集体成员的心目中除了在军事指挥方面其他的特点还没有形成足够的印象，即便是在 1958 年增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后，林彪仍旧是较少露面，除了“反教条主义”那一次。然而，刘少奇却把他和邓小平相提并论，这说明此时林彪的地位已经超乎寻常，即便“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刘少奇也不能小觑。

第一次庐山会议让前期的“纠左”工作功亏一篑，“极左”的蔓延使得“大跃进”再起高潮，而这个高潮给中国政治、经济带来的恶果在稍后的几年中很快得以凸现，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极左的思维逐渐成为政治生活里的主体，这就给此后的长达十年之久的文革浩劫埋下伏笔，而林彪就在这政治伏笔里面让自己的身形随着极左政策的发展越拉越长。

### 第三章：神化毛泽东的背后

#### 第一节：突出政治

苏共“20大”上，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所作的“秘密报告”即《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首次把共产党党内对领袖的迷信和神化问题提了出来。对于苏联人的说法，中共党内作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回应，一方面不赞同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一方面也认为“秘密报告”揭了盖子。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决定由陈伯达执笔撰写《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篇文章提出一个重要思想就是要用制度来保证集体领导的实施和防止个人崇拜的出现，而这个重要思想在稍后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进一步体现出来，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反对个人崇拜、反对突出个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然而，这种良好的愿望和讲话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执行，正如《毛泽东传 1949—1976》作者指出的那样：

“可惜后来中国共产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没有真正建立起这样一种制度并付诸实践，重犯了个人崇拜的错误。”【注1】（《毛泽东传 1949—1976》上卷 504 页）

1958年成都会议期间，毛泽东发表关于个人崇拜的讲话，毛泽东说：“有些人对反对个人崇拜很感兴趣。个人崇拜有两种，一种是正确的崇拜，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正确崇拜，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崇拜，这就不对了。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注2】（《毛泽东传 1949—1976》上卷 793 页）在这里毛泽东把崇拜真理和崇拜个人混为一谈，“结果是鼓励和助长了不加分析、盲目服从的个人崇拜”。【注3】（同【注2】）1959年8月17日，刘少奇发表讲话其内容涉及“个人崇拜”，刘少奇说：“我想，我是积极搞个人崇拜的，积极的提高某些个人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传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在七大的党章上就写上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这一条。党要领袖，领袖就要有威信，在20大（指苏共20大）以后，有人要反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确的，实际上是对党、对无产阶级事业、对人民事业的一种破坏活动。……我们中国党中央的领导，毛泽东的领导，是不是最好的领导，最正确的领导？我看是可以这么说的，如果还不满意，还要更正确一点，既不左，又不右，那么请马克思、列宁来是不是会更好一些？我看也许可能更好一些，也不见得，也许更坏一些。”【注4】（《庐山会议简史》248、249 页）

在第一次庐山会议批彭后，“个人崇拜”之风开始在党内逐渐蔓延开来，其中比较引人注目的就是林彪亲手炮制出来的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的“林彪风格”的个人崇拜。

那么，什么是具有林彪风格的个人崇拜呢？我们注意到像刘少奇等人提及的“个人崇拜”还是把毛泽东作为马克思、列宁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导师的继承人或者学生来看待的，而林彪则异军突起的宣称“马克思、列宁著作很多，是低级的，”而把毛泽东的著作看作是高级的，要求大家以学毛著获取学马列的“一本万利”，这种把毛泽东凌驾于马克思、列宁之上的提法乃是党内绝无仅有。而学毛泽东的著作，唯一有效的手段在林彪眼里就是“背警句”，林彪说：“我们不要背上那么多，要挑选最好的，背上那么几十句就差不多了。”毛泽东的思想和著作是一个系统科学，如果仅仅通过背上内中即便是十分关键的警句来理解、思考这个学说，那么显然是苍白无力、一知半解的。但是，林彪所要达到的目的并不是要人们对他的口号进行辩论和论证，而是要通过这么一个口号树立起他本人的政治地位，这也就是后来毛泽东说的那句“名曰树我，其实不知树何人”的具体所指。

林彪在战争年代有可以炫耀的军功，而和平年代的林彪除了在个别会议上偶尔露峥嵘以外，其他可供大家参考的“建树”委实难找。但是，身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的林彪就要深刻的挖掘出来几个“惊世骇俗”的作品出来，极力推动个人崇拜就是他的最为有效的手段，这个手段落下的第一笔便是“突出政治”。

1959年9月30日，林彪发表《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在这篇文章里，林彪强调指出“突出政治”的必要性，他说：“但是一定还要注意另一方面，而且是主导的一面，这就是不要忘记政治，要强调政治。我们的军队是为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军队，我们要用政治指导军事，用政治指导日常工作。政治是最根本的东西，政治工作、思想工作不做好，其他一切工作就都无从谈起。”林彪还明确反对用训练冲击政治，他说：“前几年，有些同志把参加群众运动、帮助人民生产看成为一种额外负担，认为只有出操上课才叫训练，参加社会主义斗争的实践就不是训练，反会妨碍训练，就是‘得不偿失’。这种观点是十分错误的。”【注5】（《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8、13页）

这篇文章是林彪就任军委第一副主席、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后的第一次政治上的亮相，这本可以称得上“小册子”的东西集中体现了晚年林彪走上政治舞台几乎全部的政治策略，那就是以“突出政治”为载体宣扬个人崇拜进而捞取个人政治资本。此文虽说不算很长，可是提及毛泽东的名字居然多达22处，也算的上“言必称毛泽东”。这篇文章的核心内容在于两点：第一，军队要以政治为主导；第二，任何形式的军事内容包括训练等军事活动的主体都必须给政治让路，政治是唯一的支撑。

林彪是军人出身，却始终不能忘情于政治，关于这一点，文革中已经登上副统帅位置的林彪透露过这么一段心曲：“我这个人搞军事的，一向分工抓军事工作。但是，我的兴趣是搞政治，搞无产阶级政治，我搞军事是斗争的需要。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就爱搞政治，对政治有兴趣，我的职业是军事，兴趣是搞政治，毛主席一贯搞政治，我是学毛主席的，他的法有效，我也学他的法。”

【注6】（《林彪—1959年以后》5页）在林彪的谈话中，我们可以发现，林彪自谓“兴趣是搞政治”，而且对搞政治的兴趣还要从年轻追起。这也就难怪这位从江西时代便“耍政治手腕”（萧克转述他人回忆见《萧克回忆录》第25章450页）的林彪如此重视政治、如此对搞政治热衷了。

林彪的“突出政治”在1965年11月以“五项原则”的面貌出现，即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特别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把毛主席的书当成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二、坚持“四个第一”（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大抓狠抓“活思想”；三、领导干部要深入基层；四、大胆提拔“真正优秀”的指战员到关键的岗位上；五、苦练过硬的技术和近战、夜战战术。在从1959年到1965年这不到6年的时间里，林彪念兹在兹的都是“突出政治”。突出政治的第一个节目就是“三八作风”，所谓的三八作风实际是毛泽东给抗大题写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三句话以及“团结、紧张、严肃、活泼”这八个字，林彪把他们单独提炼出来作为口号确属独出心裁。“三八作风”出笼不久，林彪在1960年9月12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又提出“四个第一”，所谓四个第一指的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其灵魂就是“抓活思想”，这是对毛泽东提出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进一步阐述，因此得到毛泽东的称许，一时引起轰动。1964年2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重要社论题目是《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在这篇社论中就着重提出了对“三八作风”和“四个第一”的肯定，社论说：“解放军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的军队，最根本的原因是：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解放军大抓政治思想工作，坚持“四个第一”的原则；解放军坚持我国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三八作风”；解放军注重创造四好连队、加强基层建设等等，这些都是解放军无往而不胜的原因。全国学习解放军，就是要把解放军这些方面的宝贵经验学到手，真正活学活用这些宝贵经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中，充分发挥无产阶级化和战斗化的革命精神。”（来自新华网新华资料）可见，社论已经把人民军队的致胜的根本原因归结为“三八作风”和“四个第一”，并且在这篇社论中要求把这些东西应用到更为广阔的地方中去。

对于“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林彪自己也是敝帚自珍，就在1960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罗瑞卿建议依照古田会议决议的写法和笔调，为军委扩大会议

写一个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这份决议中把林彪的“四个第一”，放在相当于总纲的位置，并且说这就是“我军政治思想工作的方向，也是整个军队建设的方向”，林彪相当满意，他说：“这个决议就是复古。”报给毛泽东后，毛泽东也很高兴，还让秘书田家英出面会同罗瑞卿、肖华修改了一遍，毛泽东自己亲笔加上“今后，各总部、各军种、兵种、军区、院校，每半年都应将本决议执行情况，进行一次认真的检查，并将检查结果报告军委和总政治部，军委每年检查一次。”【注7】（《罗瑞卿传》439页）1963年11月16日，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称：“四个第一好，这是个创造。”毛泽东还指出：“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1964年2月，毛泽东再次对四个第一提出表扬：“四个第一好，我们以前也未想到什么四个第一，这是个创造，谁说我们中国人没有发明创造？四个第一就是创造，是个发现。”【注8】（《文化大革命十年史》190、191页）

林彪的创造所迎来的并不都是喝彩声，同时也夹杂着反对的声浪。在军内，同为深得毛泽东信任的罗荣桓、谭政等人就对林彪的如此提法表示过不同意见，这些人并不是反对林彪宣传毛泽东，主要是对这种宣传其实为神化的手段大感质疑。而在党内首先反对林彪的神化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就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邓小平从江西时代就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毛泽东说过：“邓毛谢古死了三个人，希望邓要为党争气。”【注9】（《百年小平》69页）邓素来为毛泽东所看重，许以主持全局的重任，邓本人也不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他和罗荣桓、谭政等人的看法差不多，认为这种神化或者说庸俗化毛泽东思想的做法委实不对头。还在“四个第一”、“三八作风”的宣传甚嚣尘上的1960年，邓小平便在天津会议上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1960年3月24日，在天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又称“天津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毛泽东、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薄一波、李先念、李富春、王鹤寿、彭涛、张霖之、吕正操、赵尔陆、陈伯达、胡绳、吴冷西；一些省、市、自治区的负责人欧阳钦、黄火青、吴德、乌兰夫、林铁、陶鲁笏、万晓塘、张仲良、吴芝圃、王任重。邓小平做了《正确地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讲话，他说：“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问题，我曾经在山东、天津谈过，后来在中央也议了。昨天在毛主席那里还谈了这个问题，他赞成这个意见：第一，现在的主要问题是把毛泽东思想用得庸俗了，什么东西都说成是毛泽东思想。例如，一个商店的营业额多一点就说是毛泽东思想发展了，打乒乓球也说是运用了毛泽东思想。第二，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少讲了。这种情况，不少报纸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为什么要提出这个问题呢？因为按照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解，一个是要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回事。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里面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

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当然，也可以单独提毛泽东思想，但是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

最近，有些同志提出，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当然，毛泽东同志在政治经济学上是有发展的，但是，讲初期的发展时期的资本主义，总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资本论》；讲帝国主义，总还是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讲社会主义，列宁和斯大林都有，毛泽东同志也有重要的发展。所以，不能只是讲以毛泽东思想为纲学习政治经济学，否则人家问你研究帝国主义以哪个著作作为纲，你怎么答复？扯不清楚。当然，对于帝国主义的论述，毛泽东同志有发展，例如关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论断。但是，《资本论》和《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已经把关于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基本的理论问题解决了。对待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很严肃的原则性的问题，不要庸俗化，庸俗化对我们不利，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不利。

关于毛泽东思想的宣传，中央已经发了一个指示，准备还要搞点材料，再发个指示。一定要把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掌握得好。光讲毛泽东思想，不提马克思列宁主义，看起来好像是把毛泽东思想抬高了，实际上是把毛泽东思想的作用降低了。

还有一个集体领导问题，也要在适当的会议上说一说。我们党是集体领导，毛泽东同志是这个集体领导的代表人，是我们党的领袖，他的地位和作用同一般的集体领导成员是不同的。但是，切不可因此把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分开，应该把毛泽东同志看作是党的集体领导中的一个成员，把他在我们党里的作用说得合乎实际。毛泽东同志是尊重集体领导的。他昨天讲，提法要合乎实际，不合实际就站不住脚。我们应该本着这种精神，去做好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工作。【注10】（《邓小平文选》第一卷283、284页，89年5月第一版）

邓小平在这篇讲话中强调了两点，一个是反对庸俗化毛泽东思想及其宣传，一个是摆正个人领导和集体领导的关系。这两点实际上都是针对当时出现的“个人崇拜”和神化毛泽东的倾向。而且这两点的矛头所指同林彪此前大力宣扬个人崇拜形成鲜明对比。周恩来赞同邓的看法，周说：“一个是对立起来了，还有一个是庸俗起来了，什么都说成毛泽东思想。”刘少奇也反对把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搞成两个东西，彭真认为有些文章对毛泽东的领导和集体的关系处理的不恰当。毛泽东也承认某些写给中央的报告“主席并中央”的提法不妥。

【注1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卷296、297页）

林彪当然知道邓小平矛头所向，只是碍于邓的背景只能暂时隐忍不发。但是，如果听任这种风头的渐次开来，势必影响他的突出政治的全局设想，所以，林彪决定开刀祭旗、杀一儆百，对象就是谭政。

## 第二节：谭政遇难

谭政，原名谭世铭、号举安。1906年6月14日生于湖南省湘乡县楠竹山村。曾任小学教员，参加反帝爱国运动。1927年2月任国民革命军第4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务营文书、书记。同年9月，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谭政是最早追随毛泽东上井冈山的高级将领之一，他和谭震林并称党内“二谭”。他与毛泽东的结识还有一番趣闻。一次，他接到通知要他到前委报到，等他见到前委书记毛泽东后，毛泽东问他的第一句就是：“你的老岳父陈绍纯先生还好吗？”这让谭政很为惊奇，毛泽东又问：“你原来的名字不是叫谭世铭吗？现在怎么叫了谭政？”原来，毛泽东和谭政的岳父陈绍纯也就是陈赓的父亲有过一次短暂的会面，陈绍纯对毛泽东说：“这个世道得乱透了才能分出个高低，我把大儿子陈赓打发出去了，女婿谭世铭也去汉口投奔国民革命军了。”毛泽东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注意这位名叫谭世铭得青年的举动，后来，毛泽东从卢德铭的警卫团名单中看到一个叫谭政的名字，只是没有想到此人就是谭世铭。在查选前委秘书人选时，宛希先向毛泽东推荐谭政，说此人思想进步、政治可靠而且书法颇好，毛泽东就把谭政的入党志愿书找来一看，结果才知道谭政就是谭世铭，这才有了毛泽东问谭政的第一句话的来由。【注12】（《陈赓传》5页）

陈赓的父亲陈绍纯对谭政这位女婿非常看重，还给谭政另外起了一个名字叫做谭清河，并且序在《陈氏家谱》中。谭政的妻子也就是陈赓的妹妹陈秋葵和谭政感情甚笃，谭政离开家乡不久陈秋葵病故，建国后谭政才得知这个消息，言语间痛惜可见。

谭政历任第31团党委秘书，中共第4军军委书记、第4军政治部训练部部长、第12军、第22军政治部主任、第1军团第1师政治委员、第1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等职。参加了漳州战役、南雄水口战役以及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1929年，参加中共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曾写出《新田夜间战斗政治工作》、《高兴圩以北战斗政治工作》等报告。1936年3月写出《关于红军新的历史时期政治工作的意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1944年4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中共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根据古田会议决议精神，论述军队政治工作的性质、地位和作用，阐发政治工作的方针、原则，并提出改革政治工作组织形式和工作制度的意见。这个报告由他起草，经毛泽东、周恩

来等修改和中共中央扩大的书记处会议讨论批准，是军队政治工作的重要历史文献，曾被列为全党全军各级领导干部的整风文件和固定教材。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候补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参与领导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的政治工作。

建国后，谭政是八届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常委、总政治部主任。自从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作为领导核心之后，刘少奇、罗荣桓先后担任过总政治部主任，而今以谭政继掌总政，足见毛泽东对他的信赖和倚重。那么，以毛泽东对谭政的知遇、以谭政的个人经历以及和林彪的历史关系何以让他成为林彪手下的靶子呢？

林彪选择谭政作为打击的对象还是很有一番计较的。首先，谭政在突出政治的问题上屡次和林彪的提议发生抵触。林彪甫一提出“三八作风”，谭政就表示异议，谭政说：“三八作风这个提法恐怕不是很准确，还有个三八妇女节，这样容易混淆，也不严肃。”在1960年3、4月份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总政治部没有布置宣传三八作风的有关事项，谭政对林彪所主张的“背警句”的做法也深感疑惑。谭政还就毛泽东的那三句话中的“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提出自己的看法，他给毛泽东写信询问到底是用“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还是用“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毛泽东批示用后者，但是，这件事谭政并没有事前知会林彪，林本人在战争年代喜欢越级指挥或者叫超级指挥，但这种做法如果作为他的属下这么使用，那么在林的心目中则另有评价，谭政的越级报告使得林彪深为不快。此外，谭政主管的《解放军报》还在宣传中不提“三八作风”。林彪质问谭政：“你知道不知道政治机关和党委的关系？”谭政主张对于毛泽东思想不能庸俗化，其次，谭政不仅在突出政治方面和林彪有所分歧，而且在其他方面也和林彪的思路不能吻合。例如，中将周赤萍撰写了一篇回顾林彪在解放战争时期的文章，内中对林彪有些比较肉麻的吹捧，使用了诸如“天才”、“统帅”一类词语，谭政认为不宜在《解放军报》上转载。谭政在东北视察期间，有人推荐说有一位老太太学习毛著很好，谭政脱口便出：“这是摆样子给人看的。”再有就是总政内部有人对谭政暗中倾轧，总政一个副主任借谭政下去调查研究的机会为迎合林彪批发了《关于开展三八作风运动的指示》，在该指示中称“在部队中开展培养三八作风的运动，又是两条军事路线斗争在思想作风方面的继续。”

而林彪之所以敢于把打倒谭政付诸于行动的另外一点就是他看出谭政自从庐山会议以来已经逐渐“失宠”。谭政为人很有一些书生气，毛泽东曾经用开玩笑的口吻婉转的指出谭政的这个特点，毛泽东说：“谭政呀，谭政，不能老是书生气，也要‘谈政’嘛。”【注13】（《大将谭政》222页）可是，谭政“积习难改”，庐山会议批彭时，谭政居然给彭德怀“唱赞歌”，谭政说：“彭在

军队的地位是统帅地位，有其革命性的一面，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在处理他的问题时应足够估计其革命性的一面。”如此“觉悟”，也就难怪谭政的秘书乔希章在分析这段历史时写道：“毛泽东对谭政八大以后安排他中央书记处书记、军委常委、总政治部主任，此次庐山会议特地让他上山来，关键的时候却显得这样不得力。”【注 14】（《大将谭政》322 页）庐山批彭的后期，原来 6 个小组合并为 3 个小组，谭政原有的副组长被免掉，他所在的第二小组，组长李井泉，副组长王任重、肖华，这个小组中部队的干部占一半以上，任务就是批判彭黄的军事历史，然而，谭政又一次主动的放弃了这次“绝好”的表现自我的机会，谭政除了做一个应景的表态发言外，再没有更多的上纲上线，反倒是一再说：“批评人错误，讲话是要负责任的，把工作当中的错误，思想作风的问题都说成犯了路线错误，这是不对的。”谭政还说：“管他别人怎么说，反正不能把工作中的意见，说成是反对总路线、三面红旗，反对哪个人的野心家、伪君子、阴谋家，什么伪君子？不负责任的说这种话的人，才是伪君子。”【注 15】（《大将谭政》324、325 页）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是林彪送给彭德怀的三顶帽子，谭政非但没有顺着这一路子继续深入批彭，反而指出给彭德怀戴上这三顶帽子的始作俑者就是“伪君子”，此话传入林彪的耳中，可想而知林彪对他的态度了。

庐山下来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谭政的“书生气”又犯了，他给主持会议的林彪提出尽快结束军委扩大会议，谭政在后来狱中手书的《我的交代》中对自己为何提出尽快结束扩大会议有过一番表述：“我对于反彭黄的斗争不坚决，同彭德怀的感情没有完全决裂。自己没有勇气揭露彭德怀，又没有决心把这个斗争在部队中彻底贯彻下去，加之我自己在立场、思想作风上和彭德怀有些相类似的错误，怕牵连自己，所以更缺乏勇气来对待这个斗争。”【注 16】（《大将谭政》325、326 页）

应该说，谭政的上述表现和心路已经令毛泽东深感失望，林彪看透了这一局面，所以才敢进一步提出打倒谭政的主张。

林彪打击谭政是采取突袭的办法，他向中央提出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讨论政治思想工作。于是，继 1958 年、1959 年之后的第三次以整垮解放军三总部负责人为目的军委扩大会议在 1960 年 9、10 月间召开了。这次扩大会议和 1959 年有所不同，倒是和 1958 年有些类似，此次会议原定的议题是政治思想工作，在谭政看来这不过是同年 3、4 月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的延续而已，不料林彪在开会的前一天也就是 9 月 12 日下午借用吴法宪在军委扩大会议的发言中的“四个第一”打响批判谭政及其领导下的总政的第一枪。林彪说：“广州会议提出的战略方针，提出三八作风，这些政治工作会议都应该传达，对于三八作风还要作出解释，· · ·而且要号召、要发动、要检查，这是政治工作理所当然的事，但是，政工会议没有解释和布置。”这里林彪所提及的广州会议指的

是1960年1月22日到2月27日在广州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研究了战略方针和国防问题。林彪以总政没有在此前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把传达布置三八作风为突破口突然发难，令包括谭政在内的总政的一些领导措手不及。他们预想的和风细雨的讨论场面不见了，剩下的只有咄咄逼人。

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姜思毅就林彪指责的“总政没有搞推广三八作风而去搞系统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教育和科学文化学习是方向偏”的讲话做了解释，姜思毅表示总政开展的文化学习是经过毛泽东批准的，林彪见姜思毅这么说，非常不满。谭政没有顺着林彪的话发挥反倒站在了姜思毅的一边，谭政说：“偏在哪里？不能说偏。”但是，林彪已经给本次军委扩大会议定了调子，谭政的所谓“不能说偏”如何能够左右会议的进程呢？军委决定9月13日举行预备会议，传达林彪12日的讲话，并且以这个讲话为全部会议的主基调，9月14日正式开幕的扩大会议很快就成为批判谭政的场所，谭政所作的《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报告》被说成“仍与军委和林彪同志唱对台戏”进而遭到批判。9月22日，在林彪的亲自布置下，批判谭政的斗争陡然升级，不但涉及谭政，而且还把总政治部另外两个副主任甘泗淇、傅钟给牵扯了进来，其中甘泗淇被说成“很有可能是彭黄反党集团主要成员之一”，会议把前一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谭政对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消极批判的旧账又给翻了出来，指责谭政是彭黄军事俱乐部的“政治部主任”，谭政被包抄围攻，有口难辩。

林彪要求谭政必须就他自己的错误作出深刻的检查，谭政被逼无奈只好在10月18日草草写就《我的检讨》，谭政的检讨墨迹未干，20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就通过了《关于谭政同志错误的决议》，同时通过的还有深深打上林氏烙印的《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林彪在扩大会议闭幕会上进一步要求对谭政的“错误”进行深入的批判，他说：“他（谭政）的错误不止《决议》中那些，思想方法、工作作风方面的教条主义和‘反上’，还有历史的错误，要老帐新帐一起算。他的错误和问题要回到总政治部机关整风中去解决。”林彪在庐山讲话的特点于此又一次有所流露，那就是一旦某人给宣布“有错”，这个人的名字就很难在林彪的词典中找到，代之而来的就是第三人称“他”，对彭德怀如此，对谭政也如此。

林彪布置下去的这份“作业”其根本在于要把谭政在总政治部系统内彻底批臭。根据军委扩大会议决议和林彪讲话精神，总政在1960年10月25日到1961年1月25日长达3个月的时间里进行整风，对谭政开始全面的揭批。总政党委扩大会议的调门是“这次会议对谭政同志的批判和斗争，是在军队中坚持毛泽东思想、继续肃清彭黄影响的大是大非斗争，是两条路线斗争。”【注17】（《曲折发展的岁月》313页）既然扩大会议已经把内容界定为“两条路线的斗争”，对谭政自然也就可以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按照总体部署批

判谭政的意思，谭政已经把所领导的总政转化到独立王国的边缘，那么谭政也就理应有一个集团。这就是林彪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指责谭政的所谓的“小圈圈”，最后这个小圈圈的范围划定为总政宣传部部长姜思毅、组织部部长刘其人、秘书长白文华、《解放军报》社长兼总编辑欧阳文四个人。其中姜思毅的“毛病”在于他认为林彪鼓吹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意即著名的“顶峰论”不合适，而且还把这段话从总政编的《林彪元帅关于政治思想工作言论摘录》中予以删除，而对于周赤萍撰写的吹捧林彪的文章（周赤萍撰写的《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一文在《中国青年》上发表）中使用“天才”、“统帅”这类用词表示疑议，姜思毅觉得“天才”、“统帅”只能用在毛泽东身上，而用在林彪身上很不合适。殊不知，林彪对于周赤萍的文章非常满意，曾经要秘书给他读了多次，此文后来在1971年单独印成小册子发行。【注18】（《曲折发展的岁月》313、314页）总政党委扩大会议开过不久，姜思毅就给降级使用，虽还在总政工作可也是一蹶不振，此后姜思毅担任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政治部副主任，只不过是一个师职干部。1970年毛家湾为了给林彪准备四届人大的讲话稿，找到了姜思毅。林彪有一天忽然问及姜思毅，他说：“姜思毅是个秀才，能写点文章，但放在我这里没有什么用处。……姜思毅这个人可以放他到一个常写文章的地方，例如放到报社。”【注19】（《毛家湾纪实》377页）

姜思毅在林彪眼中不过是一个秀才，而谭政则不是秀才，更不是什么“死老虎”，总政扩大会议给谭政的定性步步升级，原来说谭政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只不过是扛着的，后来干脆就说成反对毛泽东思想。总政党委在1961年1月30日给毛泽东、中央、中央军委的整风报告给谭政扣了好几顶大帽子，一个是反党反毛主席，一个是执行彭德怀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一个是结成宗派反党集团把持总政。中共中央批准了总政党委的这份报告，并把他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下发党内、军内。同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撤销谭政的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公会议成员职务，将其降为总政治部副主任。1962年9月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谭政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也遭到撤销。这里需要提及一笔的是，对于谭政的斗争、批判，林彪诚然要负有主要责任，但是，有一些人闻风希旨、落井下石也是一律应该予以谴责的。比如总政治部当时的一位副主任××对谭政的残酷打击令谭政直到拨乱反正以后也不能思考出个大概来，谭政说：“有件事，到现在我还想不通，在总政工作时期，我对各位副主任一向是极尊重的，对其分管的工作也是很支持的，而××后来对我却不是同志式的，把人往死里整，为什么？”【注20】（《大将谭政》356页）

谭政问的这个为什么或许还是应该从当时历史条件下的极左政策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上面寻找答案。1960年10月通过的《关于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对林彪鼓吹的那一套“四个第一”和“顶峰论”给予了积极的评价。林彪的所谓的“四个第一”其实质就是唯心主义和极左论调，而且也根本经不起推敲。例如四个第一中的“人的因素第一”，在林彪看来，现代化武器诸如飞机、大炮、火箭都远不如“手枪、手榴弹和拼刺刀”能够“最后解决问题”，这种人

为夸大主观作用的结论和大跃进中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如出一辙，都是对个人的主观能动性的无限拔高。然而，就是这个实际上可能连林彪、吴法宪这些经历过战争的洗礼的制造者都未必相信的东西却在极左思潮为主导思想的60年代大行其道。1960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在这份军委扩大会议通过的决议上批示道：“这个决议，继承和发扬了1929年古田会议的传统，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全面地总结了解放11年来军队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的丰富经验，明确地指出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军队政治工作的方向，提出了措施、打中了要害。”中共中央的批示还指出：“它的基本精神对于各级党组织、政府机关以及学校、企业部门等都是有用的。”【注21】（《曲折发展的岁月》319页）这也就是说林彪所极力推崇、推动的个人崇拜、顶峰论也正在从军队开始向地方扩张、伸展。

与林彪受到肯定的同时，谭政则开始了他长达十多年的困境。谭政降级后，毛泽东找罗瑞卿、肖华商量总政主任的人选，最后圈定罗荣桓重新出掌总政，在罗荣桓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期间，谭政还是心情相对比较愉快的，罗荣桓对谭政的挨整是心知肚明的，他怕谭政想不开，还建议谭政去下面搞一点调查研究，实则也就是利用这个机会散散心，而当谭政在调查研究有了成绩后，罗荣桓很快就向军委秘书长罗瑞卿表扬谭政，给谭政“缓颊”。可惜的是1963年12月罗荣桓病逝，此后谭政的境况越来越糟。先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免去谭政的国防部副部长职务，本来这也是在预料之中的，书记处书记、军委常委都已经撤销，国防部副部长怎么可能留在谭政身上呢？接下来的事情却让谭政大为伤感。参加“四清”运动的谭政给毛泽东写信。这是他个人在运动里面的几点思想体会，当然也有想和毛泽东再次取得交流的意思。这封信送上去没有得到毛泽东的回复，却等来了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一个代表中央作出的组织决定：谭政同志去福建省任副省长，必须在年前全家搬迁离开北京。【注22】（《大将谭政》348页）谭政听到这个决定的日期是1965年11月，离1966年春节已经为期不远，在这个时候全家搬迁离开北京到底意味着什么？谭政心里最为清楚不过了。适时，“彭黄反党集团”的“头子”彭德怀、黄克诚也分别离开北京，彭德怀去了三线、黄克诚到了山西。谭政此时已经“沦落”到和“军事俱乐部”主要成员一个“待遇”的份上，而黄克诚作为“军事俱乐部”的“政治参谋长”在1961年的国庆节还受到参加观礼的礼遇，并且亲逢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主动问黄克诚愿意不愿意再回军队。【注23】（《黄克诚自述》323页）可谭政自被批判后却始终没有得到毛泽东留给他的音讯。从谭政的去向看，他已经给当作了彭黄集团的漏网分子，在处理上和邓华等人类似，都是下放。事实上，这次分派彭德怀、黄克诚、谭政等人到外地特别是让彭德怀到三线并不是一般流传的那样便于给他们恢复名誉，按照谢春涛在《庐山会议简史》中揭露出来的真相说法，我们知道原来是1965年3月，美国出兵南越，中央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准备应付严重局面，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认为受审查的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等不宜留在首都，提议分配他们到外地挂职下放，因此，对彭德怀的这一安排，实际上是变相的‘流放’。”【注24】（《庐山会议简史》261、262页）“彭黄集团”的“首脑”尚且如此，“政治部主任”的谭政自然也就好不到哪去，然而对于这种“扫地出门”的做法谭政也只能接受。文革开始后，邱会作指使福州军区卫生学校的红卫兵

把谭政揪回北京接受批斗，身陷囹圄一蹲就是9年，比较滑稽的是彭德怀的囚室是一号、黄克诚是二号，谭政则是三号，看来在有些人眼中，谭政的确是“彭黄集团”的“政治部主任”。在狱中，谭政沉默不语，甚至面无表情，9年的牢狱生活破坏了谭政的健康，他重见天日已经是1975年，那时林彪早已覆灭达3年之久。

谭政不同于彭德怀，他在历史上是始终遵从毛泽东的理念和思想的，所以，他的如此下场可谓沉冤。林彪用突袭的手段打倒谭政是林彪打击异己者的第一个政治信号，如果说1958年的军委扩大会议林彪还只限于出谋划策、1959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借题发挥，那么1960年的这次军委扩大会议则可以称得上林彪的主动出击。从打击谭政的过程中，林彪对各方势力的总体情况都有所摸查，心里也就更加有了把握，更为主要的是林彪抓住了这次斗争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即用“极左”的政治面貌充当先锋，这给他在以后的历次政治斗争中提供了绝大的方便。谭政说过：“对于林彪这个人我还是了解的，凡是与他意见不同者，他是记仇的。”【注25】（《大将谭政》353页）在整垮谭政的阶段，林彪记住了一度是他老搭档的罗荣桓的“仇”，谭政即垮，林彪很快就在林罗关系上撕开了一个大口子直接导致林罗交恶。

### 第三节：林、罗交恶

在谭政被整的前前后后始终有一个人对过程抱着一言不发的消极态度，此人就是罗荣桓。

罗荣桓（1902—1963）湖南衡山（今属衡东）人。早年曾在青岛大学读书，积极参加反帝爱国学生运动。北伐战争期间，在家乡从事农民运动。1927年春入武昌中山大学读书，不久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后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八七会议后，受中共湖北省委派遣，赴鄂南参加暴动，任农民自卫军党代表。9月率部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后随部队进军井冈山，先后任中国工农革命军团参谋、特务连党代表。1928年先后任中国工农红军连、营党代表。1929年3月任红四军第三纵队九支队党代表。12月在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古田会议）上被选为前敌委员会委员。1930年1月任红四军第二纵队党代表，6月任红四军代理政治委员，不久任政治委员。1932年3月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1933年3月后，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巡视员、动员部部长等职。1934年9月任红八军团政治部主任，10月参加长征，年底调任总政治部巡视员。1935年9月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1936年进抗日红军大学学

习。1937年1月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7月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训处(后改政治部)主任。1938年3月后主持该师工作，参与开辟了吕梁山抗日根据地。1939年3月率领东进支队挺进山东，与八路军山东纵队密切配合，协同作战，先后开辟和巩固了鲁西、鲁南、鲁中等敌后抗日根据地。1941年8月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1943年3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一一五师政治委员兼代理师长，8月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1945年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同年8月日本投降后，率部向东北挺进，先后任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1946年6月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1948年1月任东北人民解放军副政治委员。8月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兼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在中央军委的领导下，参与指挥了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1949年春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6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后改中南局)第二书记兼华中军区(后改中南军区)政治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检查署检察长。1950年4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11月兼任总干部部部长。1954年6月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主持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工作。1955年9月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56年9月，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因积劳成疾，经中央批准辞去总政治部主任和总干部部部长职务。1961年1月重新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和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古田会议期间，毛泽东指着罗荣桓对冯文彬说：“这个同志是个人才，对这个同志，我们发现晚了。”罗荣桓素有“党内圣人”之称，罗病故后，毛泽东同康生、王力的谈话中说起罗荣桓的为人，毛泽东如是说道：“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都是跟我一起倒霉的。罗荣桓的品格用十句话概括，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提的起、看的破、算得到、做得完、撒得开、放得下。”【注26】（《罗荣桓年谱》364页）1974年12月24日，已经重病在身的毛泽东听到周恩来向他列举的总政治部主任的三个人选时，毛泽东居然说：“罗荣桓”，其时罗荣桓已经辞世11年了。【注27】（《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1711页）

罗荣桓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盲从。1939年8月，山东革命根据地湖边区地委组织部部长王须仁诬称湖西干部学校教员魏定远为“托派”并且加以刑讯，得到湖西区军政委员会主席王凤鸣的支持，由此株连了大批干部如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独立大队政委郭影秋等，其中不少干部被王须仁、王凤鸣公开枪决，此为党史上著名的“湖西肃托”的由来。当时，苏鲁豫抗日支队副支队长兼第四大队大队长梁兴初对“二王”的做法提出怀疑，反被王须仁、王凤鸣抓捕入狱。苏鲁豫支队支队长彭明治表示异议，王须仁、王凤鸣反而决定再抓彭明治，彭只好给罗荣桓发报求救。罗荣桓赶到后经过仔细的调查发现所谓的“托派”都是“王须仁、王凤鸣严刑逼供的结果，他立即释放了梁兴初、郭影秋等受冤屈的干部，而且根据

实地调查的情况下令追究王须仁、王凤鸣的责任，王须仁此后在送往八路军115师保卫部的途中畏罪自杀，王凤鸣则趁机潜逃、下落不明。

鉴于“湖西肃托”的经验教训，罗荣桓对稍后在1943年由康生发起的“抢救运动”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在罗荣桓领导下的山东分局极力避免扩大化的举动，最大限度的保护了青年学生和干部群众。因为抢救运动、审干、反内奸的来头很大，罗荣桓为了进一步澄清保护干部和审查干部的必然联系专门就此写了《关于审干问题的意见》，并报中央和毛泽东，罗荣桓认为：“如果没有经过好好的整风，打下必要的基础，审干必然变为少数领导者的事情，或形成一种突击的倾向，实很容易走入轻易发动坦白，变相的严重逼供信。”罗荣桓在文件中，提出了先要克服在民主座谈会中所形成的领导与群众对立的情况，“在领导上展开自我批评，接受大家正确意见与决心改进领导之下，是完全能够启发大家，改变中间大的现象，使正气上升，以达到审干的必要基础。”他把群众中正气的上升看作是转到审干的必要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不宜马上转入审干。【注28】（《罗荣桓传》353页）对于罗荣桓的做法，毛泽东后来也给予积极的评价，毛泽东说：“罗荣桓领导的整风，重点是端正路线，而且抵制了延安的‘抢救运动’，这很难得。”【注29】（《罗荣桓年谱》365页）

罗荣桓和林彪早在红四军时期便开始合作，林彪时任四军军长，因为和历任政委关系紧张，所以，罗荣桓上任时还有人给罗捏着一把汗。殊不料，两个脾气个性迥异的人却相处甚得，连毛泽东都高兴的讲：“罗荣桓在四军，不是和林彪团结得很好吗？”这一次合作应该开启了林罗交往的大门。进入东北后，林罗再度合作，林为正、罗为副。罗荣桓生性恬淡、宽厚，在东野内部有“婆婆”一说，举凡部下不敢直接跟林彪讲的都先和罗荣桓说，举凡内部有些疑难杂症也都是罗荣桓去出面解决。但是，谁也没有想到就在二人合作的这个阶段中，因为家属的问题引起了龃龉，给双方的关系埋下隐患。

事情的起因要从罗荣桓的妻子林月琴说起。林月琴是河南商城人，父亲就是中共党员，所以，她也很早的就参加了革命，投身在红四方面军里。在延安时期通过许建国、刘桂兰的介绍和罗荣桓结婚。东北解放战争初期，东野的后勤部门设在哈尔滨，林月琴分配到的工作是担任东野子弟学校校长。这样，林月琴和政治部宣传部部长肖向荣的妻子余慎、吕正操的妻子刘莎便在一起商量办学的事情。办学需要校舍，管理部门建议使用林彪、叶群即将搬迁的原住处，这个住处原来是苏军元帅马利诺夫斯基使用过的，很为气派。此前，东野分给罗荣桓夫妇一套和林彪夫妇同样规格的房子，罗荣桓嫌房子太大住的浪费就主动提出和谭政夫妇搬到一处，谭政的妻子王常德和林月琴是延安的同学，两家关系素来不错，罗荣桓搬来他们自然高兴。不过，他们没想到这件事给林彪的妻子叶群看来却是“将军”。而且，在林彪、叶群没有搬迁前，余慎等人按照管

理部门的引导去了林彪的住所，于是这就给叶群抓住了“把柄”，她给林彪去信告状，说罗荣桓带头搬去和谭政夫妇住是逼他们夫妇也得搬家，还说林月琴号下了他们原来的住所给子弟学校是赶他们“出门”。信到双城，罗荣桓并没有计较反倒是批评了林月琴办事不够谨慎。罗荣桓曾就叶群的为人和林月琴交过底：“叶群的经历与你不同，她在大城市待过，接触过三教九流，社会经验较多，你同她既要搞好团结，也要保持一定距离。”【注 30】（《中共党史资料》44 辑 81 页）但是，林月琴也没有想到叶群竟然如此麻烦。这件校舍的事情还没有完全落定，又一件事让叶群对林月琴颇为不满。辽沈战役结束后，在沈阳召开的东北妇女代表大会上，叶群提出她是林彪的妻子，理应当选为全国妇女代表会议代表的候选人，哪知道叶群的发言遭到了与会者的嘲讽，有人说：“我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斯大林的夫人当了什么代表。”居然硬是让叶群落选，叶群怀疑是林月琴背后搞她，就去找蔡畅告状，蔡畅调查后知道并不是林月琴搞的，而是与会者们自发的。但是，考虑到林彪的面子，还是给叶群弄了一个特邀代表出来。这两件事使得叶群对林月琴的印象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接着在进城以后，林彪前妻的女儿林小琳住在罗荣桓家，叶群对林小琳不好，林小琳连林彪的面也见不到就去找林月琴代为联系，林月琴答应了，这就令叶群大起反感，认为林月琴的“手”伸得未免过长。这些琐碎小事日积月累随着叶群在林彪家族中的地位日渐显赫、对林彪的影响日渐加强，林罗两家的关系也起了微妙的变化。

如果说生活上的这些摩擦还不足以让林罗从合作走向分裂，那么工作中的分歧显然就是二人交恶的主因。本书第一章第三节《战锦方是大问题》中已经论述过林彪因为罗荣桓在辽沈战役后的总结中加进了一段对林彪在打锦州问题上的前因后果而深表不满，这是林、罗处理问题的原则的分歧，自然也就是后来他们分手的要害。在罗看来，凡事都要实事求是，而在林看来“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这种根本上的南辕北辙一旦反映在 60 年代全军政治工作的开展时，矛盾很快就走向激化并且一次性的爆发出来。

林彪在 1960 年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整垮谭政，罗荣桓因为有病没有出席 10 月的会议，谭政的处理意见出来后，罗荣桓不以为然，他在政治学院的一次讲话中说：“谭政跟主席革命了那么多年嘛，怎么会发生反对毛主席的问题？”在当时那种肃杀的政治背景下，也只有罗荣桓敢于这么“放炮”，罗荣桓的这次讲话传到林彪的耳朵里，林的不满是理所当然的。谭政受到降级处理心中委屈，罗荣桓就鼓励谭政说：“要振作精神，不要这样垂头丧气的。”支持谭政下去搞调查研究工作，等谭政归来写完调查报告，罗荣桓当着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面肯定谭政的精神，还建议罗瑞卿组织一次汇报，专门听取谭政的报告。这在林彪看来简直是“顶风作案”。

因为大跃进造成的恶果，农村工作中出现了大量的浮夸风、共产风、干部特殊化风、瞎指挥风。有鉴于此，罗荣桓决定向中央建议各地驻军应该关注地方工作，及时向当地党委反映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动态，当地方上出现一些急于解决的问题时，部队应该视同己任。这份建议经过中央讨论认定可行，总政治部向部队做了传达。但是，这份建议也犯了一个忌讳，那就是僭越了林彪的权限。林彪自己表示过，他生病养病期间，解放军三总部负责人可以越过他直接和中央对话。然而，这不等于林彪真的认同这种做法，而且谁要是这么做了，谁的厄运也就该临头了。此前的谭政、此后的罗瑞卿、贺龙、杨成武无不如此。如今罗荣桓尽管得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支持却无意中触犯了林彪，林彪自然不能置若罔闻，而且在军队关注地方工作这方面，他和罗荣桓也有分歧，他在1960年11月10日也就是罗荣桓建议下发的第三天给毛泽东写信阐述他自己的看法，林彪肯定了罗荣桓意见的出发点，但是同时也指出这样一来容易导致军队和地方党委关系上复杂情况，不利于党的统一领导，而且还会造成军队妄议地方工作的潮流。毛泽东接到林彪来信后在11月15日批示：“请富春（李富春）告肖华，照林彪同志的意见办理。”【注31】（《罗荣桓年谱》813页）

林彪和罗荣桓最大的分歧还是在“突出政治”这件大事上。林彪鼓吹活学活用、立杆见影、一本万利、急学先用。总政副主任傅钟1952年在《八一杂志》上发表文章因为否定立杆见影竟然被从历史的旧堆里给翻腾了出来。借着谭政的问题的处理，林彪顺便也把傅钟刮了进来。罗荣桓出面给傅钟辩护，罗荣桓说这篇文章发表在他做总政主任时期，言外之意那时候的谭政尚在中南军区，和傅钟的文章没有具体的关联，而且也把傅钟的“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林彪不好说什么。罗荣桓还不同意林彪给谭政以及总政强加的罪名即所谓的系统学习是教条主义，罗荣桓认为：“什么叫系统？从实际出发研究理论，而不是从经验主义出发。以经验主义的态度学理论不行。看问题不要带片面性，所以许多东西都要很好解释。”罗荣桓还认为，学习毛主席著作就要结合学习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党史为线索学习毛主席著作。只有按照“一条线”的学习方法，才能了解毛泽东某一论断是在何种历史条件下针对什么问题而发，才能学到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而不是个别词句。这种学习方法同林彪的“带着问题学”是积不相能的。【注32】（《罗荣桓传》577、578页）罗荣桓这边反对林彪的提法，林彪那边则不断完善他自己的“理论”。“1961年1月，林彪在提出‘带着问题学’和‘立竿见影’后又添加了一些内容，形成所谓“三十字方针”[即‘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罗荣桓在同总政副主任梁必业谈话时指出：‘带着问题学，就是要到毛选中去找答案。这样提不适当。比如两口子吵架，发生了问题，如何到毛选中去找答案？还是应当学习立场、观点、方法。’梁必业在总政办公会议上传达了罗荣桓的意见。对林彪的“顶峰”论，罗荣桓也明确表示不赞成。：‘把毛泽东思想说成是当代思想的顶峰，那就没有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是一样的。马列主义向前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也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嘛！’1961年1月27日，在总政召开的青年工作座谈会上，罗荣桓作了多次即席讲话。他说：‘学毛著必须反对教条主义，要好好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小平同志讲，对毛选宣传要

反对庸俗化。只喊口号不行，不能各取所需。这个问题一定要注意。”他还说：“如何学习毛泽东思想，是学习词句，还是学习立场、观点、方法，这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对毛著引证要认真负责，不能不理解就去引，只当作招牌。”“要防止借宣传毛主席来突出自己。”1961年2月2日，罗荣桓接见了《解放军报》副主编以上的干部，他反复强调：“要领会毛主席思想的精神实质，不要满足于引证某些词句。”他说：“对马恩列斯不要教条主义，对毛主席思想也不能教条主义，不能只引证某些词句。毛主席的文章很少引证马克思、恩格斯怎么说的，但他讲的是马列主义的精神实质。”在这次接见时，罗荣桓还提出了“对林总的宣传要认真负责”的问题。他认为，把林彪“随便讲的一些话”，“不分场合报导出来，是不好的”。他说：“今天这样讲，明天可能不这样讲。客观认识是反反复复的。就那么准确？那就难了。”【注33】（《罗荣桓传》578、579页）最让林彪大感刺心的是罗荣桓就已经出现的对林彪的过头吹捧提出批评，罗荣桓说过：“在宣传时，毛主席和林总不能并提。”【注34】（《罗荣桓年谱》811页）这在一些人眼中，简直就是对林彪已经取得的权威的挑战。

1961年4月30日召开的中共中央军委常委第26次会议上，林、罗终于有了第一次正面的公开冲突。这次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合成军队战斗条例概则》（草案），会议开始还很顺利，在林彪提出对这个概则还有什么疑问时，罗荣桓发言了，罗荣桓说：“带着问题学毛选，这句话要考虑，这句话有毛病。”林彪问：“这句话在哪里呀。”列席会议的总政副主任梁必业给林彪指点了出来。林彪又问：“那你说应该怎么说啊？”罗荣桓说：“应当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精神实质，带着问题学这句话改掉为好。”林彪说：“不好，就去掉嘛。”罗荣桓接着解释说：“还是去掉好，学习毛主席著作一定要从根本上学、融会贯通。要学习、立场、观点、方法。紧密联系实际· · · · · ·。”林彪这时忽然打断罗荣桓的谈话，宣布：“好吧，散会。”【注35】（《罗荣桓传》591页）此次会议军委常委参加的除了林彪、罗荣桓以外，还有叶剑英、罗瑞卿、贺龙等，林彪当着这么多的参加者、列席者如此不留情面的打断罗荣桓的讲话，不仅从工作原则上说不过去，就是从情理上也相当过分。罗荣桓非常生气，他事后说：“讨论问题嘛，为什么这个样子？”、“难道学几条语录就能把部队建设搞好？”林彪如此令罗荣桓下不来台已经不是第一次，早在平津战役前后，林彪就借口工作上的意见的冲突要求调换聂荣臻到东野担任政委，不过，那时候林彪的态度远没有眼下这样。既然林彪不愿意正面交换意见，罗荣桓就找到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正式向中央反映这件事的原委。邓小平随后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大家基本赞同罗荣桓的意见。事隔多年之后，邓小平还对罗荣桓的亲属谈及此事，认为罗荣桓反对林彪的“活学活用”、“庸俗化毛泽东思想”是旗帜鲜明的。

继4.30冲突后，林彪要求《解放军报》从5.1节开始，要在报眼处刊登毛主席语录，并且要求语录要和当天的报纸内容相吻合，这就让报社的负责人李逸民很为苦恼，他去找罗荣桓。罗荣桓否定了林彪的说法，罗说：“毛主席语

录，找几条可以，找不到也可以。毛主席语录不可能对现在的什么事都谈到，要学习精神实质，不能像和尚念经，敲破了木鱼，还不知道西天佛祖在哪里呢？”【注 36】（《罗荣桓传》592 页）

罗荣桓如此“顶牛”，林彪当然不能视若无物。他对罗瑞卿、肖劲光等人公开抨击罗荣桓“反党”，他说：“罗荣桓的思想可不对头呢，他躲着我，主张军队向地方开炮，这不是反党吗？”林彪还因为罗瑞卿也支持罗荣桓的意见，转而对罗瑞卿发火道：“听说你也这样主张，我就反对你们！”罗瑞卿辩解道：“我没有。”林彪说：“没有？什么没有？有文件为证。”罗瑞卿说：“要是查到有此主张我就承担责任。”【注 37】（《罗荣桓传》594 页）罗瑞卿在 1972 年揭批林彪时回忆这段往事时说：“当时我感到他对罗和我意见大了。”【注 38】（同【注 37】）虽然林彪嘴上说罗荣桓反党，可并没有像对待谭政那样，这里主要还是毛泽东的一个态度。1962 年毛泽东对罗瑞卿说：“我就不同意林彪的那个意见，说军队干部对地方干部有意见不能提。”而此前毛泽东对林彪与罗荣桓之间的“斗法”没有表示出倾向来，这就让林彪暂时还摸不透毛泽东的主观意图，也因此就在林彪同肖劲光、罗瑞卿针对罗荣桓发过火气后还同时表示：“为了保护罗荣桓的健康，对罗的批评现在不要公开。”【注 39】（《罗荣桓年谱》836 页）尽管说对罗荣桓的“批评”不要公开，林彪还是说：“什么林罗、林罗要分开，林罗从来不是一起的。”1963 年新华社发表人民解放军领导人名单，林彪反对公布罗荣桓的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说：“看来我这个总政主任还是不合法的。”

林彪说“林罗要分开”，可是罗荣桓并没有因为林彪同他在工作、思想上的巨大分歧而影响他对林彪过去的历史的看法。1961 年 6 月 28 日，罗荣桓在接见第四野战军战史编委会成员谈及第四野战军战史编撰工作时指出：“林总‘三三制’、‘一点两面’等战术是贯彻了主席军事思想和战略方针，在战略战术上有发展。”【注 40】（《罗荣桓年谱》841 页）这也是毛泽东给罗荣桓评语中的那句“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的真实写照。

1963 年 12 月 16 日，罗荣桓病逝。当晚，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议室召集会议听取聂荣臻等汇报十年科学技术规划，会前，毛泽东提议大家起立为罗荣桓默哀。毛泽东说：“罗荣桓同志是 1902 年生的。这个同志有一个优点，很有原则性，对敌人狠，对同志有意见，背后少说，当面多说，不背地议论人，一生始终如一。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对党的团结起了很大的作用。”12 月 19 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林彪、邓小平等到北京医院向罗荣桓的遗体告别。党政军很多高级领导干部为罗荣桓的病故撰写了大量的挽诗、挽联，林彪也不例外。林彪写给罗荣桓的挽

联如下：六亿人意气风发，日月重光、万里长征，方期任重道远；数十年风雨同舟，肝胆相照，一朝永诀，痛失挚友知心。”

毛泽东也写了一首挽诗，这就是家喻户晓的《七律·吊罗荣桓同志》：记得当年草上飞，红军队里每相违。长征不是难堪日，战锦方为大问题。斥鷃每闻欺大鸟，昆鸡长笑老鹰非。君今不幸离人世，国有疑难可问谁？一般党史作品认为这里面有毛泽东讥讽林彪的意思。但是，这首诗是不是写于1963年12月呢？为此龚育之等人专门函请胡乔木给予解答，龚育之等人观注这首诗的手迹认为不像写于60年代，倒更像是写于林彪死后的七十年代，或者说有可能是作者在这以后改写的。胡乔木回信虽然不同意龚育之等人的意见，但同意龚育之等人的关于毛泽东诗稿手迹的论证。并说“毛1971年后再追想，记忆模糊，参以当时心情，故改处甚多。”后来，龚育之等按照胡乔木的意见加了一条关于这首诗的注释，注释分为三句：这首诗（指的是吊罗荣桓同志）在作者的手稿上未署写作时间。1978年发表时所署写作时间是根据原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同志的可靠记忆判定的。仅存的一份手稿，从笔迹上刊是写于70年代初期。毛泽东同志常对过去作的诗词加以修改。胡乔木对以上的注释做了修改，删去了第一句，保留了第二句，修改了第三句，其中第三句修改为“但现在仅存的一份手稿，从笔迹鉴定当是七十年代初期据原作的回忆重写的。作者常对自己的诗词反复书写和修改。”《毛泽东诗词选》定稿出版时，又把这第三句全部删去。【注41】（引自《党史札记二集》119、120页）不过，从诗词的内容看，正如龚育之等人质疑的那样“因为我们觉得如果像诗中那样贬斥林彪，同当时的政治情况和毛林关系难以协调（林正受毛重视，并在两年多以后被定为毛的接班人）”【注42】（《党史札记二集》119页）

林彪在挽联中把罗荣桓称作“挚友知心”，但是，当这位挚友知心告别人世不久，林彪、叶群就开始着手布置对他的政治清算了。1965年，叶群和刘亚楼妻子打招呼要她离林月琴远一点，她还和薛明说：“你们邻居（林月琴）的弟弟历史有问题”。1966年8月25日，吴法宪带头给林月琴贴大字报。同年12月，叶群指示总参批判肖向荣领导小组要对林月琴斗臭、斗倒。林月琴的弟弟李宁被迫害致死，就在罗荣桓逝世三周年的日子即1966年12月16日，林月琴的弟弟李宁妻子被捕。1967年2月14日，叶群在总政的会议上公开指责罗荣桓“反党”、“反毛主席”。本月，林彪、叶群通过全军文革小组对外表态称罗荣桓和谭政都是在总政工作做的较少、较差的主任。

#### 第四节：插手海军

林彪利用“突出政治”在打击异己者的同时开始向各处安插亲信，逐渐形成自己的政治班底，这以1962年插手海军最为明显。

1959年12月1日，在舟山以东海区训练的海军418号潜艇同“衡阳号”军舰相撞，潜艇沉没，38名潜艇员遇难。这是一起恶性事故，也是海军系统少有的灾难性事件。次年1月12日，海军航空兵第二师第五团第二大队在路桥机场附近训练时，0651号飞机飞行员杨德才驾机逃往台湾，后在台湾宜兰撞毁。接连发生的这两起事件震动了海军内部，也震动了中央军委。这两件事尘埃还没有完全落定，1962年3月3日又一次发生飞行员刘承司叛逃台湾的重大事故。于是，中央军委决定在4月2日派出以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李作鹏中将、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张秀川少将为首的由41人组成的检查团到海军东海舰队了解情况。

李作鹏，1914年出生，江西吉安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军委机要科译电员、二局参谋、二科科长。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和长征。1938年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任参训队队长。1939年起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司令部侦察科科长、作战科科长，山东军区司令部参谋处长。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兼第十六师师长。1949年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三军军长，次年任第十五兵团参谋长。后任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第四、第一高级步兵学校校长。1955年入军事学院战役系学习。1957年起任训练总监部陆军训练部部长，总参谋部军训部部长。从抗战时期李作鹏就是林彪的部下，在东北战场上，李作鹏深得林彪的器重，林彪曾经准备以李作鹏使用前方总部参谋长的名义赋予李作鹏，但是，李作鹏还是倾向于使用参谋处长，林彪竟也不强求。李作鹏和海军负责人肖劲光在东北也有一定的历史关系，早在海军草创之初，肖劲光建议李作鹏到海军工作，李没有来。这次李作鹏作为检查团主要领导莅临海军，事先肖劲光也是知情的，不但知情，林彪还给肖劲光透底。肖劲光因为自己身体、精力不济建议中央给海军增加力量，就在全军编制会议期间，林彪找肖劲光谈话，告诉肖劲光要派李作鹏到海军任常务副司令员，肖劲光也表示同意。林彪说过，要是李作鹏做不了海军副司令员，那么还是要他回到总参来。言外之意李作鹏去海军主抓常务工作已经是定不可移的。林彪派李作鹏到海军用林彪在1965年说的一句话足以说明问题，林彪说：“我就是要在海军打开一个缺口。”

海军内部接二连三出现的事故给林彪打开海军缺口提供了一个不错的机会。检查团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里，走访了上海、杭州、舟山、路桥、宁波等地区，蹲点9处、座谈会57次、个别谈话400多人，如此密集的工作量让肖劲光、陶勇等人深为不解。但是，检查团做出来的海军出现这样大的问题实质在于

“四个第一”红旗举的不高、政治工作没有放在第一位的结论显然是近几年来以“突出政治”不力罪人的又一翻版。在调查报告中，检查团给海军党委列出的“罪证”之一就是指责海军党委没有按照林彪的“四个第一”治理海军，而不按照林彪的“四个第一”自然也就是违抗 1960 年下半年的军委扩大会议的决议，这种帽子一旦扣上，海军党委的主要负责人当然清楚分量的轻重，已经有一个谭政和总政摆在那里作为教训。然而，实际上问题还远不及此，表面上所谓的突出政治被当作检验海军党委工作的一个重要标准，实质则是一个立场问题。林彪让李作鹏、张秀川来海军工作也好、指责海军党委不重视“四个第一”也罢，都是技术层面的，根本则在于要“鞭策”肖劲光看好方向，是准备滑到谭政那种人堆里，还是准备主动靠上来，这是林彪历来审视干部的头条标准。突出政治是林彪在 60 年代登场的第一个亮相，部队的高级领导能不能策应他的这个亮相是林彪最为敏感的标尺，用林彪的话说，这就是“大节”。但是，肖劲光当时显然还不能理解林彪的全盘意图，换言之即便是理解了林彪的意图，肖劲光也没有办法按照林彪的路子去做，因为像肖劲光包括后来被打倒的罗瑞卿、肖华、杨成武这些人都是毛泽东一手耳提面命栽培起来的重要干部，肖劲光本人和李井泉、陈正人、余泽鸿在江西苏区甚至被人称作“四小毛派”（即有别于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这四大毛派头子）。毛泽东在江西中央苏区丧失发言权之际还能挺身而出卫护肖劲光免其一死，这在肖劲光来说，于公于私都是任何人无法替代的感念。罗荣桓表示不能把林彪和毛泽东并列，这其实也是一大批“老井冈”的看法，肖劲光也不例外。也就是说在肖劲光的眼里，毛泽东的地位是林彪永远无法取代的，包括对毛泽东的尊敬服从也是一样。这样一来，肖劲光也就不可能主动的“靠上去”，况且 1962 年的林彪还没有到达“林副统帅”的地位，肖劲光在李作鹏、张秀川等人的报告出台后的“态度不好”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了。

李作鹏、张秀川见肖劲光没有积极的表态，就又给肖加码。总政检查组在巡视海军大院时指责海军大院的混乱程度不亚于北京的著名大杂院“管庄”，还“封”了海军大院一个“管庄第二”的外号。肖劲光因为态度不好就在 1962 年年底到 1963 年年初的海军党委扩大会议上继续遭到揭批，不过，这次揭批还不是那种撕破脸的“阶级斗争”，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去医院看望肖劲光时，两个人还一起发表了点个人的真实看法，陶勇认为检查团的结论不好接受，而肖劲光则表示这些都要用时间来检验。扩大会议后，肖劲光直接给毛泽东写信，也就是《关于海军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尽管出于做官样文章的目的勉强承认了对“三八作风”、“四个第一”贯彻不力，但其本质上并不认同李作鹏等人的结论。肖劲光在报告的最后还流露出一点“隐退”的意思，那就是随时准备罢官撤职。毛泽东很快阅示了这份报告，毛泽东在批示中说“有错误不要紧，只要改正就好”。肖劲光受这个批示的鼓舞在 7 月又给毛泽东写信，肖劲光说他可以出于大局，承认没有抓好“四个第一”的“错误”。肖劲光最后还写道：“曾经有好几次打算找主席，但没有适当机会。如果主席时间许可的话，我可随时前来。”但是，这封信毛泽东没有回复，肖劲光去见毛泽东的请求也就落空。【注 43】（《肖劲光回忆录一续》226 页）肖劲光、陶勇、康志强（东海舰队政委）等人对李作鹏、张秀川初来乍到的“软抗”令李作鹏等

人大为不满，而这些不满很快就传到林彪那里，给海军党委动一番“外科手术”的念头开始在林彪的脑袋里逐步形成。

检查团撤出不久，中央就明令发表李作鹏担任海军常务副司令员、张秀川任海军政治部主任。本来，叶群传达林彪的意思说李作鹏、张秀川到海军工作是帮助肖劲光的，而且还点明肖劲光在海军中有威望，拥护主席等优点，从叶群找肖劲光的谈话看，李作鹏、张秀川到海军并没有取代肖劲光的出发点。但是，等到海军党委扩大会议前后，李作鹏、张秀川利用突出政治来打击肖劲光、苏振华的态度已经逐渐明显起来。李作鹏指责海军没有摆正政治工作和训练工作的正确位置，并且上升到“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这样的政治高度。1963年罗瑞卿到海军宣布李作鹏、张秀川挡在海军第一线，苏振华、王宏坤挡在第二线，肖劲光在第三线。这一期间，肖劲光和李作鹏的关系虽然不怎么样，可也没有太大的冲突。但是，1965年以后风向又变了。

1965年11月，海军党委在北京召开“三·二会议”（海军党委第三届第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前，李作鹏公然给海军党委成员划线排队，李作鹏说，海军党委成员在对待突出政治的大原则上有三种态度，一种是积极正确的，一种是旗帜不鲜明的，一种是错误的。在三·二会议之前，海军内部都李作鹏、张秀川这三年来搞的突出政治的主题就表示不满意，还传出怪话说，要是按照李作鹏他们这么搞下去，那就要潜艇不潜、快艇不快、飞机不飞。还说突出政治不但没有促进军事训练反而妨害的军事训练。这些言论背后是海军党委在突出政治这一问题上的原则性分歧，同时也是针对李作鹏、张秀川的颐指气使、飞扬跋扈而来。所以，李作鹏、张秀川在海军三·二会议上的发难不仅是一个紧跟林彪的表态问题，还是一个借林彪之手清洗海军内部异己者的问题。李作鹏当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态度”，打肖劲光、苏振华、刘道生的态度。试想，李作鹏还不过是海军常务副司令员，就敢在党委会议上公开挑战海军一把手肖劲光，如果背后没有人给予支持，其谁信乎？李作鹏师法林彪采取算旧账的办法，把1962年海军检查团来时肖劲光的态度不积极配合说成肖劲光对林彪的指示早有抵触，还指称肖劲光向罗瑞卿告状是对他和张秀川的排挤和捣鬼。所谓肖劲光向罗瑞卿的告状实际指的是李作鹏准备清洗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中将出海军，肖劲光去罗瑞卿处表示自己的看法，不赞同李作鹏的意见，认为刘道生不过是给李作鹏等人提了点意见而已，不值得小题大做。李作鹏则觉得自己的权威受损，在会上对肖劲光的这件事穷追不舍。

这里有必要提一下海军第二政委王宏坤上将在海军内部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

王宏坤，（1909—1993）湖北省麻城县人。1927年参加黄麻起义。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班长、排长，红四

方面军第四军十师二十八团连长、副营长，三十团营长、团长，第十师师长，第四军军长、军政治委员，红四方面军直属纵队司令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 129 师 385 旅旅长，冀南军区副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兼第六纵队司令员，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兼桐柏军区司令员，中共湖北省委第一副书记、湖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副司令员、第二政治委员。一九五五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王宏坤是大将王树声的同曾祖的堂兄弟，在部队中的资历不浅，特别是在海军里面属于典型的老资格，毛泽东对王宏坤在建立健全海军机关请示报告制度上面曾经给予过好评。【注 44】（《毛泽东与海军将领》50 页）李作鹏、张秀川到海军以后，王宏坤很快和他们打成一片，王宏坤自己也是鼓吹“突出政治”的能手，在这个问题上他和李、张是有着很大的共同语言的。就在海军的这次“三·二会议”期间，在上海发生了批判罗瑞卿的会议，而海军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奉林彪的指示写成的给罗瑞卿增添罪名揭发罗瑞卿的“密信”成为该次上海会议批罗的重炮弹。叶剑英说过：“王宏坤是一个老同志了，但他由于严重的个人主义，放弃了党的原则。”【注 45】（《肖劲光回忆录一续》265 页）正像叶剑英评价的那样，李作鹏自感在海军里面的力量一般还不足以完全同肖劲光、苏振华对抗，所以，他对海军党委其他几位领导有着一拉一打的策略，王宏坤就是他们拉的对象，而在王宏坤来说，出于个人政治目的也需要有人继续给他提携，所以，双方一拍即合。“三·二会议”尽管没有达到搬到肖、苏的目的，但是，由此而出现的李（李作鹏）、王（王宏坤）、张（张秀川）三驾马车共管海军的局面开始逐渐形成。林彪插手海军到掌握海军的时机业已成熟，此后，在文革中，李作鹏等人再度打击肖劲光、苏振华直至完成在海军的全面的“更新换代”，这在后面还要详细描述，此不赘。

## 第五节：异调独弹

林彪不但在军队中大规模的以“突出政治”为幌子大搞对毛泽东的神化、个人崇拜运动。而且在稍后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面公开给毛泽东的错误进行极左的辩护，而林彪这么做的结果让他自己在60年代中期中国政坛上日益成长一颗耀眼的政治明星。相比林彪，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彭真等人身上的光环都在“褪色”。

庐山会议批判彭黄张周，大跃进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变本加厉。这种带有政治指令性的狂热的大跃进给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简直就是不言而喻的。根据有关资料记载，农业、轻工业生产在1959年已有大幅下降的1960年继续下降，农业总产值只完成415亿元，比1959年下降12.6%。粮食产量2870亿斤，减产530亿斤，下降15.6%。【注46】（《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162页，红旗出版社1987年版）1960年全国居民人均粮食消费量由406.12斤下降到327.24斤，降幅为19.4%。【注47】

（《曲折发展的岁月》272、273页）一些地方省份的群众向干部反映“吃不饱”的情况越来越多，李先念、陈国栋、姚依林等人下到基层去做实地考察，江苏的一个农民对姚依林说：“请你带话给毛主席，借一点粮食给我们吃，秋后一定归还，否则实在吃不饱，干活没劲。”李先念随即就把这一真实的情况写信给毛泽东做了反映。在同一封信中，李先念还坦率的告诉毛泽东：“目前国家的粮食库存已经挖不动了，群众的底子也空了。”“1961年到1962年粮食的收支情况看，亏空达到150亿斤。”【注48】（《李先念文选1935—1988》258—260页）更为严重的是大跃进造成的居民人口的锐减和非正常死亡人数的增加，据《庐山会议简史》记载：“中国人口总数在1959年是6.72亿，1960年减少1000万人，1961年比1959年减少1300万人。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千分之20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字应该在4000万人左右，这个数字还没有包括1959年和1962年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注49】（《庐山会议简史》282、283页）中央文献版

的《毛泽东传 1949—1976》也承认“当时河南有些地方（最突出的是信阳地区），已经开始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的情况。”，而且“大量出现浮肿病和非正常死亡，显然不是因为基本建设和抗旱多用了粮食而造成的，主要原因还是‘五风泛滥’，征购了过头粮。”到 1960 年 10 月，“一些农村饿死人等严重情况越来越多地反映到毛泽东那里，问题的严重程度使他吃惊。”【注 50】（《毛泽东传 1949—1976》下卷 1069、1073、1097 页）认真总结大跃进给中国带来的实际困难和进一步解决这些困难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1962 年 1 月，中央决定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以及地委、县委、重要厂矿企业和军队的负责干部 7118 人，故称“七千人大会”。这次会议的核心是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以便进一步纠正大跃进以来的工作中的错误。刘少奇在会上做了重要讲话，刘少奇对大跃进以来出现的问题、灾难和前景都做了比较切实的估计和总结。他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直接点出已经显露出来的客观存在的问题的严重性，他说：“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之于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有一部分地区还可以这样讲。在那些地方虽然也有缺点和错误，可能只是一个指头，而成绩是九个指头。可是，全国总起来讲，缺点和成绩的关系，就不能说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和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如果说这些地方的缺点和错误只是三个指头，成绩还有七个指头，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是不能说服人的。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全国有一部分地区可以说缺点和错误是主要的，成绩不是主要的。这个问题，可以由各省委、各地委、各县委，实事求是地讨论一下，作一个初步的判断。第二年还可以再讨论一下，又作出一个判断。第三年、第四年、第五年，还可以再讨论、再判断。”刘少奇还说：“一方面，我们的经验还很不够，另一方面，我们不少领导同志又不够谦虚谨慎，有了骄傲自满情绪，违反了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党内生活、国家生活和群众组织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我们在建设工作的某些方面就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

刘少奇还提倡大胆的讲真话，他说：“有一种人，虽然了解情况，但不敢说老实话，怕说了受打击。分明是黑的，他不敢说是黑的。分明是白的，他不敢说是白的。这种人勇气不够，被迫说了些假话。还有一种人，如果要实事求是，那就得承认错误，就要作检讨，就要受批评，他怕面子不好看，因而不敢实事求是。至于在经济工作中藏一手，多要一点，少报一点，这种现象就相当多了。另外一种人，为了个人利益，有意造假，有意夸大成绩，有意封锁消息、扣留信件，有意对说老实话的人进行打击报复。这就不是实事求是的问题，而是一种违法乱纪性质的错误。· · · 在共产党内，在人民群众中，不允许滋长这种风气。要抵制这种风气，要对这种风气进行斗争。”【注 51】

（《刘少奇选集》下卷 421 页、424 页、439 页）刘少奇一方面提出取消诸如“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口号，一方面指责“左”不见得比“右”好，提出有什么反什么，有左就反左。刘少奇给大跃进的诊断特别是他对大跃进的错误造成的后果的估计和毛泽东一个指头、九个指头的说法不相吻合甚至背道而驰，尤其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这在毛泽东听来十分刺耳。随后在 2 月 21 日到 23 日于中南海西楼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即西楼会议，刘少奇进一步说道：“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意揭，怕说漆黑一团。还他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做斗争的勇气！”【注 52】（《刘少奇年谱》下卷 549 页）刘的西楼讲话已经把党内存在的困难迟迟不决的主因给捅了出来。

继刘少奇的“大胆”发言后，彭真也口出真言：“毛主席也不是什么错误都没有。三五年过渡问题和办食堂，都是毛主席批的。· · · 毛主席的威信不是珠穆朗玛峰，也是泰山。拿走几吨土还是那么高。· · · 如果毛主席的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印象。”陈伯达反驳彭真的说法，彭真又说：“我的意思是不要给人一个印象，别人都可以批评，就是毛主席不可以批评，这不好。”【注 53】（《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 1026、1027 页）周恩来除了检讨属于自己分内的错误以外，还对与会者说：“党内要有正常的民主生活，乱斗争行吗？不行！随便撤职、随便开除党籍· · · 都是不行的。· · · 中央的责任是第一，大区和省委第二。中央、中

央局、省委三级都是盾，地、县都是矛。矛是攻盾的，这几天攻得好。”【注 54】（《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中卷 455 页）可见，周恩来也是主张直言敢说，把问题都说出来、说清楚。邓小平也在会议上主动提出中共中央书记处要承担主要责任，多年以后当邓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时还是如此认为的：“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注 55】（《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260 页）

面对大家的自我批评和批评，毛泽东也做了一个表态发言，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注 56】（《毛泽东传 1949—1976》下卷 1196 页）就在 1 月 29 日，林彪忽然讲了一番异调独弹的话，让全场的人为之错愕。林彪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加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要小得多。我在中央的时间是不多的，同志们知道我的身体不好，了解的情况不很全面。但是，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林彪还吹捧毛泽东说：“毛主席的优点是多方面的，不是一方面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这同我们某些同志只有一股猛劲不同，也和我们某些同志处处不振作、没有什么大的打算不同。我看，我们世界观的最主要的一个部分，最主要的东西，就是唯物主义，就是尊重事实，就是从实际出发，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按条件办事，按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办事，就是不是单凭愿望，而且要估计事情的结果，不仅仅根据需要，而且根据可能。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

很大的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几十年来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这样，我们党才能够从胜利走向胜利，从小的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好起来，更加强起来。”林彪的讲话刚刚结束，毛泽东带头鼓掌，他对于林彪的讲话的感觉是相当满意的，事后他在审阅林彪的讲话整理稿后还致信田家英、罗瑞卿指出：“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注 57】（《毛泽东传 1949—1976》下卷 1197 页）毛泽东问过罗瑞卿：“你能不能讲出这样一篇来？”罗瑞卿回答：“我怎么能讲得出来？我水平差的远，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出来。”毛泽东说：“讲不出来，可以学嘛。”【注 58】（《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207 页）

“七千人大会”应该说是毛泽东和刘少奇、林彪两个人的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虽然也做了一个长篇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发言，但是，这份讲话稿在 1966 年 7 月 1 日中央领导同志征求毛泽东意见公开发表时，却遭到毛泽东的否定，毛泽东认为发表此文在 1966 年的夏季已经“不合时宜”。【注 59】（《毛泽东传 1949—1976》下卷 1419 页）毛泽东对于在“七千人大会”上揭露困难真相，把事情说得“漆黑一团”实际是不满意的，后来江青说：“七千人大会憋了一口气，直到文化大革命才出了这口气。”【注 60】（《党史探索》，140 页，廖盖隆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而就在七千人大会结束不久的同年下半年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再度念起“阶级斗争”的紧箍咒，否定了他自己的关于民主集中制的一些精彩论述，把党内生活和国家政治向更为极左的方向推进。相对于毛泽东而言，在大跃进初期包括庐山批彭和军委扩大会议，刘少奇也有一些左的认识，但是，随着刘在基层走访、实地调查的时间越长、获取的第一手资料越多，刘少奇也就越来越感觉到问题的严重性已经超出了一般性的判断。1961 年 4 月的湖南家乡之行给刘少奇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看到大跃进造成的惨剧认真负责的对家乡人说：“中央有责任，要向你们承认错误。”、“这次教训很深刻，要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注 61】（《刘少奇选集》下卷 328—331 页）这也就是刘少奇后来在“七千人大会”中能够很坦诚的谈及错误和

后果的由来。平心而论，虽说刘少奇讲了足够的困难和错误，被有的人看成“漆黑一团”，可实际上刘少奇在讲话中无一处不注意维护毛泽东的威信，没有哪一句是直接针对毛泽东而发的。只不过，刘少奇一边维护毛泽东的威信，一边还要纠正极左的错误。这种实质保全毛泽东形象的良苦用心却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支持与肯定，反倒是遭致更大的责难乃至灾难。当时刘少奇的话音未落，就有人说什么“三面红旗究竟对不对，过十年后再来总结”，文革中更据此抨击刘少奇利用七千人大会“污蔑”毛泽东。另一方面，七千人大会后，彭德怀上八万言书抗辩，国际上一些反华势力也对中共工作上的失误横加指责，这都被毛泽东看作是“算帐”，而这些在毛泽东看来似乎又都和七千人大会不无关联。

和刘少奇同样出于维护毛泽东角度的林彪的发言则完全不同，林彪刻意维护的不但是毛泽东的威信，而且主要还是维护毛泽东的错误。林彪不像陈伯达那样直接把问题提出来，而是十分巧妙的用赞扬毛泽东的正确来总结大跃进的错误，他认为大跃进造成的损失正因为没有领会毛泽东的意图才会到如此地步，这样一来，侧面的回护了毛泽东的错误，主观上又为进一步推崇对毛泽东的个人神化、个人崇拜铺平了道路。林彪用一句“毛主席思想总是正确的”掩盖了一切错误的讨论，掩盖了自跃进以来的极左错误的根源，掩盖了他利用突出政治突出毛泽东个人的背后。事实证明，林彪在七千人大会的发言是他在揣摩毛泽东、假手毛泽东权威树立其个人上升的台阶的又一次成功的表演。

林彪自七千人大会后，他的个人地位得到强化。而刘少奇的第二号人物的形象则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大打折扣。

## 第六节：“腹诽”种种

林彪从 1959 年下半年便开始注意高举毛泽东的权威、鼓吹毛泽东的正确，不断神化毛泽东、推动全党、全军对毛泽东形成全面的个人崇拜趋势。而谭政遇难、林罗分手再到插手海军、七千人大会，林彪言必称主席、事必赞主席，被他打倒或者排挤的党内、军内高级领导人无一不给他扣上“反对突出政治”的帽子，无一不给说成“反对毛主席”，在所有人看来，林彪无疑是毛泽东最为优秀的学生，是毛泽东最为忠实的战友，是毛泽东思想最新阶段领悟最及时的知心人。然而，事实是否如此呢？在林彪的心目中，毛泽东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他又是怎么在背后真实的道出他对毛泽东的看法的呢？我们不妨做一些回顾。

早在 1949 年，林彪就在一张《新华报》的散页上面写到：“他（指毛泽东）先为你捏造一个‘你的’意见，然后他来驳你的意见。并无，而捏一老东（毛泽东）的惯用手法。”【注 62】（《林彪—1959 年以后》4 页）在这段不足 40 个字的评价中，林彪不但蔑称毛泽东为“老东”，而且还颇有心计的提醒自己如何“对付”毛泽东。由此可见，毛泽东在他的心中到底居于何等地位了。

林彪在 1950 年版的《论斯大林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书的封底上面还写到：“毛，应该照顾他，使他没有小帮帮的必要，他就不小帮帮了。政治上对其每一创举与功绩公道主动地指出来，则他自无锋芒的必要。”【注 63】（《林彪的这一生》325 页）林彪的这段话写的比较晦涩，但却在其中透露一个重要的策略，那就是在林彪看来，对待毛泽东要以“捧”为主。这也是林彪后来“独邀宠信”的秘诀之一，随着毛泽东极左错误的不断发生，党内一些领导人先后做了不同程度的抵制，只有林彪始终处于“捧”的状态中，在公开场合下，林彪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吹捧毛泽东，所谓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当地方一些领导人为大跃进造成的人口减少现象发愁时，林彪公开说：“我们这么大的国家，死几个人算什么？”【注 64】（《刘顺元传》315 页）绝口不提“大跃进”的错误。

“你先说了东，他就偏说西。故当听他先说才可一致。”【注 65】（《林彪的这一生》325 页）这是林彪写在 1961 年版的《辞海》上面的话。五十年代金门炮打时，毛泽东有一次突然问叶飞：“你用那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国民党军队里的美国人打死呢？”叶飞说：“那是打得到的。”毛泽东又问：“能不能避免打到美国人？”叶飞说：“无法避免。”晚饭后，总参作战部王尚荣给叶飞看了一张条子，这是林彪写给毛泽东的，林彪了解到毛泽东担心打到美国人引起外事上的纠缠就向毛泽东建议能不能通过王炳南（此时正在华沙和美国会谈）给美国人透露一点消息。叶飞等人大感奇怪，告诉美国人不等于告诉台湾了吗？不过，他们也都感到林彪善于紧跟、揣摩毛泽东的意图的手段确非一般。【注 66】（《开国上将叶飞》452 页）为了迎合毛泽东，林彪甚至不惜冤枉过正，这和他后来推崇搞什么“军队骡马化”等极端的都是一脉相承的。

林彪是毛泽东执政中后期的个人崇拜运动的极力推动者，但是，他在 1958 年版的《学文化词典》中“个人崇拜”条目旁写到：“他自我崇拜，自我迷信，崇拜自己，功为己，过为人。”【注 67】（《林彪的这一生》325、326 页）文革中，林彪成为“副统帅”，还不忘在 1967 年版的《毛主席语录》扉页上写下“他最大的忧虑在表决时能占多数否”。【注 68】（《林彪的这一生》326 页）

此外，林彪还说毛泽东发动的“大跃进”是凭空想胡来，说绝了，做绝了，绝则错。还背后说毛泽东“言行不一、搞权术”。【注 69】（《我所知道的叶群》214、215 页）他还对女儿林立衡说：“刘少奇在理论上比毛主席讲的透”、“拿掉刘没道理”。【注 70】（《我所知道的叶群》215 页）

在林彪的这些背后的“腹诽”和议论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和政治前台高呼对毛泽东崇拜的肉麻绚烂口号的截然不同的林彪。或许这些话更能体现林彪的内心世界的的一个侧面。

其实，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在庐山会议期间也在背后几次议论过毛泽东的缺点、弱点和为人特征。但是，这些党内的骨鲠之士表里如一，他们尽管尊重、敬仰毛泽东，可更尊重真理和客观事实，他们出于党心、党性给党的领袖正面提出意见、指出错误所在，虽然横遭祸乱，却始终以一个大写的人的姿态停留在青史当中。

刘少奇在中央工作会议的报告、发言，多次引用毛泽东的名言、名句，他所鼓吹的是毛泽东思想的真谛。即便如此，他仍旧不遗余力的整顿毛泽东在指挥经济战线中遗漏的问题、整顿国家因为大跃进面对的不景气的形势。在当时的历史背景条件下，刘少奇也只能最大限度的做到这样了。而彭真则直面毛泽东的错误，呼吁大家算清楚属于各自的“帐”，也体现出共产党人敢于实事求是的一面。

然而，这些人的所作所为在林彪的行为字典中没有留下些许痕迹，林彪背后不断讥讽毛泽东、嘲笑毛泽东甚至挖苦毛泽东，而一旦当他面对毛泽东、面对全党时，他又很快把自己装扮成最拥护毛泽东、最理解毛泽东、最忠实毛泽东的第一号政治信徒。他充分利用毛泽东晚年在政治上的种种失误、偏差乃至错误给他自己营造上台的机会、铺垫前行的基础，他把毛泽东不断神化的同时也让自己最大限度的受益于这个光环之下，这就是他常说的“大树底下好乘凉”。

《荀子·大略》云：“口言善，身行恶，国妖也。” 以此论之，晚年林彪当之无愧。

## 第四章：“文革”序幕

### 第一节：整垮罗瑞卿

罗瑞卿，1906年6月31日生于四川南充县舞凤乡清泉坝。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冬在武汉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1928年10月在上海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29年春赴闽西，组建训练地方武装，任闽西红军第五十九团参谋长，曾参加中共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先后任支队党代表，二纵队政治部主任，政委。1931年任红四军十一师政委，1932年3月任红四军政委。6月任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曾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长征中曾任红军先遣队参谋长、陕甘支队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到达陕北后任红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1936年起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教育长。1937年起任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主持抗大工作。1940年5月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抗战胜利后，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参谋长。后历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晋察冀野战军政委、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第二兵团（后为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政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52年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53年任人民解放军公安军司令员兼政委。1954年任国务院第一办公室主任兼公安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公

安部部长。从罗瑞卿的履历上看，罗是一个标准的“双一”干部，林彪把出身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的人称作“双一”，这是他衡量干部出身的一条重要标准。罗瑞卿长期工作在毛泽东的身边，属于亲任一流，而且和林彪也颇有渊源，这样在1959年彭黄倒台后，林彪便推荐罗出掌总参谋部兼任军委秘书长，且被毛泽东批准。罗瑞卿刚刚上台，林罗关系说起来相当不错，不但林彪看重罗瑞卿，包括林彪的妻子叶群、林彪手下的亲信吴法宪等人都对罗亲热有加。吴法宪公开讲过：“我们空军大院就听三个人的，一个是毛主席，一个是林副主席，一个就是罗总长。”有一次，吴法宪居然对罗瑞卿的妻子郝治平说：“苏联人把斯大林称作他们的父亲。其实，我们这些人还没资格称毛主席为父亲，我们只能将林总和总长这样的人称作父亲。”【注1】（《非凡的年代》201页）抛除吴法宪肉麻的恭维姑且不论，却道出一个现象，那就是在吴法宪等人的眼中，林彪、罗瑞卿一度并列的成为他们服从的对象。林彪自己也说过：“1960年罗瑞卿和我合作是好的。”【注2】（《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202页）这指的是1960年9、10月间的军委扩大会议决议的起草过程。也是按照林彪的说法：“从1961年起，（罗瑞卿）便开始疏远我、封锁我，到1965年便正式反对我了。”那么，事实的真相是否如林彪所说呢？

查考史料，我们发现，林彪所说的“封锁”、“疏远”和“反对”实际指的是罗瑞卿在几件大事上并无主观意识的“对抗”和分歧。当时，林彪已经一跃而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兼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主管军委日常工作，成为毛泽东在全军的第一副手。这样一个雄踞高位的领导人而且在历史上和罗瑞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也相处甚得，罗瑞卿从个人主观上是没有理由出面封锁、疏远和反对他的。但是，罗瑞卿毕竟不是政治木偶，也不是林彪的仆从，所以，他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同林彪偶尔或者说自然而然的有分歧那也是再正当不过的，然而，林彪却把这些看作是罗瑞卿的本质错误。而分歧表面上看来是由工作而来，实际上还是一个“站队”、“跟谁走”的问题。林彪曾经在备忘录中写道：“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来见面。· · ·让他做绝。”、“当作有一彭黄也。”在这里，林彪指责罗瑞卿“大捧”、“大跟”的“别人”是指罗荣桓、贺龙、叶剑英等。

在第三章的《林罗分手》里面我们提到 1961 年 4 月 30 日的军委常委会上林彪、罗荣桓的不欢而散。当时罗荣桓反对林彪所说的“立杆见影”、“带着问题学”，林彪相当不快，而在座的罗瑞卿没有表态支持林彪，此前罗瑞卿倒是 对罗荣桓的态度很感同意，这就让林彪深为不满。在林彪看来，30 日的军委常委会能够站出来首先支持他的应该就是罗瑞卿。这次迁怒还不足以影响林彪、罗瑞卿的关系，不过随后罗瑞卿因为工作的关系和贺龙的接近在林彪眼中则是个问题。1962 年秋，叶群向中央报告说林彪身体有病需要休息，毛泽东决定林彪养病期间，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还要罗瑞卿有事多向贺龙汇报。林彪自己也说：“让第一线的人放手工作，不要过多考虑我的意见。一般的问题由办公会议决定，较重要的由军委常委讨论，更重要的请示中央、主席。”1963 年 6 月，林彪还通过叶群转达了他的上述意见。然而，就当罗瑞卿真的多次开始因为工作上的事情和贺龙接触以后，林彪反而多心起来。林彪有一次忽然对罗瑞卿说：“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的领导人。”这明显指的就是贺龙，而敲打的就是罗瑞卿，肖华一语道破：“林总是不是觉得你和贺老总接触太多，同旁的元帅接近太少啊？”肖华还不好直接点出其实林彪怪罪罗的原因就是向他林彪汇报太少，所以，用“旁的元帅”代替。林彪、贺龙同属毛泽东在 1959 年后选拔上来主管军队的两位高级领导人，但是，此二人在历史上因为一些积怨素不相能，甚至牵连到家属方面，罗瑞卿有意无意的和贺龙走动的频繁，让养病在床的林彪大为不安。1964 年 8 月，贺龙、罗瑞卿去北戴河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汇报期间，贺龙建议取消掉军衔，毛泽东立予同意：“取消！搞掉那块牌牌，我早就想搞掉它。”【注 3】（《罗瑞卿传》479 页）事后罗瑞卿向林彪汇报此事，林彪迟迟没有答复，这次罗瑞卿也感到越过林彪直接和毛泽东谈及此事可能引起林彪的不快了。毛泽东一直对军事共产主义时期的东西比较留恋，这从他看好张春桥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那篇文章时就已经有所流露，作为处心积虑研究毛泽东的林彪岂能不知？像取消军衔这种直接搔到毛泽东政治痒处的“活点子”以当时的背景论，本应属于他林彪的专项，不料却给贺龙着了先鞭，而且罗瑞卿事前一点气也不透，这次事件和前两次相比，林彪已经不再是迁怒罗瑞卿了，简直就是有点愤愤不平。

更让林彪愤懑的是罗瑞卿和贺龙、叶剑英等人推崇的“大比武”运动，这场运动不但在全军上下呼声最高，而且在林彪看来那也是直接同他的“突出政治”唱对台戏的一幕。

自1960年的军委扩大会议开始，林彪多次强调突出政治，但他也说，军事应该占60%，政治教育时间不能超过军事训练。1961年，他还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军事训练要大大突出。次年，林彪委托罗瑞卿去抓一个通信部门的训练。罗认真去做了，还把林彪所说的“开得动、打得准”的口号向部队进行部署。罗瑞卿同时也时刻注意这方面的典型，随时准备树立起来供全军学习。这时，郭兴福“应运而生”了。

郭兴福原本是起义战士，1962年时是12军34师100团的副连长，他在单兵训练和小分队战术训练中有一套成型的好点子，南京军区在杭州召开现场会时曾经把这套好点子作为推广、学习的模范，还给郭兴福教学法指出了五个特点：1. 带着敌情、带着仇恨、带着问题练兵；2. 把练思想、练作风、练指挥、练动作紧密的结合起来；3. 从难从严，多学几手；4. 民主教学、因人施教；5. 重视训练场上的思想工作。南京军区总结的特点很快引起全军主管军训工作的军委常委叶剑英的关注。“1963年12月下旬，叶剑英到南京军区参加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现场会以后，向中共中央军委报告，建议在全军推广。罗瑞卿收到报告很快就向毛泽东、林彪报告，毛泽东表示同意，这样，1964年1月3日，中央军委转发了叶剑英的报告，号召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的运动。此后，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方法的群众性练兵运动蓬勃地开展起来。2月5日，贺龙、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和罗瑞卿接见了广州军区学习郭兴福教学方法评比现场会议的全体代表。贺龙说：‘兵是练出来的。过去战争时期，我们就很重视练兵。如果发100发子弹给一个新兵，就得用50发训练他打枪。表面上看，这样划不来，用100发子弹去打敌人不是更

好吗？可是，没有经过训练的战士，100发子弹不一定能打中一个敌人。相反，一个经过训练的战士，50发子弹可能打中50个敌人。’贺龙还向周恩来建议来看看，5月20日中午，周恩来等领导人在贺龙、罗瑞卿的陪同下，来到天津杨村靶场，观看轻武器射击、打坦克、汽车过钢轨桥、‘夜老虎连’训练、构筑防御工事等等白天和夜间课目的表演。周恩来看完表演说：‘你们的表演很好，我看了很高兴。练兵就是这样的练法。’‘把兵都练成这个样子，把民兵也练好，那就什么敌人也奈何不了我们。’由郭兴福教学法的推广引发的狠抓军事训练很快也得到了毛泽东的关注。6月初，毛泽东在一份反映比武情况的简报上批道：‘此等好事，能不能让我也看看。’罗瑞卿同张宗逊商量后，建议调济南军区和北京军区的“尖子”分队到北京，向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作汇报表演。6月15日和16日，在贺龙和罗瑞卿等人的组织安排下，北京和济南军区的“尖子”分队和参加表演的民兵，分别在北京西山、阳坊和十三陵，向中央领导人作了汇报表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董必武、彭真、贺龙、陈毅、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乌兰夫、陆定一、薄一波、罗瑞卿、康生、李雪峰、刘澜涛、杨尚昆、聂荣臻等，和正在北京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各群众团体的领导人，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领导人都同时观看了表演。在观看表演的过程中，毛泽东指出：‘军队无非要学会两个东西，一个是会打，一个是会走。会打，会走，军队都要学会。’‘要从困难着想。什么问题从困难着想就不怕，不妨把它多想一点，想尽。’‘要多练习，要注意普及。’‘练武还要练文，注意学习文化。’表演结束，毛泽东召开会议。他对前来参观表演的各省、市、自治区的领导人说：‘你们不能光议政，不议军啊！’他要求地方党委注意抓军事工作。指示要在全军推广“尖子”的经验。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要普及‘夜老虎连’。他指出：‘过去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白天是敌人的，晚上是我们的，抗美援朝战争也是这样。今后战争，我们还是要在晚上和敌人打。‘夜老虎连’要普及，现在可以一个营先搞一个连，将来要使全军都成为‘夜老虎’，这样，打起仗来，天下就是我们的了。’”【注4】（《贺龙传》第十九章）

在这场被冠之以“大比武”的军事训练为目的运动中，罗瑞卿追随贺龙给中央领导人提供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尖兵形象，可谓出尽了“风头”，而养病的林彪却沉默不语。1964年2月13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政委吴法宪到林彪家里拜年，汇报了空军大院的工作，林彪抓住了空军机关“内务卫生好”这个题材直接给上升到“三八作风好”的高度上，让秘书通知总政派人了解情况、组织学习，还给罗瑞卿、杨成武打招呼参加学习空军的电话会议。罗瑞卿自然不敢怠慢，马不停蹄的给空军经验予以表彰，当然调子都是林彪已经定下来的，即便是这样，罗瑞卿也提醒了空军领导人一句：“办事要认真，工作要落实，经得起考验，不要翘尾巴。”实际上空军的这个所谓“三八作风好”不过是窗明几净、大搞卫生的同义词，和南京、广州、北京等军区搞的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的军事训练根本无法相提并论，罗瑞卿之所以前去加以肯定，其实心中何尝不知这是碍于林彪的面子，要执行林彪的命令。然而，就是这种花架子空泛的“内务卫生好”居然在同年2月29日给林彪说成：“今年全军的标兵是空军”。1月，中央军委已经发出指示要求全军认真学习郭兴福教学法，2月，贺龙、叶剑英、罗瑞卿莅临检查也发表了类似的想法，林彪当时没有表态。事隔不过半个多月，林彪却突然表态了，他的表态摆明就是对推广教学法不满。罗瑞卿或许对林彪提出空军作为标兵的背后注意不够，不但没有顺着林彪的态度发展，反倒是在9月的会议上大面积的肯定“大比武”的成绩，还要求全军上下把比武坚持下去。10月，全军训练工作会议在京西宾馆召开，林彪表面上同意了叶剑英转来的普及二级尖子的方案，却另外派了叶群到参加总政主持普及尖子经验的政治工作座谈会，叶群得知有些地方利用比武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回来就把这个情况报给了林彪。林彪本来就对贺龙、叶剑英、罗瑞卿在大比武问题上占尽风光很有不满，听到叶群的报告如获至宝，林彪要叶群到广东收集这方面的资料。

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那时候还没有完全站到林彪、叶群这边来，有些事情叶群也就没有必要和他事前通气。黄永胜在65年3月同罗瑞卿诉苦说“生产部队到插秧季节了，如果上课时间不去上政治课，就说你不突出政治，如果你抢时间插秧，就说你是生产冲击了政治。”【注5】（《罗瑞卿传》500页）可

见，黄永胜对林彪一味宣扬的“突出政治”也有怨言。所以，这次叶群下到黄永胜推荐的部队前没有向黄永胜“交底”，否则黄也不会次年抱怨“突出政治”。叶群下到部队，在党支部会上就说大比武是背着林副主席搞的，林副主席说话不灵了，被架空了。叶群的讲话把林彪想要说而说不出口的东西摊了出来。“大比武”并非白璧无瑕，可叶群等人的挑毛病也并非“治病救人”，他们的目标是通过打垮“大比武”这个概念进而达到“独邀天宠”的目的。叶群等先后给总政党委和林彪等军委领导人写了4个调查报告。在一份题为《对三七九团一连3个“尖子”班情况调查》的材料中，列举了移苗并丘，拼凑“尖子”；重军事技术，轻政治思想；追求锦标，弄虚作假；歪风邪气，庸俗下流；管理简单粗暴，影响内外团结等10个问题。在另一份《关于军事训练问题》的报告中说：“今年的军事训练不够正常，它打破了正常的生活秩序，四个第一受到冲击，败坏了部队的作风。许多干部战士整天忙于扣眼(射击)、扣米(投弹)，扣一、二、三(单双杠)、扣一条线(队列)，很少关心世界大事、国家大事、党的大事……”最后，她说：“长此以往，部队培养出来的将是没有政治头脑的‘木头兵’，‘木头官’，而不可能是红色的接班人”。叶群等人的报告等于把“大比武”置于“突出政治”的对立面。而从以往的经验看，无论是谭政，还是罗荣桓、肖劲光，一旦给设定到“突出政治”的反面，他们的下场便会十分不妙。

1964年12月28日，林彪收到叶群报告后找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唐平铸谈话。林彪说：“今年的比武把政治工作冲垮了。明年要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单纯技术观点，反对单纯生产观点。比武挤掉了政治工作，第一步要恢复比武以前政治工作的地位，第二步提高政治工作。”林彪认为大比武否决一切，他又何尝不是用“突出政治”来取代一切呢？这次林彪讲话中的“反对单纯生产观点”和以后张春桥、姚文元多次鼓吹要批判的所谓的“唯生产力论”有着异曲同工的地方。林彪的指示传来，罗瑞卿很紧张，他对刘志坚说：“那今年我们岂不是犯了路线错误？”林彪的指示在12月29日便形成了《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的未定稿。这个指示在罗瑞卿理解还是“局部的情况，不是指全体”，其实林彪对于大比武到底是否冲击了政治、掩

盖了突出政治并不特别关注，他所要关注的是“人”的问题，这也就是他一直所说的“人”的因素第一的奥妙所在。

1965年1月3日到5日、6日到8日，在北京连续召开多次军委办公会议，会议的内容就是传达林彪的指示，听取总政工作组汇报在广州军区379团蹲点的情况等。在谈及379团大比武中的问题时，与会的一些大军区负责人深表不满，对于工作组无限夸大问题、言不及义、以点带面的做法予以抨击。当然，也有对工作组意见表示拥护的，例如空军的吴法宪和海军的李作鹏都是支持大比武冲击了突出政治的观点的。尽管如此，会议也几乎是以一边倒的倾向支持1964年搞的军事训练工作，罗瑞卿尽可能的顾及林彪的指示，他所作的总结发言“和稀泥”的意味显得比较突出。会后，叶群对罗瑞卿说：“林彪同志说了，一定要突出政治。但他又不放心，怕搞上去了的军训成绩又垮下来。”叶群转达的林彪的意见相当圆熟、老到，这种话是一柄双刃剑，一俟罗瑞卿提高军训比例，那么就可以用“突出政治”来压迫；一俟罗瑞卿提高政治工作，那么军训成绩的下降就成了罪名。林彪这么左右逢源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当时毛泽东不但看了大比武而且还肯定了大比武，他要在围绕尊奉毛泽东意见的基础上打击异己者，这也是他后来在文革中连续击垮对手的招术。

林彪、罗瑞卿关系紧张，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以重病之身出面调解。刘亚楼曾任红军陕甘支队（红一、三军团改编为陕甘支队）第二纵队副司令员，罗瑞卿时任二纵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任抗大副校长后，刘亚楼就接任教育长的缺。二人因为性格接近，关系相当不错，有些不便对外人讲的话，罗瑞卿也不瞒刘亚楼。而刘亚楼和林彪夫妇的关系也不浅，东北前线刘亚楼是林彪的参谋长，不但在军事上襄助林彪，而且在生活上也颇多照顾，甚至连林彪的家务刘亚楼也曾费心有加，一度流传的东北时期叶群挨打、刘亚楼劝架也是据此而来。此外，刘亚楼还是毛泽东的“爱将”之一，1939年刘亚楼奉命去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肩负更为重要的责任就是负责把中共党内几次左倾路线危害以及当

时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向共产国际负责人做系统、翔实的汇报，同时刘亚楼还负责把毛泽东撰写的《矛盾论》、《实践论》和《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几本书介绍给季米特洛夫。刘亚楼到苏联后成功的完成了毛泽东交给他的政治任务，为共产国际支持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奠定了一定的基础。【注 6】

（《刘亚楼将军传》175、176 页）刘亚楼晚年患肝癌，当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说刘亚楼病情有所好转时，毛泽东非常高兴，还为此做了批示，由此可见毛泽东对刘亚楼的重视程度。惟其如此，刘亚楼的这种特殊身份才能出面调停林、罗之间的日益增加的嫌隙。

1965 年 2 月，罗瑞卿到上海汇报工作，刘亚楼约罗瑞卿见面。刘亚楼对罗瑞卿开门见山的说：“林总对我说，1961 年那次发脾气，不是针对你的，主要是对罗帅不满而迁怒于你。林总还说，现在几个大将中，论身体、论资历、论能力、论对主席跟得紧，我不用他用谁呢？”刘亚楼还转述林彪的话要罗瑞卿不要误会，刘亚楼说：“只要你们的误会消除了，我刘亚楼上八宝山也安心了。”刘亚楼还对罗瑞卿说：“叶群是好人，是做团结工作的。”、“林总说了，就是肖华、杨成武跑了，他都感到不要紧，你们两个罗（另一个罗就是罗荣桓）要是跑了，他就会感到很伤心的。”【注 7】（《罗瑞卿传》498、499 页）罗瑞卿当然明白刘亚楼话中有话，他也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作为结束语：“大家不都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干革命几十年了吗？”

事后，罗瑞卿又去见林彪，林彪一反过去激烈反对“大比武”的态度，温和的告诉罗瑞卿：“去年的军训，至少有四好，用心好、方法好、内容好、效果好。但是，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部队中一些庸俗事都会出来。以后快打仗时，还可以搞比武、搞突击，但今年不搞。”林彪忽然给“大比武”总结了“四好”，这不是偶然的，他已经知道了刘亚楼同罗瑞卿谈的比较愉快的事情，他之所以一改当初批判大比武的态度并非他在这个问题上有了什么实质性的松动，而是利用总结大比武的“四好”安抚罗瑞卿，或者说点一点罗瑞

卿，让已经“掉队”的罗跟上来。林彪还说：“我不会有啥事，就是有啥事，我绝不牵连你们，我的妻子儿女我也不牵连他们。”林彪在这里把罗瑞卿和他的妻子儿女放在一处类比，其个人目的已经比较明朗，罗瑞卿进一步还是退一步都在指顾之间。后来罗瑞卿回忆说：“这是林彪对我的最后一次争取。”【注8】（《罗瑞卿传》499、500页）

罗瑞卿并非不想和林彪搞好关系，也并非就准备在一些问题上和林彪进行对抗。但是，事关原则，罗瑞卿不可能完全照着林彪的意见去办，在罗的印象中，林尽管重要或者说很重要，不过比起毛泽东来还是次要。还有一点就是罗瑞卿和罗荣桓、谭政、肖劲光这些人有着一个比较共同的地方，他们都是无条件的尊重、服从、崇敬毛泽东的军内代表人物，可是他们对于那种无端、盲目神化毛泽东的举动并不认同，从他们跟随毛泽东的历史进程来看，承认毛泽东是领袖、统帅、导师都可以，可要他们承认毛泽东是至高无上的“神仙皇帝”，那就大谬不然了，而且他们始终认为毛泽东也是反对把他自己进行神化的。而自从六十年代初期开始的日渐狂热的个人崇拜运动不但摧毁了他们的这个信念，也摧毁了他们的既有地位。这或许是罗瑞卿乃至谭政等人的悲剧原因所在。

林彪本意这次会面或可以让罗瑞卿转向，不料罗瑞卿的继续表现很快就让林彪失望。1965年《解放军报》社起草了一篇题目为《突出政治就是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泽东思想挂帅》，其中第一个小标题是“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罗瑞卿对于这种提法颇感陌生，大家告诉罗这是林彪在上海说的原话，罗瑞卿没有马上同意编发，而是征求了素有“理论家”之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的意见。康生也对这种“最高最活”的说法表示疑虑，还要罗瑞卿最好问问毛泽东自己，康生个人的意见还是按照中央以前的提法为妥。罗瑞卿就按照康生的这个意见把最高最活给删除了。这样的事，罗瑞卿不是第一次和林彪唱反调，1961年年底为林彪准备中央

工作会议发言的稿子，叶群就曾经提出要增加一句“毛泽东同志的个人天才”，罗瑞卿当时就反对用天才的提法，叶群还引用斯大林的例子准备说服罗，罗干脆端出田家英来，说“毛泽东思想是在党和人民集体奋斗中形成的”是田家英提的。罗的意思是说田家英乃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如是提法一定也是通过毛泽东认可的。但是，叶群根本不买帐，叶群说不用天才的说法就是客观上贬低了毛泽东思想。这件事后来传到林彪那里，林彪索性抛开罗瑞卿给他组织的这个写作班子的思路，自己另起炉灶。1965年6月29日，总政为再版《毛泽东语录》起草的前言中还有“最高最活”这句话，罗瑞卿这次专门向田家英本人征求意见，田家英反对这种提法，田家英告诉罗瑞卿，他们在长沙同王任重、陈伯达、陶铸等人协助毛泽东润色几篇文章时就明确反对使用诸如什么活马克思主义、死马克思主义或者臭马克思主义这类似是而非的用语。至于说到最高最活，一则从来没有人这么提过，二则也不确切、不好理解。最高，是不是今后没有更高的了？最活是不是还有次活？难道马克思等人的著作都是死的不成？顶峰论的提法也不科学，到了顶峰是不是不要发展了？罗瑞卿把田家英的原话予以传达，“最高最活”自然再次给删除。前后三次删除或者反对林彪的“神化毛泽东”用词，而且在一些公开场合下，罗瑞卿对林彪的提法的评价在毛家湾看来也欠“尊敬”，例如林彪说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时，罗瑞卿就说过“也不能乱冲一气”，林彪针对政治和军事的比例说了一番道理：“政治冲垮了，一切都冲垮了，军事训练也冲垮了，政治不好，打起仗来往后跑，军事再好有什么用。”而罗瑞卿当时指出：“红与专是辩证的关系，政治好了，也要把其他工作搞好，政治工作要保证完成训练和各项任务，否则，天天讲突出政治，业务工作总是搞不好，提不高，那就是毛主席所说的空头政治家。”罗瑞卿还和贺龙等人说：“军事技术过不了硬，打起仗来也可能向后跑”。

罗瑞卿不但对林彪“欠尊重”，对于林彪的所谓“宠儿”也不能像林彪那样“爱护”他们。在林彪插手海军的过程中，罗瑞卿尽管前去海军党委宣布过李作鹏、张秀川挡在第一线的话，可是对于李作鹏、张秀川搞肖劲光、苏振华，罗就不支持，他还反对把海军内部的枝节问题说成什么路线斗争，罗瑞卿还托人带话给张秀川，要他注意联系干部群众，夹着尾巴做人，谦虚谨慎等。李作

鹏在海军内部批臭肖劲光，总政副主任刘志坚说：“肖苏不能动”，李作鹏还掉了眼泪。罗瑞卿对李作鹏说：“因为这个话你心脏病发作吸了氧，何必呢？”言外之意对李的惺惺作态并不以为然。而对于林彪夫妇有些恶感的人，罗瑞卿非但没有“同仇敌忾”，反而“倍加同情”，军委办公厅主任肖向荣增就叶群主动要求授予她大校军衔的问题上得罪了毛家湾，肖向荣说：“如果给你（叶群）授予大校，我们这里好几个处长怎么办？”北京市公安局发现在东安市场上有一些印有林彪图章的旧书出售，怀疑有人盗取毛家湾的东西，肖向荣派人去了解，结果是叶群搞的把戏。叶群要公开在军委办公厅做突出政治的报告，肖向荣因故未能出席被叶群视作对她的蔑视。本书第三章第二节《林罗分手》中介绍过因为办东野干部子弟学校的事，罗荣桓的妻子林月琴和肖向荣的妻子余慎早就开罪了叶群，如今新帐老帐一起算，肖向荣的倒台自难避免。

打掉肖向荣其实也是林彪向罗瑞卿发难的第二步，此前也就是1965年4月，林彪上报中央和毛泽东，借口帮助罗瑞卿，增加杨成武为军委副秘书长的同时担任总参第一副总参谋长，这是林彪分罗瑞卿权的开始。如果杨成武的提升还只是林彪对罗的分权，那么搞掉肖向荣那就是对罗的警告或者暗示。1965年11月19日，军委办公厅党委召开扩大会议批判肖向荣，罪名当然还是老一套“反对突出政治”，罗瑞卿很快就表态反对把肖向荣说成“彭黄集团漏网分子”的提法，林彪则意味深长的说：“要杀鸡给猴子看。”林彪所指的“猴子”自然就是罗瑞卿。

然而，直到这时罗瑞卿还没有意识到他自己已经成为林彪下一轮打击的对象，他还在忙碌于落实林彪关于“加强通气”的指示而奔忙。1965年5月间，林彪对罗瑞卿说：“今后要加强通气，这样我才好工作，这是组织原则。”加强通气本身没有错，而林彪在这里强调的是和他林彪加强通气，一旦罗瑞卿和其他的元帅比如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时的加强通气，林彪便视作为异端，叶群还

为此语多讥讽的说：“总长啊，我们这里是个病人，又不会钓鱼，又不能打麻将。”林彪说罗瑞卿过去通气不够，还给罗搞了一个约法三章。1. 加强通气，遵守组织原则；2. 我在北京时，三日通气一次；3. 我不在北京时，五日通气一次；4. 重大问题，立即通气；5. 来我这里，不要事先通知。罗瑞卿表示能够办到。此后的日子里，罗瑞卿为了落实林彪的这个指示，不断加强和林彪的“通气”，可林彪似乎要通过这个通气给罗找到更多的茬口作为日后清算罗的证据，当然也有通过通气考察罗的紧跟程度的涵义。

1965年5月，北京召开作战会议，安排了一次接见，毛泽东不在，中央常委负责接见，罗专门问过林彪要不要也去，林表示不去了。哪知道接见那天，林彪不但去了还大发其言，还在5月25日下发的简报批示上对罗瑞卿横加指责。总政搞了一个文件和一个名单是所谓的干部评级定薪的。罗瑞卿要总政副主任徐立清请示林彪示下，但是，叶群回复说林彪身体不看了，汇报也不听了，军委办公会议讨论即可。不料，既成事实后，林彪大为不满，叶群代为转达说：“刚刚规定的要通气，为什么又不通气？”结果，罗瑞卿、徐立清都不得不做了自我批评。

为了满足林彪加强通气的愿望，罗瑞卿可谓殚精竭虑，1965年8月，罗瑞卿冒着大雨雷电跑到林彪住处，也是为了通气，这连林彪也有些过意不去，连说：“下这么大的雨也来了。”但是，这次当时还算满意的通气在几个月后的上海会议围剿罗瑞卿时，居然给说成对林彪的一次突然袭击，说是罗的汽车开到门口林彪才知道。【注9】（《非凡的年代》194页）罗瑞卿对林彪说过：“我知道毛主席和你都是最痛恨不通气的，我今后一定按规定办。”，罗瑞卿还对叶群讲过：“我同林总的关系是棒打不散的。”【注10】（《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258页）罗瑞卿怎么也没有想到他这边考虑的是如何加强通气，林彪、叶群那里已经南辕北辙的思考如何打倒罗瑞卿了。

在打倒罗瑞卿问题上，有几个人的特殊“贡献”不能不提。一个是海军的李作鹏、张秀川，一个是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1965年10月15日，海军政治部主任张秀川给林彪送来揭发信，这份揭发信谈及的是海军党委有过一份报告给军委，提出：当苏振华、王宏坤不在时，由李作鹏、杜义德负责，而罗瑞卿对这份报告批示了同意，这样就是以王宏坤取代李作鹏，把李作鹏降格对待。张秀川还揭发说，9月17日罗瑞卿和李作鹏、张秀川谈话时说此事给林彪报告了。林彪接到张秀川的来信后批示指责罗瑞卿的谈话是“纯属造谣”，在材料内还批示“从未报告”。【注11】（《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266、267页）这份材料总体价值不大，林彪让秘书给李作鹏打电话，口授指令要李作鹏写一份近年来海军两种思想斗争的情况，主要写罗瑞卿、肖劲光的表现，重点是罗。1965年11月27日，海军李作鹏、王宏坤、张秀川给林彪写去联名信，揭发罗瑞卿的“十条罪状”，成为后来上海会议炮打罗瑞卿的一发炮弹。【注12】（《肖劲光回忆录一续》249、250）

相对而言，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的材料显然比上面的东西还要有些力度。雷英夫，河南洛阳人，1938年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历任军委作战局副局长、总参作战室主任、军委战略小组成员兼办公室主任、总参作战部副部长，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李作鹏等人的材料是林彪授意下完成的，而雷英夫的材料则是林彪夫妇向他交底后主动写的，罗瑞卿女儿罗点点在回忆这段往事时说过：“他太迫切地想讨林彪和叶群的欢心，在材料里把自己说成是对爸爸观察了六年，早就独立发现爸爸有问题的人。”【注13】（《红色家族档案》183页）雷英夫在材料中写道：“林副主席，我多次想向你报告一件事，但因事关重大，未找到适当的机会不便轻率。我觉得罗总长（罗瑞卿）骄横、懒散，心怀不测，值得警惕。我的这个感觉，是经过六年时间观察得出来的，六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九六二年五月，去上海修改“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以前，我对罗总长是极为信任和尊敬的，认为他是坚定执行主席和你的指示的人，是主席和你最信得过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接班人。一九六二年五月到今年七月，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我对他产生了怀疑，感到他的一些做法不对头，甚至对你的一些指示也不是心悦诚服的，特别是你提出的突出政治，他是不赞成的，实际

上是带头抵制的，只是采取了两面手法，搞了一些伪装，但这个时期我对他的本质还看不透，总是从好的方面想他。直到今年七月在参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和修改罗总长9月3日的讲演稿时，我才发现他是心怀不测的人……”【注14】（《罗瑞卿传》523、524页）

林彪夫妇收集了他们认为可以派发出去的打倒罗瑞卿的炮弹之后，还不急于和罗瑞卿翻脸，相反还给罗放出一些烟幕。叶群对罗瑞卿的妻子郝治平说林彪、罗瑞卿的关系就像《红楼梦》中的贾宝玉与林黛玉，还送给罗瑞卿夫妇鲜花表示两家的关系是既要吵又要好。罗瑞卿最后一次见到林彪时，偶尔说起自己牙疼，林彪马上说：“牙疼吃莲子炖鸭子，一吃就好。豆豆（林立衡）几次牙疼，一吃这个就不疼了。”这番临别赠言在罗看来实在想不出怎么会在半个月之后就得到眼前这位林副主席的截然不同的另类关照呢？

林彪准备打倒罗瑞卿除了上述的所谓材料和已经布置的手段，最为主要的还需看毛泽东的眼色。没有毛泽东的批准，罗瑞卿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给打翻在地。说到毛泽东对罗瑞卿的信任，全党皆知。毛泽东多次讲过：“天塌下来有罗长子顶着。”、“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罗长子是罗瑞卿的外号，这是红四军“八大”期间，毛泽东再度见到罗瑞卿时送给罗瑞卿的，后来成为党内领导干部称呼罗瑞卿的亲热叫法。罗瑞卿对待毛泽东始终是以领袖兼导师为标准的，在他的心目中，毛泽东就是他政治生命中的一切，其虔诚程度相当强烈，这也是他后来在遭到批判时选择自杀的原因。罗瑞卿为毛泽东的生活起居、警卫安全算的上全心全意，为了保护毛泽东，罗瑞卿在建国后已经不年轻的情况下学会了游泳，罗不但关心毛泽东的健康、安全，还如一的关心毛泽东的亲属。毛岸青、邵华夫妇从东北回到北京居住，是罗瑞卿亲自安排总参管理局给岸青夫妇找房子，直到多年以后，毛岸青和邵华的生活还是由总参管理局负责照看，这是罗瑞卿立下的规矩。【注15】（《红色家族档案》152页）邵华在四清运动开始时希望到下面锻炼锻炼，罗瑞卿考虑到综合

方面，没有同意，后经过邵华的坚持，罗就把邵华安排到北京近郊的地方，便于回京。这件事可能经他人之口传播给传走了调，让毛泽东误以为罗瑞卿干预他的家务，把罗瑞卿列席政治局常委会的资格给取消了，罗知道后毫无怨言，此后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向毛泽东解释，邵华下乡是邵华自己要求的，与罗瑞卿无涉，毛泽东这才明白过来，罗瑞卿也恢复了列席常委会的资格。【注 16】（罗点点著《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点点记忆》153 页）

罗瑞卿对毛泽东的忠心耿耿不仅体现在上述生活、警卫等技术问题上，而且还体现在政治生活中。毛泽东建国后历次政治斗争里坚持的原则，罗瑞卿无一不予以遵循、紧跟。高饶事件时，毛泽东训诫罗瑞卿说他蒙在鼓中，罗瑞卿很快矫正自己的政治嗅觉，积极的投身到斗争中去。1954 年 3 月下旬召开的东北高级干部会议上，罗瑞卿作为中央派到东北的观察员亲自指导会议进程，他在发言中批判东北局存在一个“高岗反党集团”，而且他和林枫一道都很欣赏有的人把张明远、张秀山等人描述为高岗的“五虎上将”的比喻，他还把会议情况和这个比喻都汇报给了中央和毛泽东，得到毛泽东的认可。【注 17】（《我的回忆—张明远回忆录》393、394 页）第一次庐山会议批彭，罗瑞卿也毫无例外的站在了毛泽东这边，对彭黄等人进行现场批判，著名的“7 月 23 日夜事件”就和罗瑞卿有着一定的关系。（详见本书第二章）

毛泽东赞扬过罗瑞卿，而且不止一次，也批评过罗瑞卿，而且相当严厉。对于赞扬，罗自然喜出望外，对于批评，罗也从不恼火。毛泽东有一次说：“受到我批评最厉害的是汪东兴同志，除他之外还有罗瑞卿同志，我骂过他们，要他们从房子里滚出去……我狠狠的批评了他们，但他们从来不恨我，听罗瑞卿说，这些批评对他来说是有好处的，这样能使他谨慎小心一些。”【注 18】

（《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140 页）毛泽东在延安时送给罗瑞卿的两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尽管没有给罗瑞卿琢磨明白，可也一直

享受着罗瑞卿对它们的高度重视，而且还把这种重视传染给了子女。【注 19】  
（《红色家族档案》144 页）

这样一个大背景下，毛泽东会同意林彪的看法吗？林彪是相信事在人为的，也相信自 1960 以来的越来越左、左的离奇的政治形势的，正是它们帮助林彪找到了压倒罗瑞卿的最后一根稻草。

林彪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来提倡的极左的东西，相当多的东西是迎合毛泽东的口味去的，而且也得到过毛泽东的赞同。罗瑞卿他们尽管对毛泽东一样的忠诚，却没有如此鲜活的点子、办法，而且他们也不认为单纯的依靠这些就是对毛泽东的无限忠贞。在突出政治这个问题上，罗瑞卿和罗荣桓等人有着相似的见解，自然也就和有的人有着极大的分歧。在有的人看来，罗瑞卿赶不上来了，掉队了，不如以前那样嗅觉灵敏了。甚至是“阳奉阴违”了。而除了突出政治、四清这些运动外，毛泽东在 1965 年已经开始酝酿更大的政治风暴，准备利用这场风暴彻底洗涤他心中的中国版的修正主义，能够成为这场风暴的得力的助手，在当时的毛泽东的印象中，林彪无疑是首选。在林彪、罗瑞卿这个天平上，毛泽东自然也就要毫不犹豫的把砝码加载在林彪的一边。这不但是形势所至，也是情理之中，政治家首先考虑的是政治上的成败利钝，而不是个人感情上的婆婆妈妈，毛泽东也不例外。

正是看中了毛泽东的这处“软肋”，林彪才选择要叶群出马亲自到杭州告状。从杭州告状的前后，我们可以看出林彪在政治角逐某个阶段的“老辣”远非叶群等人可比。叶群作为林彪的信使从苏州赶往杭州，林彪亲口交待她要躲开什么人，直接见到毛泽东，叶群还不十分了解林彪的套路，到了杭州还给林彪说准备写个东西送上去，林彪当时就骂她：“你糊涂、真蠢！”意思就是要叶群必须直接见到毛泽东才行。【注 20】（《回首文革》第二卷 710 页）当时负责

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是张耀祠，他也回忆说，叶群原本把东西已经交给他了，后来又转回来说林彪亲口说要她亲自交给毛泽东。【注 21】（《张耀祠回忆毛泽东》29 页）叶群和毛泽东谈了大约 4 个多小时，张耀祠中间进去催了三次，叶群才从毛处出来，出来时“得意洋洋”。据张耀祠回忆，叶群和毛泽东主要谈的就是罗瑞卿，叶群说罗已经掌握了军队大权，又掌握了公安大权，一旦出事损失太大，他的个人主义，已经发展到野心家的地步。果然不出林彪所料，毛泽东见了叶群之后，特别是面谈之后，“对罗瑞卿的看法变了”【注 22】（《张耀祠回忆毛泽东》31 页）

叶群此次前来，林彪是专门有信给毛泽东的，这就是 11 月 30 日林彪写给毛泽东的信，信中抬头为了保密，只说“有重要情况需要向你报告”，信尾还说“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12 月 2 日，毛泽东就对林彪的这封信作出回应，毛泽东批复说：“完全同意你的看法· · · · · 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把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注 23】（《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283 页）毛泽东这里所指向的就是罗瑞卿，叶群汇报结束，毛泽东派汪东兴乘专列送她回去，不在杭州停留，立即返回。毛泽东还在杭州很快接见了总参第一副总长杨成武。处理罗瑞卿的问题就这样提到了日程上来。

此前也就是 11 月 25 日，林彪动笔写信的前五天，罗瑞卿在上海，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告诉罗瑞卿说：“毛主席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文章十分不满。”陈丕显还把毛泽东指示他出小册子的提议告诉了罗瑞卿，他对罗说：“我谁也没有讲，但可以告诉你一下。”陈丕显告诉罗瑞卿这件事是不是事先得到了毛泽东的批准，不得而知。等到罗拿到姚文元的小册子在次日和毛泽东谈起时，毛泽东一笑，什么也没有说，罗瑞卿提出去苏州看看林彪，毛泽东说话了：“去看看好，要他好好保养，要保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做 3 个小时的报告。”当晚，罗瑞卿和江青见面，谈起文艺界的一些问题，罗

表态《解放军报》可以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他还亲自打电话给彭真告诉彭这件事，建议彭真《北京日报》、《解放军报》同时转载，彭真没有明确回复。

【注 24】（《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277、278 页）11 月 27 日罗瑞卿见到林彪，双方泛泛而谈，林彪一点也没有流露出对罗的不满，反而关系罗的身体。罗瑞卿对这次见面很感满意，他对妻子郝治平说谈的很好，两个人因此心情不错。罗瑞卿从苏州回上海立即飞往南宁，以后又转到云南，林彪的行动也同时开始了。

1965 年 12 月 8 日，中央决定在上海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集中解决罗瑞卿的问题。这次名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的上海会议仅从组织角度看就有很多疑问，作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的刘少奇居然问贺龙开的是什么会，贺龙说：“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被称为“准常委”的彭真也不知道会议的内容，还是周恩来给他透露了一点他才知道。而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邓小平、西南局第一书记的李井泉也是事前一无所知。这些政治局的重要成员对会议毫无所知，倒是一些连政治局乃至中央委员会都没有进来过的人对会议知道的一清二楚，叶群从毛泽东处出来就给空军吴法宪打了电话，李作鹏、张秀川也是会议的知情者，这种看起来莫名其妙的不正常的组织程序比起庐山会议还不如，庐山批彭不管怎么说也还是常委间先行通气，然后布置批判，这次上海会议，7 个常委知道的不占多数。由此作为发端，以后类似上海会议这种党内政治生活极不严肃、极不正常的东西一再冒了出来，一直延续了十一年之久。（直到文革结束）所以说，上海会议等于说从组织角度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序幕。

12 月 10 日，罗瑞卿在云南视察，秘书告知要他去上海参加会议，至于会议内容不清楚，罗瑞卿问阎红彦（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第一政委）阎红彦也不知道，罗就问彭真，彭真直说：“你去吧，去了就会知道。”罗瑞卿没有从彭真无奈的口吻中得到提示，更没有想到他所要面临的会议竟然是以整他为

主题的。罗瑞卿是 11 日飞抵上海的，毛泽东知道罗瑞卿要来参加会议时，还说：“罗回来好嘛，全体参加会议的同志都去机场接他。”【注 25】（《陈丕显回忆录》39 页）毛泽东为什么作出如此建议，已经很难揣度出他当时的真实想法了，不过毛泽东的提议没有通过，还是周恩来建议陈丕显去接罗瑞卿夫妇，邓小平还告诉陈，不要对罗他们说什么。和陈丕显同去的还有空军的吴法宪。以往恨不得要把罗瑞卿看作“父亲”的吴法宪一改常态，没有给罗拉车门，也没有给罗脱大衣，而且对郝治平的态度也是生硬的很，罗瑞卿夫妇也觉得奇怪根本没有多想，在车上陈丕显顾左右而言他，就是不提上海会议的内容。一路尴尬到了事先给罗安排的住处—建国西路的一处洋房中，周恩来、邓小平早就等在那里，这时候罗才感觉事态不妙。

就在罗瑞卿到达上海之前，上海会议上叶群已经给罗瑞卿定了性。会前，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谢富治东张西望的找罗瑞卿，没找到，就问：“罗总长怎么没有来？”没人回答，谢富治后来又问罗瑞卿怎么没有来，是不是忘了通知他？这时，叶剑英回答了一句：“主席不会忘事。”【注 26】（《张耀祠回忆毛泽东》31 页）此次会议是毛泽东亲自主持的，采取了背靠背的方式，也就是问题所有人罗瑞卿没有到会，其他人就他的问题开展批判，讲话最多和最为活跃的当属叶群和雷英夫。叶群讲的主要内容就是罗瑞卿如何逼林彪退位，还说罗瑞卿去见林彪时说“病号，不能干扰，应让贤”，出门时又说“不要挡路”，林彪气的昏厥过去。叶群还说，林彪对她讲了我是让贤的，但国防部长是主席、中央封的，我让贤也要让给真正的贤者，罗凭此不能让给他。最为离奇的是叶群还把死人拉了出来，刘亚楼此前已经病故，叶群说刘亚楼生前跟他说过四点意见，还说这是罗瑞卿交待他要他和叶群讲的，四点意见是：1.林总早晚要退出政治舞台的。不退出也要退出，现在不退出，将来也要退出政治舞台；2.要保护好林总的身体；3.今后林总再不要多管军队的事情了，由罗总长去管好了；4.一切由罗管，要放手叫他去管。叶群还说刘亚楼亲口对他说如果能够完成上述的东西，罗不会亏待她云云。叶群接着还说刘亚楼指责罗瑞卿玩弄了他，不要他当总长，还说罗不好，要林警惕罗。【注 27】（《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286、287 页）对于叶群的表述，刘少奇说了一句“难以置信”，邓小平也说了一句“死无对证”，话说的少但都说到了点子上。雷英夫还在会上说了不少罗瑞卿对毛泽东、林彪不满的话，对于雷英夫提供的揭发材料，刘少奇说：“雷英夫有些能力，但意识不好，他的材料不能相信。”其实何止雷英夫的材料不能相信，就是叶群的材料又有几分可信呢？

周恩来、邓小平向罗瑞卿宣布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意见，一共五条，第一，情节是严重的；第二，同彭黄有区别；第三，从长远看，还是有成绩的；第四，

中央未察觉也有一定责任；第五，党的方针仍然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里所说的情节是严重的，指的就是会议给罗瑞卿扣定的三顶帽子“伸手要权、封锁林彪、反对突出政治”。罗瑞卿对此当然不能认帐，而且相当委屈，自顾自己从来没有伸手向林彪要过权，而且处处为林彪着想又何来封锁一说呢？罗瑞卿情急之中对周恩来说他要去见林彪解释清楚这一切，周恩来也是情急之中大声的说：“太天真，你太天真了。”【注 28】（《非凡的年代》213 页）罗瑞卿自己也承认，他直到被关押在监狱之初还在想上海会议是林彪出于误会对他下的手。而“太天真”的人又何止罗瑞卿呢？

毛泽东对罗瑞卿的问题有过讲话，毛泽东说：“罗的思想同我们有距离。”、“罗把林彪同志实际上当作敌人看待”、“罗是野心家”，毛泽东的话不多，但是，定性很重。【注 29】（《罗瑞卿传》540 页）毛泽东还和江西的负责人杨尚奎、方志纯说到罗瑞卿，毛泽东说：“这个人（罗瑞卿）就是盛气凌人，锋芒毕露。”、“我也同罗瑞卿说过，要他到哪个省去搞个省长，他不干，军队工作是不能做了。”【注 30】（《毛泽东传 1949—1976》下卷 1400 页）然而，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对林彪说过：“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嘛，他反对我游泳，那也是好意。”毛泽东通过周恩来、邓小平告诉罗瑞卿，可以先把问题挂起来，有什么检讨什么。从这两种几乎完全不同的口气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于打倒罗瑞卿也是两难、心有不甘的，否则后来在“解放”罗瑞卿时，毛泽东也不会当着众人的面做什么自我批评了。

一贯忠厚的朱德对于打倒罗瑞卿老大不满，忍不住对康克清说：“肃反肃到我们党的内部核心，是真的？是假的？弄不清楚。罗瑞卿那些事都看得见，他办的每件事都报告过中央，经毛主席同意的，说他篡军反党，无法让人相信。”，又说：“为什么要撤？这不是撤一个罗瑞卿的问题，像这样可靠的人都撤，打击面宽了，真假失去了标准，今后党内要不平安了。”【注 31】（《康克清回忆录》469 页）然而，忠厚的朱德怎么能够想到上海会议对罗瑞卿的批判不过是一个开头而已。

1966 年 3 月 4 日讨论罗瑞卿问题小组会在怀仁堂召开，这次会议参加者为军委各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军科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的负责人，目的就是要批斗罗瑞卿。此前邓小平已经和罗打了招呼，邓小平一家对罗的处境深表同情，卓琳还专门登门看过郝治平他们，邓小平宽慰罗说：“我对挨斗是有经验的，你要作充分的思想准备就是了。”这次会议中央任命邓小平为组长，组员为彭真、叶剑英，另外还有一个会务组，组长是叶剑英，组员是杨成武、肖华。由于邓不能经常到会，所以，还有一个七个人小组负责主持会议。3 月 4 日下午会议挪到京西宾馆开，邓小平只做了一个开幕讲话就离开北京到外地视察了，彭真则要求发言时要讲大问题，不要讲枝节问题，不要牵连别人。彭真的这种良苦用心后来也被看作是对罗的包庇。这次会议的批斗程度不亚于当年批判彭黄、批判谭政，罗瑞卿尽管有了邓小平的关照，可他毕竟没有经历过如此场面，与会者把罗说成阶级异己分子，说成野心家、阴谋

家、现代修正主义的代理人等等，总参的杨成武、王尚荣、雷英夫做了联合发言，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在发言中都是坚决主张要开除罗瑞卿党籍的。吴法宪在会上宣读了一万多字的发言稿，他声嘶力竭地当面诬陷“罗瑞卿有野心，反对林副主席，向党伸手，阴谋夺取军权，你跑遍全国看地形，干什么？就是为将来你自己指挥军队” 吴法宪的发言当时号称“原子弹”，给罗瑞卿很大的打击，京西宾馆会议的批斗是导致罗万念俱灰、心存一死的主要诱因。【注 32】（《杨成武谈罗瑞卿揭批实情》，《炎黄春秋》2005 年第十期，1—9 页）

3 月 18 日，罗瑞卿跳楼自杀未果，造成粉碎性骨折，消息传来，毛泽东说了一句：“真没出息！”【注 33】（《回首文革》第二卷 715 页）叶剑英改填一首词作为对罗跳楼的惋惜，词云：“将军一跳身名裂，向河梁，回首望，故人长绝。”【注 34】（同【注 32】）就在罗瑞卿还在医院时，中央工作组向中央提交报告，由中共中央在 5 月 16 日发布了《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将罗瑞卿的问题上升到相当的政治高度，说罗瑞卿是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报告还向中央建议：（一）撤销罗瑞卿在军事系统的各项职务；（二）撤销罗瑞卿的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三）撤销罗瑞卿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四）对罗瑞卿的错误作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结论；（五）把中央工作小组的这一报告和小组会议上的几个重要发言传达到适当范围，彻底肃清他在各方面的恶劣影响。报告的这些个对罗瑞卿的处理要求后来都得到了“满足”，文革中罗瑞卿更加凄惨，多次被拉出批斗，1967 年 3 月 4 日到 5 日于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的大型批斗会上，罗瑞卿因为伤口未愈，被用箩筐抬到了台上，残肢戳在筐外，所过处血迹斑斑。1968 年 7 月，毛泽东批准，罗瑞卿第三次入院治疗，吴法宪报给中央文革碰头会，江青、黄永胜、陈伯达都表示同意主席的指示。8 月 4 日，叶群给吴法宪打电话说林彪不同意罗瑞卿动手术。林彪说：“对罗瑞卿到现在也没有搞出什么材料，要抓紧审问和斗争，搞出材料后到秋后再动手术，如果手术后不好，什么材料也不能写了。”【注 35】（《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318 页）这次延误治疗给罗瑞卿的病腿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1973 年 12 月 12 日，林彪死后一年多，毛泽东终于做了自我批评，承认他在罗瑞卿问题上听了一面之词，随后罗瑞卿得到了部分的“解放”，他真正的解放还是在文革之后。

罗瑞卿对于自己的挨斗被整一直不甚明白，有人直白的告诉他：“太突出，你太突出了。”自古就有“峣峣者易折”的名言，罗瑞卿的职务包括中共中央书

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国防工办主任、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65年的中国政坛上，罗瑞卿已经是在军队内部负责上传下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地位甚至连一些元帅也莫能企及。处于这样的位置遭人嫉妒、遭人毁谤简直就是必然的，所以，指出他“太突出”也是很有道理的。罗瑞卿在晚年回答别人问起林彪打倒自己的原因时曾经这样总结过：“有两条：一条是林彪要我入伙，我不入；第二条是要我相信林彪，超过相信毛主席，我不干。”然而，问题的最为主要的一面是罗瑞卿得罪了政治形势，俗话说：形势比人强。在一个越来越趋于极左的大背景下，罗瑞卿还想像以往那样在一些方面坚持一下原则、坚持一下真理，岂可得乎？而在极左政策的制定者、推行者看来，罗瑞卿何尝不是挡路人？何尝不是绊脚石？

## 第二节：江青请“神”

林彪整垮罗瑞卿标志着其人在毛泽东那里已经获取了不可动摇的信任，以林彪在文革前夕的地位，难怪江青要将其视作“神”。

就在林彪不断赢得政治地位的一再上升的同时，六十年代后期中国政坛上另一股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江青也开始崭露头角。江青(1915—1991)原名李云鹤，又名李进。山东诸城人。1929年春入济南山东实验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学戏。后到青岛，在大学图书馆工作，参加海漠剧社。193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只身前往上海。1934年10月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同年12月被释放。此后以蓝萍为艺名，参加演出过《王老五》等影片，1937年秋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1938年同毛泽东结婚。1947年3月党中央撤出延安后，随毛泽东转战陕北，任过中央纵队直属队协理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部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电影处处长等职。多年称病休养。从1963年开始，江青逐渐活跃，特别是以插手京剧改革、评点文艺界为名进而过问党内政治。毛泽东在1963年12月12日对于文艺工作有过一个重要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在1964年的6月27日的批示中又说：“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倒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

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1964年6月27日，毛泽东再度批示，言词更加激烈：“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15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倒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象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注36】（《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1330、1331页）而此前也就是1963年9月27日，毛泽东还对文化部吐露了不满：“《戏剧报》尽是牛鬼蛇神……文化方面特别是戏剧大量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文化部是管文化的，应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为之检查，认真改正。如不改变，就改名帝王将相部，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这些过于敏感、过于左倾的判断给江青无疑提供了更大的机会。

毛泽东对井冈山的老战友曾志（陶铸的妻子）如此评价过江青：“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但是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所以，江青虽然只是个秘书，但无论到哪里，看文件都必须按政治局委员待遇。”【注37】（《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320页）江青的这种特殊地位很快让一些愿意积极投身到极左事业的部分领导人大感兴趣。中共华东局第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就是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位。

毛泽东在五、六十年代有两位“好学生”，一个是党内的柯庆施，一个是军内的林彪。而柯庆施发起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显然比林彪还要早。在1958年的成都会议上，柯庆施就提出：“相信毛主席要到迷信的程度，服从毛主席要到盲从的程度。”这比起林彪神化毛泽东还足足早了一年。所以，我们有必要在表述林彪、江青走到一起之前对柯庆施做一个基本的描述，这也有利于我们对江青集团的发展的认识有一个铺垫。

柯庆施(1902-1965)安徽歙县人。原名尚惠、笔名怪君，人称“柯怪”。早年就读于皖南师范学校。1920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出席莫斯科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1924年春到上海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同年赴苏联海参崴做华工工作。1926年春回国。后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上海闸北区委书记。1929年秋参加组织大冶兵暴。后任红五军五纵队政治部部长、中共中央秘书长。1933年4月到张家口任中共前线委员会书记。后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石家庄市市长。建国后，任南京市市长、中共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江苏省委第一书记、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上海警备区第一政委。是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五中全会上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党内素有对某人赋以“×老”的尊称的习惯，例如我们都知道的徐老特立、林老伯渠、董老必武等，这是以年龄、资历论，柯庆施也是他

们中间的一员，据说此老当年见过列宁，中共党内见过列宁的屈指可数，除了瞿秋白、邓培，大概就是柯庆施了，而能够一直活下来把谈革命导师音容笑貌的或许只有柯庆施。不过，见过列宁的柯庆施在党性方面却并没有因此受到导师的感染，1933年，中央让柯庆施携带大量经费从上海去满洲，因敌情紧张，柯庆施没敢去，不去也罢，还把经费在天津花了一干二净，不但如此还写出假报告说火车不通满洲，后来又说已经去过满洲。1935年中共满洲省委向中央汇报工作时才揭穿柯庆施的谎言，延安整风期间，柯庆施被处以“犯有在危险时刻动摇并欺骗组织的错误”的结论。【注38】（《陈丕显回忆录》190页）中共早期革命阶段，党内经费紧张，看守党的经费如同看守自己的政治生命和肉体生命一样重要，不少的党内高级领导干部在这方面率先垂范。周恩来曾经收到吴德峰交来的一笔碎金子（金首饰剪断），因为斤两的原因，周恩来不厌其烦的三次过秤。原中共北方局书记兼河北省委书记、建国后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的高文华为了筹措党的经费不惜卖掉自己的亲生骨肉。原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陈为人，宁可自己的孩子饿死也不愿意动用一分一毫党的经费。相对于陈为人、高文华、周恩来等人来说，这位“柯老”也算是“难能可贵”的了。延安整风期间，柯庆施受到康生等人的审查，其妻因此自杀。【注39】（《峰与谷》3页）建国后，随着毛泽东逐渐向极左偏航，柯庆施步步紧跟，大跃进和庐山批彭他都充当了要角。中央文献版的《毛泽东传》作者甚至认为在庐山会议批彭这件事上柯庆施起了相当的作用：“柯庆施等人对毛泽东的进言，则直接促使毛泽东下了‘反右倾’的决心。”【注40】（《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983页）柯庆施不但在政治紧跟毛泽东，而且在一些琐碎的小事上也能看出此老的颇具心计和对毛泽东的揣摩。庐山会议以后，毛泽东路过南京，刘顺元、江渭清到毛泽东专列上汇报工作，发现柯庆施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守候在毛泽东的车厢外面，给毛泽东做守卫。刘顺元当时就深感柯庆施的“献媚不成体统，实在不像一个资深的老共产党员”。【注41】（《刘顺元传》319页）然而，柯庆施却越来越“红”，柯庆施死后，华东局第一书记的职务居然长期悬空，不任他人。

柯庆施在上海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是1963年年初，这比毛泽东年底的批示显然要早，对于柯的这种敏锐的政治嗅觉，江青非常高兴，江青说：“上海比北京好的多，上海有柯庆施。”【注42】（《陈丕显回忆录》4页）此后，江青就以上海为基地，干预政治。柯庆施给江青的另外一个间接的大贡献是让张春桥脱颖而出。张春桥在解放初主动提出要担任上海市委宣传部新闻处处长被指责为向组织伸手，在担任《解放日报》总编辑期间还因为胡乱点名批判华东军政委员会民政部陈时夫受到华东局的批评，郁郁不得志。1954年柯庆施到上海工作，张春桥因为在石家庄时期和柯庆施有过共事的渊源，很快被柯庆施提拔重用，张春桥的妻子李文静抗战变节做了“汉奸”的往事也因为张春桥的日益得宠而被柯庆施掩盖起来，柯庆施还看在张春桥的面子上，把李文静调往市委要害部门任职。张春桥也没有辜负柯庆施的厚望，给柯庆施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好点子”，据说成都会议上柯庆施的那番“好学生”言论就是出自张春桥的运筹。张春桥自从搞出了《海港》、《智取威虎山》后更得江青好感，由张春桥引出姚文元，江青集团的雏形在上海已经初步形成。

1965年4月，柯庆施猝死成都，张春桥成为江青在上海的“拐杖”，柯庆施死后不过半年多的时间，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从而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关于“海罢”事件，毛泽东自己有过总结，他说：“这场斗争也准备了一个时期。前年十一月，对一个历史学家吴晗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这篇文章在北京写不行，不能组织班子，只好到上海姚文元他们搞了一个班子，写出这篇文章。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先告诉我要批评。他们在北京组织不了，到上海去组织，我都不知道。文章写好了交给我看，说这篇文章只给你一个人看，周恩来、康生这些人也不能看，因为要给他们看，就得给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这些人看，而刘、邓这些人是反对发表这篇文章的。”【注43】

（《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1397页）也就是说，“海罢”这篇文章其实是瞒着中央政治局其他常委的情况下非组织性的东西。“海罢”出来后，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予以坚决抵制，彭真下令北京各报刊一律不转载。他还曾对《红旗》杂志一位负责同志说过：“《红旗》更不要着急，《红旗》现在不要发表文章，也不要转载。”1965年11月26日，彭真明确指出：“吴晗的性质，不属于敌我。对姚文元文章错误的地方也要批判。”毛泽东要上海市将姚文元文章印成小册子，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但是，北京新华书店没有立即表示订购。彭真还劈头责怪张春桥、杨永直等人，说上海市委的党性跑到哪里去了？毛泽东曾经问过彭真：“吴晗的问题可不可以批判呀？”彭真回答说：“吴晗有些问题可以批判，他最近参加访问朝鲜代表团在朝时的一些讲话就有错误。”【注44】（《陈丕显回忆录》31页）彭真回避毛泽东提出的实质性东西，而竭力保护吴晗等人，这令毛泽东不快，随后彭真告诉吴晗，错的检讨，对的就坚持，不用管什么来头不来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彭真的“顶撞”让毛泽东觉得北京市委正成为一个他身边的“独立王国”。1966年1月，毛泽东对陶铸、王任重说：“如果北京出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我讲了以后，一路上从天津到南昌，经过许多地方，都没有听到反应。”【注45】（《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1398页）特别是1966年2月3日，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召开会议，主持制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提出学术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二月提纲》让毛泽东感到情况越来越“严重”，必须通过疾风暴雨的运动才能消灭这些他认为的“独立王国”。

运动自然要舆论先行，江青想到了林彪。江青说：“我的话更没人听，要请无产阶级的尊神来攻。”江青所说的神就是林彪。对于江青，林彪以前没有打过交道，但是，他清楚江青为何许人也，他让叶群给总政治部分管宣传工作的副主任刘志坚找4、5个人跟着江青去，主要是谈谈部队的文艺工作，最好要总政主任肖华去。从叶群的转告看，林彪夫妇是十分清楚江青的来意的，惟其知道江青来头很大，所以，一开始就主张让肖华去。肖华却推以身体、工作等原因不去，最后刘志坚和肖华商量后就把他自己和李曼村（总政宣传部部长）、陈亚丁（总政文化部副部长）、谢镗忠（总政文化部部长）作为参加江青所组织的活动人选报了上去，得到了江青的同意。直到这时，刘志坚等人还对江青

到底为什么要召开这个会、召开这个会要谈些什么仍旧是一头雾水。肖华还同刘志坚他们商量了一下应对江青的办法，普遍认为江青脾气大，最好少说多听，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如实汇报。1966年2月1日，叶群传达林彪指示，林彪说：“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要满足现状，都要更加提高。”刘志坚对林彪的指示做了如实的记录，叶群告诉刘志坚，见到江青后首先就要把林彪的指示拿给她看。

1966年2月2日下午，刘志坚等人在上海见到江青，刘志坚率先汇报了林彪的指示，江青说：“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看电影前，江青还宣布了纪律，“不准记录”、“不准外传”，特别是强调不能让北京知道。江青还大谈目前文艺界出现对抗毛泽东路线的东西，并且诡秘的说：“现在的论战，还只是前哨战，决战时机尚未到来。”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还请了刘志坚等人吃饭，饭后看电影《逆风千里》。这场神秘、诡谲的座谈会开始了。

座谈会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2日下午到10日；第二阶段从16日到20日，其中10日到15日没有开会。对于这次座谈会，当事人刘志坚有过一个回忆，不妨照录如下：“1. 看电影、戏剧。这是‘座谈会’的主要活动，先后看了30多部电影和三场戏。每天放什么电影，什么时间放，都由江青安排。她到场看电影13次，指定放映影片21部。在看电影、看戏过程中，她想起什么就谈什么，不让别人插话。我们4人只是听她谈，有时她问什么，回答一下，一般不插话。张春桥、陈伯达有时也来看电影，随着江青的话插几句。2. 个别交谈和集体座谈。个别交谈8次，每次半小时至1小时。大多是吃过中午饭后，江青秘书来电话叫我去。每次谈话，江青都没有什么提纲，而是想到哪儿讲到哪儿，经常内容重复，有时一个问题没谈完又谈另外一个问题。每次我一去她就讲，不问什么，也不让插话，她讲累了就散。因为江青规定谈话内容不许记录，我只好每次听江青谈话回来，就凭记忆给李曼村、谢镗忠和陈亚丁说一说，并让陈亚丁作些追记，以备回去作汇报用。据我当时的日记和回忆，江青找我的8次谈话的内容是：第一次，就是刚到上海报到的那一次，主要是我转达林彪的那几句话；第二次是2月3日下午，主要是江青谈她怎样给毛主席当秘书，当‘文艺哨兵’，如何亲自买票下剧场，发现京剧存在很多问题，无论是内容、表现方法、唱腔等方面都不行，毛主席的指示没有得到贯彻，所以她要搞京剧革命；第三次是2月5日下午，讲京剧改革要改唱腔、舞蹈动作，难度很大；第四次是2月8日晚上，讲外国电影问题；第五次是2月9日下午，讲她搞京剧改革遇到的困难，北京市委不支持；第六次是2月16日下午，谈文艺工作，也谈到对一些影片，如《抓壮丁》等的看法；第七次是2月17日下午，谈要修改电影《南海长城》问题；第八次是2月17日晚，说要趁参加过三大战役的人还在，军队要负责把三大战役写出来。有次谈话

中，还谈到三十年代的文艺问题。集体座谈一共4次：2月2日晚见面谈一次；2月9日晚接见《南海长城》剧组谈话一次；2月18日、19日下午集体听江青谈话两次。集体座谈也是江青一人讲，大家听，听完就散。3. 阅读有关文件和材料。江青神秘地给我们4人阅读了毛主席的两篇著作。一篇是《毛主席于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平剧院的信》，另一篇是《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还阅读了上海文艺界整风的情况等九个有关文艺工作的材料。江青非常神秘地交待，这些材料，只供你们几个人阅读，不准传出去。4. 江青接见《南海长城》的导演、摄影师和部份演员，同他们谈话三次。主要谈她看了《南海长城》样片后的看法和修改的意见。”【注46】（《回首文革》第二卷378、379页）

江青在和刘志坚等人的谈话中，夹带了不少的“私货”，也就是过分的揶揄自己的所作所为，这大抵是江青一贯的风格，不过，江青也透露了一点实情，那就是她在春节期间找到林彪，请林彪出面支持她在文艺界的兴师动众，林彪表示赞同。江青谈的最多的就是毛泽东和她自己，对林彪虽有赞扬，却也不多，只说了“在林彪同志的领导下，部队文艺工作毕竟比地方好些”，还只是“好些”，说明部队文艺工作实际上也没有让江青有多少的好感。而这些都是皮毛、枝节，江青真正关注的不是什么具体的文艺改造，而是“抓人”，用江青自己的话说就是：“要捉大的”。但是，当时刘志坚等人怎么也不会明白江青所说的“大的”究竟有多大，更不会想到最后竟然捉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等人头上。

座谈会结束后，起草纪要，这份纪要先后写了8个样稿，反复修改达30次，文字从3000多字增加到10000多字。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毛泽东对这份纪要的高度重视，在三月间做了三次修改。毛泽东第一次审阅时修改了多达11处，其中最重要的包括：1. 在原来的题目《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前面增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标题就成了后来的著名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2. 把稿子第一部分中“江青同志在上海召集刘志坚”改成“江青同志根据林彪同志的委托在上海召集”。3、在“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之后，加了“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并在这一条之后，单独加了一段“过去十几年的教训是，我们抓迟了。毛主席说，他只抓过一些个别问题，没有全盘地系统地抓起来，而只要我们不抓，很多阵地就只好听任黑线去占领，这是一条严重的教训。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作出要在全中国进行阶级斗争这个决定后，文化方面的兴无灭资的斗争也就一步一步地开展起来了。”4、在“要破除对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迷信”后面，加了“三十年代也有好的，那就是以鲁迅为首的战斗的左翼文艺运动。到了三十年代后期”一句。在“要破除对中外古典文学的迷信”后面，加了“古人、外国人的东西也要研究，但要用批判的眼光研究，做到古为今用，外为中用”。5、在第四条“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前面及第九条“读一辈子”“毛主席的书”之间，都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几

个字。【注 47】（《回首文革》第二卷 391 页）毛泽东审阅后，批示：“请伯达同志参加，再作充实和修改。”江青于是去找陈伯达、张春桥对稿子内容作充实和修改，尔后又把刘志坚、陈亚丁叫去上海，5 个人一起从 12 日至 14 日对稿子再作一番修改。这次修改，使文字由 5500 字增加到 10000 字左右。这次修改增加了对肖华和杨成武的表扬，说：“肖华同志和杨成武同志，对这次座谈都表示热情赞助和支持”。还增加了一个无中生有的东西，就是在第三部分加了一句话：“根据林彪同志建议，总政治部已经把《毛泽东论文艺》一书，印发全军文艺工作者人手一册”，实际上林彪根本就没有这个建议。【注 48】（《回首文革》第二卷 394 页）3 月 14 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信，送交修改稿，毛泽东对这份修改稿再度予以修改，1、把第二部分第一段“其中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几点”改为“下面是在这次座谈中大家商议和同意的几点意见”。2、把第三条中“罗瑞卿同志却在毛主席指出”一句中的“毛主席”改为“党中央”。3、把“文化革命解放军要带头”改为“文化革命解放军要起重要作用”，并删去末尾“高举毛主席思想伟大红旗”一句。17 日，毛泽东批示“此件看了两遍，觉得可以了。我又改了 3 点。请你们斟酌。此件建议用军委名义。分送中央一些负责同志征求意见。”这样，陈亚丁为江青起草了给林彪的信，林彪又给军委常委写了一封信。林彪在信中强调指出：“这个纪要· · · · · · 是一个很好的文件，· · · 不仅有极大的现实意义，而且有深远的历史意义。”3 月 23 日，刘志坚等人回京把“纪要”和林彪给军委常委的信交给军委常委们。在此期间，毛泽东又作了第三次修改，其中有把“学习江青”给改为“仿照江青”。【注 49】（《回首文革》第二卷 395、400 页）

纪要报送中央后，4 月 1 日毛泽东批示：“已阅，同意。”4 月 10 日，“纪要”由中央办公厅以 211 号文件的形式印发全党。印发时，中央加了一个 148 个字的批示，指出“纪要”“很好，很重要”，要求各级党委“认真研究，贯彻执行”。事后，因中央要对批语增加“新的补充”，5 月 2 日中央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 10 日前收回 211 号文件，同时发出文件号不变、时间不变、有新批语的“纪要”。新批语约 800 字，写了四层意思：一是提出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的文学艺术领域存在“一场很尖锐的阶级斗争”；二是指出中央有关部门和绝大多数党委，对文艺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一直认识很不够，抓得很不够”，“这种严重的情况必须迅速地切实地加以改变”；三是确认“纪要”对当前文艺战线上阶级斗争的许多根本问题，“作了正确的分析，提出了正确的方针、政策”，“不仅适合于军队，也适合于地方，适合于整个文艺战线”；四是规定文件印发范围和传达范围。4 月 18 日，《解放军报》以社论的形式摘要刊登了“纪要”的内容，并称“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出现，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正在兴起”。此后，《红旗》杂志发表社论，称纪要“是无产阶级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发动大反击的一面红旗。”这份著名的《纪要》的核心内容就是号召“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而且“搞掉这条黑线之后，还会有将来的黑线，还得再斗争”，虽然表面上提到的仅仅是文艺界，其实是针对建国十七年以来的政治路线的，而所谓的彻底搞掉不过就是后来“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前身。

纪要的产生是利用部队作为推动文化大革命走向开幕的序曲，也是通过军队的压力迫使中央一线领导自行推翻《二月提纲》就范的工具，更是林彪、江青政治携手的发轫。

### 第三节：匿名信风波

林彪在延安时期曾经和陕北青年刘新民（张梅）有过一段婚恋，并且育有一女，取名林小琳。以后林彪移情别恋和叶群走到了一起，林小琳不在叶群的眼里，经常受到叶群的欺凌，甚至连林彪的面也见不到。林月琴曾经给寄宿在她家的林小琳联系过和林彪的见面，就被叶群怀恨在心，成为林月琴被整的一个因素。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 1961 年去哈尔滨看望在“哈军工”学习的儿子陆德时得知林小琳的不幸遭遇，激起她写匿名信打击叶群的念头。

严慰冰的父亲严朴是中共早期的优秀党员，家道殷实却致力于革命，被周恩来称作“三少爷毁家纾难”。曾担任无锡总工会总务部部长、江苏省委特派员、1928 年 6 月赴苏联莫斯科，作为正式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被选为大会组织、农民土地问题、苏维埃等委员会委员。同年秋回国到上海，任中共江苏松浦特委常务委员。1929 年 1 月参与领导奉贤庄行农民暴动。1930 年夏被调任中共浙南特委军委书记兼红十三军政治委员。1934 年 2 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副部长。此后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第二科科长，八路军驻西安、重庆办事处秘书长。1949 年 6 月 5 日在北平逝世。6 月 9 日，陈云在《人民日报》发表《严朴同志传略》纪念严朴，并且高度评价了严朴的一生。严慰冰因为家学渊源，博闻强记。1937 年夏以第一名的成绩被中央大学中国文学系录取。1938 年 7 月辗转武汉、西安到达延安，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大学习，经李富春介绍，严慰冰和陆定一结婚。建国后，有一次毛泽东忽然问及陈伯达、康生、胡乔木、陆定一这几位党内的“大秀才”，初唐王勃的《滕王阁序》是何时所写、何地所写，这几位大秀才都交了白卷，却不料稍后严慰冰回答了出来，这让毛泽东很惊奇，毛泽东说：“如果在古时候，你能中个女状元。”“女状元”作为严慰冰的外号不胫而走。

1952 年“三反、五反”运动中，中宣部副部长徐特立的儿媳和严慰冰一起被怀疑有贪污问题，事情后来虽然澄清了，但是给严慰冰的刺激很深，就此患上了难以治愈的精神病。对于严慰冰的精神病，陆定一曾经转引北京一家医院神经内科主任的话说：“在许多事情上表现正常，对某些特殊事件表现不正常。”

【注 50】（《陆定一传》488 页）正是因为严慰冰的这种症状，也就导致了她的开始大量的用匿名信的方式痛骂叶群及林彪。

严慰冰结识叶群并不晚，早在延安时期，她就得知了叶群的为人。此时出于对林小琳委屈的处境的抱不平、出于对林彪夫妇在政治上的丑恶表演等原因，陆续以“基督山”、“黄玫”等化名给叶群家里寄去大量的匿名信和明信片，据统计，从 1961 年到 1966 年一共写了 50 多封匿名信。严慰冰对叶群的不满、看不惯还是情有可原的，叶群的生活作风的败坏也不是什么新闻。不过，采取这种匿名信的方式发泄不满则是不可取的，而且匿名信还对一些无辜的人造成了意外的伤害，这也是必须予以指出的。王光美曾经说：“严慰冰同志写匿名信这件事，我原来一点也不知道。叶群固然很坏，但我觉得严慰冰同志采取这种方式实在不好，有问题可以向组织上反映嘛！而且，她反对叶群，可又要把这事往别人头上栽，这不是挑拨吗？她在有的匿名信上署名“王光”，信里说“咱俩是同学，谁也知道谁”，还把发信地址故意写作“按院胡同”。按院胡同是我母亲办的洁如托儿所的地址。这不是有意让人以为写信人是王光美吗？我原先完全蒙在鼓里，好几年都不知道，一直到破案，才大吃一惊。”刘源也证实：“还有的信署名“黄玫”。南方人黄、王的读音不分，也是有意让人往王光美身上联想。匿名信还挑拨叶群和女儿豆豆的关系，说豆豆不是叶群亲生的。这也罢了，可是在给豆豆的匿名信里竟说：你没发现你和刘家的平平长得特别像吗？弄得豆豆疑神疑鬼，常往我们家跑，看平平的长相，还抱着平平哭，闹自杀。有一年在北戴河，一天我正同老虎打乒乓球、说话，公安部罗瑞卿部长走过来，表情特严肃，对老虎说：“回去告诉你爸爸妈妈，又发现两封信，还没破案。”老虎马上就回去了。老虎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的小名。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注 51】（《王光美访谈录》第 392、393、394 页）但是，也由此看到，匿名信给林彪家庭造成的恐慌也是显而易见的。

匿名信终于引起中央有关部门的注意，公安机关介入的此事，而且很快查明这是严慰冰所为。严慰冰的“冲动”行为给陆定一带来的负面影响十分明显。进入 1965 年以后，毛泽东对文化界的表现越来越感到失望，对陆定一的工作也时而挑剔，就在江青联合林彪搞出来的“座谈会纪要”即将面世的前后，毛泽东同康生、张春桥等人的谈话里直接批判中宣部是“阎王殿”，毛泽东还说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其矛头直指陆定一。如今严慰冰的信又予查实，陆定一本来岌岌可危的地位更加如同雪上加霜。1966 年 2 月彭真代表中央找陆定一谈话，主要就是谈严慰冰的匿名信，彭真指出严慰冰写信地址填写的是王光美母亲的托儿所的地址，发信很多署名王光×，很容易会被引起误解，也会被看作是挑拨中央常委之间的关系。陆定一回到家询问了一下严慰冰，还把严慰冰的笔迹取来，交给彭真，几天后彭真通知他说，笔迹已经通过公安部核对，确系严慰冰手书。此前，林彪一家已经报案，公安部已经查对了匿名信的笔迹，并且通过一个很巧合的事件得到了严慰冰的笔迹。（据《陆定一传》记载过程如下：一天，严慰冰到王府井百货大楼买东西，不慎钱包被扒手扒去。她找了经理反映，经理知道她是陆定一的夫人，很客气地告诉她附近有一家出国人员及首长和家属购物的内部门市部，她可以到那里买东西。严慰冰到那里

去，刚进门，就同一个女人撞个满怀。这个人气势汹汹地质问：“你没长眼睛吗？”“我没看见。”严慰冰刚想道歉，仔细一看，真是冤家路窄，与她相撞的人竟是叶群！两人争吵起来。严慰冰咽不下这口气，事后到总政找叶群的领导，反映叶群以势欺人。严慰冰讲的是无锡腔普通话，总政这位领导是江西人，双方都听不太懂对方讲的话，只好借助于文字。严慰冰写了争吵的经过。这位领导人拿着这张纸去找林彪反映情况。林彪看到字迹觉得眼熟，便想到了那些匿名信。林彪把此事告诉了公安部。公安部立即派一位局长到严慰冰的工作单位中央宣传部，调取严慰冰的档案，查对笔迹，终于确定匿名信是出自严慰冰的手笔。参见《陆定一传》490、491页）双重的笔迹鉴定，已经证实了匿名信的始作俑者就是陆定一的妻子严慰冰。

为了避嫌，陆定一在中央处理严慰冰时到了外地。1966年4月30日，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来到合肥通知陆定一，严慰冰已经作为“反革命分子”遭到逮捕，时间是4月28日。严慰冰尽管用匿名信进行谩骂却也不能和反革命分子联系到一起，严慰冰的罪名从某种程度上预兆了陆定一即将迎来的厄运。5月6日，陆定一得到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通知要他回京参加政治局扩大会议，5月8日到京后，中宣部副部长张子意跟他说，这次回来是毛泽东的意思，直到这时陆定一还对这个会议的矛头所指一无所知。1966年5月3日开始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为了解决“彭（彭真）、罗（罗瑞卿）、陆（陆定一）、杨（杨尚昆）”的问题的，因为罗瑞卿、杨尚昆已经给“解决掉”，所以，此间会议主要是奔着彭真、陆定一的。彭真在从外地回京之前就已经得知了自己“出事了”，在杭州西冷宾馆散步时，六个中央局的书记包括刘澜涛在内，没有人敢同彭真并肩而行，更别提谈话了，只有李雪峰简单的和彭真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话。彭真随后由李雪峰、宋任穷“护送”回到北京，很快转入5月政治局会议的批判会场，成为被斗争的对象，不过，彭真表现的还是相当的不容易，他还同一些乱喊口号的人吵了一架，大声的问：“谁是第一个喊叫万岁的？”【注52】（《回首文革》第二卷718、719、720页）彭真尚且如此“待遇”，和林彪家庭有着匿名信“仇隙”的陆定一就可想而知了。

因为严慰冰的匿名信里面涉及叶群的生活作风问题和叶群同林立衡的血缘关系，所以，林彪认为他有必要出来给予澄清一下。但是，林彪澄清的方式确乎出人意料，他写了一个《处女证明书》在会上散发。这份算得上建党以来的奇文的处女证明书是这样写的：“我证明：（一）叶群在我结婚时是纯洁的处女，婚后一贯正派；（二）叶群和王实味根本没恋过爱；（三）老虎、豆豆是我与叶群的亲生子女；（四）严慰冰的反革命信，所谈的一切全系造谣。林彪 1966年5月14日”林彪的“处女证明书”第一条就不是实事求是，叶群所谓的“婚后一贯正派”根本就谈不上，不但比较其人婚前更加放荡，而且逐步走向荒唐，关于这一点我们要在后面的第六章专门提及，此不赘。第三条中说叶群和林立果、林立衡亲生的母子、女关系不假，但是，叶群对待林立衡的狠毒手法很难让人相信这是亲生母女。第四条中说严慰冰所说的都是造谣也

是林彪自己的说法，事实上严慰冰谈到的不少问题不仅实有其事，而且还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后来林彪夫妇的下场就是最好的说明。“处女证明书”在今天看来是无比荒诞的，可是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却成为林彪反击的“武器”，聂荣臻看不过眼，手里拿着林彪的手书冲着主席台提意见：“发这个做啥？收回！”【注 53】（《回首文革》第二卷 720 页）

林彪质问陆定一：“你跟你老婆勾结在一起，用写匿名信的办法长期诬陷叶群同志和我全家，目的是什么？”陆定一说：“严慰冰写匿名信，我不知道，她既没有跟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过，我本人也没有发现。”林彪说：“你老婆的事，你能不知道？”陆定一说：“丈夫不知道老婆的事，不是很多吗？”林彪这时大抵是火冒三丈，竟然说出了“恨不得毙了你”的粗话。其实，处女证明书这种东西都在政治局会议上冒了出来，“恨不得毙了你”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林彪还问陆定一：“我对你怎么样？”陆定一说：“很好。”林说：“我对知识分子历来是很尊重的（言外之意，我知道你是大学生），你怎么那么整我？”林彪还是把严慰冰和陆定一联系到了一起。李雪峰后来对这次会议有过一段追述，他写道：“因为林彪点了名，会后，政治局常委决定停止陆定一出席会议。散会了，我们知道常委在那里开会没有走，陆定一在旁边屋里等着。邓小平喊我进屋，让我和李富春去和陆定一谈话，通知他不再出席会议。富春非要我领头。我让他：‘你是政治局的。’我们俩站起来，从开会的地方到陆定一房间的门口只有几步路，谁也不愿意走在前面，一直并行，走得很慢。走到门口，他推我，我年轻，只好服从。一进门，我就靠边坐下。坐下后，应由他先说，他又推说让我先说。陆都看到了。我只好先说。传达了邓小平的一句话：‘中央决定从现在起停止陆定一同志出席这个会议。’这是邓小平找我谈的，谁找富春说的我不知道底细，只能讲这一句。既不能批评，也不能同情。陆定一说：‘雪峰同志，我可是要搞共产主义的，我还希望我能看到共产主义！’他讲话的声音很大。看出他负担很重。我们也无法回答。我劝慰：‘会议定了，休息吧。事情总会弄清楚的。’富春也说：‘是啊，事情总会弄清楚的，中央决定……’”【注 54】（《回首文革》722、723 页）李雪峰的回忆相当传神，从中可以看到当时的一些内情。李富春同陆定一私交不错，所以不太情愿的出面传达邓小平代表中央作出的决定，而且不仅是私交，在李雪峰和陆定一所说的那句“事情总会弄清楚的”的话来看，不论是李雪峰还是李富春对批判陆定一都是心有不忍、心有不平的，只不过碍于党内的纪律无法公开表达罢了。至于说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的态度就更有意思了，像这种处理政治局候补委员、书记处书记的正式会议，他连个照面都不露，事后批判陆定一时，邓更是一言不发，足以说明邓小平在批陆问题上的抵触。

在这次会议上，给陆定一强加了很多无中生有的罪名，除了说他反党、反毛泽东、反林彪意外，还说他以前是和彭德怀搞到一起的，而且和彭真、罗瑞卿是“桃园三结义”，最为荒谬的是说陆定一的儿子陆德德的名字中的第一个德来自彭德怀，第二个德来自朱德。会议还把一封很正常的陆定一给严慰冰的家信作为陆定一“反党”证据抛了出来，这封信本来是陆定一告诉严慰冰给严买了

一块手表的事，里面罗列了上海钟表的一些情况，其中提到“半钢”、“全钢”等术语，就被视作是接头联系暗号。这种卑污的政治陷害、栽赃非但没有引起义愤，反而获得了响应，陆定一因而被打倒，直到1978年12月出狱。前后长达13年，严慰冰也被关押将近13年，陆德被关押6年，严慰冰的三个妹妹因为株连的关系分别被关押9、6、8年，严慰冰的母亲过瑛惨死狱中。而因为给严慰冰诊断精神的神经科医生也被迫害致死。这场冤狱牵连人数之多，无法想象。

林彪在5月18日的著名的“五·一八”讲话中还不忘了提及陆定一夫妇，他说：“有一批王八蛋，他们想冒险，他们待机而动，他们想杀我们，我们就要镇压他们！……他们是野心家，他们搞鬼，他们现在就想杀人，用种种手法杀人。陆定一就是一个，陆定一的老婆就是一个。”林彪并没有说谎，他确实从这一天开始朝着他的异己者伸出了镇压之手。

## 第五章：跃居副统帅

### 第一节：摊牌前后

打倒“彭、罗、陆、杨”是为文革全面发动做的第一个组织上的外科手术。而此四人无一例外都是中共中央书记处成员，他们既倒，八届一中全会以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已经遭到肢解。随后陶铸入主书记处，取代了彭真的位置。1966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通知》宣布撤销《二月提纲》和“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提出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通知》罗列了《二月提纲》的所谓十大罪状，逐条批判。《通知》严厉批驳了《二月提纲》中提出的有破有立、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正确观点，要求实行无产阶级在上层建筑其中包括各个文化领域的专政。《通知》要求各级党委立即停止执行《二月提纲》，夺取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号召批判所谓混进党、政府、军队和文化领域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通知》反映了毛泽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为“文化大革命”确定了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是“左”倾错误的纲领。它的通过和贯彻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新成立的中央文革组成人员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副组长为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为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姚文元、穆欣等。8月2日，中共中央通知：陶铸兼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8月30日又通知：在陈伯达病假期间，由江青代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职务。这个小组实际是以江青为灵魂，以张春桥、姚文元为爪牙，其能量开始并没有受到中央一些常委的关注，随着政治运动的逐步深入，这一非驴非马的机构居然一举取代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乃至中共中央政治局，中央文革碰头会成了政治局常委会的代名词。

随着“5.16通知”的出笼，林彪紧跟其后做了大篇的政变讲话，也就是著名的“五一八”讲话。林彪讲话的部分内容如下：“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都有了一切；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我想用自己的习惯语言，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社会上的反动派，混进党内的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都要镇压，有的杀头，有的关起来，有的管制劳动，有的开除党籍，有的撤职。不然，我们就不懂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权的根本观点，我们就

要丧失政权，就是糊涂人。……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的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的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单位，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作这个文章，这是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文章，没有印成文章的毛主席著作，我们就是要学这个没有印出来的毛主席著作。……政变，现在成为了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改变政权，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是人民革命，从底下闹起来，造反。如陈胜、吴广、太平天国，我们共产党都是这样。一种是反革命政变。反革命政变，大多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有的是上下结合，有的和外国颠覆活动或者武装进攻相结合，有的和天灾相结合，大轰大乱大闹。历史上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世界上政变的事，远的不说，1960年以来据不完全的统计，仅在亚非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先后发生了六十一一次政变，搞成了五十六次。把首脑人物杀掉的八次，留当傀儡的七次，废黜的十一次。……六年中间，每年平均十一次。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历代开国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很短时间就发生政变，丢掉政权的例子很多。……辛亥革命孙中山当了大总统，三个月就被袁世凯夺取了政权。四年后，袁世凯作了皇帝，又被人推翻，从此军阀混战了十几年，两次直奉战争，一次直皖战争……这些历史上的反动政变，应该引起我们惊心动魄，高度警惕。我们夺取了政权十六年，我们无产阶级的政权会不会被颠覆，被篡夺？不注意就会丧失。苏联便被赫鲁晓夫颠覆了！……有很多迹象，有很多材料，我在这里不去详细说了，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的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混到我们党内来，混到党的领导机关，成为当权派，掌握了国家机器，掌握了政权，掌握了军权，掌握了思想战线的司令部，他们联合起来，搞颠覆，闹大乱子。”林彪的这番“政变经”让听者无不为之动容，林彪的这篇讲话应该说文革运动的组织路线的“战斗檄文”，点出了文革的一个要害，那就是“夺权”，林彪所提

及的“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以后被写进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林彪还向与会者透露一个政治消息，那就是他说的“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门、单位，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这无疑是对所有并不赞成文革运动的领导人的一个震慑。另外，就在这次讲话里，林彪把自从1959年下半年对毛泽东的高度吹捧、盲目崇拜提到了一个有史以来的最高峰，他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对于林彪的这个讲话，毛泽东在稍后（7月8日）给江青的信中如此提到：“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象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觉得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注1】（《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1419、1420页）在信中，毛泽东似乎有些无奈的看待林彪的发言，还说他自己是被迫的，颇有不得不如此的意思。然而，就在同一封信里，毛泽东强调指出“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今后还要多次扫除。”也就是说一场疾风暴雨的运动还不够，还要多次发动这种运动借以扫除所谓的“牛鬼蛇神”。而且毛泽东还说：“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毛泽东的这种过分的估计、过度的敌我矛盾的比较是最终导致文革不可收拾的主因。毛泽东的这封信给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看过，后来又给周恩来看了，林彪也看到了，而且还不安，为了林彪的不安，毛泽东同意销毁此信的原件，秘书徐业夫抄写的那份抄件后来留存成为日后清算林彪的一个重磅炸弹。

“5.16通知”、“5.18讲话”和“7.8日来信”，这三个大手笔把文革的发动的内情和文革指向的人都做了交待，而且这三个手笔还都是递进式的。“5.16通知”是正式的中央文件，而“5.18讲话”则是对它通俗的解说，5.18讲话充分的体现了林彪对毛泽东文革主题意识的摸查比较到位。作为江青集团的头面人物张春桥在“5.16通知”出来后还不是完全理解，没有意会到“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指的就是刘少奇，（实际上刘少奇自己也未必就意识到“赫鲁晓夫”指的就是他自己，他跟胡志明说过，党内的赫鲁晓夫已经找到了，他就是彭真。）而林彪在“5.18讲话”中已经不点名的点名了。【注2】（《大动乱的年代》15页、《回首文革》第二卷723页）至于毛泽东的7月8日来信虽说在小范围内传播，可已经进一步的把文革的“航程”给予指明。林彪在1967年5月的一次会见外宾的插话中说：“有人说毛泽东同志拉一派打一派，现在中央领导同志凡是在群众中有威信的，全是毛主席事先将文化大革命的底交给他们了。所以，他们未犯错误。”【注3】（《大动乱的年代》26页）毛泽东“交底”的固然没有犯错误，可毛泽东没有“交底”的便大难临头了。

1966年5月25日，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什么？》大字报在北京大学的校园里贴了出来。署名者是聂元梓，北大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的大字报受到周恩来的批评，却得到康生、曹轶欧夫妇的青睐，康生虽然没有直接表态却把这份大字报寄给毛泽东。对于社会上出现的越来越多的混乱现象，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中央一线领导请示远在外地的毛泽东是否可以派工作组，5月30日，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联合写信向毛泽东请示：“拟组织临时工作组，在陈伯达同志直接领导下，到报馆（指人民日报社）掌握报纸的每天版面，同时指导新华社和广播电台的对外新闻。”这封信是由刘少奇执笔写的。毛泽东当天就做出批示：“同意这样做。”总政治部副主任刘志坚后来回忆说：“中央领导商定之后，周恩来当场就走进隔壁房间，用电话向停留在杭州的毛泽东请示，获得口头同意。”可见，在派工作组问题上毛泽东是支持和赞成的，也是按照正常的组织手续获得了毛泽东的认可。5月31日，陈伯达去《人民日报》接管了大权，随即就在6月1日抛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给本来已经日渐激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再添一把柴火。这是陈伯达了解的毛泽东需要的“天下大乱”的模式，可在刘少奇、邓小平看来乱不是乱了敌人，而是乱了自己。就在刘邓等人对《人民日报》社论倍感困惑之际，毛泽东在同一天给康生、陈伯达发来指示：“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也就是说毛泽东同意了聂元梓的大字报，而且给予高标准的评价。

价。按照毛泽东的这项指示，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的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刊登出由王力、关锋、曹轶欧执笔写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直接炮打北大党委书记、校长陆平，这张大字报的作用很快就在全国反映出来，一些地区的师生纷纷到省委、市委机关贴大字报，炮轰省委主要负责人。混乱的矛头终于如有人所希望的那样指向了高层。

刘少奇、邓小平对于这种混乱的局面从一开始的态度就很鲜明，那就是利用工作组进行必要的抵制。但是，他们的做法却没有和毛泽东远在外地的思路合上拍节。6月10日，毛泽东同各大区的负责人谈话时指出，不要怕乱，要坚决支持文化大革命，最初的打击面过宽也不可怕。他说：“关于文化大革命，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这样把一切牛鬼蛇神揭露出来。”【注4】（《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1417页）就在同一天他和越共领导人胡志明会晤时还说：“我们都是七十以上的人了，总有一天被马克思请去。接班人究竟是谁，是伯恩斯坦、考茨基，还是赫鲁晓夫，不得而知。要准备，还来得及。总之，是一分为二，不要看现在都是喊‘万岁’的。”【注5】（《毛传1949—1976》下卷1418页）由此可见，毛泽东是把这场署名“文化大革命”的运动看作是一个更换接班人的手段，也反映了他在重大人事变动上的一贯思考和忧虑。

工作组派出的目的是制止混乱，而大学校园出现的运动的本质是制造混乱，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很快就对立起来并且矛盾重重。7月13日，刘少奇召集中央会议讨论工作组的问题，陈伯达提出反面意见，他主张把工作组撤回来。刘邓没有意识到陈伯达的主张大有背景。就在陈伯达提出撤销工作组的意见不久，毛泽东返京。作为中央实际主持工作的第一副主席的刘少奇按照惯例去向毛泽东汇报近来的工作却遭到挡驾，相反康生、张春桥、陈伯达等人则鱼贯而入，并把所谓的第一线的“战报”向毛泽东进行汇报。毛泽东对于北京出现的“冷冷清清”的政治状态大为不满，他高度的定性说：“怪不得到处镇压群众，现在才明白有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注6】（《毛传1949—1976》下卷1422页）毛泽东错误的认为刘邓力主稳定是“镇压群众”，错误的把刘邓等中央一线领导人认定为“资产阶级司令部”，因为这种错误的认知最终导致政治混乱局面的一发不可收拾，也让某些人趁虚而入，大肆攫取政治资本。

7月24日、25日，毛泽东连续找人谈话表明自己的立场是反对派工作组的，并且谈了工作组的弊端。7月26日，根据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精神，中央决定撤销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都对派出工作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做了相关的说明，还说这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毛泽东对于一线中央领导的检讨没有太多的满意，他从工作组事件中发觉必须要采取一个必要的手段意即人事上的变动从而保证在推动文革进程的全部政令的畅通无阻。于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便诞生了。

1966年8月1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正式召开，全会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在全会上刘少奇不断作出检查，而毛泽东则不断插话，不断打断刘少奇的发言，时而还夹杂大量的尖锐的批评和挖苦。当刘少奇说：“……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北京的情况一星期向主席汇报一次。这一段我在北京，文化革命中有错误，特别是工作组问题上出了问题，责任主要由我负……陈伯达同志正式写了一个不要工作组的书面提议，有两条。讨论时，多数同志的意见还是要工作组。最后我也发言，说我是主张要工作组的，工作组这个方式比较方便，要去就去，要撤就撤。”毛泽东插进来说：“当时只有去的问题。”刘少奇解释说：“那个时候已经是撤的问题。我说这个比较简单，要撤，下一个命令就撤了。”毛泽东反驳道：“陈伯达撤了，你们就没撤。”刘少奇只得又解释：“当时我考虑，这样大的运动，北京各院校大部分组织已经瘫痪了，怕中断了党的领导不好。”“怎么会中断呢？”毛泽东又插了一句。刘少奇说：“当时我想，是不是下这个决心撤，还是先看一看。这个时候主席回来了，我们就请示。主席就下了决心，撤销工作组。主席头一天就跟有些同志说了。陶铸同志、李雪峰同志也到我那个地方谈了。”毛泽东再次打断了刘少奇的讲话，厉声说：“工作组，不到百分之十是好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作组完全是错误的。不管怎么样是做了坏事，一不能斗，二能不批，三不能改，起了一个镇压群众、阻碍群众的作用，起了坏作用。”毛泽东还声色俱厉的批评道：“中央自己违背自己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等到学生起来了，又镇压他们。说轻一些，是方向性的问题，实际上是方向问题，是路线问题，是路线错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这次会议要解决问题，否则很危险。所谓走群众路线，所谓相信群众，所谓马列主义等等，都是假的。已经是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的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刘少奇只好再度检查说：“这段时间主席不在家，我在北京主持工作，我负主要责任。”毛泽东反唇相讥：“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毛泽东怒气不息，继续指责道：“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刘少奇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这时叶剑英插话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注7】（徐彬著《风雨福祿居—刘少奇在文革中的抗争》92、93页和《毛传1949—1976》下卷1427、1428页）

尚存余怒的毛泽东在同刘少奇激辩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5日，挥笔写下著名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全文如下：“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可是在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和一九六四年形“左”而实右的错误倾向，岂不是可以发人深醒的吗？”以上这些文字最先是写在6月2日《北京日报》头版转载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左面，下书1966年8月5日，无标题。秘书徐业夫做了誊清，毛泽东在誊清稿上加了标题《炮打司

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在文字上做了一些修改。这篇被看作是檄文一样的重要文章很快就在8月7日印发中央全会，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毛泽东文中所指究竟是谁，刘少奇的地位此时已经岌岌可危。周恩来大抵已经看出内中的奥妙，他对王稼祥说：“党中央主席的接班人或者是林彪，或者是邓小平。”王稼祥说：“你老兄也是一个。”周恩来说：“我只能当一个跑龙套的演员，不能掌舵。”【注8】（《疾风知劲草——毛泽东与王稼祥》300页）周恩来的看法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毛泽东决定利用这次中央全会彻底解决一下接班人的问题。只不过，接班人人选中没有邓小平，而是没有参加十一中全会开幕式以养病名义住在大连的林彪。

林彪从全会开幕就没有身临其境，而是请假养病。表面上看起来林彪的养病似乎有着一种“超然”的意味在里面，其实不然。从1959年便开始极力鼓吹个人崇拜并且身体力行的林彪所盼望的正是这一天的到来，政治摊牌的结果林彪已经知晓，新出笼的党中央主席的接班人“舍他其谁”？最早利用“突出政治”清洗政治上的异己者的林彪都没有超然出局，何以到了关键时刻反而要去养病呢？而此后文革初期林彪的种种表现、种种排斥异己的做法和手段更不能说明林彪此时的养病是什么超脱。相反，从林彪返会的时间看，正是毛泽东准备批发《炮打司令部》一文的前夜即8月6日晚（毛泽东秘书徐业夫给林彪打电话要他回来），林彪奉调选择这样的时间赶到会场，不能不说是别有一番深意的。

林彪乘坐由吴法宪亲自陪同的空军系统的飞机赶回北京的当晚就住进了人民大会堂的浙江厅，随后在8月8日在中央全会上露面。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简称“十六条”）。当晚，林彪接见中央文革重要成员江青、陈伯达等人，林彪说：“这场运动是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我坚决支持，军队的干部战士也坚决支持。”、“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最高司令就是我们的毛主席。”、“你们都知道前一段发生了什么事情，要不是毛主席又把局面扭过来了，文化大革命运动就会夭折、中断，资产阶级就会占优势，我们就要打败仗。”、“我们都要做好准备，这次经过大震动的大战役，打下基础，是很必要的。”、“要弄得翻天覆地，轰轰烈烈，大风大浪，大搅大闹，这半年就要闹得资产阶级睡不着觉，无产阶级也睡不着觉。”林彪的话言简意赅，对于中央文革乃至文化大革命都是一个明确的表态，因此得到了毛泽东的赞扬。8月11日，林彪的“5.18讲话”也印发全会。虽然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引起了全会的震动，却并没有得到具体的响应，很多领导干部心存疑惑，既没有紧跟，也没有欢呼，只有包括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在内的一部分人兴高采烈。毛泽东对于这种现象洞若观火，所以，他突然提出要改组中央的领导机构，大出与会者的意料。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依次递补了杨得志等6人为中共中央委员，通过了《关于撤销和补选书记处书记的决定》，认可了此前的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组织处理，撤销了他们的书记处书记、候补书记的职务，补选陶铸为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叶剑英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同时，中央全会选举产生了6位新的政治局委员，包括陶铸、陈伯达、康生、叶剑英、徐向前、聂

荣臻，补选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2 人即刘宁一、谢富治，补选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3 人包括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最为引人注目的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改组，从原来的 7 人扩大到 11 人，新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有陶铸、康生、陈伯达和李富春。而原来一直排名第二的刘少奇被下降到第八位，林彪则升至第二位。邓小平在这次全会上和刘少奇有所不同，并不是挨批的主要对象，小组会上除了谢富治对邓小平有所攻击外，其他人并没有谈及邓的所谓的“错误”，而且邓小平获得的选票是全票，和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一样，是常委中获得全票的四个人之一，按照以往的规定，邓小平本来应该名列第四，但在 8 月 6 日毛泽东审核中央常委排名顺序时，毛泽东亲笔把陶铸勾到周恩来之后、陈伯达之前。【注 9】（《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 46 页）尽管如此，毛泽东对待邓小平还是保留了一定的政治感情，他对中央文革成员王力说：“如果林彪身体不行的话，我还是要邓出来，至少是常委。”这番谈话发生在 1967 年 7 月 18 日，说明在批邓一年之后毛泽东心目中还对邓有着异乎寻常的看法。据邓小平自己回忆，毛泽东还找过他，要他和林彪搞好关系，邓奉命去和林彪谈话，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注 10】（《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37 页）“一山难容二虎”，林彪是不可能与邓小平“畅谈愉快”的。因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不再予以提及，林彪成为唯一的一位中共中央副主席，成为毛泽东的第一助手。其实，这种情形早在全会期间就有人提出：“我们党，毛主席是最高统帅，林彪同志是副帅。今后的一切大政方针，都要由主席和林彪同志决定，其他人都是做具体工作的。”“林副统帅”的名称已经呼之欲出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就是突出了林彪的地位，而且这种突出显得十分的严重、刻意、造作。全会不但全面的肯定了林彪对毛泽东的集中吹捧，有的人还大手笔的称赞林彪“最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跟毛主席最紧、跟得最好”、“这样的人（接班人）只有林彪，这已是众望所归。”林彪虽然接班人的身份在第九次全党代表大会上给写进党章，但是，这次中央全会实际已经明确了下来。林彪既然成为接班人，那么自然也要拿出一些必要的姿态出来，他提出了三条办法，作为文化大革命中考核干部的主要指标，林彪说：“第一条，高举不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罢官。第二条，搞不搞政治思想工作。同政治思想工作捣乱的、同文革捣乱的，罢官。第三条，有没有革命干劲。完全没有干劲的，罢官。”林彪还进一步阐明文化大革命的政治目的，他说：“这次要罢一批人的官，升一批人的官，保一批人的官。组织上要有个全面的调整。”对于他自己一下子到了“副统帅”的地步，林彪又不免做了一番“谦逊”的表演，他说：“我最近心情很沉重，我的工作和我的能力是不相称的，是不称职的。我意料是要出错误的，但是要力求减少错误，依靠主席，依靠常委同志，全体同志，文化革命小组的同志，以主席为轴心，我们做磨盘，一切照主席指示办事，不能有另外做法，不能有两个方针，两个司令部，不能以想当然代替主席的想法，不能唱对台戏，要一元化，紧跟主席。主席处理问题，有全盘考虑，高瞻远瞩，还有他的想法，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我没有别的本事，就是依靠群众的智慧。就是依靠领袖和依靠群众。要相信主席的天才，相信主席的英明，相信主席的智慧。一切请示主席，一切照主席的指示办事。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我们就是这

样去做，有时也免不了要犯错误，跟不上主席思想，怎么办？办法就是朝令夕改、不坚持错误，随时修正错误。主席是世界的天才，我们同他比较差别很大，错了赶快改。中央给我的工作，我自知水平、能力不够，恳辞再三。但是，现在主席和中央已决定了，我只好服从主席和党的决定，试一试，努力做好。我还随时准备交班给更合适的同志。”林彪的这段讲话里首次明显有别于其他领导同志把毛泽东称之为“天才”，其次林彪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对于毛泽东的指示，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全面神化毛泽东。在林彪的这些异常诚挚、恳切的语言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或者说唯一的一个最能遵从、服从、盲从毛泽东的身体力行者的轨迹，然而，就是这位嘴上把毛泽东歌颂的“乃神乃圣”的“接班人”几年之后第一个跳出来反对毛泽东的提议最后同毛泽东分道扬镳、决裂到底。

林彪的晋升所收获的并不都是鲜花和掌声，他做作的演讲和格外谦虚的表演也没有能够完全蒙住所有人的眼睛。就在林彪当选“副统帅”之后，还有几位难得的忠贞之士一吐骨鲠之言。

陈毅，作为党内难能可贵的素以直言著称的开国元勋，他对林彪实在太过了解了，以往林彪的那些的所谓的“突出政治”就没有获得过陈毅的好评，庐山会议结束后，陈毅成为党内第一个登门看望彭德怀的高级领导人，这也间接的表达了陈毅对庐山会议的真实看法。就在一片吹捧声中，陈毅又一次半公开的质疑了林彪。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就在林彪还于会内外大谈刘少奇、邓小平犯了“资产阶级路线错误”的时候，陈毅在和陈丕显、叶飞等人的聚餐会上不点名的谈了他对林彪的看法，陈毅说：“德国出了马克思、恩格斯，又出了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佩服得五体投地，结果呢？马克思一去世，伯恩斯坦就当叛徒，反对马克思主义！”“俄国出了列宁、斯大林，又出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比亲生父亲还亲。怎么样呢？斯大林一死，他就焚尸扬灰，背叛了列宁主义！”“中国现在又有人把毛主席捧得这么高！毛主席的威望国内外都知道，不需要这样捧嘛！我看哪，历史惊人地相似，他不当叛徒我不姓陈！”陈丕显作为当事人回忆陈毅的表情是“说到最后一句时，陈毅浓眉倒立，怒目圆睁，一字一顿，斩钉截铁！”【注11】（《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85页）而远在江苏的原江苏省委负责人之一的刘顺元也有和陈毅类似的看法与观点，刘顺元直言不讳的说到：“林彪过去有战功，他现在鼓吹顶峰论、背语录、唱语录歌，分明是搞愚民政策、别有用心嘛。”

“林彪鼓吹的一套完全违反马克思主义，就是因为他会拍毛的马屁，毛也相信了。”【注12】（《刘顺元传》361页）国民党元老、湖南省省长程潜得知林彪窜升到“副统帅”时对家里人讲：“林彪诡计多端，没修养，一副奸相，绝没有好下场。”程潜的孩子还把程潜的这句话说了出去结果遭到批斗和围攻。

如果说陈毅、刘顺元、程潜等人不同程度的和林彪有所接触才能够清醒的得出以上的认知，那么在一些干部群众队伍中对林彪的本来面目的识别并且直截了

当的给予指出也大有人在。曾经是一名优秀的中共党员的舒赛（女）在听取了林彪在八届十一中讲话后，按耐不住内心的激动，对林彪的讲话进行了逐条的批驳，她暗自写道：“真正的头号‘黑帮分子’林彪，是个阴险恶毒的政治阴谋分子……他骗取信任，利用党给予的权力，树立个人势力……他拼命制造政治术语、专用词汇、文字和语言上的混乱，不过是为了制造政治、思想以至组织上的混乱，妄图趁乱浑水摸鱼，各个击破地整倒、暗害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骨干，再进一步打倒毛主席实现其篡党、篡政和篡军的阴谋。”舒赛还在1966年12月初将以上的一些个人观点用大字报的形式在北京一些地方予以公开张贴，她也知道此行的危险，临走前还对家人做了必要的交待。其后舒赛被捕，在审讯中，舒赛据理力争、毫不变色，以致于令当时的审问人员也为之动容。舒赛于1971年5月24日含冤而死，她死后不到4个月，林彪便举家叛逃摔死在温都尔汗，舒赛生前的预言得到了验证。安徽籍的解放军拉萨某部文书石仁祥在仔细阅读林彪的“5.18讲话”后，在日记中对林彪的讲话如此评价：“是一个变相的在革命词藻掩盖下的反革命的‘白皮书’。”石仁祥还把他自己对林彪的真实看法向部队领导反映，但都遭到批评。1967年12月26日，石仁祥就在毛泽东生日这一天，把《致中共中央的一封信—关于林彪问题的汇报》寄给毛泽东、周恩来、中共中央、济南军区、武汉军区、南京军区和他所在的部队。石仁祥在信中列举了林彪的28个罪状，指出林彪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耍弄反革命两面手法，口是心非。此后，石仁祥不断写出诸如《国贼——走狗又一存照》、《对林彪要全国、全党、全军共讨之》等，直接认定林彪“万恶祸根”、“言不由衷的赞扬、皮笑肉不笑的捧场和当年赫鲁晓夫是一丘之貉。”石仁祥还预见性的说：“让他（林彪）阴谋得逞，那么国家就要变颜色，党就要变成法西斯党，那时的中国不知何等悲惨！”1969年1月8日，石仁祥被捕，在审讯他的笔录中，我们至今还能看到他铮铮铁骨。就在监狱中，石仁祥还在墙上写“打倒林彪”，他始终认为他写的那些反映林彪的东西不是“反动”的，而是进步的。1970年7月12日，石仁祥被错误的处决，时年28岁。一年多以后，林彪的政治画皮终于给全面揭露出来。1978年11月24日，石仁祥一案获得平反昭雪，石仁祥被追认为烈士和中共党员。（参见纪希晨著，人民日报出版社2001年4月版，《史无前例的年代》下册482—487页）北京农大附中的两名学生化名伊林·涤西给林彪写了一封公开信，并于1966年11月18日将公开信印制成为传单公开散发，在公开信中，两名中学生尖锐的批评了林彪神化毛泽东的一系列讲话，并且认为林彪的所作所为有把中国共产党引向歧途的危险。作者此后虽遭逮捕，但是，作为难得一见的“文革惊雷”的“公开信”却永远的被刊载在青史之间。

尽管陈毅、刘顺元、程潜、舒赛、石仁祥、伊林·涤西等人表达了对林彪的具有先知性的预见，但是，他们的声音实在太微弱了，比起极左的狂飚和文革的狂热几乎微不足道，更不用说能够上达天听了。林彪暂时并没有因为他们背后或者公开的直言而受到任何挫折，反而继续在政治舞台上大肆表演。1966年8月18日，林彪陪同毛泽东首次接见北京和全国的各地的红卫兵与群众代表，林彪在这次接见活动中鼓吹“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打倒一切资产阶级保皇派、打倒一切牛鬼蛇神”，一连串的打倒的字

眼令本来已经狂热在胸的青年造反派、红卫兵们更加踊跃、激动，文革的混乱的态势由此愈加不能收拾。林彪是熟悉毛泽东此刻的政治心态的，他知道毛泽东这时多半的思路还在“放”的阶段，所以，他也尽可能的在一切公开场合下表明自己支持“放”。1966年10月1日，第二军医大学“红纵”派头头向毛泽东、林彪反映军队院校镇压群众运动，和地方不同，设置了很多框架。林彪随后就通知全军文革发一个紧急指示，让军队院校文革的做法和地方保持一致。这份经过张春桥等人修改的《紧急指示》还被林彪要求来京串连的军队院校的师生集合宣读。然而，这种大冲击、大动乱并没有给国家带来任何实质性的好处，反而因为这种无序状态的蔓延以致于波及军队，哄抢军事机关成为一种“时尚”，这就让一些军队领导人忧心如焚。1967年1月24日，全军文革组长徐向前晚饭后直闯毛家湾林彪住地，径直找到林彪反映混乱的情况，提出军队不能乱，军队要稳定的要求。林彪当即表示同意，还口授指示，经秘书整理汇总为7条，以后又征求叶剑英、聂荣臻的意见，叶、聂都十分赞同，7条命令讨论中增加了一条“加强对干部子女的教育”，形成8条意见，报经毛泽东批准下发全军。此即为著名的“军委八条”。林彪在毛泽东的批示之后不忘肉麻的加了一句话：“主席，你批了这个文件，真是万岁万岁万万岁啊！”批发一个重要文件便是万岁万万岁，林彪的独创尽管有些人不满，可也无话可说，在当时的背景下，这种无聊的吹捧其实也是一种“时尚”。对于“军委八条”的出台，原“林办”秘书张云生有过一个不太相同的回忆，他在回忆录中写到：“（林彪）于1月20日晚紧急约见叶帅、徐帅、聂帅和杨代总长，商量对策，根据大家的讨论，林彪归纳了九条，经他口授，林办秘书郭连凯记录并整理出来，交给当夜召开的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联系会议讨论，准备以军委命令的形式公开发布。”【注13】（《毛家湾纪实》76页）张云生回忆这件事的时间是1967年1月20日，而徐向前回忆的则是1967年1月24日晚，而且张云生的回忆中所说的是林彪约见徐、叶、聂、杨等人，没有提及徐向前直闯毛家湾一事，但是，徐向前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则清清楚楚的记载了他直闯毛家湾的情景，甚至还指出有陈伯达在场。【注14】（《历史的回顾》562页）两者的回忆究竟孰是孰非还有待于历史的进一步澄清，不过“军委八条”的公布下发对于遏制混乱和冲击军队起到了一些不错的作用。

而在起草酝酿“军委八条”的过程中体现了林彪的一个一贯的行事原则，那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旦关己，十万火急。”张云生说：“现在，他（林彪）发现他点的这把火，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他的预料，大有烧到自己头上之势。”【注15】（《毛家湾纪实》76页）因而，林彪决定采纳徐向前的意见，示意军队要稳定。有人说林彪在文革中是一个特殊的“逍遥派”，这是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看法，具有相当的片面性。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毛泽东要林彪主持中央工作，林彪不过主持了几天就不再管，交由周恩来负责。【注16】（《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51页）1967年的“二月抗争”（一度被诬称为“二月逆流”）发生后，毛泽东勃然大怒，连夜召开会议对谭震林、陈毅等人进行错误的批判，然而这么重要的一次会议，林彪居然托病不出，仅派叶群作为代表出席。从以上的几个小片段中似乎可以看到林彪并不怎么热衷于文革运动，其实只要我们进一步的加以分析就会知道林彪之所以那么做自有林彪的心机。林彪本人身体有病，这当然也是他托名韬晦的一种手

段，但是，他长期休养使得他已经和中央一线工作有了很深的隔膜，况且主持中央一线工作其繁剧、纷乱的苦处自然让林彪吃不消，再有，文革初期主持中央工作要应付来自各方势力的责难、平衡各种政治势力的消长，这样吃力不讨好的差使以林彪的“精明”何能为之？林彪自己就说过“千万不要骑上去”的话，林彪是深通“干大事大毛病、干小事小毛病、不干事没毛病”的道理的，所以，他托故不主持中央工作并不是他什么逍遥、超脱的表现，恰恰是他本人取巧的政治心态的一个重要特征。“二月逆流”中陈毅等人对中央文革多有指责，却并没有涉及林彪，这也就是林彪不愿意出席批判“三老四帅”的会议的主因。（三老特指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四帅特指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然而，当谭震林写信给林彪大谈江青的跋扈专横时，林彪很快就将谭震林的信批转给毛泽东，还加了一段自己的看法：“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现将他的来信呈上，请阅。”不料，得到林彪的讨好般的批示的毛泽东却平静的写出：“已阅，恩来同志阅，退林彪同志。”没有一个字能够体现毛泽东赞同林彪的意见或者批评谭震林的来信，林彪的惺惺作态得不到回应，恼羞成怒的他将带有毛泽东批示的来信揉成一团扔进纸篓中。【注 17】（《谭震林外传》130 页）我们都知道，文革中正是林彪本人大肆吹捧毛泽东的话“一句顶的上一万句”，“句句是真理”，还要求全党对毛泽东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而且，林彪在给毛泽东去信中使用了“呈上”这也是林彪紧跟、吹捧毛泽东的一个新发明。（以往都用请或者送）关于这一点我们后面还要详细谈到。如此的超乎全党的尊重毛泽东的林彪竟然因为毛泽东的批示没有对他的看法作出些许回应就把毛泽东的“一句顶的上一万句”的真理般的“最高指示”弃之如废纸，于此益见林彪的所谓的紧跟、所谓的高举包括所谓的逍遥、超脱无一不是障眼法，无一不是在利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文革的混乱给自己的权力之路张目。这也是林彪政治上惯于取巧的一个典型例证。

心忧天下的人面对文革乱局自然忧心忡忡，而希望看到乱局的人则更多的考虑如何乱中取胜、渔人得利。林彪就是在利用局面失控的情况加强了对军队的操控、加紧了对军队中异己者的清洗进而确保其集团的全面形成和扩张。

## 第二节：贺龙蒙难

贺龙是林彪文革中第一个回合打下马的高级领导人，林、贺之间早有矛盾，林彪此人素来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特别是贺龙在主持军委日常工作以来风头甚健、屡获褒奖，尤其是搞了大比武对给以“突出政治”为己任的林彪当头棒喝。这在林看来尤为不舒服，此外，贺龙在解决海军、空军问题上一秉至公，对李作鹏、吴法宪多有批评，这就给林彪一个印象，似乎贺龙专门和他过不

去，林彪曾在背后讥讽贺龙说：“我们的威望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的领导人。”而贺龙对林彪也一样不买帐，1966年7月11日晚，贺龙谈及林彪，愤愤不平的说道：“同林彪的斗争，只要我不死，我就同他斗到底。我就不相信他这一套，他这个人为什么就不能反对？他能代表党？反林就是反毛主席、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他就是想利用党和毛主席的威信吓唬人，使别人不敢说话！”【注18】（《贺龙年谱》775页）贺龙的谈话说到了林彪为人的实质上，也点出了林彪吹捧毛泽东的要害之处，而抱有和贺龙同样看法的人在军队中显然不是少数，林彪既然已经成为党内唯一的副主席、毛泽东的第一助手和接班人，那么怎么可能容忍这种“反骨”日益存活下去呢？所以，林彪之于贺龙那是必将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贺龙的蒙冤从林彪淌平晋升之路的角度看也已经是不可避免的。

林彪、贺龙之间的矛盾还有着历史的渊源。1942年春，贺龙到达延安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有一次，毛泽东同他谈到了林彪，提到在遵义会议时，林彪表面上承认毛泽东的领导，背地里却经常散布不满情绪，甚至骂娘；1938年洛川会议时，林彪不顾全大局，对毛泽东关于留兵保卫陕甘宁边区的建议，默不表态。廖汉生晚年曾经就毛泽东、林彪、贺龙三人的关系做过一段回忆，林彪在抗战时期见到蒋介石以后曾经面谏蒋介石是抗战伟人，而且说了一些比较不符合林彪身份的话，蒋介石在洛阳召见前方将领时，林彪还就蒋介石的问题写了很多好话，给蒋介石评功摆好，这个条子他是写给贺龙的，以后贺龙带在身上被警卫员洗衣服时给洗烂了，这件事林彪引以为心病。【注19】（《廖汉生回忆录（续）》283页）贺龙曾和陶铸谈起林彪，贺龙问陶铸，林彪有没有历史问题？在叶群没有和林彪结婚之前，贺龙和林彪之间的矛盾还仅限于工作上，而一旦加入了叶群，则把一些个人恩怨仇隙增加了进来。叶群来延安之前曾在国民党中央系统的电台里当过播音员，也曾经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工作过，特别是同国民党的军官关系比较密切，并且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举办的“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讲演比赛，而且获奖。并向国民党中央统办的壁报投稿。另外，叶群的家庭背景也比较复杂，叶群的舅舅和国民党当地政府关系很好，叶群能够当播音员就是由于她的舅舅的推荐，叶群的父亲叶君奇本身就是国民党军少将。因为当时国共合作，叶群的这些表现算不得过火，也不能因此就说叶群是“隐藏的国民党特务”，但是，延安整风期间，本着“无事不可对党言”的方针，每一个人都要认真的说清楚自己的历史问题，每一个人都要写自传，包括党的军队的高级领导人在内，然而，叶群没有如实写出来，薛明作为叶群曾经一起流亡的同志，从天津到北平这一段时间中，薛明对于叶群的语焉不详十分不满，出于对党组织的负责态度，对此薛明做了补充，比如薛明指出叶群的入党时间是假的，叶群填写她自己入党时间是一九三六年，然而事实上叶群三六年并没有入党，叶群也说不出当时的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来。叶群在江西期间，表达自己对蒋经国的崇拜之情，和当地县长李林的关系很近，薛明把这些事情向中共中央组织部做了书面报告，在目前留下来的这份报告的抄件（原件已经在叶群逃跑之前被烧毁）中，我们仍旧能够看到薛明当时认真负责的态度，如果用今天的眼光看，薛明未免求全责备，可是，在那时候的那种背景下，薛明这么做是再正当不过的了。贺龙对于薛明的这份材料当时的态

度是不以为然的，他批评薛明说：“你搞的什么名堂，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不过，对于叶群同林彪之间的婚姻，贺龙作为旁观者是不同意的，他曾经就叶群把林彪给她的私人通信公布给大家看一事找薛明谈话，请薛明背后劝一劝叶群，贺龙说：“叶群在马列学院把林彪同志的信给同学们看，这很不好。谈恋爱嘛，你要不同意，就算了。为什么把林彪同志的信给别人看呢？你俩很熟悉，你是不是可以告诉她，不要这样做。”贺龙还以战友的身份劝诫林彪防止敌人把坦克车开到床上来暗指要对身边人多加了解和注意，因为处于战争年代，国共矛盾犬牙交错，贺龙的提醒应该是出于善意，但在林彪看来则不是那么回事。特别是叶群对此更是恨之入骨，以后几次三番的指示折磨薛明都是来自叶群。如果说林彪因为这件事就和贺龙不共戴天的话，那是站不住脚的，不过，这起摩擦对于贺龙同林彪之间的关系投下了新一层的阴影也是自不待言的。

贺龙和林彪的政治斗争的升级是在 1962 年之后。林彪安排李作鹏插手海军，大搞一言堂，肖劲光对此进行了软顶，而贺龙则从一开始就旗帜鲜明的做了不同于林彪的表态。贺龙针对李作鹏在海军内部拉帮结伙曾经这么谈及：“要敢于坚持真理，敢于明辨是非，敢于起来斗争。要把正气扶起来，把邪气压下去。有的人‘老虎屁股摸不得’，一‘摸’就不高兴。我是主张‘摸’的。”贺龙还说：“大姑娘的屁股摸不得，有的人的屁股凭什么摸不得？党章有权利嘛。”然而后面这句话被别有用心的人传了出去，成为“林彪的屁股有什么摸不得”，林彪说：“贺龙在海军的讲话只能代表他个人，不能代表军委，也不能代表毛主席。”他同时也勉励萧劲光“事久自然明”，并且说毛主席还是相信他的。这些事情自然也瞒不过林彪、李作鹏等人的耳报，也因此成为萧劲光的又一条“罪证”，李作鹏等人后来说：“贺龙在海军给萧劲光打气，萧劲光有了后台就疯狂反攻倒算。”

继触动李作鹏之后，贺龙和对吴法宪的一些错误举动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批评。一九六六年，吴法宪曾经在空军内部把对他有不同意见的同志打成“反党集团”，以后有人把这件事汇报给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七月，刘邓指示要对海军、空军的问题进行整顿。七月十一日，贺龙在军委常委会研究空军的问题时，明确指出：“空军内部派性比较大，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只会报喜不会报忧，有些事情就是一面之词，有些成绩经过了解以后发现是假的。”虽然，那时候贺龙已经不再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然而仍旧直言不讳的提出空军出现的问题。可是，贺龙的这种正常的工作上的意见、看法，却被林彪、吴法宪视为插手空军，林彪在听取汇报以后，明确支持吴法宪、李作鹏，林彪说：“海、空军现在班子不动。”八月下旬，他在和吴法宪等人谈话中第一次说到贺龙，他说：“贺龙‘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他还提醒吴法宪注意贺龙，“你要警惕他夺你的权。”吴法宪同时还找到叶群哭诉，叶群也给吴法宪打气，吴法宪在林彪、叶群的指使下，写信给中央和毛泽东，诬告贺龙，该信长达五页之多，对贺龙各个历史时期都做了歪曲，特别是无中生有的指责贺龙要谋反，是罗瑞卿的黑后台，和彭

德怀是同一类坏分子。以后，当审理江青、林彪两案的办事人员向吴法宪出示这些东西时，吴法宪供认不讳。

林彪打击贺龙可谓煞费苦心，就像他以往指挥作战一样认真，为了能够给贺龙最为致命的一击，林彪分为三步来走。

### 第一步叫：削其羽翼

1966年10月，林彪在同军队内部的一些高级领导干部的座谈中首次提出，对于贺龙要“削其羽翼”。这等于说打响了对贺龙的第一枪。那么都有谁才是贺龙的羽翼呢？在林彪看来无外乎这么几种人，第一种原来就是贺龙红二方面军的，比如许光达、廖汉生、王尚荣等；第二种是原来没有渊源，但后来与贺龙一唱一和的，比如罗瑞卿、杨勇等。实际上林彪在打倒罗瑞卿之后就已经把矛头对准了贺龙，他说过：“罗瑞卿这个人不好，总参让他搞，他搞到贺龙那里去了”，后来在打击贺龙的高潮阶段林彪还说：“1964年贺龙搞大比武，是单纯军事观点，冲击了政治，是个大阴谋。罗瑞卿的后台就是贺龙。”而削夺贺龙的羽翼就必须编造一个合适的理由，这也就是后来著名的“二月兵变”的出笼的主因。所谓“二月兵变”起因是1966年7月，北京大学一个工作人员就北京卫戍区曾在2月份来校联系进驻部分部队负责民兵训练一事，写了一张大字报，提出质疑。大字报的标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文中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康生知道后，先说是彭真搞“二月兵变”，后又说贺龙搞“二月兵变”。8月2日，处境已十分困难的邓小平在人民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上公开宣布：“这个二月兵变问题，我们查了。因为我们早知道这个事，我正式跟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林彪准备打倒贺龙，自然不会放过这么一个好的机会。

林彪第一个瞄准的贺龙的“羽翼”就是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王尚荣。林彪给贺龙的“二月兵变”画了一个“蓝图”。在这张图上，许光达是“总参谋长”，成钧是“空军司令”，廖汉生是“负责北京军区和卫戍部队”，而总联络员则是王尚荣。这里面以上几个人的头衔是打倒之前就给安装完毕，只有王尚荣是被打倒之后补发的。而且，在文革中，像总参二级部部长这一级的干部能够得到“林副统帅”的次最高关照的恐怕（最高是统帅）王尚荣怎么也算是比较突出的一位，等到王尚荣倒了以后，特别是整贺龙以后，林彪要斩断贺龙的羽翼的意图开始完全暴露出来，而王尚荣之倒台也就自然在情理之中了。顺便说一句，王尚荣是贺龙二方面军中第一个被打倒的高级将领。王尚荣，1955年曾被授予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湖北省石首县人。15岁开始就参加了贺龙、段德昌的红军。以后历任红三军司令部参谋、侦察科科长，龙山独立团参谋长，第五师十五团参谋长、团长、师参谋长、师长，红三十二军第九十六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团团长，独立第一旅副旅长兼晋绥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陕甘宁边区绥德警备区副司令员，独立第一旅旅长，第二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任第一野战军一军副军长兼青海省军区副司

令员。建国后，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副部长、代部长、部长。王尚荣为人风度翩翩，相貌出众。王尚荣、黄克的红娘罗瑞卿曾经说过王尚荣要是不参加革命也能在社会上找一份不错的工作，因为他长相英俊。王尚荣本人曾经有一张早年拍摄的照片，适时，王身穿军装，侧过身去，左臂微微弯曲，右手拿着一支铅笔，站在军用地图前面，就是这么一张照片居然瞒过了邓颖超，在周恩来逝世以后，在选取周恩来生前照片时，王尚荣的这张旧作被当作周恩来的照片选用了，以后邓颖超才知道，因此特意向王尚荣致以歉意。王尚荣不仅相貌出众，而且才能也比较出众，他在南京军事学院进修期间，从不轻易夸奖他人的刘伯承院长对王尚荣特别欣赏，许之以国家未来军事全局指挥人才。周恩来请刘伯承推荐几位学员到总参工作，刘伯承专门提及王尚荣，说他是“尖子”。此后，王受到毛泽东、周恩来多次的奖掖，在台海作战、对印自卫反击战中都出色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晚年的王尚荣仍旧老当益壮出现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总指挥部中，给越南人送了“一记狠狠的耳光”。但是，进入文革以后，王尚荣的处境变得越来越恶劣起来，由总参“八二五事件”作为导火索，王尚荣就此被打入另册，长期遭到非人的待遇。

“总参八二五事件”的起因是总参外事局群众反对总参外事局局长潘振武（又作国防部外事局局长）作为毛泽东在1966年8月25日上午在钓鱼台12号楼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时作为毛泽东的外事引见人之一。（当时陪同的还有杨成武等人），其中外事局参谋孙启祥还自称代表总参外事局群众向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反映潘振武的问题。潘振武，湖南常德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参加常德秋收暴动。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一军团骑兵团团长兼政委。1934年随中央红军参加长征。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敌工部部长、鲁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嫩江军区政治部副主任、第四野战军后勤部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任广州军区后勤部政委、驻苏联大使馆武官、国防部办公厅副主任兼外事局局长、武汉军区副政委，中共湖北省委书记。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在第四次反围剿后，红军为了改善伙食，专门杀了一头猪，时任管理员的潘振武用辣椒炒了满满一锅回锅肉，江西籍、湖南籍的战士自然拍手欢迎，可福建籍的一些战士则撅起了嘴巴，潘振武一见这副架势，也有些不高兴，对那些福建籍的战士说：“将就一点吧，总比南瓜汤强的多。”潘振武的话音未落就引起福建籍的战士的不满，双方争执起来一直传到保卫局局长罗瑞卿的耳朵里，罗瑞卿把潘振武找去耐心的进行说服教育，潘振武接受了批评，次日就对自己的行为做了修正，赢得了战士们的欢迎，有的人还高呼“管理员万岁”。【注20】（《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36页）而此时潘振武面对的情形显然比起当年的“回锅肉事件”严重的多，这些个不但撅起嘴巴还握紧拳头的“群众”远没有那些个福建籍的红军战士好说话，他们一面找徐业夫一面还去副总参谋长王新亭处要求王主动签字支持他们，王新亭拒绝了。此前，他们找到杨成武，杨成武也没有答应他们的要求，这样一来。“群众”看中了在家值班的作战部部长王尚荣，他们一力要求王尚荣签字。王尚荣说要通过杨总长再说，可是群众不答应，王尚荣就签字了，不仅他签字了，同时值班的另一位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也签字了。就杨成武而言，他对王尚荣是比较欣赏的，刘少奇向他转达中央决定任命他为代总长时，杨成武就推荐王尚荣，杨成武说：“如果非要我来代，那就把我原先管的

作战的一摊子交给王尚荣同志，建议提他当副总长。”而潘振武又是杨成武比较欣赏的干部之一，杨成武本人就不同意撤换潘振武作为引见人的这个主意，王尚荣为什么会签字呢？关于这一点，有的知情人回忆说是当时群众逼人太甚，王尚荣被纠缠的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才签字的，可是，这个解释虽说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完全是事实的真相。杨成武以后在和许世友、王尚荣见面时曾经提及这件事，他说即使八二五事件不发生，你（王尚荣）也一定要出事，有人惦记你的位置很长时间了。杨成武的这句话算是指出了问题的实质性，这件事的关键不是谁参加不参加，也不是谁签字不签字，而是利用这件事“换马”，把王尚荣的作战部部长拿下来换上在有的人看来十分可靠的人的身上。而杨成武也还不过指出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以当时的背景看，不但王尚荣的作战部部长的交椅有人惦记，就是杨成武的代总长也是被看得眼热。

总参的事件惊动了周恩来，他给杨成武和总参写来亲笔信：“杨成武同志转告总参谋部各部、局党委：昨（25）我陪同毛主席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时，杨成武同志向我反映，总参外事局同志提出不要潘振武同志参加接见。杨成武同志同意这一要求，并向我建议不让潘振武同志参加接见，我同意他的意见，并于事后报告了主席。可将这一情况转告有关同志。周恩来 1966.8.26。”次日，徐业夫也写来信：“总参党委：8月25日毛主席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之前，总参外事局孙启祥同志打来电话说，不让潘振武同志参加，我当即报告了杨成武请他决定。这时总理已到，他即向总理反映了我接外事局电话的情况，并向总理建议不让潘振武同志参加，总理当时同意了杨成武同志的意见，并及时告诉了潘振武同志不要参加了。此致 敬礼 徐业夫 8月27日。”周恩来对杨成武说：“人家都要夺你权了，你还不知道。”【注21】（《总参“8.25”事件》载《党史博览》1999年第九期，作者陈虹）随后在8月30日，在叶剑英主持下，肖华、张爱萍、王尚荣等人都参加了一个会议，旨在澄清八二五事件，在会议上，王尚荣做了自我批评，叶剑英也澄清了王尚荣签字的动机，叶剑英后来说，那时候他希望把王尚荣摘出来，因为有人觊觎王尚荣的位置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杨成武在会上也保了王尚荣，这件事看起来应该不会再有太大的风波。然而，林彪很快也介入了这件事，林彪在文革中不是什么事都介入的，更很难就某一事件表态甚至讲话，可是，这件事上林彪很快作出反应，并且说了大篇幅的指示。林彪说：“总参八二五事件是反革命事件，对王尚荣要一挖到底，要穷追不舍，要斗倒、斗臭，要罢官，宁愿提拔一个连长当部长，也不能要这些人。”林彪还别有用心地对杨成武说：“人家要打倒你，要夺权你还不知道。你为什么一定要他当作战部长，我给你调一个连长来当作战部长也比他强。”杨成武对王尚荣签字的这件事并没有像林彪看的那么严重，他在会上就表态说：“此事已经解决，过去了，今后注意团结，好好工作。”后来又一次讲：“作战部的问题，叶副主席召开了会议，已经解决了，没有什么问题了。”杨成武还因为这件事中有贺龙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参与特别向林彪做了解释，证明这件事和贺龙无关。【注22】（同【注21】）但是，杨成武怎么解释，林彪也不会相信，因为这件事在林彪看来是一个绝好的整贺龙的机会，林彪不但就此指责贺龙到处“插手”，还把自己的看法以及有关情况向毛泽东汇报，告了贺龙一状。林彪坚持要把王尚荣、雷英夫换下来，以林彪当时的地位，撤换一个作战部部长、副部长并不

是什么难事。（林彪一个条子曾经把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从造反派手中救出）王尚荣被捕以后，专案组找他谈话的第一句就是问你和廖汉生、许光达去贺龙家里说了什么？你要是勇于和廖汉生、许光达划清界限。王尚荣则证明他从未同廖汉生、许光达一起在贺龙家里见过面。专案组的问话恰恰说明了王尚荣被整倒的背后意味着什么。贺龙一案升级以后，专案组再找王尚荣谈话，让他交待吹捧贺龙的“犯罪事实”，王尚荣说他只说过贺龙在林副主席不在的时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贺龙关心干部，顾全大局。没有说其他的。此后，专案组让王尚荣写出他背后散布林彪身体不行的谣言，王尚荣说这都是杨成武、肖华告诉他的，说林彪副主席身体不好，怕风怕水什么的。专案组立刻让王尚荣闭嘴，不准攻击杨成武、肖华两位首长。等专案组将王尚荣交待的材料汇报上去以后，马上传达吴法宪的一个批示叫整他的态度，意思是说王尚荣态度不老实。于是，专案组成员对王尚荣进行多次毒打，毒打中，专案组成员说：“你不是美男子吗？专打你的臭美作风。”王尚荣下身遭到严重破坏，一只睾丸被打的萎缩，另外一只则被打得水肿，落下了生理上的残疾，终身未愈。雷英夫本来在罗瑞卿事件中还为林彪、叶群卖了些力气，可这次仍旧未能幸免于难。

王尚荣既倒，下一个目标就是国防部副部长、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许光达在历史上追随贺龙比较久，也是贺龙所谓的干将中军衔最高、影响最大的一位，贺龙本人作为修正主义者尚没有受到肉刑，而许光达则一直遭到毒打直至惨死。许光达自从1930年7月，他开始跟随贺龙，此后在长达十八年的革命生涯中，他与贺龙的关系一直比较深厚。然而，在贺龙专案组中，像许光达和贺龙的这种渊源并不是什么罕见的，可是，许光达所受到的“特殊关照”却是绝无仅有的。从贺龙专案组组长到空军司令、专案组的“太上皇”吴法宪，还有海军政委李作鹏乃至林彪对许光达都做过具体的批示，吴法宪等人甚至对如何斗争许光达也做过过细的批语。许光达为人正直、耿介，他是十位大将中最为年轻的一个，在1955年授衔前后，他曾经主动要求给自己降级、降低军衔，受到毛泽东等人的高度赞扬。林彪上台以后，片面强调突出政治，这是许光达不愿意服从的。许光达并不是一个漠视思想政治工作的高级将领，相反他对于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一直抓的很紧，王杰事迹就是许光达推出来的。然而，许光达一直强调的是“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这被林彪等人说成纯军事观点，在突出政治这件事上，许光达和林彪有过不同的意见，许光达在事后说了一些对突出政治有意见的话，随后被人反映上去，那时候政治空气还没有那么紧张，可是，到了1966年就不同了。1966年8月，26军政委程世清给林彪写信，称许光达对林彪最不满、最仇恨，还说许光达有“里通外国之嫌”，“一旦有事，就是一个最大的危险人物”。程世清，河南新县人，1918年出生，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文革中担任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此人是林彪的走卒之一，他对许光达的揭发等于给林彪打击贺龙提供了炮弹。就在程世清的揭发信发出一个月以后，也就是1966年9月8日，林彪在中央军委常委会上点名许光达，说“贺龙准备利用许光达控制总参”，林彪的这个点名给以后审讯许光达定了总调子，根据芦凤歧后来交待说他在第一轮审讯时就问及许光达是不是已经被贺龙内定为总参谋长了？贺龙专案组以后按照林彪的这个讲话把许光达定为贺龙一案中的第二号人物，是贺龙兵变的“总参谋长”。1967年3月6日，装甲兵党委向全军文革小组请示“将许光达、张文舟

作为重点批斗对象”。7月5日，装甲兵政治委员黄志勇主持装甲兵党委工作会议，决定在装甲兵内部成立“斗许、张专案组”，这是以后许光达专案组的雏形。吴法宪对许光达一案的重要批示是：“要连续作战，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对于许光达要敢于刺刀见红”。李作鹏的批示是：“打下许光达，向九大献厚礼。”邱会作的批示是：“不怕许光达死，就怕完不成无产阶级司令部交给的任务。”【注23】（《大将许光达》379页）当许光达被批斗昏倒以后，有人把许光达送进医院以后，在请示报告上，吴法宪批示“医疗要为专案服务”。就这样，在许光达两次住院期间，专案组一共第一次审讯79次，逼写材料25次，出院以后的21天中被逼写材料7次，审讯8次。第二次住院33天，被逼写材料2次，审讯6次，之所以这么少，因为此时的许光达已经濒临死亡。在吴法宪的这个批示下，许光达临死前三天还被专案组逼下跪向毛泽东画像请罪一次。正是由于吴法宪的“刺刀见红”的一说，专案组才提出要“血洗许光达”。至于生活作风一贯败坏的“花花部长”邱会作给许光达一案的最大贡献是照搬他在总后搞专案的经验之谈。邱会作在总后曾经叫嚣过这样一些口号“要学蒋介石！要学打砸抢！要斩草出根！死了省了麻烦！”1968年2月27日，邱会作亲笔批文规定总后办案的“三狠”方针：“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他、消灭他，这是搞专案工作必须站稳的立场……光说理是不够的，必须向敌人专政。对那些拒不交代的人就没办法吗？应当是有办法的。……应当狠斗（坚决打击他的反革命态度），狠审（可连续多少天进行审讯），狠专（敌人拒不交代就整他）。”邱会作让人把这个“三狠”方针介绍到许光达以及贺龙专案组中来，当时的许光达专案组组长薛振先、徐浩（继任者）心领神会。同时，邱会作的总后专政机器还给许光达乃至贺龙专案组贡献了一个招法，那就是找来一些装甲兵医院的男护士作为打手和专案组工作人员，这些精通人体知识的男护士们是非常知道怎样殴打“犯人”才能造成严重的“内伤”而表面上则很难看出来。许光达被捕以后，他的生活秘书陈志文立刻和专案组配合起来抄家，连1938年许光达给夫人邹靖华的情书也被抄走，许光达的儿媳妇曾正魁回忆说，她当时被北京钢铁学院的造反派、红卫兵抓走送到专案组，她进入刑讯室以后，发现一个人刚刚被打死在地，而这时曾正魁已经是一名孕妇了，让孕妇直接面对死者的狰狞正是专案组的杰作之一。目的在于让曾交出所谓的“二月兵变”的黑名单。北京钢铁学院追杀许光达家属的事情被周恩来知道以后，遭到周恩来的制止，曾正魁这才有机会生下了许雪青。许光达在专案组中的追逼之下态度一直不是很好，目前公布的许光达的所谓的交待材料，通篇都是引用的毛泽东的一些警句和名言，还有就是一些含糊不清的话，比如“一切依靠帝国主义的寄生虫，不论如何蠢动一时，他们的后台总是靠不住的，一旦树倒猢猻散，全局就改观了。”这句话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所以，许光达专案组后来的组长徐浩、副组长姜永兴对许延滨说：“许光达很顽固，我们谁和他去谈话他都骂人。”许光达被抓以后，从1967年12月开始被批斗，经常遭到罚站、弯腰，其中还有一次大规模的车轮战，三天三夜没有让许光达休息。贺龙专案组常务副组长芦凤歧指示把许光达的伙食标准下降为标准犯人，每月不得超过12元。半个月后降到8元。装甲兵保卫部副部长、原许光达专案组组长薛振先率先武斗，把许光达打昏。原装甲兵保卫部工作人员党志壁因为许光达说过他是“小贝利亚”对许光达大打出手，以致于许光达口吐鲜血，另一位专案组成员都曼林因为殴打许光达有功被提拔为兰州部队某军副军长。倍受折磨的许光达于1969年6月3日晚上十点

在没有看护人员的情况下，惨死于马桶之上，死因至今没有完全落实。早在许光达死前，周恩来就做过指示要对许光达的身体做深入的治疗，这是周恩来在对罗瑞卿专案组成员谈话时提及的，以后许延滨又给周恩来写信，但是，信被退回许延滨处。

许光达挨整的同时，国防部副部长、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廖汉生也厄运临头。廖汉生是贺戊妹（贺龙二姐）的女婿，也就是贺龙的外甥女婿，以前有人一直说廖汉生是贺龙的外甥，实属不确。以后，廖汉生和杨尚昆的五妹白林结婚，仍旧和贺龙保持一种类似于亲戚的关系，用廖汉生自己的话说，他去贺龙家，就像走亲戚一样，不用电话通知，也不用在乎他们家里谁在。再有，廖汉生曾经是贺龙大姐贺民英的警卫员，廖汉生同贺龙一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贺龙垮台是不可能不牵扯到廖汉生的，而且，也需要廖汉生出来做这么一个“陪衬”。建国后第一届国防部的副部长中共有七人，他们分别是：黄克诚、谭政、萧劲光、王树声、肖克、李达、廖汉生。这里廖汉生虽然叨陪末座，可已经比较令人瞩目，廖一做就是三任，直到文革开始。廖为人脾气急躁、说话很“冲”，在北京军区工作期间和司令员杨勇的关系不好，二人在军区会议上吵架的事情居然飘到毛泽东的耳朵里，毛泽东让郑维山把他们俩人找来，对他们说：“你们已经闹了一次了，不要闹了。”【注24】（《廖汉生回忆录一续》258页）1967年1月8日，廖汉生被造反派组织诱捕，说是去看大字报。文革中的这些造反派一词是笼统的说法，其实他们当中的成份相当复杂，很多人很多组织都是背后有人指使甚至来头十分之大的，他们即使抓错了人、办错了事也不会受到过分的责难，聂荣臻还没有被点名时，造反派就贴出来聂荣臻的大字报，“北京火车站的一幅最为“壮观”，一辆解放牌大卡车横过来竟遮不住其中的一个字”。造反派中间有学生，也有一些机关干部，还有一些是中央文革指派的所谓的“钉子”，往往是联席碰头会刚刚有了意见，这边造反派就已经取得了发言权。廖汉生自己的“罪状”最早不是从中央专案组那里听到的，而竟是从造反派口中得知的。于此可见，造反派的力度之大。廖汉生的四条罪状分别是，第一个和杨尚昆勾结，这是主要是因为廖和杨尚昆的亲属关系，所以，廖本人也“荣幸”的加入了杨尚昆专案组的审查队伍中，成为一个“罕见”的“双料修正主义分子”（指的是党内、军内双料）。第二条是插手第一军。这点实际上因为贺龙询问廖汉生关于第一军领导成员变动的情况时，廖说出了自己的意见而已，扯上这一点主要是把他和贺龙、彭德怀挂上钩。第三条是廖汉生每年去新疆视察其实是为了贺龙兵变“踩点”。1962年，新疆发生逃亡事件，中苏关系越来越紧张，罗瑞卿打报告给毛泽东希望每年要对新疆作出视察意见来，防患于未然，毛泽东做了批示，同意派廖汉生前去，所以，廖每年都去，专案组提出这一条以后，廖让他们去查一查再说，结果，一查以后，再也就不问了，因为他们找到了毛泽东亲笔的批示。最后一条是说廖汉生对总部不尊重。四条罪状两条是涉及贺龙的，廖作为贺龙手下的大将被专案组排名在许光达之后，是张飞一流的人物。1967年1月19日，廖汉生在北京工人体育馆挂牌批斗，还被做了“喷气式”，和他一起的批斗的特别是站成一排的还有许光达、王尚荣、饶正锡三人，其中总后勤部副部长饶正锡的罪名居然是“彭黄漏网分子”，（饶正锡本人担任过晋绥联军、西北野战军中的部队领

导职务，和彭德怀、贺龙都有过从）比较廖等人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饶正锡低了一等，可是，他却比廖等人多关押了一年多。对比许光达、王尚荣的审查待遇，廖汉生实在是“轻松”的多，最严重的是1968年2月，也就是毛泽东1968年1月点名贺龙以后，一天审问廖达四次之多，而且，不准休息睡觉，一旦说的不符合专案组胃口，就被呵斥、责骂和侮辱，然而始终没有殴打。这点比起许光达和王尚荣乃至黄新廷、赖星云等人的境遇来说已经是十分的“难得”的了。实际上从后来贺龙专案组的主要成员供述中知道，廖汉生专案并不是重点，原因是廖本人的很多行动基本上或者说完全上同贺龙联系不到一起去，就是北京军区号房子一事也不是廖去办的，也不是廖指示办的，廖本人所谓的对总部不尊重所发出的言论中的几位领导人都在文革中被批臭打倒，根本不成为罪证。所以，对廖没有进行进一步的“斗争”，而且，廖本人在专案审查期间态度不太好，也没有按照惯例“打他的态度”。林彪死后，毛泽东让李德生去找廖汉生，转达了两条指示，第一条是廖汉生有错，但是没有罪；第二条是解除监护。毛泽东说：“廖汉生和杨勇一样，都是没有什么罪，都是未经中央讨论，被林彪暗中整下去的。”就这样，廖被安排到军科院做了政治委员，时间是1973年12月。

成钧，湖北石首人，1955年被授予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时任空军副司令员。成钧本人自从1959年4月兼任空军技术部部长以后，在空军指挥本部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在贺龙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以来，同贺龙的关系很好，走的也比较近，因而被看作是所谓贺龙“集团”的干将。审成钧主要来自这么几点的认同，第一个是成钧和空军几个主要负责人的关系一直紧张，特别是和吴法宪的关系较差，吴法宪对林彪说过，他指挥不了成钧。第二个是康生的点名，康生说过，成钧是贺龙在空军的黑干将，他管技术，没有他，贺龙兵变不能成功，他是贺龙兵变以后的“空军司令员”。江青也点了成钧的名，江青说：“成钧是大土匪、大军阀贺龙的死党。”在这样多重压力下，成钧所受到的酷刑是显而易见的。

王尚荣、许光达、廖汉生、成钧这些被看作是贺龙的“羽翼”的人相继遭到打倒，对付贺龙的外围已经被林彪扫开。林彪目前要做的是直捣贺龙的“腹心”，而要把贺龙置之死地最便捷的途径无外乎两条，一条是通过“历史问题”搞臭贺龙，一条则是通过毛泽东的允许将其彻底打翻。前一条的历史问题又是能够动摇毛泽东对某些干部信任的最大杠杆。为了给贺龙栽赃，林彪等人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力量，分别利用晏章炎、李仲公、宋治国等人的所谓的揭发材料向贺龙的头上泼足了脏水。武汉市二十中学教师晏章炎的父亲曾经做过蒋介石军事委员长南昌行营第三厅厅长，他说贺龙曾经和蒋介石的招抚大员熊贡卿来往密切，而且有乞降的事情。事实上，贺龙亲自下令枪毙了诱降的熊

贡卿，为此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曾经就此给中央写了报告说明，报告的原件就存于中央档案馆，在晏章炎这封信拿到手以后，江青、康生等人亲自向林彪汇报，在没有调查取证的情况下，此事就成为贺龙的“罪状”之一。李仲公是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长，贵州人，曾经奉蒋介石之命劝导贺龙“归顺”被贺龙一度扣押，解放以后，李仲公曾经以自己是贵州人地理人物熟悉为由请周恩来任命他做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周恩来因此想到贺龙，请贺龙出面和李仲公谈一谈，李仲公见到贺龙以后很慌张，贺龙揭了李仲公的老底，李仲公灰头土脸，“自知无趣，赶紧告退。”就此李仲公怀恨在心，当1968年3月26日，贺龙专案组到国务院参事室来了解贺龙的历史问题时，李仲公在专案组的逼迫之下把贺龙的两封信交给专案组，据李仲公称这是贺龙的亲笔信，内容是一九二九年贺龙向蒋介石表示要投诚。此信交给周恩来的联络员郑凯以后又由总理办公室交给林彪处，林彪做了“此件很好，说明贺龙一贯立场如此”的批示，然后送毛泽东处，据说毛泽东看信以后大为动容。此外，叶群让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宋治国写出诬陷贺龙的六点证明材料。宋治国写的“揭发”材料中主要提到以下六点：1. 罗瑞卿家里办公桌下面压了一张照片，是罗瑞卿、贺龙、薛明、郝治平的合影，天天看，没有毛主席的照片。2. 我（宋治国）觉得贺同罗瑞卿、彭真、杨尚昆等反党分子来往很密切，他们经常密谈。3. 贺龙亲自保管1支精制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4. 贺龙对警卫人员教育不是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把枪法练好，并且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百发百中。5. 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120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6. 据说贺龙曾经在他家电话上安装了一个窃听器。宋治国的这份揭发材料是在叶群的不断督促下写成的，这份材料出笼以后，林彪马上作出批示，连同李作鹏、吴法宪诬陷贺龙的材料一起送到毛泽东处。当然，还有所谓的“二月兵变”的材料。应该说，这些材料对于贺龙的蒙难起了比较重要的负面作用，它虽然并不是主导贺龙悲剧的唯一途径，却在关键时刻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

林彪深知，像贺龙这样级别的领导干部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批准，那是根本不可能被打倒的，而要影响毛泽东的决策除了呈递这些有关材料外，就是利用贺龙对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态度来干扰毛泽东的决策。恰恰在这点上，贺龙留给他人的空子比较大。贺龙本人对毛泽东是具备无比的崇敬和仰慕，毛泽东曾经要求领导干部称呼正规化，不要动辄称“总”，而是要直呼同志，贺龙立刻就让大家对他改称呼，毛泽东号召医生都到贫下中农中间去，贺龙宁可身边不留医生，也让保健医生下去蹲点。1960年，毛泽东指示不准搞个人宴请和文艺演出，贺龙其时在河北承德视察部队，部队首长因为曾经是贺龙的老部下，专门给贺龙办了一桌普通的酒席，可是，贺龙始终没有出席，曾昭耆说：“贺总……他对毛主席是十分信服的，我们都能看得出来。”【注25】（《红色保健》243、249页）但是在文革的态度上，贺龙紧跟的节拍显然落后了很多，他和其他一些较为正直的领导干部一样不理解毛泽东晚年为什么要发动这起政治运动，为什么听任混乱的局面不断蔓延。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批判刘、邓的党内生活会上贺龙始终没有发言，一次，毛泽东问贺龙：“你发言了没有？”贺龙说：“还没有发言。”毛泽东又问：“怎么不讲一讲？”贺龙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噢！”在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揪工作组时，

有人将反对刘少奇的大字报贴到了王府井大街上。贺龙说：“这样做很不妥当，刘少奇还是国家主席嘛！”、“把一个国家主席弄成这样，对外影响多不好。”刘少奇的妻子王光美参加了清华大学工作组，贺龙要薛明立即到人民大会堂去向周恩来转达他的意见说：“解决清华问题应该和北大有所不同。要照顾到团结。”当有人在天安门观礼后说“刘少奇有点灰溜溜的”，贺龙马上不高兴的表态：“一个国家主席有什么灰溜溜的，你这样说是不对的。”贺龙的这些不合时宜的做法、举动自然有些要飘入毛泽东的耳中。自从文革发动以来，毛泽东看待领导干部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其人到底对文化大革命有没有“正确的态度”，在这样的标准衡量之下，贺龙是“不合格”的。

不过，毛泽东一开始对贺龙还是要保的，吴法宪等人的诬告信送上来以后，9月5日，毛泽东还在中南海游泳池同贺龙说：“你不要紧张，我当你的保皇派。”，毛泽东还说：“我对你了解的，我对你还是过去的三条：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就在毛泽东肯定贺龙的同时，海军的张秀川秉承林彪的意图给中央写出揭发材料，声称“我觉得他不够正派，对林副主席、毛主席的领导抵制和有反对情绪。”【注26】（《贺龙年谱》780页）9月8日，林彪在军委常委会上公开讲话点了贺龙的名字，林彪说：“今天谈谈贺龙同志的问题，在主席那里谈过两次，主席已看了空军的材料，总参的材料。主席的意思是要在高级干部中打个招呼……主要危险是在主席百年之后，他会放炮起哄，会出乱子。”就在同一天的中央日常工作会议上，叶群等人鼓噪要给贺龙立案，这个动议被提交给毛泽东、林彪批准。9月9日晚，毛泽东让秘书徐业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应该说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还是准备保贺龙的，但是，贺龙被保还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要同林彪把关系调和一下。9月10日，贺龙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到人民大会堂和林彪见面，这本来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会面，却被叶群看作如临大敌，她吩咐李文普等人率领警卫人员躲在幕后，一俟有情况就立刻冲出去。而这些起因无非是风闻贺龙身上有佩枪而已。事后，李文普大发牢骚：“纯粹是吃饱了肚子撑的，没事找事！”【注27】（《毛家湾纪实》38、39页）林彪、贺龙两个当事人虽然无从知晓叶群背后的举动，但是，他们的谈话相当不愉快。林彪说：“贺老总，我对你没有意见。”忽而，林彪又说：“要说有吧，也只那么一点点。就是，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贺龙说：“我干的是共产党，支持谁、反对谁，你还不知道？”此次谈话无疾而终，林彪、贺龙的关系终于不可救药。

林彪、贺龙谈崩后，贺龙的处境日益困难。12月25日，体育系统的造反派开始把斗争目标直接锁定在贺龙的身上，贺龙无法安身，先是搬到钓鱼台后又搬到新六所。1967年1月9日，林彪诬指贺龙是“大野心家”，“反对毛主席”，是一个“刀客”。次日晚，造反派就进驻贺龙的住地，查抄贺龙住处的文件。1月11日，贺龙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到周恩来住处向周恩来汇报自己的处境，周恩来不在，他要贺龙暂时住下来，不要回去了。关于这次贺龙进入西花厅的过程有关书籍的描述和有关当事人的回忆都不尽相同。周恩来的保健医生

张佐良回忆是周恩来把贺龙接到西花厅的。【注 28】（《周恩来的最后十年》125 页）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则回忆说：“1967 年 1 月 11 日，由贺龙的儿子贺鹏飞驾车，拉着贺老总和夫人薛明、警卫参谋杨青成进了中南海，直达西花厅。……邓大姐事先不知道，难怪中南海的门卫报告说：‘贺鹏飞驾车闯进中南海。’”【注 29】（《周恩来卫士回忆录》93、94 页）贺龙暂时住在了西花厅，但周恩来仍旧处于两难的境地，从南昌起义时，周恩来便对贺龙了如指掌，贺龙能在中国共产党最危难的关头挺身而出响应号召发动起义，这本身已经说明了贺龙的一切，目前强加到贺龙身上的这些个罪名无非是要给打倒贺龙制造口实。然而，打倒贺龙的来头和背景颇大、颇深，这也是周恩来根本无法左右的。1 月 19 日，周恩来、李富春找贺龙谈话，周恩来告诉贺龙：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想一想。贺龙准备辩解，周恩来打断他的话继续说：“你不要再说了。毛主席不是保你嘛。我也是保你的。给你找个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来。”周恩来还勉励贺龙说：“要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周恩来还向贺龙求证是不是在背后讲了林彪的“坏话”？贺龙表示他就同陶铸谈过林彪的历史问题。周恩来叹息道：“这就够了。”

贺龙夫妇在 1 月 20 日被转移到北京西山一处与外世隔绝的地方住了下来，外面的形势的发展对贺龙越来越不利。2 月 3 日，毛泽东在接见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卡博、巴卢库时这样谈及贺龙，他说：“我们的军队也不是没有问题的……像贺龙是政治局委员，罗瑞卿是书记处书记、总参谋长……比如杨成武他是代总参谋长，总参管好几个部，其中一个作战部的部长、副部长写大字报要打倒他，那是贺龙挑起来的。”【注 30】（《贺龙年谱》788、789 页）在谈话中，毛泽东已经把贺龙和一年多以前打倒的罗瑞卿相提并论，并且将总参“8.25 事件”的“主谋”说成了贺龙，这表明毛泽东此时已经改变了对贺龙的态度，不再做他的“保皇派”了。由于毛泽东的这种态度，林彪更加加快了对贺龙的迫害程度。1967 年 6 月 13 日，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朱铁铮奉林彪、叶群之命外调所谓贺龙通敌的证据。8 月 30 日，傅传作写信诬告贺龙要在空军“夺权”。9 月 8 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起草了对贺龙的立案审查报告，提出由康生任组长、叶群任副组长。专案组负责人还有吴法宪、张秀川、黄永胜。9 月 13 日，毛泽东在立案报告批示同意。根据贺龙专案组的当事人回忆，贺龙专案组成立后，空军政委余立金任组长、空军司令部秘书朱铁铮任第一副组长、北京军区某团政委芦凤歧任第二副组长。“杨余傅事件”发生后，海军的张秀川担任贺龙专案组组长。【注 31】（《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498、499、504 页）贺龙专案组下面还设立了若干其他专案组，在于处理与贺龙一案有关的其他高级将领，它们包括：1. 许光达专案组（装甲兵）2. 荣、雷英夫专案组（总参）3. 金如柏、李贞专案组（总政）4. 陈鹤桥、樊哲祥专案组（通信兵）5. 友林专案组（工程兵）6. 廖汉生专案组（北京军区）7. 黄新廷、郭林祥专案组（成都军区）8. 杨秀山专案组（武汉军区）9. 张仲翰专案组（新疆军区）10. 成钧、向黑纓专案组（空军）11. 荣高棠专案组（国家体委）。而在贺龙专案中受到无端牵连的还有昆明军区司令员

秦基伟。秦基伟在历史上和贺龙并没有较深的渊源，只不过因为秦基伟的妻子原任西南军区保卫干事，是通过贺龙的介绍和秦基伟认识并且结合的，仅此一点就把秦基伟算在贺龙线上的人物，而且一关就是七年之久。

1968年初，毛泽东亲笔圈阅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交来的《关于深挖叛徒的工作情况的报告》，在这份报告的批示上有这样一段话涉及贺龙：“刘邓陶及其同伙彭德怀、贺龙、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安子文、肖华等叛徒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长期隐蔽在党内，窃据了党政军领导机关的重要职务，结成了叛徒集团。”三个月后，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关于成立辽宁省革命委员会的指示”上批示：“照办”。也就在这份批示中，贺龙的“地位”已经上升到“走资派”的地步。四天后，毛泽东圈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的命令：“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包括国防俱乐部)系统，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贺龙进一步升格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种罪名在当年是足以致人于死地的。1968年10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再次宣布，他对贺龙不保了。【注32】（《贺龙年谱》797页）从此以后，逐步升级的迫害向贺龙夫妇一步步逼进。贺龙自己也有些察觉，他说：“总理没有派人来，说明总理已无能为力了。党内斗争这么复杂，可能总理也相当困难了。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全国都搞成这个样子，难道他不知道？我现在理解总理当时同我谈话时的心情和他所说的一些话了。他也不得已啊！”贺龙用手指着毛泽东和林彪的像片说：“现在已经不是这个人(指林彪)的问题，而是这个人(毛泽东)的问题了。只要毛主席说一句‘贺龙没有问题’，事情就完结了。我相信，毛主席总有一天会说这个话的。”贺龙的预言并没有错，毛泽东后来终于说了“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的话，只是这句话来的太迟了，当它来临的时候，贺龙已经病逝4年多了。而贺龙最后对林彪的评价：“党内出了奸臣，这个奸臣就是你(林彪)！”也得到了验证。倒是林彪直到中共“九大”闭幕，贺龙已经命在旦夕，还在会上大谈特谈贺龙对他的所谓的“迫害”以致于难得的掉了眼泪。徐向前、张佐良等人作为当事人都亲眼目睹了林彪所表演的一幕。

1969年6月9日，贺龙含冤而死。后来在给贺龙彻底平反时，医疗专家曾就贺龙之死做过认真的结论，结论说：“1. 贺龙同志的糖尿病本来是轻的，稳定的，这种病在正常情况下预后良好。1967—1968年的情况进一步证明，即使存在其他不利因素，只要有一般的药物和饮食条件，病情仍能保持平稳。2. 贺龙同志的病情恶化是从1969年初开始的。这种恶化具有明显的诱因，主要是失去了充分的药物治疗和必要的饮食治疗，精神折磨也有重要关系。没有这个量变的基础，不致引起最后酮症酸中毒的发生。3. 酮症酸中毒虽然是糖尿病的严重并发症，但在通常情况下，只要有恰当和及时的医疗措施，预后仍属良好。但是在贺龙同志的酮症酸中毒治疗过程中，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与一般治疗原则相反的、有重大错误的治疗措施，以至不但起不了治疗作用，反而促使病情一

步步趋于严重，直至造成死亡。”由此益见贺龙是被迫害致死。1973年2月底，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对张春桥说：“我看贺龙没有问题，策反的人，贺把他杀了。”、“我有缺点，听一面之词。”12月21日，全国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毛泽东在军委常委扩大会上讲话，再次指示要为贺龙平反。他说：“我看贺龙搞错了，我要负责呢。”、“当时我对他讲，你呢，不同。你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要保护你。总理也保护他呢。”、“要翻案呢，不然少了贺龙不好呢。”、“都是林彪搞的，我听了林彪一面之辞，所以我犯了错误。”。林彪诬陷贺龙不假，但是，如果没有毛泽东的最后批准，贺龙也是打不倒的。1974年9月4日，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催问说：“贺龙恢复名誉搞好了没有？不要核对材料了。”中共中央于9月29日发出了【1974】25号文件，即为贺龙恢复名誉的通知。1982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为贺龙同志彻底平反的决定》。《决定》高度评价了贺龙的一生。

贺龙是在中央军委副主席排名中仅次于林彪的政治局委员，“二月逆流”之后，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等人先后“靠边站”，如今又死了贺龙，林彪“独邀天宠”的空间已经越来越大。

### 第三节：肖华落马

林彪的粉墨登场既要有毛泽东的点头，也要有“四大金刚”的捧场。然而，文革初期，“四大金刚”还不足以震慑全军，也还不足以控遏要津。为了达到本集团全面接管军队系统由于文革造就的权力真空，林彪不遗余力的提拔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人，也自然就不遗余力的把那些个不怎么服从他的调度、指挥的领导干部打下去。如罗瑞卿、贺龙等人的先后蒙尘。此外，还有一部分领导干部其本身并没有什么错误，只不过因为要给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腾地方”，所以就落得个悲剧的收场。1967年震惊全军、全国的“5.13事件”导致原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肖华的落马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范例，值得一述。

肖华，人称“娃娃司令”，十七岁担任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时候，肖华还不足四十岁，是我军最为年轻的高级将领之一。在肖华二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他并不以显赫的军功见长，却是以出色的政治工作令毛泽东、周恩来、罗荣桓等人刮目相看。

毛泽东在江西兴国创建土地革命干部培训班的时候，年仅十四岁的肖华成为四

十多名学生中最为年轻的一个，毛泽东可以说是肖华踏上革命征途以后的第一位启蒙老师。也就是这位年幼的青年团干部在给毛泽东汇报有关兴国县青年团革命工作时，肖华娓娓道来，给毛泽东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肖华的不俗的能力更让毛泽东惊喜。（兴国县不到一年的时间青年团员从几十人发展到上千人，全县上下无一不建立了团委和支部。）汇报结束以后，毛泽东让人特意去附近的美香居买了饺子，毛泽东对肖华说：“今天我请你吃饺子。”毛泽东经常说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灵魂。而政治工作者又无异于灵魂工程师，肖华本人就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工程师”，在他的努力扩红下，1932年一年，江西兴国共有一万多名青壮年参加红军，这在当时是个十分罕见的数字。1933年整建制的兴国模范师成立（有5500人），光是拥军鞋就有三十万双之多，以致于堆积如山。当阵容整齐的模范师出发之际轰动了整个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央局、中革军委都发来贺电，毛泽东更是亲笔题词曰：“模范兴国。”1933年初，宜黄会议期间，敌机轰炸，如果不是周恩来的掩护，肖华可能早就牺牲了，对此肖华一生念念不忘，曾经写诗纪念，也就是在这一年，周恩来点名让肖华担任新成立的少共国际师政治委员，周恩来对肖华说：“年轻的干部带年轻的兵，这样部队更有朝气。”肖华第一次见到罗荣桓时，才虚岁十五岁，可是，罗荣桓对这位儿童团闻名已久。肖华在罗荣桓手下担任了红四军军委青年委员，主管全军的青年工作。1931年大抓AB团，罗荣桓亲自出面保护了肖华。罗荣桓还让肖华接受锻炼，做了特务营连政委，刚到那个连队的时候，连长是一个年长肖华的旧军人，他大咧咧的对肖华说：“以后你就听我的就行了。”而年纪不大的肖华用半开玩笑的口吻软中带硬的说：“我是政治委员，有最后决定权，怎么能听你的呢？”说话滴水不漏的肖华后来赢得了这位大哥一般的连长的信任和敬佩，当他们分手时，这位连长还流下了热泪。肖华多次追随罗荣桓，从江西苏区到山东根据地，罗帅的妻子林月琴曾经回忆一件往事，她说有一次王稼祥要调肖华去总政工作，罗荣桓多次不放，而且还对王稼祥说，肖华走了等于砍了我一条胳膊。晚年的肖华忆及罗荣桓，以“良师”称之。

肖华从历史上和林彪关系就不错，按照林彪用人的“双一”标准（红一军团、红一方面军）衡量，肖华应该算是罗瑞卿所说的“和林总的关系是棒打不散的”的那一圈子人中的一位。其实不仅肖华如此，包括罗瑞卿、刘亚楼、杨成武等都和林彪曾经有着一种不错的关系。肖华和林彪一家的关系也是不错的，这点肖华的家属也不回避。肖华因为对江青比较冷淡，见面打个招呼都懒得一动，结果很让江青不满。这个消息传到叶群的耳朵里面以后，叶群马上给王新兰（肖华的妻子）打来电话说：“告诉你们那个肖华，在江面前把他的傲气收一收。见了江青，站得远远的。”【注33】（《我的母亲—长征中最小的红军》317页）这也算是叶群对肖华的“格外”关照吧。文革中，江青在揪出刘志坚以后，就提出把肖华也揪出来，毛家湾就不回应，根据林办秘书张云生的回忆，叶群亲口告诉他林彪在这件事上的态度时说：“肖华是总政治部主任，不能轻易打倒，这么大的事要请示主席。”【注34】（《毛家湾纪实》65页）江青由于林彪的不同意，暂时没有动肖华。而五·一三事件后，肖华还在第一时间跑到林彪那里希望得到林彪的援助，结果没有见到叶群，他和张云生

吐了一肚子苦水，在张云生看来，肖华这时“未免过于天真了。”【注 35】（《毛家湾纪实》117 页）因为此时此刻，林彪已经决定把肖华剥去了。

文革开始以后，肖华的地位非但没有下降，反而仍旧得到足够的信用和重用。例如当时成立的王光美专案组（也就是刘少奇专案组），领导成员中就包括肖华，而这个专案组中的其他负责人诸如江青、汪东兴、谢富治等都是文革的新贵人物。肖华在这个专案组中所起的作用由于肖华很快被打倒，因而不会很大，这方面的资料也比较缺乏，不能作出进一步的结论，不过，能够进入这个专案组本身就意味着当时以毛泽东为首，林彪为副的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肖华的一个基本态度。周恩来曾经对侄女周秉德说：“我不分管刘少奇专案组，我就无权过问你爸爸的问题，只能依靠组织，耐心等待。”这里的“你爸爸”指的是周恩来的亲弟弟周同宇（也就是周秉德的父亲），周恩来在文革中一直处于第三号人物的地位，可是，仍旧没有权力对身陷刘少奇专案组中的弟弟施以援手，可见，当时的这个王光美专案组（刘少奇专案组）的显赫程度。原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刘志坚被打倒以后，全军文革面临改组，江青提议请徐向前担任军委新的文革小组组长，获得毛泽东批准。1967 年 1 月 12 日，新的军委文革小组成立，徐向前任组长，肖华、杨成武、王新亭、徐立清、关锋、谢镗忠、李曼村任副组长。我们注意到副组长名单没有按照姓氏笔划排列，而肖华这时候的排名居然在代总长杨成武之上。杨成武适时已经十分了得，一度还兼任过中央专案二办的主任的同时时而还担任毛泽东的“联络员”，是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从这份名单的排列顺序看，肖华的地位比较可观。

第一次批肖风浪期间，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因为不慎把会议内容给捅了出去，被林彪点名烧焦，叶剑英见到徐向前时说：“杨勇恐怕保不住了。”徐向前问他为什么，叶剑英说：“上峰的意思，是要对杨勇烧而焦。”这里的上峰，根据徐向前的回忆，指的是林彪。徐向前这么说也是有根据的，徐向前曾经听林彪对他讲，杨勇从来不单独向他汇报工作。【注 36】（历史的回顾）561 页）北京军区杨勇、廖汉生，一个司令员、一个政治委员，对于林彪确实不像某些军队负责人那样表示出一副单纯的“效忠”态度来，这点甚至连毛泽东都知道。1966 年 8 月 18 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对廖汉生、杨勇说：“要尊重林彪同志，多请示、多汇报。”【注 37】（《廖汉生回忆录一续》258 页）而杨勇不过是因为泄露了批肖华的内容就被一棍子打死，这也说明那时节的肖华还没有完全失去毛泽东、林彪对他的信任。“二月逆流”事件出来以后，徐向前请假检讨，全军文革工作代之以肖华，时间是 1967 年 3 月 24 日。（此处是徐向前回忆）【注 38】（《历史的回顾》566 页）这也说明肖华是军委文革第一副组长。不过，在肖华主持全军文革工作的这个回忆片断上，徐向前是这样说的：“肖华‘过关’后，确定由他主持全军文革的工作。”这里的过关二字，徐向前是用了引号的。这一时期留下来的照片我们还能看到肖华的身影，有时候经常站在毛泽东的一侧，和站在另一侧的杨成武互相辉映。在第一次批肖的风潮中，陈伯达讲了肖华不是战士，是绅士的话，而后，陈伯达要收回这句话，说

是安眠药吃多了，当时说的不清楚云云。所以，这一阶段的肖华尽管仍旧处于风口浪尖上，但是，还没有从表面上看出他的危险来，然而，这种暗流的涌动实则从一短时间以来就开始了，只不过肖华本人并没有察觉而已。而暗流的源头则来自于两个不同一般的女人。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肖华对江青的态度并不友好，其实，这也是有着一定的历史原因的。

早在江青准备和毛泽东结婚之际，就已经有不少的党内的干部表示不同的看法，而且，所提供的关于江青的一些历史背景都并非空穴来风。其中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就是项英、杨帆等人给中央的有关电文资料。此外，声势上比较轰动的还有王世英的联合签名反对意见书。关于王世英的这个意见书，张闻天的夫人刘英作为当事人是这么叙述的，刘英说：“原来在北方局做秘密工作的王世英同志，当时正在中央党校学习，写了一封信给中央，说江青在上海桃色新闻很多，毛主席同她结婚很不合适，信上签名的人一大串儿。”【注 39】（《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117 页）而肖华也应该算是江青历史背景的知情人之一，肖云（肖华之子）说：“肖华对江青一直保持距离，多少受牟宜之影响。此人是当年父亲率东进抗日纵队到冀鲁边后争取的第一个国民党县长。此人是山东人对江青底细很熟悉，当毛泽东要结婚的消息传递到山东时，牟宜之连夜找的父亲，说：‘江青这个人我知道，品行不好，得赶快给毛主席发个报，不能娶她。’父亲当时吓了一跳，告诫牟‘不要胡说’。”【注 40】（《我的母亲—长征中最小的红军》316、317 页）后来，这个叫牟宜之的人做了右派，据说和江青也有很大关系。

建国以后，肖华同江青的关系也很泛泛，用肖云的话说就是：“敬而远之，表面应付，不多交往。有时见了面，远远站着而不主动打招呼。”【注 41】（《我的母亲—长征中最小的红军》317 页）有一次江青见了肖华说：“肖主任，见了面，连个招呼也不打啊？”肖华的妻子王新兰还因此劝说过肖华，肖华却说：“她又不是毛主席。”王新兰之所以劝说肖华，自有她的消息来源，莫文骅的妻子杨枫曾经对王新兰说过江青其人，杨枫说江青自己亲口讲过，我（江青）想达到什么目的就能达到，想得到谁就能得到。所以，杨枫认为江青是一个很有心计的女人。这个观点也影响了王新兰，王新兰希望肖华不要因为这些礼节上的小事过于开罪江青。文革前的江青实际上已经不满于已有的政治地位了，刘英回忆说：“毛主席当着江青的面说她不安分，认为我（毛泽东）这棵大树遮了她的荫了。”【注 42】（《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154 页）而毛泽东对江青也有另外一番评价，他对曾志就说过：“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但是，在政治上她对我还是有所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注 43】（《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320 页）江青本人在文革前就可以阅读政治局委员级别的文件，从 1963 年就开始插手文艺工作进而向政治领域发展。然而，包括肖华、周扬、陆定一、罗瑞卿这些人在内很多经常在毛泽东身边的领导干部都没有预料到江青会从文革开始以后在短短的时间里面爬上那

么一个高的位置。也是因为没有类似的预见和固有的党性，所以，肖华在文革前和江青的关系始终没有实质性的改善。肖云说：“在地方工作的江青一直想的到总政来兼职，并亲自找父亲谈过。父亲没有理会她的要求。她又找到总政有关部门，提出同样要求，反映到父亲那里，父亲说；‘她在电影局干得好好的，到总政来干什么？’”【注44】（同【注40】318页）肖华没有答应江青的要求。而江青在林彪的支持下召开的部队文艺座谈会前，肖华又针对江青的这件事发了一次牢骚，肖华说：“江青不是搞京剧改革吗？怎么又管起军队的事情来了？管得这么宽呀。”文革中，肖华有一次因为就参加了周恩来召集的会议而没有参加江青召集的会议，招致江青的严重不满，江青指着肖华的鼻子说：“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周的会议比我的重要！”这时候的江青连一个中共中央委员都不是，但是，训斥起身为总政治部主任却像呵斥自己的仆人，把周恩来称为“周”，难怪陶铸对曾说，江青有时候训我们就跟训孙子一样。这里需要注意一点，那就是江青在文革中的权威是丝毫不能随意侵犯的，肖华尽管和江青的一些矛盾看起来都是比较小的范围内的，但在江青看来这已经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冒犯了她的“虎威”的。我们不妨把目光放的远一点，参加过1980年审判江青的张思之回忆了这么一件事，当曾汉周审判长对江青说：“你应该惧怕我们”时，江青不但没有任何顺从的表示，反而和曾汉周当场顶了起来，而且，江青就直接告诉曾汉周说：“你去问问坐在你身边的江华，我怕过谁？”这已经是江青身陷囹圄之际，由此也可想而知当初江青的骄横和焰熏天了，很多人都是因为一语不合遭致江青的暗算从而一翻到底，其中陶铸就是一个例子，（陶铸被打倒的原因还有其他的方面，但是，和江青顶撞，并且不尊重江青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而黄永胜得宠时也不过是因为批示文件上的一个小事惹得江青勃然大怒，以后还刁难黄永胜的出国，以黄永胜同林彪的关系而论，更何况肖华了。江青得志以后，凡是历史上对于她的那些不光彩往事知道比较多一点的人几乎无一例外下场不妙，而江青也花费了很大的精力要极力遮掩她的某些背景真相，文革中地位一度十分显赫的谢富治、杨成武、吴法宪、江腾蛟等人都专门为江青的这些事所奔忙过，谢富治还亲自动手烧了江青的所谓“黑材料”。所以，肖华作为江青的历史的间接知情人其本身就存在着一种先天的危险，加之以后肖华对江青的“不敬”被江青看作是“老毛病上添了新问题”，所以，决定新帐老帐一起算。不过，江青要算肖华的帐是一定越不过两个人的，那就是毛泽东和林彪。即便是先斩后奏，也必须得到这两个人的认可才行。

林办秘书张云生在1967年1月间，曾经翻看过林办存档的来往电话记录，其中他看到，江青曾经对叶群说过，揪出刘志坚以后，造反派还不满，当前群众的主要呼声是揪出肖华。【注45】（《毛家湾纪实》65页）这里江青所说的造反派不满实际就是她自己不满，她给叶群打招呼的目的就是要毛家湾出面配合她一起整垮肖华。江青在文革中曾经和叶群有过一个约定俗成的“攻守同盟”，江青说：“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这个惊心动魄的谈话表面上看是两个身份不凡的女人之间的私房话，实则是江青、林彪两个政治集团在谋求最大政治利益上的共同心声。而且，从后来的事态我们也能看到，举凡是对双方都有利的事情上的动作，也往往是他们配合的最为恰到好处的。肖华这件事上，就有着这样的痕迹。

那么，叶群对于肖华有过什么“遗憾”呢？

严慰冰曾经利用匿名信等多种手段揭露叶群的事情，后来还为此专门找了肖华，要向肖华汇报叶群在男女作风上的问题。以肖华多年的经验，他岂能不知这件事的份量，有的汇报可以听，有的汇报就不能听。严慰冰汇报叶群的事至少牵连了两位政治局成员，而且还势必要涉及到其他领导人。遭到肖华婉拒以后的严慰冰仍旧请求面见肖华一晤，肖华从工作的角度出发同时也找上了自己的上级之一的罗瑞卿一起和严慰冰谈话。在和严慰冰正式谈话之前，肖华同罗瑞卿商量的这件事的处理办法。严慰冰一旦说及叶群的私生活上的事情以后就滔滔不绝，从延安一路说到北京，把叶群生活糜烂的事情都做了具体的叙述。而且，严慰冰不光是泛泛而论，还有实证，比如她向肖华、罗瑞卿出示了有关叶群的照片。严慰冰同时还告诉肖华等人说是林立衡不是叶群和林彪的亲生女儿，这就更让罗、肖二人大吃一惊。肖华立刻制止了严慰冰的谈话，肖华说：“林是政治局委员，陆也是，你还是要以大局为重。你今天给我谈的这些事情，到此为止。不要再和其他人谈了。”实际上肖华这番话也是为了严慰冰着想，像严慰冰这种谈话的方式和内容可能给她自己带来很多政治上的麻烦。可是，严慰冰并没有听从肖华的建议，此后还把这些同样内容的东西写成信寄给军委副秘书长办公室，一时搞的有些沸反盈天。值得注意的是举凡在历史上知道、了解、批评、揭露叶群的私生活丑闻的人以及家属在文革中都没有逃脱厄运，其中不乏林彪原来一度准备拉拢的人在内。例如贺龙、薛明，肖华，罗瑞卿夫妇，就连杨成武因为没有在叶群的事情上按照林彪的提议去做以后也遭到了不测。从以上这些人和事的发生、结果看，可知在了解叶群生活丑闻这件事上，肖华已经被打入另册。上海会议解决罗瑞卿问题时，叶群忽然问及肖华：“有人说，罗瑞卿给你送过一幅字，你还裱了，挂在家里。”肖华回答说：“有的，是一个隶书条幅，写的是曹操的《龟虽寿》。”高级领导人之间互相题赠在当时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毛泽东本人还给林彪写过这首曹操的诗，叶群连这种事情都能了解的一清二楚，何况严慰冰和肖华、罗瑞卿在军委三座门谈话的内容呢？

1967年11月，此时的肖华已经失去人身自由，叶群令专案组专门找肖华谈谈那次严慰冰的汇报内容问题，肖华如实地把当时的情况写了出来，结果非但没有受到什么表扬，反而被专案组人员勒令当着他们的面把这份材料烧了。专案组要求肖华重新写一个和事实相反的东西出来，肖华没有答应，事后专案组也没有再提及。从这件事上看，肖华在叶群、林彪看来显然是不该知道的事情知道的太多了。同时，也证实了叶群在严慰冰汇报情况的旧事上的“仔细”、“认真”的程度，而这种“认真”的程度或可说已经断定了肖华应该走上哪一条路了。

而让林彪对肖华有所不满的还有一件事。我们都知道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林彪的“土伦”，尽管林彪发表了一篇措辞谦逊的发言，似乎对担任毛泽东的接班人诚惶诚恐，但是，仍旧不能掩盖林彪本人在这件事上的得意，从后来的种种事实看，林彪非但没有像他自己说的那样“随时准备交班”，反而一再培植自己的亲信掌握军队大权，不惜把儿子林立果扶上战马成为空军的“太上皇”。所以，在这次会议上对于他“当选”毛泽东的接班人的这件事上林彪是要看一看诸人的行动的，用文革的语言说那就是“忠不忠，看行动。”然而，肖华在这次会议上的态度比较令林彪、叶群失望。当时，肖华是在北戴河养病，被叶剑英接回来的，到了会场以后做过一个书面发言，但是，对于林彪作为接班人的事情没有表态，肖华自己说：“我不了解内情。”会后，叶群找到肖华说：“你是老一军团的干部，在这个关键的时刻，为什么在这个问题上不表态？这是对党的态度问题。”肖华随即也向叶群承认了错误，说这是他自己的疏忽。

【注 46】（《我的母亲—长征中最小的红军》340 页）

表面上看，肖华是疏忽，但是，从问题的深层看，则体现了肖华之不同于黄吴李邱之流对于林彪的感情的地方。吴法宪说他自己脑子里面只有一个林彪。他说：“是林彪把我提拔起来的，林彪叫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而李作鹏则说：“林副主席活着跟他干，生与林副主席同生，死于林副主席同死。”邱会作说：“林副主席、叶主任是再生父母。”可以说肖华在最初也是紧跟林彪的，然而，他毕竟不是黄吴李邱，他没有把自己的全部政治命运和林彪压在了一起，对于林彪他也尊重过，也服从过，甚至也大声的歌颂过，可是，一旦要让他像黄吴李邱这些人那样无条件的对林彪表示绝对的效忠，肖华做不到。肖华之所以服从林彪、听命于林彪，最主要的原因是林彪当时是毛泽东亲手选定的第二号人物，同时也有历史上肖华和林彪的渊源。不但肖华如此，之前的罗瑞卿也如此，之后的杨成武更如此。可以说，他们三个人之所以殊途同归不是偶然的，他们既不能像黄永胜那样为了忠于林彪进而和叶群干出那样令人不齿的荒唐事，也不能像吴法宪那样把空军大权私相授受，同时也不能像邱会作夫妇那样为了林家的私事跑前跑后，更不可能像李作鹏那样在关键取舍阶段居然擅自更改命令。所以，他们尽管和林彪有着其他人没有的历史上的比较好的合作关系，甚至林彪还准备把他们也拉入自己的集团内部，但终究未能实现，相反这些人后来都被林彪想方设法的借故打倒。这在当时可以说是这些人的“悲剧”，可从后来看，实在又是他们的喜剧。

就影响而言，“五·一三事件”既没有“一月风暴”那样“红色革命”，也没有“二月逆流”那样激烈紧张，更没有“7.20 事件”那样伤亡惨重。和以上这三个事件相比，五·一三事件似乎算不得什么，似乎一直被隐藏在一种微妙的政治暗流中。但是，研究文革史的专家和亲身经历过“五·一三事件”的人却并不这么认为。王年一在他的《大动乱的年代》的 287 页中指出：“这不是群众组织之间一般的武斗事件，而是李作鹏等人故意违反周恩来的关于‘联合演出’的指示而制造出的事件。”王年一同时还说：“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所掌握的一派就成为‘林副主席支持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就成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领袖。”【注 47】（《大动乱的年代》287 页）原林彪办公室秘书张云生作为当时这一事件的亲历者，他是这

样评价五·一三事件的，他说：“林彪、叶群利用五·一三事件做文章，他们挥动这个棒子真的‘打了一大片，保了一小撮。’”【注48】（《毛家湾纪实》121页）在张云生的眼中，五·一三事件是林彪手下几员大将的翻身仗，也是一个“转折点”。因为肖华就是在五·一三事件以后迅速垮台的，所以，当我们回顾肖华在文革中被打倒的真相时就要更加注意五·一三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且，透过这一事件我们可以看到林彪集团崛起的部分内幕。

把矛头对准肖华并不是从这个五·一三事件开始的，而是早在几个月之前，江青就开始筹划打倒肖华。陈伯达在一次接见造反派的时候，公开点了肖华的名字，他说：“肖华不像个是战士，倒像是个绅士。”陈伯达是中央文革的组长，尽管在文革内部他的权力远没有江青那样显赫，但是，在一般的造反派面前，这位“老夫子”的权威还是十分了得的，当初救邱会作的时候，毛家湾就拉上陈伯达一起出面解决了问题。陈伯达此话一出，包括解放军总政治部都出现了混乱。打倒肖华的呼声开始高涨起来。然而，陈伯达这次“炮打”没有起到预期的作用，倒是真的惊动了毛泽东、周恩来，毛泽东对这件事不很满意，周恩来也出面约见造反派，徐向前回忆说：“周总理很生气，出面辟谣，说这是谣言。”【注49】（《历史的回顾》559页）

江青知道毛泽东的态度以后，派人上街遮盖那些号称要打倒肖华的大字报。大家都以为这件事就这样平息了，但是，没料到在1967年1月19日的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会议上再起硝烟。关于这次会议，林办秘书张云生提供了一个旁证，他说：“1月19日下午三时，江青到毛家湾来了，江青与林彪密谈时，叶群也在场。江青走后，叶群急促的按铃，让秘书快去。我到叶群办公室，听到叶群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要打倒肖华了。’”而此前张云生听到叶群告诉他说林彪的意思是这样的：肖华是总政治部主任，不能轻易点名打倒，这样大的事必须请示主席。现在为何突然又改变了主意了呢？叶群对张云生说：“首长（林彪）本来是不同意打倒肖华的，现在主意变了。刚才十一楼从一组（毛泽东）那里来，与首长研究决定立即开会批判肖华。”【注50】（《毛家湾纪实》65页）

张云生和另外一个秘书与叶群同去的京西宾馆。按照叶群的说法当时是“先在京西宾馆开小会批判，然后晚上七点在工人体育场开万人大会批判。”叶群是代表林彪去京西开会的。实际上这次京西宾馆会议从主要与会者包括徐向前等人在内的回忆都说是讨论军队要不要开展“四大”的内容的，但是，会议开始以后，突然把斗争的矛头对准了肖华。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和江青、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发生争执之际，叶群忽然要发言。叶群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发言稿念了起来，内容是什么呢？是批判肖华。叶群说：“肖华反对林副主席，破坏文化大革命，必须公开向军队院校师生做检讨。”叶群还说肖华每次去林彪那里汇报工作都挨林彪的大骂等等。叶群开口以后，江青立刻给予配合，江青问肖华：“发文件把军委和总政并列是什么意思？”江青指着肖华的鼻子说：“今晚工人体育馆召开的十万人大会，你敢不敢去？”江青还要求大家表态，总政主任不能再让肖华做了，交给徐向前兼任。肖华默不做声、不发

一语，静静在那里听候批判。会议开到这里就开不下去了，由于徐向前等人并不知道事先还有批判肖华的内容，而且也不清楚叶群、江青这两个女人到底是代表了谁来发动批判肖华的，所以，均不吭气。过了一会儿，毛泽东秘书来电话，要周恩来、叶剑英去毛泽东那里，会议中断下来。张云生作为目击者，他又提供了这么一个插曲：“江青出来以后，盛气凌人，走在最前面，她厉声训斥肖华说‘你这人有民愤，批你活该！’肖华跟在她后面，面色涨红，想是要说点什么，江青根本不听，先上电梯下楼走了。”【注 51】（《毛家湾纪实》67 页）

在这次会议中有一个细节比较滑稽，那就是叶群出来以后对张云生他们说：“批肖华我还没来得及发言，你们帮我想想，我讲点什么呢？”张云生等人是秘书，开会期间不能亲自参加会议，所以，他们只听叶群这么说，事实上，从当时的与会者的回忆（如徐向前的回忆）和后来编撰主要与会者的传记（如《叶剑英传》）的情况看，叶群不但讲话了，而且讲了不少肖华的坏话。叶群一贯善于说谎，经常人前一套、背后一套，这件事上又一次体现了她的本性所在，连张云生后来也说：“她（叶群）把不久前在肖华问题上玩弄的那套把戏忘得一干二净。”【注 52】（《毛家湾纪实》68 页）

这次批肖华由于毛泽东不同意，所以，很快流产，倒是因为这次批肖引出了两个副产品，一个是杨勇和袁子钦的被打倒。本来在会上，徐向前宣布了会议纪律，说这次会议内容不准泄露出去，可是，散会以后杨勇回北京军区还是做了传达，而袁子钦的笔记本没有保存好，被群众组织知道了，于是，当晚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和总政文工团就查抄了肖华的家，肖华先是跑到徐向前那里，接着又跑到傅钟那里，最后去了西山。徐向前知道事情过程以后，专门打电话给杨勇，杨勇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在次日上午，徐向前又一次批评了杨勇。这次“泄密”事件后来导致杨勇、袁子钦被点名打倒。因为前面我们已经提及，所以，此不赘。另一个副产品就是著名的“叶剑英大闹京西宾馆”，1月20日上午继续在京西宾馆开会，江青见肖华没来就问“总政治部主任去哪里了？”肖华到了以后，徐向前也问他昨晚去了哪里？肖华没有回答，徐向前很生气的说：“你是胆小鬼！你怕什么？他们能把你吃掉吗？”叶剑英公开承认是他把肖华给保护起来了，叶剑英说：“如果有窝藏之罪，我来担当。”这次会议上，徐向前和叶剑英都拍了桌子，徐向前拍桌子把茶杯拍到了地上。叶剑英拍桌子则把手掌端远骨拍成了骨折。这就是后来传说中的“叶剑英大闹京西宾馆”的部分由来，也是因为肖华一事引起的。

继毛泽东表态以后，周恩来也随即在保肖华问题上表了态，1967年1月29日，周恩来在接见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造反派时说：“肖华作词的《长征组歌》为什么不能唱？人家有一点错误，就连人家作词的歌子也不能唱了？要唱，我还唱呢。肖华是人民内部矛盾，他过去是红小鬼。”

毛家湾也随即变更了态度，叶群说肖华是“几任总政主任当中最好的一个主任。”而且，“肖华是得到林彪一贯信任的。”因为，从毛泽东开始到林彪、

周恩来，当时的主要领导人都对肖华作出了保的姿态，肖华的日子明显好过多了。特别是1967年2月发生的所谓的“二月逆流”事件后，“三老四帅”纷纷被勒令请假检讨，徐向前靠办站以后自然无法再主持全军文革工作的，于是，肖华就代替徐向前主持全军文革小组领导工作，这可以说是肖华的政治生涯中的顶峰阶段。早在肖华代理主持全军文革工作之前也就是1967年3月3日，周恩来在出席肖华检查会时指出：“肖华同志犯错误是不自觉的，缺乏经验，他是个红小鬼，从他整个的历史看是光荣的，不要用放大镜看一个人眼前的错误，要看他的整个历史。”周恩来还对1月中发生的造反派查抄肖华的家一事作出结论，他说：“抄肖华同志的家是一股妖风。”

肖华虽然脱险于一时并且得以主持全军文革的全面工作，但是，在风起云涌的文革动乱时代，福祸本来就是互为表里的，那时候，“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此起彼伏，所以，在肖华暂时“过关”不到三个月，就又发生了第二次炮打肖华的“五·一三事件”，而这次事件中，肖华没有上次那么“幸运”了，由于打击他的人致力于必须清除肖华而后快，因而，肖华也终于面临倒台的境地。五·一三事件说起其实比较简单，就是军内的两大派因为纪念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献礼演出中发生矛盾进而演化成武斗的一起政治事件。武斗在文革中并不罕见，但是，这起武斗则不同于一般武斗，它惊动了当时几乎所有的高层人物，而且牵动了部队的主要神经中枢。

1967年5月13日，是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的日子，部队的文艺工作者自然要发起纪念活动，而这时候的军队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单纯，他们内中分成了对立的两大派。对于这两派的“誓不两立”，周恩来是洞若观火的，他要求在这次纪念演出中，要搞两大派的联合演出，借此消除派性，解放军总政治部也做了类似的要求。但是，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吴法宪、李作鹏却阳奉阴违，完全不听总政的招呼，他们麾下的空政文工团、海政文工团和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中的一派单独演出，结果造成了另一派因为不服而演变的冲斗，冲斗后来还演化成武斗。继而，以“首都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署名的大字报公开上街点名说肖华就是“五·一三事件”的黑后台，把打击的矛头直接对准了肖华，而且这一次炮打明显火力上要比上一次要足，肖华求见林彪、叶群不果，他愤怒和焦虑中对秘书说了这样一句话：“毛主席的话他们不听，周总理的话他们也不听。”那么，他们都是谁呢？他们哪来的胆子敢于不听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话呢？我们不妨把镜头对准五·一三事件发生之前的一些看起来并不是偶然的事情身上吧。

第一次炮打肖华失败以后，叶群和江青都没有暂停对肖华的进一步打击。肖华本人尽管出掌全军文革小组日常工作，但是，文革的官是公认的最难当，时不时就会成为出气筒。特别是像肖华这种已经有过“前科”的干部，更是要时刻提防随时可能出现的险情。多年以后，肖华之子肖云回忆乃父那段时光的生活和工作时不无感触的说到：“父亲全面主持。工作如山，却又被揪来揪去。眼看军队正常工作要陷于瘫痪，父亲多次要求向林汇报自己的处境，均遭拒

绝。”【注 53】（《我的母亲》363、364 页）而此前在公开场合下称赞肖华是最好的一位总政主任的叶群，此刻却对江青说：“首长（指林彪）故意晾那个姓肖的，让他在火上煎着，总政的事，全军文革的事，他都得顶着，哪一头出了问题，都跑不了他。”

如果仅仅是肖云个人的回忆显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而作为林办秘书的张云生也有一个回忆，可以作为佐证。当初保了肖华的叶群何以反复无常呢？叶群对张云生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在有困难的时候，肖华看我的笑话，全军文革开会，总政文化部的一个副处长公开顶撞我，谢富治、关锋立刻表态支持我，严厉的批评了那个人，可是，主持会议的肖华却一声不吭，我后悔，当初就不该保他。”【注 54】（《毛家湾纪实》115 页）叶群既然后悔保了肖华，而另一面江青一直要搞掉肖华，两个政治集团的主要代表人物一时达成了默契，双方都在等待机会，等待给肖华致命的一击。机会终于来了。

1967 年 4 月，毛泽东的秘书徐业夫到毛家湾找叶群谈话，谈过话以后的叶群叫来秘书张云生，说是有几位空军女演员要见一见，这几位女演员都是何许人也呢？叶群告诉张云生说：“徐秘书来，传一组（毛泽东）的话，空军几位女演员为陪主席跳舞，经常出入中南海。”大概是为了提醒张云生重视这件事，叶群随后又告诉张云生说：“不要小看她们，那是能通天的。”这几位女演员在空军内部是少数派，她们一直受压，后来他们找到毛泽东，向毛泽东反映情况，毛泽东让他们来找叶群。大抵毛泽东也知道叶群对于空军方面说话一向比较灵验。几个女演员在一个招待所（张云生回忆）中见到了叶群，女演员提出她们是空军中的保吴派（保吴法宪派），被人骂作老保受到攻击，所以，她们决定利用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25 周年的日子排练一个节目出来，借以表达她们力保吴法宪、余立金的决心。叶群得知毛泽东也保吴法宪以后，十分高兴，不仅赞成这几个女演员的做法，还提议一定要通过江青，当女演员提出人马太少的时候，叶群提议找海军、北京军区、总后等单位中同一观点的人串联一下，搞联合演出。

应该说这件事是五·一三事件的一个起因，起因不在于演出本身，也不在于女演员联合排练节目，而在于这件事的背后是拥护林彪集团的主要势力的再一次联手作战。林彪、叶群正是利用了女演员们的特殊身份和特殊背景，抓住了这次机会，很快在军内掀起又一次夺权的斗争的小高潮来。

我们先来看看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五·一三事件之前的处境好了。

吴法宪本人利用整贺龙的机会搞了一批空军里面的干部，但是，随后他自己也陷入四面楚歌的田地，空军内部包括空军院校有不少人出面反对他，张云生说：“整个 1967 年的上半年，吴法宪的日子都是不怎么好过的。”海军的李作鹏，此人一到海军以后立刻秉承林彪的意图先后整了肖劲光、苏振华，海军的三驾马车虽以李作鹏为首，但是，李作鹏直到 1967 年 4 月还在受到攻击，最后还是叶群出面编造假话说林彪要找李作鹏谈话，才算给围困已久的李作鹏解围，“叶群火速派人把李秘密送到京西宾馆，从此保护起来。”总后的邱会

作，文革一起来他就成为了总后机关的“重灾区”，1967年1月，邱会作的老婆胡敏打电话向叶群告急，说是第二军医大学的红纵把邱会作给抓去了，请求林彪叶群出面救护，叶群接到秘书传到的口信以后轻蔑的说：“邱会作的小姘头一大串，现在人家都起来揭他，叫我们怎么说？”就是在邱会作被林彪、陈伯达联名保出来以后，总后仍旧很有一大批人对他不满意，总后后来给林彪寄来一个誓言书，上面签名的人包括了总后机关的大多数人。用张云生的话说：“足见邱会作的民愤之大。”【注55】（《毛家湾纪实》122页）

从上述的事实我们可以看出来，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尽管在五·一三事件之前就已经和林彪站到了一起，可是，他们还没有掌握足够的权力来反击他们的对手，而且，他们的对手对他们的重重打击也还在持续不停。他们要是想翻身就要寻找一个机会，一个借口，而林彪、叶群要力挺他们并且达到他们最终代替林彪、叶群主管军内事务也需要一个必要的事件或者借口，于是，五·一三事件就成为一个多方搜索下的必须突破的突破口了。

根据周恩来的有关联合演出消除派性的指示精神，肖华决定让这些派别的演出统一在1967年5月13日晚上七点在北京展览馆剧场搞出一台节目来。当时，通知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和其他派别的时候，大家都没有异议。谁知道，下午三点，吴法宪首先给肖华办公室打来电话，说空军方面准备不充分，不准备演出了。肖华不太高兴，嘱咐吴法宪要小局服从大局，接着，李作鹏也来电话说他们那边也变卦了。肖华这才感觉事态有些不对头，但是，他怎么也没有料到大规模的武斗已经一触即发。

晚上，肖华在人民大会堂汇报工作期间，五·一三事件发生，当时的情况很严重，地方上的造反派也介入了，成百辆的汽车载着武装的造反派前去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武斗，消息传到人民大会堂，肖华马上赶往现场。肖华的妻子王新兰也听到海军大院和空军大院的新闻，说是去支持他们那一派的行动，北展剧场成了血肉横飞的阵地。肖华到了现场以后，首先责备军队方面，他说：“不要乱了，我们是人民的军队，是保护人民群众的，不该发生眼前这样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肖云回忆说，肖华那时着重批评的是部队，部队当场并没有反弹，事态得以暂时平息，肖华等人认为这件事由此可能就这么算了，哪知道叶群、江青得知这件事以后，事态突然起了新的变化。叶群知道五·一三事件以后，第一时间里骂道：“这些混帐王八蛋，竟敢在太岁头上动土？他们打我一耳光，我要还他们三下。”在这次事件中，江青等人支持的造反派也出面参与了，所以，周恩来让陈伯达去干预制止武斗时，陈伯达就胡乱答应，而且敷衍了事，因为他知道这些造反派的来头。

江青则去慰问受伤的造反派们，还当着叶吴李邱的面对造反派们说：“打你们就是打我们。”江青很快就把这件事定性为敌我矛盾，所以，叶群、吴法宪更是放手大干，就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要求“声讨”肖华的大字报就立刻上了街，有的大字报直接贴到了天安门，震动很大。大字报的核心内容就是要打倒肖华，说肖华是五一三事件的黑后台。林办秘书张云生把这则消息说给叶群时，叶群用了“活该”两个字来表达自己的意见。此后，张云生接到空军党办

的电话，来人让张云生向叶群转达以下内容：“请报告叶主任，我们根据她的命令把大字报贴到天安门去了，主任真高明，这些大字报贴出去以后，震动很大· · · · · 。”

这时候不仅空军、海军支持吴法宪、李作鹏等人的造反派贴肖华的大字报，就在总政内部也被煽动起来，总政系统给肖华罗织了 500 多条罪名，大字报 2000 多张，其声势按照当时经历过这件事的人的说法是比起打倒罗瑞卿和以后的杨成武规模可是大多了。

五·一三事件尽管造成了肖华的地位岌岌可危，但是，离肖华倒台还是有一段距离的，这时候的肖华仍旧把希望寄托在毛泽东、林彪的身上，因为要见毛泽东需要不少的环节，而且，军队方面的工作主要是林彪在主持，所以，肖华最早去见林彪，他希望在那里得到理解和支持。

然而，当肖华赶到人民大会堂准备面见林彪、叶群时，却被早已知道肖华来意的叶群居然拒绝接见，代之以秘书挡驾。肖华五内俱焚，情急之中就对林办秘书张云生大吐苦水。肖华诚恳的说：“我不愿意打扰林副主席，叶主任很忙，我也不容易见到她，但我相信，他们是了解我的，他们只要了解我现在的处境，是会帮我想个办法的。”听完肖华这一番表白，秘书张云生内心则表示不以为然，他回忆他当时的心境是“肖华是个久经战火锻炼的老革命，但在复杂的政治风浪里，却显得过于天真了。”张云生人在毛家湾，接触了不少林彪集团的内幕，自然知道炮打肖华背后的那些人究竟来自于何人的指使和调教，而今肖华到了这个时候还与虎谋皮，岂不是十分“天真”？

肖华到人民大会堂找叶群的时间是 1967 年 6 月，就在这个月的 14 日，邱会作在总后碰头会上已经决定成立“批斗总政领导干部小组”。邱会作是来自于哪一个山头的，不说也知道。邱会作这么大干，没有林彪、叶群的点头能行吗？

不过，此刻等候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与张云生娓娓道来的肖华并没有体察到这些幕后的活动的真正目的，他还像以往那样把希望寄托在林彪等人身上，他恳切的说：“我再不能工作，总政就要瘫痪了，我跟毛主席、林副主席干革命这么多年，眼看着因总政不力而使全军工作受损失，将来怎么交代啊？”同时，肖华也感觉到有一些异样，那就是这时造反派不怎么提五·一三事件了，用肖华自己的话说：“总政礼堂那次演出受到冲击，和我一点边沾不上，我自己心里有底。”【注 56】（《毛家湾纪实》117 页）造反派揪住肖华不放的是批判肖华执行了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抓住这一点以后，就勒令肖华随叫随到的接受批判，搞得肖华业已焦头烂额。张云生把肖华的“诉苦”报告给叶群以后，叶群明确对张云生交待：“关于肖华的事，首长和我的态度一致。”

那么，林彪的态度究竟和叶群是否一致呢？我们也来看看吧。在七一之前，汪东兴和空军政委余立金一起来到人民大会堂西大厅来见叶群，叶群当时把“汪主任”误听成“王主任”，以为是肖华的妻子、肖办的主任王新兰，所以，她马上躲开不见。汪东兴见到秘书张云生以后，说明来意，汪东兴说：“七一前

夕，军内一些文艺单位要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演出，邀请中央领导同志参加，在研究参加的领导名单时，对肖华是否参加的问题，有了不同意见，有的主张应当让他参加，有的不同意他参加，究竟怎么办好，大家最后推我们来请示一下林副主席。”

张云生考虑到汪东兴、余立金来找林彪的事比较重大，就“擅自作主”带领汪东兴去见林彪了，据张云生的回忆，汪东兴和林彪谈话时间很短就出来了。汪东兴出来以后，肖华的命运也就基本决定了。张云生说：“由于林彪摇头不同意，肖华被剥夺了参加七一晚会的权利，在平时不算什么，但在那一切反常的年代，这往往关系到一个领导人的政治命运，‘不让肖华出场’这等于林彪的一种表态，实际情形也是这样，从此，肖华就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我们注意到汪东兴来找林彪，不是传达毛泽东的口信或者指示，而是大家公推他和余立金请示关于肖华是否出席晚会，所以，这时候林彪的态度至为关键，联想到当初批邓、批贺（贺龙）时，毛泽东也曾经面谕邓小平、贺龙去找林彪谈谈，结果同林彪谈崩以后，二人的政治命运也随之江河日下了。虽说肖华和邓小平、贺龙的事情不很一样，然而，林彪的意见仍旧十分能够说明问题，林彪是那时响当当的副统帅，特别是在军队的重大人事上，他有相当大的发言权，甚至可以直接影响毛泽东的决策，如果林彪继续要保肖华的话，肖华从政治舞台上的消失可能还要推迟一短时间，可是，林彪没有这么做，他作出了同肖华本心期待完全相反的决定，他把肖华给推了出去。

林彪为什么这样做呢？联系到以前叶群的那番“首长不同意打倒肖华”的言论，何以林彪前后反复无常呢？

这个答案还要在林彪及其亲信身上找。

张云生说：“直到五·一三事件发生后，由于林彪、叶群的干预，吴法宪才有直起腰来。”“也是五·一三事件以后，李作鹏在海军的处境才改善起来。”“如果没有五·一三事件，邱会作即使是不倒，站出来工作也是比较困难的。”【注 57】（《毛家湾纪实》122 页）

五·一三事件不仅成为林彪、江青两个集团进一步瓜分大权的合作基础，也是林彪系统大打翻身仗的一个转折点。在强调提拔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这架天平上，肖华倒台在林彪看来是理所应当的，观察肖华很久的林彪已经确认肖华不可能像吴李邱那样对自己死心塌地毫无原则的追随，所以，放倒肖华既可以向江青表示合作的意向，也可以顺利的完成对军内各派的统一，林彪何乐而不为呢？

翻开《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这本书的 334 页，我们清楚的看到在 1969 年，林彪告诫黄吴李邱四大金刚说：“军队的权力就集中在你们几个人身上”，“不要把权交给别人”。【注 58】（《文化大革命十年史》334 页）董保存在《从

战将到罪犯》一文（载《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年 1 月版）中也提到了这个情节，只是林彪换成了叶群。不论说话对象是林彪还是叶群，所表达的意思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掌握军队的大权的人只能在林彪系统中产生。而以后毛泽东点名才得以参加军委办事组的李德生回忆他在军委办事组工作那一段时间中的体会时也这样说到黄吴李邱等人的“把权”，李德生说：“我参加军委办事组以后，就觉得同国务院业务组很不一样，讨论的议题事先不早告诉你，也很少印讨论文件，有些事情是林彪交待的，但又不具体传达他的意见，讨论问题时，好像他们已经商量过了，由他们一两个人谈了意见，大家就不再发言了。他们在会前会后，往往在一起谈四野的历史，谈文革中你争我斗的故事。”【注 59】（《李德生回忆录》388 页）提名军委办事组成员时，林彪等人根本就没有提李德生，毛泽东点名说：“还有李德生同志。”这是叶剑英把批示原件给李德生看的。和李德生有同样感觉的还有张宗逊等人，张宗逊回忆说：“1971 年 1 月，毛主席问黄永胜，张宗逊上哪去了？黄当面扯谎，说在济南军区当副司令员，随后，黄找人和我谈话，说是军委的决定，必须马上到济南军区报到。就这样不明不白的下放到了济南军区。”【注 60】（《张宗逊回忆录》466 页）由此可见，军队的大权的控制和瓜分问题早在五·一三事件发生时或者说之前就已经决定在林彪的心中了。

1967 年 7 月 25 日，也就是著名的 7.20 事件发生不久，林彪在讲话中突然露出了这样一句话来，林彪说：“以前我正愁没题目做文章，现在他们给我们出了题目，我们要大做文章。”也是在这天，林彪还说：“你们要战斗，要突击，彻底砸烂总政阎王店。”林彪讲话在文革中是不那么随便的，至少不像江青那样到处放火，而是言简意赅，一旦说了，那就算是问题升级了，而且，林彪本人在文革运动最激烈的三年（1966—1969）中也不是经常抛头露面的，特别是像普通的文艺演出，林彪更是与之无缘，然而，怪事在五·一三事件以后都发生了。1967 年 2 月发生的“二月逆流”事件，毛泽东亲自召见三老四帅给予严厉的批评，这次会议十分重要，但是，林彪却不到会，让叶群参加。可是，到了 1967 年七一前夕的军内两大派演出之际，林彪却忽然兴致大发，去看了演出，出奇的表示了自己的鲜明的态度，用叶群后来得意洋洋的表白来说就是“首长没讲一句话，就看了一场戏，就把那个‘冲派’压垮了。”

而我们都知道总政垮了以后，总政治部的军管负责人就是吴法宪，文革中煊赫一时的军委办事组的前身军委看守小组也是在总政垮台以后成立的，它的成员就是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和张秀川，清一色的林彪集团的大将。当 1967 年 9 月 23 日，毛泽东决定保留军委办事组后，周恩来提议杨成武以代总长的身份兼任，（当时毛泽东的原话是：“要不要这个军委办事组，要的话，就让杨成武来当这个组长，中央文献版的《周恩来传》中说是周恩来提议杨成武做军委办事组组长）林彪马上给周恩来打电话说：“吴法宪不当组长可以，但要让吴法宪担任办事组第一副组长兼副总参谋长。”【注 61】（《杨成武将军自述》317 页）

由此可见，炮打肖华不过是一个手段，而目的则是瓜分军内的大权，在这一点上，林彪不惜和自己并不喜欢的江青势力相勾结，并且处处突出江青，这在林彪以往做事中是不多见的，但也是可以理解的。在肖华这件事上，林彪很好的利用了江青的态度甚至通过江青影响了毛泽东的最后决策，可谓是一石三鸟。

关于林彪、叶群蓄意打倒肖华还有另外一个旁注，那就是杨成武的一个遭遇。一次文艺演出，杨成武通知了叶群而没有通知林彪，大抵也是深知林彪不喜欢演出这一类的公开活动吧，但是，万万没有料到的是，叶群因此勃然大怒，说出特别难听的话来，她指着杨成武说：“这么重要的演出为什么不通知 101？你杨成武眼中还有一个林总吗？你没看到罗瑞卿、肖华的下场吗？你要是走罗瑞卿、肖华的老路，小心我打断你的脊梁骨。”在这里叶群把肖华被打倒的这件事的真相给流露了出来，那就是“眼中没有林总”。

继七一前夕林彪表态不准肖华出席晚会和一屁股坐在老三军这一边以后，肖华的日子越发难过起来。邱会作把批斗总政的小组完全公开化、合法化，到处引发整肖华的材料，邱会作亲自作出修改，印了 30000 册分发给全军后勤系统学习。

1967 年 8 月 11 日，在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的操纵下和叶群幕后的支持下，造反派冲进总政大院，贴出“肖华是党内军内最大的走资派”的大字报，这一天被称为“8.11 炮打”，这件事是肖华倒台的标志，因为在这一天的大字报中最为醒目的一条就是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肖华是扶不起来的天子。”【注 62】（《我的母亲》368 页）从这个“最高指示”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对于打倒肖华的最后态度仍旧要取决于毛泽东。

8 月 23 日，《解放军报》负责人李讷（毛泽东、江青生女）贴出《反复辟、反保守、誓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大字报，侮蔑《解放军报》原来的领导人是肖华的“黑干将”，次日，陈伯达就代表中央文革去支持李讷，组建了以李讷为首的《解放军报》新的领导班子。1968 年 10 月，经毛泽东批准，对总政治部实行军管，军管负责人是林彪推荐的吴法宪。总政治部被说成了阎王殿，而总政的各个部门诸如秘书部、保卫部、联络部、干部部、文化部、宣传部等都被冠之以“黑心脏”、“保卫蒋介石”、“联络敌人”、“配黑班子”、“文艺黑线专政”、“造反革命舆论”等一系列的无中生有的名词。肖华、王新兰双双被捕，给王新兰的罪名是“肖华死党、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苏修双料特务”，一关就是三年。而肖华更是身陷囹圄，导致肖华早逝的胃癌就是这个时期种下的祸根。

#### 第四节：傅连璋沉冤

后代史家评论文化大革命时代之所以黑暗就在于在这样的年代中，公报私仇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非但不受任何责难，反而大行其道。林彪掀翻贺龙、罗瑞卿、肖华等人主要是为了他及其集团的上升铺平道路，而另一面，林彪也没有忘记那些曾经和他个人发生过龃龉、让他和他的家人为之不快的人，就在这场打着“斗私批修”旗号的政治运动中，林彪一样也在干着公报私仇的勾当，而且相当恶劣。

林彪在文革中公报私仇的一个典型对象就是导致傅连璋的沉冤直至冤死狱中。傅连璋，字日新，1894年生，福建长汀人。因为家里贫穷，所以，受到教会的资助，后来进入亚盛顿医学专科学校学习，毕业后行医，很快在当地声名鹊起，成为远近闻名的名医，家道因此中兴。傅连璋在参加中国革命之前已经是一个相当富裕的士绅阶层，他本人还担任着汀洲福音医院的院长。因为和中共党人邓子恢的接触，让傅连璋对中共开始抱有很大的好感，这种好感直接影响了傅连璋以后的人生道路的选择。中共党内著名人士陈赓、徐特立等人都曾经得到过傅连璋的精心救治，其中陈赓的左腿就是在傅连璋的治疗下得以保全。而傅连璋救治的最大病人就是毛泽东。1932年4月，毛泽东在福音医院期间，傅连璋精心设计治疗方案，为毛泽东的身体康复立下汗马功劳。傅连璋不但积极救治中共党人，还主动提出为红军大搞防疫措施，包括接种牛痘、购买药品，为此，傅连璋的侄子、堂弟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1933年初，傅连璋全家参加红军，傅连璋任中央红色医院院长。1934年，毛泽东感染恶性疟疾，生命垂危，傅连璋施展妙手，三天之内就让毛泽东的体温基本恢复正常，把毛泽东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1938年起，傅连璋开始担任中央总卫生处处长。1945年任军委卫生部第二副部长兼党总支书记。建国后，傅连璋兼任政府和军队两个卫生部的副部长，同时还担任中华医学会理事长、会长。1955年傅连璋被授予中将军衔。

傅连璋同林彪夫妇的结怨实在出于偶然。傅连璋是一个医术非常高明的专业人士，他的医道甚至连王明、张国焘都深深折服，可傅连璋却外行于政治斗争，对于政坛上的风云变幻、诡谲莫测时常显得有些“幼稚”。也就是因为这些本来属于性格上的原因导致了傅连璋在政治生涯中的一次又一次挫折。以傅连璋的资历、职务，直到延安还没有入党，而且在他的入党问题上屡受刁难。最后还是陈云发话说：“傅连璋在政治上愿为共产主义奋斗，跟共产党走，我们不能将他拒之门外。”陈云和王鹤寿主动提出做傅连璋的入党介绍人，这样傅连璋的入党问题才获解决。【注 63】（《百年陈云》92页）彭德怀庐山被批之后，其他人避之唯恐不及，傅连璋不但主动登门，还详细询问彭的健康状况，彭德怀说：“我这里是非之地，今后你千万不要来了。”可傅连璋却说：“党内不同意见的争论，为何要搞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呢？”为此傅连璋还去请教周恩来，周恩来只能含糊其词的说：“历史就是历史，他是最无情的，最公正的是人民。”于此可见傅连璋耿介的一面。也正是傅连璋耿介的这一面让他无意中得罪了林彪、叶群。

林彪在建国后长期称病，1953年毛泽东指示对林彪的病情进行专家会诊。会诊前，林彪指使叶群暗示傅连璋开一份诊断证明，意在证明林彪确实有病。但是，傅连璋以此不合工作要求和原则加以拒绝。专家会诊的结果证明林彪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大病，完全可以正常工作。傅连璋还出于医生的职业习惯和好意劝说林彪注意日常生活卫生，屋里要经常通气，要见阳光，多吃水果和蔬菜。傅连璋并劝诫林彪最好远离毒品（吗啡），戒除生活中的恶习。傅连璋同时把这些诊断结果上报给中共中央与毛泽东，傅连璋认为林彪最听毛泽东的话，就委婉提出最好由毛泽东出面对林彪进行一下劝导，毛泽东乃写曹操的《龟虽寿》赠与林彪。然而，傅连璋却没有料到他其实触及到了林彪最大的忌讳。林彪以养病行韬晦之策，傅连璋领导的专家会诊恰恰给林彪的这一政治手段做了一个最好的侧面的击穿，林彪岂能满意？还有就是傅连璋提出要林彪戒毒和戒除不良习性，这无疑是把林彪见不得人的隐私发于公众之间。实际上林彪不但长期服用一些毒品，而且还患有淋病，关于林彪患有淋病的记载不是很多，但萧克作为林彪曾经的战友，对此有过描述，可资征信。【注 64】（《朱毛红军侧记》19页）而据林彪的保健医生的描述，林彪患有一定的精神系统的疾病，这在五十年代苏联医生方面就有结论。只不过，这一点林彪夫妇都予以否认而已。

文革爆发后，林彪夫妇认为报复傅连璋的机会来了，林彪手下的亲信大将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秉承林彪夫妇的意思首先在1966年8月公开批判傅连璋，邱会作指称傅连璋是“大毒蛇，放过毒”，还说“卫生部不烧傅连璋就是没有党性。”邱会作要求总后卫生部“一定要烧透傅连璋”，在邱会作的高压下，8月26日，总后卫生部贴出傅连璋的大字报，说傅连璋是“三反分子”、“修正主义分子”，诬称傅连璋在林彪病重时不给药吃等。总后卫生部的造反派还独出心裁的搞了一个傅连璋罪行展览，此时已经72岁高龄的傅连璋对妻子说：“这一定是林彪搞的，只有毛主席能救我。”傅连璋提笔给毛泽东写信，信中提到：“我跟随你几十年，你是最了解我的。几十年来我有什么错误，从来没有人跟我谈过，现在突如其来地说我是三反分子、反革命，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弄不清楚。就算我样样事都做错了，那么1934年你在粤都（于都）病危时，我挽救了你的生命，总是对的吧，希望你现在也能救我一命。”【注 65】（《文化大革命十年史》254页）傅连璋的信是8月28日写出的，毛泽东在9月3日予以答复，毛泽东写道：“送陶铸同志酌处。此人非当权派，又无大罪，似应予以保护。”10月28日，毛泽东又就傅连璋一事作出批示，批示说：“傅医生：前后送来各件都看到了。政治安排问题，很多人同样，现在还谈不到，等将来再说。”、“对自己的一生，要有分析，不要只见优点，不见缺点。”【注 66】（《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卷《对傅连璋来信的批语》）陶铸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提出对傅连璋予以保护。但是，事情远没有如此简单，文革中的群众运动在1966年—1968年间形成的势不可挡的局面并不是经常可以依照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就在毛泽东9月3日的批示作出后的第三天即9月5日，傅连璋继续遭到更为猛烈的批斗，肋骨被打断。其后，傅连璋一

家虽然被转移到香山，但是，批判傅连璋的热浪始终没有停止。1967年6月，“打倒城市老爷卫生部”的口号一经传达，傅连璋的厄运再度临头。11月，总后勤部部长邱会作报经林彪批准，在总后成立“傅连璋专案组”，并且起草了《关于批判傅连璋三反言行的请示报告》，总后党委还专门起草了一个《关于彻底批判傅连璋三反言行的报告》报送军委。邱会作在该报告上批示：“以我看主要抓他（傅连璋）三点，第一，三反言行；第二，黑线关系；第三，斗志衰退。”

此时，林彪、江青两个政治集团尚在合作阶段，所以，林彪夫妇不满意的对象自然也是江青打击的靶子，江青在接到傅连璋的“材料”后也公开说：“傅连璋是个坏家伙，他竟敢把毛主席的健康状况向外扩散，把他抓起来。”1968年3月14日，也就是江青发出指示的第二天，邱会作亲自坐镇指挥北京卫戍区对傅连璋进行抄家、逮捕，傅连璋遭到逮捕后，先后遭受了非人的待遇，他患有严重的胃病，医生也开出了需要给他病号饭的证明，狱方却表示要“饿他一段时期”，已经74岁的傅连璋既得不到饮食上的保证又经常被突击审讯乃至殴打，身体每况愈下。就在入狱的15天后即1968年3月29日傅连璋惨死狱中，至死身上还戴着手铐。在傅连璋死后的第七个年头，1975年5月17日，毛泽东给这位他自己曾经赞誉为“现代华佗”的傅连璋提出平反的指示，毛泽东说：“傅已入土，呜呼哀哉”、“应予以昭雪”。

## 第五节：“杨余傅事件”始末

1965年林彪扳倒了罗瑞卿，1966年林彪又开始整贺龙，1967年击垮肖华，到了1968年，林彪打击的矛头对准了代总参谋长杨成武。

“杨余傅事件”的三位主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在文革初期都是当红的政治人物，特别是杨成武。杨成武，生于福建长汀。早年曾参加爱国学生运动。1929年参加长汀县农民暴动。之后加入闽西红军并任第三路军指挥部宣传队中队长。1930年随部编入红四军。同年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红四军三支队八纵队干事、十二师政治部秘书、连政治指导员、教导大队政治委员、第十一师三十二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二师四团政治委员等职，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历次反“围剿”作战。1934年10月参加长征，率部担任前卫，参与组织指挥强渡乌江、抢占娄山关、飞夺泸定桥、攻占腊子口等作战。到陕北后参加直罗镇和东征战役。1936年6月入红军大学学习。1937年初任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抗战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团长。平型关战斗时率部在腰站钳制打击日军。之后收复涞源、广灵、灵邱等7城。1937年冬起历任八路军独

立第一师师长、晋察冀军区第一分区司令员等职。1939年冬指挥所部反击日军的五路合击，在黄土岭战斗中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1940年率部参加百团大战。1944年9月任冀中军区司令员。抗战胜利后历任晋察冀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保北、正太等战役，并参与指挥清风店、石家庄等战役。1948年8月任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司令员，率部进军绥远，解放集宁、包头等城市，有力地配合了辽沈战役的进行。之后率部参加了平津、太原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天津警备区司令员、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任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指挥所部参加了秋季防御作战。1952年回国后历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京津卫戍区司令员等职。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之后历任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防空军司令员，代理总参谋长。杨成武同肖华、罗瑞卿等人一样，都是标准的“双一干部”，他和林彪也曾有着一段不错的过从，杨成武还写过一篇《林军团长教我怎样当师长》的文章，从中可以看出那一代战将对林彪在军事指挥上的钦佩。当然，这种钦佩也一度带到了文革之初，杨成武初任代总长，和林彪乃至毛家湾的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在武汉“7.20”事件起来之后也就是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阶段，林彪对杨成武的看法开始发生根本性转变。

在“7.20事件”之前，林彪在有些问题上已经开始注意杨成武的变化了。青海赵永夫事件出来后，林彪要求杨成武以后不要把重要文件送给叶剑英审阅，杨成武颇感为难，因为叶剑英不但是中央政治局委员，而且还是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央并没有明文规定不能给叶剑英送文件。林彪告诉杨成武：“不叫你送，你就不要送。”杨成武事后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要杨成武把那些并不重要的文件不必送给叶剑英，而重要文件照送不误，这样一来自然被林彪看作是“抗命”。毛泽东准备动身到南方时，点名要杨成武跟随，适时，杨成武处在一个上传下达的重要的位置，相当于“联络员”。毛泽东到武汉本意是要调和一下已经日渐激化的矛盾的，也说了要保陈再道的话。（陈再道时任武汉军区司令员）但是，由于王力、谢富治等人的处理失当，使得派系斗争进一步升温，甚至传出兵变的消息，毛泽东被迫离开武汉，在这件事发生后，毛泽东有些不够冷静，说了一些很重的话，林彪等人在京主持工作就把武汉的事情一下子上升到非常吓人的地步，直接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事后，毛泽东征求杨成武的意见，杨成武认为陈再道、钟汉华（武汉军区政治委员）等人根本就不会反对毛泽东，毛泽东深以为然。此时的毛泽东已经从当初的悻悻中逐渐清醒过来，不但制止了“揪军内一小撮”的提法，还在送审的文件陈再道的名字后面加了“同志”二字，表明陈再道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而在林彪这边已经对武汉的事件做了充分的准备，在批判陈再道的会上，空军吴法宪竟然动手打了陈再道，让与会者大吃一惊。不但林彪的亲信如此，林立果也披挂上阵，不断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言论。远在北京的林彪等人不断升温，而外地的毛泽东则开始对文革中的人与事别有一番评论。

毛泽东同杨成武说：“谁封我四个官啊？”毛泽东所指的就是林彪题写的“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

岁！”的标语口号。这应该算是毛泽东第一次公开的对林彪吹捧自己提出了质疑。毛泽东意犹未尽的说道：“你们不要宣传这些，要讲马克思主义万岁！讲马列主义万岁，不要宣传个人，否则将来要吃大亏。”毛泽东还不满的说：

“什么永远健康，难道还有不死的人吗？”毛泽东的这番话让在场的包括杨成武在内的人们都很吃惊，因为自从文革以来，林彪的这些言论还没有哪一个人敢如此质疑，如果说话者不是毛泽东本人，杨成武他们根本无法想象。毛泽东的“反潮流”言论还不仅于此，他还对当时在社会上遭到造反派围攻、批判的一些领导干部发表了大相迥异的评价，他说：“朱毛朱毛，没有朱哪有毛，有人说朱德是黑司令，我说朱德是红司令。剑英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陈毅是个好同志。荣臻可是个厚道人。徐老总四方面军的事情不能搞。是张国焘的事情。贺龙是二方面军的旗子。”这些话当中有的可以传达，有的则不好说，尤其是毛泽东批评林彪的那些个吹捧过分的语言，杨成武更不好直接告诉林彪夫妇，当叶群婉转的提出毛泽东对林彪到底有何评价时，杨成武只好支吾不言了。这在林彪夫妇看来属于“离心离德”，林彪直截了当的说：“杨成武封锁我，他随主席视察大江南北三个月不向我汇报。”

毛泽东曾要杨成武单独向周恩来汇报关于王力、关锋、戚本禹的问题，要求周恩来负责处理此事。却没有提出要林彪与闻，周恩来感觉不妥，他告诉杨成武说：“这样大的事，事先不让林副主席知道不好。回去对主席讲时，说是我让你向林副主席通报的。”【注 67】（《杨成武将军自述》303 页）林彪从这些蛛丝马迹上越来越感到有些蹊跷，也就非常想从杨成武处多了解一些有关毛泽东的动静进而揣摩毛泽东的意图，偏偏毛泽东针对林彪的讲话并没有要杨成武负责传达，杨成武怎么能够向林彪透露呢？林彪试探未果就放出风去：“杨成武从上海回来后，就骄傲了，目中无人了。”、“还是吴法宪得心应手。”林彪的这些似是而非的讲话还只是烟幕，他对杨成武此时还没有完全放弃，还要继续考验一下，看看杨成武到底能不能站过来。为此，林彪就黄永胜担任总政治部主任一事征求杨成武的意见，肖华倒台后，总政主任始终悬空，林彪有意把总政抓在手中，吴法宪就曾任总政军管的负责人。黄永胜之于林彪的关系，杨成武自然清楚，但是，杨成武并没有阿附林彪的意见，反倒是大谈自己的真实看法，杨成武认为黄永胜从来没有做过政治工作，而且生活作风不好，不检点。杨成武的话点到为止，实际已经很给黄永胜留面子，像黄永胜这种私生活糜烂的干部如果不是有林彪的照拂，是很难安于现职的，更别说提拔到总政治部主任这样一个岗位上来。杨成武的看法也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毛泽东说：“林彪提出要黄永胜当总政治部主任，我没有同意，连黄永胜这个人过去我都不认识。”【注 68】（《杨成武将军自述》305 页）

时隔不久，也就是 1967 年年底，京西宾馆举行一次文艺演出，杨成武的秘书给毛家湾来电话征求“林办”的意见，并且转达杨成武的意思，希望叶群能够参加。叶群得知这次演出江青也去就马上跟了去。哪知道叶群看完演出回来大发脾气，她说：“这么重要的演出竟然不要首长（指林彪）参加。”叶群还同秘书询问杨成武处来电话是杨成武本人打来的还是秘书打来的，当知道是杨成

武秘书打来的，叶群更加生气。叶群因为此事和杨成武闹了一次，她指着杨成武的鼻子问：“你杨成武眼里还有一个林彪吗？你没有看到罗瑞卿、肖华的下场吗？你要走罗瑞卿、肖华的老路，小心我打断你的脊梁骨。”【注 69】

（《毛家湾纪实》134 页）叶群情急之中把罗瑞卿、肖华的倒台的真相也道出了一半，叶群的威胁并不是泛泛而谈。林彪的秘书们事后才意识到叶群的发火其实是林彪、叶群整垮杨成武的信号。

1968 年 3 月初，也就是林彪准备动手收拾杨成武的前后，对杨成武进行了最后一次考验。林彪亲自在毛家湾和杨成武谈话，其亲切程度让杨成武受宠若惊，林彪找杨成武来的目的就是要杨成武在叶群的历史问题证明书上签字，作为叶群的担保者。（杨成武和叶群都是福建人，叶群偶尔也以此和杨成武以老乡称呼）按照林彪的说法，以往虽有人给叶群写过类似的证明材料，但是级别都不够，杨成武是军委常委、代总长、军委办事组组长，分量足。可杨成武说他和叶群结识较晚，叶群在北平、天津的事他也不知。林彪言简意赅的说：“吴法宪写了，你也写一个吧。”杨成武提出要先看看叶群的材料。”林彪脸色突变，杨成武后来回忆说：“林彪半天没有说一句话，空气凝固了，一切都像是死的。”【注 70】（《杨成武将军自述》309 页）应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林彪对杨成武绝望了。

林彪有一句名言叫做：“靠山头不行，要靠人。好话讲的再多也没有用，从一滴血能看到他的全身。”杨成武经不起林彪的“考验”，自然也就要被林彪剥去。打掉杨成武和打掉罗瑞卿、肖华等人一样，文章一步一步的做。总参搞了一篇谈领袖权威的文章，陈伯达指定要用杨成武的名义发表，这就是后来那篇著名的《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杨成武不同意，叶群又打来电话说林彪的意思也是要以杨成武的名义发表该文，叶群还举了一些例子：“在延安时，西北高干会议的政治工作报告，不是用谭政的名义发表的吗！浙江农村调查的文章，是毛主席亲自修改过的，不是用江华的名义发表了吗！还有毛主席关于国际问题的一篇谈话内容，不是用陆定一的名义发表的吗！”杨成武只好表示同意，文章发表后遭到毛泽东的批评和奚落，毛泽东说：“越读书越蠢，文章不是杨成武写的，是你们（指陈伯达）叫人搞的。我只看了标题，没看内容。你（陈伯达）不是中国的马克思吗，有些语言没有从科学辩证法中去考虑，你们要执行奴隶制，要写人的绝对权威，我才不相信你们写文章的人，我说不相信，不是完全不相信，列宁怎么讲的？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吗！就标题来说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虽然批评的是陈伯达，可毛家湾也有份，自 1968 年以来，毛泽东感觉以往鼓吹的很厉害的“个人崇拜”需要降温了，他在批示中说：“绝对的权威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毛泽东所要提防的实质是有的人通过吹捧他来达到其个人目的，用毛泽东的话说那就是“名曰树我，其实不知树何人”。然而，这个本来和杨成武并无关系的“罪

名”在“杨余傅事件”中却被强行的安在了杨成武身上，林彪指责说：“那篇大树特树绝对权威的文章，他拼命活动，要登。后来登在《人民日报》的第二版上，他还很不满意，那个第一版上当天登的是什么呢？是毛主席的教育批示。他认为他的文章应该登在毛主席的前面，要占第一版。”林彪如此急于摘清自己更能说明这篇大树特树文章的一些诡秘的背景。

林彪要搞掉杨成武还是有些预兆的，一次陈士榘向林彪汇报工作时顺便提了一句要同杨代总长说一说的话，林彪马上打断陈士榘：“杨成武不懂军事，不要向他讲。”杨成武是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的赫赫有名的战将，说杨成武不懂军事，恐怕无人相信，其实质还是要把杨成武排除在外。1968年年初，杨成武签名的一份报告建议提拔某人为某军军长，林彪没有一如既往的表态同意，而是暂时压下了报告。作为林办秘书的张云生已经觉察到林彪对杨成武的不满。【注71】（《毛家湾纪实》135、136页）但是，杨成武本人浑然不觉。因为毛泽东不同意“永远健康”的提法，杨成武在呼口号时就漏掉了敬祝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永远两个字，叶群不高兴的说：“你不喊永远健康，他的内脏也是好的，他的身体也没有病。”1968年3月中旬空军机关的工作人员写了两封匿名信告发空军党委办公室周宇驰、刘沛丰、于新野、王飞等人，在空军胡作非为的种种丑行。其中，有他们仗着吴法宪，整人于死地；也有他们玩弄几名小姑娘，致使她们怀孕的恶劣行径。杨成武为此郑重其事的给林彪写了信，“林副主席：转去空军一封来信，情况如属实，当严肃处理。杨成武。”杨成武的本意是不想让这件事闹得太大以致于吴法宪等人下不了台，哪知道他转信的本身在毛家湾看来已经是最大的不敬和挑衅。周宇驰、于新野等人都是林立果的亲信，他们之所以敢在空军内部胡作非为，那是深有来由的。杨成武无形中又在这件事上得罪了林立果，而此前林立果写的一篇《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永远忠于毛主席》（以空军党委调查小组名义）杨成武不同意：“以林副主席为光辉榜样，那毛主席是什么榜样，这样提不大妥当。”吴法宪没听杨成武的，是因为吴法宪知道此文的来头。在连续开罪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之后，杨成武的下场似乎已经可以预知了。

杨成武满心以为林彪可能会秉公处理空军的事情，哪知道几天后杨成武批转的这封信竟然到了吴法宪手里，而且还是叶群交给吴法宪的。不仅吴法宪看到了这封信，连被告者周宇驰、于新野等人也看到了这封匿名信，周宇驰等人还核对笔迹，最后确认是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的秘书所写。空军党委办公室本来就分化成两派，一派是王飞、何汝珍等人为首的以林立果撑腰的“新派”，一派则是包括余立金秘书在内的“老派”。两派素来不睦，经常互相攻击。而王飞这一派因为有着叶群、林立果在背后的指使，势力较大。他们利用吴法宪、余立金不在的情况下一举拿掉了空军党办某科长，事后吴法宪、余立金也不敢追究。如今王飞、周宇驰等人看到余立金的秘书居然敢“反攻倒算”利用杨成武来压他们，他们岂能善罢甘休。于是，他们就就让何汝珍出面去搬救兵，这个救兵就是叶群。何汝珍当年和叶群一起在江苏太仓一起蹲点，何汝珍还是叶群的工作队队长，二人关系很好。何汝珍就去毛家湾跟叶群说，写信的余立金的秘书同杨成武的大女儿杨毅关系暧昧，而且还指称这是余立金的秘书的妻子提

供的。叶群就让何汝珍去套余立金秘书妻子的口供，最好落实到文字上面。哪知道，秘书的妻子见此事牵连众多而且事关代总参谋长就不敢写了，叶群得知大怒，她亲自逼迫吴法宪去把这个女的抓起来，叶群对吴法宪说：“我给你撑腰，下令把她抓起来，叫她写，不写不行，我就不信拿她没办法？”吴法宪没有办法，只有按照叶群的指示办，他让空军副参谋长坐镇，何汝珍等人出面把余立金的秘书的妻子抓到空军的一个战备工事里面进行逼供，但是，这个女的始终没有屈服。【注 72】（《毛家湾纪实》138、140 页）此计没有成功，王飞、周宇驰就直接要吴法宪把余立金的秘书抓起来。吴法宪虽说地位远在王飞、周宇驰等人之上，但是，王、周背后站着的是叶群、林立果母子，吴法宪当然不敢开罪，然而，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抓捕政委的秘书，吴法宪还不能开口，吴法宪说：“余立金是空军政委，抓他的秘书，不通过他不好！你们强迫我签字不是要夺我的权吗？”周宇驰转而就把吴法宪的不从报告毛家湾，叶群直接给吴法宪打电话下命令：“你说我们夺你的权，夺你什么权？我要把林立果、林豆豆从你们空军撤回来！你不识好歹，我们把儿女放在空军是为了保你，是为了保你的权！你反说我们夺你的权。”叶群又说：“告诉你吧，杨成武和余立金勾结起来，要夺你的权！你不要蒙在鼓里！”吴法宪顶不住叶群的压力只好下令对余立金的秘书进行隔离。

余立金，湖北大冶人。1928 年参加鄂东南武装起义，在红色野战军当战士、班长。1930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在鄂东南红军独立第三师机枪连当副排长。1931 年后任机枪连副连长，政治指导员。参加了创建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作战。1933 年 7 月调往湘赣革命根据地，任红十七师直属队总支书记。1934 年 8 月任红六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参加了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及西征。同年 10 月后任红六军团第十八师第五十三团政治委员，率部参加了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多次反“围剿”作战。1935 年 11 月率部参加长征北上。1936 年 7 月任红二方面军六军团第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同年 10 月到达甘肃会师，任第十八师政治委员。12 月入红军大学第二期学习。抗日战争爆发后赴上海，在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从事秘密工作。1938 年 4 月到新四军，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教导总队政治处主任。1941 年后历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五分校政治部主任，抗大华中总分校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部副主任，兼旅政治委员等职。参加巩固发展淮南抗日根据地和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淮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副校长，华东军政大学副校长，华东军大政治部主任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军委第三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华东军区空军政治委员，军委空军副政治委员兼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委员。余立金也是毛泽东巡视大江南北时亲口点的将，毛泽东的一些谈话记录整理出来后由余立金直送周恩来，吴法宪家和余立金家是邻居，吴法宪得知余立金回来就去打探消息，可余立金守口如瓶：“我只是给总理送信，别的我不知道。吴法宪说，我们很希望及时听到。余立金说还是等传达吧。吴法宪探听消息并不是吴法宪个人的意思，而是奉毛家湾的指派。余立金对林彪不能不说不尊重，但是，要余立金像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黄永胜等人那样无条件的服从林彪甚至比肩毛泽东，余立金是无论如何做不到的。空军开党委扩大会议，吴法宪在代表党委发言中，用了“以毛主席为首、林副

主席为副的党中央”这句话，作为政委的余立金提出异议，说中央没有这么提，我们空军这样提好不好。吴法宪把余立金的疑问带给毛家湾，林彪、叶群对余立金的印象大坏。林彪之所以要把余立金也一并打倒，除了以上的原因外，还有重要的一条就是在林彪看来空军必须对毛家湾的指令绝对服从，林彪对空军的指挥必须如臂使指、收纵自如。余立金在一些关键的事情顶牛，就难保日后不成为林彪号令空军的障碍，特别是余立金和杨成武走得很近，可以说言听计从，所以，打倒杨成武也就要打倒余立金。再有，打倒余立金还有个额外的收获，那就是利用打倒余立金这件事进一步收服吴法宪，让吴法宪一劳永逸的紧紧的绑在毛家湾的战车上。

余立金的秘书被捕，杨成武和他的妻子赵志珍很快知道了，因为事关女儿杨毅，所以，作为母亲的赵志珍出面了。（赵还是杨成武办公室主任）赵志珍、余立金直接去找叶群，事前，赵志珍给叶群打了电话，怒气冲冲告了吴法宪一状，叶群佯装不知。赵志珍便和余立金登门拜访，林彪表示不能不见，具体的就让叶群出面。叶群告诉负责警卫工作的李文普注意一下安全问题，李文普因为有上次贺龙来访的教训，深知叶群喜欢无中生有，便说：“不会有什么事，赵主任（赵志珍）和余政委都是常来的客人，对他们不用担心。”叶群不以为然：“赵志珍是个女性，她不一定敢，但余立金膀大腰圆，况且人心隔肚皮，谁能保他不变哪？”李文普等人对叶群的“瞎折腾”没有办法只能照做。确如李文普所料的那样，赵志珍、余立金来毛家湾是“吐苦水”，哪可能有什么“不良”的企图呢？余立金向叶群谈了一番有关他的秘书和杨毅关系的原委，赵志珍则直接的指出：“吴胖子有鬼，想把矛头指向杨代总长。”赵志珍只说对了一半，真正想把矛头指向杨成武并不是吴法宪，而恰恰是坐在她面前的这位林办主任以及她的丈夫林彪。叶群假意表示要把赵志珍、余立金的意见反映给林彪，还告诉要赵志珍转达对杨成武的问候。赵志珍、余立金一走，叶群就把吴法宪找来，告诉吴法宪一定要顶住压力，不低头、不认错。有叶群这样的态度，赵志珍等人想要达到的目的自然落空，事隔一天，赵志珍又给林办打来电话，发了一通牢骚，赵志珍哪里知道，此时的毛家湾已经全面谋划如何整垮杨成武了。

“杨余傅事件”过后若干年，周恩来对杨成武道出了一点这次事件的有关内幕，他说：“林彪在毛主席面前一再揭发你，研究了四次，毛主席才答应。”毛泽东自己也曾说过：“一边是副统帅，一边是代总长，两者必择其一，让我怎么办呢？当时我还没有充分的理由，不要这个副统帅，无法向全国人民交待呀。”【注73】（《杨成武将军自述》374页、339页、340页）在又一次面临取舍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暂时又选择了林彪，牺牲了杨成武等人。

“杨余傅事件”的第三主角傅崇碧同林彪并不什么实质性的冲突，他的被整主要和江青有关。傅崇碧，四川省通江县人，1932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历任宣传员、县委书记兼县独立团政治委员、特委书记、川陕省工作团

团长等职，参加了川陕苏区第一、二、三次反“围剿”斗争和红军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历任股长、科长、团政治处主任、大队政治委员、团政治委员、军分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等职，参加了“百团大战”和晋东南、晋察冀反“扫荡”等战役、战斗。解放战争时期，他历任旅政治委员、旅长、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平绥、大同、怀来、丰镇、张家口、易县、青沧、正太、大清河、冀东、石家庄、平津、太原和进军大西北等战役、战斗。新中国成立后，他任军长，参加了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后期战斗和第五次战役全过程。回国后，他进入高等军事学院学习深造，1965年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文化大革命”初期兼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林彪倒是一度对傅崇碧表示出很大的“关怀”，傅崇碧住院期间，林立果还代表父母去看望他，出院后，林彪见到傅崇碧说：“不要把身体搞坏了，你可以到西山老师住地去休息一段。大的事管，小的事要卫戍区的干部多做。”叶群还打听傅崇碧妻子的工作单位，主动提出：“我可以给医院造反派打个招呼。”

【注 74】（《傅崇碧回忆录》212 页）

傅崇碧的落难始于“武装冲击钓鱼台”，1968年3月初，鲁迅先生的夫人许广平给毛主席写信，称原收藏于鲁迅博物馆的书信手稿不见了。毛泽东当即要周恩来马上查找。这件事后来责成北京卫戍区傅崇碧去办理。傅崇碧接受杨成武布置的追查鲁迅手稿的任务后，和卫戍区的副司令员、副政委等几个人，花了三四天的时间，查清鲁迅手稿就在中央文革小组的保密室，遂于1968年3月8日，由傅崇碧带着卫戍区副司令员刘光甫、副政委周树青、秘书冯正午赶往钓鱼台，经请示陈伯达的秘书进入，姚文元把他们接到钓鱼台16楼的中央文革小组办公室。此后，江青带着秘书进来，不问青红皂白，冲着傅崇碧大叫：“你们来这么多人干什么？是不是抓人啊？”傅说：“我们是来汇报的。”这时，傅崇碧的秘书冯正午由于几个晚上没睡觉，又有低血糖病，也没见过这阵势，一下子晕倒在沙发上，口吐白沫。他的提包掉到地上，滑到江青脚边。江青跳了起来，说提包里有手枪。就是这件事，后来被定性为“武装冲击中央文革”。谢富治、吴法宪还要傅崇碧因此向中央文革检讨。事后，毛泽东召见傅崇碧，江青也在座，傅崇碧违心检讨了“冲击钓鱼台”的错误，毛泽东则伸出小指头说：“你的错误是这个。”意思是问题不大，毛泽东还说：“江青是个炮筒子，乱放炮，你也可以放她一炮嘛。”傅崇碧怎么敢放江青一炮呢？只能说：“江青同志的批评是关心我们，对我们帮助很大。”3月16日，傅崇碧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期间，江青对傅崇碧说：“我批评你是为了爱护你嘛，写什么检讨报告呢？那天你来，一个人就行了，带了那么多人来，会引起惊慌的嘛。你不知道我正在整理内部嘛。”【注 75】（《傅崇碧回忆录》219 页）江青视钓鱼台中央文革所在地为禁地，一般人等根本无缘接近，曾经在钓鱼台服务的工作人员仅仅因为吃饭时发出声音就被文革小组办事组的负责人呵斥进而影响到该处警卫工作的一系列的变动。如果说傅崇碧是因为触动了江青不准擅入禁地的忌讳从而被整，那么这是低估了傅崇碧挨整的背景。傅崇碧所以被解职、调离乃至监禁，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傅崇碧从文革初期就坚定的执行周恩来的抢救政策，在毛泽东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度的保护老干部，这就给江青等人的批斗带来了阻碍，还有更为重要的一条是，傅崇碧并不能算作文革线上的人，随着文革运动白热化，北京卫戍区这个位置凸现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借助

文革崛起的各大政治派别都想把它牢牢的抓在手中，这样一来，傅崇碧必须让位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所谓“武装冲击钓鱼台”不过是欲加之罪而已，同时打倒傅崇碧也是栽赃杨成武的一个必要的伎俩。傅崇碧开始遭受的處理和楊成武、余立金也不同，只是調任沈阳軍區第一副司令員，此後行動儘管不自由，但是比起楊成武、余立金兩家所受到的磨難還算“幸運”的多。

同打倒羅瑞卿、肖華等人一樣，林彪對於處理楊成武也採取了“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的策略。葉群要林立果、張雲生代表林彪去看望病中的楊成武，林立果、張雲生到了楊成武家裏，問寒問暖，楊成武表示謝謝林彪的關心，張雲生作為旁觀者不無感嘆的回忆道：“可憐的楊成武，直到他被捕前的最後一刻還以為林彪是關心他的。”【注76】（《毛家灣紀實》149頁）

1968年3月22日夜，楊成武處突然接到電話說，空軍政委余立金被捕，是被吳法憲帶人拷起來的，當時還有人懷疑是不是吳法憲要搞政變。3月23日凌晨，楊成武家的大門被粗暴的敲響，幾十名全副武裝的軍人在李作鵬、邱會作等人的帶領下衝了進來，趙志珍等楊成武的家屬很快就被看管起來，邱會作告訴楊成武：“林副主席請你去開會。”楊成武問：“開什麼會？要你們兩個來請，啊？你們搞什麼名堂？”邱會作說，去了你就知道了。楊成武發覺家中的電話線也被掐斷，不禁怒問怎麼回事？邱會作等人不做正面回答，只是催促著快走，楊成武感覺事態不對，他大聲的質問道：“你們到底搞什麼名堂？開會？開什麼會？不要當騙子！要有黨性！沒有黨性還應該有人性，要有良心！”據說楊成武的這番話令邱會作、李作鵬等人有所震動。而就在3月22日夜晚，空軍政委余立金被突然叫走，隨即遭到逮捕，緊接著余立金的妻子陸力行被騙出門也被逮捕。陸力行的姐姐陸迅行曾在上海市公安局搞過敵偽檔案的甄別工作，了解到江青解放前的一些丑聞，深為江青所忌，文革初期陸迅行就被捕押送北京，江青還認為陸迅行應該把有些事也告訴了她的妹妹陸力行。所以，余立金夫婦的被捕比較楊成武還多了一層因素。

押送楊成武的車到人民大會堂北門，周恩來、謝富治等在那裏，周恩來小聲的對楊成武說：“你的事情，兩天前我才知道。”3月23日晚，楊成武被帶到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林彪、葉群、江青、康生、陳伯達、姚文元、王新亭、李天佑、汪東興、黃永勝都在那裏。林彪宣布：“現在開會。我來宣布中央的決定。一、楊成武搞晉察冀山頭主義，搞派性。二、楊成武勾結余立金，想奪吳法憲的權；勾結傅崇碧，想奪謝富治的權。三、楊成武把王飛、周宇馳、于新野打成反革命。楊成武你不當代總長了，黃永勝當總長。”說到這裏，林彪還刻意的強調了一下黃永勝的任職：“我再說一遍，不是代總長，是總長。”這也許是林彪對楊成武不贊同黃永勝出任總政治部主任的回應，也許是林彪在自我欣賞當初要楊成武代理總參謀長而不是實任總參謀長的預見。林彪的話音一落，江青馬上就說：“楊成武，你膽大包天，敢整我的黑材料！你要老實交代問題！”周恩來插了一句：“不是黑材料，而是紅材料。”吳法憲也說：“楊成武，你必須交代你的‘三反’罪行！必須交代你的黑后台！”康生：

“这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你要交代同那几个老家伙的关系，交代出你的黑后台！你和彭真什么关系？和罗瑞卿是什么关系？”陈伯达说：“杨成武反对马克思主义，写大树特树的文章，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这账是赖不掉的！”叶群：“杨成武三次命令傅崇碧冲中央文革的驻地，带了枪，带了子弹，还打了江青同志一皮包！这还得了吗！中央文革还有没有安全？毛主席还有没有安全！”【注 77】（《杨成武将军自述》341 页）杨成武欲加辩解，江青径直宣布散会，周恩来说：“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讲，不许揪斗杨成武，杨成武有病，要他去休息。有错误可以检查。”周恩来还对杨成武说：“不要着急，有病就好好休息。你的问题，是林副主席检举的，会搞清楚的。”杨成武当晚就被直接用飞机押送到湖北武汉。

为了给杨成武拼凑罪状，毛家湾忙成了一团，叶群特地把王飞、周宇驰调到毛家湾帮忙，叶群亲自布置杨成武的罪名，第一条是反对毛主席，第二条是反对林副主席，第三条居然是反对吴法宪。3 月 24 日夜，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军队干部大会，林彪、周恩来、康生、谢富治、江青、姚文元、陈伯达、叶群在主席台就座，原本朱德、陈毅、叶剑英、聂荣臻等人的座位也在主席台，临时给搬到了下面。毛泽东在 3 月 24 日下午给林彪布置了三个话题，一个是反对宗派主义，一个是反对两面派，一个是哲学上的相对和绝对。林彪说：“今天，这个会是要向同志们宣布中央最近的一个重要决定。最近我们党的生活中又出现了新的情况。这个问题虽然没有像刘少奇、邓小平、陶铸、彭德怀、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那样大，但是也比一般的其他问题要大一些。主席说是不很大也不很小的问题。这就是，最近从空军中发生了杨成武同余立金勾结，要篡夺空军的领导权，要打倒吴法宪；杨成武同傅崇碧勾结，要打倒谢富治。杨成武的个人野心，还想排挤许世友，排挤韩先楚，排挤黄永胜以及与他们地位不相上下的人。中央在主席那里最近接连开会，开了四次会，主席亲自主持。会议决定，撤销杨成武的代总长职务，要把余立金逮捕起来，法办！撤销北京的卫戍司令傅崇碧的职务。杨成武的错误主要是山头主义，两面派和曲解马克思主义，傅崇碧前一时间带了几辆汽车全副武装冲进中央文革的地点去抓人。”林彪还吹捧江青是“我们党女干部中的杰出女干部，女同志中杰出的女同志。”原本叶群给林彪安排吹捧江青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林彪临场给改成了“杰出的女干部”，叶群唯恐江青不满，立刻疾呼“向无产阶级革命家江青学习、致敬”的口号。康生、陈伯达、姚文元都做了发言和表态，周恩来也说：“完全拥护林副主席刚才宣布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英明的决定和命令。”他说：“我们要永远忠于中央文革”，“你们要继续揭发，有可能在杨成武后头还有黑后台。”周恩来还肯定和赞扬了江青。【注 78】（《大动乱的年代》292 页、《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 226 页）但在会后，周恩来私下关照要照顾好傅崇碧，提出对傅崇碧的家属要予以保护。坐在主席台下的陈毅身上带着糖果，他散发给叶剑英、聂荣臻等人并说：“我们吃我们的，不听他们的。”间接的表达了这些人对这个干部大会的强烈不满。就在大会散会前，毛泽东从休息室走上主席台，接见与会者，全体高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原空军文艺处的官伟勋曾在毛家湾借调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在回忆录中转引了一段林彪父女之间关于杨余傅事件的对话，颇有意思。林立衡问林彪：“杨成武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打倒他？”林彪回答：“是啊，杨成武有什么问题？”林立衡：“是你发表的讲话，下边都传达了，你怎么会不知道杨成武是什么问题？”林彪：“是啊，我讲了些什么来？把叶群叫来，杨成武到底有什么问题，让她讲讲。”【注 79】（《我所知道的叶群》225 页）此前，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当着康生等人的面已经告诉了杨成武，说他的问题是林彪检举的，如果没有这种事，周恩来怎么敢当着众人的面撒谎呢？这种低级的错误不要说在一生谨慎的周恩来身上不会犯，就是稍有政治常识的人也不敢公开编造文革中第二号“神”的谣言。在“杨余傅事件”中，林彪受益最大，他的亲信大将黄永胜、吴法宪进一步控制了总参、空军和军委办事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林彪对自己的女儿装傻说他并不知道杨成武是什么问题，这只能说明林彪在打倒杨成武一事上的心虚。因为就在官伟勋的回忆录中，我们知道林彪在背后不乏把一些自己对毛泽东、文革的真实看法告诉林立衡，以致于林立衡产生“轻生”的念头，可是一旦事关他林彪自己的种种隐私，林彪要么闭口不谈，要么王顾左右。原因也很简单，林彪如果坦率的告知杨成武乃至罗瑞卿、肖华这些人的下场都和自己有关的话，林立衡眼中的“慈父”形象何以保全？一些接触过毛家湾历史的都证明林彪素来喜爱林立衡，所以，不论从亲情角度还是从政治利害，林彪玩弄这种两面手法让包括林立衡在内的一部分人一直未能有效的识破是完全处在情理之中的，并不是有的人所鼓吹的什么“谜”。

因为在“杨余傅事件”中提及了晋察冀山头的问题，社会上炮轰聂荣臻的势头有所增强，聂荣臻亲自给毛家湾打电话质问，叶群只好搪塞。4 月 7 日，聂荣臻正式给毛泽东写信告知此事。4 月 10 日，毛泽东批示传达到聂荣臻处，毛泽东说：“荣臻同志，信已收到，安心养病，勿信谣言。”聂荣臻在 4 月 16 日去见林彪，问杨成武到底是什么问题，林彪支吾说：“杨成武不到我这里来。”意思是不大听话了。聂荣臻说：“你是副主席嘛，他不到你这里来，你打个电话他不就来了吗？”毛泽东曾对聂荣臻说过：“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注 80】（《聂荣臻回忆录》854 页）不过，直到 1973 年 12 月 21 日，毛泽东才表态说，杨余傅事件搞错了，是林彪搞的。算是给杨成武等人平反。1974 年 9 月 30 日，距“杨余傅事件”发生的 1968 年 3 月 23 日已经 6 年半的时候，三个当事人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重新聚会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庆招待会。适时，杨成武的大女儿杨毅已经被迫害致死，死因至今未明，余立金在狱中受到非人待遇，患上了绝症。

“杨余傅事件”后，林彪系统的大将逐渐正式登场，林彪集团逐渐成型。

## 第六章：林彪集团、家族概况

### 第一节：叶群其人

叶群，原名叶宜敬，又名叶瑾。去延安之前曾在国民党中央系统的电台里当过播音员，也曾经在青年战地服务训练班工作过，叶群的父亲叶君奇本身就是国民党军少将。叶群本人在生活作风上一贯不很严谨，她的朋友就曾经有过回忆，叶群在江西的时候，便和国民党的一个县长李林打得火热，以后到了延安，还把林彪给她的信到处宣扬。叶群和林彪能够结合，实际是毛泽东、朱德给多方撮合的。【注1】（《我所知道的叶群》151页）随着林彪的政治地位的不断上升，叶群也“水涨船高”起来，特别是1959年以后林彪开始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公开提出妻子可以当丈夫的办公室主任的规定，叶群得以用“林办主任”的身份频频和各方交往，抛头露面的机会大大增加，大量插手政治斗争。包括林彪都不得不在有些问题上听从她的意见。王年一在他的《大动乱的年代》中写道：“叶群权力较大，林彪的意见、指示要由她来把关，这是林彪授予她的权力，因为她有时可以向林彪提出‘更好’的意见。下面向林彪的请示必须通过她，她可以拖延请示、婉言谢绝、自行处置甚至‘假传圣旨’。她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所以，吴法宪之流也就奉承她，巴结她。”

【注2】（《大动乱的年代》376页）叶群在获得权力、政治地位上的一定的满足以后，开始转而追求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的新内容了。王年一在《大动乱的年代》中描述叶群的卧室曾经用了这样一段笔调：“而走进叶群的房间，你就像走到了一个暴发户的姨太太那里。”【注3】（《大动乱的年代》376页）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当年曾经参观过叶群卧室的徐景贤的回忆，徐景贤说：“走进叶群的卧室，就像走进一个暴发户的储藏室。”【注4】（《十年一梦—徐景贤文革回忆录》255页）两者都使用了“暴发户”这个词，实际上叶群也确实是“文革”催生的“政治暴发户”。在叶群的卧室内不仅有大量的被叶群通过各种手段巧取豪夺来的价值连城的文物，也有专门去香港为叶群定做的各种满足叶群“单身”生活的必需品。而众所周知的是林彪因为身体（或许还有政治上的考虑）的原因，无法像其他人那样过正常的家庭夫妻生活，这使得叶群倍感精神上的空虚，她不止一次的向其他人表达这层意思，甚至和秘书也谈起过。同时，叶群和林彪的关系也并不是一种密切的夫妻关系，更多的时候则是一种互为利用、互为借重的关系。1961年11月，叶群在家乡福州写过一篇不短的日记，日记中大骂林彪毁灭了她的青春，说她和林彪一起生活如同伴随着一具僵尸。叶群直接指责林彪是“一个专门仇恨人、轻视（友情、父兄、子女—无意趣）人、把人想的最坏最无情，终日计算利害，专好推过于人们，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人。”【注5】（《大动乱的年代》376页）“知夫莫若妻”，叶群的这段日记基本概括了林彪本质的大致轮廓。

指责归指责，在政治上叶群离不开林彪，她更多的时候是需要林彪这棵大树的。而林彪在相当多的时候也要借重叶群，这样，夫妻二人形成的政治双簧关系结成了林彪集团的主流。可以说，叶群在林彪政治集团中的地位是相当显赫和十分重要的。

林彪之所以看重叶群的意见，并非完全出于夫妻的关系，而主要是叶群在一些政治关键问题上的敏感。以往林办给毛泽东呈递文件按照规定都用“送”或者“请”，从1967年开始，叶群作主改成了“呈”，秘书说，呈是封建社会的习惯，解放以后都不用了。叶群大不以为然：“对别人不需要，对主席完全可以。主席地位最高，怎么恭敬也不过分。特别是首长（林彪）的身份，写‘请主席如何、如何’，似乎有点想与主席平起平坐的味道。写‘呈主席’就不犯嫌了。”叶群的这套把戏看似荒谬，其实大得林彪紧跟毛泽东的“三昧”，林彪在文革中就已经多次要求不要呼喊他“永远健康”的口号，林办秘书还上街专门做过覆盖这类大字报的事。叶群还给秘书们规定，只有毛泽东画圈或者表态的文件秘书们才能代表林彪圈阅，否则文件即使再重要也要推出去，不能由林彪率先表态。这样做的结果一方面摆脱了林彪首当其冲的可能，一方面也巧妙的避免了与毛泽东批示有所抵触之处。所以，我们至今在检阅文革期间的一些史料时就会发现林彪较少表态，用张云生的话说就是“造成林彪一贯紧跟的假象。【注6】（《毛家湾纪实》232、233页）1966年国庆节，林彪去天安门比毛泽东晚到了一会儿，叶群勃然大怒，她训斥李文普等人：“叫主席等首长，这象话吗？这是一次政治上的大事故。”叶群还娓娓道来她的“政治经”，她说：“不能让首长抢在主席前边上天安门，但也不能在主席到后，首长才到。首长可以早到一两分钟，不能让主席等首长。上天安门城楼，首长不能抢在主席前边半步，但到达城楼下的事件，首长不能比主席晚到半分钟，这是最大的政治。”叶群所说的“最大的政治”其实也就是林彪紧跟毛泽东的窍门所在。

叶群不但积极呼应林彪在政治上的紧跟，而且还能独出心裁的进行关键问题的取舍，这一点深得林彪的信赖。1967年6月初，总政治部主任办公室向林办打电话报告，天津驻军请示准备派一个连的兵力到郊外20多公里的一个地方收割小麦，往返需要三天。叶群要求秘书必须把这个电话记录抄报毛泽东，秘书有些不解，因为这是属于备案性质的报告，完全可以不报毛泽东。叶群强调说，这是部队调动，必须报毛泽东。秘书解释这不是部队调动，而只是一个连队的调动。叶群不认可，秘书进一步说，林彪自己强调过，对毛泽东要‘大事不干扰，小事不麻烦’。叶群说：“我比你更了解首长（林彪）。”叶群说的没错，这件事很快林彪就表态了，林彪说：“现在是非常时期，权力应当高度集中，部队的一切行动都应报告主席。”事后，毛泽东圈阅了报告，叶群不免得意：“主席圈阅同意了，并没有提出批评，这证明报主席是对的。”叶群还说：“反正多向主席请示报告并不错。”从文革的具体情况看，叶群的多此一举并非没有道理，李雪峰回忆：“主席对林不完全放心，自己一直牢牢的掌握着军队。文革期间不准调动军队，调一个排也要军委主席签字，就是必须由毛主席签字。”【注7】（《回首文革》第二卷713页）就在1967年毛泽东巡视

大江南北时，还专门就汇报问题表扬了林彪。毛泽东赞扬林彪的大小事都报告的做法。毛泽东具体谈到：林彪一切大小事都递来看，小事可不送的也递来，强调请示报告。你们要教育大家注意请示报告，不搞独立王国，请示了，批了，不一定正确，但比不请示报告好。由此可见，叶群在这些看似枝节上的态度确实比较秘书们“成熟”的多，也是更能抓住林彪的真实想法的第一人。

1967年3月初，周恩来、叶剑英就军队支左问题建议召开一次军级干部会议。周恩来在向毛泽东汇报时就顺便把这件事给提了出来，毛泽东当即同意，随后周恩来又向林彪讲了一遍，林彪也同意了。但是，康生却敏感的和江青、叶群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周恩来越过林彪直接同毛泽东汇报的，而报告林彪也是在毛泽东同意后补办的，等于就是履行了一个形式，这在他们眼中无形中是架空了林彪。所以，叶群要秘书立刻就此事向林彪讲清楚。同时，叶群和林彪进行了商量，和康生一道去毛泽东处告了周恩来一状。毛泽东表示：“总理是应该先与林彪同志通通气。”【注8】（《毛家湾纪实》98、99页）周恩来为此专门写了一封信给林彪，表示接受批评，下次一定注意，保证不再犯云云。林彪收到周恩来的信口授了回信，内中有“看到你的信，我深受感动，我应向你的谦虚精神学习。”林彪嘱咐这封信要给叶群先把关，叶群看后不同意发出，原因就是不能留下文字的东西，叶群说：“千年的文字会说话。”林彪同意叶群的决定，转而由叶群给周恩来打了一个电话了事。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林彪并不是什么“文革运动中的逍遥派”，更不是什么特殊的逍遥派，他对自己的权力和权限看的十分之重，任何人准备染指这个范畴都将受到他的还击，虽然这件事最初是康生提出来的，但是，林彪最后和康生等人去毛泽东处的结果说明林彪并不是康生、江青等人所能左右得了的。另一方面，像林彪给周恩来复信这种事都要叶群先行看过，足以说明叶群在林彪集团中的真实地位，林彪对叶群可以说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同时叶群的“干政”也不是在所谓瞒着林彪的情况下进行，相反却是在林彪的许可、指示下完成的。

叶群既代表林彪同外界发生关系，也主持、操控毛家湾内部一切事务。而叶群这样显赫的地位也让叶群有时甚至可以“假传圣旨”或者“先斩后奏”、“斩而不奏”。难怪聂荣臻说：“林彪是个昏君，真正给他当家主事的是他老婆叶群。”聂荣臻这话有一定道理，我们前面所举的那些例子也足以说明，包括后来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同毛泽东发生分歧并且提出三点著名的“要求”据林办秘书于运深说这都是叶群的主意。而且，目前也颇有一些人愿意如此认定叶群似乎是林彪集团的真正主谋，林彪的错误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替叶群背黑锅。我们并不准备否认叶群在林彪事件上的主要作用，也不能否认叶群在文革运动中所犯的种种罪行。但是，这些都还不能作为推卸林彪罪责的根本依据。叶群固然在不少事情可以做的了林彪的“主”，也独自出了不少的主意，然而，在事关权力角逐、政治决策等重大问题上，毛家湾真正的主角、幕后策划者还是林彪，如果因为叶群具有一定的实权就错误的判断林彪在大是大非上受控于叶群，那就大谬不然了。林立果、林立衡的婚事本属家事，理应是叶群这个当母亲应该操办的，而且这件事也一直由叶群在主持，但当叶群在林立果婚事上随便说了林彪一句“摘桃派”时竟然换来了林彪的一记耳光和随之

而来的拳打脚踢，如果不是秘书劝阻及时，叶群可能还要吃更多的苦头。毛泽东曾就林彪家事发表过意见：“叶群是小媳妇受气，林彪管得太严了，管那么多干什么？”【注9】（《我所知道的叶群》222页）鸡毛蒜皮的小事上林彪尚且如此“乾纲独断”，遑论其他？而且还不止在这些琐事上，林办秘书张云生说过他们这些林彪身边的工作人员有一个共同的致命弱点，那就是对叶群是清醒的，对林彪是糊涂的。换言之也就是普遍以为叶群很坏，林彪是受叶群操纵、摆布的，而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看法是相当的天真。中共“九大”之前，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康生、黄永胜负责酝酿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人选。江青、叶群都榜上有名，但是，毛泽东并不同意江青进入政治局，林彪也说叶群不能进。叶群因此担心当周恩来、黄永胜来毛家湾征求林彪意见时，林彪会继续否决她的政治局委员资格。所以，叶群就请林立果出面帮忙，要他编造谎话，说林彪正在出汗，还说林彪尊重毛泽东召集会议商拟的名单等。林立果把这件事同林办的秘书们说了，秘书们都很生气怂恿林立果不要管这类“闲事”，以叶群堂堂林办主任的身份在政治局选举这种大原则商居然要求助于林立果，然而，这种怪诞的“新闻”在文革中却并不罕见。林立果答应了秘书们的建议，秘书们也认为林彪可能在“一气之下”否决了叶群的政治局委员的身份。当周恩来把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的名单送到毛家湾时，按照规定，如果林彪对上述人选有不同看法时需要迅速告知周恩来。叶群叮嘱去向林彪送交周恩来提交来的名单的秘书张云生：“首长（林彪）如果圈阅，那就算了；首长如果要批什么，你要先告诉我，不能急于批。”可见，叶群当时的确担心林彪把她的名字拿下。张云生在给林彪念这份名单时也是抱着不能让叶群顺利当选的心理，特意在江青、叶群两个人的名字间重复了两次，借以引起林彪的注意，哪知道，林彪除了问一句“候选人的名字是按姓氏笔划排列的吗？”再也没有多说什么，哪怕是当张云生故意提醒说：“叶群以下，用的是四号字”时，林彪非但没有像秘书们期望的那样否决叶群，反而抬起右臂用食指在空中划了一个圆圈，表明已经圈阅。因为林彪已经圈阅同意，名单自然不用再退周恩来处，叶群等于顺利“当选”。【注10】（《毛家湾纪实》248—254页）

关于此事的描述，官伟勋和张云生略有不同，官伟勋说林立果奉叶群之命谎称林彪出汗从而完成了叶群的当选。（详见官伟勋《我所知道的叶群》220页）但是，考虑到官伟勋的身份当时不过是毛家湾借调的临时工作人员，不可能和“正牌”的林办秘书张云生同日而语，所以官伟勋的资料我们不予选取。然而，即便是这样，官伟勋也承认：“问题在于，如果林彪真的从党和国家的利益着想，知道不该让叶群进政治局。他在中央开会时，还可以坚持他的意见。在首次会议上，也有人提邓颖超进政治局，周总理不就坚决不同意，不就没有通过吗？”【注11】（《我所知道的叶群》220、221页）从这件事上我们进一步的看到，林彪不但同意叶群公开干政，而且在关键时刻不忘提携叶群，赋予叶群更大的政治活动空间。事实上，在某些问题的处理上，有些话、有些事林彪出面明显不合适，那就要请叶群出面，让叶群把林彪不便直接表达的意思清楚的予以表述。这不但借此隐去了林彪的真实意图，而且在林彪来说还有一个很大的转圜余地，由此造成的所谓的林彪“沉寂超然”于内，叶群张牙舞爪于外的假象迷惑了不少人。而这些又正是林彪、叶群夫妇所需要达到的效果。因为林彪毕竟顶着一个接班人的“桂冠”，越少的显露行迹也就越大限度的令

其他人难以揣摩。如果叶群做的过火，林彪批上两句以示一秉至公；如果叶群做的不够，林彪则加以暗示或者补充，从而让事态向着符合他们根本利益的方向滑行。林彪之取巧于此益见。而随着林彪集团的不断发展、壮大，这种夫妻政治双簧的迹象也就越来越显著，直到在关于是否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和 9.13 事件的发生，让此类痕迹明白无误的暴露出来。

尽管叶群还不能完全越过林彪发号施令，但在文革中叶群的风头之足、劲头之大、能量之广也是相当了得的。在文革时期，每当毛泽东、江青之间出现冲突时，都少不了叶群的身影。她穿梭于毛、江之间，不断的给江青找理由，叶群自己就说，毛泽东曾经讲她是“八级泥瓦匠”，能够弥和毛泽东夫妻的关系则说明叶群的政治力度不可小觑。而由于上述的因素，在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大肆攫取国家文物时，也不忘了及时的关照一下叶群。在公开场合下，叶群高呼拥护江青的口号时，江青也不忘回报叶群同样的“盛赞”。随着叶群的政治地位的不断高升，手中权力不断扩大，其人的生活糜烂程度也日益严重。以往严慰冰曾经以匿名信的形式揭露叶群的这一劣迹，事实上严慰冰所揭发的事情在文革中非但没有从叶群身上看到降温的迹象，反而愈演愈烈。叶群从最初的勾引同事和苏联顾问到直接与黄永胜发生关系，从最初的打情骂俏发展到连身边的秘书也不放过。叶群生活作风素来不够检点，她当着秘书的面换衣服、脱衣服，官伟勋曾经亲身经历叶群就在他面前让卫生兵给她做臀部肌肉注射。

【注 12】（《我所知道的叶群》55 页）黄永胜说：“叶群利用她的色相主动地挑逗人，诱人。她不仅用于周围的工作人员、秘书，也不仅是中国人，还用于外国人（主要是苏联军事顾问）；不仅是对一般工作人员，而且还有高级干部。她毫不知耻地主动玩弄男性。一般女人用色相引诱挑逗是为了金钱，有的是为了权力地位，有的是生理上的需要。而叶群是金钱、权力、生理兼而有之。”至于她和黄永胜的荒唐事我们后面还要详细提及。

毛家湾从 1969 年到 1970 年 11 月之间一直有一个“黑人”（指身分不明）存在，此人据叶群说是陪着她练习书法的，张云生说此人叫朱彦，长得仪表不俗。朱彦名义上是帮着叶群练习书法偶尔也要给叶群写诗做枪手，实际上叶群和朱彦的关系并不清楚。关于这点，张云生说：“叶群与这位朱彦是怎么关系，也令人生疑。”1970 年 5 月的一天，张云生、郭连凯两个秘书去向叶群汇报工作，发现叶群和朱彦在一起，两个秘书还没有说什么，倒是叶群沉不住气了，她大骂二人说：“你们搞什么鬼？我和朱彦是在谈学习，用不着你们来监视，我叶群是个正派人，君子坦荡荡，我没有任何辫子抓在你们手里。”这样一番突出其来、莫名其妙的表白不但令当事人的张云生、郭连凯感到滑稽，就是今天我们作为后来者重新阅读这段往事时，也会为叶群的“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说法生出些许疑问来。张云生自己亲历的叶群的“露骨”的谈话就更加清晰折射出叶群真实的侧面。我们这里不妨把这些谈话照录如下：叶群对张云生说：“我这个可怜人，谁能同情呢？”张云生：主任处于这样的高位，还不满足吗？叶群：实际上我是非常苦恼的，· · · · · ·我愿意把心里的话都掏出来，希望你理解我，同情我，你愿意听吗？张云生：主任愿意说，我就愿意听。叶群：我和首长（林彪）结婚几十年，我只能在政治上沾他一点光，但作

为夫妻，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冷冰冰的。叶群：坐的离我近一点。张云生：坐的不远。叶群：再近一点。张云生：再近，就过了屏风了。叶群：过了屏风有什么关系？张秘书，你是不是害怕？张云生：我不害怕。叶群：你既然不害怕，为什么不理解我呢？这两天我和你说了那么多，你明白我是什么意思吗？叶群：我对你的要求并不多，只是希望你对我说些安慰的语言，做些主动的表示，这还做不到吗？张云生：该做的我一定努力去做，不该做的我也不会去做。

当张云生表示不能迎合叶群时，叶群居然放声大哭，还说张云生对不起她，为什么不同情她，理解她云云。张云生因为有憾于叶群的纠缠，不得不听从于运深等人的建议，自污说和×××关系不清不楚，并且把这话告诉了叶群。虽说叶群不再找张云生的“麻烦”，可是，却突然大骂张云生：“张云生，你真好大的胆子，你也没看看毛家湾是什么地方？你竟敢调戏我？你这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联系到此前叶群和张云生的那番对话以及对张云生、郭连凯的无谓的表白，我们已经可以看出事情的全部由来了。【注 13】（《毛家湾纪实》366、368、369、408、411、415 页）不过，张云生也承认一点，那就是叶群比较江青而言还算好一些，江青身边的工作人员最后多数被整的很惨，而林办的人则多能“好聚好散”。（参见《毛家湾纪实》429 页）

就是这样一个寡廉鲜耻的女人居然从林彪的妻子一跃而为中央“首长”，身兼政治局委员、军委看守小组成员等多项要职，干预、插手了多起震惊党内的诸如罗瑞卿、贺龙、杨成武、肖华等人垮台的政治事件直至走上九·一三的逃亡之路。叶群作为一面镜子照出林彪集团的丑陋的同时也映射出整个文革运动的黑暗。

## 第二节：“超天才”林立果

在林彪集团内部还有另外一个令人瞩目的头面人物，那就是后来被捧为“全局之才”的“超天才”的林立果。在《叶群其人》中我们已经介绍过，叶群为了避免自己的名字在政治局委员名单被林彪勾决请托林立果出面，适时林立果不过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年轻人（1966 年林立果年仅 21 岁），居然就有如此“面子”，由此可见林立果在林彪家族、集团中的超乎寻常的地位和他在乃父林彪心目中的分量。叶群当年曾经亲口对朱仲丽（王稼祥夫人）说：“他爸爸最喜欢这个儿子，这个孩子对事物敏感极了，说一不二，林彪说性格像他，将来能干大事。”【注 14】（《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218 页）林彪后来对林立果的刻意培养也证实了叶群此言不虚。

1967年3月，在讨论关于部队“支左”的问题，林彪准备了三个题目准备在会上开讲。1. 形势；2. 阶级观点；3. 军队怎样支左。这本应是秘书班子的分内之事，但是，叶群建议让林立果参与此事。叫林立果帮林彪考虑一下形势，林彪欣然同意。武汉“7.20事件”发生后，7月22日，林立果以“红尖兵”的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鼓吹“揪军内一小撮”的文章。随着文革运动的不断深入，林立果也在政坛上悄然崛起。在文化大革命中，火箭式的窜升并不是什么稀罕事，但是，像林立果这种平步青云的的确罕见。例如王洪文虽然从一个造反派最后上升到中共中央副主席，可毕竟还经历了省部级这一台阶，而林立果从大学校门出来不过三、四年的光景就已经“口含天宪”代表林彪、叶群指挥中国最为先进的军、兵种了。曾经流行的顺口溜“一年兵、二年党、三年副部长、四年太上皇”形象的勾画出林立果的前进之路。而林立果能够如此顺利毫无阻碍的登堂入室实在得力于他身后的两棵大树——林彪、叶群。

1969年2月16日，林彪给空军的周宇驰、刘沛丰写去亲笔信：“这两年老虎（林彪夫妇对林立果的昵称）在你们帮助下能力已有进步，今后你们可让老虎多单独行动，以便锻炼他的独立工作能力，此致敬礼并感谢你们过去对他的帮助。”林彪这封信写的相当冠冕堂皇，但在言语中已经流露出一些蛛丝马迹。林彪此人素来不轻易发言、讲话乃至写信，不要说对像周宇驰这类的“小字辈”，就是平级的中央领导人林彪也未必写过什么亲笔信。（该信在八十年代审判林彪、江青两个犯罪集团时，法庭曾经专门将此信的原件放射投影。）而今以“副统帅”之尊居然亲劳大驾向周宇驰等人深加感谢，想来周宇驰、刘沛丰对林立果的所谓工作上的帮助绝非信中所表达的那么简单。同年10月2日，林彪在召见吴法宪时进一步把话挑明。林彪：“我请你来，是问问老虎的事，他在空军表现怎么样？群众反映怎么样？”吴法宪：“很好，很受大家拥护。”吴法宪说：“他把你的指示，运用到空军，能经常传达你的意旨、指示，对空军建设有很大意义。”林彪说：“空军是一个新军种，全世界都在发展空军。所以，我脑子里经常想研究空军的问题，特别是空军的作战训练问题。”林彪接着说：“我自己到空军部队的时间有限。因此我全靠老虎给我了解情况，汇报问题，这也是帮助你们搞好空军建设。”林彪说：我的意见嘛，为了更好的了解空军的作战情况，战术问题，可以让林立果兼任作战部副部长，这样就能向你们提出一些有益的意见。吴法宪说：“十分感谢林副主席对我们空军的关怀，对我的栽培，信任空军，把儿子、女儿都放到空军。我一定坚决执行毛主席林副主席一切指示，我完全拥护林立果兼任作战部副部长，仍兼空办副主任。林豆豆我们也准备提为空军报的副总编辑。”林彪说：“为培养她，这样也可以，边做边学嘛！”接着又说：“你要放心，我的儿子、女儿都在空军，他们都是为了扶植你这个司令员，他们不会挖你的墙脚，林豆豆在空军报社就没有写过空军的大字报。”吴法宪：“十分感谢林副主席对我们空军的关怀，对我的栽培，信任空军，把儿子、女儿都放在空军工作，林豆豆我们也准备提升为空军报的副总编辑。”林彪：“为了培养她，这样做也可以，边做边学嘛！”十五天之后，也就是10月17日，吴法宪按照林彪的授意，任命林立果为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林立果当时的年龄正常的服役期还不满，就一下子提拔到了师职干部行列，而且身处要津，这无疑开了一个建军以来未有的恶劣的先例。关于吴法宪取决于林彪的授意，

王年一在他的《大动乱的年代》的 378 页中给予明确的交待。另外，原空军作战部部长、林立果名义上的上级鲁珉在回忆中也做了必要的补充。鲁珉说：

“我专门问过王飞：林立果怎么弄？要不要单独给他搞个办公室？王飞讲，你不要搞。因为我是一个人一个办公室。我又问王飞：要不要在我的屋里给他摆个桌子？王飞讲，你不要摆，他不会来的。这样我明白了，林立果就是要这个头衔。过去他只是一个秘书，秘书算什么？在作战部当了副部长，下一步就可以当副参谋长、副司令。对不对？”【注 15】（《风云 9.13》177 页）林办秘书张云生也回忆说，叶群对他讲：“培养老虎，这本是首长的意思。但你不要给他讲老虎被提升的事，省得叫他为难。”叶群告诉张云生说林立果的提拔是林彪的意见，但同时也不要张告诉林彪，搞的张云生一头雾水。【注 16】

（《毛家湾纪实》328 页）不过，有一点肯定的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表明林彪阻挠林立果的任职，倒是有相当多的例证证实林彪在林立果升官的过程中所专门为其开设的“绿灯”。颇为滑稽的是林立果担任空军党委办公室秘书的 1967 年 3 月，他居然还不是中共党员。直到 4 个月后才由吴法宪、周宇驰介绍入党。就在担任空军司令部副主任兼作战部副部长不久的 1970 年 6 月，吴法宪和空军政委王辉球说：“林立果不简单，他到空军时间不长，有的我们过去没有想到的事，他搞出来了，是很大的贡献。”吴法宪还说：“林立果就是代表林副主席的，林立果可以指挥空军的一切，调动空军的一切。我们这些人，我这个司令，你还不知道吗？不行，要靠林立果！”吴法宪的妻子陈绥圻也吹捧林立果说：“立果同志是天才，从各方面来讲，是我们的老师，我们要好好学习他。”按照吴法宪的意见，空军政治部在贯彻“两个一切”（即林立果指挥一切、调动一切）中强调指出：“一切重大问题，例如工作计划、决定、报告、干部配备，以及重要问题的处理等，都要及时主动的向立果、立衡同志请示报告。争取他们的领导，真正做到大事不遗漏、不延误，小事不干扰。”林彪在吹捧毛泽东时曾经说过对毛泽东要做到“小事不干扰”，如今这种肉麻的词令竟然被空军上下用到了林立果的身上，岂非咄咄怪事？

实际上，吴法宪在和王辉球讲之前就已经同王飞、周宇驰说过，今后空军的要向林立果报告，林立果可以调动一切。时间是 1969 年 10 月 18 日上午。空军政委王辉球也在 1980 年 9 月证实吴法宪的确和他讲过要林立果指挥一切的话，而且吴法宪还和王辉球说：“我已向林副主席报告过，只有这样做，才对得起林副主席。”原空军司令部参谋长梁璞证明吴法宪提出的“两个一切”给空军造成很大的恶果。吴法宪这么轻易的把空军指挥、决策大权交给一个完全没有军事经验、没有军事阅历的林立果，其背景也是颇有来头的。鲁珉回忆说：“吴这个人平时容易讲过头话，说话不严密，没准头。这是他为了讨好林立果讲的。这下就被林立果、周宇驰抓住了，周宇驰就拿到空军常委办公会议上传达。周宇驰一传达，吴法宪就觉得很被动。会后，吴法宪说：哎呀，这是我在下面讲讲的嘛，没有要你们传达嘛。但周宇驰对我讲：吴司令讲了，我就给他传达。我看周宇驰够坏。”【注 17】（《风云 9.13》179 页）鲁珉的这个回忆和吴法宪在八十年代特别审判庭上的交待有些类似，吴法宪说：“我当时相信林彪，我死心塌地地跟着林彪。我当空军司令员是林彪提出来的，所以林彪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为了讨好林彪，提出让林立果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但是，没想到以后他们作了传达，越传越大。传达了以

后，我也不敢否认，怕提罪林彪，得罪叶群。”如果说林彪严于约束林立果的话，应该对吴法宪这种过分的讨好予以否定，然而，我们并没有看到林彪有过什么相反的表态。1969年国庆节过后，林彪视察张家口，此行相当秘密，除了向毛泽东汇报并且备案外，其他中央领导人都在不知情之列。然而，这样一个行动，林立衡、林立果姐弟却荣膺其中。林彪带着林立果下去的目的也很简单，就是为了历练林立果，给他创造露面的机会。林立果等人曾经搞出一项空军方面的技术革新，林彪很快将其上报毛泽东，毛泽东圈阅。张云生以旁观者的身份写道：“与其说林彪是欣赏‘技术革新’，不如说他是为了抬举参与此事的林立果。”【注18】（《毛家湾纪实》326页）林立果的所谓的“技术革新构想”在鲁珉等行家眼中其实和胡闹差不多，鲁珉说：“有一次，他要搞什么空中加油，飞机对接，我说那个美国早就有。他又想搞垂直起降，问我行不行，我说美国都没搞成，英国搞了个‘猎兔狗’，也不怎么行。可他非要搞，把沈阳飞机制造厂的设计人员都请到北京空军招待所，叶正大（叶挺之子，飞机设计专家）也参加了，叫我也去，把曹里怀（原空军副司令）也叫去了。叶正大很聪明，说，关键要把发动机搞出来。其实是托辞嘛。”鲁珉又说：“林立果总想搞出点什么，捞资本吧，他还很喜欢题目哩。说：鲁部长，关于未来战争中空军的使用问题你考虑考虑。我看那小白书上面还有我的观点。（笑）不过总的来讲我认为那东西没多大意思。”【注19】（《风云9.13》178页）就在吴法宪和王辉球交待林立果在空军中地位后的一个月即1970年7月23日，从不轻易外出的林彪破例视察国防科委所属的工厂，在欢迎仪式上，黄永胜站在林彪的右侧，林立果则站在林彪的左侧。八天之后，也就是7月31日，在周宇驰、刘沛丰等人的协助下，在林彪、叶群的授意下，林立果在空军司令部搞了一个毛泽东著作的“讲用报告”，大概是深得乃父真传的缘故，林立果在这份讲用报告中说只要一念毛泽东著作，连精神病人都会热泪盈眶、不治而愈。就这么一个全篇充满歌功颂德并不实际涵义的东西还被吴法宪的妻子陈绥圻看成当众振臂高呼向林立果学习的依据，陈绥圻的口号次数竟然高达17次之多。但是，吴法宪对这份讲用报告据说没有表态，林立果就要叶群出面去压吴法宪，叶群问吴法宪：“吴司令啊，老虎的讲用报告怎么样啊？有什么问题吗？”吴一听，马上说：“很——好——放了一颗政治卫星！”但在私下吴法宪还是不让传达，还不准印发和组织学习。鲁珉在机关里就照吴法宪说的办。鲁珉分析吴法宪的心态是这样的：“依我看吴法宪的心理状态是这样的：他怕林立果，不敢得罪他。但他又只想在背后在他们几个面前吹他。你想，如果吴法宪真的什么都听林立果的，林立果要他吹‘小白书’，何必还要找叶群去压他？林立果自己直接对他讲不就行了？林立果和叶群身份还是不一样，她是林彪的老婆，军委委员，政治局委员，林立果是什么？”【注20】（《风云9.13》178、179页）吴法宪尚且能够认识到林立果的“讲用报告”其实不过是照本宣科的教条主义，但在林彪看来，林立果的报告大有新意，林彪评价林立果的讲用报告时说：“不仅思想像我的，语言也像我的。”1970年11月，林彪亲口对林立果交待说：“要与军以上的干部见见面，不见面就没有指挥权。”可想而知，在林彪的这种高度评价、授意、授权下，吴法宪的“两个一切”和陈绥圻的不断高呼以及周宇驰等人的围追吹捧自然属于事有必至了。至于讲林立果是什么“第三代接班人”、讲用报告是“第四个里程碑”都是题中应有之义。

林彪不但在政治上提携林立果，而且在生活上也给予林立果不同寻常的关照。众所周知，文革中臭名昭著的林立果“选妃”一事曾经闹得沸沸扬扬。而且，在多数人的印象中，这件事是叶群的“专利”，林彪似乎超然于外、不闻不问。然而，事实真相并非如此。张舜甫回忆说：“给林立果选美，一开始吴法宪和王飞都不同意，说，批刘少奇时，把王光美的封、资、修，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批得一塌糊涂，你还干这！可后来吴法宪转弯子了，说，这可是对林副主席的态度问题哟，要全力以赴。”【注 21】（《风云 9.13》170 页）吴法宪为什么急转弯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林彪表态了。张云生回忆从 1969 年 6 月以后的“选妃”工作公然打着林彪的招牌，这是由于此前林彪已经就此事做了重要的“次高指示”，林彪指出：他过去在东北打仗的时候，看到锦州一带的女人长得很好看。于是，叶群也郑重的嘱咐张云生、陶干事等人：“锦州是首长（林彪）亲自点的地方，绝不能轻易放过。”文化大革命是打着“反对资产阶级法权”、批判“封资修”的旗号的，可是，这场运动的主要追随者林彪家族却把封建色彩浓厚的“选妃”搞的如此铺张、如此大张旗鼓，而且林彪还亲自作出部署，难怪张云生作为林办秘书不免感叹的说：“现在林彪本人下了命令，我还能说什么呢？副统帅都不怕搞坏了影响，我怕有何用？”林彪的亲自上阵让黄吴李邱“四大金刚”及其家族为之一震，纷纷起而响应奔走，一时“选妃”甚嚣尘上。林立果曾看中一个女演员，叶群不太同意，林立果就背着叶群直接找林彪争取支持，林彪点头了，林立果就把女演员弄到北京来，叶群得知这件事幕后支持者是林彪时，立刻去和林彪大闹，哪知道反而被林彪打了一顿，叶群不得不下跪向林彪求饶。【注 22】（《毛家湾纪实》340、341、358、359 页）由上述事实我们可以看到，吴法宪所说的选妃等于是对林彪的政治态度并不是空穴来风，吴法宪等人的“邀宠”正是在林彪点头的情况下进行的。林彪才是整个林立果“选妃”的真正的后台老板。

关于林立果“选妃”一事，早年有过很多详细的报导，包括被选者张宁等人的自我回忆都对这件事做了一定的披露，我们在这里不想继续重复这些内容，我们准备描述的是以往资料没有记载过的一些补充，从中也可以看出林立果的为人、品性乃至林彪集团的某个侧面。

根据林立果的“上海小组”成员陶某（也就是张云生笔下的“陶干事”）当时的记录本的详细记载，林立果的“选妃”的目标一度锁定上海，李作鹏开出介绍信请东海舰队副司令员予以必要的协助，他们的“选妃”指挥部设在上海市巨鹿路空四军招待所大院内一幢花园洋房中。林立果本人也经常参加“选妃”的具体行动，行动目标并不固定，而是信由轿车在路边慢行过程中的随意性“猎取”，一俟选定目标，林立果便吩咐手下人去找对方谈话、了解情况，自然都是冒充召选部队文工团团员或者医务人员。书面材料报送林立果审阅后，林立果开始正式召见“对象”谈话，谈话中间，经常有人在林立果的身边，此人的任务就是利用暗藏好的高级照相机（放在绿色军用挎包中，军用挎包经过特殊设计）给“谈话对象”暗中拍摄各种姿势的照片，作为资料储存。当这些照片被冲洗出来后，很快装订成册，而且还印有编号，林立果的“选妃小组”

抽取的对象范围很广，连徐景贤亲自主持的上海舞蹈学校《白毛女》样板戏剧组成员也在其中。林立果对“相册”中满意的对象安排单独会面、谈话，有专人、专车负责接送，林立果同该女性谈话中间，负责值班的“选妃小组”成员没有林立果的吩咐不准随意入内或者中途离开，纪律之严明俨然军内。就在陶某的记录本上，我们还可以清楚的看到一些含糊的记载，例如某月某日，副部长找×××谈话，晚十一点进夜餐，凌晨三点结束后送回等。而记录本中有几处标明林立果对“选妃小组”成员的谈话即：“昨天晚上我（林立果）犯了路线错误”，这种话出现过数次，所谓的“路线错误”其涵义不言自明。

原林彪集团骨干成员王维国被捕后曾经对林立果在上海的“选妃”做过交待，早在张宁入选毛家湾之前，就有一位叫李勤贞的青年女性落入林立果的彀中。李勤贞祖籍天津，很早随母亲在上海居住，此人是林立果偶然兜风时从车上看中的，很快就办理了所谓的“入伍”手续。（凡是林立果看中的女性都给办理入伍手续）并且更名李云，但是，这位李勤贞并不上当，林立果几次都未能得手，决定给李勤贞增加待遇，调她担任上海空军第三医院护士，按照排级发放津贴，李勤贞便从战士转为干部。李勤贞后来终于成为林立果的“上海夫人”，因为林立果并不准备和李结合，只是把她当作临时的玩物看待，所以，李勤贞愤而出走，这一来惊动了包括王维国在内的林立果的追随者，他们四处出动总算把李勤贞找到，为了防止李勤贞把林立果在上海的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讲出去，他们先把李勤贞的母亲下放苏北大丰农场看起来，然后由王维国的女儿和江腾蛟的女儿一道陪同李勤贞去广州，名义上是组成一个读书小组，住在中山医学院，实际是完全把李控制起来，同时因为林立果在广州白云机场附近有一秘密住处，李勤贞住在中山医学院可以随时等候来广州的林立果的“召唤”，“小舰队”重要成员空军的李伟信还专门跑去香港采购避孕必需品提供给林立果、李勤贞使用，直到林立果死后，李勤贞才被“解放”出来，回到上海和母亲团聚。【注 23】（《十年一梦—徐景贤文革回忆录》156—164 页、182—186 页）

林立果此人在某些事情上还很有一点小聪明、小伎俩。“杨余傅事件”发生后，林立果说了一番他自己的看法：“问题不在于有没有历史问题，而是在于想不想打倒他，罗瑞卿被搞垮了，他有历史问题吗？肖华被搞垮了，他有什么历史问题？照理讲，杨代总长是不会垮的，但这就要看说话算数的人想不想打倒他。要想打倒他，就不愁抓他的辫子，多少人垮了，不都是这样吗？”林立果的话是站在他自己的立场上看问题的，不过，或多或少道出了文革中政治斗争的某种内幕。林立果的“技术革新”受到毛泽东亲笔圈阅后，吴法宪发来“贺信”，吹捧林立果写的这份东西是空军有史以来写的最好的一份文件，吴法宪还在信中说：“感谢林副主席、叶主任和林立果对他的培养和教育”，吴法宪的过头的吹捧连林办秘书张云生也顿起反感，一个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军委办事组副组长、副总参谋长、空军司令员竟然把林立果一个年轻人说成对他的“教育和培养”，岂不是荒唐？吴法宪还专门送给林立果一块金表。在对待吴法宪的来信上，张云生建议林立果拒绝收受吴法宪的赠品，林立果却

另有一番见教：“我要叫吴司令知道我这个人是不能用金钱收买的，但我也不能给他下不来台，不能不讲礼貌。”【注 24】（《毛家湾纪实》327 页）

然而，由于林立果所处的地位和林彪、叶群对他的扶持、吴法宪对他的吹捧，让他很早就出人头地，由此养成的目空一切、狂妄无知的毛病在他的身上时有体现。鲁珉这样评价林立果：“在他眼里，中国就应该他来搞，那些老的都不行，都不在话下。后来我听林豆豆讲，林彪在他眼里也过时了，也不行，他们只不过要林彪这个牌子。那时候提起刘亚楼，我们都讲刘司令，很尊重的。他一口一个刘亚楼。哎，我想，刘亚楼跟你父亲同辈的，小毛孩子还挺狂。对吴法宪就更不用说，就叫吴胖子。据他们讲林立果在他们几个面前讲起叶群，说‘这个婊子’，你想想！另外据我所知，黄、吴、李、邱在林立果眼里，根本不在话下。其实，林立果这个人，你说他看的材料多，听到的多，恐怕是事实。林办有一个班子，里面都是秀才。林立果生在那个家庭，比当时同年龄的人视野开阔，知道的多，这都可能。但是，真要干一番事业，那差得远啦。你当个团长、师长试试？不要说中央那些老的，就空军这些老人，人家是不跟你搞，要真跟你干，你哪行！你说来说去是个毛娃娃嘛。所以后来我和几个空军的老人也议论过，周宇驰那几个人出的都是馊主意，帮的是倒忙。历史发展是延续的嘛，一代一代走嘛，掌管一个国家这样大的事，哪里可能从七八十岁的老人手里一下子落到二十几岁的毛娃娃手里？人民也通不过嘛。”【注 25】（《风云 9.13》180 页）但是，像鲁珉这样的看法在当时是根本传不到林立果的耳朵里的，更多的都是周宇驰、王飞、刘沛丰之流的“天才”的吹捧。如果说仅仅是这种逢场作戏的吹捧还不能把林立果推上以后的那种特殊地位，在吹捧的内里却是林彪集团需要新鲜血液的注入，林彪需要有一个像林立果这样的接班人出现，所以，林立果进入空军出掌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也好、组建“小舰队”也罢，都是由这一目的而来。

林立果作为林彪集团新派的首领，最为显著的标志就是组建“小舰队”。在“小舰队”之前就有一个调研小组存在，这是林立果在空军内部按照林彪的授意搞起来的，组长是林立果，成员包括周宇驰、王飞、刘沛丰、刘世英等。1970 年 5 月 2 日，林彪召见周宇驰、王飞、刘沛丰时问：“是你（周宇驰）领导林立果还是林立果领导你？”周宇驰说：“当然是立果领导我们。”调研小组宣誓向林彪、林立果父子效忠，声称林彪是一个天才，是一个历史上罕见的伟人，是一个可以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并列的革命导师和领袖。（不知为何没有提及毛泽东）还声称要和林立果永远战斗在一起，并说林立果是一个天才，还是一个全才，还说维护林立果作为核心就是更好的维护以毛泽东为首、林彪为副的领导核心。在调研小组成立不久，“上海小组”出笼了，这个小组本来是负责“选妃”工作的，后来在“选妃工作”的基础上予以扩充改编而成的，这个上海小组的《入组须知》中特别强调一点，那就是该小组的最高领导就是林副部长（林立果）。对林立果的指示必须认真领会、句句照办、字字照办。封建效忠的那一套跃然纸上。

1970年10月，林立果发出指示：“我们也是联合舰队，我们也要有江田岛精神。”调研小组改称联合舰队，林立果自称“康曼德”（意即英语司令、统帅的中文音译）。小舰队的主要成员除林立果外，还有空军党委办公室副主任周宇驰、空军党委办公室处长刘沛丰、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办公室副主任刘世英、空军司令部办公室秘书程洪珍、空军司令部副处长许秀绪、空四军政治部秘书处副处长李伟信、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办公室主任王飞、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南京军区空军政委江腾蛟等。（有关江腾蛟、王维国的事情要在后面具体提到，此不赘。）这里面除了江腾蛟、王维国、王飞级别相对较高、年龄较大外，其他人都属于年轻人，而且都是中下层干部，小舰队作为林彪集团新派势力的总和，其特点在于比较黄永胜等四大金刚更加拼死效忠林彪父子、更加盲从林彪父子特别是林立果的命令、更加具有冒险犯难、不顾生死的顽抗精神。这些人不断发出效忠林立果的信号其目的也在于有朝一日借助林立果这一悬梯攀上更高的政治台阶，所以，他们在特殊阶段所作出的表现往往比较老派人物显得尤其极端化。

“小舰队”的代表人物应属周宇驰。周宇驰是林立果顶尖的亲信，他实际上是负责着承上启下的作用的，代号“铜铃”、“金钟”。林立果多数场合下对周宇驰都以兄弟相称，偶尔也叫两声“老周”或者“周副主任”。鲁珉如此回顾周宇驰：“周宇驰原来是一航校的宣传科长。后来给刘亚楼当秘书。没多久刘亚楼就把他撵走了。刘死后他又回空军，在党办当副主任。周宇驰这个人很狂妄，尤其后来讲话口气大的很，因为他和林立果的关系最好，大家都高看他一头。江腾蛟、王飞对他毕恭毕敬的，但我对他印象不好。那时我老婆在上海，周宇驰有一次到上海，把‘左派队伍’弄在一起讲话。周说，要认识林立果是天才，要相信他，相信到林立果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你就说对，太阳是从西边出来这种程度。他又说，你们要支持林立果。支持林立果就像你们存钱一样，一本万利，零存整取。林立果的入党介绍人是吴法宪、周宇驰。周宇驰是吴法宪指定跟着林立果，帮助林立果工作的。林立果才二十几岁，空军那么大摊子，他哪懂？林立果到哪去，也不能配司机，周就自己学开车，后来又学开飞机。周宇驰这个人背后说吴胖子无能，可当吴法宪、陈绥圻的面又都是毕恭毕敬，我那时就想，这不是作假吗？我总觉得这个人献媚。到了后期，离‘九·一三’不远了，我曾对周宇驰说过：林立果有些事你要提醒他，不一定这么干嘛，不好嘛。周说，我也有我的苦处啊，（林立果）对我也不像从前了，从前什么都征求我的意见，现在他自己就这么办了。我想他们后期是不是也有些矛盾？”但也有人这么看待周宇驰：“据说刘亚楼病重时，周宇驰不但不怨恨老首长，反而常设法表示问候。”【注26】（《风云9.13》181、182、183页）尽管鲁珉在回忆中表示他反感周宇驰的为人，但鲁珉本人在给毛家湾的效忠信中却引用了周宇驰的原话，鲁珉写道：“如果没有林副统帅、叶主任、吕果（林立果在空军的化名）同志的关怀，空军就没有今天，我的一家也早已被打成‘反革命’，我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对林副主席、叶主任、吕果同志的感激心情。周宇驰同志说的好：‘我们是一个战斗集体。’我今后也战斗在这个集体里，在吕果同志领导下，为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奋战终生。”【注27】（《联合舰队的覆灭》44页）这封信是鲁珉写于1970年5月17日的，应该说在这些人眼中，周宇驰无疑就是林立果的化身，而毛家湾也把

周宇驰看作是林立果的“政治保姆”，否则林彪不会给周宇驰写去亲笔信加以感谢，也不会问询周宇驰到底谁领导谁了。（林彪后来的手令中直书“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已经把林立果、周宇驰并列）在周宇驰家中，当林立果表示张宁（被毛家湾选中的林立果的“妻子”。）不能吃冷东西，需要把西瓜用热水烫一下时，周宇驰也随之照办。西瓜用热水浇烫之后的味道可想而知，但周宇驰落实林立果的“指示”的劲头由此可见一斑。周宇驰即便是在张宁面前也不忘了夸赞林立果是天才，而每当林立果遭遇尴尬境地时，都是周宇驰出面解围，甚至包括逗张宁开心这类小事，周宇驰也一律包办代替。小舰队成员对于林立果向来都是一体凛尊、唯唯诺诺，唯独周宇驰可以和林立果公开窃窃私语，周宇驰还担负着叶群吩咐给他的照顾林立果生活起居的任务。而当9.13事件发生后，小舰队成员纷纷做鸟兽散去，只有周宇驰、于新野为林彪集团主动殉葬。所以，把周宇驰视作小舰队的“军师”或者首席骨干丝毫不为过。

林彪通过林立果控制空军并且着力培养林立果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着“妙棋”，其实这是林彪的一大失策。林立果及其小舰队的崛起表面上看起来是林彪集团外延的扩大，其实这是导致林彪等人最终走向万劫不复的一个催化剂。

### 第三节：“四大金刚”

林彪集团的支柱就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四大金刚。黄吴李邱四人早年就曾是林彪的老部下，和林彪有着较深的历史渊源，文化大革命起来后，林彪又不遗余力的对他们提拔、重用，直至把他们推到各自的政治颠峰。所以，他们出自政治目的、个人目的都对林彪感恩戴德、誓言效忠。但是，黄吴李邱等人和周宇驰、刘沛丰不同，他们身经百战、立有军功，对林彪固然迷信、崇拜，可对毛泽东也不乏敬仰、服从。因而在文革神化毛泽东已到顶峰时，如果公开站到毛泽东的对立面哪怕是以效忠林彪为前提，这也是他们不敢去做去想的，这也就是后来在关键对决时刻，林彪、叶群放弃老派转而启用新派的一个重要原因所在。

黄永胜（1910—1983），湖北咸宁人，1927年6月入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参加了湘赣边秋收起义，编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随部上井冈山。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起在中国工农红军任排长、连长、副团长、团长。1932年起，先后任红三十一师、红六十六师师长。1933年任红一师三团团长。参加过中央革命根据地反“围剿”和长征。到陕北后，先后任红四师副师长、红二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三军分区

副司令员、司令员，教导第二旅旅长。抗日战争胜利后到东北，任热河军区司令员、冀热辽军区副司令员。热辽军区司令员，冀察热辽军区副司令员，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六纵队司令员。1949年先后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五军军长，第十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曾参加辽沈、平津和解放广西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十三兵团代司令员、司令员，曾兼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第十五兵团司令员兼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后兼广州市警备司令员。1951年任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华南军区防空部队司令员和政委，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委。1952年任中南军区参谋长。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1954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任广州军区司令员，同年被授予上将军衔。1956年被选为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1968年递补为中央委员）。1961年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是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黄永胜原名黄叙全，1927年在武昌入伍时自我改名为黄永胜，有人说黄永胜的“永胜”二字是毛泽东给改的，实属不确。

黄永胜身为四大金刚之首不是偶然的，这不仅和黄永胜在文革中担任的职务的重要有关，也和黄永胜本人的历史有关。黄永胜在黄吴李邱四人中军功最为显赫，特别是红军时期、解放战争时期，黄永胜都以骁勇善战闻名。1928年初冬，红四军第二十八团第三营驻扎永新，因为天气寒冷，有的战士就说拿一点老乡家里的柴草来烤火，当时还是班长的黄永胜则说：“老乡的东西不能动。”有一个战士没有听黄永胜的，转而出外拿了老乡家里的柴禾生火，被黄永胜看到立刻予以制止，战士不服，就和黄永胜顶嘴，黄永胜劈手就给了那个战士一记耳光，打得对方哭了起来。这件事发生以后，罗荣桓知道了，就专门找了黄永胜谈话，指出他打人不对，黄永胜也随即承认了错误。这件小事尽管黄永胜打人不对，但是，也从问题的另一个侧面说明“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纪律在黄永胜心目中的份量。然而，伴随着黄永胜的不断“进步”，他身上固有的一些毛病也逐渐暴露出来。后来担任过广州军区参谋长的陶汉章作为黄永胜的战友曾经回忆说：“在教导二旅的时候，我们和日本人打了一仗，丢了一门炮。本来是他（黄永胜）给搞丢的，可他给上面汇报时却说是我丢的。那时我都过了铁路，不在那里。”解放战争时，黄永胜曾和程子华闹过一段不愉快，程子华指责黄永胜骄傲自大，而黄永胜则指责程子华“乱弹琴”。从这些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出黄永胜是一个个性比较突出的高级将领。在他的身上既有英勇作战的一面，也有透过于人的另一面。1953年5月18日，黄永胜以中南军区参谋长身份去朝鲜担任第19兵团司令员途径北京汇报工作，彭德怀直言不讳的指出黄永胜的缺点：“工作严重时你还努力，工作不严重时你就马马虎虎不当回事，有点少爷味道，不知道你改了没有？”彭德怀说黄永胜“有点少爷味道”一针见血的指出了黄永胜的“症结”。因为彭德怀直言指出了黄永胜的毛病，后来在批彭过程中，黄永胜开始报复彭德怀，并且不惜向多年的老战友邓华射去冷箭。（事详本书第二章）

在黄永胜身上十分突出的一个缺点就是生活作风的腐烂变质。他的这个缺点不但在高级将领中特别明显，就是四大金刚中像他那样行事的也是非常惹眼。

（邱会作和他有共同的“爱好”，但程度不如他）建国不久，黄永胜利用一次机会去了香港，花钱如流水，而且还嫖过妓女，据陶汉章说：“我们有一个情报组在香港，他们的人回来后向我这个参谋长汇报，我才知道黄永胜在那边去嫖过妓女，而且那个妓女还是国民党派到香港的重要人物。情报组的同志还告诉我，黄永胜还在香港存了钱，有30万港币。他是司令员，他叫情报组的人用一个假名存在银行的。至于这30万元是怎么来的，我至今也搞不清楚，有人说是战争年代他发的洋财，也有人说是后来抓了走私的东西卖了得来的。他自己曾经对我说，这钱是准备用来给中央首长买药用的。黄永胜的这些事情，当时就有人反映到了军委，我们都并不知情。后来广州搞进出口商品交易会，那个女的又来了。总参谋长罗瑞卿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是黄永胜的那个什么人来了，你要派人监视她，看她都和些什么人联系，搞些什么活动。这事情也让我很为难，黄永胜是司令员啊。对罗瑞卿的指示我也要执行，就派了一台车和一个参谋，蹲在宾馆里跟踪这个女的。但有一天还是失踪了。也就是那一天，这个女的进了我们军区大院，还到了黄永胜家里。黄永胜的老婆知道了，还和黄闹了一场。”

关于黄永胜的这个毛病，作为黄永胜的另一个同事詹才芳也有过回忆，他在晚年和女儿对话时就谈到了黄永胜私自和警卫员化装到香港吃喝玩乐长达三天的经过。【注28】（《战将的足迹—詹才芳将军的故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334页）黄永胜的毛病后来又闹到了叶群那里，黄永胜的妻子项辉芳向叶群告黄永胜的状，叶群假意说要帮助项辉芳“管教”一下黄永胜，哪知道这竟成了以后黄叶私通的缘起。关于黄永胜的这种毛病自然也逃不过林彪的眼睛，林彪左袒黄永胜，发表了一番貌似客观的讲话，实则给黄永胜的错误开脱。林彪说：“有些干部小节不那么好，生活作风、男女关系、工作态度工作方法有毛病，不太好。但他拥护毛主席，突出政治，有革命干劲。”林彪这里所说的有些干部“小节不那么好，生活作风、男女关系”实际指的就是黄永胜。虽然，林彪这个讲话对于黄永胜来说是“小骂大帮忙”，但是，也等于告诉大家黄永胜身上的这个老毛病。黄永胜身上的这个弱点因为始终没有彻底纠正，所以，一旦时机成熟了，就会进一步发酵，他和叶群的关系也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苍蝇不会盯没有缝的鸡蛋”，叶群为什么会和黄永胜发生这种事情呢？原因很多，从上面我们看到的一些资料来分析，主要就是叶群在生活上的空虚与落寞所致。目前能够告诉我们叶群和黄永胜之间这种特殊关系的史料来源主要就是林立果偷录的录音带和九·一三事件以后从叶群文件柜中发现的黄永胜写给叶群的一首爱情诗以及“小舰队”成员的供认、叶群身边工作人员的有关回忆。其中林立果的录音带还在公审黄永胜时被郑重的提出过。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吴德如此谈及录音带问题，他说：“公安部李震、于桑来了，经过公安部的技术处理，我们再听录音就很清楚了，信也经技术处理后很快就对出来了。李伟信交代：这个录音，是叶群与黄永胜通话时林立果偷录的。公安部的同志后来告诉我，林立果在录音时，对录音的速度进行了变换，是分别用几种速度录的。”【注29】（《回首文革》第四卷1232页）吴德本人是九·一三事件中的主要当事人之一，也是毛泽东在丰台车站叫来专列上的几个主要人物之一，所以，他的回忆应该是可信的，而且，这里面不光是吴德，还有公安部的头头于桑、李震，录音带是经过了公安技术检验的情况下得出的结论，同时，还有“小舰队”成员李伟信的交待。而一位当时的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徐景贤在他的回忆中也有类似的说明，徐景贤是当时负责清查王维国等人的专案审查负责人之一，他手中保留了林立果在上海期

间“选妃”的大量人证物证，而且，他本人还亲眼目睹了林立果的录音器材。徐景贤的一个熟人参加过林彪住所毛家湾全面的清查整理工作，徐景贤就是在此人的带领下亲自看到林立果的一些东西的。徐景贤说：“林立果从叶群的电话线另外接了一根窃听线，一直通到他自己的房间里。”关于林立果的这些器械，吴德在回忆中提到原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曾经专门负责查抄工作，他说：“吴忠把全部据点都查看了。林立果这些人政治上反动，生活上也十分糜烂。据点是“小舰队”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场所，也是他们吃喝玩乐的地方。据点里有一些从日本进口的录音、录像器材，当时，我们都没见过这样先进的器材。”那么，这些器械到底都是一些什么东西呢？先进在哪里呢？徐景贤作为亲眼目击者，他有一段比较详细的描写，具体如下：“在林立果的房间里，放着两只四四方方的箱子，叫做A箱和B箱。箱子的外壳钉上‘上海小组’的标志。……两只箱子中的B箱，是专门用来偷听偷录他人的电话的。像这种电话机，在海外可能早已有之，但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初的中国，确是新鲜玩意。……林立果偷偷地在叶群地保密电话机上安了一个窃听器，把线头接到自己的房间里，再接进B箱，就可以直接偷听、偷录叶群和别人的通话了。”【注30】（《十年一梦—徐景贤文革回忆录》257、258页）

我们注意到徐景贤所说的和吴德所说的关于器械的先进一处基本吻合。此外，还有张宁的一个回忆，张宁说：“林立果用窃听器录制了叶群和黄永胜用代号联系的电话录音。”【注31】（《林彪家族纪事》186页）因为张宁并不是林彪家庭的正式成员，所以，她的回忆只能作为一个补充。除了录音带以外，就是查抄叶群文件柜中发现的黄永胜本人写给叶群的一首诗，诗中写道：“缠绵五周月，亲手折几枝。虽是寒冬日，黄叶热恋时。”作为亲身参与审理林彪、江青两个犯罪集团的伍修权晚年对黄永胜、叶群的录音带事件如此回忆：“我们就抓住他的要害问题进行突破，如他同叶群打电话，有时一次就通话135分钟，我们就审问他，这么长时间，你们到底谈了些什么？他当然不敢如实讲了，开始说他是核对一个作战文件。我们拿出调查的证据，在时间上同黄永胜说的差了3天，证明他们这次密谈与那个文件无关，说的是另外的不可告人的私房话。我们还拿出一个证据，是他同叶群在另一次通话时，被林立果偷着录的音。在那次谈话中，叶群对黄永胜说：他们不管是政治生命还是个人生命，都是联系在一起的。称黄永胜“永远是元帅”，叶群自称是他下边的“通信兵”，说黄永胜“在中国革命的领域上”将要“起很大的作用”，还说林彪手下有许多人，真正最喜欢的只有你黄永胜。他们还说了许多污七八糟的话，都有录音在，充分证明了黄永胜同叶群和林彪之间，是一种极其肮脏的关系。他们这种非同寻常的特殊关系，说明黄永胜在林彪反革命集团中的位置和作用。”

【注32】（《回忆与怀念》453、454页）我们现在就把叶群和黄永胜的一段通话节录于下，这个录音带里面收集的是叶群和黄永胜最长的一次通话，一共是157分钟，时间是1970年10月7日。这个录音带也是公审黄永胜时，法庭公开出示的黄叶不正当关系的证据之一。大家可以看看再说：叶群：你想我吗？黄永胜：怎么不想呢？叶群：说真话，我可想你了。……叶群：我跟你讲，我这个生命是和你联系在一起的，不管是政治生命，还是个人生命。黄永胜：我觉得，我完全像你一样了解，请放心。叶群：101（指林彪）在家你还不知道？我就是挨着骂声过生活，我讲这些你不会觉得太庸俗了，太温情主义了吧？黄永胜：不会，你怎么还刺我的心呢？叶群：说不定将来，你能在中国革命、世界革命的领域上，起很大的作用。黄永胜：在这个方面我要向你学

习。叶群：我愿意永远做你的助手，做你的秘书，以你的意志为意志，而且我决不强加于你，我一定在你的领导下。黄永胜：我明白。叶群：我们都有孩子，我的孩子也就是你的孩子，你的孩子也就是我的孩子，要考虑，每个孩子往哪个方面培养，另外，连我的加到一起，至少有五个吧，连新朝（吴法宪之子）六个，这五六个虎大将，将来都可以，国家这么大，他们互相不会矛盾，一个人把一个关口，也是你的助手嘛，你说是不是？黄永胜：是。叶群：你永远是元帅，我永远是元帅手下的一个传令兵。· · · · ·为什么林立果要给他的亲生母亲进行电话偷录呢？林立果这么做的目的何在呢？叶群和林立果是亲生的母子关系，这一点没有疑问。但是，叶群与林立果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呢？则远不是一个母子关系的血缘就能解释得了的。关于叶群与林立果的关系，作为毛家湾的一些当事人都对此有过具体的回顾。王蓝多（叶群的内勤）：“林立果与叶群之间好像不似母子关系一样，我在林办这几年，从来就没有听过林立果叫她一声妈妈，平时称官衔，发牢骚时要么说‘他×的主任’，要么说‘叶老胖’。”张云生（林办秘书）：“林立果在背后说，他×的叶老胖太不够意思，咱们走着瞧。”张宁说（林立果的未婚妻）：“林立果说，我和立衡从不叫她妈妈。他（林立果）表情冷淡，谈及母亲会有这种毫无亲情的感觉，令我实在吃惊。”从上述这些人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林立果和叶群的关系是比较差的，更多的不是母子之间的亲情，而是政治上的相互利用、相互攻击。那么，林立果为什么要对叶群进行录音呢？换言之，他们之间产生矛盾的基础是什么呢？关于这一点，张云生认为“林立果要插手林办，要取叶群而代之。”张宁认为“林立果要进行反控制”。从林立果的后来行事来看，叶群控制不了林立果，倒是林立果经常可以摆弄叶群，所以，张云生的观点显然更贴近林立果录音的实质。在黄永胜被捕以后，项辉芳曾经向上边提出再次要和黄永胜离婚的请求。而且，项辉芳居然提出她不是黄永胜的亲属。如果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项辉芳急于和黄永胜划清界限的话，那么也比较令人纳闷，因为和黄永胜一样有前科的邱会作的老婆就没有提出与黄永胜离婚，更没有说不是黄永胜的亲属的决绝的话，而罪名不在黄永胜之下的吴法宪的妻子陈绥圻还主动向吴法宪表示要共患难的意思。特别是项辉芳提出上述要求的时间是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开庭的第二天下午。如果说在逮捕黄永胜之初，项就提出这个要求还情有可原，而这时候项辉芳提出离婚，已经显然和政治没有特别大的关联了，更多的则是他们夫妻之间的私人感情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其中黄、叶之间的苟且给项辉芳的刺激应该是最大的原因。事实上，黄、叶这件事不仅给黄永胜的家属增添了羞辱，就在黄永胜的对立面也由此给予黄永胜极大的蔑视。据说江青知道黄永胜、叶群的丑闻后多次表态说黄永胜“无耻之尤”，就在八十年代审判期间，江青还向黄永胜投以轻蔑。黄永胜口口声声说：“要在任何时候都忠于林副主席”，可在背地里却和“林副主席”的老婆蝇营狗苟，而林彪却蒙在鼓中一如既往的信任着黄永胜，林彪集团内部的荒唐暴露无遗。

黄永胜不但在生活上胡作非为，在政治上也是栽赃陷害。文革开始不久，黄永胜就在广州军区内部制造冤假错案，把相焯、文年生、陶汉章、江民风等人打成“反革命集团”。黄永胜上调中央仍旧遥控广州军区专案组，继续诬陷文年生、陶汉章、江民风、相焯等人要搞“政变”，专案组反映此案查不下去，黄

永胜却说：“可以慢慢搞嘛，王关戚都在关着嘛，将来是可以查清的。”黄永胜亲手炮制的“文、相、江、陶”一案迫害干部群众多达764人。林彪提出广东地下党“组织问题很多，究竟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弄不清楚”，黄永胜秉承林彪的意图在广州大查“叛徒”此次牵连迫害的人数竟达7000多人。黄永胜还颇会“相面”，原广州军区参谋长陶汉章的次子陶瑞生活无着以拉板车为生，恰好给黄永胜碰见，黄永胜马上交待手下说：“陶汉章的二儿子那是敢玩命的，说不定会行刺，要把他抓起来。”黄永胜的一句话让陶瑞就此身陷囹圄。黄永胜还诬陷聂荣臻、陈毅、朱德等中央领导人，其中说到朱德，他还说“要剥掉他们的画皮”，还说叶剑英和杨成武、肖华“开黑会”等。

在林彪的羽翼下，黄永胜的地位扶摇直上。林彪提出要黄永胜担任总政治部主任没有获得毛泽东的允准，“杨余傅事件”后，林彪再度提名黄永胜直接担任总参谋长。1968年3月，毛泽东提出军委办事组取代军委常委，军委办事组由林彪直管。黄永胜担任军委办事组组长，中共九大前夕，黄永胜还和周恩来、康生一道成为中央酝酿政治局候选人的小组成员。在九大之后的政治局成员投票过程中，黄永胜得票仅次于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陈伯达，在提名政治局常委的人选投票中，黄永胜得票仅次于江青。如果不是江青的干预，黄永胜极有可能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吴法宪（1915—2004），江西永丰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红十二军第一〇五团政治处青年干事，红二十二军第六十四师政治部青年科科长，红一军团第二师六团政治处青年干事。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长征中任红一军团第一师二团总支书记。到达陕北后任红一军团第二师二团政委。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政治处副主任。后任第六八五团政委。1938年10月奉命由山西挺进山东。同年底到达湖西地区，任苏鲁豫支队政治部主任，后任支队政委。1940年5月奉命率部南援华中，任八路军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1941年任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赴东北。1946年任辽西军区副政委，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政委。1949年任第四野战军三十九军政委，第十四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十三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0年任空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1955年曾被授予中将军衔。1957年任空军政委。1965年任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在担任苏鲁豫支队政委期间发生了著名的“湖西肃托”，吴法宪救援不力、畏缩不前受到罗荣桓的斥责和降级处分。但是，这件事并没有影响吴法宪此后的升迁，四大金刚中吴法宪的“官运”无疑是相当不错的，在黄永胜来京之前，吴法宪地位一直在李作鹏、邱会作之上，肖华倒台后成立的军委看守小组，吴法宪出任组长。（此为军委办事组的前身）即令是后来黄永胜成为林彪头号亲信大将，吴法宪的地位仍旧未能动摇，毛家湾把林立果、林立衡都交给吴法宪的空军足以表明对吴法宪的看重。在政坛上，通常有两种类型的做法回避来自对立面的锋芒，一谓藏拙；一谓露怯。吴法宪属于后者，吴法宪不惮于让人知道他无能的一面，一直流传的“草包司令”的外号

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吴法宪自己所需要看到的，正因为无能、正因为草包，所以，在诡谲的风云变幻之际，各方势力都不再把他看作靶子。而又因为无能、又因为草包，就成了毛家湾特别需要的材料。有一个有关吴法宪的轶闻颇能说明问题：在一次接待外宾前夕，吴法宪穿一身西装到场。他本来不高的个头，加上身体肥胖，西装穿在他很不合体。被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看见了。刘亚楼便笑骂道：“瞧你那副熊样。”刘说这话时，旁边有许多人，许多是高级将军、党政要员。一般人都可能在那种场合下不了台，何况吴法宪还是个空军政委呢？吴法宪只是迎合的笑了笑。据原中央办公厅负责人之一的杨德中回忆说：“1971年9月13日凌晨，在林彪乘坐的飞机起飞后，我被总理找到大会堂，让我带王福中同志一道去西郊机场……实际上是去监视吴法宪的，怀疑他弄个飞机跑掉。吴也知道我们的来意。因此，吴接电话、打电话都经我同意，声音很大，答话时我都能听得见。”吴法宪在交代中也说，他见到杨德中和王福中便知道了他们的来意。说：“我知道这个事情的处理结果。处理得好与不好都将和我的将来联系到一起。只要是来电话，我就先问杨德中讲不讲？若讲，我就大声喊，请杨德中听见我的话；除外就是重复，对方讲什么，也让杨听到；再就是重复了让秘书记，使将来有据可查。”诚如肖思科所说的那样：“吴法宪并不草包，相比之下，他满肚肥肠的弯儿比一般人要多。对于他来讲，只要有利于自己的功名利禄，自己可以含垢忍辱，可以忍气吞声，可以毫不在乎，可以装聋卖傻。由是，许多人把眼光留在了他嘻嘻哈哈、点头哈腰这一面。”被捕之后的吴法宪见到凡是预审人员、看押人员不论官大官小、年轻年老一律称之为首长，其恭敬程度为四大金刚中所仅见。鲁珉认为：“我又想起吴法宪。我总觉得这个人是有深浅的。……吴法宪这个人，后来完全弄成小丑了。尤其在法庭上的表演，谁看了都笑话他。其实他这个人原本给我的印象还不是这个样子。比如，你说他对林立果好，可他对别的人也好。叶帅倒霉时，儿子的胳膊被打断，吴把他弄到上海空军医院治疗。陈老总半打倒了，他的女儿也是吴弄到空军当兵的。还有张文秋一家。江青公开讲张文秋是叛徒，话讲得很难听。那时邵华和她妹妹要当兵，刘松林找到我，我给她们出主意，要她给吴法宪写个信。不久来了个穿陆军军装的人到张文秋家里，给她们填表当了兵。把张文秋弄到301全面体检。”【注33】（《风云9.13》178、179页）由此可见，吴法宪的所谓的“草包”、“无能”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政治谋生手段、一种取悦上级保存自己的政治策略。如果他真的无能、草包，也就不会在1950年便开始在空军领导岗位上行走，也就不会在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也就不会在1957年林彪尚未崛起前便担任空军政治委员。

在林彪集团中，给毛家湾办事最多、受责最重的就属吴法宪。在整罗瑞卿时，是吴法宪去刘亚楼妻子那里采用特殊手段套取所谓的“证词”，在诬陷贺龙时，又是吴法宪率先发难发出诬告信。武汉“7.20事件”后，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入京挨批，吴法宪竟然摆了一套“全武行”，他奉林彪、叶群的指令先是质问徐向前是否同这次事件有关，继而对陈再道当场打了一记耳光，随后还招呼刘丰等人对陈再道拳打脚踢直到周恩来出面制止，吴法宪的表演不但获得了毛家湾的称赞，还意外的得到了江青的嘉许，说吴法宪是造反派精神。“杨余傅事件”中，在叶群的逼迫下，吴法宪揭开了杨成武、余立金蒙难的序幕。

林立果、林立衡进入空军，又是吴法宪传达命令布置“两个一切”，林立果选妃，吴法宪跑前跑后，以后在设立国家主席、天才之争等一系列问题上，吴法宪再次充当了毛家湾的急先锋。从1971年被隔离审查到八十年代初被审判，吴法宪先后写了数十万字的交代材料，创造四大金刚交待问题之最，但是，这些材料中水分又最多，这点连吴法宪自己也不讳言。所以说，吴法宪的“幽默色彩”在四大金刚中也是相当独特的。

李作鹏，我们前面已经提及他在海军中的兴风作浪，进入文革后，李作鹏继续利用他自己和林彪的关系在海军内部以打击肖劲光、苏振华为己任，特别是利用“三·三会议”大做文章。李作鹏等人逼迫肖劲光承认自己是“罗瑞卿分子”，肖劲光一再作出检讨仍旧未能获准过关。李作鹏在给军委的报告中诬称海军一直存在着两种建军思想、两条建军路线的斗争。随意就把工作上的分歧上升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李作鹏其实何尝不知这些罪名都是莫须有，但是，他所肩负的任务就是代表林彪统管海军，所以，凡是不能站过来的就必须打下去。在李作鹏、张秀川、王宏坤等人打击下，肖劲光的地位岌岌可危。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对李作鹏、王宏坤说：“肖劲光是老同志、苏振华是好同志，你们整肖劲光、苏振华干什么？”毛泽东还特意和肖劲光合影，以后有人在毛泽东面前提及撤换海军司令员时，毛泽东还说过：“讨嫌，海军司令还是肖劲光来做，肖劲光是终身海军司令！”在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下，肖劲光的境遇略有好转。但是，好景不长，文革中的“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的习性也转移到了海军，海军党委常委中对张秀川的意见最大，搞的张秀川灰头土脸。情急之下，张秀川想到了林彪。林彪借视察海军的机会公开支持张秀川，下车伊始就把肖劲光等人撇在一边。李作鹏同张秀川的情况差不多，日子也不是那么好过，还有人公开贴大字报说要抓大鱼，李作鹏有点慌了，他给代总长杨成武写信，说海军内部有人要整他，还提出三个方案，包括公开林彪在1966年8月13日对他的评价、海军3.3会议的决议表态和大辩论。毛泽东、周恩来倾向于公开林彪在1966年8月的对李作鹏的评价。这种工作，李作鹏自己出面当然不合适，于是就请肖劲光出来讲话，李作鹏拟好的发言稿，全都是给他评功摆好的东西。由于公布了林彪的“次高指示”，李作鹏再度“还阳”，很快就动手整人，苏振华、杜义德等人首当其冲，遭到隔离审查。李作鹏出任海军党委第二书记，并被明确主持海军日常工作，肖劲光名义还是司令员兼党委第一书记，但已经开始靠边站了。

海军“新党委”成立大会期间，李作鹏怂恿、听任造反派揪斗海军党委常委，当有人把批斗矛头对准肖劲光时，李作鹏也视而不见，全然没有了当初请肖劲光出面给他讲话的热情。肖劲光勃然大怒，事后追问李作鹏为什么这样搞？李作鹏推说不知道，肖劲光：“你不搞，哪个人敢搞啊？”李作鹏这才说：“不搞了，下次不搞了。”徐向前也听说了这件事就给李作鹏直接打来电话，李作鹏表示肖劲光很安全，家也没有抄。尽管李作鹏对肖劲光没有采取硬性措施，但是，其他党委成员则未必如此幸运，海军第三届党委成员37人，被整的多达23人，李作鹏还规定设立专案组可以不必通过海军党委。李作鹏投靠林彪

暂时换来了很大的好处，他在文革中荣任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到达他个人政治生涯的顶峰。处在顶峰的李作鹏手中很有实权，1968年上海发生第二次“炮打张春桥”事件，李作鹏一纸命令就把张春桥从“火山口”上给救了下来。李作鹏指示道：“炮打中央文革副组长张春桥同志的事情，我们军队不要介入；大字报要覆盖；不要反击。”以往一些有关这次炮打事件都记载吴法宪营救的张春桥，根据当事人徐景贤的回忆，应该是李作鹏亲自出面搞的。中共“九大”开过之后，朱德回家问康克清，认识不认识李作鹏？康克清说，认识，就是你以前的警卫员嘛，还问朱德怎么了，朱德说：“左的不可收拾了。”“左的不可收拾”的李作鹏比较四大金刚其他三人之于毛家湾更具有一种“顽性”，毛泽东南巡讲话时语涉林彪，李作鹏从武汉军区刘丰处了解后密告黄永胜等人，在林彪、叶群、林立果等人叛逃时，李作鹏又擅自篡改周恩来留下的命令，放飞256号专机。这种“效忠到底”的“精神”的确罕见。难怪林彪生前说：“我活着不准反对李作鹏，我死了也不准反对李作鹏。”

邱会作（1914—2002）江西兴国。1929年12月参加兴国县地方武装，不久编入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九师二十五团，任通信员、宣传员。193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2年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1931年7月任红五军团宣传队长。1934年9月起在军委总供给部任统计员、政治指导员、总支书记。1934年，参加了红一方面军长征。1935年任军委四局三科科长。1936年7月任红军总供给部粮秣处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军委供给部副部长。1940年任豫皖苏边区财政委员会主任兼新四军四师供给部政委。1941年任新四军四师政治部组织部长。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解放战争时期任热辽军区政治部主任，第二十二分区地委书记兼赤峰军分区政委，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后为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五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政委。参加了辽沈、平津、衡宝等著名战役。1951年后任第十五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华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南军区政治部第二副主任。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59年10月任总后勤部部长。1968年7月任副总参谋长兼总后勤部部长。据说在红军时期，周恩来曾经救过邱会作一命。邱会作本人一度受伤，组织上要他就地安排，以后自谋出路。但是邱会作不愿意掉队，用10块大洋雇了一个老乡背着他追赶队伍，说明战争年代的邱会作还是十分爱惜羽毛的。然而，等他在和平年代接掌总后勤部大权后，他身上固有的毛病开始显露，特别是生活作风上的腐化是比较惊人。早在文革前，罗瑞卿等人就对邱会作的这个毛病提出了批评，可邱会作根本不在意，文革一起来，第二军医大学的红纵造反派把邱会作抓了去批斗，邱会作的老婆胡敏向叶群求救，虽说叶群自己也是同类“产品”，但对邱会作的出格行为仍旧不齿：“活该，邱会作的小姘头一大串，现在大家都起来揭他，叫我们怎么办？”胡敏没法，只好再度呼救，言语之恳切、生动无法尽述。到底是林彪比较叶群高明一筹，看出营救邱会作的政治意义，林彪很快写出手令，要求立刻放出邱会作。叶群不放心，还专门邀请了陈伯达一道签字，拿着副统帅、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共同签字的条子，叶群出马去救邱会作，林彪的命令在当时是很有威力的，红纵的人很快放了邱会作，邱会作一到住地就给叶群跪了下来。【注34】（《毛家湾纪实》69—75页）

邱会作把这次被营救称为“零点得救”，他在日记中写道：“25日零点40分，是我新生的时刻”，“是我妻儿子女一辈子不能忘记的时刻”、“林总挺身而出派夫人接一个人，据我所知全军还是头一份，想到这里，不能不使我感动得掉下了热泪”。邱会作所说的“全军头一份”应该也是林彪出面抢救干部的唯一一份，在整个文革运动中，周恩来多次抢救干部于既倒，而相比之下，林彪除了这次批准救助邱会作之外，再无类似的表示。两种截然不同的处事状态也反映出林彪和文革的真实关系已经到了一种难舍难分的境地。

邱会作在被批斗期间受了一些苦头，肋骨也被打断了一根，这些成为日后邱会作报复总后领导的一个重要起点。邱会作重掌总后大权，开始进行疯狂的报复，1968年2月27日，邱会作亲笔批文规定总后办案的“三狠”方针：“我们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他、消灭他，这是搞专案工作必须站稳的立场……光说理是不够的，必须向敌人专政。对那些拒不交代的人就没办法吗？应当是有办法的。……应当狠斗（坚决打击他的反革命态度），狠审（可连续多少天进行审讯），狠专（敌人拒不交代就整他）。在邱会作“三狠”方针下，据后来统计，仅对关押者使用摧残人身的刑罚就达五十多种。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23种刑罚列举如下：1、车轮战：日夜连续审讯。讯审人员换班休息，吃饭，而梁冰则长时间地站立受审，第一次三天三夜，第二次十天十夜，第三次七天七夜，第四次十七天十七夜；2、低头弯腰、罚站。瞌睡得碰墙壁；3、下颏顶茶杯：把两个茶杯摞在一起，下边放在梁的衣扣上，上边顶着下颏，使他不能动；4、坐高低凳：叫他坐在一个矮木凳上，两脚放在桌上，两小时不能动，只能用手扶桌子凳子；5、作“体操”：身体靠墙，两手揪耳朵，上上下下，一站一蹲；6、“打反骨”：用棒子打后颈骨，造成很长的时间抬不起头来；7、打嘴巴；8、刮伤：在打得遍体鳞伤的时候，再用木棍拨弄伤痛的地方，增加痛苦，十分残忍；9、“吃元宵”，集体拳打：审查人员站在四周，被审人员站在中间挨打，周围你一拳，我一拳，捅来捅去；10、用劈柴、扫把打：打双肩、脖颈、屁股、踝骨，致使皮肤红肿、溢血、溃烂，现还有紫色伤疤；11、脖子上挂椅子、凳子并加砖头：将椅子倒立后从背后挂在脖子上或挂铁凳子，在椅子底部加上砖，或脖子上套铁丝，两边各挂三块砖，也有时双手各拿一块；12、“捏羊蹄”：将手指屈曲后用大拇指猛压指甲处，痛得在地上打滚，不让喊出不还用擦桌布堵住嘴。捏后手指溢血、青肿，致使被捏的手指变形；13、让被审人员站在砖上，将手腕、大小指用纱布捆起来，吊在地下室天棚上，然后将砖去掉，脚离地面。曾掉下过多次；14、双手举铁凳：双手将二十多斤重的铁凳举起，因支持不了，只好慢慢套在脖子上；15、烟头烧踝骨。16、逼着吃带粪便的馒头，造成中毒性的痢疾；17、拧大腿肉：看守者（注：利用犯人看守）用指甲掐他大腿内侧。迄今还有四五块较明显的青色伤痕；18、逼自己打自己：看守打人是经常的，有时不愿打了，就逼着他自己打自己的嘴巴；19、强制在身上练针灸：看守为学针灸，以治病为名，曾在他身上多次练针，想扎哪就扎哪，乱扎一阵，还不准反抗；20、头顶大碗：为折磨人，曾几次用大碗装满凉水，顶在头上，每次半小时左右，还不能用手扶；21、限制喝水，逼喝脏水：天热口渴，多次要求喝水不给，逼着喝洗脸水；22、烟头烫嘴：不交代问题，审查人员就用烟头烫嘴；23、捆在椅子上：为了不让走动，就用绳子将两手捆在椅子上。从1967年至1971年，邱会作在

总后私设监狱，刑讯逼供，直接迫害干部群众四百六十二人，致使汤平、周长庚、顾子庄、张树森、申茂臣、张凌斗、华迪平八人被迫害致死。【注 35】（《知情者说之三—历史关键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133 页）当八十年代初审判邱会作时，受害者汤平的妻子出现在法庭如实的控诉邱会作的种种暴行时，邱会作再次下跪，这次下跪不是感激涕零，而是无地自容。

邱会作在四大金刚中排名最后，他既没有像黄永胜那样和林彪集团第二号人物叶群打得火热，也没有像吴法宪那样“勤勤恳恳”的给毛家湾“培养”子女。所以，邱会作就要付出比较他们三人更多的努力才能赢得毛家湾的信赖。在对罗瑞卿、贺龙、肖华、杨成武等人的斗争中，邱会作表现不俗，也所以，在军委看守小组成立时，四人成员叶群、吴法宪、张秀川之外还有邱会作。邱会作不仅自己积极投靠毛家湾，妻子胡敏也是紧跟其后，林彪有注射吗啡的习惯，胡敏就给亲自安排配制相关药物，还亲自把关。林立果选妃阶段，胡敏上窜下跳、忙里忙外。不过，邱会作在被捕以后特别是开庭审判时，认罪态度比较好，是四大金刚中判刑最轻的一个。

除了四大金刚以外，毛家湾还拥有两位候补金刚，他们分别是江腾蛟、王维国。江腾蛟，湖北红安人，“红小鬼”出身，1955 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任空军政委、南京军区空军政委。1964 年，叶群在江苏搞“四清”时结识江腾蛟，江就此投靠毛家湾。此后深得毛家湾的信任，叶群一度把林立果、林立衡交给江腾蛟照看。关于江腾蛟其人，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说过：“江腾蛟好色，但并未因此受到惩处，·····（江腾蛟）好象专门是为迎合上司的这些毛病而生存的。”罗点点的话没错，对江腾蛟的印象最初之坏并非一两个人，包括林彪也是这么看的。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在他给林彪讲文件时提及江腾蛟的错误即恶劣的品质和生活作风，林彪脱口而出“坏蛋”。然而，这位被“林副统帅”定性为“坏蛋”的人并没有因此给毛家湾抛弃，不但叶群和江腾蛟来往密切，林彪也亲自接见过江腾蛟，至于林立果更把江腾蛟视作心腹大将。1967 年江腾蛟升任南京军区空军政治委员，次年就被免职，毛泽东认为江腾蛟不可重用。但在毛家湾看来，这也不影响他们对江腾蛟的印象，他在毛家湾的暗中扶持下出任空军政治部党委书记，毛泽东得知后通过空政文工团团团员刘淑媛转达给吴法宪他的意见，即江腾蛟此人不可重用。林彪说过，“毛主席的话一句顶的上一万句”，既然毛泽东做了多次关于江腾蛟不能重用的指示，按正常理林彪等人就应该远离江腾蛟，可是就在 1969 年 6 月 19 日，林彪接见江腾蛟时却说：“不要看这个委员、那个委员，那是现象，将来还会有变化的。”此前，叶群亲自交待吴法宪要把江腾蛟欠的钱还清，叶群自己还表示要掏腰包给江腾蛟还清旧账。林立果委托周宇驰告诉江腾蛟说：“再苦也要把你养起来。”林彪接见江腾蛟后，上面给江腾蛟安排了去西南地区主管航空工业的工作，江腾蛟不愿意去，就打电话给林立果，林立果要他给吴法宪写信，并把此信报经林彪批准，在林立果的安排下，江腾蛟一家不去西南反去广州疗养。对于林彪家族给予的政治温暖，江腾蛟感激莫名，多次写去效忠信，多达 20 多封，内中一封说到：“不管什么时候，需要我做什么，下命令吧，我江腾

蛟绝不会说出一个难字。”1968年7月2日，江腾蛟写给林立果的信里面说：“我对首长（林彪）、对主任（叶群）是忠实的，对你也是忠实的，过去现在将来也永远是忠实的。”还连续使用了三遍的“想念”一词表达他对林立果的“感情”。江腾蛟本人是告密起家，在新四军时期就以告发高敬亭“有功”得到嘉奖，因此深知靠山的重要性，周宇驰明确的告诉过江腾蛟“其他都是虚线，只有这一条（毛家湾）才是实线。”在江腾蛟看来只有紧跟林彪父子才能有出头之日，因此他不遗余力的照办林彪、叶群、林立果发来的一切指示。和四大金刚略有不同的是，江腾蛟主要是服从林立果、吹捧林立果，成为林彪集团新派人物的中坚。江腾蛟对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说：“我们都是坐在一条船上，掌舵的是林立果，什么风浪都不怕。”在林立果“选妃”事情一出来，江腾蛟更是赤膊上阵。以后喧嚣一时的“三国四方会议”据说也是江腾蛟给起的名字，在林立果的小舰队中，江腾蛟是“拉总”一流的角色，负责联络周建平、陈励耘、王维国。1970年6月30日，周宇驰、林立果、江腾蛟、王维国四人同游八达岭，江腾蛟、王维国搀扶着比他们自己小二十多岁的林立果爬上了长城，周宇驰说：“战友（林立果）开的车不但技术上是保险的，在政治上也绝对保险，我们坐的是一列永不翻不了的政治列车。”王维国立刻附和说：“这是一列光明的车，胜利的车。”江腾蛟把这次活动命名为“车上四结义”，林立果还专门搞了一个录像保存，后来成为审判江腾蛟等人的证据。

王维国，河北省元氏县人，1938年3月参加八路军，建国后曾经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文革前就任空军第四军（空四军）政委。王维国和毛家湾的结识也是在叶群太仓蹲点时发生的，那时王维国知道叶群来头不小，所以对叶群的生活照顾的非常仔细，叶群“四清”嘴巴上喊着要和群众打成一片，内里却有些吃不消乡下的清苦，王维国就在饮食上给叶群提供了不少的方便，既掩人耳目又口惠实至，让叶群深感王维国的“乖巧”，林立果参军后又得到王维国的照顾，林立果多次说：“王政委是好领导、好班长、难得的人才。”此后王维国兼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公检法军管会主任，中共九大上又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林立果亲口许诺王维国将来可以出任南京军区空军的负责人。王维国也不失时机的写去大量的效忠信，在林立果的小舰队里，王维国是仅次于江腾蛟的重要人物，林立果甚至还把王维国看作是难得一用的“杀手锏”，林立果公开吹捧王维国“很年轻、很优秀、很聪明”，周宇驰也说：“王政委的意见有时不是他个人的意见，大家一定要信任他，就是王政委说太阳从西边起来，也要相信！”林立果还把《571工程纪要》中组建教导队的任务交给王维国，教导队一共有100多人，不要干部子弟、不要学毛著分子，只要对林彪父子忠诚的分子。王维国按照林立果的指令在新华一村大院内设立秘密据点，还准备搞一个直升飞机机场，给林立果使用。王维国还奉命制造一种轻型的6.72毫米口径的冲锋枪，这种枪适用于短距离的杀伤。林彪等人叛逃后，王维国继续给林立果销毁证据，掩埋材料。

#### 第四节：陈伯达入伙

陈伯达(1904—1989)福建惠安人。早年曾就读于上海劳动大学。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科工作。后去苏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9年回国。1930年任中共福建省委宣传部秘书，并在福建军阀张贞部当少校秘书。1935年参加编辑《华北烽火》。1937年任中共北平市委委员。同年去延安，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党校中国问题研究室主任、马列学院编辑部主任、毛泽东的政治秘书等职。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新中国成立后，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马列学院副院长，第三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顾问，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副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国家计委副主任。1956年在中共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6年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1969年，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是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文化大革命”期间，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文化大革命前曾经自己提出要给刘少奇做秘书，消息传到江青的耳朵里，江青就指责陈伯达不愿意给毛泽东做秘书反倒准备给刘少奇“伴驾”。周恩来依照毛泽东的指示要陈伯达出任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几次推让，周恩来说：“这样中央就不能分配你的工作了？”陈伯达这才接受。等到毛泽东回到北京，陈伯达再次提出不宜担任中央文革组长，还说他自己是“书生”，毛泽东听后说，你可以把书生两个字去掉。中央文革成立后有明文规定，在陈伯达不能视事时即有江青代理组长，陈伯达自己说过：“江青是文革小组的第一首长”江青和陈伯达之间素来不睦，虽有互相利用的时候，但争吵也很多，特别是江青的盛气凌人让陈伯达有苦说不出。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江青不到场，陈伯达是不敢宣布开会的，江青一到就滔滔不绝的讲个不停，也不容陈伯达开口，陈伯达在小组开会期间最大的言行就是宣布开会、宣布散会，中央文革成员中王力对陈伯达还算尊重一些，其他诸如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都是唯江青马首是瞻，根本不把陈伯达放在眼里，顾问康生更是瞧不起陈伯达，还给陈伯达起了一个外号。在这种情况下，陈伯达自命是“刘盆子”，除了参加周恩来主持的会议外，中央文革的会已经很少参加，哪知道江青因此也不大满意，对陈伯达说：“你放着小组的会不参加，乱搞什么？”1968年，江青因为李希凡的事情和陈伯达大发光火，硬说是陈伯达准备逼死李希凡，陈伯达予以辩解，江青不听，把一个茶杯当场摔得粉碎，陈伯达无奈只好捡起茶杯的碎片。江青还不罢休，又在会上声称陈伯达和她的冲突是原则性冲突，还威胁陈伯达说，她要和她女儿李讷回到中南海给毛泽东当秘书，钓鱼台的工作不干了。张春桥也讥讽陈伯达，江青对陈伯达说：“我看不起你！”陈伯达忍不住还了一句：“我也瞧不起你！”结果又形成了一次大闹。后来陈伯达不无悻悻的和别人说：“如果不是毛主席的关系，谁理她呀。”陈伯达尽管口头上这么说，实际上还要继续买江青的帐，他为了讨好江青还专门向叶群表示江青需要一个在部队讲话的身份，林彪就此任命江青为部队的文艺工作顾问，可江青丝毫不领情，看到陈伯达穿上军装就问陈伯达：“你有什么资格穿军装？你知道红五星代表什么吗？”陈伯达去见毛泽东汇报工作，出来后见到江青，江青盘问他去毛泽东处说了些什么，陈伯达如实向江青汇报，江青还说：“主席身体健康比什么都重

要，你以后少去打扰主席。”搞的陈伯达以后去见毛泽东次数越来越少。江青不但公开羞辱陈伯达，还在毛泽东面前告陈伯达的状，江青后来说：“主席说了，给陈伯达很多工作位子，他都没有拿住。”江青所说的是否为毛泽东亲口所讲，当时已经无人敢去考证。

江青如此轻蔑的对待陈伯达，毛家湾却与之大相径庭。叶群、林彪等先后都对陈伯达摇过橄榄枝。林彪说过：“陈伯达一个书生把握那么大一个局面不容易。”叶群更是利用福建同乡、延安师生（延安时期，陈伯达做过叶群的老师）的关系向陈伯达靠拢。其实，毛家湾和陈伯达之间原本就不缺乏建立政治感情的基础。文革初期，红卫兵造反派要揪斗国防科委的一个局长，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向毛家湾告急，叶群就把球踢给陈伯达，陈伯达看在叶群的面子上写了条子关照了一下造反派不要过于极端。以后邱会作遇险，叶群找到陈伯达联合签名，陈伯达也不拒绝。这样一来二去，陈伯达和毛家湾的关系逐渐走向亲近。陈伯达的妻子刘淑晏同陈伯达的关系比较紧张，叶群对此大发议论，叶群说：“老夫子（陈伯达）是多好的人哪，可是刘淑晏还不满足，她总是和老夫子吵闹，弄的老夫子非常苦恼。我真同情老夫子。”为了“安慰”陈伯达，叶群还在陈伯达没有起床时就直接进入陈伯达的卧室，就在陈伯达的床边和陈伯达闲聊，叶群还把这件事和秘书们讲了一番，言语之中还有一丝得意。因为陈伯达的家事，叶群还叫来了装甲兵政委黄志勇，最后把刘淑晏转移了事，林办的秘书们认为陈伯达家事闹得如此不堪，和叶群的插手也有一定的关系，叶群却不以为意：“我和老夫子之间的来往，都是为了正事，老夫子是文革组长，我是首长办公室主任，没有这一层，我老找他干什么？”原中央警卫局的邬吉成回忆刘淑晏的被调离陈伯达身边则说他在1968年11月、12月间让周恩来叫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亲口布置他把刘淑晏从陈伯达身边劝走，而且也是邬吉成本人和陈伯达的秘书一起把刘淑晏送上了飞机。【注36】（《知情者说第三辑之七》88、89页）

1968年初，陈伯达因为晋东南武斗严重建议派出一个师制止。毛泽东圈阅后交给林彪，叶群又把这份记录交给周恩来，周恩来阅后退给叶群。还有一个陈伯达写就的关于电子问题的文件，毛泽东批示交周恩来办，林彪又把这份文件批给主管国防工业的粟裕，而后转给周恩来。就因为周恩来在看后没有签字便退还叶群处，陈伯达就认为周恩来对自己不尊重，还把这件事说给了江青，实际上周恩来一般情况下因为毛泽东批示在先，往往阅后不签字表示对毛泽东的尊重，陈伯达不明就里胡乱发难，叶群也跟着起哄，江青还因此很对周恩来发了一番“议论”。陈伯达闲来无事也经常给毛家湾打来电话，和叶群一聊就是很长时间，包括他自己因为受江青的“气”而落泪的事也不例外，叶群一边开导陈伯达，一边给陈伯达打气，甚至陈伯达想吃螃蟹的事在叶群知道后就马上要吴法宪调用空军的飞机去办，林办秘书不理解，叶群说：“螃蟹里面有政治，老夫子不轻易开口，这只是吃螃蟹吗？”

河北地区武斗严重，两大派各持一词、互不相让。其中河北省军区支持“红楼派”，38军支持“工总派”，陈伯达因为支持河北省军区无疑就是这个派所倚重的后台。可38军又是林彪带过的部队，毛家湾一时处于两难。稍后，陈伯达不知从哪里听来的消息说是林彪表态支持38军，还派了秘书到38军工作，陈伯达就拿这个事情质问叶群，搞得叶群也很莫名其妙，仔细一问才知道所谓的林彪的秘书周××原来曾经在林办工作过，此人1964年离开林办，去了总政，总政垮了他就去了38军。叶群说：“不能因为一个秘书叫老夫子为难，也不能为了一个军，丢了一个常委。”结果，周××稀里糊涂的被调离38军。叶群的这种矫枉过正的做法让陈伯达铭记肺腑。【注37】（《毛家湾纪实》169、170、177—184页）事实上，陈伯达向毛家湾靠拢，中央警卫局的一些工作人员也有所察觉，只不过没有往这方面想而已。据原中央警卫局邬吉成回忆，陈伯达不喜欢随从警卫（由中央警卫局派出负责中央常委的警卫工作）开车跟在他的后面，而且一再就此问题发脾气，陈伯达还因此找到汪东兴说，这样派车跟着他，对他的精神压力大。【注38】（《知情者说第三辑之七》87页）

陈伯达入伙毛家湾，后来叶群等人鼓吹“相将奋起卫红旗”中的“相”指的就是陈伯达，说明陈在林彪集团虽说不能同四大金刚并列，但也有了一定的位置，大抵居于“客卿”一类的角色。陈伯达自己曾经总结过，搞政治无非就是跟人，跟对了，政治就搞对了，跟错了，政治也就搞错了。如果说他在延安时期跟随毛泽东导致了他前半生的飞黄腾达，那么他如今偏向毛家湾则让他的后半生直接进入了历史的死胡同。

## 第五节：林小琳和林立衡

林彪有两个女儿，一个是他和刘新民（张梅）所生的林小琳。一个是他和叶群所生的林立衡（林豆豆）。因为生母的不同，两个女儿曾有一段天壤之别的人生历程，也因为这段历程，她们对林彪的看法截然相反。

林小琳因为生母刘新民和林彪离婚，不得继母叶群的宠爱，后来甚至寄养在罗荣桓家中，想要见乃父林彪一面尤不可得。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林小琳参加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8.8战斗团，而该战斗团的对立面红色造反派就是中央文革小组支持的造反派组织，林小琳所在的组织被称作“老保”，但是，大家都知道林小琳身份特殊，是林彪的亲生女儿，所以这就给毛家湾带来了麻烦。林彪、叶群适时和江青等人打得火热，自然不愿意这种芝麻小事开罪于中央文

革，更不愿给上边留下“老保”的印象。叶群于是就去找林彪，将林小琳的所作所为告知了林彪，林彪听后也很生气，同意叶群的做法，公开发表一个《林彪声明》，大意是：林小琳一贯反对我，她在外面的行动、言论不代表我，我概不负责，从现在起，我与她脱离父女关系。林彪的一纸声明很快就把林小琳逼到了绝路上，林小琳不相信林彪能够发表这样的声明，声称要来北京找林彪对质。叶群只好让吴法宪用空军的飞机诱骗林小琳到了一个人烟稀少的国防科研试验场，在那里林小琳过着类似流放的生活。文革结束后，林小琳对林彪的看法比较尖锐，具有一定的深度。林小琳认为林彪的错误至少有三条：一是大搞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二是对毛泽东有意见有看法为什么不能像彭德怀那样把意见看法都公开摆出来，即便受到打击报复，后人也会觉得公正无私受到世人的尊敬。三是文革中那么多老干部被打倒，受折磨，周恩来费尽心机保护了不少人，而林彪除了保护扶植黄、吴、李、邱几个亲信之外，他和江青、叶群一起整倒了许多老干部，而且有些老部下都被整得很惨。（参见高厚良口述、高德明整理，《“九一三”之后的林立衡——暨说给豆豆的知心话》载于《中华儿女》2000年第9期。）

和林小琳同属一个父亲的林立衡在政治上显然比她的姐姐要顺利的多，吴法宪在空军传达的“两个一切”，不仅规定林立果具有一定的特权，林立衡也在其中，这位空军报的副总编辑在林立果的女友张宁看来也是空军的“太上皇”之一。张宁说：“姐弟俩（指林立衡、林立果）实际上已成了空军的太上皇。连林彪了解部队基层的政治思想情况以及军队基层关键性实质性问题，一般都从儿女那里获得第一手资料。”（参见《昨夜星辰之五一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之《扭曲的虹—张宁自述》，该书180页）不过，这位“太上皇”和林立果的“太上皇”大有区别。

林立衡没有林立果那样张牙舞爪的表演，这除了和林立衡本人的个性有关，再有就是毛家湾女主人叶群对她的恶劣态度。叶群自己曾经和外人说过，林立衡原本并非内向、木讷，而是因为那些匿名信中声称林立衡并非叶群亲生导致林立衡神经受到刺激进而性格怪异。而林办的老秘书们则认为林立衡之所以变得性情古怪，主要是因为叶群的原因，叶群经常对林立衡进行打骂，母女关系相当紧张。林立衡一生迄今为止自杀过三次，而且三次都和林彪、叶群夫妇有关。第一次林立衡自杀时间是1964年，原因据说是听说到一些有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负面消息以致于精神恍惚，走向了轻生。但这只是官伟勋的一家之言。（参见《我所知道的叶群》167页），毛家湾的老秘书则认为林立衡的第一次自杀属于被逼无奈而寻短见。（参见《毛家湾纪实》257页）虽说林立衡1964年仅有20岁，但是如果说仅仅因为对党和国家的前途丧失信心进而自杀显然持论勉强，相比之下还是毛家湾的秘书回忆比较贴近事实，因为纵观林立衡的后两次自杀其实都是和她个人的、生活前途有着密切的关系，事实上第二次、第三次自杀的时间1968、1974这两个时间段，党和国家的政治命运远比1964年更加可怕，但这两次自杀的起因却和党和国家的政治命运没有特别直接的关联。（后一次虽因林彪家族的旧事引起，但直接原因还是林立衡的个人生

活、前途受到严重威胁所致。)第二次自杀主要是因为有人给叶群推荐了一位笔杆子很强的年轻人,而在林立衡看来,举凡叶群推荐来的都未必是什么“好货色”,所以,林立衡去找林彪,林彪给叶群下了几个指示,其中有一条规定不能找笔杆子,要找枪杆子,还说林立衡的婚姻大事由林立衡自己作主。这就给叶群很下不来台,叶群为此大发脾气,亲自出面毒打林立衡,还把林立衡的头发给抓下来一绺。林立衡受辱不过,服毒自尽,幸好抢救及时未能危及生命。叶群也担心林立衡的事情给林彪知道,因此找了个理由把林立衡送到外地,父女无法见面,叶群毒打林立衡一事也就大事化小了。有人认为林立衡和叶群的冲突根本问题在于政治观点的分歧,还举例说林彪本不知道吴法宪提携林立果、林立衡姐弟掌握空军的事情,是林立衡告诉的叶群,林彪还为此责难叶群云云。(参见官伟勋著《我所知道的叶群》172页)这种说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且不论林立衡到底在政治问题上和叶群有什么具体的分歧,就以林立果、林立衡姐弟进入空军是源自“叶群为控制空军、为控制吴法宪”(该说法来自《我所知道的叶群》172页)显然比较荒谬。前面我们已经列举了林彪为安插林立果进入空军所煞废的苦心以及林彪为此所作的一切的有关证据、当事人的相关回忆。这些都是不容辩驳的,当然我们也不否认叶群在林立果、林立衡进入空军问题上的插手,但是这个插手也是在服从林彪通过林立果进而掌控空军的大前提下完成的,如果抛开林彪想要控制空军的前提不谈,说什么叶群要控制空军、控制吴法宪那将是非常可笑的,不知道叶群本人单独控制空军的目的是为了什么?而从以往毛家湾的大事决策上,没有林彪的直接点头是无法完成的,特别是掌控空军这种大事不通过林彪,叶群何敢擅自出令?况且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林立果之所以敢于和叶群对抗甚至背后公开辱骂叶群是“婊子”(在毛家湾内部叶群被儿子林立果称为“叶老胖”是秘书们多次亲耳听到的)其核心力量就是有林彪在背后撑腰,而这种撑腰绝不是简单的来自家长的寻常溺爱,更多的是林彪寄予在林立果身上的政治希望。所以说,片面的强调什么林立衡和叶群的政治分歧进而说成两者因之势不两立,我们认为这是有意拔高,不符合客观事实。

而就在林立衡自杀后不久,叶群再次为林立衡寻找合适的“夫婿”,林立衡自己有一个不错的男朋友,不巧给叶群知道,叶群为了拆散他们,不惜给男方捏造“梅毒”的证据。叶群还通过张秀川夫妇给林立衡找来另外一个很为叶群满意的男青年,哪知道林立衡根本不买帐。叶群还不死心,又陆续给林立衡找了几个男朋友,但都给林立衡打发掉了。为了回避叶群的纠缠,林立衡还同叶群玩起了猫捉老鼠的游戏,搞得叶群筋疲力竭。经过两次自杀风波的林立衡似乎有些成熟起来了,她对秘书张云生说:“我不想当左派,我最多是个中间派,我从今也不再想死了,我愿意好好活着,我活着是为了那些同情我、帮助过我的好人,我如果死了,他们就会遭殃。为了他们,我也必须活着。”(原文参见张云生著《毛家湾纪实》292页)从林立衡的这番表白来看,说林立衡在政治上和叶群有着多大的冲突以致于水火不容明显有些造作。林立衡处在那种时代、那种家庭说她对政治完全不感兴趣也是不可能的,但说她对政治有多感兴趣也是无稽之谈。她不同于林立果,她对于父母、组织上给她的安排更多的都是迁就、随意,当空军传达吴法宪的指示,赋予林立衡特权时,林立衡专门写了一个“新五条”对那些吹捧她的东西进行了个人否定。在她的本心更多的是

想要过一个正常人的生活，所以，当她决定不再自杀而环境再一次将她准备度过的平静的生活搅乱时，她再一次走上了轻生之路。她三次用生命抗争准备换来的普通人的生活终于在八十年代后得到了满足。林立衡前半生的悲剧适足说明林彪家族、集团在政治黑暗的同时在生活方面也同样处于畸形。

## 第七章：分道扬镳

### 第一节：林彪·江青·康生

就在林彪集团崛起的同时，另一股因为文革而发红发紫的政治新贵势力也在日益膨胀，这就是江青集团。江青集团的主要代表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他们和林彪及其四大金刚等人有所不同，他们既没有丰富的军事斗争的经历，也没有像林彪等人那样在部队中的广结声气。他们的主要成员几乎都是靠对政治口号、标语的呐喊、极左政策中的步步紧跟得以爬上政治舞台。一场文化大革命把部队推向了风口浪尖，特别是“支左”后，军队的力量逐步增强，在这方面江青等人始终有所欠缺，这是他们不如林彪集团的地方。但是，他们也有比较林彪等人优越的一面，那就是可以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进行政治讹诈。毛泽东在文革中的权威虽然并不像林彪吹嘘的那样“一句顶一万句”，可毛的崇高的个人威望确实在文革时期达到顶峰。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在文革中的合作、分裂以及他们各自势力的消长十分准确的勾勒出文革政治风云变幻的基础画面。

江青对林彪既熟悉也不熟悉，熟悉的是林彪的地位、权力和履历，不熟悉的是林彪的品性、作风、好恶。1966年初林彪住在苏州，江青从上海到苏州去看他，一见林彪就问为什么不看戏？林彪推以有病，江青看到林彪身边摆放着一些京剧唱片、电影插曲唱片，更加生气：“到了这时候，你还听这种东西？这些都是坏戏、坏电影。”林彪回答：“我用它调剂一下精神，听上一段，身体就好了些。”此次谈话不欢而散。【注1】（《毛家湾纪实》156、157页）据曾在毛家湾工作过的官伟勋回忆，林彪还对托尔斯泰的名著《安娜·卡列尼那》特感兴趣，而这些在江青眼中无疑都是批判打倒的对象。林彪不但对这些文革里称之为“封资修”的东西表示好感，而且对于江青提倡的“样板戏”毫无兴致。然而，这些“小异”并不影响林彪、江青攫取文革引发的权力空间时的通力合作，在这个“大同”的掩盖下，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势力暂时获得了均衡。

文革初期，江青曾经和叶群说过：“现在趁乱的时候，你给我去抓了这个仇人，你有什么仇人，我也替你去抓。”这两个女人互为对方“报仇雪恨”的举动很快成为两个新贵势力联合的先声。叶群为了给江青掩盖旧日的痕迹，不惜动用江腾蛟、吴法宪等亲信大将。1966年10月，叶群叫吴法宪通知江腾蛟到北京接受任务，这项任务其实就是江青的一些旧材料落在友人郑君里、顾而已等人手里，江青不甘心这些东西散落民间可能成为她“旗手”的负面，叶群得知江青的这块心病，立刻闻风而动。江腾蛟接受了叶群的指令，不消说那是相当卖力的。江腾蛟在全面侦察了叶群指明的对象后，在10月9日零点突然行

动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动作迅速取得叶群、江青需要的东西，然后准时把这些东西送交叶群，叶群反馈的消息是江青对办事人很满意。三十年代知道、了解江青底细的还有一个叫秦桂贞的女佣，她在江青非常困难的时候给予江青不小的帮助，江青一度把她视作恩人，到了延安之后还不忘给秦桂贞寄去照片。可是，红卫兵运动一起来，秦桂贞的原始身份给一些人知道了，江青唯恐波及她在上海的往事，指令毛家湾给予协助，吴法宪奉了江青的命令用空军的飞机把秦桂贞秘密弄来北京，随后就在江青口授的命令下将秦关押，而且一押就是七年。叶群还和江青密谋，通过吴法宪把解放军报社负责人攻垮，扶持江青系统的人马上台。江青在前面提到的她的那个仇人就是孙维世，孙维世是烈士孙炳文的遗孤，周恩来、邓颖超把她认做养女。林彪也曾追求过孙维世，但未果。虽说有了这层原因，可江青仇视孙维世的理由远比叶群更为激烈，孙维世陪同毛泽东在五十年代访苏归来，江青一再向孙维世追问毛泽东出国后的事情，孙维世未予理睬。而江青“痛恨”孙维世显然也不仅仅是这些，就在江青同叶群约定清洗“仇敌”后，1968年3月1日孙维世就被戴上手铐投入监狱，10月14日惨死狱中。事后周恩来、邓颖超才得知，晚年的邓颖超每每谈及孙维世的死都唏嘘不已。他们尽管是孙维世的养父母但对孙维世的悲惨遭遇仍然无能为力，这是由当时的政治背景决定的。应该说，在整人方面，叶群虽然和江青都是一丘之貉，但江青的手段明显要比叶群更为毒辣。尽管面对如此心狠手辣的政治盟友，可叶群仍然抱定紧跟江青的宗旨，她多次宣称：“首长（林彪）紧跟主席，我紧跟江青！”而在一些公开场合中，叶群也确实表现出难得的“紧跟”甚至到了做作的地步。叶群的这些表现给她带来的好处无疑也是显而易见的，她不仅很快成为军委看守小组四人成员，而且又成为文革中炙手可热的权力象征——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

如果仅仅是叶群如此“盛赞”、“紧跟”江青还不能完全说明林彪集团的政治态度。关键是林彪对江青的吹捧彻底表明了毛家湾的立场。如果仅仅是林彪在口头上对江青的吹捧也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因为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当时的政治条件，一些领导人不得不对江青提出违心的“赞誉”，我们经常说，对于一个政治人物，不要光看他说了些什么，还要看他做了些什么，不要光看他做了些什么，还要看他做的结果是什么。林彪吹捧江青的背后是什么？林彪在吹捧江青后围绕着江青集团的活动他又做了些什么，这才是最为关键的，这也是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勾结的实质所在。

林彪公开点名贺龙是“大土匪、大军阀、大刽子手”，这“三大”后来就是贺龙的主要“罪名”，与此同时，江青讲话配合林彪：“要把贺龙端出来，谁保也保不住。”全军文化工作会议刚刚结束，林彪任命江青为全军文化工作顾问，命令总政关于军队的文化工作一律向江青汇报备案。这次命令并没有经过军委办公会议研究决定。江青在中央文革会议上说：“军队的走资派为什么不揪出来？”江青送审具体方案，林彪批示：“完全同意江青同志的意见，按江青同志说的办。”江青提议把总政副主任刘志坚抓起来，林彪出面批评叶剑英、徐向前、陈毅乱保刘志坚，并且发出明确指示：“刘志坚实际是资产阶级在军队的代理人。”一九六八年三月，江青向周恩来提出要重新给她定行政

级别，江青原来是行政九级，周恩来托故不同意，江青找到林彪，林彪在此月的有关会议后指示：“江青同志对文化大革命立下汗马功劳，行政级别不宜偏低，可以暂时定为行政五级。”1968年9月16号，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提交了含有大量通过刑讯逼供获得的所谓刘少奇的“罪证材料”。江青在材料的批语当中使用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的字眼。9月19号，林彪批写：“完全同意”，“向出色地指导专案工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江青同志致敬！”江青大肆吹捧林彪，坚决要求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党章，江青公然说：“不把林副主席写到党章上，我们睡不好觉，也吃不好饭。”、“林副主席的名字还是要写上，我们写上了，可以使别人没有觊觎之心，全国人民放心。”、“林副主席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风度”，叶群后来给江青说（电话记录）：“江青同志在关键时刻帮助了首长，首长表示十分感谢。”在一九六九年到一九七一年两年之间，江青所在钓鱼台给林彪的毛家湾一共通话高达490次之多，其中林彪和江青的通话多达235次。林彪说过：“江青同志是我们党内女同志中很杰出的一位，也是我们党内女干部中很杰出的一位，她的思想很革命，她有非常热烈的革命感情，同时，也很有思想，对事物很敏感，很能看出问题，很能发现问题并采取措施，过去，她身体不怎么好，大家不了解她，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就看出她的作用，很大很大的作用，她有很大的创造性，能够发现很多问题，她始终树立了很多的功勋，始终站在革命的前线上，捍卫江青同志的权威也就是捍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总司令部的权威，也是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部署的权威，也就是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权威！”这是林彪在打倒“杨余傅”的大会上的讲话，尽管一些人回忆林彪并没有按照叶群所预先指定的那样称呼江青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但其他部分对江青的大肆吹捧也是相当罕见的，特别是提出了捍卫江青的权威就等于捍卫毛泽东的权威和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权威，应该说林彪在把江青推到一个非常吓人的政治地位的过程中起了很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而最能体现毛家湾、江青两处亲密合作的范例就是第二次炮打张春桥，这件事所能反映出的文革政坛的诡谲实在出人意表，所以不能不提。

张春桥本是柯庆施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柯庆施死后，上海方面江青多委张以重任。而张春桥对毛泽东晚年的思想状态多方揣摩已经进入心领神会的境地。所以，“文革”一旦掀起，张春桥很快跻身中央文革领导层。不过，江青、张春桥毕竟在过去没有太多的接触，加之江青生性多疑，即便是张春桥也难免在某些敏感的问题上凭空惹来江青的忌恨。据陈伯达回忆，当时上海有一箱江青三十年代资料没有及时给她送来，江青遂怀疑是张春桥暗中捣鬼，继而江青就在群众集会上大谈上海的工作不比北京好，消息传开，上海那些力主炮打张春桥的群团组织兴奋不已。受到过张春桥不少照拂的姚文元得知江青之于张春桥的态度有变，马上转向，公开说他跟张春桥没有什么关系。【注2】（《陈伯达遗稿一狱中自述及其他》108页）这件事发生在1968年4月，3月发生“杨余傅事件”，3月27日北京召开群众大会，张春桥意外的没有参加，这就更加引起上海张春桥对立面包括市革命委员会内部一些成员的怀疑，尤其是上海《文汇报》驻北京办事处负责人艾玲通过她的丈夫总参二部副部长贺瑞林了

解到中央传阅文件的名单上上海方面只有姚文元的名字而没有张春桥，这就让准备炮打张春桥的人食指大动。而与此同时，毛家湾也在为张春桥这次短暂的“失宠”准备炮弹，叶群让秘书们去找 1967 年南京军区党委扩大会议上张春桥的讲话，还让秘书们去查找张的讲话中的错误，秘书们不明就里自然也就不能满足叶群的要求，叶群还专门给何汝珍打去电话密令他把在江苏太仓蹲点的几个人紧急撤回，而这些人一度是代表叶群支持张春桥的。叶群又给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打电话，特殊的“关照”许世友要提防张春桥。叶群说：“许司令，你知道，主席是保你的，林彪同志也是保你的，你知道谁反对你吗？就是你们东边的那位。（指张春桥）我同你讲，你心里有数就行了。”叶群本来还专门收集过整许世友的材料，如今去一反常态和许世友热络的交底，这让秘书们如坠云雾。不久，上海来的江腾蛟把一份揭发张春桥的材料交给叶群，叶群复制了两份交给林彪，由林彪署名批出，一份送给毛泽东处，一份送给江青等人，后面这份由叶群亲自给江青送去。联系到叶群从钓鱼台江青住地回来就急要张春桥的讲话，秘书们始知此次炮打张春桥的秘密策划来自钓鱼台、毛家湾的联合运作。【注 3】（《毛家湾纪实》184—190 页）由于这次炮打来头很大，上海方面积极响应，以《文汇报》朱锡琪等人为首的炮打派格外卖力，连徐景贤等人也感到“穿军装的人露面了”。【注 4】（《十年一梦》136—156 页）张春桥被这次后来称之为“4. 12 炮打”的行动搞得晕头转向、不知就里。幸亏这时江青又意外的找到了那箱用来猜忌张春桥的旧材料，她对张的憾恨一扫而光，转而继续维持张春桥的地位，而毛家湾得知风向又变，就让李作鹏出面发给上海方面打招呼“营救”张春桥，一起内讧式的炮打就此落下帷幕。遭到炮打的张春桥当然不敢向上追查，只好向下用力，因为此事遭受牵连的干部群众高达 2000 多人，其中 5 人被逼死、6 人被逼疯。江青对张春桥一打一拉彻底收服了张，而毛家湾参与这起于自己好处几乎等于零的活动无外乎为了迎合江青的意愿，给江青捧场。

应该指出的是，林彪、江青两股势力的勾结、合作是建立在瓜分刘少奇等人倒台后所留下的权力空间基础上的，他们因为有着暂时的共同政治目的，所以才出现了一段短暂的政治蜜月期。然而，当他们各自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以后，原本就存在于他们中间的沟壑、分歧随之也就裸露出来，而且当这两股新贵势力羽翼逐渐丰满，权力瓜分又重新抬头时，林彪、江青也从最初的合作开始步入较量乃至分裂、翻脸。倘若把林彪同江青这种权力之争看成是林彪的“反江青”进而夸大为林彪的“功绩”为林彪在文革中的犯罪活动进行辩护，这就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颠倒。

其实，就在中共“九大”之前，林彪、江青的合作已经有了不谐之音，内中各自分歧的暗流一直涌动不止。江青为人骄横、目无余子，党内除毛泽东外，其他人均不在她的眼中，即令是毛泽东，有时候江青也表现出桀骜不逊。有一次，江青跟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说：“你回去好好安排一下，叫他好好休息，少操心别的事，实在不行就让他搬古董。”从江青的训话中，如果不是当事人具体回忆，根本无法想象这里面的“他”竟然指的就是毛泽东。可想而知，江青对待毛泽东偶尔都要如此态度，其他人就更不在话下了。1968 年夏，

江青因为身体不适曾经交待过要休养一个月左右，休养期间不要给她送批文件，所以，一份来自中央专案的文件作为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的黄永胜便在自己的名字下面圈阅，哪知道这件小事竟然惹动江青大发肝火，江青亲笔在该文件的后面大骂黄永胜“有什么资格越过我批这份文件，黄永胜要夺权，有政治野心”，黄永胜和毛家湾的关系尽人皆知，江青更是心知肚明，可这并不影响她对黄永胜大发其火，叶群无可奈何的表示“这个总长的人选不大理想。”谁知道，江青并不准备就此收手，她还在另外一份送交林彪、毛泽东的文件上暗指黄永胜是“广州军区保皇派”的后台。因为江青的搅闹，黄永胜出访外国的计划险些落空。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江青随即又抓住总政治部军管会主任人选不合适的理由向军委办事组发难，军委办事组的“林记”人马只好开会研究，这时总政的军管会主任是海军的第二政委王宏坤，属于林彪系统上来的，换下王宏坤固然算不得什么大事，可推举何人担任总政的军管会主任却难住了办事组的几个成员，吴法宪对毛家湾派去的秘书张云生大吐苦水：“总政的主任、副主任全都靠边站了，副部长以上干部百分八十以上都被打倒了或靠边站了，还说是右倾，解放军报社也是这样，站住的人没有几个了，还是右倾吗？我们确实不好说，得林副主席说句话，不然我们顶不住。”【注5】（《毛家湾纪实》247、202、203、209页）江青的这两次“大闹”和她某些时候的“无理取闹”并不相同，其矛头直指毛家湾头号大将黄永胜和林彪信任的王宏坤，内在的主因还是权力之争。刘少奇既倒，林彪、叶群借助文革发展自我势力且渐成尾大不掉之势，这是江青出面要“分一杯羹”的基本动机。

对于江青，林彪虽则有利用的一面，却也不乏敷衍。林彪此人事不关己总是高高挂起，一旦关系到本集团活着其人政治利益时往往奋不顾身，从零点救护邱会作到扶持儿子林立果等无一不表露林彪的这一政治属性，所以，江青的发难林彪不会视作旁观的。据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就在1967年2月，林彪、江青之间就爆发了一次罕见的冲突，在林彪的住地，不知因为由何引起，林彪大怒要叶群马上赶走江青，虽然江青强颜镇静说了一些诸如“林彪同志，我有缺点、错误，你可以批评，何必生气呢”之类的缓和气氛的话，但是，两者的矛盾由此暴露无遗。这起冲突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张云生没有作出具体的交待，但从他回忆叶群后来做的调和比较顺利、江青离开毛家湾时林彪、江青都已经消气的结果看，不应该是有什么大不了事，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林彪都不能相让，那么江青后来直接针对黄永胜、王宏坤的行径又岂是林彪集团所能容忍的呢？【注6】（《毛家湾纪实》163、164页）事实上，叶群出头去拉拢陈伯达已经是在挖钓鱼台（江青）的墙角，江青也不示弱。中共“九大”前后，黄永胜的地位比较显赫，除了担任军委办事组组长、总参谋长以外，还是中央指定的和周恩来、康生一道酝酿政治局人选的三人小组成员，按照这个规格，黄永胜进入政治局常委也不是不可能，可当这一动议甫一提出，江青很快就提出：“黄永胜要是当常委，我也进常委。”事后选举，江青的确比黄永胜还多了几票。但就在江青丢失的几票中也有叶群做的手脚。1970年5月17日，江青召集姚文元、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谢富治等人开会，在会上江青点名批评黄永胜等人是搞“军党论”，同时也标榜她自己很成熟、可以掌握国家的全盘云云。抛开江青的自我吹嘘，仅就批判黄永胜等人的“军党论”一事看，身后的背景显然不那么简单。

最能反映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从合作向分裂发展的转折点的一件事就是原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温玉成的沉浮纪录。温玉成，江西省兴国县人。一九二九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九三〇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一九三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三军第七师二十团宣传员，兴国县警卫营干事，独立第十二团总支书记、政治委员，红八军团第二十一师六十二团政治委员、军团直属队总支书记，红五军团骑兵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区队长，新四军政治部组织科科长，第三支队政治部组织科科长，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纵队纵队长，新四军第六师十八旅旅长兼政治委员，苏中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松江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第一四五师师长，第四野战军四十一军副军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兵团军长兼政治委员，广州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温玉成因为和黄永胜共事广州军区，彼此印象不错，黄永胜上调北京专门向中央军委推荐了温玉成出任副总参谋长，知情人回忆道：“当时有一种说法：在广州军区，温玉成眼睛里只有一个半人，“一个”是黄永胜，“半个”是以老谋深算著称的军区政委刘兴元。”、“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正在值班室，黄永胜进来对我讲：“你给林副主席写个报告。”于是他讲我记。报告主要建议对广州军区军事领导干部进行调整，其中特别提到温玉成在广州处境艰难，建议将他调出另行安排工作。根据我对黄永胜的了解，估计在写这份报告之前，他很可能已将有关问题当面请示过林彪。大约半月之后，便听说中央军委已任命温玉成为副总长。一天晚上，又是我在值班，温玉成打来电话找黄永胜。值班室很静，温玉成又是大嗓门儿，我在一旁可以清楚地听到他的声音。他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问黄永胜军委的调令“是怎么回事儿呀”？并表示他“水平低”，“干不了”，“不想去”。黄永胜则用亲昵、得意的语气大声地说：“这是我向林副主席建议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批准的。你赶快来嘛！”几天之后，两派群众组织在京达成协议，黄永胜返回广州。温玉成马上到黄家拜望。没过几天，他便兴高采烈地到北京履新去了。军区机关不少人去机场送行，我也在其中。”【注7】（迟泽厚《我所知道的温玉成》，载《南方周末》2005.7.28）黄永胜之所以敢保荐温玉成，那是因为林彪先前对温玉成的态度不坏，文革中林彪甚至还给温玉成“保驾”，说了温玉成“大节是好的”的一类的肯定的话。温玉成进京后发生了“杨余傅事件”，温玉成得以接替傅崇碧出任北京卫戍区司令员，以后又成了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但是，文革的政治天气经常扑朔迷离，温玉成久在外任，甫一接手如此重要的工作，很多问题倍感吃力。首先就是要在毛家湾、钓鱼台之间进行取舍，温玉成原本和黄永胜关系不错，而且又是黄永胜推荐来的，他跟毛家湾的关系自然也不会差到哪里去，每个月他都要给毛家湾送去一两份有关卫戍区工作的汇报。可另一方面温玉成也给钓鱼台的江青送文件，江青也把她视作禁脔的“样板团”交给温玉成管理，温玉成自认为这样一来可以做到左右逢源、两面持平，哪知道这无形中把毛家湾、钓鱼台都给开罪了。正如温玉成的妻子宋婉明所说：“老温是个老实人，一辈子只知道打仗，执行命令，政治他哪懂？”文革说到底就是一次重新“站队”，在这种非此即彼的“站队”中，骑墙往往下场更惨。

替江青照管“样板团”的工作表面上风光，实际受累、受气，就在温玉成左支右拙时，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的一封告状信让他彻底掉进了政治漩涡中。毛家湾把温玉成在“样板团”上的奉命工作看作是温玉成投靠江青的证据，从此疏远了温玉成。而黄永胜的秘书李必达在一次偶然的场合里偷听到黄永胜和叶群之间大骂江青，李必达就把这件事写成密信交给温玉成，李必达为什么密告黄永胜、为什么要把密告黄永胜的东西交给温玉成呢？知情人回忆如下：“李必达与黄永胜夫妇闹翻，始于一场误会。1968年底，“黄办”按照上级统一部署，进行“清理阶级队伍”学习。这期间，李必达因为一件小事引起“黄办”主任、党支部书记项辉方的怀疑，曾发动“黄办”工作人员对他进行“帮助”。李必达多次检讨都未过关。入伍后一帆风顺的他难以承受这意外挫折，自感前途渺茫，内心痛苦之极，多次找老领导于贯文倾诉。一次，于贯文当着李必达的面给项辉方打电话，委婉地指出对李的问题是否看得太重了，建议不要抓住不放，“好聚好散，实在不行，叫他回广州算了”。但是，项辉方一下子来了原则性，坚持要把问题弄个水落石出。李必达感到自己被逼到了绝境。1969年4月28日，他最后一次来看于贯文，突然冒出了一句：“难道我就任凭他们摆布不成？！”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终于决定铤而走险：向毛泽东、江青告状，扳倒黄永胜，或者还可绝处逢生。”【注8】（同【注7】）李必达选择了温玉成除开温玉成在钓鱼台那边的分量，还有就是温玉成和黄永胜关系的恶化。有人认为李必达在当时不过是出于一时的“仇隙”所以才告发的黄永胜乃至林彪，并非出于李必达本人的“先知先觉”，这种看法我们认为比较肤浅，因为前面我们已经举出例子，且不论陈毅，就像北京的舒赛、安徽的石仁祥等，他们都不过是普通的干部群众，既没有亲身经历与林彪共事的可能，也没有接近毛家湾的资历，但是，他们通过他们日积月累对林彪的发言、讲话、所作所为的感受，用最为朴素的真理衡量出林彪的为人最后得出惊人的预见，这就是在历史上也不是什么罕见的，尽管文革中很多人都一度高呼过“林副主席永远健康”的话，这并不等于他们内心就认同林彪、并不等于他们和某些糊涂虫一样看待林彪。以李必达的身份以及和黄永胜夫妇的长时期的接触，在林彪的看法上得出和当时时局相反的结论不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李必达本人那时候尚未认识清楚江青的本来面目而已，如果他能够知道江青、林彪不过是同路人的话，想必那封信也不会那么轻易的发出了。

温玉成收到李必达的来信，很快就交给毛家湾叶群的手中。李必达很快就被扣押。可毛家湾并不原谅温玉成。1969年4月的中共九大的选举过程中，举凡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九大主席团常务委员都无一例外的成为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选举出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唯独温玉成例外。温玉成急忙给毛家湾打电话，却意外的遭到了冷遇。张云生回忆：“在最后一刻把温玉成的名字从政治局委员候选人名单中拿掉，毛家湾这边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毛家湾认定李必达之所以敢把密告信交给温玉成并且通过温玉成转交给江青只能说明温玉成必定是钓鱼台的“人”，所以不留旧情的拿下温玉成也是必须的了。“九大”后，温玉成遇贬，下放成都军区担任副司令员，此时毛家湾才意识到温玉成实际上“在对林彪的忠诚上是一直不成问题的”（张云生语，参见《毛家湾纪实》219页）温玉成离开前夕，林彪难得亲自接见，叶群还把温玉成拉到自己的办公室亲密的谈话长达2个多小时。温玉成到成都上任不是提升而是落难，

林彪这样高规格的接待一个落难的干部在文革里还不多见，唯一能够解释得通的就是毛家湾在做“亡羊补牢”的工作。

中共“九大”之后，毛家湾和钓鱼台之间的关系越加微妙起来，1969年10月，林彪、叶群夫妇去苏州，竟特别嘱咐不要告诉上海方面，等到张春桥得知消息去迎接时又扑空。叶群还告诉秘书说，凡是江青询问林彪的行踪一律笼统的说成“南方”。甚至还做好了江青突然来访他们就立刻搬家的准备。江青送来给林彪批阅的文件也不像以往那样得到“礼遇”而是把球踢给了周恩来和政治局。【注9】（《毛家湾纪实》220—224页）

在和江青明里微笑、暗中斗法的同时，毛家湾还要面对另外一个重要人物，这就是中央文革顾问康生。康生在四十年代主持延安的“抢救运动”红极一时，后来因为执行“极左”政策搞得天怒人怨，不得不做了几年冷板凳，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康生从上一届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变成政治局候补委员，且没有固定的差遣。老谋深算的康生在度过政治“冬眠”后很快发现了机会，他利用小说《刘志丹》为起点迎合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观点，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当选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重返政坛。文革开始后，康生更加活跃，以顾问的名义屡屡插手专案，酿就了一场又一场的冤假错案。对于康生的阴狠，林彪、叶群岂能不知？但是，康生接二连三的主动向毛家湾示好却不能视而不见。林彪打击贺龙时，康生就编造了“二月兵变”的政治谎言迎合林彪，此后还准备出任贺龙专案组组长。周恩来的汇报偶一没有经过林彪，就被康生检举出来作为周恩来忽视林彪的证据使得周做了检讨。对于康生送来的“橄榄枝”，毛家湾欣然接受，叶群不但登门道谢，还请康生的老婆曹轶欧写字。康生很快投桃报李，在多次公开的场合下吹捧林彪。1967年3月12日，康生说：“八届十一中全会把林彪同志确定为接班人，这是百年大计。”1969年4月，康生说：“林彪同志是毛主席的接班人，当之无愧。我的意见，这应该写进党章。”康生还组织人手编辑《林彪选集》、《林彪语录》，这是康生的长项。60年代初，毛泽东提议、批准成立刘少奇选集编辑委员会时，康生就主动请缨担纲。如今林彪成为第二号人物，康生再次出马。毛家湾走近康生不但有康生上述的表演，还有就是康生曾经和江青等人关系不睦。康生在中央文革尽管是挂着顾问的头衔没有具体的职务安排，但他对文革成员多数瞧不起，包括江青、张春桥、陈伯达在内。康生曾和耿飏私下里议论过张春桥：“张春桥野心很大，当了常委还不满足，还想往上爬。”（参见《耿飏回忆录 1949—1992》，255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第一版）康生临死前还通过王海容、唐闻生告发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但是，康生对于来自毛家湾的拉拢抱着谨慎的态度，尽管他和江青、张春桥之间有着一定的矛盾，可他并不准备公开开罪于江青，更不打算在和毛家湾的联络感情上给人看出什么具体的政治倾向。

## 第二节：设立“国家主席”之争

毛泽东虽然在文革前后借重林彪并且给予他足够的尊崇。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准备把班交给林彪，关于这点，李雪峰回忆说：“但主席对林也不完全放心，自己一直牢牢掌握着军队。· · · · · ·可见毛还是不完全放心，不让林有权调动军队。”【注10】（《回首文革》第二卷713页）1967年9月24日，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处开会，讨论九大事宜，毛泽东说：“接班人当然是林彪。”

【注11】（《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191页）然而随着林彪集团逐渐形成、逐渐成为干预中国政坛的主要政治力量之一，毛泽东的隐忧也随之上升。为了限制林彪集团的势力的蔓延，毛泽东在“九大”之前就着手做了几手准备。首先给“个人崇拜”降温，1967年南巡时，毛泽东就同杨成武说过“四个伟大”讨嫌的话，还说不赞成“里程碑”的吹捧。（即把毛泽东思想说成马列主义发展的第三个里程碑）众所周知，自六十年代初极力吹捧、神化毛泽东的版权所有者就是林彪，“四个伟大”也正是林彪的“杰作”，这些货色也正是林彪充当文革“副统帅”的主要资本。再有，利用对毛泽东的吹捧，林彪集团的骨干分子也加紧对林彪的同样神化、同样鼓吹。例如黄永胜、李作鹏等人散布的“三大助手”论，即吹嘘林彪之于毛泽东犹如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吴法宪还说林彪比斯大林、恩格斯还要得多，李作鹏说林彪是伟大的天才的政治家、思想家，邱会作也说林彪的指示是普遍真理，吴法宪居然说，没有林彪，就没有人民军队、没有国家。【注12】（《大动乱的年代》391页、392页）这也就是后来毛泽东所说的“名曰树我、其实不知树何人。”林彪集团借助鼓吹毛泽东的同时也把他们自己放到了吓人的地位，毛泽东给这些过头的个人崇拜降温的实质也在于削弱林彪集团由此博取的“政治声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四个伟大”落地，那么发明该“学说”的人又将置之何地呢？这也就是林彪等人一直抓住“天才”这一谬论始终不放手的原因。

毛泽东在组织干部任用上也开始逐步注意约束林彪集团的扩张。总政治部主任肖华倒台后，林彪推荐过黄永胜出任总政的负责人被毛泽东回绝，总政是三总部唯一没有被林彪势力控制的地方。在酝酿军委办事组成员时，毛泽东亲笔加上“还有李德生同志”，李德生进入军委办事组旨在打破林彪集团“一统天下”的局面。“九大”后，毛泽东又把李德生放在了总政治部主任的位置上去。由于毛泽东不能从根本上认清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所以，他在遏制林彪势力发展的同时错误的启用了江青集团，这也在客观上造成了文革后期组织路线仍旧处于混乱的泥潭中。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建国后党内历次代表大会中最为难产的一次，自1956年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十三年过去了，而且中间还爆发了文

化大革命这种在党内、国内、军内都产生巨大影响的政治运动，刘少奇等人被错误打倒，剩余出来的权力空间很快让林彪、江青两大新贵集团填补进去，中共九大非但没有像毛泽东预期的那样开成一个“团结、胜利”的大会，反而把党内的矛盾、分裂公开化、激烈化，这从九大开幕前的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中就能窥出端倪。

1969年2月，九大的政治报告起草便开始紧锣密鼓的准备了，毛泽东对这件事看得非常重要，他多次做了指示，在毛泽东的批准下，由林彪牵头，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具体负责。2月19日，毛泽东催促陈伯达快点拿出初稿，3月3日毛泽东因为起草工作的延迟而发了脾气，特别是对陈伯达提出批评。毛泽东问陈伯达：“你究竟什么人在搞？”陈伯达说：“我自己一个人在写。”毛泽东又说：“你这个人每次都说知过必改，可就是不改，永世不变。”3月12日，毛泽东决定换人，指定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来搞。陈伯达在政治报告起草中提到过“要发展生产、搞好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不能尽搞运动、运动，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毛泽东对陈伯达这句话表示首肯，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毛泽东准备在中共“九大”之后重新考虑一些重大的政治安排，对于1966到1969年的三年的大动乱应该有所了断。但是，陈伯达的这个观点很快被张春桥攻击为“唯生产力论”，陈伯达自然不甘心，据后来吴法宪说，“陈伯达经常跑林家，商量怎么写，林彪讲出了一个大概，从这以后，陈开始靠林了。”陈伯达的稿子终于没有被毛泽东采用，毛泽东就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的基础上修改，康生也向林彪推荐张、姚的稿子，康生认为张春桥、姚文元的稿子基本思路是能够站得住的。他说：“我最近生了病，没有直接参加政治报告的起草。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政治报告，这个稿子的份量是不够的。但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它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吴法宪说：“主席否定陈伯达的报告，林彪很不高兴，因为这是林、陈商量的结果，林说，写什么就是什么，我林彪一字不改”、“九大报告，是林彪在会上照着稿子念的。”【注13】（《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1545、1546页）“九大”政治报告的短暂风波其实也是对林彪势力的一次控遏。

1969年4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就在推选大会主席团主席时，毛泽东突然提议说：“我推举林彪同志当主席？”林彪连忙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当主席。”毛泽东又说：“林彪同志当主席。我当副主席，好不好。”林彪忙摆手说：“不好、不好，毛主席当主席，大家同意举手。”【注14】（《“文化大革命”简史》203页）这一有趣的插曲折射出毛泽东、林彪各自不同的政治心态。

林彪曾经不无警觉的告诫自己“不要轻易骑上去”，然而当他迈上“副统帅”的台阶后，这些东西自然也就抛在脑后了。林彪集团在短短三年多的时间里取

得了很大的发展，势力的延伸几乎遍布军队各界，如此“成就”让林彪、叶群等人陶醉一时，特别是林立果的崛起，更令他们感到“后继有人”。而且，遍观党内、军内，毛泽东以下，和林彪集团可以直接抗衡的政治力量几乎等于零，他们在“接班人”的这面大旗下逐渐作出一些利令智昏的事情出来，使其集团的负面效应大为增加。

从上述“九大”前后的些许举动中我们可以看出，政治形势已经在旁敲侧击的警告林彪集团需要作出必要的收敛，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引起林彪、叶群的注意，他们继续我行我素。1969年6月，也就是九大结束后不久，叶群主要提出要给中央警卫局、中央警卫团负责人张耀祠（中央警卫局负责保卫毛泽东安全警卫工作，中央警卫团代号就是8341即8341部队）的子女办去参军，还颇为关心的告诉张耀祠说：“你们的工作忙，没有时间照管，到部队锻炼好。”给他人子女办参军是毛家湾进行政治拉拢的一个惯用伎俩。稍后，叶群得知张耀祠的女儿想去广州中山医学院学习而苦于门路时，叶群提出交给吴法宪去办。1970年春节，叶群让人给张耀祠送去3斤竹笋、2只野鸡表示慰问。张耀祠随即也回送给叶群20斤桔子。因为毛家湾的因素，同年7月，张耀祠还帮空军的陈励耘搞了三次药，次年还托人给陈励耘捎去一些物品。叶群打张耀祠的主意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早在1967年，林彪夫妇就对张耀祠表示了特殊的“关怀”，从不轻易题字的林彪在《毛选》四卷合订本上亲笔题写“张耀祠同志存阅”，张耀祠意外烫伤时，叶群还跑去看望。【注15】（《张耀祠回忆毛泽东》122、123、124、125页）林彪、叶群对张耀祠的如此热心是背景、动机单纯的普通的同志间的友谊吗？显然不是。

林办秘书张云生说过：“林彪、叶群开口闭口不离‘突出主席’、‘紧跟主席’，但对于一个当初曾在主席身边工作、后来又回到毛家湾负责警卫工作的韩庆余却一直百般防范、戒心重重。”1966年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派8341部队副参谋长韩庆余到毛家湾加强警卫工作。之前林彪的警卫工作始终由军委办公厅警卫处负责，这之后就变成了两家共管。叶群一口否决了韩庆余的提议即中央警卫局全部负责林彪的警卫，而是仍旧保持旧有的体制，两家共管，叶群说：“两家插手有好处，这样可以相互制约。”毛泽东、周恩来那里都有中央警卫局一个副局长值班，中央警卫局按照这个惯例也准备给毛家湾配备一名副局长过来，叶群立刻拒之千里。在叶群的操控下，韩庆余只能做警卫工作中最为普通的两件事，和韩庆余派来的任务、地位完全不相符合。叶群表面上要秘书们照顾好韩庆余的生活，可当秘书提出吸收韩庆余进入毛家湾支部过组织生活时，叶群脸色一沉的说到：“那绝对不行！他参加毛家湾支部生活，里面的事被他知道后，他还不传到外边去？”秘书提醒凡是在中央机关工作的同志都懂得保密纪律，还说韩庆余老实、嘴巴严。（秘书所言不虚，举凡在中央警卫部队工作特别是像韩庆余这样级别的干部，嘴巴严是起码的工作素质）叶群还是大摇其头，她规定：“今后严格规定一条，不准韩胖子（韩庆余）介入里面的事。”一个深得林彪、叶群好感的内勤战士就因为有一次去警卫值班室和韩庆余聊天给叶群发现，立刻遭到驱逐，而且不过夜，叶群对韩庆余的防范如此已经大大超出所谓的“保密”的程度。诚如张云生所说：“叶群对韩庆余这

样百般疑忌，从来都不愿露出是出于疑忌主席的任何痕迹。”【注 16】（《毛家湾纪实》243—246 页）

叶群如此猜忌韩庆余，何以就对张耀祠那么“礼遇”呢？原因很简单，张耀祠所处的地位远要比韩庆余重要，张耀祠对于毛家湾的作用在林彪、叶群看来也远要比韩庆余大得多。虽说表面上叶群也对张耀祠说过“你不要向别人讲，不然人家说我们拉拢”的话，但内里实际就是拉拢，因为同样似是而非、言不由衷的话叶群也和韩庆余讲过，她对韩庆余的所谓热情丝毫掩饰不住她内中的防备。林彪多年以来就以揣摩毛泽东为“主业”，他不会不知道毛泽东的忌讳所在，而迎着毛泽东的忌讳仍旧和中央警卫部队的负责人大拉关系只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他们对张耀祠的这种“关心”属于正常范围；另一种就是自以为可以按部就班的开展接班前的准备工作。退一步说，就算是正常的来往，以林彪、叶群的“精明、敏感”也不会如此轻易的授人以柄，例如前面我们提到的叶群甚至主张要把给毛泽东的文件中的“请”改成“呈”，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上叶群都这般用心，何以在和张耀祠的交往上那么“粗枝大叶”呢？所以，第二种的可能性最大，我们不妨再举一个旁证，1970年5月19日下午，林彪约见李德生，在谈话中林彪暗示李德生，李的这个总政主任是他林彪提议的。李德生当时倍感纳罕，因为在李看来，半年前，毛泽东、周恩来已经明确向李提出要他到总政工作，林彪作为“副统帅”，这样的人事任免岂能不知？既然知道为什么还如此谈话呢？解释只能有一个，那就是林彪在向李德生示好。（参见《李德生回忆录》391、392页）造成这种可能性的因素我们已经提到，那就是林彪集团的势力膨胀包括林彪本人被写进党章成为“法定”的接班人，像康生这样的人物也在为编撰《林彪选集》而奔走，种种迹象向毛家湾表明，他们接班也就在指顾间。惟其如此的“错觉”才会有后来的设立国家主席之争、才会有炮打张春桥的出现。

在这样错觉的“感召”下，林彪又办了一件让毛泽东深感不快的大事，这就是著名的“林副主席一号令事件”。“一号令”起因是1969年10月20日准备举行的中苏两国边界副外长级别的谈判，中国方面自行判断这可能是苏联放出的烟幕，极有可能借机向我方偷袭。所以在10月中旬就做了紧急疏散的决定。其中毛泽东去武汉、林彪去苏州、朱德、李富春去广州等，一些被审查的专案对象也随之疏散。10月18日下午，林办秘书张云生被林彪叫去负责记录一项来自林彪的命令，具体情况张云生回忆如下：18日下午5时许，内勤进来向我传话：“张秘书，首长叫你去一下。”由于刚来苏州，有许多事情需要安顿，因此我还拿不出充裕的时间去翻看北京带来的文件。林彪叫秘书去，可能是要我讲文件，我去讲什么呢？……我进去后，林彪正在室内低头踱步，他见我后，停下脚步，说：“你打个电话给黄永胜。”林彪示意我作下记录。我坐下了，他仍然站着。他像往常那样，站在我面前，一边想着，一边逐字逐名地口述：“一、……；“二、……；“三、……；“……”他一供口述了六条。这是林彪喜爱用的表述方式。他交代什么意图，常常没头没尾，没有拐弯抹角，没有多余的形容词和修饰词，一开口就是“一、二、三”。他这次也是这

样，他说：“苏联谈判代表团将于10月20日前来北京，对此应提高警惕。为了防止苏联利用谈判作烟幕对我进行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应立即疏散；要保证通信联络的畅通；各种重要装备、设施和目标要注意隐蔽和伪装；要加强作战值班；要抓紧武器、弹药的生产；二炮部队要做好发射的准备。”这显然是林彪以国防部长的身份向全军下达的进入紧急战备状态的口述命令。“都记下来了吗？”林彪问我。“记下来了。”我说。“再念一下。”我照念一遍。“好，就这样。”林彪说：“你赶快用电话找到黄永胜，把我说的这几条传给他。”“过去首长和主任都规定过，凡往处传的首长批示都要压半天。今天这个电话是否压一压？”“噢，当然要压一下。”林彪恍然想起他过去总结的“宁慢勿错”的经验。“宁慢勿错嘛！可以压几个小时。”他想了想，又说：“你把这个电话记录稿，再送给叶群看看！”我去的叶群，把林彪口述的六条记录稿给了她，她看了上眼，对我说：“首长叫打电话，你们就打呗！对打仗的事，我不大懂，他（林彪）比我高明。不过你们当秘书的，有责任帮助首长想得周到些。你看这里有什么问题没有？”“我看不出什么问题。”我故意绕了个弯子，然后才表示：“但如果想得周到些，我有两条建议。”“哪两条建议？”叶群蛮有兴趣地问。我说：“第一，这样大的问题，最好请示一下毛主席。”“对，对，这个建议好。”叶群连忙表示赞同，同时解释说：“首长这是在战争时期养成的作风，遇有紧急情况，就当机立断，后再向军委和毛主席报告。他对毛主席一贯是忠心耿耿的，主席对他也信得过。首长这样做，在战时是允许的。当然现在还没有发生战争，先报告一下主席是应当的。你的这条建议提到了点子上。第二条呢？”“第二，”我接着说，“这里第六条讲的是让二炮部队做好随时发射的准备。二炮是导弹部队，是靠按电钮的。一旦不慎，一次就可能引起一场世界大战。因此，我建议对这一条应加上一些限制词。例……。”“这一条建议也提得对。”叶群不等我说完，就站起来要走。“这不能开玩笑，慎重一些对。走，你随我见首长去，当面建议他改一改。”她一边走一边说：“首长是个军事家，是作大文章的，不像你那样注意个别辞句。不过个别辞句也得讲究一点。”到了林彪那里，叶群一上来就说：“一零一呀！你让张秘书给我看的那份电话稿，我看过了。”“看过了，那好嘛！”林彪坐在沙发上，笑着打趣说。叶群也坐下来，对林彪说：“你提的那几条，我看都很重要，也很好。不过我想提两条建议，你爱听吗？”“什么建议？我想听听。”叶群重复了我说的那两条意见。把我的建议说成是她的建议，大概叶群是想加重一下建议的份量，也显示一下她在林彪面前的份量。“同意。就照你说的意见办。”从林彪那里出来后，叶群就向我布置说：“你把这份电话稿照抄一份给我。向主席那里报告，由我负责。传给黄永胜，由你负责。”“再压多久呢？”我问。“两个小时就够了。”叶群说。两个小时之后，即当晚七点左右，我用电话把林彪口述的六条指示传给了在北京的黄永胜。过了几天之后我从军委的收电中才知道，黄永胜通过总参作战部向全军传达的林彪指示只剩下了四条，并给冠以一个十分明显的标题‘林副统帅一号战斗命令’。【注17】（《毛家湾纪实》316—319页）从张云生这位当事人的回忆中我们了解到，这个所谓的一号命令的标题是黄永胜等人传达时加上去的，原文并无此命题，此其一。其二是该项命令和此前的战备疏散并无直接关联。其三是张云生建议叶群应该对毛泽东就此事做一个提前汇报，叶群答应了，林彪也答应了，但是究竟什么时候做的汇报呢？《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的1564页中记载：“命令下达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

报告毛泽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这里所说的“第二天”也就是10月19日，关于这一时间，知情人之一的时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汪东兴回忆道：“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他们先送交周恩来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注18】（《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4页）从以上两处的记载看，林彪确实晚了一天才报到毛泽东处，这和林彪以往的习惯大相迥异。我们前面提到过，为了是否调用一少部分部队去支援地方，毛家湾都不肯先行表态都要报经毛泽东批准，林彪不论大事小事都要报请毛泽东，这点毛泽东也曾表扬过他。然而，此次林彪却意外的“先斩后奏”，难怪毛泽东殊不高兴，汪东兴回忆：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脸不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火柴一划把传阅件点着，给烧了。接着，他又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烧了。”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通知没有？”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总理惊诧他说：“烧了？”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注19】（《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4、15页）此时已经靠边站的朱德在得知“一号令”之后也说：“现在毫无战争迹象，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其实不但朱德如此看，连毛家湾的林立果都认为所谓的战争是根本发动不起来的，林立果说：“我们是紧急战备，苏美也是紧急战备，很可能是双方都摸不清对方意图，两头都担心对方先动手。”以林彪的军事素养能不清楚当时中苏的军事状况吗？而且，这种战斗命令的下达并非是在战争非常状态下发出的，提前给毛泽东汇报也不见得就贻误战机。所以，无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看，林彪发布的“一号令”其潜在的政治试探涵义远远超过命令本身的军事涵义。而这也正是毛泽东大为不快的主因所在。

就在“一号令事件”发生后的半年，一场围绕是否设立国家主席的争论彻底把党内高层的分歧端了出来。

毛泽东在“九大”上就一再表示出准备把国家从动乱中抽身的想法，文化大革命中显赫一时一度取代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怪物—中央文革也在毛泽东手中勾决了。毛泽东说：“中央文革不要加了，是管文化革命的。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用常委。”【注20】（《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1547页）此前，中央文革是加载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之后的，此时毛泽东如此表示特别是提出“文化革命快要结束了”，这说明毛泽东的心态是倾向于“求稳”。中央文革的取消让江青颇多牢骚，她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与“求稳”相对应的是毛泽东再次公开表达他对个人崇拜过头现象的不满。他看到银幕上多次播发他的镜头时就闷闷不乐的说：“哪有一个人老看演自己的电影？我的镜头太多了，没什么意思！四个伟大，太讨厌！”他还说：“人的一句话怎么能顶一万句呢？一句就是一句，不能是一万句，不能顶，更

不能顶那么多。”这些话是毛泽东在1969年5月到武汉休养时说的，武汉军区负责人之一的刘丰就是林彪的亲信大将，毛泽东这些话应该不会一点都不落入林彪的耳中的。

毛泽东在1968年9月亲笔删除提法为“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类文革以来红极一时的“赞语”，接着又在1969年6月由他批示发布《关于宣传毛主席形象应注意的几个问题》，有步骤的开始给“四个伟大”一类的东西降温。与此同时，四届人大的事情给提到了日程上来。

四届人大需要做的非常重要的一章就是取消原来的“国家主席”这一节，这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1970年3月7日，毛泽东让汪东兴回京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传达他的这个意见。3月8日晚，汪东兴就向包括周恩来、叶群在内的中央政治局成员传达了毛泽东的意见，与会者都表态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还专门叮嘱叶群转达此意见给远在苏州的林彪。而林彪则通过叶群在3月9日向在京的吴法宪、黄永胜转达他的意见：“林副主席赞成设国家主席。”这是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第一次违拗毛泽东的指示。在3月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成立了两个小组，一个是有周恩来、张春桥、黄永胜、谢富治、汪东兴组成的负责四届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工作的小组；一个是有康生、张春桥、吴法宪、李作鹏、纪登奎组成的修改宪法工作小组。3月中旬，毛泽东在审阅《关于修改宪法问题的请示》及其附件时再次表示不要设立国家主席。林彪委托秘书带话说：“林副主席建议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毛泽东也委托秘书回敬：“问候林彪同志好。”这是林彪第二次违拗毛泽东的指示。4月初，毛泽东在审阅有关报刊杂志送审文章稿件时删去了诸如“毛泽东同志就是当代的列宁”一类肉麻的吹捧，而这些吹捧用词都是林彪平素经常提及的，毛泽东批示传阅在政治局时，林彪未作表态。4月11日，林彪通过林办秘书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值班人员传达他的三条意见：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林彪的意见在政治局讨论后，有部分政治局委员附和林彪的意见，但4月12日，毛泽东就此立即批示：“我不能再作此事，此议不妥。”4月下旬，毛泽东回京后，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所指的比喻道：“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这段话是当着林彪的面说的。这是毛泽东第三次公开表态不设国家主席和自己不愿意担任国家主席，而且毛泽东在引用“曹操、孙权”的历史典故以林彪的在这方面的“智商”应该明了毛泽东的态度和心思。然而，在5月中旬，林彪告诉吴法宪说，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还要求吴法宪、李作鹏在宪法小组会上提出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7月，叶群私下跟吴法宪说：“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7月中旬，在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

会全体会议期间，设立国家主席的呼声再起，毛泽东严正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7月18日，周恩来在小组会上发言说：“可以考虑不设国家主席、副主席。”7月下旬，为纪念8.1建军节，中央“两报一刊”（《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准备发表题为《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社论。在7月27日讨论社论稿时，陈伯达主张将“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毛主席和“这四个字去掉。恢复以前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缔造和领导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张春桥不同意，双方发生争执，最后请示毛泽东定夺。毛泽东说：“这一类的应景文章，既然政治局已经讨论过了，我就不看了；至于提法问题，这无关紧要。”稍后，毛泽东又和汪东兴说：“两种意见，我都不赞成。缔造者不能指挥，能行吗？缔造者也不光是我，还有许多人。”毛泽东让汪东兴代他圈去“毛主席和”四个字。8月13日，又引发了后来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两大争论中的另一争论即著名的“天才之争”。张春桥以毛泽东本人曾经提出“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马列主义是个讽刺”为由主张删去宪法草稿中“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和“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词句，吴法宪反驳：“要防止有人利用毛丰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件事事后，吴法宪和陈伯达、黄永胜都谈了，还通过黄永胜汇报了林彪，他也向周恩来做了汇报，林彪对吴法宪的反驳表示赞赏。同时，林彪告诫黄永胜、吴法宪说：“要多小心，这件事没有完，到庐山会有大的斗争。”

以上是第三次庐山会议（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之前，在“设立国家主席”和“天才”两个问题上的全部争论过程。因为“天才之争”的重头戏主要发生在庐山会议期间，所以，我们这里着重看看毛泽东、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的微妙态度。

先来看一下毛泽东为什么不同意设立国家主席和为什么不愿作国家主席。关于毛泽东不同意设立国家主席的原因，王年一在他的《大动乱的年代》中如此叙述：“毛泽东提出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与错误的打倒国家主席刘少奇相联系，与错误地得出所谓大权旁落的教训相关联。”（参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393页）毛泽东曾经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十七年来，有些事情，我看是做的不好，……想要使国家安全……就搞了一个一线、二线。现在看起来，不那么好。”【注21】（《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1450页）这应该是毛泽东不同意设立国家主席的主要原因。至于说到毛泽东不同意自己再度出任国家主席也是有着历史原因的，毛泽东本人早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就多次提出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有些民主人士还想不通，毛泽东专门做了他们的工作。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这件事上得到了中央的认同，不消说林彪也是认同者之一，至少是知情人之一。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继任者是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刘少奇被打倒，他的国家主席的职务自然也就取消了，如今毛泽东如果重作冯妇、再次出任国家主席的话，容易在国内外造成一种误解，似乎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为了重新夺回国家主席的位置，这种误解等于说模糊了毛泽东自己认定的文革的“伟大意义”，这是毛泽东不愿意看到

的。而且，在当年辞去国家主席的原因中，毛泽东已经说的十分明白，主要是集中精力处理一些大事，避免因国家主席本身带来的繁琐礼节影响他的主要思路。1970年，毛泽东已然77岁高龄，比起1956年来更加年迈、精力更加有限，这时候请他出任国家主席就身体状况而言也是不堪繁剧的。当然，就政治、身体两个因素来说，政治因素是第一位的。

现在再来看看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这件事上的反常态度。林彪于战争年代时在一些问题上曾经和毛泽东有过相左的看法，例如会理会议前后和解放战争的“打锦州”，但是，这些分歧都是从工作角度出发，并不带有什么具体的政治企图，所以，毛泽东在这些事上对林彪的态度都是比较温和的。然而，进入五十年代中后期，特别是林彪进入中共中央高层、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以后，林彪对毛泽东的态度从原来的拥护进一步发展为激烈拥护、热烈吹捧。而且不论毛泽东的决策是否有利于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是否符合中国政治前进的规律，他都无一例外的表示赞成，尤其典型的就是1958年的全军反教条主义、1959年的庐山会议。1960年后，林彪又标新立异的提出“突出政治”，利用“突出政治”大肆神化、吹捧毛泽东，在党内、军内大搞个人崇拜。其中的一些“发明创造”都走到了其他常委之前，甚至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都做了自我批评的情况下，林彪还在继续无端的吹捧毛泽东，给毛泽东的错误辩护。这些都给人的印象是似乎只有林彪最理解毛泽东的战略意图、只有林彪最忠于毛泽东、只有林彪最宣传毛泽东思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公开提出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对于毛泽东的任何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把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推向党史的顶峰。叶群主动提出要把给毛泽东的文件由“请”改为“呈”，还专门发出指示通令毛家湾上下，这份叶群的指示是这样的：主任指示，第一，选文件、打电话时都要提醒，言不离主席；第二，首长（林彪）参加外事活动时，也要提醒；第三，你们要注意礼貌。如，接送主席，他们虽然告知我们不要去，只要一部车到车站，我和首长还是要去。不能只想一面。他们叫我和首长先走，我们不能走，要等主席的车走了以后，我们才能离开。林彪曾经问过他的秘书张云生对他有什么具体的看法没有？张云生回答给他印象较深的是林彪对毛泽东的紧跟，林彪闻言大感兴趣，一定要张云生详细说一说，张云生便说林彪从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在历次讲话中都念念不忘提及毛泽东，紧跟毛泽东、高举毛泽东思想大旗、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等。林彪说：“你谈的两点这第一条非常重要（指紧跟毛泽东这一条），要紧跟毛主席，其实我没什么本事，我的本事都是从毛主席那里学来的。你们给我当秘书，记住这一条很要紧。”【注22】（《毛家湾纪实》227页）行文到此，我们不禁发出疑问，既然林彪如此推崇、崇拜毛泽东、如此鼓动全党、全军向毛泽东“效忠”，而且表态说明毛泽东的每一句、每一举都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当毛泽东屡次三番的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明确表示不设为好时，林彪为什么没有遵循他自己定下来的要求其他人都奉如圭臬的“信条”办事呢？为什么还一而再再而三的违拗毛泽东的意图呢？

如果说林彪在公开场合下的对毛泽东的吹捧是属于敷衍的话，那么在林彪背地里写下的一些东西想必应该反映林彪的心声吧。林彪曾在背后如此写道：“要把大拥、大顺作为总诀，要仿恩（格斯）之于马（克思），斯（大林）之于列（宁），蒋（介石）之于孙（中山），跟着转，乃大窍门所在。要亦步亦趋，得一人而得天下。”林彪还写道：“不负责，不建言，不得罪、要响应，要表扬，要报好消息。”说到底也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意思。可是，一旦到了设立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时，林彪既不“大拥大顺”了，也不“不建言、不得罪”了，而且更不“报好消息”，而是一味的“软顶”、“软抗”，明里拥护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暗地里继续鼓动手下的亲信提出与毛泽东相反的意见即设立国家主席。从林彪的“大拥大顺”观点看，林彪实际上是把这个东西看作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政治手段，也就是说是否真的忠于毛泽东、拥护毛泽东、顺从毛泽东要视乎具体的政治情况而定。是什么样的政治情况呢？我们在前面讲过，林彪的行事作风其实就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一旦关己、十万火急。”的取巧手法。也就是说所谓的具体的政治情况要符合林彪本人乃至他的家族、集团的根本利益，只要符合这一前提，那毛泽东的话自然就是“一句顶的上一万句”，一旦脱离这一前提，毛泽东的话也就可听可不听或者干脆不听。举一个例子，比如江腾蛟的问题，毛泽东已经多次批示过，此人不可重用，甚至也传话给吴法宪，但是，毛家湾头面人物包括林彪、叶群、林立果对江腾蛟一如既往的信用、许愿。症结何在？就是因为江腾蛟对毛家湾贡献很大，用起来无比顺手，所以，毛泽东尽管指示在前，也可以忽略不计了。

回到设立国家主席这个话题上来，林彪为什么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提出设立国家主席呢？叶群说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关于叶群的这句话的具体出处是吴法宪回忆的，也就是吴法宪在1971年10月21日的交待。当中央文献研究室的《周恩来传》编写组1983年11月18日到25日之间再度走访吴法宪时，吴法宪对此仍旧如上那么回忆的。（按：吴法宪在接受此次走访时，已经处于保外就医，在这次和《周传》组的谈话中，吴法宪披露了很多以前没有说过的内情。）而且是不是吴法宪的这一回忆仅仅限于吴法宪一个人即如某些人所说的属于“孤证”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同时期的其他人的回忆，据张耀祠回忆，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程世清在1970年9月2日毛泽东接见他时，他提供了三点信息，其中第二点就是叶群在庐山会议期间见到程世清说过“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的话，当时吴法宪也在场。（具体参见张耀祠著《张耀祠回忆毛泽东》104、105页）这么看来，叶群的这句话可是实有其事的。有人提出，叶群为什么要对吴法宪说，而不是对黄永胜说？因为黄永胜是林彪集团的头号大将。这个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吴法宪虽然不是林彪集团的头号大将，却是林彪集团的头号“管家”一流的人物，毛家湾肯把林立果、林立衡都交给吴法宪照看其本身说明了吴法宪在林彪集团中的显著地位，这里或许就要问一下，为什么黄永胜是林彪的头号大将，而林立果、林立衡二人没有去总参而是去了空军了呢？难道就是林彪为了控制空军？林彪何尝不想控制总参呢？再者，这次宪法修改小组成员之一就是吴法宪，所以，叶群向吴法宪交底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至于叶群话里面提到林彪时直呼其名，有人也认为缺乏真实性，因为叶群一般称呼林彪都是首长或者101，但是，我们认为，叶群和林彪情属夫妻，叶群也曾经在背后还一度称呼林彪为“育容”（林

彪字育容），现在直呼其名又有什么稀奇的呢？何况连江青不也偶尔称呼毛泽东为“润之”吗？还有一种流行说法，那就是吴法宪在1971年10月的交待是迫于当时专案组的逼供信，并且列举了文革中专案组刑讯逼供的例子，这个观点首见于王年一、何蜀所著的《设“国家主席”问题论析》（发表于1999年的《吉林农业》增刊上）王年一、何蜀认为：“吴法宪这个‘交待’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不久的1971年10月21日作出的，当时他刚被逮捕，正受到中央专案组突击审讯。由那个在‘无法无天’年代里按照最高领袖意旨而设立的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中央专案组搞出来的审讯结果，是否可信？著名记者戴煌在《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一书中谈到中央专案组如何坚持‘两个凡是’，阻挠平反冤案时，回顾了中央专案组在‘文革’中是如何炮制冤案的：‘这些专案组，其凶残冷酷狡诈犹如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刑讯、逼供、诱供和制造伪证成了公开的秘密。’书中列举了中央专案组为逼供贺龙“叛变”和“政变”的材料时的胡作非为：在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中将军的牢房床头吊上300瓦大灯泡，不交待就折腾得他整夜不能睡觉；总参作战部长王尚荣中将被整天罚站，不准小便；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大将被打得昏死过去后，由在场医生弄醒过来又接着打，打得他浑身内伤，血染衣衫，临死前还被从病床上拖下地“向毛主席请罪”；装甲兵副司令员顿星云中将被一拳打瞎了一只眼；成都军区司令员黄新廷中将被通宵达旦罚跪，半边脸被打得乌紫，骨瘦如柴，便浓流血……有的将军就是在这种审讯中被迫‘交待’了贺龙的所谓‘叛变’和‘政变’材料，有的‘交待’后又翻供，再被拷打又‘交待’……如果说这样的专案组对其他将军都残酷无情而对吴法宪却会网开一面手下留情“依法办事”，那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或许有人会说，那些专案组的许多人员不正是林彪集团派去的，专案组的许多违法行为不正是林彪集团提倡和纵容的吗？其实，人们都熟悉“请君入瓮”的历史典故：唐代周兴与来俊臣同为武则天倚重的酷吏，二人曾狼狈为奸以酷刑对犯人逼供，炮制了大量冤案。一旦周兴被控谋反，武则天授权来俊臣对其审讯时，来俊臣也照样会毫不留情地以周兴设计的酷刑来对待周兴了。何况，中央专案组一直由康生、江青直接掌握，而吴法宪是公开反对他们时在前台跳得最凶的，他们岂能不对其恨之入骨而格外‘关照’？再说，直到1972年12月18日，毛泽东才作出了‘应一律废除’他似乎一无所知的‘法西斯式的审查方式’的指示——此时距吴法宪在这种审查方式盛行时作出‘交待’已有一年多了。”

我们注意到王年一、何蜀并没有在行文中列举出吴法宪遭到逼供信的直接证据或者根据来，而是利用一种推论假设的形式借以说明他们的本意的，我们也都知历史不容假设，如果没有翔实的依据，仅凭推理或者推论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也不是研究历史的科学态度。按照王年一、何蜀的意见，既然是江青一伙控制专案组逼供吴法宪等人，那么后来江青被揭露以后，何以这段“劣迹”没有丝毫透露呢？江青、吴法宪之流的相互攀咬的丑剧在审判他们后陆续予以暴露的为数不少，何以独少这么一幕呢？此外，王年一、何蜀所举的许光达、顿星云、王尚荣等人被逼供的例子是不是等同于吴法宪等人也被逼供了呢？显然不是，我们这样说的根据如下：首先，吴法宪在八十年代遭到审判时对自己所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而且也没有任何反诉提出刑讯逼供的书面材料出现，这点可以参见吴法宪的庭审笔录以及伍修权的回忆录。其次，吴法宪的同案犯邱

会作（被判处 16 年有期徒刑，仅比吴法宪少一年而已）后来证实，“除了未用刑罚之外，我在各方面已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囚徒。但是，伙食仍旧是一天一元钱，冬天屋内有暖气。生活上并无很大困难。”（参见《昨夜星辰之五——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之《刑满释放的邱会作》426 页）邱会作谈到这些往事足以说明，在他们被羁押过程中没有受到过刑讯，而且就在黄吴李邱被捕之后，黄永胜还就伙食问题给毛泽东写信，提出改善伙食，毛泽东复信称：“黄吴李邱应该吃好，有资格吃好，也有钱吃好。”邱会作说，在羁押地吃的甚至比在总后机关和西山家里吃的还要好。卫戍部队得到上级的指示是要把黄吴李邱看作特殊的首长，只管三条，不病、不死、不逃，其他的都不管。（参见同上）而王年一、何蜀等人提供的旁证许光达等人当时遭到审查时伙食情况又是如何呢？许光达专案组负责人之一的芦凤歧指示，许光达的伙食费标准按照普通犯人给予，一个月不得超过 12 元。而贺龙还没有被羁押就连饮用水都成了问题，1969 年 5 月，周恩来批告公安部，对在押的人（指那些被打倒的领导干部）“应增加营养食品，防其自行消瘦死亡。伙食应加至 15 元（指每月）以上，并须检查伙食管理。”此外，伍修权有过一个回忆，他说：“1972 年初，· · ·伙食标准提高到每天六角钱，虽然比过去只多了一角五分钱，可是对于当时的我们来说，无异是一个福音。”（参见《周恩来传 1949—1976》下册 1005、1051 页）也就是说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在押人犯的伙食标准才有可能增加到 15 元（每月），而伍修权等人只有在林彪事件出来后才享受到每天增加一角五分钱的待遇，这和邱会作等人相比何异于霄壤？岂能相提并论或者胡乱攀扯？试想，普天之下有没有一个在羁押地吃的比平素还要好但同时却受到刑讯的犯人？八十年代审判结束后，邱会作一度保外就医，因为居住条件不好，邱会作甚至提出要把他送回监狱住，我们再设想一下，如果监狱的条件不好，邱会作岂能如此提出要求？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王年一、何蜀所谓的吴法宪遭到刑讯逼供的旁敲侧击论点根本站不住脚。

2006 年 9 月第一版的由香港北星出版社出版的《吴法宪回忆录》的第 780 页上，吴法宪对这段“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又有了新的解读。他说：“这里我要特别声明一下，过去很多文件及文章都说，这句话是叶群亲自对我讲的，这根本不是事实。实际上，这句话是我从程世清那里听到的，是汪东兴传来的话。叶群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这是一个多年的冤案，我要在这里更正一下。这里当然我有一定的责任，但历史就是历史。当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对我审查时，专案组为了收集林彪有‘野心’的证据，千方百计地诱导我，非要我把这句话安到叶群的身上。我开始拒绝了，后来迫于他们施加的种种巨大压力，就顺从他们，说了违心的话。但我在当时写的材料上，对一些被逼出来的假话都做了记号，怕时间一长，自己也忘了。如果现在还能找到我当时写的材料，就会看到，我当时特地在这句话下面做了记号。（参见《吴法宪回忆录》该书第 788 页。）按照吴法宪的说法，这句话他是从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程世清那里听到的，关于这一点，吴法宪如此描述：“八月二十日，我约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山，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来的人。程世清是东道主，我管飞机。我和程世清过去就很熟悉，所以在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说起，前一天他陪毛泽东上庐山，汪东兴对他讲：‘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高兴，我想汪东兴传的话，就是主席的意思吧。这一下，我感到心里更有底了。”也就是说这段话的出处又增添了一个人即汪东兴说。但是，我们前面给出的《张耀祠回忆毛泽东》的第 104 页、105 页明确的记载了程世清的谈话中点出了这段话的原始出处即“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

是来自于叶群。而且，吴法宪并不是亲耳听汪东兴说的，而是通过程世清之口转达的，也就是说吴法宪的这段回忆也存在着一定的疑点，并不能作为第一凭据借此否认叶群没有说过上述这段话，因为包括吴法宪自己也说“我想汪东兴传的话，就是主席的意思吧”，说明这个只不过是吴法宪的自己猜想而已。更为主要的是，所谓的汪东兴的原话是“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而非吴法宪原来交待的叶群所说的“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按照吴法宪的回忆，汪东兴充其量也就是希望林彪出任国家副主席，而他真正拥护的是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虽只是一个字的区别，而意思却相差万里，其背景更是不可同日而语。

退一万步说，即便是叶群没有提出这句话，那么这段话中反映的情况是不是真的？是不是存在一个“林彪往哪里摆？”的事实？我们不妨来看一看林彪在四届人大之前的所有职务和头衔。林彪当时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部长。一俟召开四届人大，林彪头顶上的国务院副总理肯定要消失，因为林彪在中共“九大”上已经被明确为“接班人”，他不可能以副总理的位置屈居周恩来之下，这也是不符合党内排名标准的。既然副总理位置没有了，国防部部长是否还要兼任也大成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自建国20多年以来（1949年至1977年），兼任国防部部长象征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彭德怀、林彪、叶剑英，无一不是如此。而彭德怀兼任国防部部长和林彪初期兼任国防部部长时，党内的接班人是刘少奇，叶剑英兼任国防部部长时党内的接班人先是王洪文、后是华国锋。换言之，兼任国防部部长远在接班人的地位之下，以接班人之尊是否还能继续兼任国防部部长，不得而知。这样一来，林彪在四届人大召开后头上原有的四个头衔肯定跑去一个、一个摇摆不定，保留的只有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而刘少奇作为毛泽东原来选定的接班人，有四个重要职务即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毛泽东选集》编辑委员会主任。刘少奇的地位虽然是历史形成的，而且毛泽东也亲口说过刘是接班人的话，但远没有林彪的“接班人”的地位在名义上显赫，因为林彪的地位是写进党章的，而且林彪自文革以来还有刘少奇以前不曾拥有的精神头衔那就是“副统帅”、“亲密战友”。有如此之多“优势”的林彪在四届人大召开后非但没有可能“更上一层楼”，反而还要丢失一个或者两个实缺，这是林彪及其集团所不甘心看到的，叶群便说过：“林彪不就是副主席、副总理、国防部长吗？这么多年也就是这么多的工作吗？”以上就是这段“林彪往哪里摆”的全部事实。实际上除却叶群的谈话，林彪集团的另外一个核心成员林立果也有类似的看法。第三次庐山会议前夕，林立果同王维国讲：“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话，101（林彪）可以当嘛。”【注23】（《十年一梦—徐景贤文革回忆录》225页）由此益见，叶群的话绝非空穴来风。

王年一在他的《大动乱的年代》中写道：“林彪身为中共中央唯一的副主席，地位仅在毛泽东一人之下，身体又的确很不好，他是不是对任国家主席感兴

趣，不得而知。即使林彪想当国家主席，这也不是反党行为。叶群的阴谋活动，他是不是知道，也不得而知。”（详见该书 394 页）王年一的这个观点实际上是为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史实进行模糊化处理，第一，他认为林彪未必对国家主席这个位置感兴趣。第二，他认为林彪未必知道叶群的阴谋，这就是所谓的林彪“不知情说”。那么，我们来看看 1954 年版本的国家主席是不是仅仅属于一个荣誉性的位置。根据一九五四年宪法的第二章第二节若干条规定如下：“第四十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第四十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必要的时候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并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最高国务会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长、国务院总理和其他有关人员参加。最高国务会议对于国家重大事务的意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长、国务院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讨论并作出决定。第四十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协助主席工作。副主席受主席的委托，可以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第四十六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因为健康情况长期不能工作的时候，由副主席代行主席的职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缺位的时候，由副主席继任主席的职位。”上面的这几条基本阐述出了国家主席的威权，第一，他是统率全国武装力量，担任国防委员会主席。即使是名义上的。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在必要的时候召开最高国务会议，并担任最高国务会议主席。而这个最高会议的组成人员包括国务院总理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可见，国家主席对国家行政的干预和指导是不言而喻的。因为，最高国务会议对于国家重大事务的意见，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长、国务院或者其他有关部门讨论并作出决定。第三，副主席受主席的委托，可以代行主席的部分职权。而且，在国家主席身体状况不允许的情况之下，副主席可以代行主席的职权。这个版本的国家主席之所以拥有如此之多的权力和当时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有关。不过，在毛泽东卸任后，刘少奇接任国家主席，宪法对于国家主席的权限没有做任何修改。如果在这次宪法修改过程中，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的话，这个版本的这项国家主席的条款也许不用做太大的修改，如果毛泽东不任国家主席的话，那么这项条款就要进行必要的修订。所以，毛泽东干脆提出取消这一章。毛泽东的愿望后来在四届人大上得到了贯彻。1975 年四届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有如下条款，第一章第十五条规定：“第十五条，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民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子弟兵，是各族人民的武装力量。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统率全国武装力量。”不论原来的宪法怎么修改，只要设立国家主席即便不是毛泽东担任这个职务，国家主席对于政府的事务的干预也是一定的。

林彪是不是真的不知道叶群的阴谋活动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叶群之所以在文革中张牙舞爪，并非简单的狐假虎威。如果她的背后没有林彪的支持，很难想象叶群的“指示”、“讲话”会有那么大的威力，会有那么多人盲目服从。张云生在毛家湾工作期间多次见证叶群在林彪面前的面子之大是其他人所不能企及的，1970 年江青送来一批材料有关文艺界的，江青附来信恳切的要求林彪帮忙批一下，林彪在决与未决之间，他首先问张云生，叶群是什么意思？而就当林彪已经决定时，叶群一句话又改变了林彪的主意，林彪连续使用“你

（叶群）看怎么办？”、“就照你的办”一类的语言加诸于叶群身上，其信赖的神情溢于言表。就当林彪在发布“一号令”后就疏散是否停止的问题上，又是叶群一句话把林彪原本传达给黄永胜的命令做了原则性的更动，这一更动让几百万军队无形中多受了几个月的苦。林办的警卫秘书李文普回忆，在庐山会议前，林彪对于在会上如何发言始终有些举棋不定，直到临上车前还在询问叶群的意见。应该说，这才是林彪、叶群这对政治夫妻的本来面目和本来关系。诚如张云生所说的那样：“在关键性问题上，叶群总能在林彪面前当大半个家。”【注 24】（《毛家湾纪实》224、324 页）林彪所提出的关于他对设立国家主席的三点态度（即 4 月 11 日电话记录），据林办的秘书于运深判断，这个三点态度的办法很有可能是叶群想出来的。（参见《毛家湾纪实》384 页）如此之大的事情仍旧要叶群出面想办法，可见张云生的观察不虚。但是，叶群的这个办法乃至形成的办法是不是叶群背后私下进行的呢？也显然不是。因为就在林彪的秘书把这份记录呈报毛泽东处的第二天，在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就在周恩来的主持下召开会议研究林彪的这个态度。假如叶群敢于不通过林彪就搞出这么一个三点基本态度的东西出来，政治局会议开过，林彪岂能不知？那么叶群将何以立足呢？所以，尽管这个主意可能来自叶群（假如于运深的判断属实的话），但真正拍板定策的还是林彪本人，说什么叶群所干的那些阴谋林彪不知情实际是粉饰林彪。

还有就是在设立国家主席这件事上林彪的另一侧面的反常态度也说明了林彪提出设立国家主席的目的绝不是一般性的。林彪在 1967 年曾经口述了一份材料给周恩来，表明他的一个态度，那就是不准出现歌颂他的小说、电影和艺术作品，还有不准喊他永远健康，周恩来以为不用如此，林彪便绕开周恩来直接找了印刷厂印了几千份还到会场散发。林办秘书们甚至还奉了叶群的命令去大街上覆盖吹嘘林彪的大字报。就在中共九大前夕，康生、江青等人提议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党章时，林彪非常“谦逊”的推托。而这种“谦逊”还可以追溯到八届十一中全会收尾时林彪作为第二号人物的那番似乎推辞不掉不得已为之的讲话中去。从那时候开始，林彪在人前人后的最大特点就是谦虚的回避而极力的突出毛泽东。可是，到了设立国家主席这件事开场时，林彪的这些逊避似乎都一扫而光。李作鹏公开说：“林彪担任国家主席较合适，因为他既是副统帅也是接班人。”【注 25】（《文化大革命简史》230 页）**邱会作也在内部讲话中提到要让林彪当国家主席，有的单位甚至给中央写信请林彪出任国家主席，黄永胜本人也看出林彪想当国家主席的意图。**【注 26】（《关键会议亲历实录》751 页）吴法宪甚至回忆说：“毛家湾去不成，汪东兴就请叶群、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一起到他家里坐一坐。于是，我们一行从中南海的新华门进去，一直到了靠水边的小楼，汪东兴的家。我们下了车，随后一起在客厅里闲谈了一会儿，接着话题就转到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这时，汪东兴又对我们说，毛泽东曾经说过，‘要设国家主席的话，只有林彪同志才能当’。（参见《吴法宪回忆录》，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6 年 9 月第一版，该书 775—776 页）按照以往林彪的风格，遇到这种情况时，林彪最有可能的就是立刻予以回避，至少应该让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吴法宪等人不要再涉及此事或者出面做下边“劝进”者的工作。因为如果设立国家主席、如果毛泽东不去担任国家主席，那么国家主席的头衔最有可能落在林彪的头上。（况且林彪还说明他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的职务）特别是当毛泽东也提出要林彪做国家主席（假如吴法宪回忆属实的话，此人的回忆向来水分较大，《超级审判》的作者肖思科对此有过专门的描述。），那么林彪的“逊避”应该更加激烈才对。（林彪在八届十一中全会期间曾就自己的“窜升”发表了大量的如履薄冰的讲话，并且表示“随时准备交班给合适的同志”，详见本书第五章。）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林彪都应该在设立国家主席这件事上采取回避或者消极的态度，这也符合林彪一贯的做人方式即“不要轻易骑上去”。**关于这一点，吴法宪回忆到：“林彪当即表示：‘我不当这个主席，这个不妥。应该是毛主席**

当国家主席，这才是名正言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国家主席，没有一个元首，这样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国家主席、国家的元首，只有毛主席来当，别人都不合适。但是毛主席的年纪大了，当国家主席要出国访问，别的国家元首来还要回访，毛主席出国有困难，可以设副主席，副主席可以出国对其它国家进行访问。我也不适合当这个副主席，我的身体不好，不能参加活动，不能出国访问。要设国家主席还是毛主席来当。’”（参见《吴法宪回忆录》777-779页）吴法宪回忆的林彪的谈话的时间是1970年5月17日下午，实际上毛泽东早在4月12日就断然了否决了林彪的有关设立国家主席的意见。况且，林彪也在这段吴法宪回忆的讲话中提出“毛主席的年纪大了”的问题。而林彪的这番貌似谦逊的表白表面上似乎并不以其个人进退萦怀，实质上还是坚持要设立国家主席，即便是在“毛主席的年纪大了……出国有困难。”的情况下还是坚持要毛来出任国家主席，坚持一个已经遭到毛泽东否决的和毛泽东相对立的意见。仅此一点也是与他素来的主张“毛主席画圈我画圈”大相径庭。林彪如此顽固的坚持设立国家主席到底又是为什么呢？林彪的如此超乎寻常的异变说明了什么？

建国后特别是1957年后在毛泽东走上极左之路时，他的观点、思想和提法虽然最后都不免获得通过，但是在提出来的时候都会遇到一些不同意见和看法的，也迎来过各种不同的声音。但是，这些公开的声音中唯独没有林彪的，恰恰就在不少党内领导人对于极左的东西表达不满时，林彪总是独树一帜的站到了毛泽东的一边。往往别人还没有完全领悟到毛泽东的本来意图，林彪就已经在开始吹捧毛泽东了。所以说，按照林彪的这一风格，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即便是其他人都赞成设立国家主席，林彪也应该一如既往的同毛泽东保持一致。换言之，就算是汪东兴这样的毛泽东身边的一等一的“管家”式的亲信提出设立“国家主席”，作为毛泽东的“最亲密的战友”的林彪按照惯例也该一律予以否决，也该积极的站在毛泽东的一边。可是，偏偏第一个不同毛泽东保持一致的就是林彪。（按：这里必须注意的是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的除开毛泽东之外的其他四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林彪是第一个表态坚持设立国家主席的，况且林不同于一般性的常委，他是唯一具有接班人的身份。）而且不是一次两次的不保持一致，而是一再的违拗毛泽东的指示，这还是自1959年以来的那个绝对服从、口称万岁的林彪吗？

特别是林彪提出的那个三点态度，不妨让我们重新温故一番，林彪认为：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林彪还说：“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说毛泽东当了国家主席，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国外的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不适合不知道，但就国内党内军内的群众的心理状态，应该说不论毛泽东做不做国家主席，都应该适合。这里我们引用一段有关的中央文献。1958年11月，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就在这次会议上，中共中央通过了一项决议即《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该决定说：“毛泽东同志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专做党中央的主席，可以使他更能够集中精力来处理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的问题，也有可能使他腾出较多的时间，

从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工作，而并不妨碍他对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毛泽东同志是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的久经考验的领袖，在他不再担任国家主席的职务以后，他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注 27】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 11 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 1 月版，第 647 页。）这项决定开宗明义的就说了，毛泽东辞去国家主席也不影响他对国家工作继续发挥领导作用，而且毛泽东是与不是国家主席，都仍然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袖。这项决议林彪不会不知道，以他揣摩毛泽东的习性他对这个决议的内容根本就不会陌生。按照决议中所说的也就根本不存在林彪讲的“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的现象存在。至于林彪所讲的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国家就没有一个头就更加无从谈起了，因为这项决议已经告诉大家毛泽东不论是不是国家主席，他都是各族人民的领袖，都是中国的“头”。有什么“名不正言不顺”呢？最为费解的是林彪的第三条建议：“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众所周知，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中已经上升到“伟大统帅、伟大舵手”的地位，而林彪也上升到“副统帅”的位置，毛为正、林为副已经形成惯例，如果毛泽东出任国家主席的话，林彪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做副主席，为什么林彪突然提出一个他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的提议呢？用意何在？

林办秘书于运深告诉张云生，当他向毛泽东处汇报了林彪的三点意见后，毛泽东曾说过：“设国家主席，谁当主席呢？反正我不能再当了。那就让董老（董必武）当吧？”【注 28】（《毛家湾纪实》384 页）事后证明，于运深的对毛泽东的这段讲话的回忆基本属实。（按，《中共党史资料》第 67 辑第 157 页中记载毛泽东确曾说过上述这段话。），那么，毛的如此表态无异等于直接封死了林彪途经国家主席的必由之路。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也不提议林彪而是提议董必武。这件事的侧面也说明毛泽东即便是同意设立国家主席也愿意把国家主席变成一个荣誉性的职务，也更愿意让党内的元老出任这项职务，而不准备让林彪兼任。1970 年 5 月 19 日，毛泽东对林彪直截了当的说过：“国家主席还是不设为好，一个人担任党主席和国家主席会被压垮，两个主席会打架，这方面我有体会，你还是当好党的副主席，抓好军队。”【注 29】（《林彪与毛泽东》，冯治军著，皇福国际有限公司 1996 年版，542 页）然而，就在毛泽东明确表态后，林彪仍旧主张设立国家主席，林彪系统的亲信人物继续在为设立国家主席和“天才”奔走，叶群甚至直接告诉吴法宪等人还要坚持设国家主席。在设立国家主席这件事上，江青也表过态说：“毛主席还在，林彪如当国家主席，也不好。”【注 30】（《陈伯达遗稿一狱中自述及其他》134 页）林彪、叶群夫妇一度在文革中标榜的紧跟江青的口号在设立国家主席这件事上也发生了质的变化。

纵观在庐山会议之前的整个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上林彪的所作所为以及林彪集团、家族的所作所为颇多疑点、颇多反常。而解读这个疑点、反常的只有一种，那就是林彪准备出任国家主席，上述的那些表演不过是虚晃一枪，是为了他达到这个目的所作的烟幕。关于这点，林彪集团内部亲信如黄永胜等自然心

领神会，可也多少骗了外面不了解实情的一些人的眼睛，然而，这一切却瞒不过老奸巨猾之辈如康生者，后来康生和毛泽东就说：“他（林彪）愿意当国家主席就让他当去。”一句“他愿意当国家主席”可以说把林彪的本心揭示得一清二楚。林彪释放的烟幕并没有随着毛泽东的批评、指责而修改，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后，国家主席之争伴随着天才之争愈演愈烈，终于成了毛泽东、林彪分手的标志。

### 第三节：炮打张春桥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决定在 1970 年 8 月下旬在江西庐山召开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讨论修改宪法、国民经济计划和战备工作，参加此次会议的人数为 253 人。这是建国后第三次在庐山召开的中央会议，所以也被称作“第三次庐山会议”。

毛泽东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纪登奎、黄永胜留守北京，剩下的中央领导悉数上山，大批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全方位的警戒庐山。各地的相当一部分的中央委员被告知开会却没有得到开会的具体地点和时间，这就给这次会议无形中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不过，神秘也好、重视也罢。上山之初，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心情还是相当不错的。毛泽东上山后很快就去芦林湖游了一次泳，还给庐山上的工作人员周水莲、余山宝等人改了名字。（余山宝改名余宝山、周水莲改名周天。）周恩来在住所的阳台上兴致勃勃的和一些年轻的中央委员比了一场乒乓球，周恩来告诉这些中央委员，会议也就需要三、五天的时间，邓颖超约了几位“大姐”准备在会后去井冈山游览一番。和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心境相比，林彪、叶群似乎也不那么紧张。就在 8 月 22 日，叶群邀请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同游仙人洞，游玩期间，叶群仍旧坚持要他们提出设立国家主席的题目。也就在这一天的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上再度提及关于设立国家主席的问题。除毛泽东外，其他四名常委都主张设国家主席，他们表示根据群众的愿望和要求，应该实现党和国家的两位主席的一元化即在形式上有一个国家元首、国家主席。周恩来提出：“如果设国家主席，今后接见外国使节等外交礼仪活动可由国家主席授权。”康生表示：“设国家主席，这是全党全国人民的希望，我们在起草宪法修改草案时也这么希望，但又不敢违反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处在这一矛盾中，我们感到压力很大。”陈伯达说：“如果这次毛主席再担任国家主席，将对全国人民是一个极大的振奋和鼓

舞。”林彪附和了陈伯达的意见。【注 31】（《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下卷 386、387 页）毛泽东非常不高兴，他说：“设国家主席，那是个形式。我提议修改宪法，就是考虑到不要国家主席。如果你们愿意要国家主席，你们要好了，反正我不做这个主席。”毛泽东还严厉的告诫说：“要把这次全会开成一个团结的胜利的会，而不要开分裂的、失败的会。”

毛泽东的告诫在林彪、叶群看来并不是能够阻止他们原定的计划的。此前一天，叶群说：“首长（林彪）一直坚持天才的提法，有人否定天才，实际是反对毛主席、反对首长。”、“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否定天才、否定十一中全会决定，甚至连国家元首的提法也不同意。”1970 年 7 月间，叶群已经表达过上述的意见，她说道：“首长提倡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经过斗争的，首长讲毛主席是天才，也是经过斗争的，我坚决维护首长讲的毛主席是天才。”文革中流行一种说法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叶群嘴里所要捍卫的“天才”、“国家元首”这些提法恰恰都是毛泽东已经作出了否决的东西，所以，捍卫毛泽东是假，捍卫林彪是真。叶群讲话刚刚结束，李作鹏就和王宏坤、吴瑞林说：“群众对设国家主席反映很强烈，在宪法起草委员中，有人反对提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林立果此时也以军委办事组秘书的身份上了庐山，他对王维国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的话，101（林彪）可以当嘛。”他要王维国特立独行的在华东组坚持设立国家主席，王维国领命而去。

林彪也没有闲着，他在上庐山之前就对黄永胜说过：“到庐山会有大的斗争。”他本人先后找了吴法宪、陈伯达密谈。8 月 22 日常委会后，陈伯达再去林彪处密谈。林彪在征求了叶群的意见后，决定在全会开会时把既定的一些想法端出来。陈伯达回忆说：“在庐山全会正式开会之前，林彪个人单独在一个房间里同毛主席谈话，周恩来同志和我与其他人，都在另一个房间等待，时间并不很短。毛主席和林彪单独谈话以后，大会开了。”【注 32】（《陈伯达遗稿一狱中自述及其他》118 页）关于毛泽东、林彪之间的这次谈话内容，吴法宪曾经有过一段旁白：“林彪告诉毛主席他要讲话，毛问，讲什么？林答，主要是天才问题，现在党内有人反对天才。毛问，谁？林答，张春桥。毛没说话。”【注 33】（《风云 9.13》230 页）从林彪提出张春桥的口吻看，这次林彪准备率先开刀的就是张春桥。这又是为什么呢？

张春桥自从文革之后窜升到中央，深得信任，又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跻身“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此次又忝居宪法修改小组成员，他是钓鱼台江青集团的头号大将兼亲信。林彪何以选择他作为突破口呢？据说，毛泽东曾经和林彪谈起过林彪之后谁来接班的问题，内中提到了张春桥，林彪因此对张开始设防。【注 34】（《大动乱的年代》388 页）还有一次，毛泽东问林彪，你看将来谁当总理合适？林彪说他没有考虑，毛泽东说，我看就是张春桥。林彪没说话。【注 35】（《风云 9.13》216 页）林彪向来对自己头上的接班人的头衔抱有一定的敏感，他说过：“我这个接班人是不保险的，不可靠的，现在没有人。刘少奇不也当过接班人吗？”叶群对此也

深有同感，叶群说：“九大以后，在苏州，他（林彪）转氨酶高，我们俩人都哭了。他哭政治上的，我哭主要是政治上的，加上责任上的。”、“他的身体和毛主席比，差的很远，拖不过毛主席。”【注36】（《林彪：1959年以后》209、263页）

我们注意到，林彪对于在党内比较具有潜力特别是有可能成为毛泽东接班人（不是已经明确的，故刘少奇不在此列）别有一番浓厚的介意。如文革前的邓小平和文革中的张春桥。邓小平是毛泽东提出要保护的、要给出路的，而且毛泽东还要邓去找林彪谈话，想来邓去谈话前，毛泽东应该和林彪打过招呼，然而，林彪并不买帐，和邓小平谈了一次就谈崩了。有关会议上本来批邓不是既定内容，林彪却鼓噪着大谈邓的错误。如果说林彪对于邓小平忌恨之中还有一些忌惮，那么他对张春桥除了忌恨之外就是轻蔑了。林彪在和黄永胜、陈伯达、吴法宪等人谈话时十分蔑视的谈及张春桥：“张、姚是无名小卒，不知是从哪里冒出来的，也没有做过什么大的工作，不过是个小记者。”毛泽东问过张春桥：“李富春这个人怎么样？”【注37】（《风云9.13》222页），李富春很早就追随毛泽东，是典型的老资格，又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批准选举出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还是国务院副总理小组组长。毛泽东征求张春桥对李富春的看法本身说明了当时毛泽东寄予张春桥以错误的信任。林彪却在毛泽东面前旁敲侧击的表达他对张春桥的不满，他在回答毛泽东何以防止修正主义时说：“还是要靠黄吴李邱这些个从小跟毛主席干革命的人，防止小资产阶级掌权。”这里的“小资产阶级”指明就是针对张春桥的。张春桥又在宪法小组会上反对使用“天才”，还说这是一个讽刺，这就更让林彪感觉到张春桥的咄咄逼人。从接班的政治上考虑，林彪认为首先把张春桥拿下来比较符合林彪集团的切身利益，同时也不失为一着妙棋。因为在林彪看来，张春桥身上的劣迹实在太多、民愤实在太大。当初喧嚣一时的“二月逆流”的起因就是谭震林怒斥张春桥扣押陈丕显。一大批党内、军内的老干部对这位文革新贵一肚子怨气，而且张春桥、李文静夫妇都有严重的政治历史问题，有据可凭、有章可查，这些都是炮打张春桥最为有力的炮弹。更为主要的是，在1968年4.12炮打张春桥的过程中，毛家湾曾和钓鱼台联手收拾张春桥，说明在江青眼中，张春桥并非那种完全信得过的人。既然江青可以炮打张春桥在先，为什么他林彪不能整肃张春桥在后呢？应该指出的是，第三次庐山会议期间，所谓的“天才之争”都是表象，真正反映其实质内容的就是“炮打张春桥”，这是林彪集团极为关键、重要的一步险棋。

现在我们还是先回来看一下全会的过程。1970年8月23日下午4时，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周恩来宣布会议议程后，林彪便开始了长篇讲话，林彪说：“昨天下午，主席召集了常委会，对这次会议作了重要指示。这几个月来，主席对于宪法的问题和人代会的问题都是很关心的。宪法的修改、人代会的召开问题，都是主席提出的。我认为这很有必要，很合时宜。在国内、国外大好形

势下开人代会和修改宪法，对于巩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反帝反修斗争，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是有深远影响的。”毛泽东同志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毛主席是我们党、政府、国家、军队的缔造者。……我们有今天的胜利，决定的因素就是毛主席。这次我研究了宪法草案，表现出这样一个特点，就是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无产阶级专政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毛主席的这种领导可以说是我们胜利的各种因素中间的决定因素。……这个领导地位，就成为国内国外除极端的反革命分子以外，不能不承认的。……我们的工作前进还是后退，是胜利还是失败，都取决于毛主席在中央的领导地位是巩固还是不巩固。”他强调说：“我们说毛主席是天才的，我还是坚持这个观点。……这次宪法里面规定毛主席的领导地位，规定毛泽东思想是领导思想。我最感兴趣的、认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一点”林彪的讲话突出了两点，一个是元首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在林彪的讲话中虽然没有明确的提到设立国家主席的事情，但是，林彪却使用了一个“元首”的词汇，原来本可以说成的“无产阶级专政统帅”的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元首”，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中“元首”的解释即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来判定，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元首”其实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最高领导人”、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主席（总统）”的同义词。说起来这个词虽不那么惹眼却费去了林彪诸多心血。林彪此人一向言简意赅、不多罗嗦，想来这次的讲话特别是这个词的遣用，林彪是别有用意的。所以，后来陈伯达的讲话中就直接使用了“国家元首”这个词，说明林彪的用心在其响应者那边已经得到了融会贯通。而“天才”则是给国家元首即国家主席问题的一个推动，既然毛泽东是“天才”，那么“天才”做国家主席简直就是顺理成章、别无选择。可惜林彪机关算尽，却选错了对象。毛泽东何如人？这种“捧杀”的伎俩怎么能够蒙混过关？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回忆说，毛泽东下了会场就很不高兴，吃饭的时间一推再推，饭菜一热再热。或许从这时，毛泽东已经预感到这次全会未必能像他自己希望的那样，开成一个胜利的团结的会，倒是有可能滑向一个新的分裂边缘。

林彪话音未落，康生继起发言。康生说：“刚才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宣布了我们的九届二中全会开幕；恩来同志宣布了日程；特别是我们的林彪同志——毛主席的最好的接班人讲了毛主席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运动中间的伟大历史地位，以及对宪法的说明，我完全同意、完全拥护。”他提出：在群众讨论中，在要毛泽东当国家主席、林彪当国家副主席的问题上，“所有意见都是一致的”；如果是主席不当（国家）主席，那么请林副主席当（国家）主席。如果是主席、副主席都不当的时候，那么（国家）主席这一章就不设了。”，康生又说：“到底怎么样，要请毛主席最后指示，最后定。”康生的话固然肯定了林彪的发言，实际却和林彪发言的内容不尽相同，他提出了一个敏感的话题，那就是如果毛泽东不当国家主席，就请林彪担任，如果林彪也不担任，国家主席这一章完全可以取消，而且这一切都要毛泽东来拍板。康生长于谋算、精于整人，他的这段讲话通篇透着“骑墙”和“和稀泥”，他既看出毛泽东不

愿设立国家主席的一面，也看出林彪准备出任国家主席的另一面，于是两不得罪。此后康生还和毛泽东说过：“他（林彪）愿意当国家主席就让他去当。”结果被毛泽东斥之为“糊涂”。【注 38】（《走下圣坛的周恩来》334 页）康生的讲话刚一结束，毛泽东就宣布散会。

在当天晚上讨论林彪讲话过程中，林彪的录音被重放。一些中央委员们由于习惯了文革这一套无端肉麻的吹捧，而且又是吹嘘毛泽东，理所当然的觉得这都是很有来头、很为“正确”的。吴法宪因为要求重放林彪讲话录音被毛家湾称许“立了大功”。吴法宪对陈励耘、王维国说：“林副主席的讲话讲到了大家的心坎上，你们明天都要讲话，林副主席的讲话，事先报告过毛主席。”他还在小组会上串连了一些空军、总后的中央委员们，对他们说：“你们要拥护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吴法宪应该知道林彪在 4 月 11 日的三点态度中最后一点就是林彪自己提出不宜担任国家副主席，何以这时候还要这些人提议林彪担任国家副主席呢？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陈伯达专门收集了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称天才的一些讲话作为依据。8 月 24 日上午，叶群找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开会，叶群指示：“第一，要拥护林副主席讲话、坚持天才论；第二，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第三，发言不要点名，不要扩大打击面，毛主席那里通不过；第四，今天下午的发言，吴司令（吴法宪）你带个头，定个调子。”

8 月 24 日下午，陈伯达发言拥护林彪的讲话，陈伯达有些激动的说：“我完全拥护林副主席昨天发表的非常好、非常重要、语重心长的讲话。林副主席说。这次宪法中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地位，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写上这一条是经过很多斗争的，可以说是斗争的结果。……现在竟然有人胡说‘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这些话是一种讽刺。……有人利用毛主席的谦虚，妄图贬低毛泽东思想。……有的人说世界上根本没有天才，但是他认为他自己是天才。我们知道，恩格斯多次称马克思是伟大的天才，他的著作是天才的著作。列宁多次称赞马克思是天才。斯大林也称马克思、列宁是天才。我们也称过斯大林是天才。否认天才，是不是要把马克思、列宁全盘否定呢？更不用说要把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笔勾销。我看这种否认天才的人无非是历史的蠢才。”他还说：“有的反革命分子听说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欢喜得跳起来了。”与此同时，叶群、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人也在各大组上做了性质相同的发言。叶群在中南组发言说：“林彪同志在很多会议上都讲了毛主席是最伟大的天才。说毛主席比马克思、列宁知道的多、懂得的多。难道这些都要收回吗？坚决不收回，刀搁在脖子上也不收回！”吴法宪在西南组发言说：“这次讨论修改宪法中有人对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下马列主义的说法，说‘是个讽刺’。我听了气得发抖。如果这样，就是推翻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推翻了林副主席的《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中肯定下来的，怎么能不写呢？不承认，就是推翻了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决议，推翻了林副主席写的《再版前言》。……关于天才的说法，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

大林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毛主席对马克思和列宁也都有过这样的论述。林副主席关于毛主席是天才的论述，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接着，他念了毛主席、林彪以及马、恩、列、斯有关天才的语录）。大家听听这些语录，怎么能说没有天才呢？……要警惕和防止有人利用毛主席的伟大谦虚来贬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李作鹏在中南组发言说：“本来林副主席一贯宣传毛泽东思想是有伟大功绩的。党章也肯定了的，可是有人在宪法上反对提林副主席。所以党内有股风，是什么风？是反马列主义的风，是反毛主席的风，是反林副主席的风。这股风不能往下吹。有的人想往下吹。”邱会作在西北组发言说：“对毛主席思想态度问题，林副主席说‘毛主席是天才，毛泽东思想是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次他仍然坚持这个观点。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胜利、二中全会上还讲这问题？一定有人反对这种说法，有人说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种讽刺，就是把矛头指向毛主席、林副主席。”吴法宪也应该知道所谓的毛主席语录的“再版前言”就是出自张春桥等人的帮忙。

陈伯达的讲话结束后，汪东兴也做了发言，汪东兴也赞成设国家主席，赞成要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汪东兴是毛泽东身边的重要工作人员，他的讲话在干部当中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相当一部分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心思和汪东兴差不多，他们并不知道设立国家主席后面的政治风云，而只是出于文革以来的惯性思维，主张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这里需要提一下陈毅的态度，因为后面批判陈伯达时搞出了一个“二陈合流”的政治诽谤，所以，有必要交待一下陈毅的发言的真相、根据陈毅的秘书杜易回忆，陈毅和他说过他发言的来龙去脉，陈毅根本不清楚在设立国家主席背后的争执，所以，他一旦看到林彪发言中提及毛泽东的那些个赞美之词便联系自己和毛泽东交往接触的历史做了一个客观实际的发言，陈毅在发言中认为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得到锻炼，领导中国革命确实有天才，现在谁否认毛泽东是天才，我坚决不同意。但是，陈毅通篇的讲话并没有完全照录在会议之后的简报上，而是给概括成了一句即“陈毅做了拥护陈伯达意见的发言”。杜易问陈毅为什么事后不做澄清和解释呢？陈毅说，止谤莫如不言，他相信事情的真相总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的。【注 39】（《大雪压青松一文革中的陈毅》217、218 页）所以说，类似陈毅的这种情况至少在老干部中有着很大的市场，他们亲身跟随毛泽东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在他们看来，毛泽东是一个大英雄这是非常朴素的普遍真理。因而，这些人拥护毛泽东担任国家主席包括称颂毛泽东为天才是不能与叶群等人的做法不能同日而语的。

与拥护设立国家主席、拥护天才论的同步进行的就是“揪人”，目标当然就是张春桥。陈励耘后来说：“这年夏天，主席在杭州住了三个月，直到 9 月才上庐山。二中全会开会前夕，我和南萍、熊应堂也一起上了庐山。在此之前，有个重要插曲：空五军宣传处长徐曙，应江腾蛟之邀，到北京写文章。徐带了个江腾蛟的口信回来：‘二中全会要召开了，林副主席可能有个重要讲话，请陈政委注意一下。’又说：‘张春桥是反林副主席的。这次可能要点这个事’

情。”陈励耘又说：“在林彪讲话前夜，忽然有人给我打个电话，劈头就说：‘我是军委办事组秘书，姓肖，肖秘书，住在空军疗养院。’我一听声音，楞了，分明是林立果嘛。接下去就问：‘你在山上同那个姓张的接触过没有？’我说：‘没有。’他又说：‘你不要接触了，这个人有问题。明天上午林副主席在大会上有个讲话，你注意听吧。’接了这个电话，我只管一个人纳闷：林副主席同张春桥到底闹什么矛盾，因为知道南萍同张春桥比较好，我就没有敢把林立果的电话告诉他。”“第二天，我怀着紧张的心情，听林彪讲话。他没有点张春桥的名，只是说有些人企图反对毛主席，怎么样，怎么样。我因为听过林立果的电话，知道指的是谁。回住所的路上，南萍说：‘林副主席的讲话，可能是有所指的。’我只含糊答应：‘是有所指的’。”按照陈励耘的这个回忆，林彪集团早在庐山会议之前就已经跟下面的人交待下去要对张春桥采取必要的手段，由此益见，庐山“揪人”才是林彪和黄永胜所说的那个“大的斗争”也才是林彪最为看重的一个主要环节。徐景贤也回忆说，吴法宪特意找到王维国、陈励耘交了底，吴法宪在手心里写了一个“张”，陈励耘、王维国等人更加清楚火力的交汇点了。

在吴法宪等人的鼓噪下，会场上对那个“陆定一式的人物”做了激烈的炮轰，有人说：“这种人就是野心家、阴谋家，是极端的反动分子，是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没有刘少奇的刘少奇反动路线的代理人，是帝修反的走狗，是坏蛋，是反革命分子，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火药味十足。8月24日晚，华北组2号简报（全会6号简报）出笼，这就是第三次庐山会议的导火索。当晚华东组的发言比较热闹，因为张春桥就在华东组，所以，华东组成了重头戏之一。华东组的情形是这样的：组长是许世友，副组长是杨得志。韩先楚、王洪文、张春桥、徐景贤、王展、陈云、方毅、程世清、周赤萍（福州军区政委）、韦祖珍（福州军区空军政委）、彭冲、南萍、熊应堂、陈励耘也都属于这个组。该组成分比较复杂，既有林彪集团的干将，也有江青集团的亲信。陈励耘回忆说：“我一上来就慷慨激昂：‘林副主席讲话是有所指的。现在有人反对林副主席。反对林副主席就是反对毛主席！林副主席是毛主席亲自指定的接班人。有些人还反对军队干部，整我们军队干部……’我愈讲愈激愤，许世友坐在我面前，还没等我讲完，就回过头来说：老陈，你讲得对！我同意你的意见。最后我说：‘这些人应该站出来说清楚’这一来，会上火药气很浓。别人都不吭声。”休息时，杨得志问我：‘老陈，你讲的有人，到底是谁？’我答：‘什么人反对毛主席就指谁。’晚饭后，我到韦祖珍房里去玩，韩先楚也来了，问我：‘老陈，你到底在讲谁？’我反问：‘你看我讲谁？我不是说过嘛，谁反对毛主席就讲谁。’韩不响，走了。韩一走，韦祖珍拉我散步，说：‘老陈，你说得对，张春桥算老几，他有什么资格？是他反对毛主席！’谁也没有想到没过多久，江青突然来到了华东组，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当着江青的面就说要设国家主席。许世友也说：“我看还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吧。”江青说：“不设国家主席可以减少国家机构的层次，关于这个问题，主席已经做过多次指示，你们也都听过传达。大家还是尊重主席的意见吧。”陈励耘当时顶了一句：“不设国家主席，群众在感情上通不过。”江青说：“群众要我们去做工作嘛。”程世清又说：“毛主席也应该听

听群众的意见吧。”江青只好进一步的说到：“我们要看的远一点，主席不但高瞻远瞩，而且深谋远虑，要知道，设了一个国家主席的位置，就会有人伸手的，主席都考虑到了，至于主席自己，他是坚决不当国家主席的，他说过，不要黄袍加身。”江青还请许世友帮忙劝阻一下，许世友表示爱莫能助，江青离开会场时，这些人仍旧没有意识到江青话中代表的真实涵义。【注 40】（《十年一梦—徐景贤文革回忆录》207 页）

华北组 2 号简报出台后，“揪人”的呼声日益高涨。上海方面因为是江青、张春桥的大本营，所以，他们一起约定坚持毛泽东是天才的观点，但不坚持设立国家主席。候补中央委员金祖敏密告王洪文、徐景贤说王维国最近经常接到吴法宪的电话，还经常单独行动。果然，就在上海方面约定的话音没有完全落地，王维国就再一次单独行动了。8 月 25 日下午，王维国在华东组开了头炮，不点名的声称要“揪人”，这样连久不预政的郭沫若都感到了问题不简单。马天水追问陈励耘，到底要揪谁时，陈励耘告诉马天水，谁是野心家、阴谋家就揪谁。陈励耘因为离张春桥所坐的位置很近，他转过身来对着张春桥大声的说：“自己站出来嘛。”陈励耘的这一身体语言很快让全场为之震动，接着就有人高呼口号要打倒野心家、阴谋家，张春桥一直沉默不语、表情神秘。会议进行到下午四点，许世友突然被叫走，回来后的许世友宣布会议暂停，不开了。还说这是毛泽东的决定。事隔多年，徐景贤转引江青的一段谈话才知道就在这天早上，张春桥拿着华北组简报去见江青说明事态的严重性，江青带着张、姚去见毛泽东，毛泽东还在准备睡觉（毛白天休息、夜间工作），听到江青等人的汇报，毛泽东才知道华北组搞出了这么一个简报出来，于是很快约见各组负责人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毛泽东在会上宣布：“刚才，我和几位常委商量，认为现在各组讨论的问题不符合全会原定的三项议程。又说：“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谁坚持设国家主席，谁就去当，反正我不当！”讲到这里，毛泽东冲着林彪说：“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他还发出警告：如果再继续这样搞下去，我就下山，让你们闹；再不然，就辞去党中央主席职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决定全会分组会立即停止讨论林彪的讲话，收回第六号简报，责令陈伯达等作出检查。会议的突如其来的转向，让林彪措手不及，这位精于应付各种政治风波的老手一时也有些慌乱。林彪有一点颇为自信，那就是自从 1959 年他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以来，在和谭政、罗瑞卿、贺龙、肖华、杨成武等一系列都曾经位列毛泽东“爱将”的较量中，毛泽东几乎无一例外的都站到了他的这一边，让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荣耀。在他看来以他的和毛泽东的渊源、关系以及他在文革中的实际地位、权势，这次发动的“炮打张春桥”即便不能获取全胜，至少也有赢得一定的优势，哪知道毛泽东竟然下令陈伯达检查、停止他的讲话的讨论，还别有深意的告诉他“也不要当国家主席”，名义上是指着陈伯达等人，实际上已经暗中在敲打他自己了。远在毛家湾的林办秘书们接到叶群的电话要求查一条成语“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翻译过来就是“商纣王虽然不好，可也不像人们说的那么坏”，原来这句话是毛泽东对林彪说的，林办秘书们也从这句话的来源似乎看到了庐山风云的一点端倪。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

佐良回忆了一件事，在庐山，周恩来对他说：“我告诉你，邓小平同志就在山下，本来他这一次是可以上山来的，现在看来又不行了。”（参见张佐良著《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个保健医生的回忆》233页）联系到毛泽东在文革中和王力的关于邓小平的对话（林彪身体要是不行了，我还是要请邓（邓小平）出来，至少是常委。），可以想见，在文化大革命从“大乱”走向“大治”的理论的逐渐破产之际，毛泽东又想起了邓小平，特别是林彪等人在庐山的表演令毛泽东大失所望，而只有邓小平才是一个最为合适的力挽狂澜的关键角色。如果说几年之后邓小平的复出是毛泽东的综合考虑，那么应该说至少在第三次庐山会议时，毛泽东已经在考虑邓小平的出山问题了。

林彪发动的“炮打张春桥”其核心还是在为他的天才论、设立国家主席开道，而设立国家主席、天才论是林彪保住接班人位置的两个必要因素。在这场政治斗争中，叶群的威力不容低估，事后林立果专门给林办秘书张云生通过电话，直指叶群坏了林彪集团的大事，“损害”了林彪的“威信”。可是，林立果忘了，如果没有林彪的既定设立国家主席的思路，叶群纵有天大的本领又能掀起几尺波澜？周恩来要吴法宪等人检讨，林彪却告诉吴法宪，没有错，不要检讨，叶群进一步说，还有林彪、黄永胜嘛，大锅里有饭，小锅里好办。叶群此时还没有意识到她所提到的“大锅”也已经岌岌可危了。

#### 第四节：批陈整风

早在中共“九大”之前，毛泽东便已对陈伯达深表不满，他批评陈伯达说：“不干，也不辞职。”中共九届一中全会，陈伯达继续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对陈伯达说：“我没有想到你还列入这个名单里（指常委名单）。江青放言，如果黄永胜当常委，她也要当，有一位同志因此提出，常委名单可以照旧不动。”也就是说本来常委已经同陈伯达无缘，只不过因为毛泽东不同意江青进入常委的行列才意外的“便宜”了陈伯达。然而，“九大”后的陈伯达与毛家湾的关系逐步升温以致于在庐山紧随林彪、叶群其后大谈“天才”、特谈“设立国家主席”，彻底栽进了政治泥坑。用毛泽东的话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要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注41】（《回首文革》第四卷1220页）陈伯达自己也有预感，他在含鄱口散步时垂叹道：“上庐山，我这恐怕是最后一次喽。”后来的发展竟被他言中。

周恩来奉命找吴法宪等人谈话让他们出来检讨各自的错误未果。毛泽东知道这些人也是属于“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一类的人物，于是，就在常委扩大会议不久的8月31日写下了著名的《我的一点意见》的“最高指示”。此前，毛泽东工作经常到深夜，不停的找各级干部谈话。现把《我的一点意见》照录如下：“这个材料(指《我的一点意见》所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作者注)是陈伯达同志搞的，欺骗了不少同志。第一，这里没有马克思的话。第二，只找了恩格斯一句话，而《路易·波拿巴特政变记》这部书不是马克思的主要著作。第三，找了列宁的有五条。其中第五条说，要有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能够很好地互相配合的领袖，这里列举了四个条件。别人且不论，就我们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来说，够条件的不很多。例如，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这一次，他可配合得很好了，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至于无产阶级的天下是否会乱，庐山能否炸平，地球是否停转，我看大概不会吧。上过庐山的一位古人说：“杞国无事忧天倾”，我们不要学那位杞国人。最后关于我的话，肯定帮不了他多少忙。我是说主要地不是由于人们的天才，而是由于人们的社会实践。我同林彪同志交换过意见。我们两人一致认为，这个历史家和哲学史家争论不休的问题，即通常所说的，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奴隶们创造历史。人的知识(才能也属于知识范畴)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有的，是唯心论的先验论。还是唯物论的反映论，我们只能站在马、列主义的立场上，而决不能跟陈伯达的谣言和诡辩混在一起。同时我们两人还认为，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问题，我们自己还要继续研究，并不认为事情已经研究完结。希望同志们同我们一道采取这种态度，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不要上号称懂得马克思，而实际上根本不懂马克思那样一些人的当。”毛泽东在这篇文章中开宗明义的指出了陈伯达的错误，不过有两处值得注意。毛泽东这篇批示的原来的手稿中有一句“陈伯达摘引林彪同志的话多至七条(实际是九条)如获至宝。”但等到文件印发全会前，毛泽东删去了这句话，还把删改件交给林彪看。【注42】(《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1579页)联系到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和林彪说：“我劝你也不要当国家主席！谁主张设就让谁去当。”的话，可见毛泽东此时还是不准把陈伯达、林彪画上等号，也是在等待林彪有所回头。然而，就在《我的一点意见》中毛泽东也说“我这些话，无非是形容我们的天才理论家的心(是什么心我不知道，大概是良心吧，可决不是野心)的广大而已。”毛泽东不认为陈伯达是“野心”发作，说明毛泽东从这时候已经看的很清楚了，那就是陈伯达背后还有人，以他对陈伯达的了解，也知道陈伯达宣传天才、主张设立国家主席是不可能孤立而来的。只是这层意思还没有到点破的时候。

毛泽东希望林彪在这件事上有所表示虽然这种希望并没有特别明显的流露出来。但在林彪、叶群看来，这显然是办不到的。吴法宪后来说过，当时他们都在叶群那里开了会，叶群制定的原则，要检讨，但不能涉及林彪，也不能涉及黄永胜。一定要把林、黄保下来。而且吴法宪这几个人的检讨写的也相当不成样子，明显是应付了事，他们都把责任往陈伯达身上推，强调一个“上当受骗”。9月1日，毛泽东点名批评陈伯达，要陈伯达做检查。此前，毛泽东已经找来叶剑英会晤，在场的还有周恩来。关于毛泽东要叶剑英去面谈的时间目前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原中央警卫部队的邬吉成回忆的8月30日，是周恩来打电话给叶剑英的，而且周还说了“机会难得”的话，叶剑英深夜去毛泽东处，刘兰荪还提着马灯在前面引路。邬吉成回忆，这次毛、周、叶密谈后，《我的一点意见》才印发全会。（参见《知情者说第三辑之七》186页）但是，在范硕的《叶剑英在关键时刻》的一书中则记载是9月1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结束时的一天夜里，叶剑英接到周恩来的电话去毛泽东处，毛泽东交给叶剑英调查陈伯达历史、政治面目的任务。（参见该书330页）两个记述前后相差十天之多，未审孰是孰非。但是，在这次庐山会议结束前后，朱德、董必武、叶剑英又重新走回了政治前台。这也是毛泽东深思熟虑的结果，这个结果所显示出来的信号也是不言而喻的。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在会上一度犯了方向性错误，一经纠正很快就投身到批陈的行列中去，林彪见汪东兴转向，就把汪排除在他所召集的会议之外。处在关键位置上的周恩来可谓心力交瘁，一天早饭后，连续工作了30多个小时未能休息的周恩来突感不适，只好暂时休息了一下。医护人员不得不准备了氧气瓶守在周恩来工作的地点旁边，以防万一。周恩来既要负责继续把全会既定的工作抓好，还要督促陈伯达、吴法宪等人摆正态度，特别是在对待陈伯达的问题上，周恩来显示了他公正、客观的一面，较之林彪、江青等人不可以道里计。

陈伯达被批后，受到毛泽东的接见。毛泽东对陈伯达说：“这两年你都不来见我了。”其他责备的话，毛泽东没有说，倒是临走时还对陈伯达讲：“团结起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可以找和你一块工作的几个人谈谈”，陈伯达先后去见了江青、康生，江青大叫“稀客、稀客”，接着江青带着陈伯达到了康生的住处。康生那里正好张春桥、姚文元也在，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分别向陈伯达撒火，江青骂陈伯达名义上是拥护林彪，实际则是反对林彪；张春桥便指出陈伯达所说的毛泽东不好见是假的，不是事实；姚文元追究一次陈伯达对他的态度。可是，周恩来并没有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方法，仍旧抱着治病救人的方针客观的评价陈伯达的错误。他针对有些人指责陈伯达在大问题上没有和毛泽东配合好的发言说：“在一些大的问题上没有配合，不是在一切重大问题上都没有配合。”这件事颇令陈伯达感动，直到多年以后他还在回忆录中不忘了提上一笔，他说：“在那样条件下，周恩来同志竟这样维护我，更使我感到他对事对人的公正。”【注43】（《陈伯达遗稿一狱中自述及其他》124页）

9月6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举行闭幕式，毛泽东讲话指出：“庐山是炸不平的、地球还是照样转。极而言之，无非是有那个味道。我说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听你的。”“你就代表人民？我是十几年以前就不代表人民了。因为他们认为，代表人民的标志就要当国家主席。我在十几年以前就不当了嘛，岂不是十几年以来都不代表人民了吗？我说，谁想代表人民你去当嘛，我是不干。你把庐山炸平了，我也不干。你有啥办法呀？”毛泽东讲毕，林彪也讲了几句，他说：“这个会议整个进程中间都是主席亲自指导的。会议过程中出现间的问题，主席很敏锐地发现了，顺利地解决了。这个会，可能成一个是团结的会，还是个分裂的会？经过主席的这种指导，依然变成了一个团结的会，胜利的会。”林彪的讲话已经底气不是很足。尽管此前，叶群领着吴法宪等人去见了江青，声称对不起毛泽东、江青，江青却说，这都是陈伯达与张春桥的文人相轻，彼此之间还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双方的相互吹捧多少分散了一点自批陈以来的紧张空气，可林彪深知，他们在庐山的所作所为绝不是轻易的能够滑过去的，而且毛泽东也不是江青，毛泽东历来在重大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9月中旬，中央决定成立陈伯达专案审查小组，由周恩来、康生、李德生负责。9月16日，毛泽东和汪东兴谈话，毛泽东说：“我们军委办事组内有几位同志也上当了。发言时，一个口径，用一样的语录，连林彪也受他们的骗。据说他要写信给我，叶群和他们（指黄永胜等人——作者注）不让写。我劝林应好好地想一想，表一个态嘛！今天未想通，待想通后表态也可以。”【注44】（《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62—65页）毛泽东此时已经对庐山会议上黄吴李邱等人的活动起了疑心，认为这里面“另有名堂”，其实不仅毛泽东这么看，一些军队上的领导人也是这么看的，例如福州军区司令员皮定钧就如是看。9月19日，毛泽东在丰台车站召见了陈先瑞、纪登奎、吴德等人，毛泽东又说：“庐山开会，有人反对现在修改的宪法，这是康生、春桥他们搞的，是按我的意思写的。天才问题，关于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九大新党章起草时和这次修改宪法，康生等同志几次写上，三个副词我都勾掉了。不设国家主席，也是我提的。陈伯达明明白白知道这件事，而他却说这是反对我的。”“要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三十本多了，可选读一些，使大家知道马列主义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不要以为马、恩、列宁是外国的，就不读了。”据吴德事后回忆，毛泽东的这番话让他想到了陈伯达背后可能还有人，可能这个人就是林彪。毛泽东话里的“陈伯达明明白白知道这件事”指的虽然是陈伯达，实际上也在点林彪、叶群的名，他们同样也知道毛泽东不同意“天才”那句话，同样也知道毛泽东不主张设立国家主席。

几乎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在做进一步的部署工作，他要求邮政部门，今后不准在邮票上印毛泽东像、语录和诗词。周恩来还要求出口商品包装上也要做好类似的检查工作，他说：“这样到处印毛主席的话是不严肃的，是对毛主席的不尊重。什么事搞极端了，总是走向反面。”回京后，周恩来批评吴法宪：“为什么要把林立果说成是‘超天才’？”此外，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指示要求黄

吴李邱作出深刻的反省、检查，彻底割裂和陈伯达的关系。吴在检讨中先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主席亲自主持的二中全会，干扰了林副主席，破坏了主席教导的要把全会开成团结的会、胜利的会的方针，我内心万分沉痛。”至于为什么这么做，吴法宪解释为“由于我对陈伯达这个坏人没有识破，盲目地认为他读的书多，是‘理论家’，所以对他搞的语录就相信，根本没有通过自己的脑子想一想是否对，在发言时就念了这些语录，上了当，受了骗”，是自己“政治上极端幼稚”的表现。”无独有偶，叶群的检讨也是一个调门，“也讲了天才问题，本来不准备发言，后来听其他同志发了言，又听说会议快要转到讨论国民经济计划问题，自己也憋不住了，也讲了这个问题。由于情况没有核实清楚，误以为主席思想的贯彻受到阻碍，发言时很激动。”“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毛泽东对吴法宪、叶群等人的所谓检讨大为不满。毛泽东多次在吴法宪、叶群等人的检讨上面写出一针见血的意见，其核心直指他们的内里。

汪东兴回忆道：吴法宪在检讨书中讲到他在庄严的二中全会上，在关系全局性的原则问题上，事先没有请示政治局的同志，更未向主席、林副主席请示报告。毛主席在这段文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又在旁边写道：“作为一个共产党人，为什么这样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由几个人发难，企图欺骗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有党以来没有见过。”在吴的检讨书中讲他自己的发言“不从全局考虑，不顾影响，不考虑后果，这是极不严肃、极不慎重的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段话的下边，毛主席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着：“这些话似乎不真实。”在吴法宪谈到陈伯达是“大野心家、大阴谋家、反党分子”这句话的下边，主席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陈伯达“是个可疑分子。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揭发过，又同个别同志打过招呼。”吴法宪交代8月23日晚12点前后，陈伯达来找他和李作鹏、邱会作，谈到过关于“天才”方面的问题。毛主席在这段话下边也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办事组各同志(除个别同志如李德生外)忘记了‘九大’通过的党章，林彪同志的报告，又找什么天才问题，不过是一个借口。”当毛主席看到吴的检讨书写到“他(指陈伯达——作者注)还说，主席也批评了你们，我们问他主席批评了什么，他不肯说。……说话神态异常，说时支支吾吾”时，毛主席在旁边批示：“无非是想再骗你们一次，企图挽救他自己。”吴法宪的检讨书中揭发8月27日晚上12点以后，陈伯达来问他讲没讲过“有人利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伟大谦虚，贬低毛泽东思想”这句话，毛主席在“伟大谦虚”四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有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在庐山我的态度就是一次反潮流。”吴法宪提到陈伯达8月27日晚上核对上面那句话时，看到陈的发言稿上有“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一句话，吴法宪认为这是“造谣”。毛主席在“中央委员会也有斗争”这九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这句话并没有错，中央委员会有严重的斗争，有斗争是正常生活。”当毛主席看到吴的检讨书中写道“……他只参加过两次会，也没有提出什么意见，怎么能这样做，并且告诉秘书不要答复他”这句话时，在旁边批道：“这样对。”10月12日，叶群也向毛主席交出了第一次书面检讨。

承认“我犯了严重错误，干扰了主席，干扰了中央和到会同志，……心情是沉重的”。说毛主席国庆节在天安门城楼上对她的谆谆教导，使她受到极大的启发和教育。但叶的检讨书中把她的问题说成是上了陈伯达的当，自己在九届二中全会上发言的“动机是出于对主席和主席思想的热爱，但效果是很不好的”。10月15日，毛主席看了叶群的检讨，并作了批示：“此件已阅。”并在装检讨书的信封上批示：“林、周、康及其他有关同志阅后退中办存。”叶群在检讨书中说，她“这次犯的错误的严重的是路线性的”。毛主席在“路线性”三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一句：“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叶群在检讨书中谈到她在北戴河时，连续接了几个这方面反映情况的电话。而她没有注意核实情况时，毛主席在旁边写道：“爱吹不爱批，爱听小道消息，经不起风浪。”叶群在检讨书中引用毛主席讲过的话“一切结论产生于调查情况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头”。毛主席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并在旁边批道：“这是马克思的话，我不过复述一遍而已。”叶群在讲到林彪要写信给毛主席，她出来劝阻，结果帮了倒忙时，引了毛主席过去讲过的话“矛盾，以揭露为好。要揭露矛盾，解决矛盾”。毛主席在这句话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了这样一段话：“一个倾向掩盖着另一倾向。‘九大’胜利了，当上了中央委员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线抛到九霄云外，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风，请同志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呢？”叶群在检讨书中写道，九届二中全会上她接到军委办事组寄给她一份论天才的语录。毛主席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们为何这时又向马列求救，题目又是所谓论天才，不是在‘九大’论过了吗？为何健忘若此？”叶群说自己“不加分析地”部分引用了论天才的语录，这就间接地上了陈伯达的当。毛主席在“不加分析地”五个字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直接地利用材料，所以不必加以分析。材料是一种，无论谁搞的都是一样，难道别人搞的就不算上当吗？”叶群还说什么她对陈伯达的反动本质认识不足，警惕不够，因而过去对他的斗争不够有力。毛主席在旁边写道：“斗争过吗？在思想上政治上听他的话，怎么会去同他斗争？”叶群在检讨书中还对陈伯达提出了一些疑问。毛主席在旁边写道：“不上当是不会转过来的，所以上当是好事。陈伯达是一个十分可疑的人。”叶群表示要按毛主席的教导认真读几本马、恩、列、斯著作，联系实际，改造世界观。毛主席在下边划了一道杠，在旁边写道：“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共产党人不读一点马列怎么行呢？我指的主要是担负高级职务的人。”在叶群的检讨书末尾，毛主席写道：“不提‘九大’，不提党章。也不听我的话，陈伯达一吹就上劲了，军委办事组好些同志都是如此。党的政策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除了陈待审查外，凡上当者都适用。”【注45】（同【注44】，该书67—71页）

毛泽东给吴法宪、叶群的书面批示，林彪当然能够看到，但是，林彪却没有积极的反应。于是，毛泽东决定进一步采取措施，在背后再击一掌促其猛醒。11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高级干部学习问题的通知》。传达了毛泽东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关于党的高级干部要挤出时间读一些马列主义著作的指示，建议各单位干部读六本马、恩、列著作和五本毛泽东著作，即：马克

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法兰西内战》，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国家与革命》，毛泽东的《矛盾论》、《实践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1月16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央作出《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指示说：“在党的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采取了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制造谣言，欺骗同志的恶劣手段，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伟大领袖毛主席洞察一切，立即写了《我的一点意见》一文，粉碎了陈伯达的反党阴谋，拨正了全会的航向。在毛主席亲自领导下，全会揭露了陈伯达反党，反‘九大’路线，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严重罪行，揭露了他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这是我们党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指示要求凡是了解陈伯达的情况和问题的人，要进行检举、揭发，将揭发材料报送中央，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我的一点意见》还经过毛泽东批准向地、师一级干部传达，“批陈整风”自此开始。11月6日，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成立，这个组织宣传组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领导，直接管辖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光明日报、中央编译局，工、青、妇中央一级机构和所属的五·七干校也归这个组管理、该组组长为康生，组员包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李德生、纪登奎。中央组织宣传组的成立在组织上分割了林彪集团的权力，遏制了林彪集团的膨胀。但是，这个组织后来被江青集团利用并且成为江青集团扩张的工具，特别是康生称病、李德生调走后，江青集团控制了该组的实际权力。

林彪集团的势力主要分布在军内，针对这一现象。毛泽东决定改组北京军区。任命李德生为北京军区司令员、谢富治为第一政治委员、纪登奎任第二政治委员，谢富治任北京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李德生任第二书记（后为第一书记）、纪登奎任第三书记。毛泽东还派纪登奎、张才干进入军委办事组，在林彪集团内部开始“掺沙子”。

在舆论上继续推进“批陈整风”，中共中央连续发出《关于扩大传达反党分子陈伯达问题的通知》、《关于把批陈整风运动推向纵深发展的通知》，叶剑英也奉派到福建调查了解陈伯达的历史问题。12月16日，毛泽东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作了批示，建议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一次，各师要有人到会，时间要多一些，讨论为何听任陈伯达乱跑乱说，他在北京军区没有职务，中央也没有委任他解决北京军区所属的军政问题，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毛泽东还点名要黄永胜、李作鹏参加北京军区的批陈会议，此为“华北会议”。

12月18日，毛泽东在和美国友人斯诺谈话时提到：“什么‘四个伟大’（指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总有一天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因为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其他的一概辞去。斯诺问：过去是不是有必要这样搞啊？毛泽东说：过去这几年有必要搞点个人崇拜。现在没有必要，要降温了。斯诺又问：我有时不知那些搞得很过分的人是不是真心诚意。毛泽东又说：有三种，一种是真的，第二种是随大流，‘你们大家要叫万岁嘛’，第三种是假的。你才不要相信那一套呢。”【注46】（《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1586页、《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73页）“四个伟大”的发明权在林彪手里，毛泽东这是又一次公开表态称“四个伟大”讨嫌，而且这份和斯诺的讲话纪要很快就被批准作为正式文件口头传达到全体党员。1971年1月9日，中央军委召开有143人参加的批陈整风座谈会，这次会议让毛泽东很不满意，因为没有深刻的批判陈伯达，黄永胜等人的态度也是敷衍塞责。1月26日，毛泽东批准下发《反党分子陈伯达的罪行材料》。接下来，毛泽东在布置批陈问题上紧锣密鼓的予以部署。

据汪东兴回忆：军委座谈会和华北会议前期，都没有开好。对此毛主席进行了批评。2月19日，毛主席在关于开始批陈整风运动的指示中说：“请告各地同志，开展批陈整风运动时，重点在批陈，其次才是整风。不要学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更不要学华北会议前期，批陈不痛不痒。”2月20日，军委办事组根据毛主席批评军委座谈会不批陈的问题，写了一个检讨报告。毛主席在这个检讨报告上又批示说：“你们几个同志，在批陈问题上为什么老是被动的，不推一下，就动不起来。这个问题应该好好想一想，采取步骤，变被动为主动。”毛主席在这个检讨报告上还批示：“为什么老是认识不足？三十八军的精神面貌与你们大不相同。原因何在？应当研究。”毛主席对黄永胜等人不做自我检查，不认真批陈是抓住不放的。与此同时，毛主席又强调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认真学好马列著作。3月15日，毛主席对《无产阶级专政胜利万岁》一文批示：“看了一遍，觉得可用。只在十八页上去掉一个词，以便突出马列。十七页上已有了这个词，也就够了。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这个教训非常严重，这几年应当特别注意宣传马、列。”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等迟迟不肯承认错误。不肯作自我批评，直到1971年3月才交出书面检讨。尽管如此，毛主席对他们承认错误作出检讨的行动，仍采取了欢迎的态度。毛主席看了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的检讨后，于3月24日在黄永胜3月21日的书面检讨上作了如下批示：“黄永胜、邱会作、李作鹏三同志的检讨都看了，我认为写得都好。以后是实践这些申明的的问题。只在黄的第二页上有一个注语，请各同志注意。”黄永胜书面检讨的第二页上有段话“过去我对反党分子陈伯达这个人有迷信，被他所谓‘天才理论家’、文化大革命‘有功’、‘小小老百姓’等假象所迷惑。”毛主席对这段话批注：“陈伯达早期就是一个国民党反共分子。混入党内以后，又在一九三一年被捕叛变，成了特务，一贯跟随王明反共。他的根本问题在此。所以他反党乱军，挑动武斗，挑动军委办事组干部及华北、军区干部，都是由此而来。”3月30日，毛主席又对刘子厚在河北省“批陈整风”会议上

的检查作了批示，指出：“上了陈伯达贼船，年深日久，虽有庐山以来半年的时间，经过各种批判会议，到3月19日才讲出几句真话，真是上贼船容易下贼船难，人一输了理（就是走错了路线），就怕揭，庐山会议上的那种猖狂进攻的勇气，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毛主席还在刘的检查的最后一页批示：“这还只是申明。下文如何，要看行动。”4月15日至29日，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中央召开了批陈整风汇报会。参加会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99人。29日，周总理代表党中央在汇报会上作了总结。【注47】（《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75—78页）

这里需要提及的是在华北会议阶段，由于当时的极左大背景，李雪峰、郑维山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吴德回忆说：“我认为李雪峰与陈伯达没有特殊关系，他与陈伯达为首的中央文革小组在有些问题上有对立情绪。”（参见《回首文革》第四卷1222页）李雪峰被开除党籍下放农场劳动，郑维山也被免职。周恩来还在会议上给李雪峰、郑维山等人说情，他说：“定性在先，非打成‘三反’不可，那就不会实事求是。”（参见《周恩来传1949—1976》下册1028页）而且，陈伯达的有些问题，当事人陈先瑞（原北京军区负责人之一）也有不同的看法，陈先瑞认为：“太上皇一说，也不是事实。从根本上说中央文革当时是全国各地的太上皇。……军区（北京军区）没有与陈伯达狼狈为奸，……说‘陈伯达不择手段的插手军队，搞宗派活动，妄图乱军夺权。’在北京军区不是事实。……‘保定问题’不能完全归咎于陈伯达。”【注48】（《陈先瑞回忆录》460页）尽管如此，华北会议所起到的打击林彪集团的作用却不能忽视。

黄永胜是林彪集团的头号大将，毛泽东对他也是责备最严。毛泽东说：“人一输了理，就怕揭。”毛泽东指责黄永胜道：“你黄永胜是个总参谋长，是个头儿。你一天到晚不抓大事，只抓小事，不参不谋，路线问题、团结问题，你就抓不住。什么（总）参谋长，打起仗来我就是（总）参谋长！”连续批黄吴叶李邱（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让林彪坐卧不宁，他恨恨的说：“读马列的书，是为了整军队老干部，整大老粗。现在不让说天才，实际上就是有天才。”就在批陈整风运动深入时，叶群还给吴法宪打来电话，告诉吴法宪说，林彪讲了，他是愿意同黄吴李邱死在一起的。他们几个人还订立了攻守同盟，第一，黄吴李邱不去见人；第二，批称会上多听少说；第三，不要有问必答；第四，会上情况随时通气。邱会作还向叶群保证，说他们这些人不会忘恩负义，林彪保了他们，他们永远不会忘记，要是江青把他们打下去，就是送到农场劳动，也会给林彪养几只老母鸡。林彪对黄永胜、吴法宪说：“一批判陈伯达，这一下把你们几个都带出来了。陈伯达一拖，把你们几个都拖出来了。”【注49】（《史无前例的年代》下册534、540、541、543、544页）

林彪的言外之意就是不准备认帐。1971年3月29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黄永胜、李德生等人一道去北戴河见林彪，目的就是李德生所说的“是毛主席要林彪出来参加一下即将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讲几句话，给他个台

阶下。”但是，林彪除了轻描淡写、不痛不痒的说上几句并不准备参加批陈的整风会。周恩来返京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听后很不满意。他对在场的黄永胜等人严厉的斥责道：“你们已经到了悬崖的边沿了，是跳下去，还是推下去，还是拉回来的问题。能不能拉回来全看你们自己了！”【注50】（《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1589、1590页）大抵毛泽东也看出黄永胜等人当时还不可能马上转向，就告诉周恩来说，对于吴法宪、叶群等人的检讨“可以了”，同时把这几个人的检讨提交政治局会议，作适当处理。林彪始终没有在批陈整风报告会上讲话，甚至连会议都没有出席。不仅如此，林彪还刻意作出两次“不辞而别”企图让毛泽东陷于难堪的境地。1971年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天安门城楼上，勉强而来的林彪既没有和已经就座的毛泽东打个招呼，也没有过多的寒暄甚至连坐也不过坐了五分钟就匆匆离去以致于让在场的摄影师杜修贤大吃一惊。而今天我们看到的唯一的这张林彪和毛泽东最后一次合影的照片还是来自杜修贤习惯性的抓拍。周恩来后来说起这件事时如此谈及：“五一节晚上，林彪上去只呆了五分钟。过去每次去天安门，他都是紧跟，拿着语录，紧跟毛主席后面。……这次他不跟了，对主席恨极了。这天，他本来是不愿意去的，叶群哭着在他面前跪下，苦苦哀求，你要是不去，我们一家人都得死了。林彪答应只来五分钟。”【注51】（《史无前例的年代》下册555页）这次五一节不辞而别还只是一个开端，不久，杜修贤又亲眼目睹了一次林彪的不辞而别。

杜修贤的回忆如下：毛泽东、林彪、周恩来、康生抵达118号房间不久，罗马尼亚客人也到了。我忙着拍摄宾主握手的镜头，待宾主落座后，又赶快拍摄会议的场景。我见会谈的气氛已进入正常的轨道，就退出来到门外的大厅里等会谈结束时再进去拍摄。我刚转了一圈，找了个新华社记者，叫他把先拍的胶卷送到社里冲洗。回到大厅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林彪坐在大厅的西北角，没有坐在沙发上而是坐在一张椅子上。我以为会谈结束了。再看看，主席、总理的警卫员都还在大厅里，他们也和我一样愣愣地瞅着莫名其妙的林彪。不知林彪什么时候从118房间里出来的。我们光着头还热得直冒汗，他却萎缩成一团，帽檐压得低低的，最叫人惊骇的是他那张没有一丝血色的脸，虽然看不见他整个脸庞，但露出的部分足以使人相信那是一张陈列的蜡人的脸。我当时还以为他生了什么急病，奇怪他的警卫员怎么也和别人一样在旁边张望，不叫车送他们的首长上医院？……我回到118房间，毛泽东旁边的沙发空着，和“五一”晚上那个椅子几乎如出一辙。毛泽东泰然处之，兴致勃勃地舞动着手臂和客人热烈地交谈。房间里不断传来毛泽东朗朗的笑声。周恩来平静地微笑着，时时插上一两句话。康生话不多，镜片后面的目光很深，不容易看清。会谈结束了，林彪还没有进来。待毛泽东他们都走了，我收拾完摄影箱，才离开118房间。到大厅里我看了一眼西北角。林彪不死不活地还坐在那，我真想过去问问他是不是身体不舒服？这模样怪叫人心惊肉跳的。我略略地迟疑了一下，立即失去了上前询问的勇气，脑子深处出现了天安门城楼的夜晚，那五光十色下的空椅子。

但是，外界对于上层的政治风波还是一无所知。在 1971 年的全国外事工作会议上，有人还提出，既然韶山已经作为毛泽东的故居开放，是不是也应该把林彪的老家湖北黄冈的林家大湾也作为开放的景点进行宣传，周恩来点了一句：“我看这件事不忙决定。· · ·但是，湖北的同志应该把黄冈那个地方的抓革命、促生产搞好，把林家大湾各方面的工作做好。”【注 52】（《周恩来传 1949—1976》下册 1031 页）

不过，毛泽东心里很清楚，林彪的问题不能继续拖着了，特别是当他得知黄永胜等人在批陈和庐山这几件大事上继续“打埋伏”，不由得勃然大怒，终于决定通过南巡的方式敲山震虎，彻底要林彪从幕后自己走出来。

## 第八章：林彪之死

### 第一节：毛泽东南巡

1971 年 7 月 9 日，就在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抵达北京的当天午夜，毛泽东召见了周恩来、熊向晖。周恩来当即向毛泽东汇报了基辛格的会谈结果，毛泽东却意外的说：“那个不忙。”

事隔多年之后，熊向晖的女儿熊蕾把这次会谈写成文章在收入熊向晖的回忆录《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时命名为《关于九一三事件的一段往事》，我们不妨照录如下：“毛主席深深地吸了一口雪茄，操着浓重的湖南乡音问：那个“参谋总长”姓甚名谁呀？熊向晖一面回答：“黄永胜”，一面感到不可思议：怎么提出这样的问题？而且把“总参谋长”说成“参谋总长”？毛主席又问：你同黄永胜熟悉不熟悉呀？答：到总参以后，在会上认识了黄总长，没有单独接触过。黄总长提到过我。问：他是怎么提到你的呀？答：今年 4 月，黄总长在总参批陈（伯达）整风小结会上说，主席对他讲，总参有篇批陈发言有水平，但主席没有具体讲是哪一篇。黄总长估计，可能是江钟的，也可能是熊向晖的。毛主席说：我指的是你的那一篇。你读过一些马列。熊向晖以为谈到这里，毛主席就该听周总理的汇报了。不料老人家似乎忘记了这件事，抽着小雪茄，继续优哉游哉地同他“漫谈”。熊向晖以为谈到这里，毛主席就该听周总理的汇报了。不料老人家似乎忘记了这件事，抽着小雪茄，继续优哉游哉地

同他“漫谈”。主席问：在那个小结会上，黄永胜还讲了什么？熊向晖感到，说得过于简单，恐怕招致更多的问题。为了节省时间，以便总理及早汇报，他这次回答的比较详细：小结是王新亭副总长念的，吴法宪副总长作了补充，说总参批陈整风搞得很好，自从黄总长主持总参以来，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高，各方面工作都取得很大成绩。主席和林副主席对黄总长是满意的，各大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对黄总长是尊敬的。黄总长很谦虚，说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还不够高，比林副主席差得远，在工作中还有些官僚主义。听到这里，毛主席“哦”了一声，又问：他们没有讲庐山的问题？熊向晖回答：讲了，是在批陈整风动员会上讲的。吴副总长说，总参同陈伯达没有来往。黄总长说，他是在庐山会议开始以后才到了庐山，当时主席已经发表了《我的一点意见》，揭露了陈伯达。黄总长说，他不认识陈伯达，原来只知道陈伯达是个理论家、秀才。如果不是主席、林副主席指出来，他也看不出陈伯达搞的《恩格斯、列宁、毛主席关于称天才的几段语录》有什么问题，也可能上当受骗。以后要坚决按照主席和林副主席的指示，多读一点马列的书。毛主席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他又抽了一支雪茄，用缓慢的语调问：庐山的事，他们就讲这些？熊向晖回答：主要就是这些。1970年八九月间在庐山举行的中共中央九届二中全会上，当时是政治局常委的陈伯达伙同林彪的老婆叶群，以及掌握军队大权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煽风点火，为林彪当国家主席制造舆论。毛主席说他们“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我的一点意见》的及时发表，制止了这幕丑剧。庐山会议之后，中央开始在党内批判陈伯达，并责成黄、吴、叶、李、邱作出检讨。将近一年过去了，熊向晖只知道陈伯达被揪了出来，其余情况一概不知。所以，当毛主席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吸了一口雪茄，突然伸出左掌，用右手一个一个按下左手的手指，问熊向晖：黄永胜和他那个军委办事组——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他们在庐山搞鬼，黄永胜讲了没有？熊向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怔了一下，回答：没有听黄总长讲过。毛主席又问他有没有看过“五个大将”的检讨、听过这件事的传达？熊向晖都只能回答：没有，因为他毫不知情。毛主席意味深长地看着熊向晖，问：你嗅出点什么没有？大半年来，熊向晖除了批陈，一直埋头于国际问题的研究。他对主席这个问题的回答，依然是“没有”。毛主席转过身来，问周总理：“五个大将”的检讨，你在中央批陈整风汇报会上的讲话，发给总参没有？周总理说：发了，总参和军委一共发了60多份。那是应该发到熊向晖这一级干部的，而他竟毫不知情。毛主席又吸了口雪茄，沉思了片刻，用左手拍了一下茶几，突然提高了声调，说：他们的检讨是假的，庐山的事情还没有完，还根本没有解决。这个当中有“鬼”。他们还有后台。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他们的后台”是谁？过了一会儿，大概是想缓和一下气氛吧，周总理委婉地说：我过去也犯过错误，一经主席提醒、批评，总是努力改。这次黄永胜他们犯了错误，主席对他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作了检讨，以后也会在实践中改正的。毛主席摇摇头，说：那个不同。你犯错误是阳谋，他们是阴谋。实践证明，他们的检讨是假的，是阴谋，连熊向晖这样的干部都不让知道，这不是阴谋？我历来主张，党内允许有公开的反对派，绝不允许暗藏的反对派。黄永胜他们搞阴谋，搞分裂，他们是暗藏的反对派。搞阴谋，搞分裂，就是搞修正主义。真正搞马克思主义的人，就要讲团结，就要光明正大。黄永胜他们光明正大吗？完全不是。总而言之，庐山的事，根本没有完。停了停，毛主席的情绪松弛下来，又问熊向晖有秘书没有，写报告、起草文件

是否亲自动手。听说他是自己动手时，毛主席说：那好。我这里的文件，就是一个秘书管。她的任务就是收收发发。文件来了，我自己挑选重要的看，需要提点意见的，我自己动手写，从来不让秘书代劳。共产党员一要动手，二是动口。动手动口，就是要动脑筋。现在一些大官、小官，自己不动手，不动口，不动脑筋，什么事都靠秘书，听说连科长都有秘书，搞“秘书专政”。有的人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这不是共产党的作风，是国民党的作风。熊向晖听了，心里又是一动：让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办公室主任的，不是林彪吗？直到此时，毛主席才结束了同熊向晖的“寒暄”，听取周总理关于同基辛格第一天会谈的汇报。熊向晖看了看表，已是10日凌晨1点5分了。毛主席谈“题外话”，竟谈了将近一个钟头！待周总理等人离开毛主席住地时，已经两点多了。在回宾馆的路上，周总理嘱咐熊向晖：今晚主席讲的话，绝对不能外传。……9月22日下午，熊向晖接到通知去听总参系统的传达。他已知道内容，本不想去，但通知他的人说，黄永胜指定他参加。……黄永胜盯着他，问：是不是主席在今年7月间，问过你庐山会议的事？熊向晖说：是的。……散会时，一位副总长问熊向晖：主席找你谈话，你为什么不向我讲讲？熊向晖说：主席没有让我讲。但他心里有些不安：这件事，他从未向别人说过，黄永胜是怎么知道的？回到家里，他马上打电话，报告周总理。总理说：是我告诉黄永胜的。我对他说，7月间，主席就问了熊向晖，你们现在还不交待，我们等了快十天了。总理又问黄永胜还讲了什么，熊向晖如实作了反映。”【注1】（《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406—414页）

从熊向晖的这段经历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已然识破了黄永胜等人的伎俩，并且非常不满。不过，直到这时候毛泽东还没有放弃对黄等人的最后争取、挽救，周恩来能把毛泽东和熊向晖谈话的经过向黄永胜透露显然是事前征得了毛泽东的同意，而毛泽东之所以同意把谈话的过程透露一点给黄永胜无外乎还是要黄迷途知返。但是，黄永胜等人格于对林彪的“效忠”并不准备积极的响应毛泽东的招呼。因此，毛泽东决定踏上南巡的征途，再最后一次给林彪集团一个机会。同时，南巡也是旨在给那些还蒙在鼓中的地方领导敲敲警钟。

在南巡之前，毛泽东布置要在国庆节前召开中共九届三中全会，并考虑在全会上作出一些人事变动，包括增补常委等。国庆节后召开四届人大。毛泽东正式出巡的时间是1971年8月15日，而在此前后，《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七、八两期的合刊上都刊登了署名峻岭（江青的化名）拍摄的林彪学习毛选的大幅照片，而且题目就是“孜孜不倦”，7月31日，《人民日报》还为此专门发表了文章，称“这幅照片把林副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生动形象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给人们巨大的激励和鼓舞。”一年前也就是1970年夏季，江青把她自己的摄影作品送给毛家湾“赏玩”，叶群还煞有介事的安排《解放军画报》不惜损失十几万元人民币来完成江青作品的刊登任务。林彪、江青两大文革新贵集团直到摊牌前还在作戏，而作戏的其中的一种目的或许达到了，林立果看到照片后还认为“空气缓和了”。

毛泽东一行第一站就是武昌，毛泽东约见武汉军区负责人刘丰、河南省负责人刘建勋时说：“希望你们要搞马克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中国也怪，中国的党没有分裂。已经经过五十年没有分裂过。苏联的党分裂过，分裂成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中国没有。有人要分裂我们的党是困难的。”，“你们就是太急了，问题不在你们。你们是属于上当受骗的，问题在北京。就是那些大将，包括黄水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他们都跟着起哄。犯了错误，进行了检查，允许改正错误，还是可以工作。这次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地下活动，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这就是反对“九大”路线，推翻九大中全会的三项议程。有人看到我年纪老了，快要上天了，他们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要分裂党，急于夺权。这次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什么“天才的”，我不是天才，读六年孔夫子，读七年资本家的洋学堂，我到二十五岁那一年，正是一九一八年开始读马列主义。”毛泽东在谈到九届二中全会上犯了错误的人的时候说：前途有两个，一个是可能改，一个是可能不改。犯了大的原则的错误，犯了路线、方向错误，为首的，改也难。历史上，陈独秀改了没有？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王明、张国焘、高岗、饶漱石改了没有？没有改。毛泽东说：“对这些人怎么办？还是教育的方针，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有的可能救过来，有的也可能救不过来。”，“现在我要抓军队的事。我就不相信我们军队会造反，军下面还有师、团，还有司、政、后机关，你调动军队来搞坏事，听你的？开九十九人的会（指1971年4月中央召开的批陈整风汇报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中央、地方和部队的负责人共九十九人。——作者注）不行，要开军长、政委，地方上相当军一级以上干部的会议，把问题讲清楚。听说连总参二部部长这一级的人都还不知道（指九届二中全会林彪一伙人的问题。——作者注），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军区、省军区常委要研究一下。暂时不忙，待提中央讨论后定。”，“不要把自己的老婆当自己工作单位的办公室主任、秘书。林彪那里，是叶群当办公室主任。还有黄永胜那里是不是？”，“庐山会议以后，我采取了三项办法，一个是甩石头，一个是掺沙子，一个是挖墙脚。批了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批发三十八军的报告和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报告，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座谈会，根本不批陈，我在一个文件上加了批语。我的办法，就是拿到这些石头，加上批语，让大家讨论。这是甩石头。军委办事组准备叫李先念、纪登奎参加，这是掺沙子。改组北京军区，这叫挖墙脚。我同林彪同志谈过，他有些话说得不妥嘛。比如他说。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历史上还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呢！这不符合实际。”【注2】（《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88—97页，下面毛泽东和其他人的谈话，凡是未特别说明出处的均引自该书第四节《庐山这件事，还没有完》即第85—169页。）刘丰是林彪线上的人，毛泽东当着刘丰的面如此评价林彪一伙包括对林彪的言行进行批评，甚至提出挽救的方法，这些讲话虽然宣布了保密，可事后刘丰还是向毛家湾告密，应该说刘丰的所作所为也应该在毛泽东的意料之中。毛泽东如此作为还是要旁

敲侧击的“教育”、“开导”林彪及其集团，希望他们不要在分裂的路上越滑越远。

8月25日，毛泽东在武昌召见湖南省负责人华国锋，毛泽东见华国锋戴着毛泽东的像章，告诉华国锋不要戴了，看见就讨嫌，这是明显的指责林彪。毛泽东对华国锋说：“我看你是满脑子的农业，我是满脑子的路线斗争。当然你讲的农业也有路线斗争，但是还有更大的路线，光有农业不行，还要考虑东西南北中、党政军民学。工农业要抓，但当前主要应该抓路线斗争。农业也有路线问题。”，“庐山会议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在庐山搞突然袭击，是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的。发难不是一天半，而是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三天。是否定“九大”路线，否定二中全会三项议程，要改成讨论天才和要设国家主席问题。他们名为反对张春桥，实际是反我。是我把天才划掉，是我提出不设国家主席。我不是天才，我读了六年孔夫子的书，上一中、一师七年是读资本主义的书，到一九一八年才读到马列主义。”，“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看到三十八军的报告很高兴，当即批了。把二十四军、二十一军、三十八军整得厉害，特别是把三十八军整得苦。还批了济南军区反骄破满的文件和刘子厚的检讨等文件，这是打石头。改组北京军区是挖墙脚。中央警卫团、北京卫戍区，他们没有插进来。掺沙子，掺了李德生、纪登奎。还少，叫李先念参加军委办事组。不能不管军队，开会不一定到，中南也要有人参加，可以不到会。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要当武官。”，“不要搞山头主义，山头主义害死人。全国都要团结，还是几个原则。三个办法，打石头、挖墙脚、掺沙子。有些话不能听，一句话顶一万句，能相信吗？有的连半句也不顶，顶个屁。实际有的不算数，如天才和国家主席问题，我说了多少次。半句也不顶。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哩。”后来，毛泽东在谈及解放军时还说：“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指挥解放军？郑维山能指挥解放军？华北八个军，就有五个军反对他们。天津的六十六军就不听他们的嘛！他们要把那几个坏人塞进天津市，六十六军就反对嘛！就是那二个军，还有军长、政委，师长、政委、团长、政委，会听他们的吗？”毛泽东直接点出了要害，指出庐山这场斗争的性质，相对于几个月前，调子明显提高了，而且再次提及解放军的指挥权，说明毛泽东对黄永胜等人的反感已经很为强烈。8月28日，毛泽东在和丁盛、刘兴元等人谈话时又指出：“去年庐山会议这次会议搞出来的那些东西，我看他们搞地下活动，突然袭击，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的。纲领就是“天才”，设国家主席，推翻二中全会的议程和“九大”路线。这就是他们的纲领。他们是有组织的，瞒着人去搞的。中央五个常委瞒着三个，也瞒着政治局的大多数同志，除了那几位大将以外。二中全会前一段开得不好，后一段开得好，引起大家对读书学习的重视。”，“黄永胜当总长，又是军委办事组的组长。办事组里面有一些人，在庐山会议上搞出那么些事来。我看黄水胜这个人政治上不怎么样强。”，“好的要表扬，但不能过分。不能捧得太高，比如有人说“超天才”，对二十几岁的人就捧得这样高，这没有什么好处，实际上是害了他。”8月30日，毛泽东再次找丁盛等人谈话，毛泽东说：“你们和黄永胜的关系那么深，黄永胜倒了怎么得了呀？他是办事组里

边井冈山的独生子。”，“不要公开讲这次庐山会议，因为中央还没有作结论，你们只是说九次路线斗争就可以了。这是说现在的路线斗争还有些问题，不要像我跟你们说的这一套。但是，我们军队应该进行教育，所有的高级干部都应该弄清楚我和你们吹的这些。军长、政委那么多，怕来不及。其实人家都知道了，什么“小小老百姓”啊！“小小老百姓”是谁呢？河北人都知道。总之，就是路线问题、山头问题、团结问题。我是程咬金的三板斧。我是到处讲。不管谁犯了错误，不讲团结，不讲路线，总是不太好吧。回北京以后，或者一个一个的，或者三个四个的，还要再找他们谈谈。他们不找我，我去找他们。”毛泽东在这次讲话里进一步点明了有些问题的来龙去脉，特别是再度提及黄永胜，还点出了林立果的问题。丁盛是广州军区的负责人，广州军区是林彪、黄永胜等人经营多年的“老营”，丁盛和黄永胜乃至林彪的关系素来密切，毛泽东如此向丁盛“交底”也表明了毛泽东的一个分化、瓦解的策略。事后证明，毛泽东的这个策略相当成功，林彪叛逃后，丁盛很快就打来电话表态支持中央。

8月31日，毛泽东专列抵达南昌，许世友、程世清、韩先楚都受到接见。毛泽东对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说：“去年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向华东空军系统的王维国、陈励耘、韦祖珍这几个人打了招呼，有没有你程世清呀？”程世清说：“我有错误，吴法宪对我有影响。主要的错误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程世清是林彪集团的外围分子，和毛家湾的关系向来走得很近，他在庐山修机场连毛泽东那里都不知道，汪东兴见了一问才了解到原来程世清处理这件事就同黄永胜、林彪汇报了，周恩来乃至毛泽东都不知情。撇下程世清，毛泽东和许世友回顾了一下历史，多谈了一些当年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的往事，说是历史实际为了讽今。毛泽东说：“军队的缔造者、领导者就不能指挥，这是不对的。缔造者、领导者也不是少数人，也不是我毛泽东一个，也不是你林彪一个，我们党内还有很多同志是领导兵暴的、领导军队的。张国焘在长征路上搞政变，他也是缔造者、指挥者。但是，他指挥军队搞分裂，拿军队作为本钱来搞分裂，那就不好了。”毛泽东在这里明里说的是张国焘，实际上已经把林彪的事情点了出来，他是让在座的几位地方领导人心里有数，特别是许世友，因为经历过张国焘的分裂活动又是毛泽东当年亲手从枪口下救出来的高级将领，他太了解毛泽东这番话的意图了。出于当时复杂的政治情况的考量，毛泽东曾要许世友和张春桥、王洪文等人搞好关系，此前在庐山，毛泽东还出面要许世友、张春桥搞了一次小聚餐，目的就是让他们缓和一下彼此紧张的关系，据徐景贤回忆，张春桥很卖力气，喝了不少的酒。这次会谈中，许世友也说：“我与上海的关系比较好。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张春桥一直是保我的，一直是为我说话的，并且有我的大字报时，他还派人去覆盖。”9月2日，毛泽东在病中又一次接见了许世友、韩先楚、程世清三人，韩先楚表态要听中央的，程世清则揭发了几件事。程世清说：“一，7月间，空军周宇驰两次跑到南昌来，并运来一辆水陆两用的汽车要江西仿造，7月底，周宇驰把汽车用飞机运走了；二，在庐山会议期间，吴法宪带我去见了叶群，她说，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里摆？三，林立衡同我妻子讲了林彪、叶群的一些问题，她要我少同林彪一家人来往，搞不好要杀头的。”【注3】（《张耀祠回忆毛

泽东》104、105页)毛泽东单独把程世清留下,问他:“林豆豆能找到吗?”程世清说:“如果主席要找她,我能找到。她可能要谈一些问题。”程世清还向毛泽东献计,他认为“四大金刚”一定有什么把柄被叶群抓住了,要从林立衡那里了解情况就要先把“四大金刚”的问题搞清楚,这样一来,叶群的情况也就清楚了。程世清还如此提及林彪:“林(林彪,没有说林副主席)这么多年脱离实际,形而上学的东西很多,比如在部队里搞的四好五好,闹的矛盾很多。互相不团结,事故很多。”毛泽东要程世清搞出一个报告来,这份报告只能报告给周恩来,其他人一律不能讲。据后来的有关调查,程世清反映的情况基本属实。【注4】(《史无前例的年代》下册579页)无疑,程世清的单独汇报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是相当深刻的,这也就给毛泽东判断林彪集团的动态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材料。或许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已经注意提防林彪集团的一举一动。

9月3日,毛泽东到达杭州,找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南萍、省军区司令员熊应堂、空军第五军政委陈励耘谈话。毛泽东说:“庐山会议你们有什么错,听说吴法宪找你们谈了,他搞的那一套,说不是有八个人嘛?”,毛泽东还专门指着陈励耘说:“其中有你一个,还有上海的那个王什么(指王维国——作者注),还有福建的那个叫什么?是不是就是那几个人。你们空军就八个中央委员嘛?”毛泽东接着说:“我看前途有两个,一个是改,一个是改不了。他们可能改,有的不一定能改。你们是受骗、受蒙蔽。对犯错误的,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比如说,我当班长,你们三个都是兵,我总是那么凶,抓着你们辫子不放,那么行吗?”陈励耘检讨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他不了解情况,跟着犯了主观唯心主义的错误。毛泽东又说:“庐山乱了三天,实际一天半,后来停下,逛庐山,到现在一年了。林彪同志那个讲话(指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上的讲话——汪东兴注),没有同我商量,也没有给我看。林彪两次打电话、写信都被他们阻止了。”汪东兴在此处也回忆:“毛主席所说林彪打电话、写信的情况是这样的:九届二中全会前,林彪曾经有两次想要打电话、写信给毛主席,但是都被叶群和黄水胜阻止了。”毛泽东说:“庐山会议,主要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国家主席问题,一个是天才问题。说反天才,就是反对我。那几个副词,我圈过几次了。”“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提了三个副词,当时兵荒马乱,那时还需要嘛。“九大”后就不同了,要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现在就要降温。到处挂像(指毛主席像——汪东兴注),日晒雨淋,可怜噢!还有那个“伟大”。我就有四个“伟大”,你们就一个没有啊!伟大的导师,就是一个教员嘛,当然导师比教员更高明一点。“九大”党章草案上那三个副词,我就圈去了。“九大”党章已定了,你们为什么不翻开看看。”“现在的几位大将(指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汪东兴注),我也不熟悉,不了解,同他们单独谈得不多,集体谈得也不多。黄永胜现在思想状况怎样,也不清楚。过去我没有管,现在我要管军队的事,我不相信军队要造反。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这次杭州谈话也是别有一番深意的,陈励耘是林彪线上的人,在庐山极力主张设立国家主席,还和张春桥有了一场不点名的小冲突。毛泽东点名陈励耘,让陈很为紧张,庐山会议后,陈励耘在一次

宴会上曾经跟张春桥道歉，说他在庐山的态度不好，张春桥则不以为然的回答：“我不在乎！”毛泽东在同南萍等人的谈话中再次提到了他要管军队，还把庐山的问题进一步挑明，不过，毛泽东还是提出要保林彪。关于这点，陈励耘自己也有过一个回忆，可咨佐证，陈励耘回忆道：“1971年毛主席巡视南方，到了杭州，在专列上找我和南萍、熊应堂谈话。讲了掺沙子、挖墙脚等等。其中有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林副主席要保。听了这句话，我才清楚一些，林副主席犯了错误，没犯错误，何必保？但是，还不敢想两个主席之间有矛盾，也没有想到林彪在二中会全上讲话有错误。谈话最后，毛主席说：‘我打算在你们这里休息几天，你们欢迎不欢迎？’我就说：我们一切都难备好了，请主席下去休息。他说，‘你们欢迎，我就去吧。’就这样，主席在汪庄住了一个星期。谈话第二天下午，汪东兴要我找南、熊二人一起，回忆主席在列车上的谈话，整理一份记录。后来南萍把它整理出来了，这个事也就完了。现在回想这件事，汪东兴好像受命启发我揭发林彪的意思。可是我实在糊里糊涂，根本没有想到要揭发林彪，也想不出自己有什么东西可以揭发的。我只是老老实实向毛主席检讨：我在二中全会华东大组上的讲话是错误的。主席说，‘这没有什么，错了改了就好了。’”【注5】（《昨夜星辰之五一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413、414页，本书内凡是陈励耘回忆均引自该书）

9月10日，毛泽东专列到了上海，许世友、王洪文去汇报工作。王洪文此时虽然还只是上海市的头头，但他的地位已经有逐渐上升的趋势。在第三次庐山会议期间，江青指着王洪文说：“知道吧，对你的希望是很大的。”王洪文当然也不会放弃这次面见毛泽东的机会，当毛泽东问起庐山会议时的一些情况，王洪文说：“六号简报，我们一看到就火了。”毛泽东问：你为什么一看到就火了？王洪文说：简报里有一些话有问题。设国家主席问题，在北京讨论宪法时有争论，而且争论得很厉害。当时有人提议设国家主席，有人不同意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是毛主席的意见，可是他们不听，还要坚持他们设国家主席的意见。毛泽东问王洪文说：那你对简报的性质有什么看法？王洪文说：这个简报是有错误的，是错误的简报。毛泽东说：“听了你们的意见，六号简报是错误的，是有人捣鬼，有人在搞阴谋诡计，不搞光明正大；不搞团结，是搞分裂。我讲话一句顶一万句？在这个问题上，我看连一句也不顶。不是我的话一句顶一万句，是陈伯达的话一句顶一万句。”许世友也表态支持中央的决定和毛泽东的部署。毛泽东要王洪文去锦江饭店请许世友吃饭，还说要把饭菜搞的好一点。但对于另外一个被召见者空四军的政委王维国，毛泽东则显得比较冷淡，仅仅握了一下手而已。毛泽东还对王洪文说：“看来他们要动手了。”【注6】（《十年一梦—徐景贤文革回忆录》233页）这句话包括王洪文在内当时都没有理解是怎么回事，直到9.13事件起来后，他们才明白这是毛泽东有些觉察的结果。

毛泽东南巡的讲话内容当时是保密的。但在9月5日，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听到刘兴元的吹风后便把毛泽东讲话的内容泄露给林立果。林立果通过其

他人传话说，非常感谢顾同舟，顾同舟得到林立果嘉勉以后，还把毛泽东的讲话整理出来，派他的老婆以治病的名义到北京直接交送，顾同舟还附给周宇驰一封信，告诉周，毛泽东的讲话决不止这些。次日，刘丰还把毛泽东的讲话转告李作鹏，李作鹏当天就把这些告诉了黄永胜，黄永胜得报异常焦急，连续三次给叶群打电话，最后一次通话时间长达 58 分钟。林彪集团骨干成员对毛泽东的南巡讲话的共同认识是停留在以下几点上的，第一，庐山的问题没有完；第二，上纲比较高；第三，矛头指向林彪。而毛家湾原来设定的最后界限是保护林彪、黄永胜不出问题。如今对照毛泽东的南巡讲话，在他们看来这等于南辕北辙。在黄永胜看来，他的错误无非就是那些，他自己就说过：“拿到全国去检讨也不怕。”更有甚者，黄永胜在军委办事组的会上还公开念了一段古诗：“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李作鹏尤其强硬，他说：“不怕，还有完没有？”毛泽东南巡的全部内容除了敲醒一些沉睡的地方领导人的酣梦，还有就是尽可能让林彪集团回头，然而，林彪集团的骨干“四大金刚”如此态度自然不能让毛泽东的目的落到实处。而林彪集团的另一股新兴势力一小舰队（联合舰队）主要成员则要把毛泽东彻底置之死地、发动一场骇人听闻的政治谋杀。

## 第二节：“571 工程”

林彪在批陈整风以来的态度殊为纳罕。本来在庐山期间，毛泽东一旦发出批评的指示，林彪就准备写信给毛泽东，却被叶群、黄永胜所阻拦，前后两次未果。（参见汪东兴著《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52 页）官伟勋在他的《我所知道的叶群》一书中转引一位毛家湾的秘书 Y 某人的回忆说：“林彪找他（指毛泽东）很多次，就是见不上。后来没办法才找江青，他最讨厌江青，但又没办法，因为想通过江青去见毛主席，· · ·江青说她在钓鱼台已经布置好了，让林去。林为了见毛主席赶紧去，走得急，脸都没刮，到了钓鱼台，现借江青秘书的刮脸刀刮了刮，照片拍了，但还是没见上毛主席。”【注 7】（《我所知道的叶群》242、243 页）这位 Y 某人没有交待清楚这件事到底发生在什么时候？究竟是一次还是多次？曾经警卫过林彪的卫士长李文普回忆说：“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曾写过检查，是让新调来的秘书王焕礼写的。王焕礼是老秘书关光烈帮忙选的，对会议情况不一定清楚，叶群让他写，送上去没有我不知道。林彪心情不好，曾要求面见主席谈话。当时，毛主席那边电话至少是叶群打，我们‘林办’有传闻，林彪想与毛见一下，谈一谈。但是长时间毛主席不作答复。林彪个性很强，从不服软。两人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叶群和江青表面上仍经常通电话问候送点东西，实际上是虚与应付。林彪不愿住在北京，经常住在苏州，北戴河。”【注 8】（《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载《中华儿女》1999 年第二期，同时可以参见李文普著《林彪事件与我》，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通讯 93》增刊第 252 期，2001 年 2 月 21 日出版。）在李文普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林

彪想见毛泽东而不可得不过是“林办”的传闻，并非确有其事，至少是语焉不详，这样似是而非的东西是不能作为历史定论出现的。而且，我们从历史的资料中发现，林彪并不是见不到毛泽东，而是不止一次的见到过毛泽东，至于和毛泽东谈话的机会不是没有，而是不少。前面我们引用了摄影师杜修贤的两次目击就可以作为有力的佐证。最迟在1971年劳动节时，林彪仍旧可以见到毛泽东甚至坐在一处，只是林彪不愿意和毛泽东多谈提前离开。从杜修贤的回忆我们得知，林彪的离开并不是因为“出汗”或者其他原因，否则不会连周恩来那样精细的人都倍感措手不及。直到1971年8月15日，周恩来还奉毛泽东之命前去北戴河向林彪转述毛泽东关于处理黄吴李邱等人的指示，也就是说在毛泽东、林彪之间的沟通渠道始终没有被人人为的隔绝。林彪不但有机会说，而且还有很多的机会说，第三次庐山会议结束不久的1970年10月8日，毛泽东给林彪写信，信中有“秋风又起，保重身体”的字样。也就是说在毛泽东这一边始终对林彪抱有复杂的态度，这个态度直到林彪叛逃之前还是有的，正如毛泽东自己所说的，他们不找我谈，我回去还是要找他们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毛泽东给林彪集团留足了机会的同时林彪集团上上下下采取的是并非主动、积极，而是消极乃至对抗。周恩来问黄永胜，你们现在还不交待，我们等了快十天了。至于林彪更是连批陈整风会都不去参加，这在一个从1959年便开始极力鼓吹毛泽东的全面权威、发誓要“紧跟”毛泽东、声称毛泽东的话“一句顶的上一万句”的林彪难道是正常的吗？毛泽东在南巡途中就讲过：“林彪不开口，这些人是不会开口的。”【注9】（《大动乱的年代》424页）而事实上林彪至死都没有开口，都没有正面的面对过毛泽东所给与他的机会。客观的讲，正是林彪把他自己逼进了历史的死角。

1971年7月，林彪去北戴河，吴法宪回忆林彪：“很沉闷，一句话也不讲，和以往完全不同。”林彪在政治上深于谋算，他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及集团所处的处境。他既不想认真的与毛泽东进行沟通，也不准备公开对庐山会议这件事作出合理的交待。林彪为什么不采取积极主动的态度迎合毛泽东的批评而宁肯选择对抗，这应该说是一个很大的谜团。我们认为，这和林彪亲眼目睹过刘少奇的悲惨下场有直接关系。而也就在这时，林立果作为林彪集团的新派势力的代表开始在集团内部取得主导性地位。此前也就是1971年3月初，林彪对林立果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娥。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注10】（《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440页）在林彪的这一启发之下，林立果决定铤而走险。

为什么在林彪集团面对如此“险境”的时候，林彪没有一如既往的启用“四大金刚”呢？这件事看起来似乎有些离奇，其实也在情理之中。第三次庐山会议之后，林立果曾经如此评价“四大金刚”，林立果认为：“这些老总们（指黄吴李邱）政治水平低，平时不学习。到时胸无成竹，没有一个通盘。指挥军事战役可以，指挥政治战役不可以。说明了一点，今后的政治斗争不能靠他们的领导，真正的领导权要掌握在我们手里。”【注11】（《大动乱的年代》406

页)鲁珉也曾经回忆到林立果根本就看不起黄永胜、吴法宪等人,(详见本书第六章第二节)林立果半公开的称呼吴法宪是“狗熊”。林立果是林彪集团的当然“接班人”,也是林彪集团新派势力的代表人物,庐山一战,叶群和“四大金刚”都分别受到责难,几乎全军覆没。只有新派势力毫发未损,这是启用他们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也就是林彪素来看重林立果的意见所致,除林彪外,敢于和叶群“叫板”的只有林立果,在林彪集团内部更是如此,而林立果之所以能够如此抗衡于叶群,原因相当简单,那就是林彪在背后的撑腰。否则,何以理解林彪对林立果说出上述一番“武装斗争”的话呢?俗话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到了林彪集团生死存亡的关头,林彪再度让儿子披挂上阵这是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了。而林彪之所以这么做却不愿意直接令四大金刚出马还有深一层的因素作祟。黄吴李邱等人自从庐山会议之后便灰头土脸、萎靡不振,特别是经过批陈整风,他们的政治声望开始走了下坡路,他们的所谓的“斗志”大不如前。尤其是黄吴李邱四个人的功名富贵虽然在文革以来都是得力于林彪的扶持,但并非都是来自于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早在五十年代就已经是大军区正职,即便不进入政治局,要想安享既有的富贵尊荣当不是难事。况且,这些人不同于林立果、周宇驰,他们身经百战、九死一生,深知这种冒险犯难的危险性,更何况如今面对的又是毛泽东。如果说要他们四个人在对敌斗争包括整垮一般性对手尚余勇可贾,那么,当他们知道针对的竟然是他们一直追随的最高领袖时,想必不会有什么正面的回应。且不论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已经被捧上神坛,就以黄吴李邱等人在战争年代对毛泽东的感知,也不可能像林立果、周宇驰那样毫无顾忌的杀伐决断。9.13事件发生后经过查实,黄吴李邱也确实没有像林立果、周宇驰那样预谋杀害毛泽东,甚至连另立中央等一系列政变计划都未能与闻。【注12】(《大动乱的年代》437页)

林立果、周宇驰等人在经过多次酝酿,形成了后来震惊中外的政变纲领即571工程纪要。其中571就是“武装起义”的谐音。这份纪要完成于1971年3月下旬,由“小舰队”骨干成员于新野执笔。主要内容如下:(一)可能性◇  
9.2(指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后,政局不稳,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尖锐,右派势力抬头,军队受压十多年来,国民经济停滞不前群众和基层干部、部队中下干部实际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敢怒不敢言。甚至不敢怒不敢言。统治集团内部上层很腐败、昏庸无能众叛亲离(1)一场政治危机正在蕴(酝)酿,(2)夺权正在进行。(3)对方目标在改变接班人(4)中国正在进行一场逐渐地和平演变式的政变。(5)这种政变形式是他们惯用手法(6)他们“故计(伎)重演”。(7)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于枪杆子方向发展。(8)因此,我们要以暴力革命的突变来阻止和平演变式的反革命渐变。反之,如果我们不用“五七一”工程阻止和平演变,一旦他们得逞,不知有多少人头落地,中国革命不知要推迟多少年。(9)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我方力量经过几年准备,在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水平都有相当提高。具有一定的思想和物质基础。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蓬勃。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了未来的政权。和国外“五七一工程”相比,我们的准备和力量比他们充份得多、成功的把握

性大得多。和十月革命相比，我们比当时苏维埃力量也不算小。地理回旋余地大空军机动能力强。比较起来，空军搞五七一比较容易得到全国政权，军区搞地方割据。◇ 两种可能性：夺取全国政权，割据局面（二）必要性、必然性 B—52（指毛泽东）好景不长，急不可待地要在近几年内安排后事。对我们不放心。如其束手被擒，不如破釜沉舟。在政治上后发制人，军事行动上先发制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在受到严重威胁，笔杆子托派集团正在任意篡改、歪曲马列主义，为他们私利服务。他们用假革命的词藻代替马列主义，用来欺骗和蒙蔽中国人民的思想当前他们的继续革命论实质是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他们的革命对象实际是中国人民，而首当其冲的是军队和与他们持不同意见的人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是社会法西斯主义他们把中国的国家机器变成一种互相残杀，互相倾轧的绞肉机式的把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变成封建专制独裁式家长制生活。当然，我们不否定他在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正因为如此，我们革命者在历史上曾给过他应有的地位和支持。但是现在他滥用中国人民给其信任和地位，历史地走向反面实际上他已成了当代的秦始皇，为了向中国人民负责，向中国历史负责，我们的等待和忍耐是有限度的！他不是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而是一个行孔孟之道借马列主义之皮、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三）基本条件◇ 有利条件：国内政治矛盾激化、危机四伏——独裁者越来越不得人心，——统治集团内部很不稳定，争权夺利、勾心斗角、几乎白热化。——军队受压军心不稳 高级中上层干部不服、不满，并且握有兵权——一小撮秀才仗势横行霸道，四面树敌 头脑发胀，对自己估计过高。——党内长期斗争和文化大革命中被排斥和打击的高级干部敢怒不敢言。——农民生活缺吃少穿——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红卫兵初期受骗被利用，已经发现充当炮灰，后期被压制变成了替罪羔羊——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受剥削。国外矛盾激化——中苏对立。整苏联。我们行动会得到苏联支持。最重要的条件：我们有首长（指林彪）威信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从自然条件上讲，国土辽阔、回旋余地大，加之空军机动性强，有利于突袭、串联、转移，甚至于撤退。◇ 困难△目前我们力量准备还不足△群众对 B—52 的个人迷信很深△由于 B—52 分而治之，军队内矛盾相当复杂，很难形成被我们掌握的统一的力量。△B—52 身（深）居简出，行动神秘鬼（诡）窄（诈），戒备森严，给我们行动带来一定困难。（四）时机。敌我双方骑虎难下目前表面上的暂时平衡维持不久，矛盾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是一场你死我活斗争！只要他们上台，我们就要下台，进监狱、卫戍区。或者我们把他们吃掉，或者他们把我们吃掉。◇ 战略上两种时机：一种我们准备好了，能吃掉他们的时候；一种是发现敌人张开嘴巴要把我们吃掉时候，我们受到严重危险的时候；这时不管准备和没准备好，也要破釜沉舟。◇ 战术上时机和手段△B—52 在我手中，敌主力舰（指毛泽东的助手）均在我手心之中。属于自投罗网式△利用上层集会一网打尽△先斩局部爪牙，先和 B—52 既成事实，逼迫 B—52 就范，逼宫形式：△利用特种手段如毒气、细菌武器、轰炸、543、车祸、暗杀、绑架、城市游击小分队。（五）基本力量和可借用力量◇ 基本力量△联合舰队和各分舰队（上海、北京、广州）△王、陈、江四、五军骨干力量（指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以及他们控制的空四军，空五军）△九师、十八师△二十一坦克团△民航△三十四师◇ 借用力量：国内△二十军△三十八军△黄（指黄永胜）军委办事处（应为军委办

事组) △国防科委△广州、成都、武汉、江西、济南、新疆、西安△社会力量、农民、红卫兵青年学生、机关干部、工人国外：苏联（秘密谈判）美国（中美谈判）借苏力量（箱）制国内外其他各种力量。暂时核保护伞。（六）动员群众口号、纲领 全军指战员团结起来！全党团结起来！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当代的秦始皇——B-52，推翻挂着社会主义招牌的封建王朝，建立一个真正属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全世界真正的马列主义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我们对外政策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承认现有的与各国的外交关系，保护使馆人员的安全。· · · · · ·（七）实施要点 三个阶段 ◇ 第一、准备阶段~} (1) 计划 (2) 力量△指挥班子—江、王、陈。△两套警卫处 公开的李松亭秘密的上海小组负责。新华一村（林立果等在上海的秘密据点）教导队 △四、五军部队训练（地面训练）△南空（指南京军区空军）直属师工作（十师）周建平负责争取二十军（江、王、陈）——扩大舰队——加速根据地建设京、沪、杭、蜀、穗、(3) 物质准备 武器 领 自造通讯器材（包括O1工程）（指林立果主持设计的一种收发报机）车辆掌握他们仓库地点、只要军械库(4)情报保障~}掌握三个环节 搜集 分析 上报◇ 第二阶段 实施阶段奇袭式一个先联后斩，上面串联好，然后奇袭。一个先斩后联。一个上下同时进行。一定要把张（指张春桥）抓到手，然后立即运用一切舆论工具，公布他叛徒罪行。总的两条：一是奇袭 二是一旦进行开始、坚持到底。◇ 第三阶段 巩固阵地，扩大战果 夺取全部政权(1) 军事上首先固守阵地△尽力坚守上海占领电台、电信局、交通把上海与外地联系卡断△力争南京方面中立，但做好防御△固守浙江、江西△掌握空降、空运~(2) 政治上采取进攻△上面摊牌△掌握舆论工具 开展政治攻势(3) 组织上扩大△迅速扩军△四方串联（八）政策和策略 打着B-52旗号打击B-52力量 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 缓和群众的舆论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 · · · ·（九）保密、纪律 此工程属特级绝密，不经批准不得准向任何人透露。坚决做到一切行动听指挥，发扬“江田岛”精神（江田岛，日本海军学校所）在地}。不成功便成仁 泄密者、失责者、动摇者、背叛者严厉制裁。

该纪要通篇都是磨刀霍霍、杀气腾腾，不啻于一个政治谋杀的宣言。在这份宣言中尽管还有很多地方流露出意气用事的痕迹，但查考其主旨则基本保留了林彪在1959年以来的一贯的政治思路。尤其是林彪政治后期的思路的重要转型也在该纪要中暴露无遗。例如第一段中的“政变正朝着有利于笔杆子，而不利枪杆子方向发展”这也就是林彪在批称整风前后所说的“大老粗挨整、秀才得意”的翻版，只不过林彪嘴巴中的“大老粗”实际也就是黄吴李邱的代名词，林彪似乎忘了自从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军内发动一场又一场导致一批又一批“大老粗”的高级将领挨整、受压的那支黑手不正是来自他林彪本人吗？罗瑞卿、贺龙、杨余傅、肖华这些人的落难无一不与毛家湾密切相连。而那时候，林彪眼中的“笔杆子”正和他配合的天衣无缝、亲密无间。纪要中说“一场新的夺权斗争势不可免，我们不掌握革命领导权，领导权将落在别人头上，革命的领导权落在谁的头上，未来政权就落在谁的头上，取得了革命领导权就取得

了未来的政权。”这更体现了林彪的意思，林彪很早就讲过，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他还强调过，所谓政权就是镇压之权。纪要通篇下来内中充斥了不少的漂亮的比喻词、惹眼的政治口号，包括倾泄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可是，这些内容的核心内容呢？那就是两个字“夺权”。而且，这场被纪要诅咒的文化大革命从何而来呢？林彪作为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长达十余年之久的中央主要领导人极力推崇极左路线、极力鼓吹个人崇拜、利用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为自己的势力开路，不知道纪要的起草者何以健忘若此？也正是这场文化大革命导致了林立果这样的政治怪胎的出笼，也正是文化大革命导致了林彪集团的气焰薰天。纪要中又说“在全国，只有我们这支力量正在崛起，蒸蒸日上，朝气蓬勃。……我们有首长（指林彪）威信名望、权力和联合舰队的力量。”这里所谓的“我们这支力量”指的就是林立果的小舰队，这也就从他们自己口中得出为什么林彪最终选择了新派力量作为发动政变的骨干而放弃了四大金刚的症结所在。王年一说：“（纪要）送给林彪、叶群看过没有，都不得而知。”（参见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421页）而我们知道，林彪、叶群在文革中轻易不会留下文字一类的东西，林立果敢于让于新野放手起草这么一个明目张胆而且还只是草稿的文件，如果不经过林彪、叶群那是很难想象的。最为重要的是，这份纪要事关林彪家族、集团的生死存亡，林立果即便再胆大妄为也不能或者不敢任性胡为。而从林彪、叶群扶持林立果的整个过程看，林立果的思想、行为无一处不体现着林彪、叶群的意志，特别是在这件事上，林彪已经在月初同林立果有过类似的谈话。所以，说什么林彪、叶群不得而知或者像有些人胡说什么林彪根本不知情，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9.13事件结束后，小舰队重要骨干李伟信就交待说，571工程纪要就是林彪授意林立果搞出来的东西。

李伟信具体交待说：林立果说，“目前从各地区实力来看，首长（指野心家林彪）讲话，还是有一定作用，这件事与首长（林彪）谈过，首长（林彪）叫先搞个计划。”，一、“571”计划写成后，我没有见过，但是于新野在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一日，曾夸耀自己说：林立果把计划及一本于新野最近摘录的关于武装起义的事例，都留在北戴河“首长”（林彪）、“主任”（叶群）那里。二、于新野一九七一年七、八月在广州时对我说：批陈整风汇报会时，林立果当时比较紧张，对会议估计三种可能：（1）一般谈一下，（2）整到军委办事组，（3）整到“首长”（林彪）。后来估计（1）、（2）可能大。在批陈整风汇报会上，黄、吴、邱、李、叶都检讨了，而且是主席批准要他们检讨，“主任”（叶群）非常紧张，当时要搞“571”，并和黄永胜也商量了，黄永胜他们也同意。（参见汪东兴著《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97、201页注引处）按照李伟信的交待，不但林彪、叶群参与此事、与闻此事，就连林彪集团的头号大将黄永胜也事前知道。再者，《571工程纪要》起草的时间正好是林彪向林立果交待武装斗争重要性的一个月之内，也正是党内开展批陈整风的关键阶段。叶群的内勤曾从叶群的卧室内找到一个叶群带在身边的名言“与其坐以待毙，孰若起而伐之”，可见，在政变或者武装斗争的这个方式上，叶群的态度和林立果是不谋而合的。

就在小舰队成员紧锣密鼓的起草《571工程纪要》之后，由林立果亲自主导的“三国四方会议”也悄悄开幕了。这次秘密会议在上海召开，参加的人有林立果、江腾蛟、王维国、陈励耘、周建平（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等，林立果在会上说，庐山会议主要是黄吴李邱等人搞坏了，现在“军队”的日子难过。他还大骂张春桥，认为张春桥没有资格继承毛泽东，提出毛泽东的接班人到底是谁的问题。他还在会上做了分派，以王维国为上海方面的头子、陈励耘为杭州方面的头子、周建平为南京方面的头子，江腾蛟抓总、负总责。所谓“三国四方”指的就是杭州、南京、上海三方面和四个负责人即陈励耘、周建平、王维国、江腾蛟。会议从3月31日开始到4月1日结束，江腾蛟高呼：“我们都是属羊的，头上长角的。”林立果则拍着腰间的佩枪说：“我经常带着它，时刻提高警惕。”不过，事隔多年后，江腾蛟说他对571工程并不知情，一直不知道，还是李伟信告诉他的。【注13】（《大动乱的年代》422页）然而，江腾蛟的所作所为不能为他的这一“辩护”做有力的证明，因为在审判中，他犯下的罪行事实确凿、无可辩驳。

有关“三国四方会议”，当事人陈励耘也有一个回忆：“庐山会议以后，自己感到压力很大，认为自己犯了错误。但是仍旧一点没有想到两个主席之间会有什么矛盾。到1971年春天，身体不好，就住进了453空军医院。3月28日下午，我的秘书王明寇来告诉我：‘于新野来了，要来看看你。’我说：‘请他来。’于当时是空军总司令部党委办公室副主任，他一见我就说：这次我来有一件事：江政委（腾蛟）在上海，想请你到上海去玩玩。后来又说：林副部长也在，都希望你去。好久不见了，大家谈谈。我实在不想去，有个指导思想：二中全会沾了一身屎，不想再同这些人打交道了。就推说生病，去不了。到3点，于新野又来了，说：政委该走了吧。他们都在等你。当时已经快下午五点了。我就带了王明寇，同于新野坐了张金富开的车，开往上海。到了闵行附近一条原来空军用的公路上，老远看到一堆人站在那里。驶近一看，竟是这样一些人：王维国夫妻两个，空司作战部长鲁岷的老婆武虹桥，还有于的秘书和两个处长。一看见我，热情得不得了。王维国还说：‘我们是特地来接你的。’说着就拉我上了他的车，一直开到了原岳阳路少年科技站。在餐厅用完晚饭后，有人来说，林立果、江腾蛟都来了。王随即领我上楼。江腾蛟、林立果两个人在扶梯口接我。大家在二楼会客室里坐下，江腾蛟先讲：‘老陈，我们简直把你憋死了，你怎么现在才来？’我说：‘我生病，来一次也难。’然后又说了些闲话，根本没有人说开会的事。”，“再扯，我就讲了‘704工程’情况，说：‘这房子明年可基本完工，林副主席什么时候去住都可以。’林立果说：‘陈政委，谢谢你。你们浙江办了这么件事情。本来林副主席在无锡有一幢房子，但是不能住，这是个黑窝。意思是说这房子归上海警卫处管，是张春桥手下。接着，又问了许多房子的事情，设备、备战坑道、指挥所等方面的情况，都问了。”，“后来又谈了备战问题。我就讲了飞机改装问题。还说：‘报废的炮改装后可以防空，可以平射，效果很好，我们已改装了一门。’接着，我又吹了一通我们空五军为应付敌人空降、机降，研究了几个方案，组织了战备营等等。扯了一阵子，有人扯到了二中全会。我说：‘我压力很大，日子不好过。’林立果说，‘现在军队的日子不好过，黄总长（黄永

胜)他们日子也不好过。’我说:‘我无非讲了张春桥几句,现在跑不掉了。’林立果说:‘现在的斗争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我接过林的话说:‘现在主席还健在,江青、张春桥要想这样搞也不敢。’林又说:‘将来主席百年之后,就是江青、张春桥这些人来接班。’这时,江腾蛟一拍大腿说:‘就是夺权也轮不到他们,还有林副主席呢!’林立果说:‘夺权有两种形式,一是武装形式,一是和平形式,我们采取的是和平形式。’我对他们突然冒出这些话感到吃惊,就不敢再说什么。时间过得很快,快近一点了。江腾蛟忽然提出:‘是不是把周建平找来?’到近二点,周建平来了。周一到,江腾蛟说:‘南空党代会’事不是要谈一谈吗?我根本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周建平就讲了南空党代会筹备情况。”“快分手了,江腾蛟忽然又讲了一句:‘今天我们开“三国四方会议”。’我不懂,忙问:‘什么“三国四方会议”?’他说:‘周是南空,你是五军,王是四军,我们(指他和林立果)也是一方嘛。’大家听了也不作声。”这时林立果又说:大家就扯到这里了。周副司令来了,就负责南京吧。王政委就负责上海,陈政委就负责杭州吧。还有你们的老政委(指江腾蛟),他是总负责的。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还以为讲的是同上海张春桥斗争的问题,根本没想到其他,所以没吭声。周建平和王维国也没有任何表示。从头到底,就没有一个人说两个主席有矛盾?记者追问“没有。绝对没有。”“也没有人提到‘571工程’?”“没有!绝对没有”“你也一点没有想到他们是在阴谋反对毛主席?”“没有。绝对没有。”“林立果要你负责杭州,你也没想想负什么责?”“根本没有想。那时候已经凌晨三点多钟,累得要死回来,还想这个干什么呢?”“你既不想,也不问。回来也没有想到应该向中央报告?”“没有,要命就要命在这里罗。”【注14】(《昨夜星辰之五一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411—413页)

从陈励耘的回忆看,当时林立果并没有直接把571工程给端出来,更多的则是打着一面“清君侧”的旗号攻讦张春桥。另一个当事人周建平回忆:“3月31号那天夜里,蒋国璋打电话给我,要不不要出去。· · ·凌晨两点蒋国璋突然来我家,把我接到科技站。我上楼一看,陈励耘也来了,· · ·再一看,在座的有林立果、江腾蛟、王维国。· · ·· · ·这时,林立果回来了。上来就问,你们在干什么?江腾蛟说,谈南空党代大会问题。我们谈完了,请副部长指示。林立果没头没脑的讲:团结。南空左派周建平负责,五军陈励耘负责,四军由王维国负责,老政委(江腾蛟)在这儿,他来拉总协调。江腾蛟表态说,我不能拉总,我当参谋。· · ·· · ·林立果送我们每人一盒罗汉果。· · ·据说林立果回到巨鹿路,有人问他,你们开的什么会呀?林没回答,想了一下说:三国四方吧。”原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说:“大约1971年4月,周宇驰告诉我,开了个三国四方会议。越南不是有个三国四方会议嘛,套用的。主要是解决矛盾,理顺关系,不要自己内部搞摩擦。”【注15】(《风云九一三》273、274、277页)

周建平、鲁珉也不认为三国四方会议是为了执行 571 工程而召开的。当然，这些都是他们的一家之言。然而，我们注意到的是，不论是周建平还是陈励耘都承认一点，那就是林立果向他们做了分派，谁负责哪一方面，谁拉总等等，我们不禁要问，林立果不过是区区一个空军作战部副部长，一个副师职干部，他有什么资格给这些省军级或以上级别的干部分派任务呢？况且又不是空军司令部布置下来的作战任务。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吴法宪等人宣称的林立果可以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命令在生效，而这个命令尽管出自吴法宪之手，背后却有着林彪、叶群夫妇的直接指使。林彪当初把林立果推上指挥空军的岗位或许已经有着两手准备，一手是黄吴李邱的文攻，一手是林立果的武卫，否则如何解释林彪在三月初对林立果还强调什么武装斗争的重要性的来历？至于说到陈励耘、周建平他们没有听到有关 571 工程的东西，那也很为简单。一则作为政变的纲领性文件只能少数人知晓，即便知晓范围扩大，核心机密也不可能尽人皆知；再则，陈励耘、周建平这些人都不在林立果心目中合适的人选，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黄永胜等老派人物不在林立果的眼中，周建平、陈励耘都曾有过和黄永胜等人类似的战争经历，他们大抵在林立果看来都是属于一路货色，都是那些指挥军事战役尚可、指挥政治战役无门的“大老粗”。三则，陈励耘、周建平甚至江腾蛟都不是林立果小舰队的核心成员，小舰队的核心成员基本就是林立果、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这几个人，起草 571 工程纪要的也是围绕着这几个人发生。此外，在“571 工程纪要”中，林立果等人多次强调王、江、陈，也就是王维国、陈励耘、江腾蛟三人，而三国四方会议也正是按照 571 工程纪要的预先布置下展开的。（571 工程纪要完成于 3 月 24 日）就在这份纪要中，林立果等人还指明要建设“京、沪、杭、蜀、穗”根据地，借用包括国防科委、成都、江西、新疆等地在内的力量，后来的事情的发展证实了林彪集团确系按照这一“方针”进行具体活动的。1981 年 10 月 23 日，成都军区党委呈递的《关于梁兴初同志问题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中指出，在 1971 年 7 月 16 日，梁兴初（时任成都军区司令员）从万县回到成都时，刘锦平到机场迎接。7 月 24 日，梁请刘到他家吃饭。在谈话中，刘锦平问梁兴初：“快开四届人大了，四届人大前要开三中全会，对黄吴叶李邱这些有错误的人怎么办？他们的日子不好过。”进而刘又说：“现在有股风，有人反对林彪。我们要誓死保卫毛主席就要保卫接班人，保卫接班人就是保卫毛主席。”当 1971 年 11 月，周恩来问及梁兴初，是否见过刘锦平，梁兴初回答没有。【注 16】（《统领万岁军—梁兴初将军的戎马生涯》545、546 页）刘锦平是空军党委常委，他应该知道黄吴叶李邱的日子为什么不好过，也应该知道所谓的有股反对林彪的风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不谈黄吴叶李邱的问题核心所在，却在梁兴初面前大谈什么保卫接班人，用意已经很为明显。9.13 事件后，“571 工程纪要”中提及的几个“根据地”都成了深受林彪事件影响的重灾区。

“571 工程纪要”的最为重要的东西就是谋杀毛泽东，这是他们眼中的“革命任务”。如果说在“纪要”中还只是书面上的谋划，那么等到得知毛泽东南巡途中对林彪集团的观感时，林立果急不可待的准备动手了。1971 年 9 月 8 日，林彪下达亲笔手令：“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此前一天，林立果已经给小舰队下达一级战备的紧急通知。9 月 10 日，刘沛丰带回林彪的另一

张手令，手令上面写到：“永胜同志：很惦念你，望任何时候都要乐观，保护身体，有事时可与王飞同志面洽。林彪”。林立果、周宇驰不过是空军司令部的师职干部，林彪需要通过他们传达什么命令？难道是战斗命令？显然不是；王飞也只是空军的副参谋长，黄永胜和王飞并没有直接的隶属关系，且地位远在王飞之上，有什么事需要和王飞面洽？

李文普曾就林彪9月8日、10日的手令有过一个具体的回忆，李文普说：“有人说中央公布的林彪写的‘九八手令’和给黄永胜‘有事和王飞联系’的亲笔信不可靠，‘林办有人专门模仿林彪笔迹代林彪在中央文件上签字，一模一样。’实际情况是：那时候，到林办的文件很多，由秘书筛选重要的给林彪读。我在林办工作人员少时，也被任命为秘书给林彪读过外事方面的文件。我从警卫师选来的打字员李根清字写得好，给林彪，叶群抄卡片，模仿林彪的字很像，有时一般划圈签字的文件就让他代签退回。但重要文件是不让他代签的。秘书讲的重要文件，林彪在听讲后有时也叫留下给他自己细看。并不是像现在传说的那样根本不看文件。李根清当时留在毛家湾，没有到北戴河来。叶群、林立果都不会模仿林彪的笔迹，别人更不敢胆大妄为代林彪下手令了。”【注17】（《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载《中华儿女》1999年第二期。同时可以参见李文普著《林彪事件与我》，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通讯93》增刊第252期，2001年2月21日出版，以下凡是引用李文普有关9.13事件回忆均引自此两处资料来源。）种种可疑的迹象都表明，林彪、林立果父子准备孤注一掷了。

### 第三节：折戟沉沙

关于暗杀毛泽东的办法，汪东兴还有一个补充回忆，列举了八种办法：第一种办法，如果毛主席的专列停在上海虹桥机场专用线上，就由负责南线指挥的江腾蛟指挥炸专用线旁边飞机场的油库，或者让油库燃烧。据王维国交代，这时就由王维国以救火的名义带着“教导队”冲上火车，趁混乱的时候，先把汪东兴杀死，然后杀害或绑架毛主席。第二种办法，是准备在第一种办法失败后采用的，就是在毛主席的专列通过硕放铁路桥时，炸掉铁路桥和专列，制造第二个“皇姑屯事件”。然后他们再宣布是坏人搞的。硕放桥在苏州到无锡之间，他们已经到那里看了地形，连炸药怎么安放，都测量和设计好了。第三种办法，如果硕放炸桥不成，就用火焰喷射器在路上打火车。周宇驰讲，火焰喷射器可以烧透几寸厚的钢板。朝火车喷射，很快就会车毁人亡。王维国、周宇驰等人也到铁路沿线看过地形。他们准备从外地调来火焰喷射器部队，由于我们

行动提前，这支部队没有来得及调来。第四种办法，是用四〇火箭筒和一百毫米高射炮平射打毛主席乘坐的火车。四〇火箭筒是打坦克的，高射炮是打飞机的，这两种武器的穿透力都很强，对付火车不成问题。第五种办法，是由王维国利用毛主席接见的机会，开枪杀害毛主席。第六种办法，是利用中央开会的机会，对毛主席下毒手第七种办法，是策划用飞机上的机关炮、警卫营的步枪、机关枪打毛主席乘坐的专列，把车打停以后，欺骗战士说上火车去抓凶手，看着哪个活着就把他干掉。第八种办法，是要陈励耘在杭州用改装的伊尔-10飞机来轰炸毛主席的专列，由陈励耘负责在飞机上装炸弹。据陈励耘后来供述：于新野找他布置任务时，他曾提出杭州没有可靠的飞行员，于新野答应回去向领导上汇报，派一个飞行员来。他们准备派谁呢？派鲁珉。鲁珉当时是空军司令部的作战部部长。· · · 9月9日，于新野在上海当着王维国的面说：“我们这次用飞机轰炸，除飞机上有的武器外，还要再加配高射机关枪，这个机关枪可以扫射火车上跑下来的人。”【注18】（《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88—190页）林立果选定的“杀手”竟然是空军的战斗英雄，他的名义上的顶头上司鲁珉。

鲁珉虽然也给毛家湾写过效忠信，可毕竟还不清楚毛家湾已经把他看作是一块通往政治颠峰的垫脚石。1971年9月10日，江腾蛟问鲁珉，要是开九届三中全会，你鲁珉会站在哪一边？鲁珉毫不犹豫的回答要站在林彪这一边。江腾蛟又点了一句，如果毛主席支持他们，你还站在哪一边？鲁珉说他还是站在林彪这一边。鲁珉这时候还是单纯的认为高层的矛盾仅限于林彪、江青两个集团之间，还没有认识到毛家湾准备暗害毛泽东的谋划已经步步逼近。在他的心目中，林彪、江青两个集团的取舍当然他自己的天平要偏向林彪这一边。鲁珉的谈话似乎给江腾蛟一个错觉，似乎鲁珉为了毛家湾什么都可以去做。9月11日晚，林立果直接向鲁珉交待了任务，这时候鲁珉才知道，原来是要他在毛泽东专列经过的硕放铁路上安装炸药，模仿当年的“皇姑屯事件”，鲁珉暗自吃惊却不敢正式表态，鲁珉后来回忆说：“我万万想不到事情会搞到这样肮脏的地步！”鲁珉不好正面推托，只好迂回的谢绝，他回忆说：“我说：不行，我空战次数不少，可从来没在陆军干过，对炸药从来没摆弄过，连看都没看过。林立果说，那就派个懂行的一起去。我又说不行，铁路上保卫工作很严密，根本不可能进去。林立果说，那就换上工人衣服进去，把铁路上的工人干掉。我还说不行，我说就算你进去了，炸药怎么点燃？你怎么计算得准爆炸时间？总之我就是说不行。”鲁珉推说不行，江腾蛟和林立果便轮番做鲁珉的工作，林立果当时就对鲁珉说毛泽东是如何的坏，而江腾蛟则说跟着毛泽东是没有好下场的。从江腾蛟当时的言行就已经看出来他在林彪集团的这一图谋中的应有的地位，所谓知道不知道571工程纪要已经无关宏旨了。就在这时，于新野来了，说是上海方面有电话，林立果接过电话后就说原计划取消。鲁珉回家无以自处，情急之中和妻子武虹桥说了这件事的大概，鲁珉甚至表示要把自己的双手都剁掉，武虹桥出主意说还是把眼睛弄烂吧，最后夫妻二人用浓盐水把鲁珉的眼睛搞肿，还住了医院，林立果一伙有点怀疑鲁珉的“病”，几次来电话询问。【注19】（《风云九一三》302—304页）

其实，一旦涉及刺杀毛泽东这件大事，不仅鲁珉这样外围深感吃惊，就是小舰队的核心骨干王飞也是临阵胆怯。叶群为了给王飞等人壮胆，亲自封官许愿，她说：“林副主席历来说话一句算一句，不考虑成熟，不会要你们办的，办了不会亏待你们的，什么问题都好办。你们将来都是‘常’字号的。”同时，叶群也威逼王飞等人必须“干到底”，王飞惊恐异常，回到家里甚至和妻子商量是不是搞一个“脑震荡”出来借以养病，王妻更绝，直接就要找人把王飞针灸成全身瘫痪以避灾祸。林立果在小舰队内部大肆卖好：“这次要论功行赏，首长（林彪）讲过，谁能完成这个任务，谁就是开国元勋。”周宇驰还对江腾蛟说：“你如能完成任务，副总理、政治局委员由你挑选。”可是，事到临头，每个人都是推三阻四，先是推出王维国作为“杀手”出面，林立果表示王维国“太粗”改易江腾蛟，继而又派鲁珉，为了万无一失还把林彪以前的秘书当时驻扎河南某部的师政委关光烈找来，询问有关火箭筒、火焰喷射器的事宜，关光烈当然知道兹事体大，托词说喷火连运输困难，根本就不想揽事上身。叶群知道找了关光烈还把王飞给臭骂的一顿。林立果跟江腾蛟说：“搞成了，我在北京开十万人大会欢迎你们。到那个时候，北京军区司令不是你江腾蛟我还不放心。”江腾蛟只好表面敷衍林立果，实际他也是胸无定见。

而此次行动涉及的另外一员大将陈励耘对于刺杀毛泽东更加退避三舍，汪东兴回忆：“陈励耘在接待于新野的房子里挂着一张毛主席像，陈励耘一看到毛主席像就发愁。”陈励耘自己则说：“我是有一支枪，但这支枪没有带在身边，而是放在包内，留在车上。关于警卫中央首长带不带枪的问题，我专门请示过汪东兴——大约是1969年，浙江省革委会指定我负责抓警卫处的工作。我记得解放初期中央有个规定：部队人员进北京不能带枪。因为知道这个规定，所以我专门请示了一下。汪东兴说：警卫人员嘛，当然要带枪。意思还有点怪我多事，连这也要请示。从此，在毛主席周围的我们警卫处人员都带枪。”，“引导车引导主席车队进一号门（在贵宾室旁边一点），我先进月台，关照警卫处副处长王英杰把主席座车一直引到车厢门口，我在门口送主席。主席上车时，我上前同主席握手。主席很亲切地同我握手。主席上车后，汪东兴、张耀祠还站在车厢门下月台上。汪招呼我过去，问：老陈，还有什么事吗？我们要走了。我上去同他们握手，祝他们一路平安。他们上车，我看车子平安开走了，松了一口气。总而言之，没有一点不正常。有人竟说我企图带枪接近毛主席，当时还紧张得面孔发白，手发抖，幸亏汪东兴发现，把我的手抓住。又说我布置警卫处的人，在红房子顶上安了机关枪。真不知是哪个的胡思乱想。”当有人问陈励耘是否有利用飞机轰炸毛泽东专列的企图时，陈励耘忙说：“这事就更莫名其妙了。我们空五军原有伊尔—10歼击机五六十架，老得一塌糊涂。为了备战，决定改装，加强火力。改了装，效果比较好。二十八师师长先向军部报告，军部作战处有关人员又向我报告。我就说：‘飞到苕桥来，让我们看看吧。’一看不错，就准备从二十八、二十九两师各调一个团到苕桥。居然有人把这个部署，说成是为了轰炸主席的专列。”【注20】

（《昨夜星辰之五一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414、415页）1982年，法院对于陈励耘的判决是这么写的：“被告人陈励耘积极追随林彪，参予林彪的

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活动，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已构成参加反革命罪。鉴于未发现被告人陈励耘参加“上海会议”（指“三国四方会议”）后有新的犯罪活动，罪行较轻。根据《刑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决定免于起诉。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七日内向本院申诉。”法律的裁决是公正的，也从正面将陈励耘的功罪说的条理清晰、有一是一。

在整个暗杀活动中，有一个约定的暗语，如果暗杀成功就是“王维国病愈”，如果暗杀失败，则是“王维国病危”。然而，这位“暗语”的主人王维国却对林立果交来的任务大感吃力。9月11日，叶群来了“抽鞭子”电话（指催促林立果快办）后，林立果调整部署，而身在上海的王维国却并非积极配合，据说当天中午王维国已经从宴请许世友的饭桌上知晓毛泽东专列北去的消息却没有及时通知林立果，相反则是在毛泽东专列已经远离林立果等人计划安置炸药的硕放一带开入山东境内前后才报告的周宇驰、林立果，而此时对于小舰队乃至林彪集团来说已经是大势已去。9月12日晨，王维国派自己的儿子王大璋（化名王严）搭乘头班飞机去北京向林立果报告。王大璋事后回忆王维国在临行前对他的交待：“父亲（王维国）说：‘关于庐山批评问题，· · ·可能三中全会要重提一下。总理来了个电报给主席，马上要开三中全会，接着开四届人大。三中全会开成扩大的，每个军都要有代表参加。主席讲，看来他们一是有点害怕，二是有点硬干，没有认真的检讨。黄永胜我以前不认识，是在他当了总长后才跟他谈过。这些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是检讨一下就可以了，跟陈伯达不一样。因为主席说，陈伯达就不让他检讨了。告诉他们早点向主席检讨，这样好些。你一说他们就知道。’父亲为什么要我去北京通报？因为于新野讲过，说主席到上海，可能有些指示，要父亲早点给他们打个招呼。父亲说，他既已答应于新野，总要有个交代，他没想到后来会出那样的事。”王大璋见到林立果后，林立果说：“很感谢你们的关心，说明王政委对我们感情很深。· · ·今后要想法跟王洪文搞好关系。少提林副主席，特别不要提我。”

【注21】（《风云九一三》296、297页）根据王大璋的回忆，我们可以知道王维国对于暗杀毛泽东也是心有余悸。另据徐景贤回忆，林立果还对王大璋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今天所以能得到这么重要的情况，说明王政委（王维国）采取的策略很好，隐蔽的很好。”王维国没有轻举妄动是不是和林立果所说的“策略很好、隐蔽的很好”有关？因为王维国尽管吩咐王大璋要林立果等人自行检讨，可是就在他了解到林彪外逃的情况后仍旧告诉蒋国璋等人说：“为了对立果负责，杀脑袋也不能讲！也可能把我们抓起来，你们仍要有单独作战的能力。”【注22】（《十年一梦—徐景贤文革回忆录》247页）王维国如此顽固的追随林彪集团于此可见一斑。这样看来，无论是江腾蛟、鲁珉，还是王维国、陈励耘在面对暗杀毛泽东的问题上都是却步不前、望而生畏，这点毛泽东自己说的很明白，他讲：“我相信，中国人民解放军任何一个人，只要知道是杀我，谁也不会干的！”

小舰队之所以在刺杀毛泽东这件事上一败涂地，除开他们内部的原因外，还有一点很为重要，那就是毛泽东在行车路线上的出其不意将小舰队摆弄的无所适从、莫衷一是。

汪东兴回忆：“我送走许世友、王洪文、王维国等人后，马上回到车上去见毛主席。毛主席问：‘他们走了没有？’我说：‘走了。’毛主席马上说：‘我们走。你立即发前卫车。’我说：‘不通知他们了吧？’毛主席说：‘不通知。谁都不通知。’我们执行毛主席的命令，立即发了前卫车。13点12分，我们的车也走了。……我们专列18点35分抵达南京站，停车15分钟。许世友在南京站迎接，毛主席说：‘不见，什么人都不见了，我要休息。’我下车见了许世友，跟他说：‘毛主席昨天晚上没睡，现在休息了。毛主席还说，到这里就不下车了。’许世友说：‘好！’他接着问我：‘路上要不要我打电话？’我说：‘不用了，我们打过了。’许世友又问：‘蚌埠停不停？’我说：‘还没最后定。一般的情况，这个站是要停的，但主席没定。’专列从南京开出后，到蚌埠车站是21点45分，停车5分钟。12日零点10分到徐州，停车10分钟。到兖州时是2点45分，没有停车。到济南时是5点，停车50分钟。在济南车站，我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要他们通知纪登奎、李德生、吴德、吴忠到丰台站，毛主席要找他们谈话。专列到德州时是7点40分。停车20分钟。11点15分到天津西站，停车15分钟。”

毛泽东专列离开上海之际，王洪文正在锦江饭店宴请许世友，饭吃到一半，王洪文接到电话说是毛泽东专列驶离上海，许世友知道后立刻乘飞机赶到毛泽东专列之前去送别。毛泽东专列在途经蚌埠、徐州都是短暂停车，而途经兖州则干脆就没有停车，等到小舰队成员了解到毛泽东的专列的基本行踪时，毛泽东已经安然接近目的地。毛泽东的行踪不要说小舰队成员蒙在鼓中，就是留守北京的周恩来也知道的不很清楚，他对汪东兴说：“你们怎么不声不响地就回来了，连我都不知道。路上怎么没有停？原来的计划不是这样的呀。”

在丰台车站，毛泽东找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上车谈话，据汪东兴回忆，当时的情景大致如下：毛主席谈了党的历史上有人多次搞分裂，但都未把党分裂成。他接着说：再就是去年庐山会议搞突然袭击，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他们先搞隐瞒，后搞突然袭击。五个常委隐瞒着三个，一点气都不透，来了个突然袭击，出简报煽风点火。这样搞总是有个目的嘛！可见这些人风格之低。我那个文章，找了一些人谈话。作了一点调查研究，是第五天才写的。天才问题是个理论问题，他们搞唯心论。我并不是不要说天才，天才就是比较聪明一点，天才不是靠一个人靠几个人，天才是靠一个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天才是靠群众路线，集体智慧。毛主席说：我同林彪谈过，你说欧洲几百年，中国几千年才出现一个天才，这不符合事实嘛！马克思、恩格斯是同时代的人，到列宁、斯大林一百年都不到，怎么能说几百年才出一个呢？中国有陈胜、吴广、有洪秀全、孙中山，怎么能说几千年才出一个呢？什么“顶峰”啦，“一句话顶一万句”啦，你说过头了嘛！一句就是一句，怎么

能顶一万句。不设国家主席，我不当国家主席，我讲了六次，一次就算讲了一句吧，就是六万句，他们都不听嘛，半句也不顶，等于零。毛主席接着说：我们的干部，大多数是好的。犯了错误要批评，做好了工作要表扬，但不能捧。二十几岁的人捧为“超天才”，这没有什么好处。犯错误的人，允许改正错误。但发声明是容易的，无非是讲在口上、写在纸上。问题在于是不是实践他的声明，改正错误。这些人最没有勇气，收场那么快。刘建勋同志说搞了一天半，我说是三天。为什么那股妖风，只刮三天就不利了，你有理为什么收回？说明他们空虚。我是哪里有石头抓起来就打，在庐山陈伯达搞的那个骗了不少人的材料，是一块石头，济南军区三破三立的报告也是一块石头，三十八军的报告是一块大石头。以后又有刘子厚的检讨，还有军委开了那么长的会根本不批陈，我加了批语，这也是甩石头。谈到这里。毛主席对李德生说：他们在庐山搞的那个材料（指论“天才”的语录——作者注），你向他们要，一连说三次：“你的那个宝贝为什么不给我？”看他们怎么说。毛主席接着说：进城以后，我很少抓军队工作，管军队工作的，开始是聂荣臻。以后是彭德怀，再以后就是林彪，实际是贺龙、罗瑞卿管得多。三任参谋总长罗瑞卿不大听他的。以后是杨成武、黄永胜。毛主席提到黄永胜时说：我看黄永胜这个人政治不怎么强，是有头无脑。他检讨最没有勇气，怕得要死。要把脑子里的东西向人家讲出来。把正确的、错误的都讲出来，就舒服了。毛泽东又借此机会把林彪的问题摊开来讲：毛主席问在座的同志：陈伯达算不算一次路线？纪登奎回答说：算！毛主席说：还要看一看。黑手不只陈伯达一个，还有黑手。我一向不赞成自己的老婆当自己的秘书、办公室主任。你们是不是夫人专政啊？林彪要给我打电话、写信，说是被他身边的人阻止了。要报告了，他们就搞不成了嘛！毛主席接着强调：我们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不要搞宗派主义、山头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毛主席批评林彪不讲三要三不要的原则。毛主席最后说：要抓路线教育，方针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利。【注23】（《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171—175页）另据吴德回忆：“毛主席说庐山会议的6号简报（华北组2号简报）是反革命简报。我一听毛主席这样说，就赶紧检讨。……毛主席挥着手说，没你的事，吴德有德。……这时，吴忠说，主席，可能有坏人吧？毛主席说，你讲的对，吴忠有忠。”【注24】（《回首文革》第四卷1224、1225页）毛泽东还让李德生调派一个师来南口负责警戒。然而就在这时，毛泽东对林彪还是没有从“一棍子打死”的角度出发的，江青事后说过：“丰台会议，毛保他（林彪），仁至义尽。”（参见《文化大革命十年史》379页）

毛泽东的突然返京让林彪集团阵脚大乱，林立果尤其沮丧。接到上海方面的电话得知毛泽东已经离开上海，林立果就告诉下面原计划暂停，李伟信后来交代说，林立果一度流着眼泪对他们说：“首长（林彪）交给我的任务没有完成，首长连生命都交给我了，我拿什么去见首长？”林立果情急之中把林彪的授权给说了出来，周宇驰还不甘心，他自称要等国庆节那天，林彪借故托病不出，他周宇驰亲自驾驶飞机去撞天安门。这种胡思乱想的方案当然也就是说说而已，目前关键的是如何摆脱困境。在“571工程纪要”中，林立果等人已经树

立武装割据的概念，而在叶群早在9月6日前后便已做好了出走的准备，9月7日，叶群开始索要俄华词典、英华词典。当晚，叶群问前来毛家湾的总参某部的倪参谋，蒙古国有哪些大城市还详细询问了它们的仔细概况，叶群还问及中苏边境、中蒙边境的布防情况，倪参谋都做了回答。9月8日，周宇驰索要苏联航班地图。9月9日，叶群索要有关中美关系文件，周宇驰索要三北（东北、西北、华北）地区雷达兵部署和中国周边国家广播电台频率表。9月11日，叶群要副军以上干部名册。前者的谋杀毛泽东和时下的谋划割据出走，后来被称为“两谋”。在后者的谋划中，割据广州、另立中央则显得比较突出，原因很简单，因为那里是林彪、黄永胜等人经营多年的老营，对那里的干部熟悉，广州军区的丁盛一直和林彪、黄永胜等人关系不错，虽则后来丁盛在权衡利弊之后站到了中央这一边。还有一点，林是军人出身，对军事方面的考虑最多，自清以来从吴三桂算起，西南出兵进而问鼎中原的无外乎控制两湖，这样沿江而去，南可以割据南京捞取东南半壁，北可以通过湖北进驻河南，形成中原逐鹿。而当时控遏上游的武汉军区主要负责人刘丰则是林的又一大将，况且上海和南京方面还有江腾蛟等一班空军将领做接应。南逃广州的具体筹划工作交给王飞执行，王飞还要把住院的鲁珉叫来，鲁珉一时没有到。王飞决定在空军副司令员邝任农的办公室（邝外出不在）里举行秘密会议，他宣布南逃广州的计划，除了林彪、叶群外，小舰队成员以及“四大金刚”都要去广州，进行武装割据、对抗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王飞后来自供时说：“明知干不得，也干不成，但自己已经是陷进去了。被反革命绳子拴住了，解不脱。”鲁珉得到消息说要他去邝任农办公室去看文件，鲁珉以为自己的异常被发觉，可能有鱼死网破的危险，就在临上楼之前告诉妻子，一旦听到枪声就跑到吴法宪住地报告或者到汽车队值班室喊人，后来发现情况并没有自己预想的那样紧张，这才罢休。这次小型的秘密会议的参加者包括王飞、鲁珉、贺德全（空司情报部部长）、刘世英（空司办公室副主任）、于新野、朱铁铮（空司办公室二处处长）、郑兴和（空司装备处处长），会上拟定了南去的名单，专设一个领导小组负责南逃计划实施，组长王飞、副组长鲁珉、贺德全、刘世英，王飞等人还研究了对付黄吴李邱警卫、司机等人的办法，明令在机场不能开枪，于新野提出紧要关头可以动用匕首。【注25】（《“联合舰队”的覆灭》254—256、268页）黄吴李邱这时候虽还不知情，但为了另立门户的需要，也要把他们四个拉上，林立果说过，到了广州，他们在政治局和中央委员里面也不在少数。林彪、叶群再加上黄吴李邱四人，九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林彪集团占了四分之一。

然而，南逃广州的计划很快落空，这是因为林立衡的告发以及周恩来对256号飞机的去向的追问引起的。在得知谋杀毛泽东计划落空后，林立果搭乘256号飞机去北戴河，时间是1971年9月12日下午，为了保密起见，256号飞机改用252号飞机的呼号。当天下午四点，周宇驰给空军副参谋长胡萍打电话告知林彪准备去广州的事，要胡萍准备五架飞机：一架是256号三叉戟；另外再安排一架三叉戟给黄吴李邱；第三架是伊尔-18；第四架是安-12运输机，可以装汽车；第五架是安-24。叶群在9月8日就和吴法宪通话，要求以后安排飞机的事可以不通过和吴法宪商量直接同胡萍交待，吴法宪此时尚不知叶群、林立

果的计划，也蒙在鼓中。胡萍在林立果、周宇驰等人的示意下，为 256 号飞机配备了一个不错的机组班子，航空兵某师副政委潘景寅亲自出任飞机的驾驶。表面上，毛家湾已经做好了南去的准备，却不料半道中给林立衡窥出破绽，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

历史的发展总是以其必然性和偶然性为组合体的，林彪集团的败亡是历史的必然性，而林立衡的告发则是这个规律发展过程中的偶然性。林彪、叶群当时住在北戴河中央疗养院 62 号楼（又称 96 号楼），叶群为了制造行前的烟幕以林立衡、张清林订婚仪式为名邀请大家看电影，还准备了烟酒糖茶等，林立果还送给林立衡一束鲜花以示祝贺。但是，林立衡已经对叶群的蹊跷的举动有所察觉。12 日晚八点左右，林立衡了解到他们可能选择出走。9 点后，林立衡又从林立果那里知道次日早上六点“行动”，具体行动的内容，林立果没有说。林立衡感觉事情不一般，便打通了驻守在北戴河的中央警卫部队副团长张宏的电话，向张宏、姜作寿（二大队大队长）报告了叶群等人的异常情况。张耀祠、汪东兴随即知道了情况，他们向周恩来做了汇报，周恩来查问起 256 号飞机的去向，还在晚 11 点半给叶群通话，叶群告知周恩来说是林彪准备动一动，周恩来问如何动？叶群答以天上动，周恩来即以夜航不安全为理由加以劝阻。周恩来还命令李作鹏，山海关机场的专机不要放飞，须有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四人一起下命令才能生效。周恩来还表示要去北戴河看看林彪，叶群忙说不要来，一来林彪就会紧张云云。叶群等人误以为周恩来已经觉察到他们的行动，于是，在慌乱中决定取消南逃计划，改为外逃。林彪集团当初在兴起时布置政治陷阱清洗对手可谓步步为营、处处得手，如今却乱从四起、心惊肉跳，毛泽东还没有真正的掌握他们的政变的有力证据，他们自己内部已经慌作一团，败象显露无疑。有关这一天也就是 9 月 12 日晚的情况，当事人汪东兴、李文普、林立衡、林彪的内勤公务员小张、小陈、8341 部队警卫科副科长刘吉纯等人都有若干回忆，可为这起事件的来龙去脉提供佐证。

汪东兴回忆说：“林立衡也没有心思看电影了，就从电影室出来，到林彪的房间外边去听。她听到林彪、叶群、林立果三个人在一起谈话，隐隐约约地听他们说，要去什么地方。林立衡听到这些话，心里很紧张。她马上去向当时在北戴河保卫林彪的 8341 部队的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的队长姜作寿报告。晚上 9 点 20 分左右，张宏、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我的办公室，说：

“情况很紧急，林彪要走动，怎么办？”我马上打电话找周总理。周总理当时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主持讨论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我将林立衡报告的情况向周总理报告后，周总理问我：“报告可靠吗？”我回答说：“可靠。”周总理对我说：“你马上打电话通知张宏，如果有新的情况，立即报告。”我和张耀祠都守在我的办公室的电话机旁。过一会儿。张宏又来电话报告说：林立衡还报告，她听接林立果的汽车司机讲，林立果是乘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由于林立衡的

报告，我们掌握了林立果是乘专机去北戴河，山海关停有专机的重要情况。我马上又将这个情况报告给周总理。这时，周总理听了这些情况后，已经不能继续主持开会了，他也紧张起来。他安排其他人继续开会，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一间小房子里处理北戴河方面的问题。他打电话给我，要我不离开电话机，随时掌握北戴河那边的情况。我说，不会离开，我就在电话机旁边等着。周总理接着打电话把在大会堂参加《政府工作报告》稿讨论会的吴法宪从会场上找出来，问他知道不知道有一架飞机从北京飞到北戴河去了。吴法宪回答说不知道，并说他要问一问空军调度室。周总理要求吴法宪立即去问。吴法宪就到另一个房间去打电话了。周总理这时又打电话给我，让我立即转告北戴河的张宏。让他查一查，山海关是不是有一架专机，如果有什么新情况，马上向他报告。张宏很快答复说，他已问过山海关机场。确实有一架专机，专机的机组人员正在休息。这个机场归海军管理。”【注26】（《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203—205页）

李文普也回忆道：就在这天下午，我在平台上乘凉，林立衡突然对我说，“林立果尽干坏事，要害毛主席，他们还要去广州。万一不行就让首长去香港，你不能让首长上飞机走。”林立衡说这番话，我确实感到突然，不相信。我不相信的原因有几条：一是林彪让我准备去大连，并没说去广州。另外，林立衡和叶群感情不好，“文革”以后，叶群为她选美，选了一个又一个，她不要，自己选中了空政保卫部的某干事，叶群知道后大发脾气，林立衡以死抗争，服了一大瓶安眠药自杀，幸好被她的公务员王淑媛及时发现，送301医院抢救才免于死。除此外，林立衡和林立果也有矛盾，感情平淡。现在林立衡冒出一个这么大的“阴谋”来，真把我吓得一大跳。但我首先想这是林家儿女又闹矛盾了。同时也问有什么证据，但她也不说任何证据，我当然就不会很相信了。还有一点，就是长期在“林办”，对林家真真假假的事见多了，听多了，也遇多了，所以就又用平常的心态去看待了。尽管我很吃惊，但心里还是没吃紧。当时，我想林立衡既然知道林立果要害毛主席，搞反革命活动，这样大的事，为什么自己不去向林彪报告，加以制止，却要我不让首长上飞机。我从来没有干过这样的事，负不起这个责任。我对她说：“你有什么证据？我有什么理由不让首长上飞机？如果他要上，我强行阻止，不让他上，能行吗？”林立衡见我这样，就没有往下说，我就到空军疗养院办事去了。可能林立衡又去找“林办”其他工作人员说了此事，叫他们注意观察叶群的动向。所以气氛就紧张起来。我从空疗回到96楼，几个人问我，“你到哪里去了？我们以为有人把你害了呢！”晚上，我仍然在值班室值班，林立衡又突然把我叫到小厕所里，再次对我讲了不能让林彪上飞机的事。对她的话，我心中还是没有底，仍然问她：“有什么证据，没有证据，我怎好不让首长上飞机？”，“晚饭后在96楼走廊里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这时林立果正从北京乘飞机返回山海关机场。机场打电话问是谁来，秘书们都不知道。叶群告诉我：“豆豆今晚订婚，立果听说后很高兴，坐飞机赶回来祝贺。”她要刘吉纯坐车去接。林立果是坐机场的汽车在半路上换乘刘吉纯的车回到北戴河的。这时，已经到了晚上8点以后。过去，负责照顾林彪生活的内勤公务员是不能离开内勤值班室看电影的，叶群却把他们赶出来看电影。自己躲进林彪房间关上门长时间地密谈。林立衡听说林立果快要回来，便去林彪房门口偷听，里边谈话声音很低听不

清。21点左右，林立果回到96号楼，马上和叶群钻进林彪卧室三人一起密谈。林立衡逼着内勤公务员张恒昌、陈占照去门外偷听。张恒昌来告她：“刚才，在卫生间里，隔着门隐约听到里边两句谈话，一句是叶群说的：“就是到香港也行嘛！”一句是林立果说的：“到这时候，你还不把黄、吴、李、邱都交给我。”林立衡听后决定去8341警卫部队报告。”，“林立果谋害毛主席的计划落空后，准备和林彪、叶群带着林立衡、张清林、张宁及林办工作人员于13日晨6时去广州。叶群在10点多钟向张恒昌说“明天早上6点去大连”。林立衡把我拉到小厕所，还是要我阻止他们上飞机，我还是说没有什么理由，不好说。她要我注意林立果的动向，自己带着杨森去8341部队打电话向中央报告。张清林继续留在96楼看电影。林立衡的报告引起中央的注意，周恩来总理找吴法宪查问林立果私调飞机的情况，并派中央警卫局副局长杨德中随同吴法宪一起到西郊机场查问，原已做好去广州准备的周宇驰紧急打电话报告已回到北戴河的林立果，林彪、叶群这才决定马上就走。”，“大约11点多钟，叶群拉我到林彪卧室门外叫我等着，她先进去和林彪说了几句话然后叫我进去。这时，林彪早已从床上起来穿好衣服。林彪对我说：“今晚反正睡不着了，你准备一下，现在就走。”我说：“等要了飞机再走。”叶群插话骗我说：“一会儿吴法宪坐飞机来，我们就用那架飞机。”我当时怀疑为什么不让我调飞机，有些反常，心里越来越没有底。我从林彪那里出来，叶群也跟着出来，叫我快点调车，并说“快点吧，什么东西也别带啦！有人要来抓首长，再不走就走不了啦！”究竟往哪里走？我越发怀疑。就到值班室给北京打电话，找到空军主管专机工作的副参谋长胡萍。我说：“首长要马上走，什么也不带，我觉得方向不明确，你知道去哪里吧？”胡萍在电话中很不耐烦地说：“你不要问了，不要问了，你不要再往北京打电话了！”不容我再说，他就把电话挂断了。这时，林立果把我叫到叶群的办公室，给在北京的周宇驰打电话，叫我在门外看着。我听到林立果说：“首长马上就走，你们越快越好！”他放下电话出来，催我快去调车，我回到秘书值班室给58楼8341部队张宏副团长打电话，告诉他：“首长马上就走”。张副团长问我：“怎么回事。”林立果又走了进来，问是谁来的电话，我说：“是张副团长。”林立果立即伸手把电话压了。我拿了林彪常用的两个皮包走到外边。杨振刚把车开上来，刚到车库门口停下，林彪光着头出来和叶群、林立果、刘沛丰走到车旁。这是一辆三排座大红旗防弹车，林彪第一个走进汽车坐在后排，叶群第二个走进汽车，坐在林彪身边。他们坐定了，中间第二排座才能放好。第三个上车的是林立果，他坐在第二排在林彪前面。第四个上车的是刘沛丰，坐在叶群的前面，我最后上车，坐在前排司机旁边。身后就是林立果坐的位置。”【注27】（《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载《中华儿女》1999年第二期，同时参见李文普著《林彪事件与我》，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通讯93》增刊第252期，2001年2月21日出版）

林立衡自己的回忆是这样的：“我向8341部队张副团长、于副大队长报告了情况……张副团长说，你先回去吧。……张清林说，我走后，叶群和林立果几次在放电影的走廊里穿来穿去。林立果以送礼物为名，几次到张清林这里，打听我到哪里去了。张清林按照我们预先约定的说法，回答说：‘找钢笔去了。’，‘拿夜餐去了。’……走进叶群的房间，我看到叶群在整理

卡片，刘沛丰坐在叶群旁边，两眼通红，直瞪着我。我叫了叶群几声，她才抬起头来，冷冷地说：‘明天早上带你们到大连去，首长在飞机上还要看地形。你告诉张宁、张清林，收拾一下。’……没多久，林彪的内勤小张匆匆跑来，对我说：‘他们现在就要走。’……我赶快去找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李文普主动对我说：‘首长现在就要走，不要刘吉纯去大连打前站了。’我说：‘你现在还打什么电话？赶快拖住他们，就说今天太晚了，不能走。还可以叫张副团长来劝一下。’李文普说：“现在还是要上飞机，不行再拼！”我说：‘到这时候，你连枪都不带，还怎么拼？”李文普就去拿枪。我说：‘你们不拖住，我去叫部队阻拦！’……张副团长要通了北京的电话，向中央办公厅副主任张耀祠报告，我把电话抢过来，直接向他报告情况。……这时，林彪的内勤公务员小张从96号（即62号）楼打来电话说：‘首长、主任、林立果、刘沛丰、李文普坐着杨振刚开的车走了。’差不多时，我听到外面传来几声枪声。张副团长慌忙跑出去，我又立即把听到的枪声的情况报告了张耀祠。张副团长很快跑回来，也给北京报告了情况：‘林彪坐汽车逃跑了，没有拦住，警卫秘书被打伤了。’然后对我说：‘现在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我马上去追！’”【注28】（《“联合舰队”的覆灭》271—273页）

当时担任8341部队警卫科副科长的刘吉纯如此回忆：“9月7日上午，林立果、林立衡等从北京飞往北戴河，是我派车去山海关机场接的。晚上，林立衡要我到她那里去，她跟我说，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坏事，被上边知道了。他们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挟持首长（林彪）到外地去。我说，怎么办，是否去报告？她问，向谁报告？我说，只有向汪东兴、张耀祠、杨德中报告。她说，汪在庐山也受到了批评，现在对谁都不要讲。首长国庆节还要上天安门。现在离国庆节还有二十多天，等几天再说吧。当时我同她商定，她在里面、我在外面观察动静。9月8日，林立果、刘沛丰离开北戴河。12日，午饭后，叶群叫我去。我到她办公室时，叶群问我，现在部队情况怎样？我说，很好。她说，没什么，随便问问。当时我很纳闷，她为什么忽然问起部队情况，是否对部队不放心？下午，叶群吩咐工作人员为林立衡、张清林操办订婚活动，并放风说要做去大连的准备。晚饭后，我们在院里纳凉，忽然听到空中有一架大飞机飞往山海关方向。这时，叶群打来电话说，老虎专程从北京来这里祝贺豆豆和张清林订婚，你快去机场接他。林立果是和刘沛丰一起回北戴河的，两人各提了一只小箱子。回到驻地后，我一直没有见到林立果，怀疑他来北戴河一定有别的事情，不像是为林立衡订婚而来。当晚10点半左右，林立衡对我和李文普（林彪随身警卫员，“林办”在北戴河的负责人）说，主任、老虎要挟持首长到广州去，在广州呆不住就去香港。她想要报告去，李文普说怕林、叶找他，他不去。我见李文普不去，便把林立衡带到小树林里，然后找到姜作寿大队长和陆军医，说林立衡有重要情况向中央报告。我回到96楼后，心情十分紧张，又不敢对别人讲，一时不知如何是好。11点多钟，听到叶群在走廊上大喊，快走快走！我以为是去大连，就跑到秘书办公室，让宋秘书给大连打电话。他刚拨通，把话机交给我，恰好林立果进来，他立即拉断话机，并大声喊：“谁都不要打电话，也不准接电话！”接着，他拉李文普出

去，李文普立即叫司机杨振刚备车。我跑到大队部，让姜作寿赶快派于仁堂副大队长带人去机场，先把飞机看住，别让起飞。等去机场人员上车后，我回到96楼。刚到楼前，看到林彪的车已经开了出来。林彪内勤张恒昌跑来说，他们都坐一辆车跑了。我看到院子里停着一辆“伏尔加”车，就跟宋秘书、李秘书和小张一同上去，又拉一个有自动步枪的战士，直奔山海关机场。”【注29】（《林彪出逃前夜》，刘吉纯口述，载2005年6月3日《文汇读书周报》）

林彪的内勤公务员小张回忆：“大约11点40分到50分左右，叶群、林立果和刘沛丰一起到林彪的客厅里，刘沛丰手里提着三四个皮包。叶群一到，就马上出来到处找李文普，叫喊着调汽车，载走廊里到处乱窜，像个疯子一般。……刘沛丰提着三四个皮包，首先上车，接着叶群、林立果上了车，林彪最后上车。李文普上车后，汽车立即开走了。没几分钟，听到下面响起了枪声。”林彪的另一位内勤公务员小陈也回忆说：“叶群披头散发，林立果跑来跑去，忙着调车，十分着急的样子。……准备上车，林彪走在最后边，当他走到我们内勤门口时，问我：‘东西都装车没有？’我答：‘没装车’。林彪没有再说什么，也没停步，连帽子、大衣都没有带，就钻进了汽车。”【注30】（《“联合舰队”的覆灭》274—277页）

李文普在回顾林彪逃亡的情况时还专门批驳了林立果的未婚妻张宁的不准确记忆，李文普说：“‘不一会儿，小陈端着茶盘从林彪那边走廊上的小侧门里冒出来，急步走向林立衡。我悄悄进去，刚走到沙发后面就被林立果发现了，凶巴巴地推我出来，差点把我推倒，吓坏我了。’立衡和众人急问：‘听到什么呀？’小陈说：‘我刚进去的时候，听到首长哭（呜咽）着说，我至死是民族主义者。听到这句，就被立果发现我了，立果推我的时候，首长回头望了一眼，我看见首长正淌着眼泪。’这是张宁书中（即张宁著《自己写自己》）243页的一段话。张宁书中还说：‘小陈和小张在叶群母子走后，一起进去服侍林彪吃安眠药，替他脱衣服，扶他上床睡觉，时间约十一点左右。’这一段编得荒唐。林彪是久经沙场统帅过百万大军的党中央副主席，不是呜咽哭泣求儿子老婆放过他的那种人。他从不喝茶，他不打铃，内勤公务员根本不敢进屋偷看偷听他和老婆儿子的谈话。”李文普的记忆比较张宁的回忆具有可靠性，因为林彪内勤小张、小陈的回忆中都没有张宁所说的那些内容，特别是没有林彪说什么“民族主义者”这一类不着边际的话，而且林彪本人并没有服用安眠药的习惯，小陈回忆直到上车林彪还在问话，还处在十分清醒的地步，所谓的林彪稀里糊涂的被林立果、叶群带走一说是无稽之谈！正如李文普所说：“据我长期观察，林彪和叶群之间，叶群和林立果之间虽然有矛盾，但为了各自的利益和欲望，在政治上又是一致的。如果没有林彪的指使或点头，叶群是指挥不动林立果的。林立衡、张宁的所谓“自述”或“披露”，把一切坏事都归罪叶群，蓄意为林彪父子开脱翻案，是没有根据的欺人之谈。”

在林彪逃跑的途中，李文普被林立果击伤，关于这一点，时下有些不负责任的谣传混淆视听，我们不妨来听听李文普和其他几位当事人的说法。李文普说：当时已是深夜，天很黑，车开动了。叶群对林彪说：“李文普和老杨对首长的阶级感情很深。”我和杨振刚都没有说话。车到56楼时，我突然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汽车开到58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叶群说：“8341部队对首长不忠，冲！”杨振刚加快速度，过了58楼。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我才知道不是去大连，是要到苏联去。当时一听去苏联的地方，脑子里第一个反映就是叛逃，所以，在这一瞬间，我思想上产生了激烈的斗争。跟着跑，这不是当叛徒了吗？自己的老婆、孩子不成了叛徒的家属了吗？便决心下车。我本能地大喊了一声“停车！”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我立即开门下车。叶群气冲冲地说：“李文普！你想干什么？”我说：“你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当叛徒我不去！”我转身朝58楼喊了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我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我开枪。当时距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受伤后，我倒在路边，先后听到三辆车通过……后来，是8341部队二大队的卢医生给我包扎的。他们要送我去空军疗养院。我想女儿刚去那里，不好说话。我说去军区疗养院。到那里检查，子弹穿透手臂，造成粉碎性骨折。医生问我怎么受的伤，我不好说林彪父子如何如何，因为这是重大机密，我们做这项工作不用谁教都知道的。所以，只好说是自己“枪走火”。· · · · ·林立果开枪把我打伤之后，叫杨振刚加快速度驶向机场，刘吉纯和8341部队2大队的干部战士分乘几辆车在后面追赶。我提着枪流着血走回到58楼2大队队部，卢医生马上找了一个急救包给我包扎，十几分钟后就送我去军区疗养院作检查治疗。在大队部里的人有姜作寿大队长，林立衡、杨森和张清林。姜大队长、杨森处长都能证明不是张清林给我包扎的。林立衡关心的是林彪的行动，哪有什么人给我检查伤口，张清林有什么资格给我做“自伤”的诊断？中央1971年下发的第57号文件，1972年下发的4号文件，都明确说明林彪是打伤了跟随他多年的警卫人员逃往机场强行起飞的。我在几年监护审查期，组织上从来没有人问过这一枪是不是自伤。只是在近几年林立衡才私下对人散布说“那一枪是他自己打的。”【注31】（《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载《中华儿女》1999年第二期。同时参见李文普著《林彪事件与我》，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通讯93》增刊第252期，2001年2月21日出版）

林立衡自己的回忆中已经提到张副团长（张宏）回来对她说，警卫秘书被打伤了。林立衡不在现场，怎么能够判定枪伤是自伤还是他伤？张宁的回忆就更加不可信了。当时担任8341部队二大队大队长姜作寿回忆说：“汽车跑到距离我们挡车的地方约100米处，突然停下，我们看到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开了车门下来了，车里就响了一枪，紧接着又听到打了四枪，并听到李文普在路边喊叫，他负伤了。”姜作寿是亲眼目击李文普受伤的证人，他的回忆相当可信。林彪一行跑到机场，很快登机，8341部队二大队副大队长于仁堂回忆说：“林彪的汽车一到，他们就从飞机上下来。林彪、叶群等人一起向飞机上爬。”【注32】（《“联合舰队”的覆灭》280—282页）姜作寿也看到林彪光着脑袋几乎顶着叶群鞋底紧跟着爬了上去（飞机）。如果林彪不是处在相当

清醒的状态和提前知道这次行动，（并且问了伊尔库茨克的飞行距离）很难想象林彪会有如此行为。据林办秘书张云生回忆说，叶群从来不让林彪、林立果父子共乘一架飞机以防“两代接班人”遭遇不测、毁于一旦，然而在慌不择路的出逃中，不知是巧合还是必然，林彪父子同坐一架飞机、同遇一种命运，说来不免令人哑然失笑。

周恩来原来下的命令是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四位领导同时下达命令，飞机才能起飞，但是，这个命令却被李作鹏篡改为“四个首长中一个首长指示放飞，才能放飞”，于仁堂等人赶到机场时，飞机已经起飞，机场佟参谋长还向空中打了三枪。由于事出仓惶，领航员、通信报务员、副驾驶都没有来得及登机，飞机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信保障的前提下仓促起飞。

作为当时现场指挥的李德生事后回忆说：“到9月13日零点32分，北戴河的警卫部队报告，林彪不顾警卫部队阻拦，已乘三叉戟飞机强行起飞了！山海关机场曾三次报告李作鹏，飞机强行起飞怎么办？李作鹏竟然没有下令阻止起飞。总理一听这个消息，马上出去打电话报告了毛主席，并请示了一些事情，回来后立即对我说，林彪乘飞机逃跑了！命令我马上到军委空军司令部，代替他坐阵指挥，随时报告情况。总理指示我二十四小时都不能离开。实际上，我五天五夜都没有离开空军司令部。同时，总理派杨德中同志随吴法宪（监视他）去西郊机场掌握情况，派纪登奎同志去北京空军司令部。总理还发布了“禁空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我的汽车急驰空军司令部，下车后我快步进入作战部指挥所，并找来空军参谋长梁璞，一起注视着整幅墙壁大的雷达屏幕。这时，我看到屏幕上清楚地显示出那架飞机标志的亮点正向北移动。位置在承德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境线之间。总理曾问调度员：“用无线电向256号飞机呼叫，他们能不能听到？”调度员回答说：“能听到。”总理说：“我要对潘景寅（已知潘为此机驾驶员）讲话，请给我接上。”调度员说：“他开着机器，但不回答。”总理说：“那就请你向256号飞机发出呼号，希望他们飞回来，不论在北京东郊机场或西郊机场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调度员报告总理：“他不回答。”飞机耍了个花招，是先向西飞了一段，又调转方向往北飞的。我和梁璞紧张地注视着荧光屏。梁璞说：“这架飞机飞行不一般，情况异常。”我问他：“有什么特点？”梁说：“第一，飞的不是国际航线；第二，方向往北，马上要出国境到蒙古了；第三，飞的是低空。”我坐在一张很大的写字台前。这是空军指挥所，桌上装有直通总理的红机子专线电话，我不断将飞机的位置、高度、方向、到达地点等等情况向总理汇报。当我向总理请示处置办法时，总理告诉我，已请示了毛主席，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9月13日凌晨，那架飞机出了国境。我及时报告总理。”

【注33】（李德生著《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载《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第三卷下册558—560页）

汪东兴也回忆说：我们正在向毛主席汇报时，吴法宪从西郊机场打电话找我，说林彪的专机已经起飞 30 多分钟了，飞机在向北飞行，即将从张家口一带飞出河北，进入内蒙古。吴法宪请示，要不要派强击机拦截，我说：“我立即去请示毛主席，你不要离开。”当时，毛主席的房间里没有电话，电话在办公室里，离谈话的房间还有几十米远。我马上跑步回去，报告毛主席和周总理。毛主席听了报告以后说：“林彪还是我们党中央的副主席呀。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不要阻拦，让他飞吧。”周总理同意毛主席的意见，让我马上去传达给吴法宪。我又跑回值班室，只告诉了吴法宪一句话，就是不要派飞机阻拦，其他的话，我没有告诉他。这时时针指向 13 日凌晨 1 点 12 分。飞机从起飞时算起，已经飞了 40 分钟，快要飞出国境了。把这架飞机放过去，是毛主席、周总理的意见。这个意见是对的。要是把这架飞机拦截下来。那可不得了！会在全国造成不好的影响。林彪是党的副主席，我们当时并不知道他要飞到哪里去，做什么事，拦截专机，我们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后来才知道，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林彪、叶群经过长期策划，林彪认为，只要毛主席健在。无论是威望还是文的、武的。他都不是对手，所以他想出了三个计策，即上策是谋害毛主席。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中策是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政府；下策是往北叛逃国外。最后关头，他选择了下策。【注 34】（《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208、209 页）

就在林彪 256 号飞机起飞后不久，沙河机场报告说又一架机号为 3685 的直升飞机飞走，机上主要是周宇驰、于新野、李伟信等人。毛泽东、周恩来下令立即拦截。李德生追问沙河机场为何放飞这架飞机而且是在禁空令下达后，沙河机场回答，周宇驰出示了林彪的手令，调度室这才决定放飞。从这件事上也可以看出来林彪的手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了。北京空军接到命令，起飞了 8 架歼 6 战斗机拦截直升飞机，而在直升飞机上，驾驶员陈修文和周宇驰也有一番斗争，周宇驰用枪威胁陈修文向北飞，陈修文和他们虚与周旋，歼 6 飞机开炮，陈修文籍此把飞机降落到北京怀柔县境内，周宇驰开枪打死陈修文，其后自杀，于新野也自杀身亡，只有李伟信没有按照三人事前的共同自杀的约定，放了空枪，侥幸活了下来，成为小舰队一系列图谋的少有的见证者之一。

坐镇在第一线的周恩来彻夜未眠，事后他的保健医生回忆，在整个九·一三事件中，周恩来长达 50 个小时没有休息。周恩来要求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内的领导干部都不要离开此地，也不要给家里打电话，周恩来还命令任何人不能轻易走进新疆厅，以致于铁道兵司令员刘贤权也一度被拦在外面。【注 35】

（《周恩来卫士回忆录》123 页）周恩来的保健医生走进周恩来的临时办公室，发现叶剑英在绕圈子散步，而张春桥则不发一语的吸烟。总参谋长黄永胜进来向周恩来汇报情况，周恩来破天荒的没有让黄永胜坐下来，而且竟然没有抬头搭理黄永胜，这在平素很讲礼节的周恩来或许是一个不寻常的例外。【注 36】（《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个保健医生的回忆》239 页）

9月13日晨，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给周恩来打来电话，告诉周恩来，他已经派部队占领了南京的全部机场，辖区内其他机场也被控制起来，并请毛泽东、周恩来放心。周恩来在身边工作人员的好意劝阻下终于进餐。不久，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也打来电话，当时负责值班的秘书记录下了丁盛的表态：请报告总理，他忠于毛主席、听毛主席的、听周总理的，周总理怎么说，他怎么办，他已经遵照总理的指示办了。1971年9月14日下午四点，也就是周恩来服下安眠药不到三个小时，王海容来电话要见周恩来，周恩来马上起身接见，王海容手执密信，周恩来让秘书纪东给他读信，信中说的就是一架军用飞机在蒙古失事，周恩来听后即向毛泽东汇报。这个情节是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回忆的。

【注37】（《周恩来卫士回忆录》127页）按照《周恩来年谱》和《周恩来传》的记载，周恩来是在收到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特急报告后得知林彪一行数人摔死的消息的，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的回忆中也有类似内容。而有一点则是上述所有记载都几乎雷同的，那就是周恩来的心情不错，连说“摔死了、摔死了”，为此周恩来还破例喝了茅台酒。周恩来担心毛泽东身体，很快赶到毛泽东居住的人民大会堂118厅处，他对毛泽东说：“请主席放心，您回去休息吧。”毛泽东虽然松了一口气，可还是有点不放心，汪东兴回忆：毛主席想了一下，问我：“这个消息可靠不可靠？为什么一定要在空地上坠下来？是不是没有油了？还是把飞机场看错了？”我对毛主席说：“飞机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不清楚，大使准备去实地勘察。目前还不知道飞机是什么原因坠落下来的。”毛主席又问我：“飞机上有没有活的人？”我对毛主席说：“这些情况都不清楚，还要待报。”【注38】（《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212页）

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30分，林彪座机在紧急迫降时于蒙古国肯特省温都尔汗西北70公里处坠毁，精确位置是东经111度17分，北纬47度41分。机上9人包括林彪夫妇、林立果等人均告死亡。关于林彪坠机身亡和256号飞机的一些情况，国内目前出版的不少书籍、杂志上都有长篇累牍的介绍，特别是孙一先的《在大漠那边》尤为突出，所以，本书行文到此无意于再继续纠缠这些已经逐渐明朗的细节，林彪作为一个政治人物，从他决定出逃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自我宣告了在政治上的死亡。林彪的死不但是林彪自己不折不扣自毁前程的独立死亡，也是一场极左运动带给国家、人民、民族的浩劫的死亡的先兆。

林彪死讯传来，远在江西的邓小平说了一句“林彪不死，天理难容。”而久系图圈的彭德怀在1972年8月23日夜突然说：“打电话给周总理，我相信他（林彪）是革命的，这样把林彪杀了我有意见，他死我不同意。叫周恩来总理亲自参加这个审查，请打电话给周恩来总理、董必武副主席，叫他们亲自来审我，我不活了。”这时的彭德怀因为经年日久的折磨，已经有些精神恍惚，特别是半夜这个时间。果然，不过一个多月，也就是10月19日，彭德怀又说：

“《一个阴谋家的丑史》这本书很好，是针对林彪写的。”“林彪不是喊‘毛主席万岁’喊得最多吗？巴枯宁也是和他一样，早先也是喊马克思喊得很多。叫他们把这本书尽快地给我买来，我要看一看。”【注 39】（《彭德怀年谱》836 页）在这里，彭德怀把林彪比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叛徒巴枯宁，应该说这才是彭德怀的本意，才是他对林彪真实的评价。当外交部符浩把这个消息传给中国驻法国大使黄镇时，黄镇不仅打开房间所有的灯，还情不自禁的开启一瓶珍藏多年的茅台酒以示庆祝，符浩说，这是他平生所喝的最美的酒。【注 40】（《风云沧桑集—符浩文集》159 页，2001 年 5 月第一版，世界知识出版社）

而作为一直紧张处理林彪事件的周恩来，却在得知林彪死讯不久突然大放悲声，关于这一情景，我们还是来看看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的回忆吧：1971 年 9 月 13 日林彪乘飞机外逃，……有一个情节鲜为人知：中国驻蒙古大使馆派人带回的照片，证实了林彪的确折戟沉沙，自取灭亡之后，不断有面色严峻的国家领导人脚步匆匆进出于人民大会堂，弥漫着高度紧张气氛的东大厅里终于恢复了往日的平静。其他人都已经如释重负地离开了，屋里只剩下周恩来、纪登奎。突然，一阵嚎啕之声如江水崩堤猛然暴发，这是一种长久的压抑到了极限，终于无法再压抑而暴发的哭声，一种痛楚无比撕肝裂肺的痛哭。纪登奎一下呆住了：不是亲眼目睹，他压根儿不会相信，发出这种哭声不是别人，正是面对墙壁双肩颤抖的周恩来！就是刚才还和大家一样露出久违的笑容，举杯庆祝这不幸中的万幸的周恩来！自从调到中央工作，纪登奎看到的周恩来永远是从容、镇定、乐观。……像今天这样的失控，纪登奎是第一次看见，真感到太意外了，太震动了，以至于平时反应敏捷极善言辞的他，此刻也乱了方寸，话说得结结巴巴：“总理，总理，林彪一伙摔死了，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应该说是最好的结局了，您该高兴，对不？！”讲完他自己才意识到，自己分明在重复着总理刚才讲的话。周恩来回过身来，双肩依然在颤动，脸上老泪纵横，他摇着头，声音嘶哑地反复说：“你不懂，你不懂！”【注 41】（周秉德著，铁竹伟执笔，载《我的伯父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八章《苦涩的辉煌》283—346 页。）显然，周恩来哀恸的并非林彪之死，而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的灾难。林彪虽死，但是，文革造就的另外一个政治集团—江青集团正跃跃欲试，诺大的中国需要面对的考验还远远没有因为林彪的死亡而结束，相反更多的不测的政治风云还将此起彼伏，这才是周恩来忧心忡忡以致于失态的原因所在。

#### 第四节：身后余波

就在林彪等人叛逃成为事实的次日也就是9月14日，鲁珉开始寻找自首的出路了。对于选择这样一条路，鲁珉还是颇费周折。他先是考虑到如果贸然说出林立果派他去刺杀毛泽东的情况而林彪父子当时仍旧在台上、证人（指周宇驰、江腾蛟）也不可能有积极的表示，很容易坏事。继而，他考虑去找毛泽东的亲家张文秋（刘思齐、邵华的母亲），仍未果。接着，他决定找他的同学鲁瑛（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德在他的《庐山会议和林彪事件》一文（载《回首文革》第四卷1212—1248页）称鲁珉是鲁瑛的弟弟，是为不确。鲁瑛也表示很难为鲁珉接洽上周恩来或者毛泽东。这样，鲁珉决定去找李德生，鲁珉向李德生揭发了林立果等人的政变活动，纪登奎要求鲁珉把这些写成材料，毛泽东听到鲁珉自首的情况后还嘱咐说：“好好把眼睛治好，将来继续为党工作。”李德生还勉励鲁珉说这算是“半起义”。【注42】（《风云九一三》306、307页）

鲁珉自首，“四大金刚”却无动于衷。他们还不知道林彪叛逃的情况，这里唯一算是知道一些情况的当属黄永胜。因为叶群和他有着不同寻常的暧昧关系，就在林彪下达“盼照立果、宇驰同志传达的命令办”那个手令不久，黄永胜也接到叶群捎来的密信，信中称：“现在情况紧急，我们决定在上海动手。”1971年9月10日晚，黄永胜又收到林彪给他的那份手令，林立果还托人嘱咐黄永胜要做好一切思想准备。10日上午，黄永胜、叶群多次通话，最长的两次分别为90分钟和135分钟。11日下午，林立果给黄永胜来信，告诉黄，等政变一发动，北京的一切由黄永胜指挥。然而，黄永胜却没有叶群、林立果那样乐观，他深知当时的情形完全不利于林彪集团，所以，从9月6日他收到李作鹏送来的刘丰关于毛泽东南巡谈话的内容后便忧心忡忡，至11日又接到林立果的最后命令，他知道他的政治生涯可能面临绝路。他把凡是能够证明他与叶群、林立果、林彪关系、联系的照片、信件、笔记、材料一律烧毁。13日开始，他还和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频繁通话，要他们也把记载了黄永胜的讲话的小本子烧毁。【注43】（《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311、312页）据说，黄永胜为了烧毁这些材料以致于家里的两个大缸都烧裂了。黄吴李邱的问题，毛泽东亲口交待过：“看他们十天，叫他们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老同志，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交代好了就行。”基于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在传达林彪叛逃的57号文件时，还是要黄永胜出面。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徐向前传》的第22章《在十年动乱中》曾有这么一段精彩的描写，兹录于下：“‘九·一三’事件后的第一天，三座门会议室里充满了严肃的气氛。工作人员听说很久没有露面的老师们都要来开会，觉得这个会非同寻常。黄永胜一反常态，早早地站在门口迎候老师。徐向前走进来，黄永胜迎上去问好。老师面无表情，不予理睬。聂帅来了，黄永胜急忙迎上去，并解释说在北戴河没有去看老师。聂帅说：‘划清界限嘛！’黄永胜十分尴尬、狼狈。会议由黄永胜传达中央第57号文件，通报林彪叛逃，机毁人亡。黄永胜作贼心虚，浑身颤抖，念文件语不成句，只好由别人代读。· · · · · · 会议

一结束，黄永胜的司机习惯地第一个把车子开到了门口。黄永胜急得大声叫喊：“开走，开走，让老师们先走！”司机被弄得莫名其妙。”

9月21日下午，陈毅有些不解的和熊向晖讲，为什么要黄永胜来传达中央的这份文件？言外之意就是黄永胜本身就是林彪集团的骨干，林彪跑了，黄永胜能脱的了干系？9月22日下午，黄永胜在总参谋部问熊向晖：“是不是主席在今年7月间，问过庐山会议的事？”熊向晖回答：“是的。”黄又问：“我犯了错误，你是不是对主席说你不知道？”熊向晖回答：“我的确不知道。”黄永胜对与会者说：“我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犯了宗派主义错误，我上了林彪的贼船。之所以上了他的贼船，是因为我认为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的最高，我上当了。”【注44】（《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413页）黄永胜直到这时候还在为自己的罪恶做这种不负责任的辩护，以他和林彪、叶群的关系特别是和叶群的关系，能用一个“上当”解释吗？他在文革中的权倾一时能用一个“上当”解释吗？至于他积极参与林彪集团在政治上的诬陷他人、清洗异己又怎么能用一个“上当”解释？谁能相信具有赫赫战功、经验丰富的战将在他的晚年居然是在“上当”的情况下完成的那些助纣为虐的行径？

黄吴李邱并没有给予毛泽东的温和的调子以积极的回应。据汪东兴回忆：十天后，毛主席把我找到他的住处说：“黄永胜他们怎么处理了？你去问一问总理。”于是，我马上赶到人民大会堂新疆厅向周总理汇报，说毛主席催问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周总理让我等一下，等他接见完外宾后，同他一起乘车去见毛主席。当我同周总理到达中南海毛主席住所后，周总理向毛主席报告说，黄永胜他们在拼命烧材料。毛主席说：“是啊，那是在毁证据嘛。这些人在活动，这些家伙是要顽抗到底了。”周总理对毛主席说：“我马上办。今天晚上办不成。明天早上一定办成。”周总理和我从毛主席那里出来后。周总理说：“你不能离开中南海了。要严加保卫毛主席的安全。我们有事时可以找张耀祠、杨德中，必要时找你。”我当时向周总理建议不要在集体开会时解决，要分开来。一个人、一个人地办。后来是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宣布的对黄永胜等人的处理决定。当时，怕他们反抗，把福建厅的烟缸、茶杯等都端走了。周总理对他们宣布说：“限你们十天坦白交代，争取从宽处理，你们不听。这个事还小呀，还有什么事比这个事更大！你们对党对人民是犯了罪的。现在宣布对你们实行隔离审查。”【注45】（《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217、218页）

吴德的记忆和汪东兴回顾的略有不同，吴德说：“9月23日晚上……我进去时，看见汪东兴、杨德中在那里，汪东兴和杨德中都说，黄吴李邱这些人是军权在握，再不动他们很危险，这个事应该处理。我们正说着，周总理来了，汪东兴向周总理讲了要处理黄永胜等人的意见。杨德中说黄永胜在烧材料。周总理说，你们先等一等，说完他就同汪东兴一块去了。过了不长时间，……周总理回来了，周总理告诉我们，毛主席已经批准了，把黄吴李邱逮捕起来。我

们研究了逮捕黄永胜这些人的办法。周总理对我说，明天早上李先念同志要去越南访问，他自己去送，邱会作也去送，让我也去，从机场回来时，对邱会作说有毛主席的指示要传达，这样就可以先抓邱会作。周总理说：另外再通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来人民大会堂开会，会议是听传达毛主席的指示，黄永胜等人来后，先跟他们谈话，然后再逮捕。周总理让我回去同吴忠商量，由卫戍区落实逮捕、押送、关押地点等问题。我们对卫戍区是这样布置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来后，周总理和叶帅、纪登奎先与他们谈话，然后把他们带走。黄、吴、李分别由卫戍区的司令员、副司令员、副政委陪同，关押地点安排在卫戍区的第三师。布置好卫戍区的准备工作后，我到人民大会堂汇报，周总理、叶剑英、纪登奎在场。我记得是在东大厅的小房子里边，我们四个人坐在一张方桌旁。第二天早上，我们在飞机场送先念同志时，周总理镇定自然，谈笑风生。我是很紧张的，心里老觉得绷着。邱会作从机场回来后，周总理、叶帅和纪登奎跟他先谈话，然后有人把他带走了。通知黄永胜等人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后，他们过了半小时都没来，周总理、叶剑英、纪登奎和我坐在那里焦急地等。叶帅问卫戍区有没有部队在黄永胜等人住地附近。我打电话问了吴忠，然后向叶帅报告说，有一个团在附近。叶帅说：如果他们不来，或者抵抗，就用硬办法把他们逮捕。又过一段时间，黄永胜等人来了。周总理、叶帅、纪登奎到福建厅去与他们谈话、宣布决定，周总理让我和吴忠等候在东大厅，招呼卫戍区的人。周总理与他们的谈话谈了很久，我听到黄永胜在嚷嚷，说他们冤枉等等。我们又等了很久，怕出意外，我让吴忠到会场上看一看情况，吴忠进去后又等了一段时间，他们才出来。黄永胜是第一个出来的，吴法宪好像是第二个，他们依次被带走了。”【注46】（《回首文革》第四卷1239—1241页）

周恩来的卫士高振普还回忆了这么一个有关邱会作的情节：“由机场返回的路上，杨德中坐在总理的车上，周总理对杨德中说：‘咱们把车开快一点，先一步到大会堂，再与邱会作谈一谈，争取他多交待一些问题。’……到大会堂北门，杨德中虽是抢先一步下车，已来不及了，执行人员已对邱会作实施隔离。”周恩来对“四大金刚”还进行了必要的政策宣读，周恩来说：“你们放心，你们的问题是你们的事，你们的家属、孩子不会受到牵连，这是我们党一贯政策，不会像你们当年对待叶帅那样，叶帅的孩子你们都不放过，今天叶帅在座，他不会那样的。”【注47】（《周恩来卫士回忆录》130、131页）周恩来所说的在吴德回忆中也有体现：我对周总理说，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的秘书、警卫、司机怎么处理。当时，把这些人的枪、公文包都缴了，他们坐的汽车也都搜查了。周总理说：卫戍区找一个地方，农场或者别的什么地方，把他们弄到那里去办学习班，让他们学习、揭发，不要让他们太紧张了，黄、吴、李、邱有问题，并不等于他们有问题。后来的事实证明，黄吴李邱在关押期间受到了足够的优待，比起文革中他们制造的那些冤假错案里的刑讯逼供简直是天壤之别。

黄吴李邱被隔离审查标志了林彪集团的基本覆灭，其他余党也先后落网。毛泽东在林彪问题上初衷一直未变，吴德回忆：10月8日，毛主席接见塞拉西皇帝。我和肖劲光同志提前到达接见地点等候。外宾来访之前，我们进去见毛主席，发现他老人家满脸倦容。毛主席缓慢地说：治病救人嘛，有病也不让治。他说原来准备在三中全会时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准备安排林彪的工作的。毛主席还说：高岗不自杀，也准备安排他的工作。显然，关于林彪的事情，他到这时还没有撇下，甚至还困扰着他。【注48】（《回首文革》第四卷1241、1243页）不久，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逐级传达到全党、全国、全军。1971年12月11日和1972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先后下达了《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的材料之一、之二。毛泽东还坚持把“571工程纪要”下发。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正式批准《关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罪行的审查报告》，对林彪从政治上宣判了死刑。

然而，林彪事件带给中国政治的影响却远没有因为林彪的摔死而告终。一方面因为林彪的叛逃给原本一些受压的老干部的解放工作带来一线希望，一大批老干部陆续受到关照先后从关押地、流放地回来了。另一方面“批林整风”运动在推行过程中仍旧受到来自极左思潮的干扰。在批判林彪的初期，有些地方、有些干部群众都表示有些实际困难，意即林彪的“罪行好批，谬论难驳”，有些地方则反映批林之后反而证明刘少奇当初的话对了，在还继续坚持极左路线的大背景下，“批林整风”进入了一个怪圈，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六中全会之后对文化大革命进行了彻底的否决，林彪的实质性犯罪活动才大白于天下。八十年代初，中国政府对江青、林彪两案的审理从根本上宣判了林彪的一切罪名，这次审判具有相当的权威性，为以往存在的种种偏差做了公正的矫正，这是迄今为止最有说服力的审判，也是对林彪盖棺论定的裁决。

有关林彪的最后评价，我们还是来听听陈云、杨尚昆、黄克诚他们是怎么说的吧。一九八三年陈云曾说：“林彪作为四野的司令员，在当时正确的地方，我们不必否定。……对林彪还是要实事求是地写。我们对待历史人物，不能因为一个人犯了错误就否定一切，也不能因为一个人一时正确就写成一贯正确。”一九八五年，杨尚昆在《红军长征》等史料丛书编纂工作会议上强调：“林彪，他最后走上了叛国的道路。但不能因为他叛国，就对他一概否定，而不作全面的、历史的评价。林彪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打日本，特别是在东北解放战争中，还是有功的。”黄克诚说：林彪在我军历史上是有名的指挥员之一，他后来犯了严重的罪行，受到党纪国法的制裁，这是罪有应得。但是在评价他的整个历史时，应当分为两节，一节是他在历史上对党和军队的发展、战斗力的提高，起过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是他后来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严重破坏，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这样，两方面都写明确，不含糊，才符合历史事实。……据我了解，林彪的确有指挥作战的能力。他生前我是这么讲，他死后我还是这么说。有人说林彪不会打仗，这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不符合历史事实。……解放战争时期，一九四五年冬我们进军东北的部

队是十万多人，经过三年，到一九四八年十二月部队进关时是一百多万人。带十万人进去，带一百多万人回来，建立了东北那么大的解放区。当然，这不是林彪一个人的功劳，这是整个东北局和东北部队指战员和东北人民的功劳，但是林彪是主要负责人，也不能抹煞这一点。不然外国人会说我们写历史不顾历史事实。在‘林彪’这条释文中，对他的成绩也需要写具体一点，概括地写几句话。譬如，他与陈云、罗荣桓、李富春同志，共同领导了东北的解放战争，解放了整个东北，后来进关指挥了平津战役，解放华北，以后又进军中南，直到中南地区全部解放，他才回来休息。总之，对他历史上的成绩也要概括地点出来。· · · 至于他后期的问题，属于另外一个性质，那不是错误，而是严重的罪行。他坐飞机外逃，机毁人亡，身败名裂，自己给自己作了结论，这要严肃批判，当然也是按照历史事实表述出来。总起来说，我的意见就是要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用历史学者的态度，来写林彪的历史，好的，坏的，两方面都写，不要只写一方面。” 【注 49】（《黄克诚自述》377—381 页）

我们经常说历史是公正的，历史是人民书写的，的确如此。1989 年 11 月，经中央军委确定，33 人被冠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的称号，1994 年 8 月又确定增补 3 人，共计 36 人。他们是：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德怀、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林彪、杨尚昆、李先念、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萧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叶挺、许继慎、蔡申熙、段德昌、曾中生、左权、彭雪枫、罗炳辉、黄公略、方志敏、刘志丹。在这三十六位军事家的名单中，我们看到了林彪的名字，历史并没有因为林彪最后的叛逃而否认他的前半生的功绩，自然也不会因为他前半生的功绩来忽略他晚年的罪恶。

（全书终）

## 《晚年林彪》注引和出处

### 第一章：林彪与毛泽东的历史渊源

- 【注1】** 陈士渠著，《从井冈山走进中南海—陈士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 10 月第一版，112 页。
- 【注2】** 萧克著，《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7 年 6 月第一版，123 页。
- 【注3】** 《陈毅谈井冈山时期的林彪》，《党史博览》2003 年第十期。
- 【注4】** 江华著，《追忆与思考—江华回忆录》，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7 月第一版，89 页。
- 【注5】**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12 月第一版，64 页。
- 【注6】** 同【注 4】，94 页。
- 【注7】** 黄克诚著，《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12 月第二版，113 页。
- 【注8】**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178 页。
- 【注9】** 萧克著，《朱毛红军侧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 1 月第一版，98 页。

- 【注10】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 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第一版，211 页。
- 【注11】 同【注 4】，97 页。
- 【注12】 同【注 10】，212 页。
- 【注13】 同【注 4】，94 页。
- 【注14】 粟裕著，《粟裕战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8 年 11 月第一版，41 页。
- 【注15】 同【注 7】，380、381 页。
- 【注16】 同【注 10】，311 页。
- 【注17】 钟文、鹿海啸著，《百年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 1 月第一版，69 页。
- 【注18】 李志英著，《博古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第一版，96 页。
- 【注19】 同【注 10】，333 页。
- 【注20】 同上，334 页。
- 【注21】 同【注 7】，113 页。
- 【注22】 耿飚著，《耿飚回忆录》上，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1 月第一版，146 页。
- 【注23】 同上，158、160 页。
- 【注24】 孙毅著，《孙毅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1 年第一版，113 页。
- 【注25】 伍修权著，《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 5 月第一版，111 页。
- 【注26】 同上。
- 【注27】 聂荣臻著，《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版，202 页。
- 【注28】 同上，213、214 页。
- 【注29】 张聂尔著，《中国 1971—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 1999 年 6 月第一版，53 页。
- 【注30】 同【注 25】。

- 【注31】 李敏著，《我的父亲毛泽东》，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第一版，170 页。
- 【注32】 彭德怀著，《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12 月第一版，198 页。
- 【注33】 同【注 27】，259 页。
- 【注34】 同【注 32】，199 页。
- 【注35】 同【注 33】。
- 【注36】 杨尚昆著，《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第一版，134 页。
- 【注37】 同上。
- 【注38】 同【注 7】，151、152 页。
- 【注39】 同【注 36】。
- 【注40】 程中原著，《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 7 月第一版，223 页。
- 【注41】 同【注 36】。
- 【注42】 同【注 36】，136 页，
- 【注43】 同【注 40】。
- 【注44】 同【注 42】。
- 【注45】 同【注 34】。
- 【注46】 同【注 32】，200 页。
- 【注47】 同【注 32】，199 页。
- 【注48】 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6 月第一版，189 页。
- 【注49】 谢春涛著，《庐山风云：庐山会议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年 11 月第一版，189 页。
- 【注50】 同【注 48】，213 页。
- 【注51】 王平著，《王平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6 月第一版，86 页。
- 【注52】 同【注 36】，163 页。

- 【注53】 叶子龙著，《叶子龙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27 页。
- 【注54】 《李先念传》编写组著，《李先念传 1909—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9 年 6 月第一版，311 页）
- 【注55】 同【注 54】。
- 【注56】 同【54】，318 页。
- 【注57】 师哲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一版，231、232 页。
- 【注58】 埃德加·斯诺著，《西行漫记》，战士出版社 1979 年 12 月第一版，66、69 页。
- 【注59】 刘统著，《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东方出版社 1997 年 8 月第一版，111 页。
- 【注60】 同【注 59】，114 页。
- 【注61】 同【注 59】，115 页。
- 【注6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 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年版，68 页。
- 【注63】 同【注 62】，70 页。
- 【注64】 同【注 62】，74 页。
- 【注65】 同【注 62】，76 页。
- 【注66】 同【注 7】，236、237 页。
- 【注67】 同【注 62】，83 页。
- 【注68】 同【注 59】，189 页注引处。
- 【注69】 同【注 7】，237 页。
- 【注70】 同【注 62】，187 页注引处。
- 【注71】 黄瑶等著，《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版，456 页。
- 【注72】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战士出版社 1981 年 12 月第一版，476、477 页。

- 【注73】** 同【注71】，477、478页。
- 【注74】** 黄瑶等著，《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457页。
- 【注75】** 同【注62】，352、353页。
- 【注76】** 同【注73】，474页。
- 【注77】** 詹时圃著，《毛主席军事路线伟大胜利—批判林彪在辽沈、平津两大战役中的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人民出版社1975年1月第一版。
- 【注78】** 张文杰等主编，《纪念朱理治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557页。
- 【注79】** 同【注77】，559页。
- 【注80】** 张麟著，《徐海东将军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2月第一版，155、170、171页。
- 【注81】** 李原著，《只唯实—阎红彦上将往事追踪》，云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5月第一版，20、21页。
- 【注82】** 同【注80】，21页。
- 【注83】** 同【注80】。
- 【注84】** 同【注57】，166页。
- 【注85】** 张明远著，《我的回忆—张明远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372页。
- 【注86】** 刘树发著，《陈毅年谱》，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第一版，419页。
- 【注87】** 当代中国人物传记编辑部编，《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295页。
- 【注88】** 同【注86】，296页。
- 【注89】** 同【注86】，297页。
- 【注90】** 《革命回忆录》丛书第九辑，人民出版社1983年4月第一版，167页。
- 【注91】** 黎玉著，《黎玉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4月第一版，250、251页。

- 【注92】 林蕴晖著，《一个伟人的奋斗与命运—刘少奇之路（三）》，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1 年 12 月第一版，795 页。
- 【注93】 同【注 91】，796 页。
- 【注94】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上卷 235、236 页。
- 【注95】 同【注 93】，234 页。
- 【注96】 薄一波著，《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年 3 月第一版，375 页。
- 【注97】 同【注 91】，787 页。
- 【注98】 同【注 91】，775 页。
- 【注99】 同【注 91】，793 页。
- 【注100】 同【注 10】，278 页。
- 【注101】 同【注 84】，381 页。
- 【注102】 同【注 84】，557 页。
- 【注103】 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11 月第一版，760 页。
- 【注104】 同【注 91】，797、798 页。
- 【注105】 同【注 10】，280 页。
- 【注106】 同【注 53】，201 页。
- 【注107】 同【注 84】，423 页。

## 第二章，在庐山崛起

- 【注1】** 廖汉生著，《廖汉生回忆录（续）》，解放军出版社 2003 年 9 月第一版，110 页。
- 【注2】** 同上。
- 【注3】** 同【注 1】，85 页。
- 【注4】** 王颖著，《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四，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年 1 月第一版，142 页。
- 【注5】** 李曼村等主编，《刘伯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2 年版，651、652 页。
- 【注6】** 张宗逊著，《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0 年 10 月第一版，448 页。
- 【注7】** 萧克著，《萧克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7 年 6 月第一版，442 页。
- 【注8】**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 1998 年 3 月第一版，637 页。
- 【注9】** 同【注 5】，656、657 页。
- 【注10】** 同【注 8】，642 页。
- 【注11】** 同【注 8】，643 页。
- 【注12】** 同上。
- 【注13】** 从进著，《1949—1989 年的中国—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12 月第一版，282 页。
- 【注14】** 同【注 5】，658、659 页。
- 【注15】** 同【注 7】，447 页。
- 【注16】** 同【注 7】，448 页。
- 【注17】** 同【注 7】，449 页。
- 【注18】** 程中原等著，《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 1975》，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3 年 10 月第一版，188 页。

- 【注19】 刘英著，《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年 9 月第一版，127 页。
- 【注20】 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11 月第一版，755 页。
- 【注21】 同【注 7】，450 页。
- 【注22】 同【注 5】，663、664 页。
- 【注23】 同【注 7】，450、451 页。
- 【注24】 同【注 13】，289 页。
- 【注25】 同上。
- 【注26】 同【注 7】，451 页。
- 【注27】 同【注 8】，688 页。
- 【注28】 同上。
- 【注29】 同上。
- 【注30】 同【注 5】，664 页。
- 【注31】 同【注 7】，451 页。
- 【注32】 同【注 30】。
- 【注33】 同【注 13】，290 页。
- 【注34】 李普著，《记刘帅》，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 年 11 月第一版，541 页。
- 【注35】 同【注 1】，134 页。
- 【注36】 同【注 13】，291 页。
- 【注37】 同【注 5】，665 页。
- 【注38】 同【注 13】，291 页。
- 【注39】 同【注 13】，294 页。
- 【注40】 同【注 37】。
- 【注41】 同【注 38】。
- 【注42】 同【注 5】，660 页。
- 【注43】 同【注 13】，292 页。
- 【注44】 同【注 7】，452 页。
- 【注45】 同【注 7】，455 页。

- 【注46】 同上。
- 【注47】 同【注7】，452、453页。
- 【注48】 同【注7】，456页。
- 【注49】 钟期光著，《钟期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10月第一版，524页。
- 【注50】 同【注5】，668页。
- 【注5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188页。
- 【注52】 同【注49】，525—532页。
- 【注53】 同【注7】，456页。
- 【注54】 同【注49】，528页。
- 【注55】 同【注7】，457页。
- 【注56】 新华网新闻资料库提供。
- 【注57】 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征集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专题研究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二）》，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10月第一版，232页。
- 【注58】 同【注8】，43页。
- 【注59】 同【注57】，233页。
- 【注60】 彭德怀著，《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一版，143页。
- 【注61】 同上。
- 【注62】 薄一波著，《领袖元帅与战友》，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一版，182页。
- 【注63】 同【注60】，173页。
- 【注64】 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一版，292页。
- 【注65】 同上。
- 【注66】 王焰等编，《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103页。
- 【注67】 同【注64】。

- 【注68】** 同【注 60】，174、175 页。
- 【注69】** 同【注 60】，176 页。
- 【注70】** 同上。
- 【注71】** 彭德怀传记编写组编，《一个真正的人—彭德怀》，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10 月第一版，50 页。转引彭德怀《庐山笔记》。
- 【注72】** 李锐著，《庐山会议实录》，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6 月第一版，307 页。
- 【注73】**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6 月版，551 页。
- 【注74】** 聂荣臻著，《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版，359 页。
- 【注75】** 同【注 64】，487、488 页。
- 【注76】** 同【注 64】，487 页。
- 【注77】** 同【注 60】，223 页。
- 【注78】** 同【注 60】，224 页。
- 【注79】** 王建英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汇编—领导机构沿革和成员名录》，红旗出版社 1983 年版，296 页。
- 【注8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年 3 月第一版，393 页。
- 【注81】** 同【注 60】，225 页。
- 【注82】** 同【注 60】，177 页。
- 【注83】** 同【注 66】，224 页。
- 【注84】** 同【注 60】，238 页。
- 【注85】** 同【注 66】，214 页。
- 【注86】** 薄一波著，《七十年奋斗与思考》，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年 3 月第一版，367 页。
- 【注87】** 同【注 86】，369、370 页。
- 【注88】** 杨尚昆著，《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1 年 9 月第一版，203 页。
- 【注89】** 同【注 86】，371 页。

- 【注90】 同【注 88】。
- 【注91】 同上。
- 【注92】 同上。
- 【注93】 同【注 66】， 227 页。
- 【注94】 师哲著，《在历史巨人身边（师哲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1 年 12 月第一版，270 页。
- 【注95】 同【注 72】， 73 页。
- 【注96】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第一版，下卷 1010 页。
- 【注97】 力平著，《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4 年 8 月第一版，356、362、363 页。
- 【注98】 同【注 62】， 292 页。
- 【注99】 同【注 96】， 上卷 771 页。
- 【注100】 谢春涛著，《庐山风云：庐山会议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年 11 月第一版，32 页。
- 【注101】 同【注 100】， 44 页。
- 【注102】 同【注 60】， 266 页。
- 【注103】 同【注 72】， 36 页。
- 【注104】 同【注 8】， 724 页。
- 【注105】 黄克诚著，《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12 月第二版，301 页。
- 【注106】 程中原著，《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 7 月第一版，645 页。
- 【注107】 同【注 100】， 48 页。
- 【注108】 同【注 72】， 63、64 页。
- 【注109】 同【注 8】， 740 页。
- 【注110】 同【注 8】， 738—740 页。
- 【注111】 同【注 100】， 90 页。
- 【注112】 同【注 66】， 594 页。

- 【注113】 同【注 71】， 241—243 页。
- 【注114】 同【注 8】， 741、742 页。
- 【注115】 同【注 100】， 105 页。
- 【注116】 同【注 105】， 302 页。
- 【注117】 同【注 71】， 255 页。
- 【注118】 同【注 116】。
- 【注119】 同【注 8】， 742 页。
- 【注120】 同【注 96】， 979 页。
- 【注121】 同【注 96】， 983 页。
- 【注122】 同【注 72】， 72、73 页。
- 【注123】 同【注 106】， 671 页。
- 【注124】 同【注 100】， 140—151 页，有删节。
- 【注125】 同【注 105】， 305 页。
- 【注126】 回忆张闻天编写组编，《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316 页。
- 【注127】 同【注 8】， 745 页。
- 【注128】 官伟勋著，《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3 年 5 月第一版，215 页。
- 【注129】 同【注 105】， 316 页。
- 【注130】 同【注 8】， 743 页。
- 【注131】 同【注 8】， 744 页。
- 【注132】 丁群著，《刘顺元传》，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340—342 页。
- 【注133】 同【注 8】， 744、745 页。
- 【注134】 同【注 66】， 664 页。
- 【注135】 同【注 105】， 308 页。
- 【注136】 同【注 100】， 170 页。
- 【注137】 同【注 66】， 622 页。
- 【注138】 同【注 72】， 182 页。
- 【注139】 同【注 72】， 185 页。

- 【注140】 同【注 72】， 200—202 页。
- 【注141】 同【注 66】， 210 页。
- 【注142】 同【注 8】， 561、562 页。
- 【注143】 同【注 8】， 746 页。
- 【注144】 同【注 62】， 174、175 页。
- 【注145】 同【注 143】。
- 【注146】 同【注 72】， 234、235、236、239 页。
- 【注147】 同【注 72】， 246 页。
- 【注148】 同【注 8】， 771 页。
- 【注149】 同【注 8】， 556、565 页。
- 【注150】 同【注 8】， 747 页。
- 【注151】 同【注 105】， 312 页。
- 【注152】 郑笑枫等著，《陶铸传》，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2 年 11 月第一版，275、276 页。
- 【注153】 同【注 151】。
- 【注154】 同【注 105】， 313、314 页。
- 【注155】 同【注 105】， 316 页。
- 【注156】 宋任穷著，《宋任穷回忆录（续）》，解放军出版社 1996 年 8 月第一版，351、352 页。
- 【注157】 同【注 20】， 793 页。
- 【注158】 周维仁著，《贾拓夫传》，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3 年 3 月第一版，179—181 页。
- 【注159】 同【注 159】， 186 页。
- 【注160】 罗印文著，《邓华将军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 年 8 月第一版，286 页。
- 【注161】 同【注 160】， 288 页。
- 【注162】 同上。
- 【注163】 同【注 13】， 304、305 页。
- 【注164】 同【注 160】， 297 页。

**【注165】** 万毅著，《万毅将军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8 年 11 月第一版，238、239 页。

**【注166】** 同【注 165】，253 页。

**【注167】** 同【注 165】，255 页。

**【注168】** 同【注 165】，257 页。

**【注169】** 同【注 165】，258、259 页。

**【注170】** 同【注 105】，319 页。

**【注171】** 同【注 105】，320 页。

**【注172】** 金冲及主编，《朱德传》，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696 页。

**【注173】** 同【注 13】，306、307 页。

**【注174】** 同【注 172】。

**【注175】** 同【注 8】，750 页。

**【注176】** 同【注 13】，304、305 页。

**【注177】** 同【注 96】，下卷 939 页，莫志斌著《邓小平与毛泽东一说不尽的世纪两伟人》，人民出版社 2004 年 8 月第一版，50 页。

### 第三章：神化毛泽东的背后

**【注1】**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第一版，上卷 504 页。

- 【注2】** 同【注1】，上卷793页。
- 【注3】** 同上。
- 【注4】** 谢春涛著，《庐山风云：庐山会议简史》，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11月第一版，248、249页。
- 【注5】** 林彪著，《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人民出版社1959年9月第一版，8、13页。
- 【注6】** 江波等著，《林彪1959年以后》，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5页。
- 【注7】** 黄瑶等著，《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版，439页。
- 【注8】** 严家其、高皋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一版，190、191页。
- 【注9】** 钟文、鹿海啸著，《百年小平》，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69页。
- 【注10】**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5月第一版，283、284页。
- 【注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第一版，中卷296、297页。
- 【注12】** 《陈赓传》编写组编，《陈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2003年2月第一版，5页。
- 【注13】** 乔希章著，《大将谭政》，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222页。
- 【注14】** 同【注13】，322页。
- 【注15】** 同【注13】，324、325页。
- 【注16】** 同【注13】，325、326页。
- 【注17】** 从进著，《1949—1989年的中国—曲折发展的岁月》，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第一版，313页。
- 【注18】** 同【注17】，313、314页。
- 【注19】** 张云生著，《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1988年7月第一版，377页。

- 【注20】** 同【注13】，356页。
- 【注21】** 同【注17】，319页。
- 【注22】** 同【注13】，348页。
- 【注23】** 黄克诚著，《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二版，323页。
- 【注24】** 同【注4】，261、262页。
- 【注25】** 同【注13】，353页。
- 【注26】** 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364页。
- 【注27】** 同【注1】，下卷1711页。
- 【注28】** 黄瑶等著，《罗荣桓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353页。
- 【注29】** 同【注26】，365页。
- 【注30】**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44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年11月第一版，81页。
- 【注31】** 同【注26】，813页。
- 【注32】** 同【注28】，577、578页。
- 【注33】** 同【注28】，578、579页。
- 【注34】** 同【注26】，811页。
- 【注35】** 同【注28】，591页。
- 【注36】** 同【注28】，592页。
- 【注37】** 同【注28】，594页。
- 【注38】** 同上。
- 【注39】** 同【注26】，836页。
- 【注40】** 同【注26】，841页。
- 【注41】** 龚育之著，《党史札记二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11月第一版，119、120页。
- 【注42】** 同【注41】，119页。
- 【注43】** 肖劲光著，《肖劲光回忆录（续）》，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2月第一版，226页。

- 【注44】 吴殿卿等著，《毛泽东与海军将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1999 年 1 月第一版，50 页。
- 【注45】 同【注 43】，265 页。
- 【注46】 《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大事辑要》，红旗出版社 1987 年版，162 页。
- 【注47】 同【注 17】，272、273 页。
- 【注48】 李先念著，《李先念文选 1935—1988》，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1 月第一版，258—260 页。
- 【注49】 同【注 4】，282、283 页。
- 【注50】 同【注 1】，下卷 1069、1073、1097 页。
- 【注51】 《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12 月第一版，421、424、439 页。
- 【注52】 同【注 51】，549 页。
- 【注53】 薄一波著，《若干重大事件与决策回顾》，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下卷 1026、1027 页。
- 【注54】 同【注 11】，中卷 455 页。
- 【注55】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7 月第一版，260 页。
- 【注56】 同【注 1】，下卷 1196 页。
- 【注57】 同【注 1】，下卷 1197 页。
- 【注58】 黄瑶著，《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1994 年 6 月第一版，207 页。
- 【注59】 同【注 1】，下卷 1419 页。
- 【注60】 廖盖隆著，《党史探索》，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 年版，140 页。
- 【注61】 同【注 51】，328—331 页。
- 【注62】 同【注 6】，4 页。
- 【注63】 少华等著，《林彪的这一生》，湖北人民出版社 2003 年 3 月第二版，325 页。

**【注64】** 丁群著，《刘顺元传》，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315 页。

**【注65】** 同【注 63】。

**【注66】** 王昊等著，《开国上将叶飞》，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 年 5 月第一版，452 页。

**【注67】** 同【注 63】，325、326 页。

**【注68】** 同【注 63】，326 页。

**【注69】** 官伟勋著，《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3 年 5 月第一版，214、215 页。

**【注70】** 同【注 69】，215 页。

#### 第四章：“文革”序幕

**【注1】** 点点著，《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7 年 7 月第一版，201 页。

**【注2】** 黄瑶著，《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1994 年 6 月第一版，202 页。

**【注3】** 黄瑶等著，《罗瑞卿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6 年版，479 页。

**【注4】** 《贺龙传》编写组著，《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3 年版，第十九章。

- 【注5】 同【注3】，500页。
- 【注6】 杨万青等著，《刘亚楼将军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6月第一版，175、176页。
- 【注7】 同【注3】，498、499页。
- 【注8】 同【注3】，499、500页。
- 【注9】 同【注1】，194页。
- 【注10】 同【注2】，258页。
- 【注11】 同【注2】，266、267页。
- 【注12】 肖劲光著，《肖劲光回忆录（续）》，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2月第一版，249、250页。
- 【注13】 罗点点著，《红色家族档案—罗瑞卿女儿点点记忆》，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1月第一版，183页。
- 【注14】 同【注3】，523、524页。
- 【注15】 同【注13】，152页。
- 【注16】 同【注13】，153页。
- 【注17】 张明远著，《我的回忆—张明远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4月第一版，393、394页。
- 【注18】 同【注2】，140页。
- 【注19】 同【注13】，144页。
- 【注20】 张化等主编，《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第二卷710页。
- 【注21】 张耀祠著，《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6年9月第一版，29页。
- 【注22】 同【注21】，31页。
- 【注23】 同【注2】，283页。
- 【注24】 同【注2】，277、278页。
- 【注25】 陈丕显著，《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39页。
- 【注26】 同【注22】。
- 【注27】 同【注2】，286、287页。

- 【注28】 同【注1】，213页。
- 【注29】 同【注3】，540页。
- 【注30】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下卷1400页。
- 【注31】 康克清著，《康克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8月第一版，469页。
- 【注32】 《杨成武谈罗瑞卿揭批实情》，《炎黄春秋》2005年第十期，1—9页。
- 【注33】 同【注20】，第二卷715页。
- 【注34】 同【注32】。
- 【注35】 同【注2】，318页。
- 【注36】 同【注30】，下卷1330、1331页。
- 【注37】 曾志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320页。
- 【注38】 同【注25】，190页。
- 【注39】 师哲著，《峰与谷—师哲回忆录》，红旗出版社1992年版，3页。
- 【注40】 同【注30】，下卷983页。
- 【注41】 丁群著，《刘顺元传》，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319页。
- 【注42】 同【注25】，4页。
- 【注43】 同【注30】，下卷1397页。
- 【注44】 同【注25】，31页。
- 【注45】 同【注30】，下卷1398页。
- 【注46】 同【注20】，第二卷378、379页。
- 【注47】 同【注20】，第二卷391页。
- 【注48】 同【注20】，第二卷394页。
- 【注49】 同【注20】，第二卷395、400页。

**【注50】** 陈清泉等著，《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 年版，488 页。

**【注51】** 黄峥执笔，《王光美访谈录》，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6 年版，392—394 页。

**【注52】** 同【注 20】，第二卷 718—720 页。

**【注53】** 同【注 20】，第二卷 720 页。

**【注54】** 同【注 20】，第二卷 722、723 页。

## 第五章：跃居副统帅

**【注1】**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第一版，下卷 1419、1420 页。

**【注2】** 王年一著，《1949—1989 年的中国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第一版，15 页。（同见张化等主编，《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年 1 月第一版，第二卷 723 页。）

**【注3】** 同【注 2】，26 页。

**【注4】** 同【注 1】，下卷 1417 页。

**【注5】** 同【注 1】，下卷 1418 页。

**【注6】** 同【注 1】，下卷 1422 页。

- 【注7】 徐彬著，《风雨福祿居—刘少奇在文革中的抗争》，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92、93 页。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第一版，下卷 1427、1428 页。
- 【注8】 朱仲丽著，《疾风知劲草—毛泽东与王稼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9 年 1 月第一版，300 页。
- 【注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第一版，下卷 46 页。
- 【注10】 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37 页。
- 【注11】 陈丕显著，《陈丕显回忆录—在“一月风暴”的中心》，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第一版，85 页。
- 【注12】 丁群著，《刘顺元传》，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361 页。
- 【注13】 张云生著，《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 1988 年 7 月第一版，76 页。
- 【注14】 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 7 月第一版，562 页。
- 【注15】 同【注 13】。
- 【注16】 同【注 9】，下卷 51 页。
- 【注17】 董保存著，《谭震林外传》，作家出版社 1992 年 6 月第一版，130 页。
- 【注18】 李烈主编，《贺龙年谱》，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2 月第一版，775 页。
- 【注19】 廖汉生著，《廖汉生回忆录（续）》，解放军出版社 2003 年 9 月第一版，283 页。
- 【注20】 黄瑶著，《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1994 年 6 月第一版，36 页。
- 【注21】 陈虹著，《总参“8.25”事件》，载《党史博览》1999 年第九期。
- 【注22】 同上。

- 【注23】** 王嘉翔著，《大将许光达》，辽宁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7 月第一版，379 页。
- 【注24】** 同【注 19】，258 页。
- 【注25】** 顾英奇主编，《红色保健》，华龄出版社 2003 年版，243、249 页。
- 【注26】** 同【注 18】，780 页。
- 【注27】** 同【注 13】，38、39 页。
- 【注28】** 张佐良著，《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个保健医生的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 12 月第一版，125 页。
- 【注29】** 高振普著，《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93、94 页。
- 【注30】** 同【注 18】，788、789 页。
- 【注31】** 邱石著，《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经济日报出版社 1998 年 2 月第一版，下册 498、499、504 页。
- 【注32】** 同【注 18】，797 页。
- 【注33】** 肖云著，《我的母亲——长征中最小的红军》，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4 年 1 月第一版，317 页。
- 【注34】** 同【注 13】，65 页。
- 【注35】** 同【注 13】，117 页。
- 【注36】** 同【注 14】，561 页。
- 【注37】** 同【注 19】，258 页。
- 【注38】** 同【注 14】，566 页。
- 【注39】** 刘英著，《在历史的激流中——刘英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2 年 9 月第一版，117 页。
- 【注40】** 同【注 33】，316、317 页。
- 【注41】** 同【注 33】，317 页。
- 【注42】** 同【注 39】，154 页。
- 【注43】** 曾志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实录》，广东人民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320 页。
- 【注44】** 同【注 33】，318 页。
- 【注45】** 同【注 34】。

- 【注46】 同【注 33】， 340 页。
- 【注47】 同【注 2】， 287 页。
- 【注48】 同【注 13】， 121 页。
- 【注49】 同【注 14】， 559 页。
- 【注50】 同【注 34】。
- 【注51】 同【注 13】， 67 页。
- 【注52】 同【注 13】， 68 页。
- 【注53】 同【注 33】， 363、364 页。
- 【注54】 同【注 13】， 115 页。
- 【注55】 同【注 13】， 122 页。
- 【注56】 同【注 35】。
- 【注57】 同【注 55】。
- 【注58】 严家其、高皋著，《“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6 年 9 月第一版，334 页。
- 【注59】 李德生著，《李德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7 年 8 月第一版，388 页。
- 【注60】 张宗逊著，《张宗逊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0 年 10 月第一版，466 页。
- 【注61】 杨成武著，《杨成武将军自述》，辽宁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317 页。
- 【注62】 同【注 33】， 368 页。
- 【注63】 钟文编著，《百年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5 年 1 月第一版，92 页。
- 【注64】 萧克著，《朱毛红军侧记》，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 1 月第一版，19 页。
- 【注65】 同【注 58】， 254 页。
- 【注66】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二册《对傅连璋来信的批语》，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版。
- 【注67】 同【注 61】， 303 页。
- 【注68】 同【注 61】， 305 页。

- 【注69】 同【注 13】， 134 页。
- 【注70】 同【注 61】， 309 页。
- 【注71】 同【注 13】， 135、136 页。
- 【注72】 同【注 13】， 138、140 页。
- 【注73】 同【注 61】， 374、339、340 页。
- 【注74】 傅崇碧著，《傅崇碧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 年 12 月第一版，212 页。
- 【注75】 同【注 74】， 219 页。
- 【注76】 同【注 13】， 149 页。
- 【注77】 同【注 61】， 341 页。
- 【注78】 王年一著，《1949—1989 年的中国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第一版，292 页。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第一版，下卷 226 页。
- 【注79】 官伟勋著，《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3 年 5 月第一版，225 页。
- 【注80】 聂荣臻著，《聂荣臻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84 年版，854 页。

## 第六章：林彪集团、家族概况

- 【注1】 官伟勋著，《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3 年 5 月第一版，151 页。
- 【注2】 王年一著，《1949—1989 年的中国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第一版，376 页。
- 【注3】 同上。
- 【注4】 徐景贤著，《十年一梦—徐景贤文革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4 年 6 月第一版，255 页。
- 【注5】 同【注 1】。
- 【注6】 张云生著，《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 1988 年 7 月第一版，232、233 页。
- 【注7】 张化等主编，《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年 1 月第一版，第二卷 713 页。
- 【注8】 同【注 6】，98、99 页。
- 【注9】 同【注 1】，222 页。
- 【注10】 同【注 6】，248—254 页。
- 【注11】 同【注 1】，220、221 页。
- 【注12】 同【注 1】，55 页。
- 【注13】 同【注 6】，366、368、369、408、411、415 页。
- 【注14】 朱仲丽著，《毛泽东、王稼祥在我的生活中》，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 年 10 月第一版，218 页。
- 【注15】 张聂尔著，《中国 1971—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 1999 年 6 月第一版，177 页。
- 【注16】 同【注 6】，328 页。
- 【注17】 同【注 15】，179 页。
- 【注18】 同【注 6】，326 页。
- 【注19】 同【注 15】，178 页。
- 【注20】 同【注 15】，178、179 页。
- 【注21】 同【注 15】，170 页。
- 【注22】 同【注 6】，340、341、358、359 页。
- 【注23】 同【注 4】，156—164 页、182—186 页。

- 【注24】 同【注6】，327页。
- 【注25】 同【注15】，180页。
- 【注26】 同【注15】，181—183页。
- 【注27】 邵一海著，《“联合舰队”的覆灭》，春秋出版社1988年5月第一版，44页。
- 【注28】 詹杨著，《战将的足迹—詹才芳将军的故事》，湖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8月第一版，334页。
- 【注29】 同【注7】，第四卷1232页。
- 【注30】 同【注4】，257、258页。
- 【注31】 何力编，《林彪家族纪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年1月第一版，186页。
- 【注32】 伍修权著，《回忆与怀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第一版，453、454页。
- 【注33】 同【注20】。
- 【注34】 同【注6】，69—75页。
- 【注35】 肖思科著，《知情者说3—历史关键人物留给后世的真相》，中国青年出版社1998年版，133页。
- 【注36】 王凡著，《知情者说第三辑之七》，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88、89页。
- 【注37】 同【注6】，169、170、177—184页。
- 【注38】 同【注36】，87页。

## 第七章：分道扬镳

- 【注1】** 张云生著，《毛家湾纪实—林彪秘书回忆录》，春秋出版社 1988 年 7 月第一版，156、157 页。
- 【注2】** 陈伯达著，《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天地图书有限公司 1998 年版，108 页。
- 【注3】** 同【注 1】，184—190 页。
- 【注4】** 徐景贤著，《十年一梦—徐景贤文革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4 年 6 月香港第一版，136—156 页。
- 【注5】** 同【注 1】，247、202、203、209 页。
- 【注6】** 同【注 1】，163、164 页。
- 【注7】** 迟泽厚著，《我所知道的温玉成》，载《南方周末》2005 年 7 月 28 日。
- 【注8】** 同上。
- 【注9】** 同【注 1】，220—224 页。
- 【注10】** 张化等主编，《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0 年 1 月第一版，第二卷 713 页。
- 【注1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第一版，下卷 191 页。
- 【注12】** 王年一著，《1949—1989 年的中国—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第一版，391、392 页。
- 【注13】**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第一版，下卷 1545、1546 页。
- 【注14】** 金春明等著，《“文化大革命”简史》，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6 年 7 月第一版，203 页。
- 【注15】** 张耀祠著，《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6 年 9 月第一版，122—125 页。
- 【注16】** 同【注 1】，243—246 页。
- 【注17】** 同【注 1】，316—319 页。

- 【注18】** 汪东兴著，《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一版，14 页。
- 【注19】** 同【注 18】，14、15 页。
- 【注20】** 同【注 13】，下卷 1547 页。
- 【注21】** 同【注 13】，下卷 1450 页。
- 【注22】** 同【注 1】，227 页。
- 【注23】** 同【注 4】，225 页。
- 【注24】** 同【注 1】，224、324 页。
- 【注25】** 同【注 14】，230 页。
- 【注26】** 李剑主编，《中共历史转折关头—关键会议亲历实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8 年 3 月第一版，751 页。
- 【注27】**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 1 月第一版，647 页。
- 【注28】** 同【注 1】，384 页。
- 【注29】** 冯治军著，《林彪与毛泽东》，皇福国际有限公司 1996 年版，542 页。
- 【注30】** 同【注 2】，134 页。
- 【注31】** 同【注 11】，下卷 386、387 页。
- 【注32】** 同【注 2】，118 页。
- 【注33】** 张聂尔著，《中国 1971—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 1999 年 6 月第一版，230 页。
- 【注34】** 同【注 12】，388 页。
- 【注35】** 同【注 33】，216 页。
- 【注36】** 江波等著，《林彪 1959 年以后》，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209、263 页。
- 【注37】** 同【注 33】，222 页。
- 【注38】** 权延赤著，《走下圣坛的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3 年 1 月第一版，334 页。

- 【注39】 杜易著，《大雪压青松—“文革”中的陈毅》，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7 年 1 月第一版，217、218 页。
- 【注40】 同【注 4】，207 页。
- 【注41】 同【注 10】，第四卷 1220 页。
- 【注42】 同【注 13】，下卷 1579 页。
- 【注43】 同【注 2】，124 页。
- 【注44】 同【注 18】，62—65 页。
- 【注45】 同【注 18】，67—71 页。
- 【注46】 逢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 年 12 月第一版，下卷 1586 页，汪东兴著，《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一版，73 页。
- 【注47】 同【注 18】，75—78 页。
- 【注48】 陈先瑞著，《陈先瑞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 1999 年 3 月第一版，460 页。
- 【注49】 纪希晨著，《史无前例的年代》，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1 年版，下册 534、540—544 页。
- 【注50】 同【注 13】，下卷 1589、1590 页。
- 【注51】 同【注 49】，下册 555 页。
- 【注52】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 2 月第一版，下册 1031 页。

## 第八章：林彪之死

- 【注1】 熊向晖著，《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9 年 1 月第一版，406—414 页。
- 【注2】 汪东兴著，《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当代中国出版社 1997 年 11 月第一版，88—97 页。
- 【注3】 张耀祠著，《张耀祠回忆毛泽东》，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6 年 9 月第一版，104、105 页。
- 【注4】 纪希晨著，《史无前例的年代》，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1 年版，下册 579 页。
- 【注5】 司任著，《昨夜星辰系列丛书之五一文化大革命风云人物访谈录》，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1993 年 8 月第一版，413、414 页。
- 【注6】 徐景贤著，《十年一梦—徐景贤文革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 2004 年 6 月第一版，233 页。
- 【注7】 官伟勋著，《我所知道的叶群》，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3 年 5 月第一版，242、243 页。
- 【注8】 李文普著，《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载《中华儿女》1999 年第二期。同时可以参见李文普著《林彪事件与我》，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通讯 93》增刊第 252 期，2001 年 2 月 21 日出版。
- 【注9】 王年一著，《1949—1989 年的中国—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12 月第一版，424 页。
- 【注1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 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年 5 月第一版，下卷 440 页。
- 【注11】 同【注 9】，406 页。
- 【注12】 同【注 9】，437 页。

- 【注13】 同【注9】，422页。
- 【注14】 同【注5】，411—413页。
- 【注15】 张聂尔著，《中国1971—风云九·一三》，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6月第一版，273、274、277页。
- 【注16】 任桂兰等著，《统领万岁军—梁兴初将军的戎马生涯》，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版，545、546页。
- 【注17】 同【注8】。同时参见李文普著《林彪事件与我》，载《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通讯93》增刊第252期，2001年2月21日出版。下同。
- 【注18】 同【注2】，188—190页。
- 【注19】 同【注15】，302—304页。
- 【注20】 同【注5】，414、415页。
- 【注21】 同【注15】，296、297页。
- 【注22】 同【注6】，247页。
- 【注23】 同【注2】，171—175页。
- 【注24】 张化等主编，《回首文革》，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1月第一版，第四卷1224、1225页。
- 【注25】 邵一海著，《“联合舰队”的覆灭》，春秋出版社1988年5月第一版，254—256页，268页。
- 【注26】 同【注2】，203—205页。
- 【注27】 同【注17】。
- 【注28】 同【注25】，271—273页。
- 【注29】 刘吉纯口述，《林彪出逃前夜》，载《文汇读书周报》2005年6月3日。
- 【注30】 同【注25】，274—277页。
- 【注31】 同【注17】。
- 【注32】 同【注25】，280—282页。
- 【注33】 邱石著，《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2月第一版，下册558—560页，李德生著《从庐山会议到九·一三事件的若干回忆》。
- 【注34】 同【注2】，208、209页。

- 【注35】 高振普著，《周恩来卫士回忆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123页。
- 【注36】 张佐良著，《周恩来的最后十年——一个保健医生的回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239页。
- 【注37】 同【注35】，127页。
- 【注38】 同【注2】，212页。
- 【注39】 王焰主编，《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第一版，836页。
- 【注40】 符浩著，《风云沧桑集——符浩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年5月第一版，159页。
- 【注41】 周秉德著，铁竹伟执笔，《我的伯父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八章《苦涩的辉煌》，283—346页）
- 【注42】 同【注15】，306、307页。
- 【注43】 董保存著，《知情者说第三辑之八》，中国青年出版社2004年1月第一版，311、312页。
- 【注44】 同【注1】，413页。
- 【注45】 同【注2】，217、218页。
- 【注46】 同【注24】，1239—1241页。
- 【注47】 同【注35】，130、131页。
- 【注48】 同【注24】，1241、1243页。
- 【注49】 黄克诚著，《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二版，377—381页。